

第一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
論文集

主辦單位：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2015 年 10 月

目次

壹、 會議議程

貳、 議事規則

參、 會議內容

肆、 論文發表

壹、會議議程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4001 室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林文程會長致詞
	開幕演講—China's Maritime Expa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演講人：飯田將史（日本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主持人：林文程會長
09:30-11:00 (90mins)	場次一：日本政治
	主持人：林文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1 戰後日本「台灣研究」之發展變遷 發表人：陳怡璇（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林文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2 從戰後「憲法九條論爭」看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內涵 發表人：林彥瑜（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楊鈞池（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 1-3 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日本國防外交突破與未來可能發展 發表人：魏丞宣（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楊鈞池（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 1-4 日本與南韓在加入美國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決策上差異之比較： 以威脅可信度視角分析 發表人：徐圓媛（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郭育仁（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11:00-11:10	茶敘
11:10-12:40 (90mins)	場次二：日本產業經濟
	主持人：李世暉（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2-1 日本動畫產業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研究 發表人：吳亞儒（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郭永興（台中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2-2 跟隨與自主-日本戰後航空產業研究 發表人：林本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郭永興（台中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2-3 東亞區域整合的新現實主義迴歸？——以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為案例 發表人：侯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李世暉（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2-4 台日在中國之產業合作戰略 發表人：吳佳育（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李世暉（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12:40-14:00	茶敘
14:00-15:10 (70mins)	場次三：日本社會與其他 主持人：黎立仁（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3-1 日本動畫的數位化發展與聖地巡禮：以京都動畫與 P.A.works 為例 發表人：嚴翔彬（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黃美惠（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3-2 全球氣候變遷的農業課題與日本環境保護之國際參與實況研究 發表人：李曉佩、鄭淳夷（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黃美惠（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3-3 論促進社會參與之日本社會福祉法制—以「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為例 發表人：王鼎棧（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黎立仁（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50 (90mins)	場次四：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 主持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4-1 從多元啟發理論分析日本在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政策 發表人：李明勳（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郭育仁（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4-2 以東亞地緣政治看中日戰略 發表人：吳沛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許家豪（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助理教授） 4-3 日澳戰略夥伴關係下的潛艦合作 發表人：陳鼎尹（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4-4 戰後北方四島爭端中的美國因素—日俄關係歷史分析 發表人：楊中天（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16:50-17:10	評審討論
17:10-17:30	頒獎暨閉幕
18:00	晚宴

貳、議事規則

一、會議時間分配：

1. 每位主持人加每位發表人：8 分
2. 每位評論人加自由討論：10 分
3. 提問與回應(綜合討論)：15 分

二、鈴響規則：

1. 發表結束前 2 分鐘，第一次按鈴(2 響)。
時間到，第二次按鈴(3 響)。第二次按鈴後，請結束發表。
2. 討論時間到按鈴(2 響)。

三、發言規則

1. 擬發問者請先說出所屬單位名稱、姓名後簡潔發問。
2. 發問時間以不超過 2 分鐘為限。

參、會議內容

為培養台灣新一代日本研究人才，以深耕並強韌台灣的日本研究基礎，使台灣的日本研究得以茁壯繁盛，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於 2015 年特創立年度「日本研究青年論壇」論文獎研討會，下設「日本政治」、「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日本產業經濟」、「日本社會與其他」共四大領域之優秀論文獎項，以提供台灣各大專院校博碩生發表其研究成果之管道與並獎勵之，以刺激年輕研究人才投入日本研究相關領域，並建立其持續不懈研究日本之信心。當代日本研究學會並邀請日本研究學者參加「日本研究青年論壇」論文獎研討會，以評論入選發表之論文，並與博碩生對話，以表揚年輕研究人才並使其精進，並擴展台灣的日本研究社群網絡。「日本研究青年論壇」將於 2015 年 10 月 25 日（週日）舉辦，會議地點為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本會以碩博士研究生為主角，期盼能透過彼此的發表與相互的評論，針對涵蓋日本安全、外交乃至經濟社會等多面向議題的探究與分享，讓新興學者可以成為未來引領台灣日本研究前進的種子。

肆、論文發表

場次一：

日本政治

戰後日本「台灣研究」之發展變遷

陳怡璇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同屬於東亞區域範圍內的日本和台灣，其歷史糾葛源遠流長，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五十年之久，然而，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國際情勢大幅變動，其在區域研究下面對台灣的態度轉變亦與國內外的環境息息相關。本文欲透過整理戰後各時期日本對台灣之研究文獻，同時藉由「日本台灣學會」所編纂之『戰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將其所收納之文獻依據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社會科學領域的九類主學門進行分門別類，進而分析各時期日本對台灣的認識，探討戰後日本「台灣研究」的發展變遷。

壹、日本的區域研究

日本的政治學者—國分良成將區域研究定義為，「發現世界各區域的獨特之處，並對其進行深入的理解與探究」。一般來說，區域研究即為選定這個世界中的某一塊區域，進而對其的獨特性進行解釋和實證性的研究，因此首先應學習該區域之語言，並透過實地考察以及共同研究的方式進一步釐清該區域之特性為區域研究之首要任務。區域研究自美國發源，主要發展原因為美國為了解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所處之戰爭區域之情報而所因應出現。1943年，美國的社會科學評議會即提出一份《社會科學領域下的區域研究》之報告書，其目的在於提出培育區域研究相關人才之重要性。同年，成立美國第一個有關區域研究的研究學會—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也因於此，為了解決盟軍是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所困擾之美國政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委託美國的人類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進行研究，其藉由文化類型理論以及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分析當時的敵對國，仔細闡述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以及習慣等等，進而彙整而成提出報告，於1946年出版『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¹

1947年日本於美軍佔領期間設立「美國學會」，1953年設立「亞細亞政經學會」，1956年成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隨著美國式的區域研究在日本快速的發展，1955年北海道大學成立斯拉夫研究中心，1958年成立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和同志社大學的美國研究所，1959年設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而所謂美國式的區域研究，最直接的體現為，1963年京都大學接受福特集團的支援所成立的東南亞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成立之時，當時的京都校長平澤興便指出，「其著手於研究東南亞之時，首要欲確認之事為此研究之目的在於對該區域進行科學式的深入理解，而非關於任何政治上的立場」。因此，雖然區域研究為一

¹國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國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地域から見た国際政治》，東京都：有斐閣，2009年，頁4-6。

門由美國引入之學術研究項目，但相較之下日本提引出其較明確的去政治化的意圖，並著重於對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的認識。1980年代，前往日本留學的亞洲各國學生之數量快速攀升，同時也出現勞動者的流入現象，面對此一現象的日本，其相關區域研究以及國際關係教育的人才需求再度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存在感也隨著因越戰而疲憊不堪的美國以及自身自戰後以來經濟快速發展所形成的經濟高度成長而被世界其他國家所再度注意，促使許多國家出現了「日本研究」的現象。而日本本身除了關於區域研究和國際問題的研究機構數量再度擴張外，在大學科系以及研究所的名稱上與區域研究和國際關係相關聯者更是日益增加。²

貳、戰後日本的台灣研究

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即陸續出現有關台灣之學術研究團體，1977年，「台灣史研究會」成立，為當時大阪市立大學的森田名教授以及三名年輕的研究學者所發起，後由關西大學的石田浩教授持續發展，直至2006年3月，由兵庫教育大學的松田吉郎接手成為新的代表。「台灣史研究會」為一以台灣為研究對象，含括不同職業的研究人才、戰前時期於台灣生活開始著手台灣研究的碩士學生以及在日本留學中或已留學歸國的台灣人等富含多樣化色彩的研究會，且研究範圍不單只有歷史方面，與台灣相關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教育等等皆為其中，至今組織運作超過三十年，其對於日本的台灣研究之貢獻不可言喻，因而於2007年獲得「日本學術會議協力學術研究團體」的認證，現今的主要活動內容為每兩個月一回定期舉辦的定期研究會以及每年兩回的『現代台灣研究』（舊名：台灣史研究）的刊行。³

1991年，日本天理大學決議組織以促進台灣相關學術發展為其目標的「天理台灣研究會」，自1991年6月起每年舉辦研究發表會，其各學者所發表之研究論文皆刊載於『天理台灣學報』，1995年「天理台灣研究會」更名為「天理台灣學會」，至2015年6月底為止，共計舉辦二十五回研究大會，為日台雙方學者進行交流之學術平台。⁴

自十七世紀以來，原居中國大陸的漢族開始大量移民台灣，同時也將原有的中國特色一併帶入，因此，廣義來說，有關於台灣方面的學術研究多半是包含於中國研究當中進行。然而，有一批日本學者認為，台灣位處於日本與東南亞連結之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路線之中心點，且與中國大陸之間有台灣海峽將其兩者相隔分開，而在民族結構的組成上，原屬於南島語系而非漢民族的居住

²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地域から見た国際政治》，東京都：有斐閣，2009年，頁9-10。

³台灣史研究会，研究会の概要，http://www.geocities.jp/taiwan_studies/about/about.html，（進入日期 2015年7月5日）。

⁴天理台灣学会，<http://www.tenri-u.ac.jp/tngai/taiwan/index.htm>，（進入日期，2015年，7月25日）。

地，因此台灣社會出現與中國主流社會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不同的發展，同時，藉由其地理位置之優越性，伴隨經濟發展的躍進，成為台灣歷史的發展特色，有鑑於此，從事台灣研究的日本學者認為，應建立一套專屬於台灣的區域研究系統，從而進行跨學科的區域研究，擺脫過去位居中國研究領域下的地方研究，發展成為具有獨立性的台灣區域研究，因此集結了三十一位學者，於1997年成立「日本台灣學會」(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簡稱JATS),作為日本關於台灣研究的研究學者之間相互連結、合作的基點以及日本與其他國家地區關於台灣研究的交流窗口。⁵同時，「日本台灣學會」亦蒐集整理自戰後以來日本方面有關台灣之研究內容，進而編輯成一檢索目錄—

『戰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至2015年7月15日為止共收錄一萬兩千三百三十一筆文獻資料，其內容含括廣泛，為一系統性的檢索目錄。⁶1999年5月，「日本台灣學會」開始發行『日本台灣學會報』，一年一期，至2015年6月為止共發行十七期。

2003年10月，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成立了以台灣為研究重點的「台灣研究所」，主要目的為促進日本和台灣學術界之間的交流和增進日台雙方的相互理解，其持續提供相當程度的支援，積極地促進深入台灣研究的展開。成立初期，透過設立「了解台灣」之講座組織、訪台遊學團、收集整理台灣相關資料、舉辦與台灣議題相關之演講等方法，以及2006年開始開辦的日台市民社會相互交流平台為主要發展模式。在累積部分的研究成果之後，於2007年與明石書店協定合作，出版「台灣研究叢書」系列—『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民主化-日本、台湾、韓国にみる』、『東アジアの社会運動と民主化』、『台湾人元日本兵の手記小説集-生きて変帰る』、『東アジア新時代の日本と台湾』和『台湾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と祖国化—二・二八事件前後の文学運動から』，主要著墨於日台關係、日台市民社會、台灣經濟和台灣文化。2008年4月，台灣研究所提出了第二次的五年計畫，其主要目標有三：首先為研究基礎的明確具體化；由於自2003年成立台灣研究所以來，其對於「台灣研究」所處之研究位置尚處於模糊階段，為能進一步加以明確定義，因而決議於2009年4月時將其隸屬單位從原先的綜合研究機構變更為亞洲研究機構，欲透過運作組織上主管機構的改變，進而使其更便利地與關於亞洲區域的研究活動相互連結，達到互通合作的效果，同時利用台灣研究作為其研究特點，進一步與各領域的研究計畫接軌，進行共同研究和教育活動，且透過國內外有關於台灣研究學者之間的交流討論等方式，營造更加多元完善的台灣研究的基礎環境。其次為培育豐富的日本關於台灣研究方面之專業人才；於2009年開始開授關於區域研究下的台灣之課程內容，期望能出現更多對台灣持有高度關心且進

⁵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http://www.jats.gr.jp/shuisho.html>，(進入日期，2015

年 8 月 2 日)。

⁶ 日本台湾学会，戰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http://www.koryu.or.jp/taiwanstudies.nsf>，(進入日期,2015 年 8 月 2 日)。

行台灣研究方面取得博士學位的研究學者，同時，以從事台灣研究方面的博士生和相關研究之學者為中心所組成的「台灣研究會」亦定期舉辦。第三點為強化以台灣為研究對象的教育體系；在早稻田大學成立台灣研究所之前，日本在進行區域研究之時，尚未將台灣研究置於一個清楚的定位，因此為了確保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們能持續順利地進行其研究，避免在進行研究活動之時受到各式各樣的阻礙，因而於第二期計畫中提出「台灣研究」之專題，目的即為了將台灣研究朝體系化的學術道路推進。⁷

參、日本於各時期對台灣的描述

根據「日本台灣學會」所編輯之『戰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1942年～2014年），於2014年2月17日為止共收錄10,099筆文獻。本文將其文獻進行分門別類，得出結果如下：刪去文獻目録當中重複收納之文獻筆數79筆，因此實際文獻筆數為10020筆，其中，社會科學領域共計7896筆，即：人類學1090筆，社會學1565筆，教育學458筆，心理學2筆，法律學264筆，政治學1931筆，經濟學1320筆，管理學409筆，區域研究及地理學857筆。人文學領域為2124筆，即：文學類1539筆，語言學163筆，歷史學106筆，哲學0筆，藝術學113筆，其他-人物傳記203筆。而本文僅就社會科學領域之文獻進行統計，因此統計數據將排除人文學領域之文獻。1942年至2014年，戰後日本在社會科學領域下對於台灣之相關文獻分佈比例如表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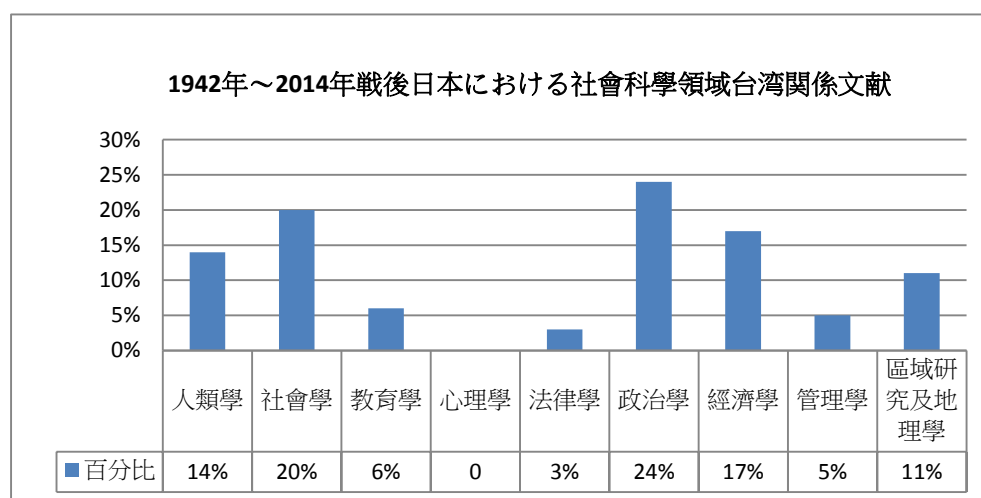


表1，本文自行繪製。

另更進一步依據年代，以十年為一單位，了解日本於不同時期上，對於台灣研究在各學門中所著重之比例及背後意義，解析台灣由殖民地轉變為經濟發展國家以至於現今於亞太地區所扮演之角色的變遷總結。

一、戰後至1960年代，以人類學、民族學為主的台灣

⁷早稻田大學 台灣研究所，<http://www.waseda.jp/prj-taiwan/gaiyou.html>，（進入日期 2015年7月15日）。

戰後至 1960 年代之文獻分類如表 2（1942 至 195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表 3（1951 至 196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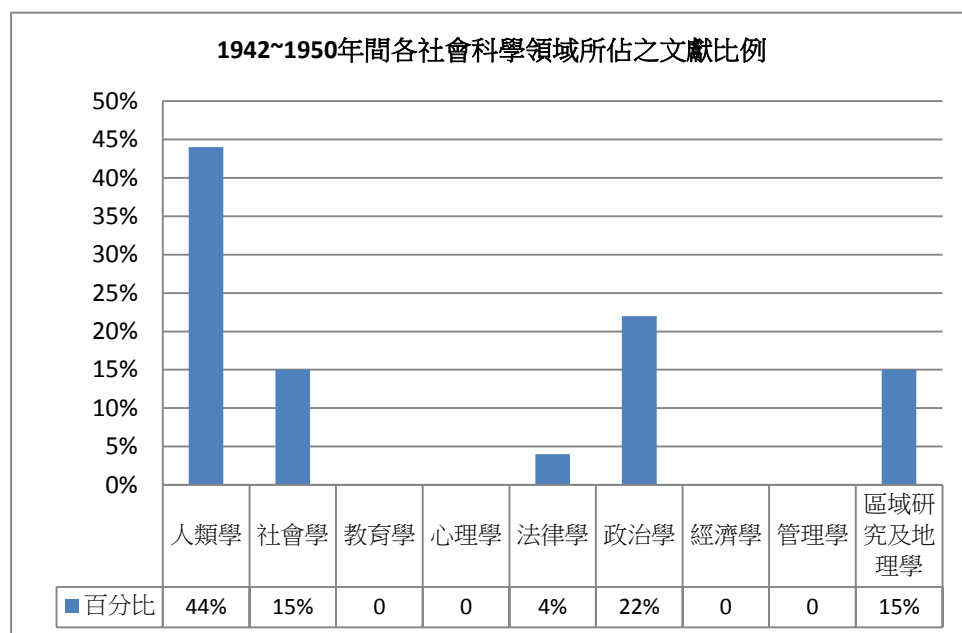


表 2，本文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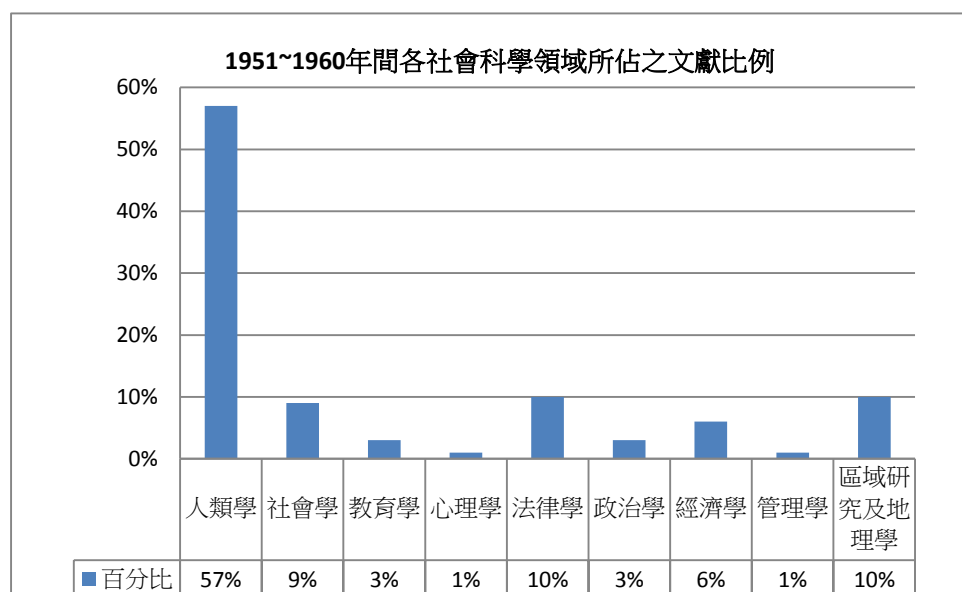


表 3，本文自行繪製。

歷史脈絡源自 1895 年，清朝於甲午戰爭中戰敗，進而使台灣成為日本帝國擴張之始於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在這段長達約 50 年的殖民統治時期當中，日本面對台灣所進行的主要學門研究便以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為大宗，而其中一個顯著的特徵為，當時的研究對象為佔居少數的原住民族群，而非當時人口數中佔大多數的漢族系的住民。在日治時期，以現地調查為基準，可將原住民族研究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 1896 年開始，由於當時尚未武力平定

成功，因此日本總督府的統治權力並未擴及至山區，此時期主要以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三人為研究者之代表，對未知的土地領域以「探險」的方式進行廣域式的調查。第二時期為 1909 年開始，透過總督府所設置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以官方主導的身份進行「五箇年計劃理蕃事業」的現地調查，雖然當此計畫結束之後仍遺留了尚未進行調查的部分地區，但透過此計畫完成後所發表的報告書-『蕃族調查報告書』以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可視為當時相當寶貴的原住民族之學術資料，然而，當時從事調查與執筆的負責人員-佐山融吉和小島由道等人，於調查結束後便未持續進行原住民族之相關研究，因此使得第二時期的原住民族調查研究在後期出現了空白的狀態，期間僅剩下森丑之助與原住民族持續保有的互動關係。1928 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此舉替第三時期的原住民族研究帶來一個新的轉機，在此一新設立之帝國大學中，以專家學者們為中心，對於昭和時期的台灣民族學和人類學方面進行更深入的原住民族調查研究，同時，此一時期原住民族的自身社會狀況亦發生大規模的變動，1930 年，賽德克族大規模的武裝抗爭，是為霧社事件。因此於霧社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總督府對於原住民族之統治方式改採更為高壓強制之手段，欲更快速地強迫去除原住民族之舊慣以及強化山地的開發，此一時期之代表人類學學者為馬淵東一，其於台北帝國大學創立之始，花費十餘年之時間於台灣各地進行原住民族之資料收集。⁸

在 1930 至 1932 年間，台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接受了前總督上山滿之進的補助，進而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並於 1935 年出版由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與馬淵東一共著之『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以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等兩部巨著，並分別獲得日本學術院賞及恩賜賞，⁹其中『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中將近四分之三的部分為馬淵東一所執筆，其內容將近六十萬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著作當中並未詳述記述台灣原住民族自十七世紀以來遭受各個外來勢力的影響，而是將重點完全放置於當前日本統治時期下的框架之中。¹⁰因此，即使在戰後，台灣已不為日本之殖民地，但在戰後初期，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仍著重於人類學之延續。

二、196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經濟奇蹟的台灣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文獻分類如表 4（1961 至 197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表 5（1971 至 198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表 6（1981 至 199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所示。

⁸笠原 政治，「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学と馬淵東一」，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近代「日本意識」の成立 民俗学、民族学の貢献』，東京：東京堂出版，2012 年，頁 124-125。

⁹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通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二期』，2006 年 11 月，頁 44。

¹⁰笠原 政治，「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学と馬淵東一」，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近代「日本意識」の成立 民俗学、民族学の貢献』，東京：東京堂出版，2012 年，頁 126-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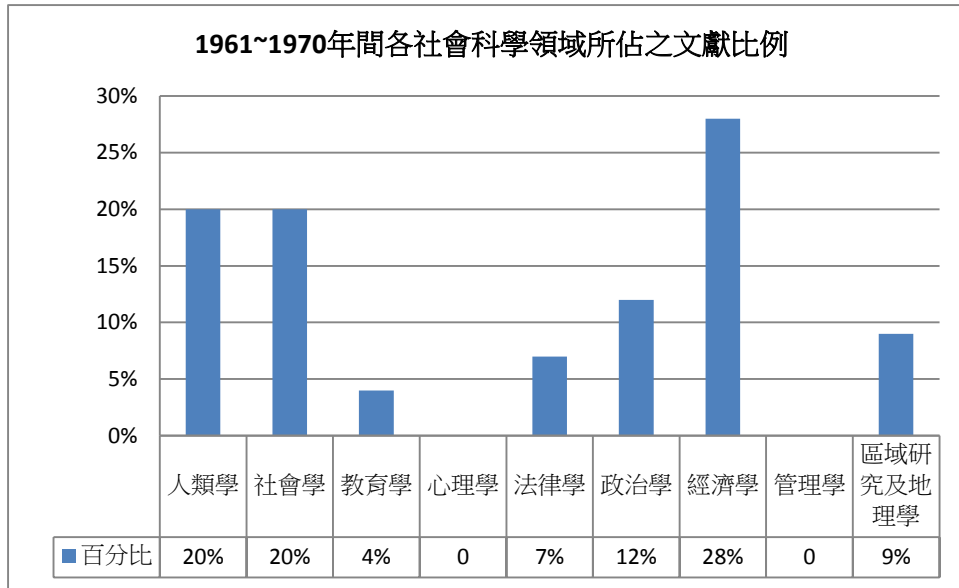


表 4，本文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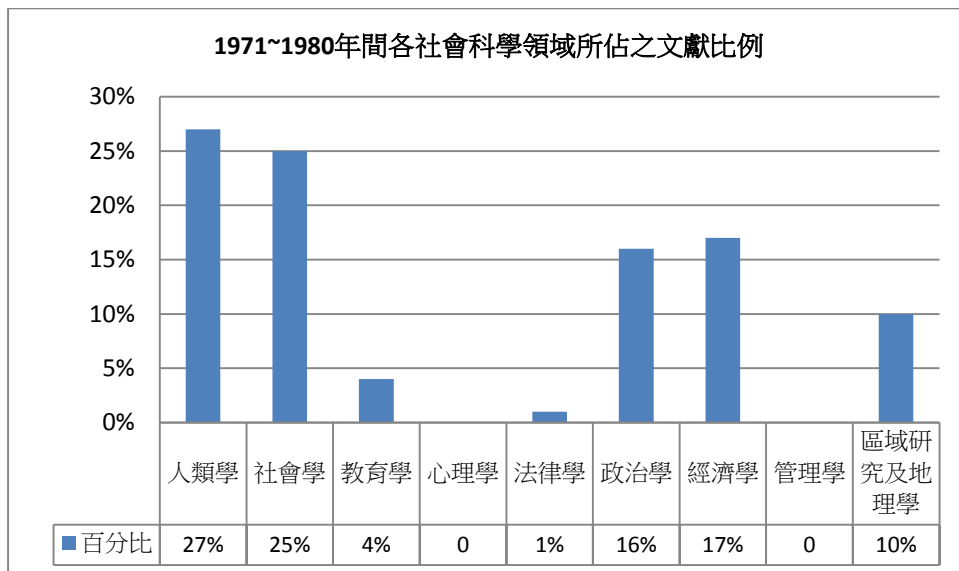


表 5，本文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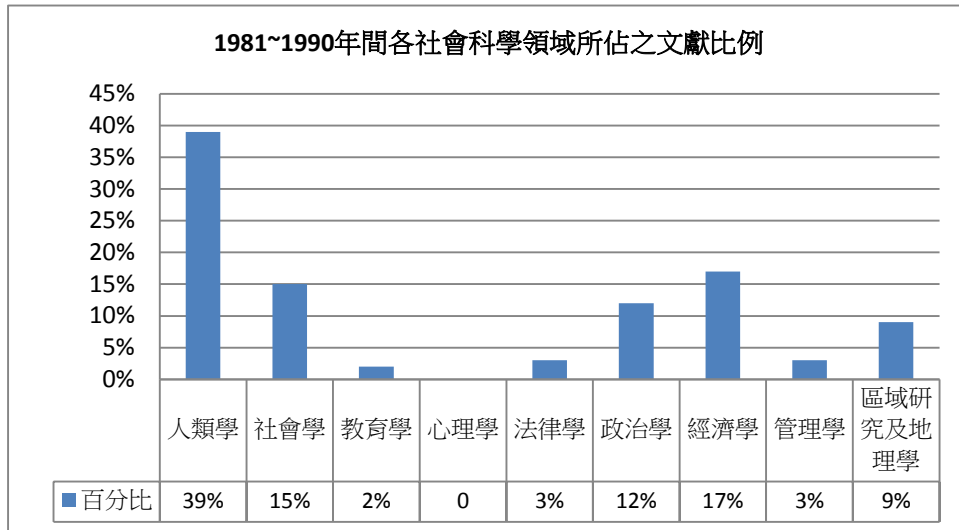


表 6，本文自行繪製。

依據本文所整理之圖表可發現，日本對於台灣經濟的研究數量於 1960 年代後期開始有著明顯的成長。然，根據戴國輝所著『台灣史の探索』一書指出，戰後日本對於台灣經濟方面的研究更可追溯自當時附屬於「中國研究所」研究團體底下之研究。1950 年出版，由岩村三千夫和米沢秀夫所撰寫之『台灣問題と台灣經濟』（中國研究所『中國資料月報』）為先驅，其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國際情勢下的台灣」，第二部份則為「台灣經濟的現況」。然而，米沢秀夫於撰寫台灣經濟部分之處時，同時表明提出：「現階段關於台灣經濟方面的資料尚未充足，因而無法進行詳細地分析」，因此對於二戰結束之後至 1952 年之間，台灣經濟的描述僅能透過當時的新聞記事，例如：『上海大公報』、『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香港經濟商報』、『同大公報』、『台灣經濟時報』等進而進行參考。至 1960 年代，「中國研究所」陸續發表了關於「美國的台灣政策」、「台灣經濟與美國援助」、「國際法上的台灣地位」方面的研究文章，然而，此階段關於台灣之相關研究，主要被美中關係架構下的「台灣問題」框架所主導。¹¹另外，於 1961 年所出版的三本著作，即：吉村曉和加藤芳男所共著『自由中國的表情』、木內信胤所著『現代的台灣』和近藤俊清所著『台灣的命運』。戴國輝認為，上述三本著作並不能歸類為學術研究專書，『自由中國的表情』一書為當時吉村曉和加藤芳男以隨行於總理大臣岸信介身旁的讀賣新聞記者之身份，透過其在旅行、訪問期間之所見所聞進行紀錄，因此評論的價值不高。而『現代的台灣』一書大致為根據世界經濟調查會的結果，將其原封不動地進行論述，可說是較為粗糙的整理，並未提出進一步的調查研究結果，然而，木內信胤在其中所提出「台灣位於經濟發展途中所應佔據代表之位置」，被認為之所以台灣位於區域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漸提

¹¹戴國輝，『戴國輝著作選 2 台灣史の探索』，（東京都：三省堂書店，2011 年 4 月），頁 328-329。

升，此為一不容忽視的開端。近藤俊清所著『台灣的命運』，其書中對於當時台灣所實行的農地改革提出質疑，舉出此項改革對於台灣農民而言是一項新的德政亦或是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壓榨手段，同時作者近藤俊清本身亦為台灣獨立運動的支持份子，¹²此點亦為一值得關注之處。

1960年代以前，日本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直至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第二，此一狀態維持將近40年之久，直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取代美國與日本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由此可見，日本與台灣之前的經濟關係一直以來都十分的緊密。¹³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東亞與台灣政策深深影響著日本的對台政策，然而，1971年10月，中國取得了其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權益，國際地位因而隨之提高，世界局勢也因而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同時，由於蘇聯奉行大國沙文主義政策，促使中蘇關係更為冷淡，另一方面，美國由於深受越戰情勢所苦，且在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中逐漸趨於下風，為扭轉此一局面，決定與當時和蘇聯對立的中國政府進行協商接觸，期望透過中國的力量，進而牽制蘇聯的擴張，以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勢力。而此大動作的外交舉動，在日本政界引起很大的震撼，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亦迅速做出了調整。1972年7月，田中角榮隨即與中國進行國交正常化的談判，同年9月，中日雙方簽署『中日聯合聲明』，而此聲明中的第二、三條提及：「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此一立場，並堅持貫徹『波次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進而確立了「七二體制」，即為基於中美『上海公報』以及『中日聯合聲明』所訂定之框架，日本政府將保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日本政府為維持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不至於完全破裂，雙方便互相設置了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日本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作為雙方相互交流的聯絡窗口，以持續實質的交流關係。¹⁴

在歷經一連串外交挫敗以及遭受國際孤立之衝擊下，1970年代初期的台灣對外政策轉向為經濟外交的強化。對於此時期的台灣來說，日本與美國所占之總輸入額及總輸出額為五成以上，為當時經濟貿易活動之重點國家，然而，日本方面由於1970年松村謙三訪中交涉之際，與當時中國主席周恩來訂下為維持日中貿易，日方所應遵守之四大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拒絕與符合以下四點之企業進行合作：1.受中華民國和韓國援助之企業。2.中華民國以及韓國所投資的企業。3.在越戰當中，以援助美國為目的，進行兵器和彈藥等等軍事物資供給的企業。4.為美國企業之子公司或合夥公司。因此與台灣關係匪淺的住友化學、三菱重工以及在日華協力委員會中的重要成員，包含三井物產等日本四

¹² 同上註，頁330。

¹³ 巴殿君，『冷戰後日本對台灣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頁111。

¹⁴ 巴殿君，『冷戰後日本對台灣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頁35-36。

大商社，皆因為「周四條件」的提出，而形成沈重的壓力，因此為了扭轉在國際社會上因退出聯合國所遭逢的低潮，轉而選擇「彈性外交」、「現實外交」之外交道路。¹⁵綜合國內外因素，此時期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尤以經濟方面的數量逐漸豐碩，研究重心對象出現變化。

三、1990 年代至今，兩岸關係下的台灣

1990 年代至今之文獻分類如表 7（1991 至 200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表 8（2001 至 201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表 9（2011 至 2014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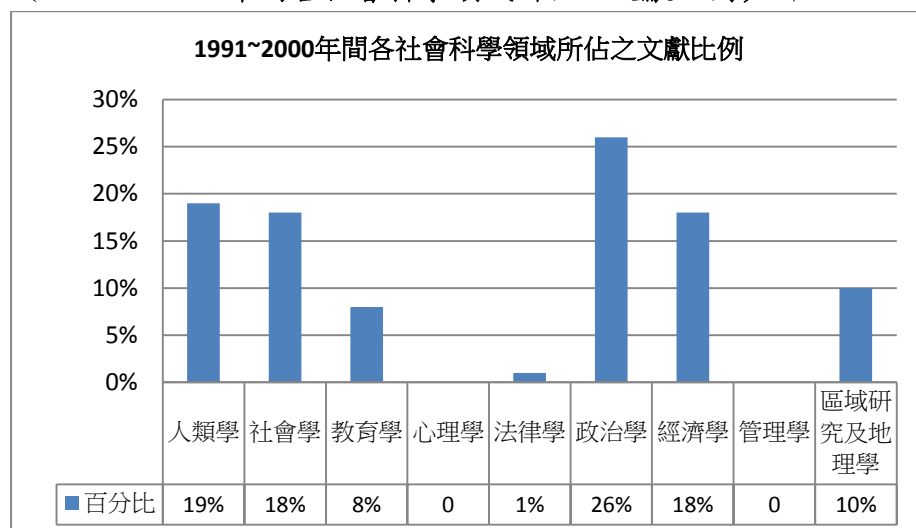


表 7，本文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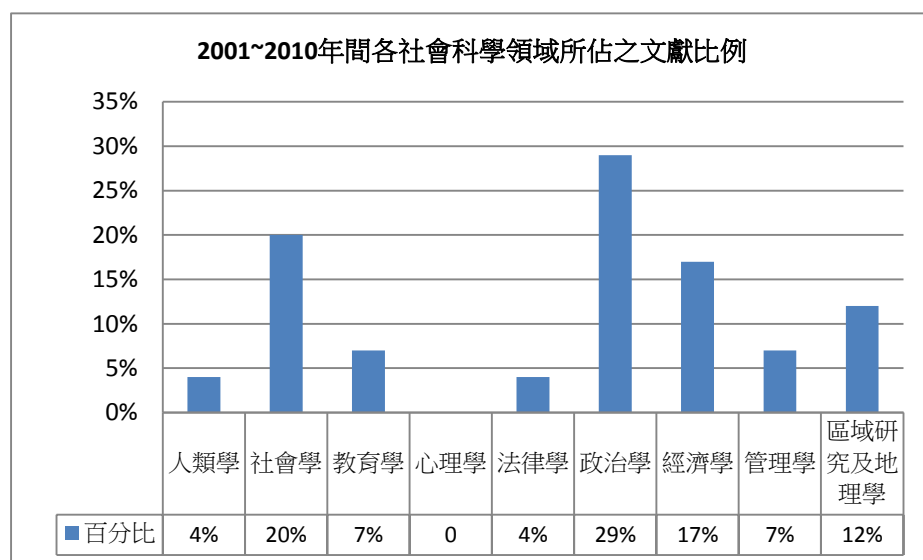


表 8，本文自行繪製。

¹⁵清水 麗，「日華斷交と 72 年体制の形成—1972-78」，川島 真、清水 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頁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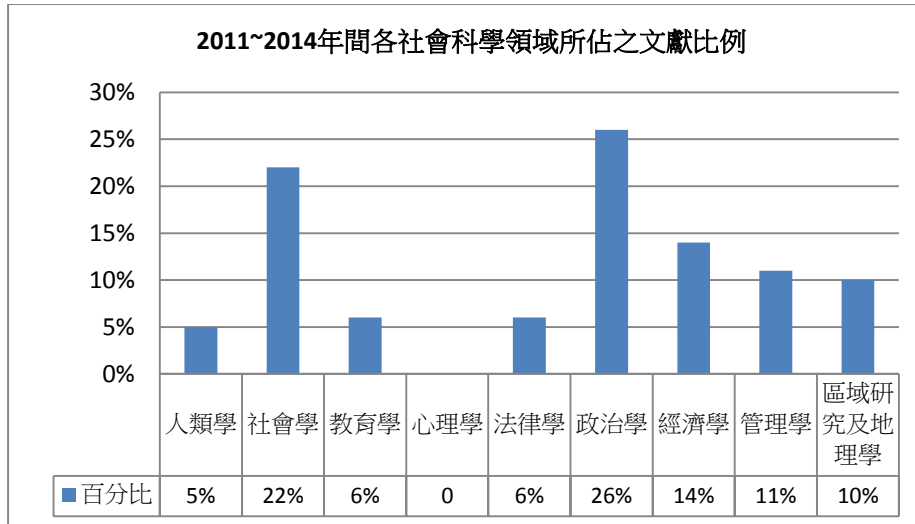


表 9，本文自行繪製。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環境下民主化浪潮的擊襲，台灣的威權專制政體逐漸消弭，進而急速地向民主化社會邁進。然而，多元組成的台灣內部社會，並未因為威權政治體制的變遷而平靜，反而愈加激起對社會內部對立的火花。總體來說，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狀態自 1990 年代以來，由於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出現大轉變，因而促發一連串的連帶影響。

由沼崎一郎和佐藤幸人所編之『交錯する台湾社会』一書便以 1990 年代以來，經濟構造產生巨幅變化，同時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密，以及政治層面上的民主化經歷和 2000 年與 2008 年時政權交替為背景，進而概觀分析台灣社會。關於自 1990 年代以來台灣的經濟變動可分為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與中國之間日漸趨於緊密的關係之兩個層面。台灣的經濟結構的再變化始於 1980 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主要是倚靠勞力密集型的製造產業帶動經濟的高速成長，然而，台灣勞動力成本的逐漸提高，使得經濟結構出現轉型。自 1990 年代開始，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逐漸趨緩，而進入 2000 年以來，由於遭受了 2001 年時的國際網路泡沫之影響，使得邁入以資訊、通訊產業為主的台灣經濟型態更受打擊，且 2008 年發生雷曼兄弟債券事件，因而使得台灣經濟曲線於 2001 年和 2009 年出現負成長的狀態。另外，以經濟結構中的貿易比重為觀察基準，進而發現由於台灣民間消費的內需市場逐漸擴大，使得 1990 年以來，台灣的貿易出口依存度出現下滑的趨勢，然而，進入 2000 年後，出口依存度又再度向上攀爬，台灣經濟型態再度轉回出口主導形式，且最主要的出口對象亦從原先的美國轉為中國。¹⁶自時序進入 1990 年代以來，不論是經濟亦或是政治上的變化都促使台灣社會產生劇變，而其中構造層面的變動為主要原因。台灣歷經日本殖民時期和國民黨蔣氏父子之統治，可將台灣社會視為一種「外來者」與「原住民」的二元對立，以及「統治層」和「被統治層」的二層構造下所組成。¹⁷遠

¹⁶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交錯する台湾社会』，（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2012 年 3 月），頁 5-6。

¹⁷同上註，頁 38。

自日本殖民之前，台灣社會便存在著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然而在日本殖民時期時，身為外來者的日本人以殖民者的身份統治著於更早之前即居住在此地的漢人和原住民族群，使得原先漢人和原住民族的二元對立的構造變動，合併為同一構造層，形成日本人（統治層）與漢人和原住民族（被統治層）間的二元關係。¹⁸ 伴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其喪失對於台灣之統治權，蔣介石政權於 1944 年 4 月設置台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因此台灣社會的統治者從日本人再度變更為中國大陸出身的「外省人」，接手自日本殖民時期所殘存之大部統治機關，同時進一步加強特務機關和監視體制，造成「白色恐怖」籠罩台灣社會，此時期的二元關係轉變為統治層的「外省人」（中國大陸出身）與被統治層的「本省人」（台灣出身）和原住民族群。¹⁹ 自蔣經國政權過渡到李登輝政權，隨著國內外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轉變，原先根深於台灣社會的二元結構關係似乎也開始出現流動的現象，多元化的族群認同以及新移民的加入等逐漸滲入二元結構的鴻溝，進而填補，往多元構造延伸、發展。²⁰

日本台灣學會發起人之一的日本學者—石田浩，其在著作《アジアの中の台湾》中對於戰後以來日本的台灣研究提出系統性的整理。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的中國學術界對於 1949 年所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有相當程度的關心，相較之下，當時日本方面對於台灣的研究著墨較淺，最大的原因為，日本基於發動侵略戰爭進而展開「戰後反省」，而日本的中國學術界的研究學者對於在過去被認為是停滯不前的中國竟透過中國農民發起了自發性且同時具備革命性質的社會變革抱持相當程度的好感和共鳴，因而將中國社會主義視為夢想和理想的寄託之處。且當時的研究學者之所以將重心著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台灣，其原因有二，首先為其對於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地不信任，且擁有中國的代表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其次為日本在戰後實施「戰後反省」的對象僅限於中國，將國民黨所統治下的台灣排除在外，忽視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台灣實施長達 50 年的殖民支配統治，有鑑於此，戰後以來日本對於台灣方面的研究數量與戰前相較是為減少的情形。²¹

面對「台灣研究」，同為日本台灣學會發起人之一的日本政治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台灣的特殊性即在於其先後歷經社會組成上之重疊性以及位於國際社會中的身分認定問題，因此，當前位於區域研究框架下的台灣研究，應著手於現今所面臨之國際情勢進行分析和研究。在傳統的區域研究中，其含括對該區域歷史、政治、經濟、文學、文化人類學等等各方面之學術認知，然在進行台灣研究之時，除了透過傳統學術領域的探究之外，應加上與其相關聯之外來

¹⁸ 沼崎一郎，『台湾社会の形成と変容—二元・二層構造から多元・多層構造へ』，（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14 年 3 月），頁 48。

¹⁹ 同上註，頁 74。

²⁰ 同上註，頁 91。

²¹ 石田 浩，『アジアの中の台湾：政治、経済、社会の変容』，大阪市：関西大学出版部，1999 年，頁 5-6。

歷史，即：荷蘭史、中國史、日本史和國際政治史等等同時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因此可以說台灣研究具備其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因此，戰後關於台灣研究的問題意識可分為三個系列，即為：「發展」系列、「民主化」系列和「身分認同」系列，1970 年代末期，台灣經濟快速地發展，其迅速發展之姿成為第三世界以及開發中國家所欲爭相模仿的對象，於此同時，由於經濟的快速成長，實現民主化的聲響亦如同浪潮般隨之席捲而來，因此於 90 年代開始，逐步實踐一系列的民主選舉，並於 1996 年完成總統直選，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確立民主化的基礎。同時，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成為台灣最不容忽視的問題，不論歷史、文學亦或是以文化為中心的研究皆圍繞著台灣的身分認同問題打轉，因此也進而出現了「台灣為其自身之主體」以及「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此兩種史觀在認知上的拉鋸。²²於 1992 年出版之『台灣—分裂国家と民主化』，便透過「權威主義體制下民主化的政治社會學」以及「在國家、社會框架下的台灣歷史社會學」此雙向的視角解析台灣政治的現況，為當期的代表著作之一。

肆、結語

戰後，日本在區域研究下所進行的「台灣研究」，其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皆展露出不同的面貌，與日中之間政治、經濟的變化亦有著連帶性的影響。戰後初期為殖民地記憶的延伸與遺留，因此主要研究類別集中於戰前延續下來的人類學領域，1970 年代由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使得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重點逐漸偏向經濟領域，直到 1980 年代末期，由於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巨大轉變促使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者對台灣的研究重心再度出現改變，對在位處兩岸關係下的台灣之政治變化的研究更趨盛行，因此，台灣在日本眼中的認識變化亦從殖民地印象轉為經濟發展國家，再進一步轉為亞太區域中的關鍵角色。

伍、參考文獻

一、專書

（一）中文：巴殿君，《冷戰後日本對台灣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

（二）日文：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地域から見た国際政治》（東京都：有斐閣，2009 年）。

笠原 政治，「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学と馬淵東一」，ヨ一ゼフ・クライナー編，《近代「日本意識」の成立 民俗学、民族学の貢献》（東京：東京堂出版，2012 年）。

戴國輝，『戴國輝著作選 2 台湾史の探索』（東京都：三省堂書店，2011 年 4 月）。

清水 麗，「日華断交と 72 年体制の形成—1972-1978」，川島 真、清水 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

²²若林正丈，「台湾研究のイメージ」，『日本台湾学会報』，創刊号 1999 年 5 月，頁 1-3。

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交錯する台湾社会』，（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12 年 3 月）。

沼崎一郎、『台湾社会の形成と変容-二元・二層構造から多元・多層構造へ』，（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14 年 3 月）。

石田 浩，『アジアの中の台湾：政治、経済、社会の変容』（大阪市：関西大学出版部，1999 年）。

二、期刊論文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通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二期』，（2006 年 11 月）。

三、研討會論文

若林正丈，「台湾研究のイメージ」，『日本台湾学会報』（創刊号 1999 年 5 月）。

四、網站資料

台湾史研究会，研究会の概要，

http://www.geocities.jp/taiwan_studies/about/about.html。

天理台湾学会，<http://www.tenri-u.ac.jp/tngai/taiwan/index.html>。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http://www.jats.gr.jp/shuisho.html>

日本台湾学会，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

<http://www.koryu.or.jp/taiwanstudies.nsf>。

早稲田大学，台湾研究所，<http://www.waseda.jp/prj-taiwan/gaiyou.html>。

從戰後「憲法九條論爭」 看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內涵

林彥瑜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日本在戰敗後進入美軍佔領期，並於1947年施行了有「和平憲法」之稱的戰後新憲法，其中，「憲法第九條」明文規定「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這個「放棄戰爭權」的條款，在戰後每當日本遇到國防外交危機時，都會遭到挑戰，引起國內「改憲派」與「護憲派」的激辯，是為「憲法九條論爭」。1990年代主張修改「憲法九條」的「新民族主義者」登場，引起筆者好奇「憲法九條」與「民族主義」的關係。本文試圖討論「憲法九條」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思考為何「憲法九條」緊緊牽動者日本民族主義者的敏感神經，並透過整理分析「憲法九條論爭」的戰後史，理解戰後日本「憲法九條論爭」中正反兩派「和平國家vs正常國家」所各自意味著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內涵。

關鍵詞：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民族主義、和平憲法、戰爭放棄

壹、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在戰後的新憲法中有著著名的「和平條款」——「憲法第九條」（簡稱「憲法九條」），明文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由於「憲法九條」使日本在失去戰爭權的同時、成為國際社會非常特殊的一員，「修改憲法九條與否」、「日本是否應該軍備化」的爭論，屢屢成為日本在面臨國防外交危機之際最分歧的政治爭議。贊成修改九條的人認為這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第一步，反對者則認為這是重返戰前軍國主義的道路。戰後，曾經有好幾波「修改九條運動」²³，而在2012年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上台以後，「修改憲法九條」的動向也愈趨明顯，成為新一波修憲的趨勢。不禁讓筆者思考：這些以自民黨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所謂的傳統「日本右派」對日本國家認同的政治主張，為何總是不離「修改憲法九條」？「憲法九條」與「日本民族主義」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這些所謂的「新民族主義者」，會為了建構日本國族認同與歷史認知的理念不遺餘力，卻在主張修改歷史教科書、強硬處理領土問題、反對首相為二戰道歉等等這些關乎「歷史」的主張以外，會提到一個與「現實」如此緊密相關的「修改憲法九條」這個主張？「憲法九條論爭」之於「日本民族主義」是否存在什麼特殊性？

換句話說，在日本的特殊歷史脈絡下，民族主義與憲法九條的關係，引起了筆者的好奇。為什麼一談到日本的「民族主義」就一定會牽扯到修改「憲法九條」的問題？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國家像日本一樣，戰後從未修改過憲法，而且還是在傾向贊成修憲的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狀況下。為什麼「憲法九條」如此觸動日本人國族認同的敏感神經？為什麼「憲法九條」會和「歷史認識問題」連結在一起？也很少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會堅持一個和「民族」、「族群」等關鍵字無關的憲法條文——即憲法九條——必須修改。似乎，正是因為日本輸了「那場戰爭」（あの戦争²⁴），所以戰後對「那場戰爭」的記憶，幾乎就被固

²³ 戰後日本曾發生幾波「修改憲法九條與否」的爭辯，包括1950年代初期韓戰期間日本社會的躁動、1955年「砂川判決」裁定安保條約違憲、1982年中曾根康弘內閣時期、1990年波斯灣戰爭、2012年自民黨修憲草案等。詳本文後述，參考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3）。

²⁴ 不同國家從不同的視角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各種不同稱呼，例如日本視角的「大東亞戰爭」、「十五年戰爭」，美國視角的「太平洋戰爭」，中國視角的「對日八年抗戰」、「反法西斯戰爭」等稱呼。因此日本學界有論者稱呼其為「那場戰爭」，同時也代表了對「那場戰爭」視角的多元性，用這個用詞表達戰爭的名稱難以窮盡各方多元視角。

著在這些特定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象徵」之中，其中就包含「憲法九條」——一個映照出日本人如何「記憶」那場戰爭、「想像」日本的未來——的鏡子。於是，本文嘗試進入日本的歷史制度脈絡，考察「憲法九條論爭」在當代日本民族主義的場域中扮演的角色，思考當代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在「憲法九條論爭」的脈絡中是如何變化的。

然而，儘管「『憲法九條論爭』是現今日本民族主義的重要議題」似乎是個合理的直覺，日本有關「憲法九條論爭」的研究著作也汗牛充棟，但若進一步比較日本既有的、關於「憲法」的研究成果，似乎發現日本法學者的憲法研究成果中較難找到關於「民族主義」的敘述；同時，日本政治學者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中，也較少談到學理上「憲法」之於「民族主義」的意義與作用。換句話說，既有的「憲法研究」中，比較難找到探討「憲法——民族主義」此一連結的系統性研究。本研究試圖以「日本戰後『憲法九條論爭』中『改憲派』與『護憲派』的主張為何？這些主張產生的歷史脈絡為何？這些主張如何形塑了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為問題意識，整理僅有的既有文獻中「憲法九條」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試圖從「憲法九條」這個切入點一窺「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實質內涵。

貳、「憲法九條」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

一、本研究對「日本民族主義」的概念界定

民族主義（nationalism，ナショナリズム）的理論十分繁雜，民族主義的研究學者唯一的共識就是，對於「民族主義」並沒有一個公認的、統一的定義或理論存在，必須依照各個民族、國家的實際脈絡適用、補充不同的理論。

日本人類學者大貫惠美子在《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這本巨著中檢討了各家民族主義理論之於日本的不適用性。若以著名的民族主義學者《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為例，大貫惠美子認為，基於兩項特殊的歷史脈絡因素——日本尚未真正脫離君主制、且官定歷史已經融入天皇家系的時間之中——日本民族主義的產生，並不符合安德森對民族主義提出的要件。

大貫惠美子因此跳脫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家的民族主義界定，在該書討論「櫻花」這個美學意象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時，將「民族主義」區分為「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群體式的感覺**，就像是櫻花在古代日本的美學價值一樣，通常是在選擇了某個特定的象徵之後，再將界線加以具象化；『政治民族主義』則是國家的意識型態之一」

²⁵，這裡對「意識型態」的定義是：「為了保證或顯示權力，所展開的統一性計畫或一連串政策」²⁶。

因此，本研究對「日本民族主義」的界定延伸以上大貫惠美子的區分，認為「日本民族主義」包含了國民對特定象徵的群體認同（文化民族主義）及政府由上而下的制定的意識型態（政治民族主義），並在結論中試圖提出「憲法九條論爭」本身如何在「日本民族主義」的界定框架中產生意義。

二、「日本民族」與「憲法九條」的關係

日本被認為是個「單一民族國家」，然而，儘管日本看似擁有同質性極高的語言、血緣、文化、歷史，根據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的研究，日本的「單一民族」其實是個「神話」，是相當晚近才被建立的²⁷。在二次大戰前結束前，大日本帝國獲得殖民地朝鮮與台灣後，「純血的日本民族」會成為領土擴張、將殖民地收編進帝國的一個障礙，因此主流論述是日本自古以來有著大量異族的同化經驗，並對各個民族一視同仁；然而戰後卻突然改變成「日本自太古以來住著單一的日本民族」，是一個「沒有異族抗爭，是農民的和平國家」。有趣的是，在戰後的「單一民族神話」論述中，並非只強調日本民族的「單一」而已，還宣稱「和平」乃是日本民族的「天性」，而且這樣的「天性」乃其來有自——與日本民族發展的歷史經驗相關。小熊英二將戰後的日本單一民族神話論述歸納如下四點²⁸：

（一）日本自太古以來住著單一的日本民族，沒有異族的抗爭，是農民的和平國家。

（二）天皇一家並非外來的征服者，而是這個和平民族的、文化共同體的統合象徵。

（三）日本民族自太古以來與邊境島國居住的其他民族的接觸很少，外交能力和戰鬥能力也很貧弱。

（四）因為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家，所以歷史和現在都是和平的。

這四點皆強調日本民族**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這樣的「和平天性」和「與其他民族很少接觸」這樣的經驗有關，也跟天皇作為日本純血的象徵有關。這

²⁵ 大貫惠美子（Ohnuki Emiko）著，堯家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台北：聯經，2014），頁403-408。

²⁶ Eric Wolf, *Envisioning Power: Ideologies of Dominance and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4.

²⁷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57。

²⁸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國家の起源》（東京：新曜社，2003），頁362-364。

和戰前拉攏殖民地人民的帝國民族論述完全相反。從這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日本是個單一民族」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國族神話，如社會學者汪宏倫所說，「如果我們把日本視為給定的實體，是一個由單一民族組成、具有高度同質的血緣、語言與文化的國家，那麼我們恰恰是掉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²⁹。

於是，我們可以接著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戰前和戰後的日本民族論述有如此大的反差？根據小熊英二本人的解釋是，「當然這（戰後的日本民族論述）符合了戰後的象徵天皇制、因為敗戰而對國際關係失去自信、以及厭戰而『不想被捲入戰爭』這種『一國和平主義』的心理。為了國內的和平與安定，拒絕來自外界的『麻煩事』」，也就是說，「弱的時候以單一民族論獨善其身，強的時候以混合民族論侵略外部地區」³⁰的一種具策略性的民族論述，會隨著日本所處的局勢而變化。

由此可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日本近現代史上最劇烈的一個「斷裂口」，「和平」是用來銜接日本戰前與戰後這個巨大「斷裂口」的一個脆弱的「黏著劑」：因為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所以我們現在用和平憲法，創世界之首例，希望可以開創新的國際關係與國家的想像。若加以對照戰前與戰後的憲法，作為「和平條款」的「憲法九條」正是「日本民族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的認證章。因此，「憲法九條」所象徵的和平日本，與當代日本的國家認同、民族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三、 全球觀點的制度論：「憲法九條論爭」在日本當

代民族主義議題中的位置

那麼，「憲法九條」與日本民族主義的關係為何？中研院社會學者汪宏倫為極度繁雜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議題（包含靖國問題、謝罪補償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領土問題等）提供了一個清楚的「全球觀點的制度論」³¹分析架構，將這些議題做了明確的分類。他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相關議題分類為「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兩個向度，並從中區分「國際」與「國內」層次，在該2x2的表格中，「憲法九條論爭」乃是屬於「公民——領土」政治場域的「國內」議題。值得注意的是，汪宏倫所區分的「政治場域」與「文

²⁹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57。

³⁰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國家の起源》（東京：新曜社，2003），頁362-364。

³¹ 汪宏倫根據Brubaker的啟發，結合Bourdieu(1991)、Meyer et al.(1997)等學者的理論，發展出「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取向」作為民族主義的分析架構。參考汪宏倫，〈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第1期，2001年6月，頁183-239。

化／象徵場域」的兩個層次，與前述大貫惠美子界定日本民族主義的兩個範疇「政治民族主義」及「文化民族主義」的區分不謀而合——「政治民族主義」是國家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則是一種群體式的感覺與情緒——可與此表概念相互對照。

表1 日本民族主義所牽涉議題的場域或層次³²

	公民—領土制度 (政治場域)	族群—文化制度 (文化／象徵場域)
國際／全球 脈絡層次	· 原爆、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 · 美軍占領、東京審判與舊金山和約 · 韓戰、美日安保條約與冷戰 · 兩次波灣戰爭與自衛隊海外派遣問題 · 國際間對日本戰時犯行（例如慰安婦、731部隊等）的指控、訴訟與索賠	· 近鄰諸國對歷史教科書的抗議 · 國際知識社群關於南京大屠殺、慰安婦、731部隊等議題的跨國調查與歷史研究 · 原殖民地（台灣、朝鮮）要求將原台籍或朝鮮日本兵牌位從靖國神社移除
國家／國內 脈絡層次	· 國體與天皇制之論爭（含天皇之戰爭責任問題） · 和平主義憲法（「憲法九條」論爭） · 戰後美軍主導下所建立的議會民主體制 · 對「謝罪外交」的指責	· 國族的紀念／祭祀機構（如靖國神社、廣島、長崎等地的和平紀念館等） · 教科書問題（家永三郎訴訟案、「東京裁判」史觀、《新歷史教科書》、「近鄰諸國條項」等） · 節日與儀式（原爆紀念日、終戰紀念日等）

汪宏倫認為，藉由這個表，「我們可以重新勾勒日本近現代國族主義的發展軌跡與大致樣貌」，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冷戰的國際體系

³² 粗體處為筆者所加，強調「憲法九條論爭」在此表中的位置。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59。

下與東亞鄰國（特別是中國、韓國）之間的「歷史認識³³」議題為何，並且在1990年代冷戰解體後，日本「新民族主義」熱潮是如何應運而生³⁴。

日文的「歷史認識」一詞，乃指人們對歷史的記憶、評價、解釋、認知。觀諸此表中的**每一個**民族主義議題，例如歷史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首相謝罪問題等，皆與「歷史認識」相關。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認識」，深深決定了日本國民對這些議題的立場，然而這些議題之間並不能簡單相互化約，議題與議題之間彼此相互交織牽連。其中，以「憲法九條論爭」為例，汪宏倫對「憲法九條論爭」與「歷史認識」的關係，解釋如下：

「日本戰後制定所謂『和平憲法』，雖然屬於『公民——領土』制度場域，但由於和平憲法賦予國家相當特殊的地位角色，因此必須倚靠『族群——文化』制度場域的和平主義教育來加以合理化，而這就不得不牽涉到『國家觀/世界觀』的改寫，以及對日本戰前歷史的記憶與評價³⁵」。

此處所指出的「和平憲法」以及「和平主義教育」，乃是戰後美國在日本留下的兩大制度遺產，主要是為了達成兩個目的：「去軍事化」與「民主化」³⁶，希冀對日本從外在的制度到內心的思想進行全面的改造。汪宏倫認為這樣的制度遺產是日後日本民族主義辯論中，日本怨恨他者（美國、中國、韓國等）的種子³⁷。「和平」在日本的歷史脈絡下是種近乎意識型態的符號，半強迫半自願的被貼上「和平」標籤後的日本，戰後無論是在國際舞台的外交作為、或是國內的國防政策，都必須遵守憲法第九條對國家戰爭權的限制。然而數十年來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制度遺產賦予日本國家極度特殊的性質，因此在民族主義辯論高漲的時刻時常發生齟齬，「憲法九條論爭」如同漂浮在日本人內心的一個幽靈，每當日本民族主義議題浮現檯面，「憲法九條論爭」也隨之躁動。尤其在自民黨於2012年重回執政大位以後，這樣的「修改憲法九條」的傾向越發明顯，甚至頒佈了自民黨版的新憲法修正草案。

³³ 「歷史認識」乃是日文，若應用在中文的場域中，應譯為「歷史認知」，唯本文以引號方式保留日文原文，是因為中文之中「歷史認知」的用法較之日文與韓文之中，經常使用此一詞彙指涉關於歷史教科書等民族主義議題的「對歷史的記憶與評價」，故本處保留原文。

³⁴ 詳後述。參考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60-161。

³⁵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60。

³⁶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43-49。

³⁷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62。

於是，接下來本文考察「憲法九條」的誕生過程、以及戰後至今幾次重大的、關於「憲法九條」的辯論，日文漢字名之為「憲法九條論爭」，探討「憲法九條論爭」之於日本民族主義的意義。

四、一種強加的「由上而下的民主革命」：「和平憲法」的誕生

美國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在《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一書中以「由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稱呼美國在戰後以聯合國盟軍最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佔領日本期間（1945年八月到1952年四月）的政策。其中，頒佈新憲法就是最重大的改革政策，美國對日本的兩大目的「非軍事化」以及「民主化」徹底被體現在這部憲法之中。新憲法不僅將「民主化」的基本理念規定成文，而且明確禁止日本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與「非軍事化」的原則完美結合³⁸，取代舊有的專制獨裁體制。

依據波茨坦宣言，「當建立起一個合乎日本國民自由意志的、傾向於和平和負責任的政府」時，美軍對日本的佔領將會終結³⁹。由此可見，「和平憲法」並非單純只在制度面合乎美國的利益，而是要將日本從內而外改造成一個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徹底消除將日本引向戰爭的軍國主義根源。在美國這樣明確的意圖之下，「和平」、「民主」這些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符號並非表面的憲法文字規定、而是本質的徹底改造，因此這樣的改造自然也牽涉日本國民的自我認同，也就是說，「和平」、「民主」的價值重建了日本國民的國家認同，也因為對戰前的自己——軍國主義的日本——完全否定，因此戰後的「和平、民主」價值也同時彰顯了日本國民對「戰爭」的反省。因此，日本作為一個全新的「和平國家」即將在復興之路上慢慢重建破碎的家園，追求嶄新的、愛好和平的、民主的日本，就是戰後日本的目標。

這樣的心理體現在1947年《日本國憲法》頒佈施行之初，日本民眾對「憲法九條」的歡迎。小熊英二2008年的著作《〈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以時間序列分章，探討日本戰後社會中「民主」與「愛國」的概念在各種政治事件、運動、符號、思想之中如何演變，而《日本國憲法》就是此書所探討的民族主義的「符號」之一。小熊於第四章「憲法愛國主義」中主張，「憲法九條」的和平主義是戰後破敗的日本唯一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政府以和平、道義的形象作為戰後對國內宣傳憲法教育的手段，讓「和平主義」成為日本人的自我認同，因此「憲法九條」作為戰後新的民族主義基礎，受到民眾的歡迎（戦後の新し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基盤として

³⁸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52。

³⁹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46。

歡迎されていた)。小熊主張，日本人痛苦的戰爭經驗是支持「憲法九條」成為日本憲法條文背後的民意基礎，在心理上，由於不能讓戰死者的犧牲變得沒有意義，因此需要一個有意義的「戰後改革」——「憲法九條」，讓日本以「和平國家」的身分再次找到對自己的信心⁴⁰。

意即，戰敗初期，由於戰前的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制度被全盤否定，日本若要重建國家，就需要一個新的國家理型，作為新的目標和價值，那就是新憲法所追求的和平與民主。甚者，小熊分析，戰敗之初這樣的新「和平」理想，成為了日本對抗歐美軍事力量（以原子彈為象徵）的國家認同基礎，若要批評美國的原子彈轟炸是違反人道原則的暴行，那麼只有揮舞「世界和平」的大旗才能有譴責美國的正當性⁴¹，「憲法九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1946年3月6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憲法改正草案要綱」，這個新憲法案乃是以GHQ在2月13日提交給日本政府的草案為基礎而寫的，根據GHQ的記錄，GHQ方所提出的草案與日本政府原本所準備的草案內容差異甚大，令日本官員十分惶恐⁴²。儘管如此，3月6日所公布的這個包含憲法九條的版本，仍受到日本民眾歡迎，甚至包括日後轉向為「改憲派」的保守人士，例如後來擔任首相、並於隔年轉變為「再軍備」贊成派的石橋湛山，曾在3月16日的報紙投書上如此描述憲法第九條：

……倘若我國國民真正的（如同憲法草案前言所述的）「賭上國家的名譽，發誓盡全力達成這樣崇高的目的」，在此瞬間日本既非戰敗國，亦非四等、五等國，而是光榮地閃耀著的世界和平一等國……⁴³

此處所使用的「四等國」一語，是1945年9月2日投降儀式後麥克阿瑟在記者會所使用的語彙，甚至成為了當時的流行語。石橋的這段話經典地展現出當時的日本人期許自己可以以憲法九條所高舉的「和平」價值，脫離「四等國」的狀態。諸如此類的「第九條歡迎論」，甚至還得到政府的公開肯認，例如當時的吉田茂表示第九條「有著崇高的理想，作為和平愛好國的先驅，踏上正義的大道，如此的堅定決心在國家根本大法中被明文規定」、議員們也對第九條有許多正面評價的發言⁴⁴，肯定日本毀棄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並選擇了戰後《日本國憲法》裡所彰顯的和平理想。

⁴⁰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頁153-174。

⁴¹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頁155。

⁴² 大嶽秀夫，《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東京：三一書房，1991-92年，第一卷），頁75。

⁴³ 大嶽秀夫，《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東京：三一書房，1991-92年，第一卷），頁103。

⁴⁴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頁157。

於是，戰後的日本新憲法，在國會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⁴⁵，並於1946年11月正式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在公布到施行的這段期間，政府為了對民眾宣傳新憲法，甚至派遣了「遊說隊」到全國各地，不遺餘力的對民眾進行「憲法啟蒙」。在5月3日施行日當天，所有報紙都一面倒讚揚、歡迎新憲法。憲法正式施行以後，政府也透過教育政策向兒童宣傳以第九條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例如於1947年8月文部省發行的《新憲法的故事》（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小冊子，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解說非武裝的理念。根據大江健三郎（戰敗時年10歲）的回憶：

終戰後，對小孩們而言『戰爭放棄』這個詞是怎樣充滿光芒的憲法詞彙呢？我的記憶中，中學的社會科老師說，現在的日本大國論風潮的最早論調就是『戰爭放棄』。老師說，日本戰敗後，社會殘存著封建與非科學的東西，是個卑屈的小國，但是，**局面突然逆轉了，因為日本是個選擇了放棄戰爭的國家。**……因此，「戰爭放棄」一直是支撐我的道德原則的重要支柱。

像這樣強烈的「憲法愛國主義」，作為重建日本國的理念，深入了兒童的內心⁴⁶。

然而，日本在戰敗之初的「非軍事化」政策，很明顯的符合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利益，讓日本在短期之內不可能再發動戰爭、也能夠確保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因此，儘管「憲法九條」是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和平條款，卻同時也是一個最符合現實考量的妥協，因為事實上聯合國軍的確不可能同意戰敗國日本在戰敗之初就擁有武力。出於這樣的現實考量而支持憲法九條的「現實主義者」與相信和平理想的「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在憲法施行當下，都同樣的歡迎第九條⁴⁷。

小熊英二為這樣的「九條歡迎論」風潮下了這樣的解釋：「戰爭體驗和戰死者的記憶，在支持著『佔領軍強加的憲法能夠成為日本的憲法』。為了不要讓戰死者的死無意義的結束，戰敗帶來的戰後改革，必須要做出一些有意義的什麼」⁴⁸——這個「一些有意義的什麼」，就是標榜和平主義的「憲法九條」，基於對戰爭的「歷史認識」，讓「憲法九條」作為戰後的民族主義的基礎，呈現了日本國民對戰爭的反省意識、也指出了日本在戰後復興之路上應該朝向的方向。

⁴⁵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63。

⁴⁶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頁160。

⁴⁷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頁165。

⁴⁸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頁174。

「憲法九條」處於與「民族主義」和「歷史認識」敏感相關的關鍵位置，戰後因為政治局勢變動而發生的多次「憲法九條論爭」中，正反兩派的論述反映了日本民族主義的不同樣貌與認知。接著簡述戰後的「憲法九條論爭」的基本圖像，及其所反映出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內涵變化的軌跡。

五、「和平國家」與「正常國家」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戰後「憲法九

條論爭」史

（一）戰後「改憲派」與「護憲派」的論述基調

關於「憲法九條」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在諸多日本法學者於2007年共著的《平和憲法と公共哲学》中，法學者加藤節指出，誠如丸山真男所說：

「在考慮第九條的問題時，必須重新試著思考何謂『國民的驕傲（国民的な誇り）』這個問題」，因此我們若能了解「改憲派」與「護憲派」所個別認知到的「國民的驕傲」內涵為何，就能更理解「憲法九條論爭」中正反雙方所具有的民族主義意涵，及其對立的爭點為何。

簡單來說，「改憲派的民族主義」想要維護的「國民的驕傲」，是日本固有的特殊文化傳統，一個擁有「戰爭權」、能夠派兵到海外的日本國才是「正常的」國家；然而，這樣的民族主義卻和《日本國憲法》在制定之初所預想的民族主義完全相反——「日本國憲法（護憲派）的民族主義」包含兩部分：一是作為「和平憲法」本身所形塑的日本民族主義內涵，即憲法前言中所述「我國亟欲在國際社會佔有名譽的一席之地」一樣的「國民的驕傲」心理（這一點也與前節有關「和平作為一種國家認同」的敘述相合）；二是結合了「普世價值」與「個人權利」，例如，實現「永久和平」同時，憲法也要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符合「政治道德的法則」，沒有專制與壓迫，換句話說，日本憲法的規定既體現了普世的和平價值，也可以展現、尊重日本國民的個體自主性⁴⁹。護憲派認為，唯有個人權利被尊重、和平狀態被確保，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與正義；此外他們也認為，日本憲法第九條不只提供了「沒有戰爭權的主權國家」可能性，也賦予了「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主義」可能性，因此，廢除這

⁴⁹ 千葉真等，《平和憲法と公共哲学》（東京：晃洋書房，2007），頁109-111。此處「國民的個體自主性」之日文原文為「国民の個性」，由於中文的「個性」比較接近「個人特質」之義，此處順應日文原文文脈，將「国民の個性」譯為「個體自主性」，指在追求普遍主義的日本憲法規範下，日本國民仍然保有受尊重的個體自主性，不像戰前被要求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必須被犧牲。

個世界絕無僅有的、彰顯珍貴崇高和平價值、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憲法九條」，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⁵⁰。以上是護憲派所認知的「國民的驕傲」、也就是護憲派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可見，「改憲派」與「護憲派」所認知到的「國民的驕傲」是如此大相逕庭。

然而事實上，「和平」這個「國民的驕傲」乃是被美國「強加」的——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乃是在美國的主導下制定施行，這樣受到美國「強制」的性質，也讓「改憲派」認為和平憲法本身是對日本自主性的一種羞辱。例如，加藤典洋在他知名的《敗戰後論》一書中反覆強調，「和平憲法」是在美國原子彈的逼迫下被迫放棄武力，而這就是戰後日本最大的「扭曲（ねじれ）」，這樣長期存在卻隱晦的「扭曲」造成日本社會的「人格分裂」——「改憲vs護憲」、「保守vs革新」這樣的對立⁵¹，因此，日本社會每每面對到修憲、歷史認識、戰爭責任的問題時，日本政府常有左支右絀、無所適從的窘境⁵²。

對此，高橋哲哉在《戰後責任論》此書中花了一整篇的章節批評新民族主義（neo nationalism，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詳後述），也就是所謂的「右翼」、「保守」的民族主義。其中，高橋哲哉評論加藤典洋的《敗戰後論》所提之「被『強押』著制定的憲法（押しつけ憲法）」的問題時，高橋指出「被強押著放棄戰爭，對這件事的記憶是戰後日本對美國怨恨感情的泉源，反美民族主義的溫床」⁵³；此外，事實上，「憲法九條」不只是反美民族主義的溫床，因為「憲法九條」的戰爭放棄條款讓日本成為國際社會非常特殊的一員，在國際社會行事時因為沒有武力而必須事事都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無法自主做出外交決策，這也是日本保守民族主義者所批評的。汪宏倫將之稱為「**被制度化的不平等/不正常**」⁵⁴，汪宏倫並認為，這同時也是怨恨情感滋生的溫床，因而成為民族主義的「覺醒劑」，且這樣「非正常國家」的陰影不只僅存在於傳統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心中⁵⁵。

日本右翼民族主義作為對戰後體制的一個反撲力量，其實一直有跡可循。從小林善紀、西尾幹二、藤岡信勝等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出版作品及言論主張就可以知道，對戰後日本屈辱的現實狀態充滿不滿，因為日本不只被強迫放棄武力，更被戰勝國進行「民主」、「和平」的思想改造，即便美國佔領期已經結束，但長期被壓抑在這樣的「**被制度化的不平等/不正常**」之下，怨恨因而

⁵⁰ 千葉真等，《平和憲法と公共哲學》（東京：晃洋書房，2007），頁 112。

⁵¹ 加藤典洋，《敗戰後論》（東京：ちくま文庫，2005），頁 52。

⁵²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4。

⁵³ 高橋哲哉，《戰後責任論》（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2005），頁 154。本處的翻譯乃引用自汪宏倫。

⁵⁴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5。

⁵⁵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5。

滋生，批評日本戰後體制成為新民族主義者論述的基調，其中，「憲法九條」是否應該要修正的問題，就是最具體的制度辯論。

假設「憲法九條」是激起日本新民族主義怨恨情感的制度化現實之一，那麼依據民族主義的理論，「憲法九條」本身必然也代表著另一種意識型態、民族主義情感，即對「和平」的信仰（詳前節敘述），認為「憲法九條」作為一種在日本特殊的、戰前崛起、最後戰敗的歷史脈絡下，出於對這場悲慘戰爭的反省，用特殊的制度設計展現日本的「國民的驕傲」。而日本新民族主義者則會認為這是失去自主性的屈辱。

到此，可歸結出這兩種對「憲法九條」截然不同的看法，分別代表了日本民族主義不同的內涵，而這樣的對立基調，就會在國際社會發生重大事件（如戰爭）時，再次在日本國內掀起是否應該修改憲法九條的熱議。在下一小節筆者試圖簡單概述之。

（二）戰後「憲法九條論爭」軌跡概述

在1950年韓戰爆發以後，「再軍備問題」再次成為政治辯論的焦點議題，面對美國把日本納入朝鮮半島防線佈局的傾向，針對修改憲法九條與否的「改憲派」與「護憲派」對立浮上檯面。1952年，舊金山和約的簽訂，結束了美軍在日本的佔領統治，日美安保條約⁵⁶生效。該條約欲促進日本的「再軍備化」，因此同年日本開始設置軍隊色彩濃厚、但名為警察的「保安隊」，政府因而備受輿論質疑是否有違反「憲法九條」之虞，於年底發表了「關於『戰力』的政府統一見解（戦力に関する政府統一見解）」，這是實質上架空「憲法九條」、「解釋修憲（解釈改憲）」的開始。以時任首相的吉田茂為首之主流派儘管有修憲的意願，但因為當時的反戰輿論強大，且主張修憲的政黨都沒有超過國會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在1954年政權結束前都沒有修憲的具體動作。1954年七月，日本政府依據「防衛二法⁵⁷」設置了海陸空自衛隊。總的來說，即使1950年代前半的「憲法九條論爭」中反修憲輿論頗為高漲，制度上仍步步走向「再軍備」之路⁵⁸。

1955年，日本正式進入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執政的「五五年體制」，在此後至今的各種反基地運動、反戰運動中，「憲法九條」這個被制度化的「和平主義」，一直都是抗議民眾口號中的正當性代表符號。依據田中伸尚在《憲法九條的戰後史》中詳盡的整理，可以知道，1955年的砂川基地鬥爭（抗議美日安保違反憲法九條）、1960年的反對新安保條約的「安保鬥爭」、1968年判決自衛隊違憲的「長沼裁判」、以及戰後至今仍未停止的沖繩美軍基地抗議運動

⁵⁶ 此處的日美安保條約乃是第一次安保條約，為了與1960年的安保條約相區隔，也有人稱之為舊安保條約。

⁵⁷ 自衛隊法、防衛庁設置法，合稱「防衛二法」。

⁵⁸ 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21-24。

⁵⁹中，「憲法九條」都是抗議民眾的精神象徵與法源依據。事實上，時至今日（2015年）夏天密集的安保法案抗議活動中，也隨時可見「不要破壞九條（九条を壊すな）」的標語。「憲法九條」彷彿成為抗議任何「軍備化」政策對國民產生的壓迫（如基地問題）的精神象徵。反戰、反基地運動的民眾相信：「憲法九條」標榜了絕對的和平主義，放下武器的同時，也保障了「和平的生存權」，使人可以安居樂業。

1980年代，因為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對二戰的記述引發中韓等國不滿（稱為「歷史教科書問題」），日本應該如何負起戰爭責任、如何記憶那場戰爭等問題，成為當時最具爭議的議題。有學者認為，日本的和平憲法是「亞洲人民的憲法（アジアの民衆の憲法）」，九條是防止日本政權暴走的條款⁶⁰，因此「贊成修憲與否」成為對曾受日本殖民侵略的國家檢測日本對戰爭是否有「反省意識」的一個標準。由此，也可以理解「憲法九條」之所以形塑了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原因。

然而，「憲法九條」也與現實政治中的國防政策密切相關。1990年波斯灣戰爭爆發，美國要求日本負擔鉅額軍費，且1991年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應美國之要求派遣自衛隊至波斯灣支援掃雷行動，在國內引發「自衛隊海外派遣是否違憲」的爭議。波斯灣戰爭帶給日本強烈的屈辱經驗，讓許多日本人忿忿不平，甚至成為許多新民族主義者轉變政治立場的契機⁶¹。因此，1990年代出現了所謂的「新民族主義」的熱潮（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neo nationalism），稱之「新」，乃是與戰前的舊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區別⁶²，主要的主張展現在幾個議題：贊成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憲法九條」應該修改、提倡「自由主義史觀」、反對日本歷史教育現有的「自虐史觀」、「反日史觀」、「暗黑史觀」，否定二戰中日本的侵略行為。這套對日本民族的認知、以及日本作為一個「正常國家」所應有的樣子，是現今所謂右翼、保守民族主義者大致的政治立場，而「憲法九條」和歷史教科書的修改，即是新民族主義者最主要的制度改革主張，甚至在2012年自民黨提出了「自民黨改憲草案」，大幅修改現行的日本憲法，除了「憲法九條」，也修正了許多用詞，比現行憲法更強調日本的傳統、美德、集團主義，是新民族主義具體的文字化表現。

綜合以上，「憲法九條」的議題牽涉層面之廣可見一斑——不只是現實政治的考量，也是歷史認識的標記，更是日本人民「和平的生存權」與軍備政策對抗的象徵。

⁵⁹ 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29-102。

⁶⁰ 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139。

⁶¹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64-165。

⁶²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49。

參、 結論：「憲法九條」所象徵的日本民族主義內涵

變化軌跡

爬梳完「憲法九條」與日本民族的關係、「憲法九條」的誕生與發展歷史後，為了做綜觀式的回顧，必須回到正文最初借用大貫惠美子對日本民族主義的界定來討論「憲法九條」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日本民族主義分為兩個範疇：「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

首先討論較好理解的、日本「政治民族主義」與「憲法九條」的關係。如正文最初所述，「政治民族主義」指國家的意識型態⁶³——「為了保證或顯示權力，所展開的統一性計畫或一連串政策」，而「和平憲法」是日本戰後制度的根本大法，是美國佔領期間為了從內而外改造日本而留下的制度遺緒，「憲法九條」確保了美國的利益，即使在GHQ佔領期結束以後，美國仍對失去國防自主權的日本仍握有主導的權力。可見，「和平憲法」所代表的「和平」意識型態——以「憲法九條」為象徵符號——乃是被政府建構出來的。

然而，作為政府統一性計畫或政策的「和平憲法」所伴隨的「和平」思想改造，必然也需要創造一種「群體式的感覺」，這就是「文化民族主義」所說的「像是櫻花在古代日本的美學價值一樣，通常是在選擇了某個特定的象徵之後，再將界線加以具象化」⁶⁴。「憲法九條」象徵著和平、光明的戰後日本理想圖像，正如同櫻花象徵武士道的死亡美學一樣。國民對「和平」的群體式渴望，在戰爭甫結束的1940年代後半因為戰爭記憶猶新，「憲法九條」的理想在政府的宣傳下受到歡迎；然而在1950年代韓戰爆發、簽訂舊金山合約及美日安保條約等重大國際局勢的變動以後，這個被「憲法九條」建構出的「和平」意識型態就受到了挑戰。到後來1960年代新安保條約問題、1980年代歷史教科書風波、1990年代新民族主義的崛起，都看見「憲法九條論爭」成為「和平國家vs正常國家」、「護憲派vs改憲派」的意識型態拉扯，雙方的立場論述分別象徵著對日本的國家認同樣貌，「改憲派」所追求的日本乃是維護日本自主性的一種信念，認為日本要當家作主就必須擁有武力、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而非總是因為受到他國壓力而處處掣肘，擁有著相信日本必須重新「出頭天」的情感；「護憲派」則堅持守護「和平憲法」所揭櫫的、世界絕無僅有的和平價值。

在雙方的認知中，日本作為一個群體——無論名之為「國家」、「民族」皆然——都有著一個特殊的價值圖像，這個圖像可以從「改憲」和「護憲」的政治主張看出，雙方的主張論述都試圖營造出一種「群體式的感覺」、一種對日

⁶³ 大貫惠美子（Ohnuki Emiko）著，堯家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台北：聯經，2014），頁403-408。

⁶⁴ 大貫惠美子（Ohnuki Emiko）著，堯家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台北：聯經，2014），頁403-408。

本的認知方式，這是牽涉到日本人內心諸多複雜情感的，也正是民族主義之所以複雜難解的原因。若觀諸《日本國憲法》前言中白紙黑字所寫下的明確「和平」願景：

日本國民期望恆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類相互關係的崇高理想，信賴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決心保持我們的安全與生存。我們希望而努力維護和平，從地球上永遠消滅專制與隸屬、壓迫與偏見的國際社會中，佔有光榮的地位。我們確認，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於恐怖和貧困並在和平中生存的權利。

我們相信，任何國家都不得只顧本國而不顧他國，政治道德的法則是普遍的法則，遵守這一法則是維持本國主權並欲同他國建立對等關係的各國的責任。

日本國民誓以國家的名譽，竭盡全力以達到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

「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就是日本能夠好好扮演「和平國家」的角色，讓國內百姓擁有和平的快樂生活、也與他國維持良好關係、讓他國能「對（和平的）日本放心」。從憲法前文充滿激情與狂熱的宣示，可以知道「和平憲法」、「憲法九條」並非單純只是冷冰冰的制度設計而已，它代表了「文化民族主義」的一種強烈的情感與信念，而這樣的情感與信念乃是透過「憲法九條」這個「政治民族主義」的象徵去實踐。然而因為這部憲法被美國「強加」的這個「強制性質」，而激發出戰後日本新民族主義的大力反彈。綜上可知，「文化」與「政治」民族主義的區分，只是為了分析方便，其實二者絕非二元對立，反而有著密切複雜的糾葛。

日本當代民族主義變化的軌跡，存在「憲法九條論爭」的辯論之中，從不同時代的正反論述變化、或同時代的論述比較中，我們可以一窺日本人民「國家認同」的真貌，也可以理解戰後「修改『憲法九條』與否」這個政治議題，牽涉到日本人民對國家定位的想像、對日本的認同、對戰爭的記憶。「憲法九條論爭」仍是現在進行式——2014年起，安倍晉三政權試圖通過「安全保障法案」來放寬海外自衛隊派遣的規定，引發民間大量抗議示威人潮，同時沖繩美軍基地的抗爭也是一日未歇。即便「憲法九條」仍尚未真正被「修改」，但仍拿著「不要破壞九條」標語來抗議的日本社會，仍值得身為鄰國的台灣持續密切關注相關的政策動向。

參考文獻

中文（依注音順序排列）

大貫惠美子 (Ohnuki Emiko) 著，堯家寧譯，2014。《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台北：聯經。

汪宏倫，2001/6。〈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第1期，頁183-239。

汪宏倫，2010/6。〈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19期，頁147-202。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胡博譯，2008。《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北京：三聯書店。

英文

Wolf, Eric, 1999. *Envisioning Power: Ideologies of Dominance and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日文（依50音順序排列）

大嶽秀夫，1991-92，《戰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一卷。東京：三一書房。

小熊英二，2002，《〈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

小熊英二，2003，《单一民族国家の起源》。東京：新曜社。

加藤典洋，2005，《敗戦後論》。東京：ちくま文庫。

高橋哲哉，2005，《戦後責任論》。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

田中伸尚，2013，《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

千葉真等，2007，《平和憲法と公共哲學》。東京：晃洋書房，2007。

場次二：

日本政治經濟

日本動畫產業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研究

吳亞儒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1990 年後，由於國際化與網際網路的發展，世界一體的概念逐漸成形；而後，又因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各國的經濟實力逐漸成為另一種決定國際情勢的重要因素。因此，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壯大經濟實力，除了穩固原有的經濟市場之外，各國政府亦極地將心力注入於開發具由潛力之經濟市場，在此背景下，內容產業的重要性便開始逐漸受到重視。

日本內容產業在 2003 年因為「Cool Japan 概念」的提出而逐漸被日本政府重視，小泉政府更有「文化立國」之目標，而後更在 2010 年開始積極推動「Cool Japan 戰略計畫」，成立了內容產業成長戰略相關研究會，定期召開會議及成果報告。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相當於我國之「經濟部」）商務情報政策局於 2013 年 12 月的內容產業現狀與今後發展之報告內容中，可知日本的內容產業市場規模約為 12 兆日圓，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2010 年）；內容產業包含了電影、動畫、音樂、遊戲、出版、廣告等六項主要領域，而本研究所著重之內容產業領域為動畫及部分之印刷（漫畫）領域。以動畫領域來說，自日本動畫協會所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動畫產業市場為 1 兆 4,913 億日圓（2014 年），⁶⁵顯示其重要性。在《Cool Japan 戰略計畫》中，三大策略方向中的其中一項即為內容產業與消費財的共同提攜，當中流程的一環即為內容產業的輸出以及「二次利用」，即角色商品的授權，而二次利用的內容物主要以動畫與漫畫所創造的角色利用為主要手段。於動畫產業及漫畫產業領域中，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內容也依消費者需求改變而漸轉，以商品內涵來說，從最初以故事內容為主的消費需求到近年萌元素消費之主要訴求；以商品型態來說，除自過往的小說、漫畫、周刊、動畫等最常見且最普遍之型態之外，也陸續增加如模型、盒玩、扭蛋、遊戲、抱枕、海報...等藉由作品中角色形象所製作之周邊產品，其種類、型態更是五花八門，不斷推陳出新。在此的情形下，內容產業的推動除了舊有民間的主要運作之外，更加入了政府的協助，日本政府於內容產業相關法律推出後，也隨之提出許多補助內容產業的政策，期望能助內容產業一臂之力，使其發展能更具規模及成熟，也創造出有別於國外的一套系統。

自 Cool Japan 提出後，隨著官方內容產業成長戰略的推動以及民間產業的相互合作，讓日本動畫備受國外矚目並帶來無限商機，東北大地震對日本經濟

⁶⁵ 經濟產業省（METI），

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contents/（2014 年 7 月 28 日閱覽）

產生直接且衝擊性的影響，也使得振興日本國內經濟成為最重要的項目，然而在經濟全球化下，經濟的振興與復興單憑一己之力是難有作為的，尚須仰賴龐大國外市場才能早一步走出困境，於是日本政府便擬定海外推廣的經濟策略，期望透過內容產業的軟實力吸引國外資金流入國內市場；2014 年的《コンテンツ海外展開の促進に向けた施策について》中，提到日本尚未在海外充分展現出其魅力，所以海外市場亦因此尚未真正拓展，於是想藉由能代表「日本魅力」，並在海外具高人氣的商品、服務等項目逆向吸引外國市場進入國內，也就是在世界製造「日本潮流」，而動畫產業即為當中被點名的項目之一，動畫產業對於日本之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

近十年來，日本動畫產業受到傳媒進步、盜版問題、少子化引起國內市場縮小...等因素影響，自既有市場中開發未知市場及吸引新客群以獲得最大利益為目標的跨媒體營運模式便逐漸成形，並以實際獲益的成績單證明可行性，在當今已成為動畫產業中廣泛運用之經營手段。究竟跨媒體營運模式為何？涵蓋和種類別的產業？其所帶來的優勢與劣勢為何？該如何克服...等，為筆者欲於研究中欲探討之項目。而透過本研究能更進一步了解日本動畫產業於行銷策略面之運作方式，期許能成為我國內容產業界發展之助力，並提供將來欲從事相關研究之學術人員的研究參考，並期望能藉此為臺日內容產業的學術交流盡一份心力。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歷史文獻分析法為主，實地訪談法為輔之方式進行。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文獻內容方面，區分為動畫產業發展演變與動畫產業組成、營運部分。文獻類別又分為第一手文獻與第二手文獻。

1、第一手文獻：主要為日本政府所出版之書籍與官方網頁所提供之相關參考數據。如：日本經濟產業省所提供《內容產業的現狀與今後發展之方向性》（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狀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內容產業相關之報告書與 Cool Japan 戰略報告書（クールジャパン戰略報告書）...等。

2、第二手文獻：除上述之第一手文獻外，亦會參考民間企業（出版社、一般財團法人...等）的出版書籍、期刊文獻與網頁資訊。例如一般財團法人數位內容協會之數位內容白皮書、動畫協會與相關業界及學者之著書...等。

（二）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本研究將透過訪談日本經濟產業省、講談社，藉由官界、產業界之不同角度的觀點與意見來更加了解有關動畫產業之營運情形，同時補全文獻資料不足的部分，使本研究內容得意更加完善。

三、研究目的

(一) 明白跨媒體經營模式中各關聯企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明白有關原創方、製作方、流通方之業務為何、其在動畫產業中的作用外，也須了解負責募集資金的製作委員會方式與日本動畫產業之市場現況。

(二) 了解動畫製作委員會在跨媒體營運模式中如何運作。對於製作費用高昂的動畫製作而言，資金籌措的順利與否將會影響到模式能否順利運行，此外，整體的收益與製作委員會的出資比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文獻的蒐集以及至業界的訪問對動畫製作委員會的組成以及資金調節方能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三) 探討跨媒體經營模式之運作方式。藉由文獻資料了解被日本動畫產業如何廣泛運用跨媒體經營模式，分析此種模式之建立背景與發展沿革、競爭優劣處、各行為企業的相互關係、面臨之困境...等，瞭解此種模式對於動畫產業於日本發展之重要以及獨特性。

貳、先行研究

目前有關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相關先行研究就十分稀少，即便是相關參考資料也多為片段之內容，較少深入探究與整體性的內容。在此之中，田中繪麻

(2009)的論文針對日本動畫產業中各關聯企業相互合作的水平分離特徵進行研究與分析，論述透過跨媒體經營模式(メディアミックス)，各關聯企業在一定的期間中進行暫時性的水平與垂直統合，透過各部門在活宣傳活動上的協助，將各產業的能力發揮至最大限度。田中以動畫產業為例，指出自1980年代開始，持有原作作品的出版社與電視局、動畫製作公司為基本成員組成團隊相互合作，並以此基本企業成員逐漸擴大合作範疇；此外，田中認為日本此種以中小企業為中心運行的跨媒體經營模式與美國常用的以特定大型企業為中心進行商業行為的統合經營模式有所區別。

從Steinberg(2012)的中，⁶⁶除了能夠對跨媒體經營模式起源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外，一提供了模式的發展與演變的研究素材，可謂較為完整且具有連貫性。研究中對日本跨媒體經營模式的起源進行系統性的考察以及探討，並以玩具產業與角色商品為例，對於模式營運方式進行論述與分析，認為這種透過克服時間空間限制，將時間空間進行徹底利用的大規模宣傳以及利用異業結合，將食品產業、玩具產業及動畫產業做結合，有效運用動畫角色的超高人氣吸引消費者，促進商品的銷售量的商業手法是日本特有的，也認為這種透過不同企業合作的團隊合作方式有別於美國迪士尼的商業行銷手法。

但，直至目前為止的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相關研究多注目於團隊中的資金調節方法與團隊概略的營運方式，較少針對團隊中各相關企業的扮演角色以及經營模式的優缺點進行論述以及分析，並且缺乏其經營模式於商業行為有何重要性之相關論述。

⁶⁶ Steinberg, Marc., *Anime's media mix : franchising toys and characters in Japa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參、日本動畫產業之組成與市場現況

一、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組成方式

(一) 水平統合方式

以動畫制作中各項業務的運作方式做為區分，動畫業界基本上區分為水平統合與垂直分離兩種型態。

水平統合，是指一家企業能夠獨立運作動畫產業中所需之企劃、出資、製作、配給、放映、周邊販賣等各項業務之方式，這種方式最大的特色極為該企業獨家擁有該動畫的各項權利，美國的動畫與電影業界多屬於水平統合。水平統合方式最著名之企業以華特迪士尼企業集團為代表，該社旗下擁有各種部門之子企業，在本公司決定推行一新作時則全力支援各項業務。此種方式操作下的作品若是成功引起市場注意並成為熱門，則該企業將能獲得巨大利潤且由其獨佔，加以近年來又有跨媒體經營模式的推波助瀾，強化各項業務，於經營面來說是有益之發展，但若是成效不彰則易鉅額虧損，但相關風險評估在決策時即會做出判斷。除了企業的過度擴大、利益寡占化、與製作費的增加等利弊外，也可能存在創作內容多樣性的減少問題。⁶⁷

(二) 水平分離方式

相較於獨佔企業水平統合，同時存在許多的制作部門、能同時創造出各式各樣的作品內容的產業構造，由不同企業負責不同業務，彼此之間形成相互交織之成合作網的水平分離方式則為日本內容產業界的一大特色，當中又以動畫產業尤其明顯。獨立作業的各企業雖為獨立分工，但透過一作品而有所交集，並且擁有相同目標，在槍口一致的前提下，各種關係企業便紛紛提出各種企劃與想法，運用有限的資源以期將利益最大化，在多企業與多部門的構造、企業相互合作、創作內容的多樣性等因素下，企業間逐漸發展出一套合作的模式，即跨媒體經營模式（メディアミックス，Media Mix）。水平分離方式所獲得的權利與利益通常為共同參與的複數企業所共有，比較少有權利與利益的寡佔情形，且擁有創作內容的多樣性等特色，不過由於參加的企業規模有大有小，可能會有製作能力或是權利管理能力不足的問題。⁶⁸

跨媒體經營模式的運行，讓各企業得以暫時性的水平統合與垂直統合，如同粽子式組成關係，個企業就如同粽子，並以動畫製作委員會為中心向各個領域發散出各種企畫的連結，而各個企業間也可以相互進行合作強化連結，這種方式能促使各企業部門相互合作以發揮最大潛能。

⁶⁷ 田中繪麻，〈クールジャパンの産業構造：製作委員会方式による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と多様性の並存〉，《会・経済システム》(30)，2009年，頁51。

⁶⁸ 同前註，頁47。

二、動畫製作委員會方式

日本的製作委員會方式，簡而言之，是與某特定內容作品相關之各企業彼此共同達成協議、共同出資、共同獲得相關利益且不會對投資對象進行虧損補償要求的一種組織方式。更詳細的解釋為，指多方產業部門的企業，如制作部門、流通部門、廣告部門、原作保有部門等，為使一共同世界觀的作品得以順利製作與推展，彼此參與且根據簽訂的契約組成一個組織，為了達成該共同目標而集結出資提供費用以供各個流程得以順利進行，而制作出的各種形態的作品的各項權利則是由該出資之「製作委員會」所持有；岩崎（2007）認為製作委員會方式是指一作品經由複數的企業夥伴組成一組織，並共同出資所製作之方式。⁶⁹

而以集結動畫製作所需資金為目的所組成的製作委員會組織，即稱為「動畫製作委員會」。近年，日本動畫產業在資金周轉方面多以「製作委員方式」為主流，此種方式是以管理員創作內容原作之企業，例如出版社，與配給與上映企業，例如電視局，以及周便關聯企業，例如玩具製造商等各家企業共同出資，於事前決定作品的利用型態及利益分配等相關事宜，進而展開作品的制作。⁷⁰製作委員會方式，即「製作委員會」一詞作為詞彙被使用，並與映像製作相關聯約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⁷¹並於 2008 年擴大運用於手機內容產業。1990 年代中期開始於動畫產業運作，自此開始確立型態並漸成主流，山本（2010）指出，1990 年代動畫工作室系統開始崩壞，開始接受企業的製作費出資支援，此種方式逐漸普遍且自成生態，可是作為製作委員會的前身；1996 年後，原本以單一電影企業、工作室獨力完成全部流程，進似美國水平統合的動畫業結結構開始轉換成現在多方關係企業相互合作的水平分離型態，製作委員會方式成為水平分離方式中主要的資金調節樞紐。

由前述的發展沿革可推知，促成動畫產業界製作委員會方式確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企業開始無法獨立負擔龐大的動畫製作費用，加以 1990 年代後深夜動畫的需求大增，除了難以同時周轉龐大的製作費用外，隨著各動畫的播放時段、頻道的不同，所需支付的金額也有所不同。舉例而言，根據日本動畫協會的調查，2011 年，於深夜時段十一點至十二點播放之動畫新作每周約有近 40 集；而深夜時段所需花費費用約為數十萬到數百萬円，若是要購買地上波時段，便宜的也須約 1500 萬至 3000 萬円。⁷²由此可知，光是動畫的製作費用加

⁶⁹ 岩崎明彦，《「フラガール」を支えた映画ファンドのすごい仕組み》（東京：角川 SS コミュニ

ケーションズ，2007 年，頁 78。

⁷⁰ 伊藤高史，《日本映画産業における製作委員会方式の定着と流通力の覇権》，（創価大学社会学会，2014 年），頁 3-27。

⁷¹ 鷹野宏行，〈映像製作コンソーシアムに関する考察〉，《三田商学研究》48(1)，2005 年，頁 201。

⁷² 日経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特集 2 アニメパワー2012：解説 変わるビジネスモデル・アニ

上撥放時段費用就十分龐大，遑論還要加上作品之宣傳與其他雜支費用，以一社之力實在是難以負擔。筆者認為製作委員會方式的形成，除了先行研究中常提起之降低成本風險、調度製作資金等顯見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間接強化各企業間的合作關係，拓展了作品內容的二次與多次利用範圍，連帶提高整體獲利。

三、動畫產業之組成關聯企業

日本的動畫產業構造的根源仍舊是以動畫制作為基礎產業構造，概略可以下單與接單之業務區分成委託方及受委託方。例如：由電視局或是電影公司等委託制作動畫之委託方發單委託制作動畫作品，而「元請制作公司」與該公司旗下為數中多的「下請制作公司」⁷³等受委託方便負責將作品完成。除了基礎的動畫制作委託結構之外，其他相關領域的相互合作與連結也促成該產業結構的多樣與複雜化，多領域的產業結構可謂日本動畫產業興盛發展的主要關鍵。本節將針對動畫制做公司、出版社、電視局與電影公司、廣告代理商與玩具代理商等主要關聯企業做探討。

（一） 動畫制作公司

負責制作動畫作品，依照執行業務的不同區分成為「元請制作公司」、「下請制作公司」以及「專門工作室」⁷⁴三種。元請制作公司，有從企劃到執行制作等業務有能力獨自執行一完整的制作程序，在基礎動畫產業結構中是承包商的角色，例如：東映動畫、吉卜力、SUNRISE...等，皆為員工人數超過百人之大規模動畫製作公司。下請制作公司主要承接由元請制作公司所外包之制作業務，其規模較元請制作公司小上許多，多為十來名員工之中小型企业，下請制作公司多有自元請制作公司分家獨立之情形。而專門工作室則是負責承接動畫畫面之作畫、背景美術、攝影等動畫製作工程。

動畫制作公司雖主要為接受委託方，但並非一味處於被動，例如元請制作公司能夠獨立執行所有企劃與動畫制作能力之企業，除了足夠的資金與執行能力外，這些企業有足夠的經驗去制作消費者喜好的動畫作品，反向販賣這些熱門動畫的版權獲得利益。雖然動畫制作公司以中小企業為多數，但一些財力與規模實力足夠雄厚的元請制作公司亦參與動畫制作委員會成為出資者之一。

（二） 出版社

在日本動畫產業中，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許多動畫作品皆以漫畫作為原作，也因此使得出版業界與動畫產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一般而言，出版社大多扮演著提供作品原作的角色，透過提供原作，可依據最初所簽訂的契約獲

メ業界儲けの構造》，2012年12月号。

⁷³ 「元請け制作会社」與「下請け（グロス請け）制作会社」。

⁷⁴ 専門スタジオ。

得該動畫之著作權、二次利用權以及其他部分之收入；隨著跨媒體經營模式的運作，根據動畫作品推動方式的不同也可能逆向以動畫為原作再將動畫改編繪成漫畫並出版，此時出版社便扮演將作品二次利用的角色。出版社與動畫產業之關係除前述提供原作與二次利用外，更重要的是期望透過不同型態的作品宣傳與上映獲得消費者的注目以其青睞，更甚者進一步對於該作品的周邊產品進行消費。以漫畫為原作的場合為例，若其原作改編製成的動畫獲得高人氣，則帶動周邊消費的可能性也就相對提升，除了各種二次利用的利益回收之外，隨著動畫人氣的節節攀升，原作的漫畫出版量也會獲得關鍵性的影響，而出版量的增加又會進而迎來新的消費者，這些消費者又陸續加入該作品的龐大消費圈之中，如此相互提攜形成的好循環與相乘效果，正是各個關聯企業所期望的，同時也是跨媒體經營模式最主要的核心目的。

由於提供原作、二次創作以及產業相互提攜中所預期的可能利益等因素促進了出版社與動畫產業間的高度密切合作關係，也因此出版社通常亦為動畫製作委員會中的主要成員之一，提供動畫制作資金，在跨媒體經營模式中可謂不可或缺之角色。

（三） 電視局、電影公司

電視局主要是將電視播放的時段針對各個利用的請求以進行分配，對有所需求的顧客進行時段的販賣以賺取廣告時段費用。在動畫業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為與各個廣告代理店協調其委託者所製作之動畫的播放時段，而各個時段所需的購買金額會依照收視率的多寡而有所不同，為了確保想要的放送時段，出資者常常會支付超額的電波費用，這也是為何動畫製作費用經常不得已被壓縮到最低，甚至是負債情形。

近年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動畫的播放方式也凱使多元化，除了專門播放動畫的頻道之外，網路電視與OVA（オリジナル・ビデオ・アニメーション，Original Video Animation）形式的動畫型態也日漸增多，這些管道的使用雖然尚未成為主流，但可以減少原本花費在購買播放時段的金額以投入動畫製作費用中，若是持續發展利用，則動畫業界得以擺脫長期依附於電視局播放媒介的型態；尤以網際網路的發展影響動畫業界最甚，網際網路將時間與通姦零距離化，讓作品得以在第一時間內於世界播放，同時根據不同的宣傳手段也可以將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關聯商品市場亦隨之擴大。隨著輸出管道的轉換，屆時對整體動畫業界而言也將會是一種革新，而隨著製作費的增加，作品的內容也將得以更加豐富，配合新型態的呈現方式，勢必將會帶給市場更大的衝擊。

（四） 廣告代理店

廣告代理店即現在所稱之廣告公司，但一般業界仍習慣以「代理店」稱之。目前日本廣告業界中以電通與博報堂兩社鼎立佔據大部分的市場，但在動

畫產業中，以電通、ADK⁷⁵為主要合作對象。⁷⁶其主要業務為在想要刊登廣告的客戶（廣告主）與能夠刊登廣告的企業（媒體公司）之間擔任協調事項之角色，代替廣告主向媒體公司在廣告主之預算範圍內爭取到所想要的刊登時段，也因此在此業界中習慣稱其作「代理店」。與日本的廣告代理店進行交涉之四大媒體企業為報紙、雜誌、電視以及電台廣播；⁷⁷以電視動畫為例，動畫出資者會透過廣告代理商支付電視局金額以購買播放時段，此時廣告代理店將會在電視局、出資者以及原作方（例如：出版社）與動畫制作公司之間進行周旋，在動畫制作進行中將以完成之部分作品呈現於電視局，在價值與利益評估中相互其進行時段價格之協調，而廣告代理店則自協調中與各媒體公司簽訂契約並從中賺取利益。

（五） 玩具製作商

在動畫產業中，較難有以玩具製作商為主導的動畫制作團隊，玩具製作商扮演的角色大多為兩種，一種為自動畫製作的企劃階段便開始參與，並且共同負擔動畫制作費用，另一種為單純以支持企業的角色提供已制作完成的動畫所需之撥放時段。⁷⁸在跨媒體經營模式中，玩具製作商亦積極參與提供動畫製作資金之製作委員會，成為主要出資者之一。

四、日本動畫產業之市場現況

（一）國內市場

日本國內自年開始推動 Cool Japan 計畫，期望透過官民合作向海外推廣內容產業、流行、地域產品、服務、與食衣住行等日本特色產業，增加對日本的興趣以期吸引更多觀光客至日本進行消費。2015 年 1 月開始於大阪環球影城舉辦的 Cool Japan 特別展覽，在園區內針對惡靈古堡（バイオハザード）、魔物獵人（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新世紀福音戰士（エヴァンゲリオン）、進擊的巨人（進撃の巨人）等四個在國內外皆具有超人氣的內容為主題設立期間內之限定特別展覽，希望透過知名作品的魅力吸引更多國內外觀光客至日本觀光。

由於日本國內高齡少子化的影響，自 2007 年來動畫的製作部數有逐漸減少的趨勢，當中尤以深夜動畫的減少幅度最大。此外，根據日本みずほ銀行所做的內容產業調查報告指出，日本國內動畫收視率原至 2000 年後開始大幅下降，自 1970 年代 20~30% 的高收視率到 2012 年為止已跌落至不到 3.0% 的收視率，⁷⁹原因可能是受到同時段節目以及同業作品的高度競爭與少子化的影響所致；

⁷⁵ 營業額僅次於電通與博報堂，日本國內排名第三位支廣告代理店。

⁷⁶ 寺田信之介，《業界的最新常識：よくわかる広告業界》，2007 年，頁 12-13。

⁷⁷ 同前註，頁 140。

⁷⁸ 谷口功、麻生はじめ，《最新アニメ業界の動向とカラクリがよ〜くわかる本》，（東京：何秀システム，2010 年），頁 104。

⁷⁹ みずほ銀行，〈コンテンツ産業の展望：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更なる発展のために〉，みずほ産業

儘管年平均的動畫作品數有減少的趨勢，但對目前的市場而言，仍舊呈現供過於求的狀態。

（二）海外市場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 2014 年 12 月的《Cool Japan Initiative 報告》指出，⁸⁰日本是被公認為全世界最有創意的國家，其內容產業市場約佔世界的 36%，顯現出日本產業在世界市場中具有優勢。而 Cool Japan 隨著政策的推動與演進，2015 年針對日本內容產業進軍海外市場的策略可分為三步驟，一為在世界創造出日本潮流，當中包含了因應各國文化的不同，將作品內容進行微調，以便各國視聽者能更加融入作品內容的方式以及招募對國外消費者具吸引力的代表宣傳人才...等、二為確保日本國內各企業的支持與配合，政府以提供補助的方式吸引國內各中小企業發掘各地能以吸引海外的魅力及特點，並且提供中小企業擴大海外販賣通路的方法、三為促進外國觀光客及企業至日本進行消費，例如向國外公布日本的許多活動期程。

日本的動畫產業對在海外市場發展主要是以販賣許可權、與海外企業共同合作進行動畫製作、進軍好萊塢以及海外分部的營運...等方式為主，許可權又包含了作品的播出權利以及角色二次利用及商品化的使用權，佔據整體市場的主要部分。根據日本動畫協會（Association of Japanese Animations, AJA）2013 年的調查結果指出，2012 年日本與海外 80 個國家簽訂了約 328 部作品，1,572 個契約，全體而言以亞洲各國為大宗（49.8%），歐美地區地二（33.6%），以契約數來看則以韓國（114）、臺灣（104）、美國（70）佔據前三名，主要集中於亞洲各國。⁸¹目前日本動畫業界的海外營業額約為 144 億日圓，相較巔峰時期的 300 億日圓大幅減少，且市場主要集中於東亞地區，雖然透過前述許多作品證明了日本動畫的實力但還是難以真正打開的歐美市場，其原因主包含了盜版的猖獗、透過網際網路的非法下載、文化衝突、動畫內容富含大量血腥暴力而受到當地審核團體的規範以及撥放媒介的取得...等，因此，即便日本動畫受到西方世界矚目與歡迎但播放部數仍舊不多。

雖然 2006 年後期開始，動畫作品供過於求與光碟市場的縮小，導致在對海外販售時的販賣金也大幅下跌，再加上市界景氣低靡及違法盜版層出不窮...等因素，導致動畫業在海外發展上並未如預期中順利，但以未來的發展趨勢而言，海外市場是重要的發展對象，加以內容產業近年來的多元化運用帶來新商機，各國政府也越發重視這個新市場，擬定各種因應政策。

調查》，2014 年。

<http://www.mizuhobank.co.jp/corporate/bizinfo/industry/sangyou/pdf/1048_01_01.pdf> 2015 年 3 月 25 日閱覽。

⁸⁰ 日本經濟產業省，〈Cool Japan Initiative 報告〉，

<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creative/141211CoolJapanInitiativeDecember.pdf>，2015 年 03 月 23 日閱覽。

⁸¹ 日本動畫協會，〈日本のアニメの海外展開 2013 年版〉，<<http://www.aja.gr.jp/data/>>，2015 年 03 月 23 日閱覽。

肆、日本動畫產業之跨媒體經營模式之運作分析

一、跨媒體經營模式之定義

跨媒體經營模式源於日文メディアミックス (Media Mix)，於近十年來開始被廣泛運用於日本的內容產業界，目前已成為各產業擴大宣傳與推廣產品的慣用手法之一。雖然跨媒體經營模式雖已被業界廣泛運用行之有年，在於學界之相關研究卻相對稀少，也因此，雖然其概念廣為人知，對跨媒體經營模式也有許多方面的解釋，但卻缺乏一個統整的定義。根據 Steinberg (2012) 對跨媒體經營模式 (media mix) 之定義，為透過不同的媒體管道以原創的、合成的、有效的方式達到宣傳目標。在大眾傳播高度發展的現在，僅使用單一媒體為宣傳手段已不符合時代需求與商業成本，且難以達成宣傳目標。加以社會的日益複雜化、媒體網絡與新型態流通管道的發展，特別是電視與網路的普及，與各種宣傳手法的日新月異，適當地使用其他媒體管道做為手段已成為必須；此種背景之下，跨媒體經營模式於宣傳戰略中所佔的重要性便顯而易見。⁸²而根據田中 (2009) 在其學術論文中對跨媒體經營模式所做之定義為，將一創作內容的世界觀以不同的媒體型態重新呈現，並透過複數的流通部門將此同樣世界觀但不同型態樣貌的作品進行發送，藉此擴大收益機會的一種手段。⁸³

自 Steinberg 與田中對跨媒體經營模式的定義與解釋中，可統整出跨媒體經營模式是一種「以一特定內容為營運中心，透過不同媒體管道的交互進行活動與宣傳，並將關聯產品多樣化推出，在盡可能提升整體營運效能的同時以期達到營利的最大化」的商業模式；而電視的發明與普及、電影產業的式微與動畫電視的抬頭、經濟的富裕...等環境外在因素與模式中各關聯產業藉由媒體管道串連在一起，並激發出預期之外的吸引力之內在因素則是促成該商業模式成功不可或缺之因素。從字面上可得知，這是一種強調運用多種媒體管道的營運手段，而從目前較多實際運用的案例可知，傾向於呈現型態較富有彈性與變化空間之內容產業，雖然作品的呈現方式隨著不同的媒體管道而有所不同，作品內容也會依流通時間、目標群體或是型態需求有所修正調整，但整體而言仍舊可視為同一核心主題內容，該核心內容透過各式的媒體傳播以達到擴大知名度，進而提高內容的販賣力，達成最終的營利目標。而此所稱之「核心主題內容」的原形，又或稱為原作，可以是任何型態，例如：漫畫、動畫、小說、遊戲...等，皆可成為跨媒體經營中的核心作品，透過一系列的交互宣傳，例如：電影化、電視劇化，達到擴大受益機會的目標。

⁸² Steinberg, M. (2012). Anime's media mix : franchising toys and characters in Japan. p.139.

⁸³ 田中繪麻，〈クールジャパンの産業構造：製作委員会方式による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と多様性の並存〉，《会・経済システム》(30)，2009年，頁46。

二、跨媒體經營模式之擴大發展（角川商法）

角川書店在跨媒體經營模式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性的代表意義，其將媒體連結的相互傳輸方式明確的呈現於電視動畫、寫實電影以及小說，亦致力於發展當代跨媒體經營模式之運用，同時也是推動該模式運行的關鍵人物，也是了解跨媒體營運的傳承與轉變所不可或缺的角色。⁸⁴跨媒體經營市場目前由角川及集團佔據九成以上，⁸⁵可見角川集團對跨媒體經營模式運用的熟悉。

角川商法，從本質上來看其實就是跨媒體經營模式，而將此模式以內容產業為中心並確立運作手段，使其成為目前角川書店最大商業利器的關鍵人物式角川第二代社長角川春樹。1970年代，文庫市場的競爭者不斷增加，讓原本在文庫市場佔有優勢的角川書店受到不小的影響，為了提升自家書籍的銷售量，想出了將角色形象與產品進行連結宣傳的跨媒體經營概念與日本長青產業，出版與電影產業做結合，產生出對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具重大意義的新型態的商業經營模式，以電影、音樂、書籍三位一體為主、大量宣傳為輔的商業手段，也就是日本報章所稱之「角川商法」，亦為現代所熟悉之跨媒體經營模式之基底。⁸⁶1976年「犬神家的一族」即為角川春樹首次的跨媒體經營模式運用，當時最主要的戰略以「大量宣傳」為中心，先是破天荒地投入大量資金於廣告宣傳費，透過廣告CM不斷重複即將上映的電影資訊，並採用知名演員擔任主演，在電視、電影、書籍等多媒介的大量且重複宣傳下，成功引起消費者的注意，而原作書籍的知名度也因此水漲船高，紅極一時，角川商法亦成功的在70、80年代掀起新商業旋風。1980年代，跨媒體經營模式（media mix）一詞開始被廣泛運用於指稱複數媒體交流的現象。80年代中期，這種複合式的媒體行銷手段已被普遍運用，此時此種現象也開始出現一些代名詞，例如「三合一策略」（trinity strategy）「角川模式」（Kadokawa business）、「跨媒體經營模式」（media mix）...等。

三、動畫產業所扮演的角色與優勢

Steinberg 在其著作中提到動畫產業的跨媒體經營模式通常具有以電視為關鍵的播放及宣傳管道、重視模式中附加物的特殊性、強調在媒體管道上運用合成方式達到特定宣傳目標等特性。即，將電視動畫是為營運的重心之一，並且著重作品在改編後內容的獨特性與內容作用於關聯產品上的特殊性，並且在多媒體管道交互宣傳的同時，宣傳內容也可能與其他作品內容合作進行合成或是

⁸⁴ Steinberg, Marc., *Anime's media mix : franchising toys and characters in Jap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p.135-136.

⁸⁵ 日経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KEYWORD1 ジャンプアニメ『ONE PIECE』『NARUTO』と劇場版も好調な“ジャンプアニメ”の背景は？》，2012年12月号。

⁸⁶ 毎日新聞東京朝刊，〈挫折した「角川」商法 埋没したメディアミックス 大作映画、重荷に〉，頁25，1993年09月01日。

將作品內容的元素分開運用，以達到最大宣傳效果。動畫與漫畫，又或者說是原作，給了角色（代表符號）專屬性格、相互關係、以及一個獨特的故事背景或是世界觀，可以說原作提供了一個由想像所創造的「世界」，而其他產業則透過種管道與方式具現化這個「世界」。藉由跨媒體經營模式中的各種活動的推動與各種關聯產品將想像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連結，消費者可透過此連結或是媒介滿足其自身想要參與作品世界的欲望。當消費者的欲望被激起後，再透過消費者之間的傳遞網將訊息更進一步地向外擴散，吸引潛在顧客或是強化已消費顧客對產品的欲望，形成一正向循環，並構築了一種屬於以特定作品內容為中心的交流現象。本研究所指稱之日本動畫產業之跨媒體經營模式，是以包含元作為電視動畫、原作為其他媒體平台但有改編為電視動畫、以動畫角色為中心取向，並藉由跨媒體平台、流通管道等進行活動的宣傳以及發展關聯商品的多樣化的運作，是一種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聯繫關係以可能的方式來呈現的特定模式。

跨媒體經營模式在動畫產業能順利推行運作，主要是因為動畫產業有著利於跨媒體經營模式推動穩定且寬廣的市場、品牌形象戰略、特色性高的角色、難以預測的故事內容、親近大眾...等特色。首先，動畫產業容易因為策略的適當運用以及得當宣傳的刺激而擴大動員力以及刺激消費者購買慾望，消費者對作品具有很高的忠誠性，具有穩定性，且，除了出版業外，動畫產業與玩具或是遊戲廠商的相容性高，透過不同年齡取向的玩具與遊戲的發售所挖掘的潛在消費市場之年齡層也十分寬廣。其次，有關於品牌形象戰略，由於動畫產業擁有廣大視聽者與熱心且忠誠的消費群，當一動畫與各種企業合作進行多元化發展時，根據視聽者對該動畫的角色、代表台詞、音樂...等已有既定印象的前提下，這些元素會形成一種代言作用，而各合作產業在推出產品時可以藉由將「代言」與產品形象作結合的方式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引起消費者認知上的共鳴、有效率地進行宣傳，同時，異業結合的方式於目前的產業發展來說也具有正向評價。再者，極具特色的動畫角色與難以預測的故事內容可謂吸引消費者進行視聽消費的重要關鍵，在未知且具無限可能的作品中不斷地追求後續以滿足求知慾。而動畫普及與廣大年齡層市場的擁有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其不僅限於特定年齡層或是消費族群，具高度親民性，較不容易引起市場反感，也因為此種潛在認知，許多名人會願意公開表示對於內容產業的喜愛以拉近與民眾之間的距離，例如：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及不諱言其對於漫畫的喜愛，意外獲得一些年輕選民的支持、日本演藝圈中更不乏公開表示自己喜歡看動畫的藝人，甚至許多歌手的創作中亦置入許多動、漫畫元素；對於動畫產業而言，雖然名人的公開支持不見得全是益處，但對於動畫的普及化來說是很有效的方式，而隨著大眾對於動畫產業認可的提升，民間自治團體甚至地方政府亦開始將動畫視為重要宣傳手段活動主題，例如：觀光產業推出聖地巡禮行程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在多單位推波助瀾下，隨著動畫作品在國內外知名度的提升，輸出進軍

海外亦成為下階段的發展目標。⁸⁷

根據上述各種原因，動畫作品容易產生動畫力（アニメパワー）現象，⁸⁸無論是原作本身就已是熱門作品或是透過跨媒體經營而走紅的作品，皆有能力引起視聽消費者的共鳴，即便是不同媒介產品的視聽消費者們也能因為共同作品內容而達成某種共識，這種穿針引線的能力也是一般傳統產業所難以擁有，成為動畫產業的重要利器。換言之，一個作品的動畫力會隨著消費市場的擴大而隨之增強，宣傳活動也會打鐵趁熱地進行廣告宣傳，當一作品擁有廣大視聽消費者時，知名度亦水漲船高，即便是非消費者也會經由宣傳管道的放送而接受到作品的基本資訊而對其有所了解；在此種背景之下，某作品的中心思想或是特色將透過這些交互管道迅速散播，進而成為群體共識時，社會現象⁸⁹便由此產生。舉例而言，新世紀福音戰士在 1990 年代因為故事內容獲得廣大視聽消費者的回響，雖後擴展至一般社會大眾，其用語、角色形象...等眾多元素在日本形成一股潮流，又被稱為新世紀福音戰士之社會現象。2014 年，進擊的巨人隨著動畫化之後的竄紅，日本國內甚至國外相繼吹起「進擊」風，作品當中的元素迅速充斥在社會中，如「進擊的 OO」標語、巨人形象、調查兵團一詞...等，被廣泛運用，成為新時代的社會現象動畫。

伍、結論

動畫產業透過無限的想像，創造出各種得以排解消費者壓力的故事內容，甚至是反映出人們對於社會渴望。儘管動畫與出版物等一直被視為一種非必需的消耗品，但於數位時代中，網路已逐漸成為必須，無論是日常生或是職業需求，越來越多人開始習慣依賴網際網路；在透過網路達到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亦代表著市場的大開與國際化，也因此，透過與網路科技結合得以發揮更大產業潛能的內容產業也日趨重要，而成為大眾娛樂的動畫產業將連帶受到重視。

日本的動畫產業在其歷史的發展沿革下發展出獨特的跨媒體經營模式，結合各中小企業的力量，運用各種媒體管道將產品魅力發揮至最大，再透過網際網路的串聯，讓作品不再侷限於日本國內，得以更進一步地推展至世界各地，也讓世界對於日本能有更深刻的印象。而日本政府在了解到動畫產業於世界中具有高人氣後也明白對於拓展世界經濟市場而言，有效運用動畫產業將是必須的手段，繼而對其寄予重望。本研究透過對日本跨媒體經營模式的考察與分析，期望能更加了解此種獨特的商業模式，對臺灣尚在摸索階段的內容產業能

⁸⁷ 日経ビジネス，〈“好き”が消費を動かす：アニメパワー2012 お金が、人が動いた！アニメ事件簿 20〉，2012 年 12 月号。

⁸⁸ 同前註。

⁸⁹ 社會現象，根據日本數位大辭泉的解釋為，在人類的社會生活、社會關係中所產生之有關經濟、道德、法律、藝術、宗教等的現象；又，某種事物在社會中急速發展滲透，進而產生了一

定程度的影響。

有所貢獻，也期許本研究內容能對日後進行相關領域研究的後輩有所幫助。

陸、參考文獻

1. 中文部分（按作者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川口盛之助著，江裕真譯，2009。《日本創意·萌經濟》。台北市：商周出版。

李世暉，2013。《文化經濟與日本內容產業：日本動畫、漫畫與遊戲的煉金術 = Cultural economic and content industry in Japan : alchemy of Japanese animation, comics and video game》。台北市：智勝文化。

李錫東，2009。《文化產業的行銷與管理》。台北市：宇河文化。

陳萬達，2012。《媒體企劃：跨媒體行銷趨勢與傳播策略 = Media planning : cross-media marketing trend & communication strategy》。台北市：威仕曼文化。

傻呼嚕同萌，2007。ACG 啟萌書：萌系完全攻略。台北市，木馬文化。

藤村正宏著，李毓昭譯，2006。《抓住女性顧客的戀愛力行銷學》。台北市：太雅出版。

2. 日文部分（按作者姓氏五十音順序排列）

相原 博之，2007。《キャラ化するニッポン》。東京：講談社。

秋山 孝，2002。《キャラクタ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入門》。東京：角川書店。

東 浩紀，2001。《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東京：講談社。

東 浩紀，2010。《ゲ-ムのリアリズムの誕生：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 2》。東京：講談社。

東 浩紀、伊藤剛、神山健治、桜坂洋、新海誠、新城カズマ、西島大川，2007。《コンテンツの思想：マンガ・アニメ・ライトノベル》。東京：青土社。

新井 範子、福田敏彦、山川悟，2004。《コンテンツマーケティング—物語型商品の市場法則を探る》。東京：同文館。

岡山 斗司夫，2008。《オタクはすでに死んでいる》。東京：新潮社。

大塚 英志，2001。《定本物語消費論》。東京：角川書店。

大塚 英志，2004。《物語消滅論：キャラクター化する「私」。イデオロギー化する「物語」》。東京：角川書店。

大塚 英志、大澤信亮，2005。《「ジャパニメーション」はなぜ敗れるか》。東京都：角川書店。

大塚 英志，2012。《物語消費論改》。東京：アスキー・メディアワークス。

河合 良介，2006。《萌える！経済白書》。東京：宝島社。

小山 昌宏、須川亜紀子，2013。《アニメ研究入門：アニメを究める9つのツボ = Study of Animation》。東京：現代書館。

- 斎藤 環，2011。《キャラクター精神分析：マンガ・文学・日本人》。東京：筑摩書房。
- 杉山 知之，2007。《クール・ジャパン：世界が買いたがる日本》。東京：翔伝社。
- 藤原 実，2013。《萌えビジネスに学ぶ「顧客を熱中させる」技術：「売れない時代」の新しいマーケティング論》。東京：中経出版。
- 田中 絵麻，2009。《クールジャパンの産業構造：製作委員会方式による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と多様性の並存》，会・経済システム(30)。
- 谷口 功、麻生はじめ，2010。《最新アニメ業界の動向とカラクリがよ〜くわかる本》。東京：何秀システム。
- 津堅 信之，2004。《日本アニメーションの力 85年の歴史を貫く2つの軸》。東京：NTT出版。
- 出口 弘、山中秀幸、小山友介，2009。《コンテンツ産業論：混淆と伝播の日本型モデル》。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野村総合研究所オタク市場予測チーム，2005。《オタク市場の研究》。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 山田 徹，2000。《キャラクタービジネス》。東京：PHP研究所。
- 山口 康男，2004。《日本のアニメ全史：世界を制した日本アニメの奇跡》。東京：テン・ブックス。
- 四方田 犬彦，2006。《「かわいい」論》。東京：筑摩書房。

3.英文部分（按作者姓氏發音順序排列）

- Steinberg, Marc., 2012. *Anime's media mix: Franchising Toys and Characters in Jap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u, M. Y. a. T.-y. G., 2013. *Japanese animation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Kümmerling-Meibauer, J. B. a. B., 2013. *Manga's cultural crossroad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4.網頁資料

- 經濟産業省（METI）。<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contents/>

跟隨與自主-日本戰後航空產業發展的策略

林本長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所博士生)

摘要

二戰後，日本航空產業發展得利於，外在結構因素：因韓戰回應美國的壓力重新武裝，扮演防禦中蘇共黨侵略的角色，鑲嵌於美國的東亞地區國際政經情勢「美日同盟」架構。冷戰期間，美國願意犧牲短期的經濟利益。提供航空技術移轉與開放市場。冷戰後，日本航空產業逐漸從跟隨轉變為自主整機發展，先進技術提供與國際政經環境依附於美國之下、國內需求不振及先天不良結構弱勢軍事體質，很難有大幅度的轉變。日本自主發展 MRJ 能否成功，如過去汽車業與家電業攻城掠地橫掃美國及全球市場，則有待日後續觀察。

關鍵詞：美日同盟、官民協作、三位一體、自主發展、軍民兩用

壹、前言

中國的政經實力崛起並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2008 年美國「重返亞洲」目的，在戰略上，孤立中國強化日本的美日同盟的夥伴關係。面對中國崛起，2009 年 7 月 21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曼谷會晤泰國副總理 Korbsak Sabhavas 聲明時表示：「美國重返亞洲，並繼續維持我們對於亞洲盟友的承諾。」⁹⁰對日本而言，美國重返亞洲提供東京基礎和正當性，以強硬的方式回應北京日與俱增的影響力。2013 年，中日於釣魚台爭議上，美國刻意保持戰略模糊，增加兩國戰略計算與兵棋推演的複雜度與不確定性，迫使兩國始終只能在美國戰略設定的框架內，以各種方式試探對方底線，與表現維護主權與領土的決心。⁹¹

2013 年 1 月~11 月 17 日止，訪問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一年內共訪東南亞五次，力抗中國於東協的政經佈局。⁹²安倍地球儀俯瞰外交，對內展現自信的執政能力；對外日本重返國際政治舞台的姿態。日本強化澳洲，印度，菲律賓，越南和印尼，形成安全夥伴關係外，並通

⁹⁰ 〈Remarks with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Korbsak Sabhavas〉，2009 年 7 月 21 日，《U.S. State of Departmen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271.htm>〉。

⁹¹ 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頁 43~64。

⁹² 江迅，〈中國高鐵外交抗衡日本在東南亞勢力〉，《亞洲週刊》，第 27 卷，第 41 期，http://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81376362306&docissue=2013-41。

過對這些國家的軍民兩用機、潛艦等武器出口強化雙邊的軍事外交的關係。⁹³其次，透過對東南亞、印度等國對海外國際援助與日元貶值優勢，循序漸進推動民用 MRJ 的飛機銷售給這些國家航空公司，擴大海外市場及達成合作夥伴與供應商關係，全面鞏固軍事外交與產業合作緊密的共同體。

冷戰架構下，日本於國際政治，選擇「吉田主義」作為外交政策，回應美國的壓力重新武裝，美國因應蘇聯為首共產集團入侵東亞地區，協助日本航空產業的重建，恢復軍機的生產製造；另一方面，日本以「發展型國家」設計出官民協作體制，採取計畫性的經濟發展追趕策略。對國內政經發展採取策略，總體目標是集中經濟復原與產業發展政策，提升國民生活水準。在政治經濟，採取與美國合作回應其需求。⁹⁴日本保持基本武裝，及避免被美國捲入戰爭。在軍事採取低姿態，全力發展經濟，避免國內政治鬥爭與分裂。在國家安全，獲得長期的保障，容納右派主流意見保持與美國穩定關係，與左派和解限制軍備擴張。⁹⁵

冷戰結束，美國重新定義對盟國的承諾後，提高盟國的軍事負擔。⁹⁶就戰略意義，東協是美國重返亞洲的舞台，美日同盟意志的延伸，建立東南亞國家協商與溝通機制。東協近年經濟成長日益茁壯，民航機市場潛力商機龐大。本文分析目的有，一、戰後美國東亞政經戰略佈局，使得日本恢復航空產業發展的契機，藉由美國航空關鍵技術轉移的對象，從供應商角色升級，加入國際共同開發的機會成為策略性夥伴關係。二，冷戰後，美國通過控制成長策略抑制日本自主的發展及自我限縮武器出口，導制防衛產業生產成本過高。2014 年後，通過修法「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軍工出口和共同開發促進與美國等盟邦國家的防衛合作；以及提升日本防衛產業的競爭力。⁹⁷三、日本透過軍事外交經濟三位一體的機制與技術合作出口策略，與東南亞國家航空產業合作，透過波音技術協助開拓全球區域型飛機市場。

⁹³ 〈Visit to Southeast Asia by Prime Minister Abe〉，2013 年 7 月 27 日，〈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http://www.mofa.go.jp/index.html>〉。

⁹⁴ 佐々木卓也、中西寛，〈第 7 章 パクス・アメリカーナの中の戦後日本 1950 年代〉，五百旗頭真編，〈日米関係史〉（東京：有斐閣，2008），頁 186~187。

⁹⁵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2007), pp. 241~243.

⁹⁶ George Bush,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January 1993, pp. 13-15.

⁹⁷ 內閣官房、外務省、防衛省、経産省同時発表，〈「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策定しました〉2014 年 4 月 1 日，〈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4/20140401001/20140401001.pdf>〉。

貳、文獻回顧

1945~1952 年，日本航空產業慘澹經營的空白歲月。韓戰爆發，日本藉由美國軍需維修保養的合約與生產執照，及技術移轉航空產業得以恢復生機。⁹⁸冷戰期間，在美國政府的全球外交與戰略目標下，強化美日同盟關係，美國願意犧牲短期的經濟利益，提供航空技術移轉與開放市場。⁹⁹美國對武器與戰機是在嚴格的條件下出口，其中包括銷售必須通過政府的方案進行，日本必須同意某些「最終用途保證」。以及協助美國航空工業提升，於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銷售的軍用和商用飛機。¹⁰⁰冷戰氛圍下，美國因自身利益持續科技移轉，日本有能力製造高性能戰機，日本社會黨關切戰機與零組件出口，避免日本可能被美國捲入戰爭的產物。¹⁰¹

在吉田原則的大戰略架構下，日本授權通產省官僚監理與主導經濟產業政策。Michael W. Chinworth and Ron Matthews 指出二戰後，在經濟產業發展，日本通過「官民協作」模式扮演關鍵的角色，帶領航空產業的發展及預測未來趨勢，恢復世界級的工藝水準。¹⁰²日本通過政策的制定，政府採取管制型態、介入市場的方式、以及廠商的發展規模。¹⁰³重建航空產業，維持低度的軍需工業，及建立國家自給自足的軍民兩用(dual-use)產業，於國內軍需市場的有限性，國家自主性主導產業政策走向，追求經濟發展及模擬人工市場。¹⁰⁴Chamler A. Johnson 指出，日本「官民協作」體系是政府與企業緊密的合作，國家通過政策干預推動經濟發展。官僚體系退休官僚空降企業(amakudari)，組織強而有力綿密的政商網絡關係。自民黨一黨獨大及長期執政產生利益團體與派閥透過選票集中，作為干預通產省的政策走向。¹⁰⁵

豬口孝指出，官僚制定經濟產業發展的前瞻性計畫，快速調整政策適應市

⁹⁸ 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日本航空工業五十年：第 1 部日本の航空機工業》(東京：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2003 年)，頁 12。

⁹⁹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pp. 249.

¹⁰⁰ Andrea Shalal and Emily Stephenson, 〈U.S. establishes policy for exports of armed drones〉, 2015 年 2 月 18 日,《Reuters》, <<http://mobile.reuters.com/article/idUSKBN0LL21720150218>>。

¹⁰¹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年 7 月,頁 1~54。

¹⁰² Stephen Martin, “The Economic of Offsets Defence Procurement and Countertrade.” In Michael W. Chinworth and Ron Matthews, eds. *Defense Industrialisation Through Offsets: The Case of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1996), pp. 200.

¹⁰³ Frank, Dobbin,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

¹⁰⁴ Yujen, Kuo, *Market Failure Mentality In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 Case Studies Of Robotics and*

Aircraft Industries (Los Angeles: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34.

¹⁰⁵ Chamler A.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5~80.

場的變化與政經結構的平衡，有效的內部資源適當整合。當國家經濟政策無法與市場力量對抗，國家必須在短期時間內達成產業發展目標。扶植大企業提供產業訊息與獎勵引導企業投資，政府保證企業長期獲利。¹⁰⁶郭育仁指出，日本政府防止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採取「人為市場模擬」包括創造內部科技資源，通過推動美國授權生產及加入國際專案計畫，提供利潤誘因，經濟規模，研發方向，以及試錯中與學習經驗並藉由公部門基金支持計畫。¹⁰⁷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認為日本通產省推動航空產業發展過程，透過美國技術授權縮短學習新科技與追趕美國技術的過程，調整適合發展的模式，鑲嵌於美國航空業推升出口成長，以及技術外溢效果，促進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¹⁰⁸

Marie Anchordoguy 指出，國家角色管理市場推升產業發展與政治社會穩定，維持相對自由與公平市場關係，在追趕西方科技過程國家控制國內產業環境、明確科技發展軌跡、產品的逆向工程。國家與私有部門彼此相互合作無間創造環境與緊密集體關係，產業中廠商彼此之間強而有力的共存(coexistence)與合作(cooperation)，避免產業間削價競爭。¹⁰⁹

日本航空產業發展國家政策制定使資源有效分配，扮演關鍵角色促進產業良性發展，避免廠商過度競爭及導致資源錯置。¹¹⁰ 產業政策是政府策略協助企業，轉型具有競爭力調整經濟結構升級，一、產業政策經過嚴密的推算協助產業具有競爭力，進而促進經濟發展。二、日本選擇產業發展於本質的差異，來自對航空產業發展前瞻性，試圖預測國際未來的趨勢與市場潛在性的發展。三、因應外在變化，調整不斷改變的生產模式與市場的關係。

參、冷戰時期跟隨的策略

一、戰後恢復與重建發展因素

韓戰爆發給了日本天時的機會，藉由美國維修與保養的合約與生產執照重新建立航空產業發展與恢復生機。¹¹¹1950~1973 經濟高度成長期，強勢的民意

¹⁰⁶ Takashi Inoguchi, *Japa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rans Pacific Press, 2003), pp. 47-48

¹⁰⁷ Yujen, Kuo, *Market Failure Mentality In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 Case Studies Of Robotics and Aircraft Industries* , pp. 59.

¹⁰⁸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2~223.

¹⁰⁹ Marie Anchordoguy, *Reprogramming Japan: The High tech Crisis under 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8-13

¹¹⁰ Ellis S. Krauss, " Political Economy: Policymaking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Vol. 25, No. 1, May, 1992, pp. 44-57.

¹¹¹ 1952-1954 年美國與日本簽訂保養與維修合約金額 26 億日圓，相關零組件生產 34 億日圓。

壓力支持經濟成長壓倒一切，政治衝突被禁聲，官民協作制定長期目標與產業政策。¹¹²外在國際現實因素，冷戰時期，東西方嚴重仇視與對立，美國全球外交與戰略目標下，對共產國家進行圍堵，全力支持日本航空產業與自我防衛的提升能力，分擔美國東亞地區政經與軍事佈局，持續支持相關科技轉移快速提升日本航空科技與生產技術能力。

日本面對天然資源匱乏，唯有促進科技創新與生產效率來彌補先天的不足，產業策略設計的邏輯，驅動財政支援經濟發展，從簡單來料加工及初級生產技術到產業升級。¹¹³日本政府採取行政指導強力介入與推動，一系列航空產業政策引導大型企業積極參與，歸因於戰前具備強而有力航空相關技術能力與條件。

二、美國授權生產與加入國際專案計畫

冷戰架構，軍事外交跟隨與日本技術追趕兩重因素，通產省官僚經過理性計算選擇採取美國軍機的授權技轉，大幅縮短自主研發的時間與成本，跳過關鍵技術的瓶頸與障礙，將先進軍用技術進行軍民兩用大量生產製造，獲取經濟利益及技術升級。1955年，開始美國專案計畫，從授權製造 F-86F 與 T-33A 開始一系列的軍機。¹¹⁴短期間內，美國技術大量移轉與訂單，縮短自行研發的時間與成本最小化，經濟利益極大化。長期下來造成技術依賴與成長控制策略，扼殺的航空產業的創新能力。日本實施進口替代，通過收購外國生產製程移轉，達到技術外溢本土科技的效果；技術擴散促進產業升級，總體產業經濟轉型；高附加價值的創新能力，推升產業出口。¹¹⁵郭育仁認為，1967年「武器出口三原則」是官僚刻意自我限制軍是出口，及戰後強調經濟發展與保持有限軍力下的最適方案。¹¹⁶日本故意的忽略航空產業出口品項與技術，受限美國武器擴散的原則與航空產業利益所制約，進而導致日本軍用航空產業作繭自縛進退兩難的結果。

詳請參見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Clarendon Press, 1996), pp.222~223.

¹¹²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pp. 248.

¹¹³ Christopher Freeman,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ussex Press, 1987), pp.35.

¹¹⁴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3.

¹¹⁵ Samuels, J. Richard,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3.

¹¹⁶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頁 1~54。

表 1 美國授權生產製造

年代	機型	授權廠商	製造商	備註
1954	T-34 螺旋槳教練機	Beech Aircraft	富士重工	
1955	T-33A 噴射教練機	Lockheed	川崎重工	
	L-19 連絡機	Cessna	富士重工	
1956	F-86 噴射戰鬥機	North-American	三菱重工	
1958	S-55(UH-19) 大型運輸直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59	P2V-7 反潛機	Lockheed	川崎重工	由 P2V-7 修改而成，世界上第一架採取全電子式儀控的反潛機
1961	F-104J 噴射戰鬥機	Lockheed	三菱重工	國產化
1962	V107 大型運輸直昇機	Boeing	川崎重工	
	S-62 中型運輸直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63	Bell 204B(Hu-1B) 中型直昇機	Bell	富士重工	
1964	S-6(HSS-2) 大型運輸直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68	Hughes 369 小型運輸直昇機	Mcdonnell Douglas	富士重工	
1972	F-4EJ 噴射戰鬥機	Mcdonnell Douglas	三菱重工	國產化
1973	UH-1H 中型運輸直昇機	Bell	富士重工	
1981	F-15J/DJ 戰鬥機	Mcdonnell Douglas	三菱重工	國產化
1983	AH-1S 反裝甲直昇機	Bell	川崎重工	
1986	CH-47J/JA 大型運輸直昇機	Boeing	三菱重工	
1991	SH/UH-60J & SH-60K 反潛直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93	UH-1J 中型運輸直昇機	Bell	富士重工	國產化
2006	MCH-101 掃雷與運輸直昇機	Agusta Westland	川崎重工	
	AH-64D	Boeing	富士重工	

	阿帕契武裝攻擊直昇機			
--	------------	--	--	--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日本航空工業五十年：第1部日本の航空機工業》

(東京：社團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2003年)，頁114~129。

SJAC, *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3*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 2012), pp. 26.

加入國際聯合開發計畫

受限國內航太市場需求量不足，獨自開發經費過於龐大，同時在獲取先進技術專利授權制約下。1978年日本決定加入波音公司國際合作開發計畫(ICP)成為第1個合作夥伴，獲取波音公司先進科技轉移，首先進行YX/7X7國際合作開發計畫的7X7型為230座位商業客機。¹¹⁷加入國際開發計畫航太公司有三菱重工、富士重工、新明和、日本航太製造公司(JAMCO)、石川島播磨重工、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公司、日本航空系統公司。¹¹⁸陸續開發767、777、787機型生產，加入國際開發計畫除了製造廠商之外，也加入兩家日本國內民航公司全日空與日本航空，主要目的獲取最先進機種購置成本，來加強營運管理上的競爭力，日本與波音合作的開端以767機型協力生產。

表 2 日本加入國際專案計畫製造商業客機

商轉年份	機 型	用 途	發展/製造商	生產數量(架)
1982	YX/767	噴射商業客機	波音(Boeing)、日本航空機協會、三菱、富士、川崎三大重工	1108 1000
1994	777	商業客機	波音、日本航空機協會 三菱、富士、川崎三大重工	1066
2011	787	噴射商業客機	波音、日本航空機協會 三菱、富士、川崎三大重工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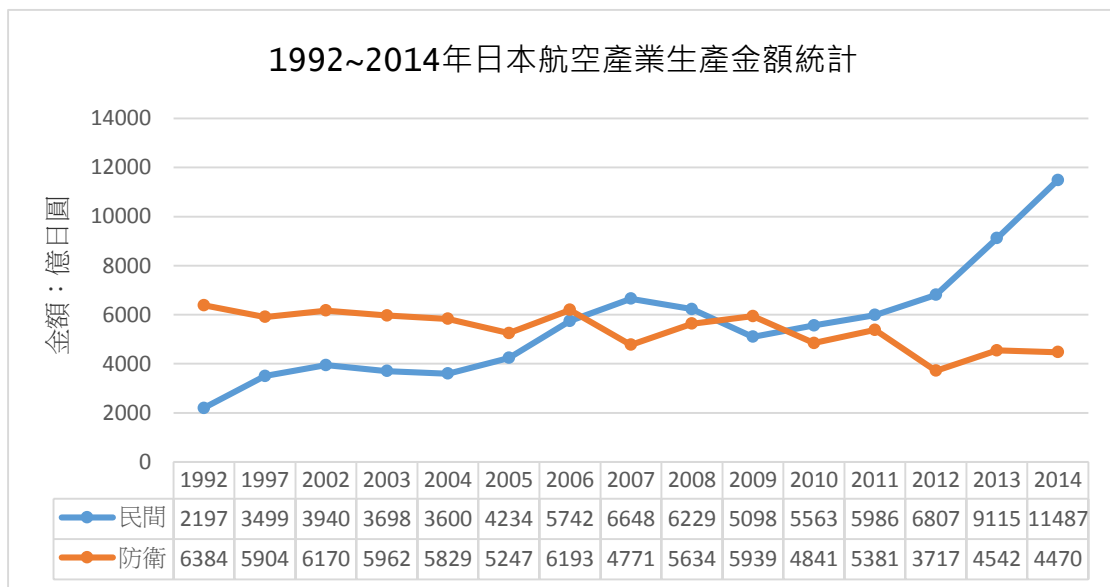
¹¹⁷ David Pritchard and Alan Macpherson, *Canada-United States Trade Center Occasional Paper No. 30. Boeing Diffusion of commercial Aircraf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o Japan: Surrendering the US Aircraft Industry for foreign Financial Suppor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5.

¹¹⁸ FAC, 2004. *Farnborough Aerospace Consortium: Japan Scoping Mission Report*, <<http://www.fac.org.uk/ReportJapan.htm>> .

資料來源: SJAC, Aerospace Industry_in Japan 2013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2012), pp.27.

資料說明：上述機型尚未停止生產，年度與數量統計至該年度為止。

冷戰前，防衛省的每年預算編列補貼廠商研發經費，來彌補日本民航機產業規模過小，避免廠商因虧損退出市場，進而影響產業技術升級的進程，降低其國際航空產業的競爭力。¹¹⁹1992年，民用航空產值為2197億，防衛航空產值6384億，後者是前者的三倍。日本航空廠商高度仰賴防衛廳的軍購訂單，無需往民用航空發展。冷戰後，於2007年起，軍需與民用明顯產生變化，日本民用航空的產值大幅超過防衛的產值，幅度約略接近3/1的產值。於2014年民間產值11487億、防衛產值4470億，前者高於後者約為2.5倍。¹²⁰



圖一、1992~2014年日本航空產業防衛與民間的生產額

資料來源：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日本の航空宇宙工業-平成19年》，《東京：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2007年》，頁184。

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平成26年度航空機生産額は前年比2,428億円増〉，《工業會活動》，第738号，（東京：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2014年），頁29-30。

肆、冷戰後自主發展的制約

¹¹⁹ Richard J. Samuals,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pp. 265~266.

¹²⁰ 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平成26年度航空機生産額は前年比2,428億円増〉，《工業會活動》，第738号，2015年6月，頁29-30。

一、美國成長控制策略

日本航空產業自主發展受限雙重制約的束縛，波音透過制度的誘因與先進關鍵技術的障礙，持續支配國際航空產業的地位，箝制日本航空產業自主性。美國出售軍用戰機型號與技術規格輸出於日本，基於假想敵的戰略實力與維持美日同盟的利益。¹²¹前石川島播磨重工航太部專家前間孝則認為後冷戰，外在軍事威脅解除，美國緊縮尖端軍事技術移轉輸出的姿態，以過去經驗日本 F-104J 國產化的比例約為 99%，到了 F-15J 約 75% 之後逐漸遞減。¹²²美國考量因素，於東亞地區地緣戰略的需求，美方國內航空產業利益和避免被日方及盟邦透過逆向工程所超越，因此，行銷及技術移轉權是操之在美國政府。商業客機操作策略，美國透過北約組織(NATO)及美日同盟的外交軍事架構，將盟邦的廠商透過國際專案合作的計畫納入其全球供應鏈。¹²³一方面，技術轉移所需的科技；另一方面，透過技術成長控制策略的抑制自主的發展。

Theodore H.Morgan and David C. Mowery 指出，即使美國開放國際專案計畫邀請各國廠商參與，為了維持全球領先的地位，採取策略：1.通過技術黑箱，限制外商進入尖端技術領域。2.推動產業技術變革來維持利益。3.經濟規模生產與先發優勢。4.控制整機設計與協作及整合技術能力。5.透過法律措施防止侵權。¹²⁴木村清志(Seishi Kimura) 也認為波音公司控制日本航空產業的成長，限制參與飛機原始的設計與系統整合的技術黑箱，以及避免將關鍵技術轉移給具有競爭力的次供應商，使其保持技術領先地位，避免對波音公司形成潛在的威脅。¹²⁵

二、從武器出口自我制約到解禁

冷戰時期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的經濟官僚自我限縮，及嚴格管控進入航空市場的零組件及設備商的家數，避免削價競爭。¹²⁶防衛產業利益，如三菱重

¹²¹ 週刊金曜日編，《國策防衛三菱重工の正体》(東京：株式會社金曜日，2008 年)，頁 18。

¹²² 前間孝則，《國旅 MRJ 客機飛翔》(東京：大和書房出版，2008 年)，頁 119。

¹²³ David C. Mowe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In Theodore H. Morgan and David C. Mowery, eds. *Aerospa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ress, 1994), pp. 179.

¹²⁴ David C. Mowe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In Theodore H. Morgan and David C. Mowery, pp. 182~184.

¹²⁵ Seishi Kimura, "Learning For Upgrading The Control Growth of the Japanese Aircraft Firms," 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Prince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March 9-11, 2006. <<http://www.princeton.edu/~ina/gkg/confs/hamilton.pdf>>.

¹²⁶ Richard J. Samuals,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pp. 265.

工、川崎重工等所占的營業額不到 10%，在電機與通訊機具上甚至低於 3%。

¹²⁷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瞬息萬變，波音與麥道等如火如荼進行企業組織併購與資源重組，對外進行航空機的聯合研發，降低開發成本與分散風險。¹²⁸然而，日本並沒有壓力進行像歐美國家防衛產業進行重組，導致航空機及軍需裝備用品的契約金額過度分散於各企業，隨著防衛相關事業收支狀況的惡化，中小企業不得不退出防衛與軍用航空產業市場，結果導致航空產業基礎陷入危機的窘境。¹²⁹日本防衛產業受到「武器出口三原則」的制約，無法參與國際共同開發航空飛機與武器生產，導致研發與生產成本過高。

村山裕三認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背景，維持與扶植國防生產的基礎與強化防衛技術，呼應促進日本經濟發展和強化航空產業能量蓄積。¹³⁰2011 年 12 月 27 日《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正式提出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2012 年 4 月 10 日，野田佳彥首相與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舉行會談內容涵蓋武器合作研發〈英日聯合聲明〉。¹³¹同年 6 月 3 日，雙方簽署〈日英國防合作聲明〉主要內容是武器及裝備聯合開發、生產防衛裝備，維持及提升日本防衛產業的生產及技術基礎，聯合開發的方針達成共識。¹³²2013 年 6 月 7 日，日本與法國發表聲明，主要項目包括建立外交與國防部長的「2+2 會議」、強化兩國武器與軍事設備合作、共同建築武器出口管理協議，促進太空領域合作。¹³³

三、維持「國產化」方針確立與強化「防衛生產技術基礎設施」的策略

¹²⁷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先進防衛裝備品の多国間共同開発の状況とこれがわ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2 年)，頁 148。

¹²⁸ Kenneth Flamm, “Redesigning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n Ann R. Markusen & Sean S. Costigan, eds.,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n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99), pp. 226~227.

¹²⁹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頁 1~54。

¹³⁰ 村山裕三，〈武器輸出三原則の見直し〉，2011 年 12 月 28 日，《Nippon.com》
<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016/>。

¹³¹ 外務省，〈日英兩國首相共同聲明〉，《外務省-會談，訪問》，2012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uk_1204/kyodo_seimei.html〉。

¹³² 防衛省，〈英国国防省及び日本国防衛省の間の防衛協力に関する覚書〉，2012 年 6 月 3 日，
〈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2/06/03_memo.pdf〉。

¹³³ 外務省，〈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のフランス共和国訪問の際の日仏共同プレスリリース〉，
2014 年 5 月 6 日，www.mofa.go.jp/files/000037579.pdf。

2014 年 4 月 1 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閣會議，確立「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大幅修改禁止武器出口的禁令，通過國際合作的條件：因應對中國於東海及南海的軍事佈署。基於國家安全考量，航空武器裝備進行海外技轉和共同開發，促進與美國及歐洲盟邦國家的防衛產業的合作。提升日本防衛產業的競爭力。¹³⁴因此，有別於過去的政策，「輸出貿易管理令」第 1 條第 1 項規定，於軍用飛機相關附件與零組件(軍用航空機若しくはその附屬品又はこれらの部分品)，允許部分防衛技術基礎設施，採取國際聯合開發和聯合生產，同時維持「國產化」方針與強化「防衛生產技術基礎設施」的策略。¹³⁵

設立防衛省裝備廳統整防衛裝備採購缺失

過去防衛省無專責單位採購與審查防衛軍購，及不穩定國防採購、研發費用估算困難問題與廠商浮報預算的醜聞不鮮。¹³⁶防衛省於 2014 年設立「裝備廳」目的有三，1.改善不平等採購契約及廠商規避商業風險的高估報價。2.統整陸海空自衛隊武器與裝備採購管理。3.因應聯合開發與聯合製造的防衛裝備國際化，孕育尖端技術研發投資，維持防衛科技基礎及平台協調機制。¹³⁷

契約制度的修正

2001 年，防衛省受限於研發預算制度的制約，採取單一預算做為 P-X 與 C-X 的專案計畫兩機開發使用，採取契約方式與川崎重工為主體自主開發。三菱重工、富士重工、新明和、日本飛行機等公司協力機體生產製造，共同參與所組成的開發體制。¹³⁸2010 年富士重工提出民事訴訟，向防衛省追討墊支剩餘費用 350 億。高橋衫雄表示「富士重工提出契約共識極具爭議性，也是日本國防工業長期存在的問題。礙於憲法與相關法規，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的武器採購清單只是期望不是承諾，實際採購也只能以年度進行，否則有違憲之嫌」。¹³⁹

2011 年，F-2 戰機契約生產結束。戰鬥機生產中斷將導致長期累積技術與能

¹³⁴ 內閣官房、外務省、防衛省、經產省同時発表，〈「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を策定しました〉2014 年 4 月 1 日，《經濟產業省》，<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4/20140401001/20140401001.pdf>。

¹³⁵ 沓脱和人，〈「武器輸出三原則等」の見直しと新たな「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立法と調査》，No. 361，2015 年 2 月，頁 55~67。

¹³⁶ 轉載，郭育仁，當面訪談，高橋衫雄，防衛省(東京)，2012 年 8 月 27 日。

¹³⁷ 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裝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日本：防衛省經理裝備局，2014 年)，頁 4~5。

¹³⁸ 前問孝則，〈飛翔への挑戦—国産航空機開発に賭ける技術者たち〉(東京：新潮社，2010 年)，頁 138~139。

¹³⁹ 轉載，郭育仁，當面訪談，高橋衫雄，防衛省(東京)，2012 年 8 月 27 日。

量消退及技術人員的流失，導致企業退出生產。後續引起產業運用能力的下降與研發間斷。造成自 1952 年以來，戰鬥機生產中斷出現空窗期的危機。¹⁴⁰2011 年，日本機械工業連合會與日本戰略研究論壇(日本戰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的聯合調查報告書，建議防衛省修正表 3 的契約制度，降低契約的爭議性與企業負擔過大的研發風險。¹⁴¹

日本防衛省為了修正此契約制度，特別進行修正《財政法》15 條第 3 項的規定，由現行每年編列預算及每年簽約採購 P-1 預警機和廠商簽約於第 4 年交機。改為「一次性」簽約於第 4 年起每年交機，見表 4。¹⁴²因此，日本海上自衛隊計劃，於 2015~2021 年(平成 27~33 年度)七年間，編列預算購買 20 架 P-1 反潛巡邏機，淘汰日本現今兼使用 P-3C 海上反潛巡邏機。¹⁴³防衛軍用機契約的修正後，防衛省可透過一次性簽約，廠商取得長期契約的「可預期性」。可以進行投資與人員調配的穩定性，藉由預購一定數量的零組件與材料，降低採購交易價格，同時避開造成政治的違憲之疑慮。

表 3 防衛軍用機契約的修正前

27 年度	28 年度	29 年度	30 年度	31 年度	32 年度	33 年度
簽約			→ 5 架交機			
	簽約			→ 5 架交機		
		簽約			→ 5 架交機	
			簽約			→ 5 架交機



表 4 防衛軍用機契約的修正後

27 年度	28 年度	29 年度	30 年度	31 年度	32 年度	33 年度
一次性簽約	→	→	→	→	→	→

¹⁴⁰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會，〈産業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我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會，2011 年)，頁 134。

¹⁴¹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會，日本戰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編著，〈先進防衛装備品の多国間共同開発の状況とこれがわ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會，2011 年)，頁 167。

¹⁴² 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日本：防衛省経理装備局，2014 年)，頁 11。

¹⁴³ 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頁 7。

			5 架交機	5 架交機	5 架交機	5 架交機
--	--	--	-------	-------	-------	-------

資料來源：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日本：防衛省経理装備局，2014 年），頁 11。

C-1 固定機翼反潛機作為 P-3C 的後繼機，於 2007 年 9 月試飛成功。由川崎重工於 2008 年生產兩架 XP-1 反潛機試驗機，在 2009 年生產兩架運輸機 XC-2 試驗機。¹⁴⁴2012 年第一架交機服役。第一架 P-1 運輸機於 2010 年試飛成功於 2014 年交機給自衛隊空軍服役使用。¹⁴⁵

國際共同開發的優劣比較

在戰機與軍工武器以參與國際共同開發，促進日本技術專家的交流、增加國際競爭力與技術向上的提升，投入研發費用確定性。改善現階段日本廠商負擔過大的研發費用，降低開發的風險與不確定性。¹⁴⁶從表 5 檢視，國際共同開發的優缺點的比較，將考驗日本官民協作的智慧及有待後續的觀察。

表 5 國際共同開發的優劣比較

優點	劣勢
1.在國際競爭意識與科技資訊交流，促進日本吸收先進觀點，促進技術向上提升。	1.各國之間研發資訊不對稱，增加溝通成本。
2.日本研發費用投入的明確性，降低廠商研發風險與不確定性。	2.各國依投入研發費用高低，分配承包的金額，同時涉及各國之間交叉授權技轉等複雜問題，導致交機時間不斷延宕。
3.制約研發機密資訊不當外流與增加廠商技術直接交流。	3.只要 1 個國家不加入量產，造成生產時程遞延外，導致各國生產成本費用節節升高。
	4.因投入國際共同開發經費，導致日本國內研發經費外流，侵蝕自主研發的機會。

資料來源：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産業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我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1 年），頁 163~164。

¹⁴⁴ SJAC, *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3*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 2012), pp. 27.

¹⁴⁵ SJAC, *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4*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 2013), pp. 5.

¹⁴⁶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産業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我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1 年），頁 163~164。

伍、自主的策略-從零組件製造邁向 MRJ 整機製造

美國 911 事件，頓時全球航空產業陷入低迷時期，2003 年 9 月，召開第一次「航空機宇宙產業分科審議委員會」，針對開發民間航空機開發推進各省廳協作會議（防衛省、文部科學省、國土交通省及經產省局長級協議第一次會議），透過開發 C-1 運輸機的技術開發經驗用於 MRJ 及追認預算案。¹⁴⁷經產省明確提出「當前航空機產業政策的方針」（当面の航空機産業政策の在り方について）。為了避免違反 WTO 自由貿易規定，各國政府對民航機研發補貼不得超過總經費的 1/3，以及促進參與企業的自主與產業合理化要求，官民各出資一半的方式，日本政府提撥 500 億日圓做為研發經費，降低企業財務負擔。¹⁴⁸

三菱飛機公司 MRJ 受限於整機開發經驗的不足，透過波音的技術協助，提供零件庫存、營運管理、飛機維護管理系統(Airplan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AHMS)，彌補三菱飛機這方面的不足。¹⁴⁹總結，前車之鑑 YS-11 的失敗案例，產業目標明確與三菱重工技術到位，日本政府過去僅限於廠商提供研發、製造生產的補貼措施。¹⁵⁰但是，缺乏全球行銷經驗及生產供應鏈，也無法對英語系國家提供售後服務體系。三菱飛機公司避免再重蹈覆轍，取得波音公司協助 MRJ 的國際市場行銷、技術研發和售後維修服務，建立一套完善的售後配套機制。¹⁵¹北美地區行銷也由 Boeing 負責，在東南亞地區整合國家總體軍事外交與技術移轉合作方式爭取訂單。北歐地區：Saab 公司負責。歐洲地區則設立三菱飛機歐洲分公司負責。

表 6 YS-11 與 MRJ 發展策略比較

	YS-11	MRJ
主導廠商	三菱重工	三菱重工

¹⁴⁷ 〈民間航空機基盤技術プログラム~我が国航空機関連産業の基盤技術力の強化〉，2003 年 9 月 2 日，《經濟産業省》，

<http://www.meti.go.jp/policy/kenkyu_kaihatu/program/h16fy/program-kihonkeikaku/koukuPG/koukuPG-gaiyo.pdf>。前間孝則，《國產旅客機 MRJ 飛翔》（東京：大和書房，2008 年），頁 107。

¹⁴⁸ 前間孝則，《國產旅客機 MRJ 飛翔》（東京：大和書房，2008 年），頁 122~123。

¹⁴⁹ 〈Boeing to support MRJ with Mitsubishi deal〉，2011 年 6 月 24 日，《Australian Aviation》，<<http://australianaviation.com.au/2011/06/boeing-to-support-mrj-with-mitsubishi-deal/>>。

¹⁵⁰ Richard J. Samuals,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4.

¹⁵¹ 〈Mitsubishi Aircraft Concludes Support Agreement with Boeing〉，2008 年 9 月 4 日，《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http://www.mrj-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080904.html>。

投資與主要製造廠商	三菱、富士、川崎、日本飛行機、新明和、昭和飛機	三菱、富士、川崎、新明和四大重工
生產公司	日本航空機製造公司	三菱飛機公司
飛機引擎型號	採用勞斯萊斯 542-10 型 部分改裝奇異(GE-T64 型)	採用普惠(PW-1000) 於西雅圖設立引擎設計與製造中心
研發製造成本	政府補貼研發製造生產成本	官民各出資一半，各 500 億日圓
市場目標	國內為主	全球市場
生產架數與試驗機	182 (2 架試驗機)	尚未正式生產，2015 年 5 月訂單超過 400 架左右。 5 架試驗機
行銷策略	三菱重工	官民協作；日本政府透過軍事外交與技術移轉方式，與東南亞等國如越南、印尼洽談合作模式。 三菱飛機公司於北美地區：由 Boeing 負責。 北歐地區：Saab 公司負責。 其他歐洲地區：設立三菱飛機歐洲分公司負責。
售後服務體制	三菱重工	委請 Boeing 建立全球售後服務體系與據點

資料來源：Richard J. Samuals ,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0~214；〈Mitsubishi Aircraft sets up 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 in Illinois to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MRJ program partners〉，2013 年 6 月 19 日，〈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
http://www.mrj-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130620.html。
 〈Boeing to support MRJ with Mitsubishi deal〉，2011 年 6 月 24 日，
 《Australian Aviation》，
<http://australianaviation.com.au/2011/06/boeing-to-support-mrj-with-mitsubishi-deal/>。

三菱飛機公司於美國設立 100% 的子公司，於 2013 年 6 月 17 日於芝加哥設置辦公室目的，強化 MRJ 的 17 個項目與供應商進行協作，進行品質保證測試

和檢驗。外商合作夥伴的品質管理導入日本，針對品質、成本、交機(Quality, Cost, Delivery, QCD)貼近 MRJ 供應商，有利於資訊即時更新與解決問題。¹⁵² 1990 年代，波音公司曾經生產嚴重落後及財務危機，尋求豐田汽車及時生產技術(Just-in time)與財務金援等協助。¹⁵³ 另一方面，MRJ 於整機開發與系統整合過程，由波音提供技術移轉協助。MRJ 透過豐田汽車入股，協助即時生產、強化供應鏈與製造品質庫存能力，以利推動生產線流程製造效率提升與成本降低，提升 20% 省油效率的優勢與全面品質管理改善的能力；另一方面豐田藉此跨入小型商業客機市場。¹⁵⁴

一、三位一體的航空與對各國出口策略

日本官民合作援外體系，雖然企業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但是過去從事經濟活動的部分商社與廠商累積海外活動經驗，持續善用亞洲地區推動日圓貸款、無償資金合作、技術轉移的合作的三位一體，已經創造出成功援助模式。¹⁵⁵ 透過 ODA 資金方式，利用國際合作銀行 (JBIC) 貸款至少為期 5 年 1% 的 10 億美元低利貸款，協助給川崎重工 C-2 運輸機與新明和 US-2 水陸兩用飛機 (amphibious plane) 的出口，協助防衛承包商取得國際訂單。¹⁵⁶

US-2 水陸兩用飛機的特點，於水上滑行約 30 秒即可起飛，可塔載 15 噸的水量，對於東南亞與地中海國家位處多島嶼與火山地形，當離島火災或船難發

¹⁵² 〈Mitsubishi Aircraft sets up 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 in Illinois to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MRJ program partners〉，2013 年 6 月 19 日，〈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
<http://www.mrj-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130620.html>.

¹⁵³ Steve McGuire & Toshiya Ozaki. "Path dependence as a political construt, the disruptiv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and Japanese aerospace," *Int. J.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50, Nos.3/4, 2010, pp.367-379.

¹⁵⁴ 前問孝則，〈國產旅客機 MRJ 飛翔〉，頁 172。；自動車開発の王道を築く - 長谷川龍雄氏，2012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jahfa.jp/jahfa4/pala/person2-1.htm>。；豐田汽車在戰後延攬戰時立川飛機公司「キ 94」型戰鬥機設計者，在戰後豐田汽車創辦人豐田喜一郎期望設計出「飛行汽車」，但受盟軍禁止發展航空機。轉而透過其飛機射機經驗用於開發全球受歡迎皇冠汽車 (Crown)、(Celica) 系列，其對世界汽車市場準確預測理論以及省油、安全、豪華、輕量性設計理念，對豐田汽車日後發展有深厚影響；戰前 1943 年豐田汽車關係企業愛知精密工業與川崎重工共同出資成立東海飛行機株式會社，生產陸上警械機及航空機零主件，詳見：
<<http://www.aisin.co.jp/profile/history/index.html>>.

¹⁵⁵ 楊永明編，〈新世紀日本體制的再轉型：政治、經濟與安全政策之演變〉，第三章，石原忠浩，〈轉變期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新世紀後的新趨勢之探討〉，(台北：翰蘆出版公司，2009 年)，頁 143~144。

¹⁵⁶ 〈Japanese government looking for financial support for export of military aircraft〉，2013 年 11 月 5 日，〈The Japan Daily〉，
<<http://japandailypress.com/japanese-government-looking-for-financial-support-for-export-of-military-aircraft-0539036/>>.

生具有機動性。¹⁵⁷三菱重工社長宮永俊一 (Shunichi Miyanaga)認為，日本企業具備競爭力的技術創新，透過對東南亞、印度等國對海外國際援助與日元貶值優勢，及有利於推動 MRJ 的飛機大量銷售給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合作夥伴及供應商共創雙贏。¹⁵⁸日本官民協作與三位一體的政策安排，行銷 MRJ 的策略未來的發展有待觀察。

對印度的策略

面對中國崛起，日印兩國的軍事合作，同時印度是日本第一個出口軍民兩用飛機的國家，在 2014 年 1 月，日本出售海上自衛隊所使用的 US2 型水上飛機給印度，用於執行救難任務。¹⁵⁹日本解除武器出口禁令，於防衛產業考量無非是進軍國際軍工市場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協助日本軍工企業打進世界尖端武器市場。

對菲律賓的策略

美國希望亞洲盟友反對中國的軍事擴張。日本和菲律賓藉由雙邊的軍事協議的強化，菲律賓希望日方出口反潛偵察機(P-3C anti-submarine reconnaissance aircraft)和雷達技術(radar technology)，協助監視中國在東海的海上各項活動，同時日本軍機也可以使用菲律賓基地及油料補給。¹⁶⁰

對越南的策略

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於 2010 年 11 月 24 日，指示越南航空公司 (Vietnam Airlines) 與三菱飛機公司就採購 MRJ 區域型飛機價格進行磋商。也對三菱重工提出，除了採購 MRJ 外，針對零組件技術移轉，以及於越南生產 MRJ 零組件。也對日本提供大量援助給予感謝之意，並加強對越南投資的力度。¹⁶¹

¹⁵⁷ 東洋經濟編輯部，〈新明和工業と川崎重工民間転用で活路開く〉，《東洋經濟週刊》，2010 年

1 月号，頁 38-40。

頁 38~40。

¹⁵⁸ Kunio Saijo，〈Innovation, not yen, key to expanding Japan exports〉，2014 年 10 月 31 日，*《Nikkei Asian Review》*，<<http://asia.nikkei.com/print/article/57297>>.

¹⁵⁹ 〈India Will Buy 15 Amphibious Aircraft From Japan: So What?〉，2014 年 1 月 29 日，*《The Diplomat》*，<<http://thediplomat.com/2014/01/india-will-buy-15-amphibious-aircraft-from-japan-so-what/>>.

¹⁶⁰ 〈Japan to discuss military exports to the Philippines, P-3C ASW aircraft could be up for sale〉，2015 年 6 月 4 日，*《The Economic Times》*，<<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japan-to-discuss-military-exports-to-the-philippines-p-3c-asw-aircraft-could-be-up-for-sale/articleshow/47538232.cms?from=mdr>>.

¹⁶¹ 〈越南將購 MRJ 飛機並希望日轉讓部件生產技術〉，2011 年 11 月 26 日，*《民航資源網》*，<<http://news.carnoc.com/list/175/175664.html>>。

對印尼的策略

2015 年 2 月 5 日，日本與印尼雙方簽署備忘錄，針對日方提供軍工製造設備與技術轉移給印尼 PT Dirgantara 航空公司。印尼現階段進行國防工業升級，希望透過雙方共同研發與共同生產進行軍工產業合作，提升印尼國有軍工企業的研發與技術能力。¹⁶² 同年 3 月 23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見了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雙方建立外交與國防(2+2) 定期會晤與強化戰略夥伴關係及經濟貿易投資。¹⁶³

透過政府採購的支持

從波音過去 50 年的發展成為美國與全球軍民兩用飛機的頭龍，受惠於美國政府的支持及解除航空政策的管制；建立中心輻射式的經營模式；及政府默許下通過併購取得國內民航機市場的獨佔性。¹⁶⁴ 三菱飛機公司仿效波音模式，積極推動地方政府和自衛隊採購 MRJ 外，取代現階段航空自衛隊 4 架灣流飛機 (Gulfstream IV) 及政府接待外賓使用的專機。日本政府未來通過國家採購 MRJ 為首相出訪外國的使用。¹⁶⁵

陸、結論

冷戰時期，日本航空產業發展受制於外在結構因素，及鑲嵌於美國的東亞地區國際政經情勢「美日同盟」架構。1990 年代，冷戰結束與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對中國關係改善，同時也改變美日的關係。¹⁶⁶ 美國保留軍隊於前線基地，日本提供基地各項財政及技術支援，進而懷疑美日同盟的必要性，船橋洋一指指出，雖然雙方保持安保與信賴關係，此一階段進入日美同盟的漂流時期。

¹⁶² Prashanth Parameswaran, 〈Japan, Indonesia To Sign Defense Partnership Tokyo and Jakarta are looking to boost their defense ties〉, 2015 年 2 月 5 日,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2/japan-indonesia-to-sign-defense-partnership/>>.

¹⁶³ 〈Japan's Abe, Indonesia's Widodo to tighten defense ties〉, 2015 年 3 月 23 日, 《The Straits Times》, <<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asia/east-asia/story/japans-abe-indonesias-widodo-tighten-defense-ties-20150323>>.

¹⁶⁴ 中山淳使, 國產航空機、50 年後にボーイングに勝つ, 2014 年 10 月 21 日, 《日本經濟新聞》,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78618680Q4A021C1000000/>>。

¹⁶⁵ 〈Mitsubishi pushes MRJ for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use〉, 2013 年 7 月 23 日, 《Flightglobal》, <<http://www.flightglobal.com/news/articles/mitsubishi-pushes-mrj-for-government-and-military-use-388575/>>.

¹⁶⁶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著, 何大明譯, 《長城與空城計》(台北: 麥田公司出版, 1998 年), 頁 116。

¹⁶⁷2003 年，胡錦濤「和平崛起」與北韓導彈試射。2004 年，美日修正《一六防衛大綱》及日本放寬武器出口。因此，美國隨著外在時空背景的變化莫測調整政經佈局，及成長技術控制策略制約日本航空自主發展。

內部架構，受制於日本第九條憲法防衛支出不得超過 GDP%1 的軍事預算制約，及自我限縮的「武器出口三原則」有限軍工市場規模，導致日本軍機開發昂貴。因關鍵技術的不足，軍機生產執照需支付昂貴權利金與關鍵技術研發受限，導致了雙重先天不良結構。2013 年，通過防衛武器出口解禁，日本初嘗 15 架 US-2 海陸軍民兩用飛機的出口印度的實績。未來出口防衛武器與軍機涉及到美國關鍵技術及設備的智產權，如何避免與受限於美國波音、洛馬等軍火公司的制約，以及英、法兩國武器共同研發與共同生產，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競合關係。¹⁶⁸

從產業技術發展歷程，延續戰前的 1940 年體制的政經與產業「官民協作」制度框架，建構並調整合適的軍民兩用的自身發展路徑。日本政府與產業界利用槓桿策略於有限國內軍機市場，及試圖自主發展整機模式，經歷重複 YS-11、MU-300 的自主失敗的原因，在與具有整機製造技術的能力，可惜缺乏全球與美國市場行銷、售後服務及供應鏈的經驗與產官政策相關配套措施的支援，以及美日當時貿易摩擦，各種因素所導致失敗的結果。¹⁶⁹從韓戰爆發，維修與保養美國軍機開始，進而接受授權製造及技轉後內化，承接 F-86 戰機及 T-3 教練機的訂單累積技術能量，從「做中學」與「用中學」破解關鍵技術的黑箱，跨越技術障礙的峽谷。¹⁷⁰利基於波音代工與供應商及包商，到合作夥伴關係，生產份額從 B737 的 13%、B757 的 18%、B777 的 21%、提升至 B787 的 35%。¹⁷¹最終，自主發展 C-X 運輸機與 P-X 反潛機，到 MRJ 區域型飛機。

全球民航機市場的需求不斷擴大下，現階段日本航空產業的發展策略，加入國際專案計畫與自主發展 MRJ 雙管齊下。為了避免過去自主整機發展的失敗重演，日本政府透過政經及外交政策鋪排，於東南亞國家的航空產業技轉合作與出口軍民用機的佈局，開拓海外市場。在產業必須克服障礙是規模經濟，克服從過去零組件與次包商角色轉變為自主整機發展，MRJ 面臨風險從製造端，

¹⁶⁷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下)》(東京：岩波書店出版，2006 年)，頁 14。

¹⁶⁸ Arther Herman, 〈 Japanese Defense Exporters Race to Catch Up 〉, 2014 年 8 月 21 日,《Hudson Institute》, <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0561-japanese-defense-exporters-race-to-catch-up>.

¹⁶⁹ 杉山勝彥,《日本のものくりは MRJ でよみがえる》(東京：SB クエオタイプ出版，2015 年)，頁 46~47。

¹⁷⁰ Nathan 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40.

¹⁷¹ Jeffrey A. Frankel and Miles Kahler, *Regionalism and Rivalry Japan and The U.S. in Pacific Asia*, eds., David B. Friedman and Richard J. Samuels, *How to Succeed without Really Flying: The Japanese Aircraft Industry and Japan's Technology Ide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309.

生產支付學習曲線及成本；行銷端，三菱 MRJ 做為新品牌後進廠商，截至 2015 年 5 月止訂單超過 400 架。¹⁷²

由於全球景氣的不明朗狀況，MRJ 的訂單與交機架數難以預測，零組件供應商與三菱飛機公司雙方無法確定零件生產契約成本價格，將影響未來零組件的品質。¹⁷³售後服務端，三菱飛機公司川井朝陽社長認為，MRJ 將面臨顧客售後服務、零組件補給、整機的維修保養大修(Maintenance、repair、overhaul)體系等環節的具備全球整合能力。產品差異化，最重要孕育新品牌識別度，需於短時間內整合具有規模經濟及顧客信任度。¹⁷⁴資金需求，MRJ 母公司為三菱重工集團分別有銀行、重工、電機、化學、材料等跨國公司，彼此間股權交叉持股資金需求容易調度，以及日本政府開發基金的財務融資支持不致匱乏。日本航空產業從跟隨轉變為自主整機發展，先進技術與國際政經環境依附於美國之下，國內需求有限及先天弱勢軍事結構不良，很難有大幅度的轉變。因此，切入波音與空巴的商業噴射客機作為次包商的角色發展目標與方向，成為全球第 2 階或第 3 階的供應商與合作夥伴關係，所獲取的實質穩定的代工訂單與分包利益。¹⁷⁵全球區域型商業客機市場長期由龐巴迪與巴西航空雙寡占。¹⁷⁶品牌知名度與市占率遙遙領先，後進中國、日本、俄羅斯的航空廠商。三菱 MRJ 能否成功，如過去汽車業與家電業攻城掠地橫掃美國及全球市場，則有待日後續觀察。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麥克·波特著，李明軒等譯，2004 年。《競爭論(上)》。台北：天下出版社。

楊永明編，2009。《新世紀日本體制的再轉型：政治、經濟與安全政策之演

變》，第三章，石原忠浩，〈轉變期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新世紀後的新趨勢之探討〉。台北：翰蘆出版公司。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著，何大明譯，1998。《長城與空城計》。台

¹⁷² 〈Mitsubishi MRJ jet marketing push takes off in U.S.〉，2015 年 5 月 20 日，《The Japan Times》，〈<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5/20/business/mitsubishi-mrj-jet-marketing-push-takes-u-s/#.VfDqlBGqqko>〉。

¹⁷³ 杉本要，〈翔べ、世界の航空機市場に挑む「日の丸」〉，頁 52~3。

¹⁷⁴ 麥克·波特著，李明軒等譯，《競爭論(上)》(台北：天下出版社，2004 年)，頁 7-9。

¹⁷⁵ Keith Cowling and Philip R. Tomlinson, "The Japanese Model in Retrospective: Industrial Strategies, Corporate Japan and The 'hollowing out' of Japanese industry," *Policy Studies*, Vol. 32, No. 6, 2012, pp. 569-583.

¹⁷⁶ Glennon J. Harrison, *Challenge to the Boeing-Airbus Duopoly in Civil Aircraft: Issues for Competitiveness* (U.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Press, 2011), pp.38.

北：麥田公司出版。

期刊論文

郭育仁，2013。〈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7 月，頁 1~54。

郭育仁，2014。〈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頁 43~64。

網際網路

2011/11。〈越南將購 MRJ 飛機並希望日轉讓部件生產技術〉，《民航資源網》，
<<http://news.carnoc.com/list/175/175664.html>>。

江迅，2013。〈中國高鐵外交抗衡日本在東南亞勢力〉，《亞洲週刊》，第 27 卷，
第 41 期，
<http://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81376362306&docissue=2013-41>。

英文部分

專書

Anchordoguy Marie, 2005. *Reprogramming Japan: The High tech Crisis under 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8-13

Dobbin Frank., 1994.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

Freeman Christopher., 1987.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ussex Press, pp35.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1996.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2~223.

Johnson, Chamler A.,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5~80.

Pyle, Kenneth B., 2007.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p. 241~243.

Rosenberg, Nathan., 1982. *Inside the Black B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40.

Takashi Inoguchi, 2003. *Japa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rans Pacific Press, pp. 47-48

專書論文

Flamm , Kenneth.,1999. “ Redesigning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n Ann R. Markusen & Sean S. Costigan, eds.,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n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pp. 226~227.

Frankel , Jeffrey A. and Kahler Miles., 1993. Regionalism and Rivalry Japan and The U.S .in *Pacific Asia*, eds., David B. Friedman and Richard J. Samuels, *How to Succeed without Really Flying: The Japanese Aircraft Industry and Japan's Technology Ideology*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309.

Kuo, Yujen., 2009. *Market Failure Mentality In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 Case Studies Of Robotics and Aircraft Industries* .Los Angeles: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pp. 33~34.

Martin, Stephen., 1996 . “ The Economic of Offsets Defence Procurement and Countertrade.” In Michael W. Chinworth and Ron Matthews, eds. *Defense Industrialisation Through Offsets: The Case of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p. 200.

Mowery, David C., 1994.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In Theodore H. Morgan and David C. Mowery, eds. *Aerospa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 Netherlands : Kluwer Academic Press, pp. 179.

Pritchard, David and Macpherson , Alan., 2005. *Canada-United States Trade Center Occasional Paper No. 30. Boeing Diffusion of commercial Aircraf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o Japan: Surrendering the US Aircraft Industry for foreign Financial Support*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3~5.

SJAC, 2012. *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3* . Tokyo :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

SJAC, 2013. *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4* .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

期刊論文

- Bush, George, 1993/1. “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 Vol. 4, pp. 13-15.
- Cowling, Keith and Tomlinson, Philip R., 2012/6. “ The Japanese Model in Retrospective: Industrial Strategies, Corporate Japan and The ‘hollowing out’ of Japanese industry,” *Policy Studies*, Vol. 32, No. 6, pp. 569-583.
- Krauss, Ellis S., “ Politcal Economy: Policymaking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Vol. 25, No. 1, May, 1992, pp. 44-57.
- McGuire, Steve & Ozaki , Toshiya., 2010 ” Path dependence as a political construt,the disruptiv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and Japanese aerospace,” *Int.J.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50,Nos.3/4, pp.367-379.

官方報告

- Harrison, Glennon J.,2011. *Challenge to the Boeing-Airbus Duopoly in Civil Aircraft: Issues for Competitiveness*. U.S.: CRS Report for Congres Press, pp.38.

網際網路

- FAC, 2004. *Farnborough Aerospace Consortium: Japan Scoping Mission Report*, <<http://www.fac.org.uk/ReportJapan.htm>>.
- Kimura , Seishi., 2006/3. “ Learning For Upgrading The Control Growth of the Japanese Aircraft Firms,”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Prince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http://www.princeton.edu/~ina/gkg/confs/hamilton.pdf>>.
- 2008/9. 〈 Mitsubishi Aircraft Concludes Support Agreement with Boeing 〉 , 《 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 》 , <http://www.mrj-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080904.html>.
- 2009/7. 〈 Remarks with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Korbsak Sabhavasus 〉 , 《 U.S. State of Department 》 ,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271.htm>> 。
- 2011/6. 〈 Boeing to support MRJ with Mitsubishi deal 〉 , 《 Australian Aviation 》 , <<http://australianaviation.com.au/2011/06/boeing-to-support-mrj-with-mitsubishi-deal/>>.

- 2013/6. 〈 Mitsubishi Aircraft sets up 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 in Illinois to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MRJ program partners 〉 , 《 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 》 , <http://www.mrj-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130620.html> .
- 2013/7. 〈 Mitsubishi pushes MRJ for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use 〉 , 《 Flightglobal 》 , <<http://www.flightglobal.com/news/articles/mitsubishi-pushes-mrj-for-government-and-military-use-388575/>> .
- 2013/7. 〈 Visit to Southeast Asia by Prime Minister Abe 〉 ,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 , <<http://www.mofa.go.jp/index.html>> .
- 2013/11. 〈 Japanese government looking for financial support for export of military aircraft 〉 , 《 The Japan Daily 》 , <<http://japandailynews.com/japanese-government-looking-for-financial-support-for-export-of-military-aircraft-0539036/>> .
- 2014/1. 〈 India Will Buy 15 Amphibious Aircraft From Japan: So What? 〉 , 《 The Diplomat 》 , <<http://thediplomat.com/2014/01/india-will-buy-15-amphibious-aircraft-from-japan-so-what/>> .
- 2014/10. 〈 Innovation, not yen, key to expanding Japan exports 〉 , 《 Nikkei Asian Review 》 , <<http://asia.nikkei.com/print/article/57297>> .
- 2015/2. 〈 Japan, Indonesia To Sign Defense Partnership Tokyo and Jakarta are looking to boost their defense ties 〉 , 《 The Diplomat 》 , <<http://thediplomat.com/2015/02/japan-indonesia-to-sign-defense-partnership/>> .
- 2015/2. 〈 U.S. establishes policy for exports of armed drones 〉 , 《 Reuters 》 , <<http://mobile.reuters.com/article/idUSKBN0LL21720150218>> .
- 2015/3. 〈 Japan's Abe, Indonesia's Widodo to tighten defense ties 〉 , 《 The Straits Times 》 , <<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asia/east-asia/story/japans-abe-indonesias-widodo--tighten-defense-ties-20150323>> .
- 2015/5. 〈 Mitsubishi MRJ jet marketing push takes off in U.S. 〉 , 《 The Japan Times 》 ,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5/20/business/mitsubishi-mrj-jet-marketing-push-takes-u-s/#.VfDqlBGqqko>> .
- 2015/6. 〈 Japan to discuss military exports to the Philippines, P-3C ASW aircraft could be up for sale 〉 , 《 The Economic Times 》 ,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japan-to-discuss-military-exports-to-the-philippines-p-3c-asw-aircraft-could-be-up-for>> .

日文部分

專書

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2007。《日本の航空宇宙工業-平成 19 年》。東京：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1。〈産業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我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 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2。《先進防衛装備品の多国間共同開発の状況とこれがわ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

杉山勝彦，2015 年。《日本のものくりは MRJ でよみがえる》。東京：SB クエオ

タイプ出版。

杉本要，2015。《翔べ、世界の航空機市場に挑む「日の丸ツェント」》。東京：日刊工業新聞社。

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2003。《日本航空工業五十年：第 1 部日本の航空機工業》。東京：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

佐々木卓也、中西寛，2008。〈第 7 章 パクス・アメリカーナの中の戦後日本 1950

年代〉，五百旗頭真編，《日米関係史》。東京：有斐閣。

前間孝則，2008。《國旅 MRJ 客機飛翔》。東京：大和書房出版。

前間孝則，2010。《飛翔への挑戦—国産航空機開発に賭ける技術者たち》。東京：

新潮社。

船橋洋一，2006 年。《同盟漂流(下)》。東京：岩波書店出版。

週刊金曜日編，2008。《國策防衛三菱重工の正体》。東京：株式會社金曜日。

堀地徹，2014。《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日本：防衛省経理装備局。

期刊論文

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2014。〈平成 26 年度航空機生産額は前年比 2,428 億円増〉，

《工業会活動》，第 738 号，東京：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頁 29-30。

東洋経済編集部，2010。〈新明和工業と川崎重工民間転用で活路開く〉，《東洋経済週刊》，1 月号，頁 38~40。

沓脱和人，2015。〈「武器輸出三原則等」の見直しと新たな「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立法と調査》，No. 361，2 月，頁 55~67。

網際網路

経済産業省，2003/9。〈民間航空機基盤技術プログラム~我が国航空機関連産業の基盤技術力の強化〉，《経済産業省》，

<http://www.meti.go.jp/policy/kenkyu_kaihatu/program/h16fy/program-kihonkeikaku/koukuPG/kouk>。

村山裕三，2011/12。〈武器輸出三原則の見直し〉，《Nippon com》

<<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016/>>。

外務省，2012/4。〈日英兩國首相共同聲明〉，《外務省-會談，訪問》，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uk_1204/kyodo_seimei.html>。

防衛省，2012/6。〈英国国防省及び日本国防衛省の間の防衛協力に関する覚書〉，<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2//06/03_memo.pdf>。

内閣官房、外務省、防衛省、経産省同時発表，2014/4。〈「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

を策定しました〉，《経済産業省》，

<<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4/20140401001/20140401001.pdf>>。

外務省，2014/5。〈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のフランス共和国訪問の際の日仏共同プレスリリース〉，<<http://www.mofa.go.jp/files/000037579.pdf>>。

中山淳使，2014/10。〈国産航空機、50 年後にボーイングに勝つ〉，《日本経済新

聞》，<<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78618680Q4A021C1000000/>>。

東亞區域整合的新現實主義迴歸？

——以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為案例

侯立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所博士班)

摘要

儘管東亞各國經貿關係日益緊密，但彼此之間的制度化、地區化合作仍然非常有限，其整合進程呈複合型局面——多種機制的競合狀態，因此通過區域層次來分析東亞經濟整合相當困難。本文將研究層次投射至國家，考察國家因應區域整合的政策，這樣才能更進一步瞭解東亞區域整合的過程。

本文採用新的理論視角——新現實主義，通過分析體系與單元層次的相關變量，深刻解讀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本文透過國家個案，來說明政治精英在推動區域經貿合作政策過程中，不僅受到國際體系的制約，也受到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關鍵字：日本、東亞、區域整合、新現實主義

壹、前言

在東亞談及「區域主義」或「區域整合」等相關詞彙始終是個尷尬的問題。一方面，東亞區域（中國大陸、日本、南韓以及東協十國）的 GDP 之和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 23.6%；但一方面，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东亚区域内的经济整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明显滞后。虽然该地区并不缺乏经济合作机制，但大都比较虚弱，缺乏权威性和领导力。

東亞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加快區域經濟合作的呼聲，但為何地區經濟整合始終難以走上深入發展的快車道？在經濟合作日趨緊密的東亞地區，國家參與區域整合的策略又是取于何種考量，是完全受限於東亞區域整合的現況，還是單純只是「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也正是由於東亞區域發展的複雜性，區域研究的學者們才會有更多的探討空間，從不同的理論角度、議題分析東亞區域整合的相關探索。首先有必要將其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和梳理，已明確現階段研究的成果和未來可探討的空間。

第一，現行的東亞區域整合研究大多從區域層次為主，學者透過安全、政

治、經濟與認同等途徑來解析東亞區域整合的動態。而且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新自由制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來分析東亞區域整合，往往都會走入諸如「困境」研究的批判性方向。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區域建制，可這樣的分析角度顯然無法解釋東亞區域整合的狀況，追求開放和彈性的東亞「特色」區域主義與強調規範的制度主義顯得格格不入，因此，新自由學派往往會「集中火力」批判東亞區域整合的制度缺失。例如，Miles Kahler 用區域整合法制化的角度來研究東亞區域主義；Amy Searight 則是從區域建制架構角度指出東亞區域主義「制度剩餘」(noodle bowl) 的特點。現實主義途徑倒是和歐盟整合所強調的「新功能主義」相聯繫，將視角投射到從上而下的政治命題，但是現實主義者在東亞問題上多持有負面觀點，大陸學者李開勝認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李開勝提出「碎片化」的概念，他認為東亞地區，「缺乏地區層次的整體合作，地區的政治經濟版圖由各種次地區的合作區塊所組成，它們彼此間充滿了交叉、競爭的關係」。¹⁷⁷他在另一篇期刊論文中更是直接指出東亞地區仍然走不出「現實主義的邏輯」，新功能主義所津津樂道的「外溢」效應並沒有發揮較大的作用。¹⁷⁸儘管這些區域層次上的研究都非常具有啟發性，也都從各自理論角度指出東亞區域發展的問題本質，然而如前文所述，東亞整合強調開放性和國家自主性，這也使得東亞整合進程不可能太快，區域建制規範化還有待時日，區域層次研究勢必在現實考量上有所缺失，「需要更加精細的國家層面來尋求東亞整合的解決方案」。¹⁷⁹

當然，也有不少東亞區域整合的相關研究聚焦於國家政策實施層次，特別強調政治方面的因素，這也符合東亞區域主義中「政治考量多於經濟考量」的特徵。Amy Searight 就花費五頁的筆墨闡述東亞各國在追求區域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戰略動機 (strategic motivation)。王江雨也在政策考量層面考察中國大陸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動因。¹⁸⁰不過這樣的研究通常較偏重參與整

¹⁷⁷ 李開勝，〈論脆片狀態下的東北亞競合困境〉，《太平洋學報》，第 22 卷第 9 期，2014 年 9 月，頁 58-65。

¹⁷⁸ 李開勝，〈東北亞現實主義邏輯及其突破〉，《國際關係研究》，2014 年 3 月，頁 26-29。

¹⁷⁹ 王文岳，〈東亞區域主義再建構：韓國參與東亞區域整合之進程與效應〉，《亞太研究論壇》，2013 年 12 月，第 59 期，頁 53。

¹⁸⁰ Wang Jiang Yu, "The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of China-ASEAN FTA: The Impact o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Ho Khai Leong and Samuel C. Y. Ku, ed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p.42-49.

合國家的內部狀況，較關注於貿易政策的具體細節，例如 Walter F. Hatch 的專著，儘管將日本內部產業結構的變革與東亞區域產業分工相連接，不過更多的是從日本內部狀況角度闡釋，並沒有將日本區域政策放置於體系層次的框架下。作為一名政治學專業的學生，研究國家參與區域合作的產業政策固然是好，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確造成這種政策抉擇（因變量）的體系層次因素（自變量）和單元層次因素（干預變量）。

最后，現在亦有學者開始突破東亞整合的區域與國家的單一層次研究，將二者將關聯，探究東亞區域主義的現實情勢。這一類學者觀察到東亞整合中多邊主義、區域主義和雙邊主義相融合的多軌區域軌道，而這一點也是理解國家參與區域整合策略的關鍵要點。劉德海教授在其論文中從東亞區域整合變化角度出發，分析探究南韓參與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劉泰廷、洪銘德的研究也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他們從新古典現實主義出發，區分不同議題板塊，按照「國際情勢」-「國內情勢」-「政策回應」的脈絡分別闡釋后冷戰日本時期參與東北亞合作進程。不過，要指出的是，盡管他們已經開始跳脫區域/國家單一層次的框架，仍然缺乏更深入的結構性分析，這在劉泰廷、洪銘德的論文中體現得相當明顯，所謂的「國內情勢」不過是日本國內學界對於「國際情勢」的反應，似乎只停留在國內意識形態層面，缺乏系統的結構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迴歸現實主義的要義，體系層次的結構特徵才是決定國家參與國際活動的根本出發點，並且「情勢」這樣的表述也不夠符合政治科學表達方式。

綜上所述，區域研究有必要在區域層次分析以外，佐以國家層次分析，才能更為完整的解釋現行東亞區域整合的限制和突破。¹⁸¹換言之，談論區域整合也絕不是自由主義的範疇，國家參與區域整合也必須受限於東亞區域發展的結構性特徵，再納入區域國家的內部作為，以求更為全面、細致的探討。

是故，筆者認為，東亞區域研究可以採用新現實主義理論視角，區分清楚國家參與區域整合政策與國際體系層次及國家層次的關係是一種因變數與引數及干預變數的關係。本文採用該理論的分析路徑，以日本為案例，探究區域大國在東亞區域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明確新現實主義的基本觀點在本選題中體現為：

¹⁸¹ 王文岳，〈東亞區域主義再建構：韓國參與東亞區域整合之進程與效應〉，《亞太研究論壇》，2013年12月，第59期，頁55。

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的決定性因素來自體系層次，但是體系層次要通過國內層次起作用。

貳、體系層次

一、進入后雁型模式時代的東亞經濟

（一）雁型模式下的東亞經濟發展

談及東亞經濟的發展不能不提到雁型結構，甚至對日本政府與許多學者來說，所謂「東亞奇蹟」不過是日本成功經驗的擴大版而已。日本官僚結合赤松要（Akamatsu Kaname）和 Raymond Vernon 理論學說將這樣的「日本經驗」宣揚成為一個以比較利益為原則，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日本由於它的資本與技術優勢而成為產業部門創新的源頭。藉由日本的FDI，創新的生產技術與產品在進入成長期與成熟期，被依次傳遞到第二梯次（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與第三梯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的雁子們。東亞各國因此踵步日本，由勞力密集產業逐漸往資本密集、甚至於技術密集產業移動，造成整個區域發展在日本領導下的集體上升。按照這樣的邏輯，日本對外投資模式所引導的發展與歐美跨國企業的投資方式有本質上的不同。Kojima 就論證到，歐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是在控制投資國的國內市場，並從而獲取其獨佔利益，歐美投資國因此是以傷害地主國的國家利益來擴大自身之出口。「（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將會幫助地主國實現它的潛在利益，並因此地主國的這些新產業得以發展成出口產業。同時，由於產業的轉移至國外，日本就能將資本與勞動力用於發展具有新的比較利益的產業，因此國內的結構調整就可以展開。」¹⁸²

這種「和諧而互惠」的說詞其實掩蓋了日本在區域分工體系下所佔據的支配性地位。在日本主導下的區域生產體系是一個主要利潤與領導權保持在日本母公司中的垂直整合系統。Bernard 和 Ravenhill 表示，這種緊密的垂直整合所造成的技術差距，使得某一產業部門的跨國移植不會如同產品週期理論所預測的那般，在一定的時間中由先進國完整地往後進國移動。更重要的是，技術差

¹⁸² Kiyoshi Kojima, "Japanese-Styl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14, Spring, 1986, p.68.

距還會因為技術創新集中於日本，而使得後進國家越追趕越落後。¹⁸³這樣支配性的垂直整合生產系統並不是依照著所謂市場上自我調節的比較利益所形成，而是日本政府與資本家有意識的一項海外擴張計畫。它將國內垂直整合的系列會社（keiretsu）組織往海外延伸，並透過種種方式將海外生產體系保持在低階的生產工序上。例如，為了防止技術擴散，日本母公司通常會選擇自海外子公司進口所需零件，而非當地生產者。在 1993 年，日本豐田汽車泰國廠總共從當地供應商採購 66% 的商用汽車零件，其中的 75% 來自日本的子公司。¹⁸⁴

另外，母公司會將訂單分散到不同廠家，從而降低廠家可能因為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技術升級。母公司也會將生產工序在整個區域中作更進一步的切割，以防止當地生產者瞭解整個生產過程及其關鍵技術。這些措施配合高額權利金、技術使用的限制範圍、以及將研發單位設置於日本本土內等等，造成系列會社保持著對區域分工體系的最大控制權，維持日本與其他東亞雁子們在技術與利潤上的差異。¹⁸⁵

然而，日本的區域支配地位並不是自我充足的（self-sufficient）。即使只就經濟因素來考量，美國還是發揮著比日本更具關鍵性。整個雁行發展是以出口工業化來取得發展所需之資金與技術，美國除了提供東亞其他雁子們另一個關鍵性的資金與技術來源之外，吸收東亞出口的美國市場事實上才是雁行發展的最終拉力。

（二）後雁型模式時代

不過，這種曾帶動東亞經濟起飛的雁型模式，自上世紀 80 年代似乎一刻開始出現結構性的鬆動與變化，它所固有的內在缺陷在 90 年代中期顯現更加明顯。這主要表現在：（1）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技術轉讓方面持謹慎保守的態度，向東亞進行標準化或已過時的產業結構投資，使東亞國家經過近 20 年的引進日資過程，不僅沒有吸收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反而導致了東亞各國產業結構的偏頗，出口產品結構的單一，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類同化，

¹⁸³ Mitche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47, No.2, January 1995, p.171-209.

¹⁸⁴ Walter F.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0.

¹⁸⁵ Walter F.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6-109, p.160-167.

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¹⁸⁶

(2) 隨著東亞各國對海外資本管制的進一步松綁，歐美和日本在東亞區域上的經濟競爭也日益加劇，面對來勢洶洶的歐美企業，日本顯然有些力不從心。¹⁸⁷但就 1999 年這一年，美國企業的投資金額就佔到亞洲資金的 23%，高達 58 億美元。¹⁸⁸在區域內居於中層的國家不僅彼此競爭激烈，甚至開始威脅日本企業，中國大陸、台灣以及南韓都逐步將製造基地移至東南亞，並且在新興科技上大量投資，例如三星和 LG 公司已佔據全球顯示板產業的半壁江山。誠如 Hatch 所言，「亞洲已不再是日本人的遊戲」。¹⁸⁹(3) 戰後十年來，東亞各國經濟與日本的資金、技術以及美國的資金、市場之間形成了鏈式的垂直分工，這是一個「帶有較多互補性質的國際經濟分工體系」。¹⁹⁰由於 90 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日本、亞洲四小龍、東協國家以及中國大陸所組成的東亞經濟發展鏈圈發生動態演變，例如，而這種演變關係正在把東亞各國的經濟更緊密地交織到經濟分工體系之中，因而使得該區域完成從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轉變。¹⁹¹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著年均 10% 左右的增長，是世界主要國家中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影響日趨突顯，特別是在 2008 年以後，中國大陸更是引領全球經濟走向復蘇。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崛起促使東亞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市場愈加依賴。2009 年度，日本對中國大陸出口大幅超過對美出口，中國大陸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¹⁸⁶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5-206.

¹⁸⁷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7.

¹⁸⁸ Natasha Hamilton-Hart,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Asia: National, Regional, or Global?" in Ellis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9.

¹⁸⁹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7.

¹⁹⁰ 董振源，蔡增家，〈從雁行發展到經濟分工：從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國際關係學報》，2007 年 7 月，第 24 期，頁 90。

¹⁹¹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14.

¹⁹²2010 年，中國大陸和東協之間的貿易額達到 2928 億美元，中國大陸也成為東協第一大交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¹⁹³毫無疑問，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會普遍地改變東亞和世界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從而對東亞乃至全球產生深刻影響。

中國大陸已經取代日本領頭雁的角色，成為東亞區域經濟增長的「龍頭」和其相鄰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些經濟體向中國大陸出口工業品（部件和配件）和初級產品，充分利用了中國大陸的內部市場，使其成為自身增長的來源。成為自身增長的來源。這是因為中國是許多區域供應鏈（區域生產網路）的集散地。中國大陸的崛起推動了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並從根本上改變了區域貿易模式和資金流向。作為一個資本盈餘的經濟體，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沒有「區域主義」的東亞

與歐洲和北美相比，東亞區域內的經濟整合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明顯滯後。雖然該地區並不缺乏經濟合作機制，但大都比較虛弱，缺乏權威性和領導力。這一方面導致由私人行為體推動的區域經濟整合缺乏強有力的區域治理，從而帶來各種風險；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政府層面的推動，經濟整合的水準難以得到質的提高。

東亞經濟合作呈現的是多重平行制度設定的複合狀態，因此，東亞的區域合作方針，自始即呈現全球與區域多軌並存的政治設定複雜的區域接軌取向。是故，東北亞經濟合作顯現以下幾個特徵：

首先，政治考慮大於經濟考慮。國內外有分析表明，在東亞各種自由貿易方案（東協方案、中國大陸方案、目標方案）中，中國大陸方案是韓、日受惠最大的方案，而韓、日等國家寧可選擇次優的一小步——東協方案，而不願意選擇最優的一大步——中國方案，很重要的一點是出於政治的考慮，而非出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慮，這樣既可顧及本國農民利益集團的壓力，又可避免形成以中

¹⁹² 嚴聖禾，〈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國〉，《光明網》，2010 年 4 月 25 日，<http://www.gmw.cn/01gmrb/2010-04/25/content_1102254.html>。

¹⁹³ 周利朔，〈中國成為東盟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出口目的地〉，《中國新聞網》，2011 年 4 月 8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08/2961087.shtml>>。

中國大陸為主導的東亞經濟合作體制；既可享受中國中心市場的好處，又可不承認中國市場的中心地位。但這種局勢現在發生更為微妙的變化，美國雖然早已宣佈「亞太再平衡戰略」，所提倡的 TPP 也有逼迫亞太各國「選邊站隊」之嫌，但隨著 2012 年底習近平的上臺，以及中國大陸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以及中國大陸經濟與周邊國家經濟的不斷融合，中國大陸經濟的中心地位特別是市場的中心地位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替代的，在區域合作進程中中國大陸的角色越來越舉足輕重。

其次，缺少北美區域合作裡美國霸權國的推動，或是歐洲整合經驗中法、德等大國的領導，東亞經濟區域合作的領着者始終處於爭議和爭奪狀態。儘管作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在推動北亞合作進程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 1990 年代以來長期陷於嚴重的泡沫經濟崩盤，另外與中國大陸、南韓均存在歷史、領土糾紛；南韓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雖然雄心勃勃，但由於過分依賴美國，在先天上缺乏組織和引導東亞區域合作機制化的條件；相比而言，中國大陸作為東亞區域內的大國，已經成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國家，但由於經濟實力和以及來自日本和東協的制衡，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大陸在東北亞經濟合作中發揮領導者的作用。¹⁹⁴為了防止自身被邊緣化，同時也是為了要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獲得更多利益，東協進一步在東亞現有大國間特別是中日之間尋求平衡，而且還積極歡迎區外大國參與東亞經濟合作進程。

再次，東亞區域合作在制度上具有明顯的「重疊性」(noodle bowl)。¹⁹⁵由於區域內主要經濟行為體，在區域機制的選擇上，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戰略訴求（見表 1），因此極力通過各種方式推動自己偏好的區域機制在制度競爭中勝出。這導致東亞地區的經濟地區主義不是像歐洲那樣，在一個單一制度框架下，以一種遞進的方式，從低水準向高水準發展，而是多種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並存，而任何一種制度框架和合作進程都得不到品質上的提升。這種制度過剩，是東亞經濟地區主義遭遇挫折而非走向成功的標誌。

¹⁹⁴ 李巍，〈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的終結？——制度過盛與經濟整合的困境〉，《當代亞太》，2011 年 4 月，頁 21-22。

¹⁹⁵ Amy Searight, "Emerging Economic Architecture in Asia: Opening or Insulating the Region?," in Michael J. Green and Bates Gill, eds., *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7.

表 1 主要行為體對東亞經濟合作機制的偏好

國家或地區	偏好的機制
美國	APEC；TPP；東亞峰會
中國大陸	「10+1」；「10+3」；中日韓峰會
日本	東亞峰會；中日韓領導人峰會
東協	東協；東亞峰會

最後，軟約束大於硬約束——進程比制度更重要。一般認為，歐洲一體化是區域化合作中最具組織化、制度化的代表。但在東亞地區，已覆蓋整個東亞地區合作的東協模式所強調的卻是「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組織性」。對於制度主義者而言，「10+3」機制不過是一個鬆散的合作框架，而非建立在法理之上的正式制度安排。東亞這種既充滿活力又不以硬性規定約束參與者的做法，可稱之為軟地區主義。因此，東北亞區域合作更像是一種價值理念，而不是一種制度安排，表現為「強理念、弱制度」。實際上這也與東亞地區合作的脆弱性有關。

一、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2008 年以美國為發源地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陷入衰退困境。311 大地震以及近年來的歐洲債務危機，都阻礙了日本經濟的恢復 2010 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11 年日本的貿易收支 31 年來首次出現赤字。

其實，自從 1990 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就一直處於低增長狀態。最大的問題是，少子高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根據《高齡化社會白皮書》，2012 年日本的高齡化比例上升到 24.1%，2060 年將達到 39.9%。不僅如此，日本總人口數也不斷減少，到 2048 年將首次低於 1 億人。¹⁹⁶這樣勢必會帶來民間消費萎縮和內需不足的問題。而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已達到 GDP 的 2 倍以上，很難通過財政支出去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日本國家戰略擔當大臣玄葉光一郎指出，¹⁹⁷因為日本位於東亞的東端，所

¹⁹⁶ 內閣府，〈日本再興戰略〉，2013 年 6 月 14 日，頁 19，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saikou_jpn.pdf>。

¹⁹⁷ 玄葉光一郎，〈TPP を奇貨に FTA 交渉を加速化する〉，《Voice》，2011 年 1 月，頁 96-97。

以具備地緣優勢。因此，應該把亞洲貿易圈約 35 億人，亞太貿易圈約 40 億人所產生的需要變成本國的內需。但是，日本的 FTA 進程比較落後，FTA 在貿易中所占比例也低於南韓等其他國家。如果繼續「鎖國」的話，日本企業只能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加上日元匯率居高不下，產業空洞化會越來越嚴重。¹⁹⁸因此，為了保持日本企業的競爭力，乃至國家經濟活力的恢復，必須加快與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高水準 FTA 並且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如果能夠實現 TPP。日本-歐盟、日中 FTA，也就是日本與美國、歐盟、中國大陸等巨大經濟圈實現 100% 的高水準的自由化，可以使日本的經濟增長率提高 1.23%-1.39%，GDP 增加 6.1 萬億-6.9 萬億日元。¹⁹⁹而日本與中國大陸的 FTA 的推進困難較大，所以日本想通過中日韓 FTA 以及 RCEP 來間接與中國大陸推進 FTA。

二、調整產業結構，建立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

日本必須徹底消除其在工業近代化百年歷程中形成的一國之內擁所有產業和功能的「全套型產業結構」，從而建立日本產業與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的新的相互依存關係。換句話說，日本產業必須從封閉型的、自我完善型的產業結構，迅速向開放型的、相互依存型的產業結構轉變。²⁰⁰

從日本國內情況看，日本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基礎性技術」群體正面臨危機。鑄造、鍛造、電鍍、機械製造等產業，已很難在國內完全維持下去，對東亞的依賴程度已加深。儘管在日本的製造產業中，有關企業還會不斷努力進行技術革新以改善勞動環境，然而，在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要在國內保持必要的供應能力是困難的。因而，面對新形勢的日本產業，必須對前所未有的課題作出反應，即調整國內的技術基礎，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相互依存關係，這是日本產業當前所面臨的最大課題。

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其參與國際分工特別是與東亞各國之間的國際分工的目標與形式。正是基於日本企業在東亞地區所構建的以日本處於「微笑曲線」上端的產業鏈，才使日本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了比較利益的最大

¹⁹⁸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14.

¹⁹⁹ 內閣府，〈日本再興戰略〉，2013 年 6 月 14 日，頁 24，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saikou_jpn.pdf>。

²⁰⁰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35.

化，所以，日本政府有必要幫助企業降低構建產業鏈的成本，強化日本企業所構建的海外生產體系，特別是在國際市場競爭越發激烈的當今，通過自由貿易協定改善日本企業在投資國的商業環境就成為日本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也是日本政府以東亞為中心簽訂 FTA 的原因。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締約國也是競爭力遠遠低於日本的，而且是日本進行 FDI 最活躍的國家。因此，日本在 FTA 談判時最關心的問題是：對已經進入對象國市場的本國企業的耗材。零部件進口關稅的徹底廢除；投資、智慧財產權及反競爭行為相關法律的強化；租賃、保修、修理等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貿易和投資方面的法律限制的放寬；整頓對象國貿易環境以說明本國企業在該地區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如在投資領域，日本要求貫徹實施與投資對象國的企業無區別對待的「國民待遇原則」、第三國企業無區別對待的「最惠國待遇原則」以及除了不予開放的領域外，其他所有領域全部對外開放的「確定主義原則」(Positive List) 投資領域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投資者履行義務、保障外匯匯出自由、通過國際仲裁機構解決投資糾紛等保護投資的有關法規的制定。²⁰¹

三、修復和加強日美同盟關係，牽制中國

2009 年 9 月，鳩山由紀夫上臺，鳩山政權將外交目標設定為「緊密而平等的日美同盟關係」、「自主性的外交戰略」、「構築與亞洲國家的信賴關係」。鳩山由紀夫提出的「東亞共同體」等重視亞洲的外交政策立刻引起了美國對日本的不滿。特別是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使美日矛盾進一步升級，「該問題也被認為是鳩山內閣倒臺的主要誘因之一東亞共同體」。²⁰²加上面對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地位日益提高，釣魚臺撞船事件使中日關係緊張，朝鮮半島的局勢不穩定等現實情況，對於之後的菅直人政權、野田政權以及安倍政權而言，修復和加強日美同盟關係，並牽制中國大陸成為當務之急。而以重返亞太為目標的美國的 TPP 戰略為日本修復和加強日美同盟關係。牽制在亞太地區不斷擴大影響力的中國提供了機遇。日本的《每日新聞》指出，日本政府有關人士在私下裡表示，雖然表面上不能說，但是 TPP 本身就是對華牽制戰略的一環。因此日本不顧國內反對力量，堅持加入 TPP 談判，把 FTA 重心從東亞擴大到了亞

²⁰¹ 任明，〈日本 FTA 政策的動向、特徵及展望〉，第 155 期，《現代日本經濟》，2007 年 9 月，頁 12。

²⁰² 張勇，〈日美關係中的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日本學刊》，2012 年 5 月，頁 27。

太地區。由於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以及美國實力在全球經濟危機中遭受重創，美國加入 TPP 被分析除了在經濟上有利於掌控亞太多邊合作主導權外，更是把 TPP 視為其重返亞太地緣政治舞臺中心的必要武器。日本顯然意識到了美國在 TPP 問題上的政治考量，因此有日本輿論認為政府追隨美國步伐加入 TPP 談判的進程是為了與美國聯手防範與制衡中國大陸，形成針對中國大陸的「包圍圈」。²⁰³

另外，雖然美國是日本的第二大交易夥伴國，但是因為日本的農產品、服務業市場不開放，日美 FTA 談判一直難以啟動 而包括日本在內的 TPP 成員國中，日本和美國的 GDP 總量就占了將近 80%。²⁰⁴因此日本參加 TPP，實際上就是啟動了日美 FTA 談判，這不僅能鞏固日美同盟的經濟基礎，也能與美國共同主導亞太自由貿易協定。

肆、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

隨著東亞作為世界的發展中心、生產基地、消費市場與投資市場的形成，日本為了分享東亞發展的利益，在 2006 年經濟產業省制定的「全球化經濟戰略」中提出了「東亞 EPA」構想與「東亞版 OECD」構想，把東亞地區作為日本推進 FTA 戰略的重點地區。²⁰⁵雖然，在該戰略的推動下大大地加快了日本與東亞各國建立 EPA 的進程 但日本 FTA 的締約國依然以日本企業所構建的企業內國際分工網路所分佈的地區為中心。直到 2010 年後日本政府才開始全面強化 FTA。

為了配合日本企業國際化經營所進入的新階段及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日本政府意識到有必要改變日本 FTA 的落後狀態。但基於日本政府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思維定式與制度慣性，依賴自身的力量很難在 FTA 戰略上實現突破。這樣，利用美國政府的壓力，做出積極回應美國向日本所提出的參加 TPP 談判的建議，不僅成為日本政府決心調整 FTA 戰略的標誌也成為其調整 FTA 戰略的

²⁰³ 張微微，邵 冰，〈日本加入 TPP 談判進程的政治考量及中國的對策〉，《現代日本經濟代》，第 185 期，2012 年 9 月，頁 37。

²⁰⁴ 朴英愛，金香蘭，〈日本 FTA 政策變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7 期，2014 年 9 月，頁 27。

²⁰⁵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Global Economic Strategy(Summary)>, October 21,2006, p.3, < [http://www.meti.go.jp/english/topic/downloadfiles/GlobalEconomicStrategy\(Summary\).pdf](http://www.meti.go.jp/english/topic/downloadfiles/GlobalEconomicStrategy(Summary).pdf)>

有效手段。日本試圖通過參加 TPP 談判改變日本在以地區或雙邊貿易關係下形成的世界貿易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擴大同 TPP 參加國間的貿易，消除貿易轉移影響，在獲得直接經濟利益的同時，依賴制度優勢進而獲得間接經濟利益。

一、有層次推進雙邊和多變自由貿易協定

2002 年 10 月，日本外務省公開發表了題為《日本的 FTA 戰略》的政策報告，系統闡述了日本實施 FTA 政策的意義、效果、注意點、目標以及談判物件的選擇標準等，其目標是，實現從國際上看毫不遜色並且不低於 WTO 標準的自由化。並且在隨後出臺的《關於今後推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基本方針》，更多地使用了 EPA 這個用詞，因為根據 GATT 第二十四條規定，FTA 應實質上撤銷所有貿易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通常貿易自由化水準超過 90%。而 EPA 不僅包含傳統的 FTA 內容，還包括投資自由化、服務自由化、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政府採購公開透明、人員流動、競爭政策等更加廣泛的經濟合作內容。²⁰⁶

為了實現高水準的 FTA，日本目前不顧國內巨大的反對力量，積極參加自由化率極高的 TPP 談判。並在 201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二輪中日韓 FTA 談判中，日本主張在 10 年內將零關稅品種占比提高至 90% 以上，即自由化率超過 90%，這將高於此前日本簽訂的 FTA 中 85% 的平均自由化率。²⁰⁷可見，日本朝著實現高水準的 FTA 而積極努力。

二、有層次推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傳統上來講，日本的 FTA 戰略偏好雙邊主義。不過對於具有「重疊性」的東亞區域建制而言，筆者認為不可能有哪個國家完全偏好特定的整合途徑，必然是會採用雙邊和多邊的雙重貿易自由化路徑，當然，這種雙重路徑面對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不同的發展階段會有所偏重。並且由於 WTO 多邊談判的停滯，使得區域大國將焦點轉向於區域及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發展。

日本雖然早在 1970 年代開始與東南亞國家發展雙邊關係，其雙邊主義的立場一直是其東亞區域政策的中心，但是由於 1997 年金融風暴後東亞地區積極拓

²⁰⁶ 朴英愛，金香蘭，〈日本 FTA 政策變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7 期，2014 年 9 月，頁 24。

²⁰⁷ 〈第二輪中日韓 FTA 談判角力：日方主張三國自由化率超 90%〉，《東方早報》，2013 年 8 月 1 日，〈<http://finance.jrj.com.cn/2013/08/01112215617800.shtml>〉。

展多邊機制，加上東協與中國大陸率先於 2010 年建立自貿區，日本從 2002 年開始在對外政策上出現轉變，從原本的堅持雙邊主義，逐漸願意配合東南亞區域主義的發展策略，加入各項多邊機制。

依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5 年 2 月為止，日本已與 14 個國家、1 個區域組織完成雙邊的 FTA 簽署，其中 7 個是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分別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汶來、印尼與越南，而唯一的區域組織就是東協。處於談判環節的 FTA 有 3 個國家和 5 各區域組織，亞洲區域 C-J-K 和 RCEP 都是多邊貿易整合，更無需提及最近頗受關注的 TPP 談判，²⁰⁸美國務次卿表示 TPP 有望在今年內達成。²⁰⁹

三、FTA 的重心從東亞擴大到亞太

2004 年 12 月，日本政府制定了《關於今後推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基本方針》，並把 FTA 作為構築東亞共同體的一個階段來推進。²¹⁰與優先同 ASEAN(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締結 FTA 的《日本的 FTA 戰略》不同，2004 年的方針帶有通過 FTA 構築東亞共同體，以形成有利於日本外交戰略的國際環境的戰略色彩。2009 年執政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改變以往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對外戰略，明確要以「ASEAN + 6」東亞共同體建設作為對外戰略的核心，強調要重視亞洲外交。

一向重視東亞地區的日本政府到了 2010 年突然把重心擴大到了亞太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舉動就是參加 TPP 談判。2010 年 10 月 1 日，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國會發表政策演說時，明確表明了日本參加 TPP 談判的態度，並稱參加 TPP 談判具有「平成開國」的巨大歷史意義。為此，2010 年 11 月在內閣會議上制定了《關於全面經濟合作的基本方針》，該基本方針強調，亞太地區對日本在政治、經濟、安全保障上是最重要的地區，這個地區的穩定和繁榮關係到日本的生死存亡。因此，在亞太地區，要加速推進正在談判中的 FTA，為重啟日韓 FTA 而積極準備，同時要加速實現中日韓 FTA 東亞自由貿易圈構想

²⁰⁸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Japan's EPA/FTA Network>, February 10, 2010, p.1, <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file/epa_Japan-English.pdf>.

²⁰⁹ 葉林，〈美國務次卿：TPP 可望今春達成〉，《美國之音》，2015 年 3 月 4 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s-20150303/2666894.html>>。

²¹⁰ 平力群，〈日本調整 FTA 戰略的動因——基於保護與支援產業發展的視角日本 FTA 政策變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5 期，2014 年 3 月，頁 41-51。

(EFTA, 10 + 3)、東亞全面的經濟合作構想(CEPEA, 10 + 6) 等研究階段中的區域經濟合作和與蒙古的 FTA 談判。特別是對於 TPP，需要通過收集資訊來採取應對措施，儘快創造國內環境，並開始與相關國家協商 2011 年 11 月 11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正式宣佈日本決定參加 TPP 談判，並與 TPP 成員國就參加 TPP 問題展開協商和交涉 2013 年 3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首相官邸召開記者會，正式宣佈加入 TPP 談判，並於同年 7 月 23 日正式加入了 TPP 談判。

伍、結論：東亞區域整合的新現實主義迴歸

現行的東亞區域整合研究大多從區域層次分析其整體形貌，或者是單純從國家層面出發闡釋國家參與區域整合的政策變化，不過本文回歸新現實主義理論框架，將區域層次和國家層次相銜接，並且以日本參與東亞經貿整合的具體案例，探究更為全面、細緻的東亞區域整合進程。

誠如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家對外政策行動不僅受到國際（區域）體系的制約，同時也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其中國際（區域）體系是自變量，國內政治因素是幹預變量，而國家對外政策是因變量。國際體系層次應當考察國際社會權力結構的分配狀態，國內因素則包含決策者國內政治結構、意識形態與政策考量等。就本文而言，日本對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為國際（區域）體系層次與國內層次及其兩者之間複雜互動的結果。

分析日本推進區域自由貿易的路徑，對於我們理解區域國家參與整合之決策，則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日本的案例顯示，藉由區域層次與國家層次的互動分析，可以反映區域國家的政策思維。日本至今已經與美國、歐盟以及中國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全球貿易領域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而韓國能否在中日之間取得更有力的平衡位置，特別是與日本，能否進一步克服領土糾紛與歷史問題等障礙，加速推進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協定，對於東北亞區域經貿合作的發展，至關重大。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一）期刊論文

李開勝，2014/9。〈論脆片狀態下的東北亞競合困境〉，《太平洋學報》，第 22 卷第 9 期，頁 58-65。

李開勝，2014/3。〈東北亞現實主義邏輯及其突破〉，《太平洋學報》，頁 26-29。

王文岳，2013/12。〈東亞區域主義再建構：韓國參與東亞區域整合之進程與效應〉，《亞太研究論壇》，第 59 期，頁 49-80。

董振源，蔡增家，2007/7。〈從雁行發展到經濟分工：從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頁 87-113。

李巍，2011/4。〈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的終結？——制度過盛與經濟整合的困境〉，《當代亞太》，頁 6-32。

任明，2007/9。〈日本 FTA 政策的動向、特徵及展望〉，《現代日本經濟》，第 155 期，頁 10-14。

張微微，邵冰，2012/9。〈日本加入 TPP 談判進程的政治考量及中國的對策〉，《現代日本經濟代》，第 185 期，頁 33-40。

朴英愛，金香蘭，2014/9。〈日本 FTA 政策變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7 期，頁 23-33。

平力群，2014/3。〈日本調整 FTA 戰略的動因——基於保護與支援產業發展的視角日本 FTA 政策變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5 期，頁 41-51。

（二）網際網絡

嚴聖禾，〈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國〉，《光明網》，2010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gmw.cn/01gmrb/2010-04/25/content_1102254.html>。

周利朔，〈中國成為東盟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出口目的地〉，《中國新聞網》，2011 年 4 月 8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08/2961087.shtml>>。

〈第二輪中日韓 FTA 談判角力：日方主張三國自由化率超 90%〉，《東方早報》，2013 年 8 月 1 日，<<http://finance.jrj.com.cn/2013/08/01112215617800.shtml>>。

葉林，〈美國務次卿：TPP 可望今春達成〉，《美國之音》，2015 年 3 月 4 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s-20150303/2666894.html>>。

二、英文部分

(一) 專書

Hatch, Walter F. and Kozo Yamamura, 1996,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tch, Walter F., 2010,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二) 專書論文

Hamilton-Hart, Natasha, 2004,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Asia: National, Regional, or Global? " in Ellis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21-157.

Searight, Amy, 2009, "Emerging Economic Architecture in Asia: Opening or Insulating the Region?," in Michael J. Green and Bates Gill, eds., *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93-242.

Wang Jiang Yu, 2008, "The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of China-ASEAN FTA: The Impact o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Ho Khai Leong and Samuel C. Y. Ku, ed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42-79.

(三) 期刊論文

Bernard, Mitchel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47, No.2, January 1995, p.171-209.

Kojima, Kiyoshi, "Japanese-Styl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14, Spring, 1986, p.61-96.

(四) 網際網絡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Global Economic Strategy(Summary)>, October 21,2006, p.3,
<[http://www.meti.go.jp/english/topic/downloadfiles/GlobalEconomicStrategy\(Summary\).pdf](http://www.meti.go.jp/english/topic/downloadfiles/GlobalEconomicStrategy(Summary).pdf)>.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Japan's EPA/FTA Network>, February 10,2010, p.1,

< 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file/epa_Japan-English.pdf >.

台日在中國之產業合作戰略

吳佳育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經濟重心開始轉移至東亞地區，使中國大陸成功轉變成世界各國競相競爭的市場；加上台商企業在中國外商圈中具有的特殊地位，與近年來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助益下，形成台商的吸引力，使日本企業在面臨諸多問題時，更願意與台灣合作，並在台日策略聯盟制定下增進台日之間的交流與發展。因此，本文將深入探究台日在中國之產業合作的模式。

首先，將檢視台商在中國大陸外商圈所具有特殊地位、以及 ECFA 對日商之特殊意義；其次，探討日本商社海外經營模式與投資取向上，選擇台商作為合作夥伴之因素；最後，透過台日經貿策略聯盟分析台日經濟合作的互補性，以及未來可能面臨之挑戰。對此，文中將以台日產業合作所設定的四種合作模式作分析，並輔以製造業及非製造業之實際案例比較其中的不同。

關鍵字：台商企業、日本商社、經濟合作、台日產業、策略聯盟

壹、前言

全球經濟版圖重心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有明顯從歐美等成熟市場移往東亞地區新興市場的現象，其中，中國大陸市場更是跨國企業競相爭取的重要市場，台灣近年來與中國大陸在各項經貿往來及合作交流上日益密切，尤其在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之後，兩岸經貿關係邁向新的里程碑，在這樣的機制強化下，更使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佔據特殊地位。

再者，日本 311 大地震及海嘯引發核能危機後，許多企業作業停擺，面對長期的內需不振，日本企業極需拓展海外市場，尋求值得信賴的國際夥伴來開拓新市場，才能化解生存危機。根據日本瑞穗總合研究所（MizuhoResearch Institute）

報告指出，²¹¹台灣與日本合資的中國大陸當地法人存活率為 78%，平均值明顯比日本的中國大陸當地法人 68.4% 的存活率高，且 ECFA 有助於台日企業合作，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利基。²¹²這說明兩個意涵，第一是日本企業經常無法適應中國大陸各地複雜交易習慣或易遭受模仿等因素下蒙受損失；第二是在歷史文化因素下，台灣企業比日本企業更了解中國大陸市場，亦比其他國家企業更了解日本企業，這些因素使日本商社願意透過台灣成為有效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模式。

在雙方投資合作上，日本商社主要以提供關鍵技術及品牌經營為主，台灣企業則偏重以提供下游相關配件、原料之設廠的加工生產。由此可知，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主要由日本企業主導、台灣企業配合的方式，又可細分為事業經營合作、研發設計合作、市場行銷合作及生產製造合作等四種模式，在這樣台日企業的互補與互動關係中，台商在中國大陸外商圈所具有的成功優勢與特殊地位，使日本商社更願意長期與台灣企業合作交流，並共同制定台日投資協議政策合作來增進發展，皆是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

貳、台商在中國外商圈的特殊地位

一、中國經濟角色之轉變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造成全球經濟衰退，歐美等已開發國家與亞洲地區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力出現變化，引發世界經濟權力的調整，歐美領頭的世界市場需求大幅度的縮減，這對高度依賴出口成長的中國大陸影響巨大，使中國大陸深刻意識到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的必要性，以因應國外經濟局勢變動的不穩定問題，開始高度重視擴大內需市場，²¹³期望以內需政策提升國內企業競爭力，帶動經濟發展，並降低中國大陸對外出口過度的依賴。透過在政策上的調整，讓中國大陸由過去出口和外來投資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逐漸轉變為內需和消費者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²¹⁴同時，也奠定了中國大陸長期的經濟發展基礎，使中國大陸逐漸由世界工廠轉變成為世界市場。

隨著中國大陸在政策上的調整，及擁有巨大的消費市場、良好的經濟實力和有利的經濟政策下，快速帶動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各國企業為了掌握這波龐大

²¹¹“The Surge of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Utilizing Taiwanese Managerial Resources,”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2014/8/24), <http://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rp/MRP0502.pdf>.

²¹² 蔡宏明，〈台日產業合作契機〉，《產業雜誌》，2012 年 8 月 6 日，

〈<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108-509-7>〉。

²¹³ 溫芳宜，〈中國大陸內需政策變化探討〉，《經濟部全球台商 e 焦點》，2013 年 11 月 1 日，

〈<http://www.twbusinessnet.com/epaperArticle.do?id=241762304>〉。

²¹⁴ 趙文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可能風險之探討〉，《經濟研究》，第 13 期，2012 年，頁 538。

商機，更加積極佈局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持續不斷的吸引全球資金流入，成為世界各國企業競相爭取進入的重要市場，使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²¹⁵並在世界經濟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版圖重心也因中國大陸經濟地位的快速上升而轉移至亞洲地區。

因此，金融危機的發生讓中國大陸經濟地位獲得提升，並逐漸由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同時，也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有強大的貢獻，更成為世界各國競相爭取進入的重要地方，而台灣在近年來與中國大陸在各項經貿往來及合作交流上日益的密切，不僅提升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優勢，也讓台灣能夠藉由這些優勢，在中國大陸市場上佔據特殊與重要的地位，進而成為世界各國為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而爭取合作的對象。

二、台商在中國具有之優勢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也持續的在增加，使得兩岸之間的經貿活動愈來愈密切，在 2014 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實際投資金額排名第三，僅次於香港及新加坡。²¹⁶因此，在面臨全球競爭環境的趨勢之下，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所有外資企業投資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保有一定的競爭優勢，也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極大的貢獻。透過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成功經驗，歸結出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方面，由於佈局較早且地理位置相近，並在語言、風俗、文化類似的背景優勢與台灣特有的企業文化下，使台商能夠在其他外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際，仍然能與其他國家企業相抗衡，並在中國大陸市場上佔據特殊的地位。

首先，中共對台刻意優惠。中國大陸自制定並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在對台政策上採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其中，在經貿及民間交流方面，中國大陸充分展現出柔軟面，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及經濟交流合作，對台灣提出各項的務實及優惠政策，同時，釋出善意及讓利給台灣人民，使台灣人民享有更多的國民待遇，進而讓中國大陸能夠積極推動及務實各種統戰策略。²¹⁷中國大陸目的是要透過加強對台灣的交流與互動，增進雙方之間的瞭解及消除誤解，使兩岸經濟關係更加密切，並有助於掌握雙方的立場，企圖在反分裂國家法的規範與包裝下，積極展開對台灣的統戰作為，期望以不統而戰的方式來爭取民心。然而，在這些

²¹⁵ 中央銀行，〈UNCTAD 發布全球投資趨勢監控報告〉，《中央銀行》，2012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210269453471.pdf>〉。

²¹⁶ 商務部外資司，〈2014 年 1-12 月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快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2015 年 1 月 22 日，〈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33_4500_0_7.html〉。

²¹⁷ 唐仁俊，〈當前中共對台統戰策略之分析〉，《空軍軍官雙月刊》，第 158 期，2008 年，頁 35。

中國大陸刻意釋放出的經濟條件優勢下，也使得台商能夠受到與眾不同的優惠政策，讓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擁有諸多優惠，提升台商在中國大陸所佔據的特殊地位。

第二，語言文化背景相似。台灣與中國大陸來自同樣的文化與種族關係，使台灣人在融入當地社群上沒有阻礙，這對台商進軍中國大陸市場來說，在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下，能保證良好及暢通的溝通管道和人際關係，同時，在貼近並帶動當地關係下，也較其他國家企業更容易切入中國大陸市場，進而保障生意上的擴展。再者，台灣與中國大陸飲食與風俗習慣相近，對中國大陸的風情文化較其他國家企業有更深入的體會，也更瞭解中國大陸的官場文化及人際關係的運作，使台灣企業對於中國大陸當地的政府和企業具有優秀的交涉能力，更能接近並適應當地環境與市場，也更容易與中國大陸企業建立夥伴關係及維護良好的交易氣氛，最重要的是，同文同種及語言相同的優勢是其他國家企業都無法比擬與取代的。因此，台商企業可以善用此一資源及有利條件，使各國企業透過與台商企業的合作，來共同拓展中國大陸市場。

第三，地理位置優勢。台灣位居亞太地理樞紐與區域航線交會點，橫向串聯北美及西歐，縱向連接東北亞及東南亞，具有極佳的地理位置，成為貿易經營的優勢。加上台灣與中國大陸地理距離最近，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透過擁有的獨特地理優勢，讓台商企業的人員、資金與物流往來更具效率與便捷。再者，地理距離的遠近也影響運輸成本及管理成本，成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這讓台商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上，遠勝於其他國家外資企業。

第四，企業管理基礎與市場行銷網絡。²¹⁸台商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優勢，成為提供台商企業管理與市場行銷的基礎，在企業管理上，因為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使台商具有良好溝通管理能力，加上台商比其他國家更了解中國文化，使台商在供應鏈管理制度、人才培訓與管理制度、品質管理、採購庫存管理等多項高效能管理能力上皆能夠適當運用並展現出台商的特色；而在市場行銷上，台商擁有環境與市場適應的能力，這不僅能提升台商在產品行銷及全球生產網絡的連結，也成為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經營成功的重要資源。

最後，科技產業技術。科技產業是台灣重要的經濟支柱，使台灣成為全球科技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²¹⁹在全球科技產業鏈中，台灣的科技產業成功扮演了重要的代工合作夥伴，使台灣贏得代工王國的美譽，台灣科技產業能闖出這樣的局面，與台商企業的創新精神及技術背景有絕對的關係。台灣科技產業具有快

218 童振源，〈促進台日經濟合作戰略夥伴關係〉，發表於「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東京：2005 年 9 月 6-7 日），頁 4。

219 劉國泰，〈開啟雙革，航向永續〉，《天下雜誌》，2014 年 1 月 17 日，〈<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5402>〉。

速且完整的供應鏈，擁有優良的製程與高素質的產能，在專利技術與研發技術上能力強大，能夠持續的創新，且擁有充裕的產業技術人才，並在科技教育、研發教育等培育管道與資本市場上也十分發達，有利於台商企業為產業創造領先產品及品牌價值，也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創造經濟價值，也因為台商過去在台灣已經累積了良好的製造能力及信譽，使得國際知名企業不論代工或採購都會首選台商企業，使台灣的科技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內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三、ECFA 對日商之特殊意義

雖然台灣與日本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對於日本企業而言，不論在貿易、產業合作、科技交流上，台灣為日本重要的經貿投資合作夥伴，隨著 ECFA 的簽署使兩岸經貿加速整合，對於早期收穫清單項目也開始全面實施關稅優惠，影響日本企業投資台灣。在 2011 年日本對台灣的投資件數快速的增加，2012 年日本對台灣直接投資件數寫下歷年最高紀錄 619 件。²²⁰ 其中，在日本企業來台灣投資的產業類別中，多數產業都是納入早期收穫清單項目的行業，使日本投資企業大多享有 ECFA 的好處，並對 ECFA 的進展更為關切。因此，在看好兩岸商機下，大幅度增加來台灣投資的意願，日本企業認為 ECFA 的簽署有助於台日企業之間的合作，並可以透過經由台灣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或在台灣設置生產據點以滿足中國大陸市場的想法，是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利基。

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經驗並不順利，經常無法適應中國大陸各地複雜的交易習慣，尤其是日本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長期以來都很敏感，日本企業在考量中國大陸投資風險的情況下，不敢貿然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投資。相對之下，台灣鄰近中國大陸市場，能夠提供中國大陸當地客戶的即時需求，確保與當地客戶之間的長期交易關係，並透過台灣在中國大陸市場的行銷網絡，可以順勢拓展第三地商機。

然而，台商企業除了在 ECFA 簽署上具有的諸多優勢外，對日本企業來說，還擁有特殊的歷史因素與雙方之間透過長期合作而建立起的信賴關係，在這些特殊魅力的吸引下，加速了日商企業來台灣投資的意願，同時，也影響日商企業與台灣合作的積極度，使台日之間在這些因素的促進下，逐漸發展出策略聯盟。

台灣過去曾受過日本殖民統治，基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化情感及語言因素，使台灣受到日本文化的深度影響，在與其他國家相比之下，台灣對日本文化的接

²²⁰ 經濟部投審會，〈103 年 12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速報〉，《中國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4 年 12 月，〈<http://www.moeaic.gov.tw/>〉。

受度較高，也較能夠理解日本人的想法，這讓台商企業在承接日本技術時，能夠理解日本企業的品質水準與管理語言，並降低雙方在溝通上的障礙，同時，也讓台商企業在提升製造水準方面，更加願意相信日商企業在製造方面的管理理念，並積極落實與日商企業的合作。

再加上台商與日商之間超過半世紀以上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經驗，讓雙方之間能夠藉由長期合作的歷史、持續的投入及關係的經營上，建立起長期穩固的互信關係，在這特殊的關係下，能夠提升台日產業的合作交流效益，使台日雙方更能面對全球經營環境的迅速變化及全球化的競爭。透過台日之間經貿交流的基本內涵來說，長期信任關係是雙方建立深厚的產業合作基礎，同時，台商與日商之間也是透過雙方的長期合作基礎，進而醞釀出台日之間的互信關係。

參、日本商社海外經營模式

一、日本商社發展與演變

日本是依靠海外貿易成長的經濟大國，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使海外貿易額大幅度的縮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經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在 1945~1955 年，為戰後迅速經濟復興時期，²²¹日本開始恢復對外直接投資，由於當時日本經濟處於復興階段，國內資金短缺，對外投資也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使得對外直接投資的件數不多，規模也較小，主要目的在確保經濟的正常運行；直到 1960 年後才逐漸放寬對外投資的政策，使日本經濟進入了第二階段 1956~1973 年的高度成長時期，²²²恢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在這個階段，隨著經濟高速的成長，企業國際競爭實力也跟著增強，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產業結構穩定，國際收支狀況改善，資本自由化開始取得進展，加上海外各國要求自由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逐漸放寬資本和外匯的管制，加速海外投資的進行，使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開始顯著的增加，對外貿易順差也擁有大幅度的成長。

然而，從 1974 年開始至今，日本經濟進入第三階段的低速、穩定發展時期，由於戰後建立國際貨幣體系的瓦解，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其中，1985 年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簽訂廣場協議的影響下，迫使日圓大幅度升值，²²³削弱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日本為降低生產成本及確保投資的利益，企業紛紛到海外投資設廠，開始增加在開發中國家的投資，以便利用當地的廉價且充沛勞動力，

221 丸茂明則著、陳鵬仁譯，《經濟大國——日本的強處與弱點》（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991 年），頁 31。

222 同前註，頁 35。

223 木毎，《中日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分析》，《日本學刊》，第 2 期，2006 年，頁 99。

因而推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使日本在 1980 年代對外直接投資有穩定成長。在這段期間內，日本持續保持對外投資，也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亞洲等發展中國家轉移，加速對亞洲地區製造業的投資，尤其以紡織、電器及機械等產業為主，並且為促進日本產品的出口市場，積極的擴大海外投資規模，使日本進入前所未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時期，在這三個階段的經濟發展下，日本在海外貿易政策上不斷的作出調整，以促進日本企業的海外貿易發展，從而帶動了日本的經濟成長。

在不斷促進海外貿易政策的發展下，使日本在 1980 年代中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²²⁴然而，經濟成長卻在 1990 年開始停滯，連帶使日本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主要的原因在於，日本難以為國際資本的增值和技術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再加上經濟發展的停滯也使得日本缺乏競爭力，因此，日本在經歷這段經濟低速成長時期，面對持續的經濟衰退與接續發生的眾多問題下，使日本企業轉向開拓中國大陸市場，並透過積極對台灣投資合作，發展出日本海外貿易的新平衡點。

首先，金融危機的發生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的打擊。²²⁵日本經濟對於外部需求的依賴較大，因此，金融危機的發生對日本造成了不小的衝擊，不僅讓日本失去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支撐，同時也影響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首先波及的即是出口貿易領域，迫使日本必須將投資重點轉移，並積極尋求海外企業的合作夥伴，這讓日本逐漸開始注重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拓，但日本企業在進軍中國市場上並不順利，這使得日本企業轉往台灣投資，並與台商合作發展策略聯盟，進而作為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平台。

其次，311 大地震對日本經濟的衝擊。日本 311 大地震的發生，以及海嘯引發的核能危機，對日本國內造成公共建設破壞，並影響供電限制、廠房損毀、零組件短缺等問題，使日本工業生產中斷，許多企業停擺，進而引發全球供應鏈的動盪；再加上，日本為因應重建所需的資金，而形成政府債務的問題，以及支援重建與震災的大量海外資金回流日本，影響日圓匯率，出現大幅度的升值，這對日本而言，匯率短期的升值波動，對出口貿易會造成衰退性的衝擊，也對出口市場是一大傷害，更加使得日本經濟無法迅速提升。

最後，中日關係的緊張因素提供台商與日商合作的契機。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問題有很深的民族仇恨情緒，並非一時之間可以化解，再加上近年來因為在釣魚台主權爭端、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以及日本可能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等事件，使中國

224 童振源、蔡增家，〈從雁行發展到經濟分工：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2007 年 7 月，頁 92。

225 吳振興、袁野，《危機與轉機：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問題、政策分析與出路》（中國：新世界出版社，2011 年），第 11 章。

反日的情緒更加蔓延，並對反日情緒展開行動上的破壞，這讓日商企業在進軍中國大陸市場上失利，因此，日商企業希望透過與台商合作的方式，降低在中國大陸市場經營上的政治與社會風險，並基於現實環境資源的需求、國內生產過剩與內需轉弱等問題上，迫使日商企業必須不斷擴展海外投資，積極尋找海外市場，以彌補現實的需求。在這些因素下，使日本在對外開拓新市場上，藉由台商具有的優勢，與台商對日商特殊意義的加乘幫助，使日本選擇台灣成為投資合作的首選夥伴，而不是其他與日本更為親近的國家，同時，台灣企業也藉由海外市場拓展能力、彈性高及配合度高等優勢，成為日商企業更緊密的投資合作夥伴。

二、日本商社投資需求分析

根據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產業需求的變化一直是以製造業投資為中心而展開。²²⁶在 1990 年以前第一波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熱潮中，是典型的資源利用型投資，其主要的目的是利用中國大陸豐富而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及資源等優勢，在中國大陸設立生產加工基地，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因此，主要投資動機為生產要素導向型，以食品、服裝紡織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起步發展。

進入 1990 年代以來，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的成長和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相對之下，日本國內經濟衰退和市場需求縮減，使日本企業逐漸意識到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性，開啟第二波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熱潮，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成為主要投資動機，並開始向電器、汽車等加工組裝型工業迅速的發展，隨著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發展，原先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狀況已有了明顯的改變，這一投資方向的轉變，帶動了技術由低向高發展，資本額也跟著擴大，使製造業的投資開始大大高於非製造業。

然而，自 2000 年以來，在加工組裝型工業投資繼續增加的情況下，運輸工業的投資成為了牽引重化工業投資的新主角，²²⁷特別是向汽車、電器、機械等產業集中，實現產業技術的升級，並隨著中國大陸逐漸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下，使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的首要目的轉向為佔領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因此，市場導向型成為主要的投資動機，日本企業紛紛加大對銷售、物流等項目的投資，並計畫在品牌、行銷能力上能夠靈活的應用，以確保對中國大陸企業的競爭優勢。

²²⁶ 劉昌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新發展及其原因分析〉，《東北亞論壇》，第 15 卷第 6 期，2006 年，頁 73。

²²⁷ 同前註，頁 73。

三、日本商社投資取向

1970 年代為日本商社對外直接投資的興盛時期，也是日本海外直接投資數量增加的轉折點，由於日本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十年之後，經濟出現高速的成長，造成日本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開始持續的上升，增加日本企業經營成本的壓力，同時也使日本國內資源匱乏，然而，為了確保資源穩定的供應以保障經濟發展，日本企業必須不斷的進行海外投資。再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瓦解，造成日圓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產品競爭力下降，日本企業唯有透過海外投資才能幫助日本的經濟發展，在當時，日本商社的全球競爭以生產管理，如降低生產成本、規避貿易壁壘及提升品質為出發點。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日本企業開始將投資重點放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並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投資為主，以便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市場。

日本企業在對外選擇海外投資對象中，由於與美國、南韓之間的貿易基礎及經營重點的不同，使雙方在合作上較有難度；在與台灣同樣具有語言優勢的新加坡及香港上，則因為經營成本較高以及中國大陸的干預下，使得日本企業減少投資的意願。相較之下，台灣企業在語言能力較具優勢，且擁有深度的國際觀，對於日式管理也擁有較高的包容度，並在零件製造、產品組裝、成本加工等產業上均有完整的設備與技術，再加上台灣地處亞洲之中心，與日本又僅有三個小時的飛機旅程，在優質的地理及人文環境優勢下，使得台灣自然成為日本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經濟重鎮，讓日本在對外開拓新市場上選擇台灣成為投資合作的首選夥伴，而不是其他與日本更為親近的國家。另一方面，台灣企業也藉由海外市場的拓展能力、彈性高及配合度高等優勢下，成為日商企業更緊密的投資合作對象。

肆、台日經貿策略聯盟進軍中國之分析

一、台日產業合作緣起與發展趨勢

1960 年代，日本企業開始對台灣投資，依其對台灣投資之目地、型態可區分為三波對台灣投資的熱潮，²²⁸首先，在 1960~1980 年，日本企業開始第一波對台投資，此時期的日商企業因為高度的經濟成長，造成國內物價高漲，連帶使企業的人事費用、土地等各方面的使用成本增加，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使得日本多數勞力密集型產業開始積極進軍台灣廉價的勞力市場，相對之下，在這個時期，台灣為勞力密集產業發展的最盛時期，在日商積極投資下，使台灣經濟發展相當

²²⁸ 魏聰哲，〈日商對台投資歷程與趨勢分析〉，《經濟部全球台商 e 焦點》，2014 年 8 月 1 日。
〈<http://twbusiness.nat.gov.tw/epaperArticle.do?id=256868355>〉。

快速。

緊接著，在 1980~1990 年代中期，由於已開發國家的強勢壓力下，日圓逐步升值，造成日本企業不利於出口，這對一向以出口為主的日本企業來說，不得不更努力的對外尋找更好的投資環境，相對之下，台灣在此時期，根據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發展下，開始前往中國沿海城市設廠投資，並適時的開放多項優惠方案，在這些利益的誘惑之下，帶動了第二波日本企業對台灣投資的熱潮。

直到 1990 年以後，日商企業受到日圓快速的升值及國內經濟泡沫破裂的影響，²²⁹更加不利於對外出口，相對之下，台灣也面臨土地與人事費用高漲等問題，使台灣企業積極擴大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規模與範圍，這對原本不利於外商投資環境的台灣來說，因為對中國大陸的擴大投資而急速發展，而且在這個時期，台灣也蓬勃發展高科技產業，擁有優質的高科技產業代工技術，在日本高科技產業為因應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零件及技術需求下，成就了日本企業高科技零件供應與台灣委託代工產業的良好互動關係，因此，台灣成為日本高科技產業另一個重要的生產據點，也成為日本企業進出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基地，並形成第三波對台灣投資的熱潮。

在過去五、六十年間的發展過程中，台灣與日本一直是彼此最密切的經濟合作夥伴，這樣長期且緊密的經貿關係，是形成台日經濟共同利益的重要條件，並在台日經貿往來的過程中，來自於日本企業的直接投資與技術轉移，不僅為日本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也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然而，在國際政治的制約之下，過去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經貿交流主要是以民間企業的往來為主，但在面對現今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與東亞經貿整合的發展趨勢下，與貿易密切往來的國家發展策略合作關係，成為台灣與日本強化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途徑。²³⁰

再者，中國大陸市場的興起，與快速成長和個人消費能力迅速的提升下，改變台日產業之間產品製作過程的分工型態，從過去的側重垂直分工逐漸轉變為垂直分工與水平合作並重，進而提升至雙方的互惠關係，²³¹使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合作關係進一步的升級，逐漸從原本屬於民間企業分工形式的經濟合作，轉而透過官方協商的經濟合作架構，建立台日經濟合作戰略夥伴關係，營造出台日策略聯盟的發展，以發揮台商與日商的最大優勢及效率。

在過去台日產業的合作關係，日本企業大多單純將台灣做為生產據點或採購

229 高超洋、簡汝嫻，〈近年日圓升值對日本產業影響之研究〉，《國際金融參考資料》，第 63 期，2012 年，頁 7。

230 李世暉，〈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2 年，頁 167。

231 李世暉，〈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2 年，頁 171。

據點為主，對台灣的貢獻僅限於資本投入、增加出口與提供就業機會上，並以台日雙方國內市場之間的開拓發展為重點。相對於過去台日產業的合作關係，面對新興市場的崛起，以及台日政府在此基礎下輔助措施的推動，使台日產業開始擴大合作型態，逐步提升至技術合作或創設新公司等夥伴關係，並擴大到經營、研發、行銷、生產等領域上，因而歸納出事業經營合作、研發設計合作、市場行銷合作及生產製造合作四種合作類型。透過四種合作模式的運用，使得台日企業之間的合作展現出多元化與多樣化的形式，不僅有利於投資環境的提升，也讓台日產業間的連結更加的緊密，進而深化及鞏固了台日雙方產業合作的策略聯盟關係。

二、台日經濟合作互補性

日本企業一直是台灣最重要的外資技術來源，也是最密切的經濟合作夥伴，在這樣長期且緊密的經貿關係下，使台灣企業與日本企業在合作類型與模式上不斷的轉變，但是在產業結構上雙方始終保有高度的互補性。透過台日經貿實務的運作，台灣企業在環境適應、語言文化、全球生產網絡連結上皆展現特色，最重要的優勢在於對中國大陸市場經營成功的基礎，提供了日本企業選擇台商作為合作夥伴的關鍵誘因；²³²而日本企業則在創新研發與技術、品牌形象與商譽、品質管理能力上具有較大的優勢。²³³

因此，在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下，雙方企業能相互整合優勢，結合彼此之間的企業文化與信任關係，使台日企業在共同進軍中國大陸市場上存在相當大的合作潛力，透過台日經貿策略聯盟，讓台灣企業和日本企業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彌補各自的弱勢，在中國大陸開拓事業，相對於過去產業合作類型，台日產業合作擴大到研發、行銷等領域，使台日企業的合作展現出多樣化的面向，並透過台日產業合作類型與模式，將台日企業之間的經濟合作互補性歸納為：

第一，事業經營合作。由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廣大，台日企業之間必須透過事業合作的方式，將資源做到最有效的利用，才較有利於經營與市場開拓，為推進在中國大陸的事業，台灣企業與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所設立的合資企業。再者，台日企業在經營模式、企業文化等方面較為相近，並在長期的合作發展下，台日企業能夠相互瞭解，形成了事業合作的基礎，因此，在事業經營方面的合作關係，無論透過哪一種發展模式，台日企業之間到中國大陸的投資合作，都能夠獲得巨大的效益與幫助，台日雙方企業也可以各自從策略聯盟關係中獲得利益。

232 童振源，〈促進台日經濟合作戰略夥伴關係〉，發表於「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東京：2005 年 9 月 6-7 日)，頁 4。

233 陳德昇，〈台日商策略聯盟：市場機遇與競合挑戰〉，發表於「FTA、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角色：機會與挑戰研討會」。(台北：2014 年 5 月)，頁 5。

第二，研發設計合作。台灣企業擁有良好的環境與市場適應能力，比起其他國家企業，更瞭解中國大陸當地的文化，也更熟悉消費環境及適應市場的需求，使台商企業較不容易迷失方向，設計出適合當地文化背景及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同時，台灣企業也具有國際化的思維與明快的決策效率等經營能力，善於因應國際潮流，並且擁有良好的商業靈敏度，能夠快速嗅出商機進行投資。透過台日企業的合作，能夠結合日本企業在基礎研究與產品開發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優勢，運用日本企業的高端技術研發實力與領先的科技研發技術，以及日本企業在品質控管的技術能力下，取得市場的先機。²³⁴

再者，在台商企業與日本企業的長期合作下，較能夠理解日本人的想法，這讓台商企業在承接日本技術時，能夠深度瞭解日本企業的品質水準及管理語言，在交易習慣方面也較能滿足日本企業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台日企業之間透過長期合作的基礎，並運用各自具有的優勢，使台灣企業與日本企業在研發設計方面的合作關係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第三，生產製造合作。由於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佈局已久，長期在中國大陸的經營，使台商企業具有雄厚的製造能量，並在中國大陸形成大規模且高效率的產業聚集，以及快速且完整的零組件供應鏈，在全球科技產業鏈中，台商企業在生產的零組件與產品上擁有量產的能力，且不論在品質、價格等方面都優於其他國家的外資企業，再加上台灣零組件供應廠商的製造品質也較接近於日本企業。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為提高在中國大陸的生產效率，會選擇接近台灣企業的產業聚集地，以方便從台灣企業採購零組件，特別是在資訊科技產業上，日本企業利用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生產情況，以委託代工的形式，對台灣企業下單，採購台灣企業生產的電腦及周邊設備產品。²³⁵

然而，日本企業為從台灣企業採購零組件和產品，也向台灣企業提供技術和生產管理技巧，幫助台商企業擴大生產能力、提高技術水準，特別是在半導體、液晶面板、電腦等高科技領域，許多日本企業與台灣企業締結提供技術並採購此技術生產所產品的合作關係，²³⁶使日本企業可以向台灣企業提供技術，且合理的從台灣企業採購產品。因此，台日企業在採購、供應鏈方面的合作關係，透過雙方合作的互補性，使得日本企業可以從台灣企業採購低成本、高品質的產品和零組件，以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競爭力，並可以確保生產所需的零組件供應，及維

²³⁴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日本瑞穗金融集團〉，《投資台灣入口網》，2012年，〈<http://investtaiwan.nat.gov.tw/chs/show.jsp?ID=5225&MID=5>〉。

²³⁵ 徐斯勤、陳德昇，《台日商大陸投資策略聯盟—理論、實務與案例》（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2010年），頁218。

²³⁶ 徐斯勤、陳德昇，《台日商大陸投資策略聯盟—理論、實務與案例》（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2010年），頁219。

持對消費者與客戶的產品供應。同時，日本企業也可以透過委託台灣企業代工的方式，減輕在中國大陸設廠與設備投資的負擔，使日本企業更加有利於集中經營資源及提高效率，而台灣企業也可以從幫助日本企業代工的過程中，獲取日本企業具有的優勢技術，並透過代工過程擴大生產的規模，使台日雙方企業在研發設計方面的合作關係上，可以享受到多方面的利益，進而建立起強而有利的策略聯盟關係。

第四，市場行銷合作。透過台商企業在行銷策略上，擁有的獨特性、差異化、吸引力等行銷手法優勢，增加產品的銷售及利潤，讓產品在劇烈的競爭環境中，不容易被淘汰，²³⁷加上台灣企業擁有良好的環境與市場適應的能力，比起其他外資企業，較能夠熟悉消費環境及迅速解讀市場的銷售方向，能夠快速適應市場的需求，以提升台商企業在產品行銷及全球生產網絡的連結，使得日商企業積極透過與台灣企業合作的方式，利用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構築的生產和銷售網絡，藉助台灣企業的力量，擴大在中國大陸國內市場的銷售，以有效彌補在中國大陸市場上銷售及商業習慣的不足。同時，日本企業也會向台灣企業傳授生產管理技巧，並結合日本企業具有可以使各國消費者認同的品牌價值與經營能力，幫助台商企業擴大在中國大陸生產的能力。

近年來，台灣企業和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聯手發展成功的經濟合作案例，主要是在汽車零組件、電機電子及食品飲料等領域上。²³⁸透過台灣企業在投資靈活性、產業群聚、人事管理制度、市場對應能力等方面具有的優勢，並結合日本企業在品牌技術能力、品質控管、品牌形象等方面具有的優勢，藉由台日企業之間的合作互補性，讓台灣企業能將日本企業開發的技術迅速商品化，以靈活回應市場需求，並以低成本高品質的優勢大量的生產。

同時，還能藉由日本企業的品牌效應，使雙方的優勢都能夠從策略聯盟中徹底的發揮，進而有效切入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中獲得利益，由此也可以看出，台日雙方之間的合作，主要是以日本企業為主導，提供關鍵技術及品牌經營；台灣企業為配合，提供下游相關配件、原料之設廠的加工生產為主，並透過策略聯盟關係在中國大陸建立起大型的跨國生產網絡，因此，台灣企業和日本企業藉由在經營方面各自擁有的不同優勢及弱點，透過策略聯盟關係，即可發揮優勢克服弱點，共同獲得利益，同時，雙方的互補性也是成為提供台灣企業與日商企業作為合作夥伴的關鍵誘因。

²³⁷ 游鴻裕，《兩岸經貿關係：台商的投資與經營觀點》（台北：雙葉書廊出版社，2009年），頁158。

²³⁸ 徐斯勤、陳德昇，《跨域投資與合作——台日商策略聯盟理論與實務》（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2011年），頁8。

三、台日合作之挑戰

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 ECFA 並積極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與台灣產業擁有高度相似性的貿易強勁的競爭對手南韓，在 2015 年 2 月 25 日與中國大陸初步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並於 2015 年 6 月 1 日雙方正式簽署中韓 FTA，預計在今年底前生效實施。中韓 FTA 的簽署，不僅有利於降低或消除雙方的關稅貿易障礙，幫助南韓製造業的發展，同時也有助於促進中韓雙方的貿易及加強雙邊的經貿關係。²³⁹

中國大陸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占台灣總貿易額 21.6%，而南韓在經濟發展程度及模式上與台灣極為相似，且在產業上也擁有高度的相似性，加上同屬於出口導向型為主的國家，使得台灣與南韓雙方在出口商品的相互替代性高、貿易競爭性也較強，為台灣最主要的貿易競爭對手。其中，台灣與南韓在電子、紡織、石化、機械、汽車零組件以及文創等產業上，出口商品相似度高達 70%，²⁴⁰因此，一旦中韓 FTA 生效，南韓輸往中國大陸的商品將因關稅調降而享有關稅上的優惠，並大幅度的提升其競爭力；相對之下，台灣商品輸往中國大陸的價格優勢不在，並影響台灣產品的競爭力，使得台灣在 ECFA 享有產品銷往中國大陸的關稅優惠不再是唯一的優勢。

伍、結論

自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以來，全球經濟版圖重心明顯轉移至中國大陸，同時，憑藉著中國大陸龐大的消費市場、良好的經濟實力、有利的經濟政策下，快速帶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使中國大陸逐漸由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並在全球競爭環境的影響下，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成為各產業經營成功的關鍵。然而，中國大陸在經濟地位上的轉變，使各國企業為了掌握這波龐大的商機，開始積極佈局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其中，台灣企業與日本商社也不例外。

在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過程中，台灣企業因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刻意優惠、語言文化背景相似、地理位置等諸多優勢，使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日本企業則是面臨全球金融海嘯、311 大地震以及對外政治因素等影響下，開始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並日漸重視投資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性，卻因中日關係緊張的因素影響下，使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並不順利，這對於與

²³⁹ 經濟部，〈陸韓 FTA 議題直擊〉，《經濟部工業局》，2015 年 2 月，
〈http://ecfagoods.tw/?page_id=19318〉。

²⁴⁰ 彭連漪，〈台灣輸掉第一回合，未來還有許多硬戰〉，《遠見雜誌》，2012 年 5 月，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0010.html〉。

中國大陸及日本都較為友善的台灣來說，自然成為雙方產業經濟往來的重要據點，再加上 ECFA 的簽署，使得有意赴中國大陸投資的日本企業，加速與台灣企業合作，成為台日企業經濟合作的催化劑，並逐漸營造出台日策略聯盟的發展，透過台日產業合作的發展下，能彌補雙方之間的弱點，強化彼此的競爭力，進而共同獲得利益。

因此，由本文研究分析可知，台日產業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合作過程中，首先，由於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具有特殊地位，再加上 ECFA 的簽署，使台商在中國大陸外商圈更加佔據優勢；其次，日本企業對外投資面臨諸多困境，進而加速促成了台日產業的合作發展；第三，在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中，台商與日商企業之間有很大的互惠合作空間、彼此互補性相當大、合作意願也相當高，一直是彼此最密切的經濟合作夥伴；最後，中韓 FTA 的簽署，使台灣在 ECFA 的關稅不再是唯一優勢，長期下來將會對台日企業之間的合作造成影響。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一）專書

丸茂明則著、陳鵬仁譯，1991。《經濟大國—日本的強處與弱點》。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吳振興、袁野，2011。《危機與轉機：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問題、政策分析與出路》。中國：新世界出版社。

徐斯勤、陳德昇，2010。《台日商大陸投資策略聯盟—理論、實務與案例》。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

徐斯勤、陳德昇，2011。《跨域投資與合作—台日商策略聯盟理論與實務》。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

游鴻裕，2009。《兩岸經貿關係：台商的投資與經營觀點》。台北：雙葉書廊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

木每，2006。〈中日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分析〉，《日本學刊》，第 2 期，頁 97-105。

李世暉，2012。〈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第 3 期，頁 165-183。

高超洋、簡汝嫻，2012。〈近年日圓升值對日本產業影響之研究〉，《國際金融參考資料》，第 63 期，頁 1-22。

唐仁俊，2008 年。〈當前中共對台統戰策略之分析〉，《空軍軍官雙月刊》，第 158 期，頁 29-44。

童振源、蔡增家，2007/ 7。〈從雁行發展到經濟分工：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頁 87-114。

趙文志，2012 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可能風險之探討〉，《經濟研究》，第 13 期，2012 年，頁 525-553。

劉昌黎，2006。〈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新發展及其原因分析〉，《東北亞論壇》，第 15 卷第 6 期，頁 71-77。

（三）研討會論文

陳德昇，〈台日商策略聯盟：市場機遇與競合挑戰〉，發表於「FTA、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角色：機會與挑戰研討會」。（台北：2014 年 5 月），頁 5。

童振源，2005/9/6-7。〈促進台日經濟合作戰略夥伴關係〉，「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東京。頁 1-10。

（四）網路資料

中央銀行，2012/10/25。〈UNCTAD 發布全球投資趨勢監控報告〉，《中央銀行》，〈<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210269453471.pdf>〉。

商務部外資司，2015/1/22。〈2014 年 1-12 月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快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http://www.fdi.gov.cn/18000000121_33_4500_0_7.html〉。

彭連漪，2012/5。〈台灣輸掉第一回合，未來還有許多硬戰〉，《遠見雜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0010.html〉。

溫芳宜，2013/11/1。〈中國大陸內需政策變化探討〉，《經濟部全球台商 e 焦點》，〈<http://www.twbusinessnet.com/epaperArticle.do?id=241762304>〉。

劉國泰，2014/1/17。〈開啟變革，航向永續〉，《天下雜誌》，〈<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5402>〉。

蔡宏明，2012/8/6。〈台日產業合作契機〉，《產業雜誌》，〈<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108-509-7>〉。

經濟部，2015/2。〈陸韓 FTA 議題直擊〉，《經濟部工業局》，〈http://ecfagoods.tw/?page_id=19318〉。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2。〈日本瑞穗金融集團〉，《投資台灣入口網》，

〈 <http://investtaiwan.nat.gov.tw/chs/show.jsp?ID=5225&MID=5> 〉。
經濟部投審會，2014/12。〈 103 年 12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速報〉，《中國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 <http://www.moeaic.gov.tw/> 〉。
魏聰哲，2014/8/1。〈 日商對台投資歷程與趨勢分析〉，《經濟部全球台商 e 焦點》，
〈 <http://twbusiness.nat.gov.tw/epaperArticle.do?id=256868355> 〉。

二、英文部份

（一）網路資料

Shingo Ito, 2005/2. “The Surge of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Utilizing Taiwanese Managerial Resources,”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 <http://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rp/MRP0502.pdf> 〉。

場次三：

日本社會與其他

日本動畫的數位化發展與聖地巡禮：

以京都動畫與 P.A.works 為例

壹、前言

2015 年 2 月 20 日朝日新聞社報導了東京都內歷史悠久的神田神社境內出現了許多過往少見的年輕參拜者，而這些過往所未見的新面孔與 2014 年於日本播放的電視動畫《Love Live!》有極大關連。故事描述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的一所高中面臨廢校危機，就讀中的 9 位女高中生為了挽救頹勢，嘗試透過成為偶像歌手來吸引學生入學；其中 1 位女主角東條希在設定中偶爾會在神田神社擔任巫女的打工職務，以此為契機許多動畫迷們因此視神田神社為「聖地」而前往參拜，並奉納許多有該角色塗鴉的繪馬。神社方面也順勢與相關業者合作，不僅宣布東條希為神社的官方偶像，也推出如繪馬和護身符等週邊商品；更甚至由神田神社主辦，被視為日本三大祭典的「神田祭」也與《Love Live!》合作推出宣傳海報。

事實上神田神社並非個案，而是諸多「動畫聖地巡禮」（アニメ聖地巡礼）現象的冰山一角，山村高淑定義動畫聖地巡禮為「動畫迷將動畫作品的描繪地點乃至於與作品或作者相關的地區視為聖地，將其找出並實際前往探訪」²⁴¹。雖然過往也有許多如漫畫、小說、電視連續劇或電影等不同媒體所引發的文化觀光（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但是聖地巡禮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與近年來逐漸受到日本產業與社會重視的御宅族（オタク）現象有所關連外，在和過往的影視觀光相比較中也可以發現許多不同之處。

但是值得注意的，聖地巡禮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東京都，但是近年來被學者和大眾傳播媒體所關注的案例，例如埼玉縣久喜市、石川縣金澤市和滋賀縣犬上郡豐郷町等地，皆是人口相對大都市較為稀少的地方自治體。為何如此？筆者以為這與做為引發契機的「日本動畫」有高度關連，而其產業發展的脈絡是如何的影響了聖地巡禮的出現，這是筆者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而聖地巡禮現象的案例相當複雜，本文作為案例討論的分別是京都動畫公司與 P.A.Works 兩家分別立足於京都府和富山縣的動畫製作公司。京都動畫創辦於 1981 年，因設置於京都府宇治市因而得名，原先為其他動畫公司的下游承包廠商，但在 2000 年代開始獨立製作電視動畫並因高水準的作畫品質而聞名²⁴²。從 2005 年開始以每年一部的頻率推出電視動畫作品，多半都能得到良好的

²⁴¹ 山村高淑，〈観光革命と 21 世紀：アニメ聖地巡礼型まちづくりに見るツーリズムの現代的意義と可能性〉，北海道大学観光学高等研究センター文化資源マネジメント研究チーム，《CATS 叢書 Vol.1 『メディアコンテンツとツーリズム』》（北海道：北海道大學，2009），頁 9。

²⁴² 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学会，《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入門》，（東京：古今書院，2014），頁 12-13。

市場反應，而且在作品中積極的使用京都府與週遭縣市的地貌風景，也成為許多地方媒體報導的對象。P.A.Works 則是創立於 2000 年，創辦人崛川憲司因為遵守家族的約定而回到故鄉發展，卻找不到相關的動畫工作而決定創辦自己的動畫公司，除了與東京地區的動畫公司合作承製外，2008 年開始也開始獨立製作電視動畫作品，其作品中經常使用日本越中地區的風景，引發了許多聖地巡禮現象²⁴³。這兩間公司獨立於東京地區以外，以地方都市為依據而創造出許多市場評價極高的電視動畫作品，京都動畫在 2007 年《幸運星》的推出首度展示了聖地巡禮與社區營造合作之間的可能性，讓聖地巡禮一躍成為廣受注目的觀光現象，往後幾年的作品也都為其拍攝地點帶來許多變化，而 P.A.Works 在 2011 年的《花開物語》成功與地方溫泉區合作，不僅是淺層的商業活動，更首次創造出與地方居民深入交流的新祭典，因此以這兩家動畫公司的發展和作品來討論近年來聖地巡禮現象有其代表性。

貳、 動畫聖地巡禮的歷史發展與特徵

一、何謂「聖地巡禮」

回顧日文的「聖地巡禮」（聖地巡礼）一詞，按岡本亮輔的定義為「宗教創始者與聖人的誕生地或埋葬地等與其生前有關場所；或者是神明或精靈等存在有關場所之旅行」²⁴⁴。例如在日本有巡迴由弘法大師所創建的寺廟之旅行，稱為四國遍路（四国遍路），或是江戶時代流行經由東海道前往伊勢神宮參拜等，原來是與宗教目的相關的詞彙。但是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動畫產業逐漸發展，特別是在 1990 年代左右有許多電視動畫出現了與實際景物相關的描繪，像是 1994 年播放的電視動畫《美少女戰士》之中便與東京都麻布十番的冰川神社有所連結，吸引了觀賞後的觀眾前往該神社參拜觀光²⁴⁵。而在神社之外也有許多跟宗教毫無關聯的民宅、校園和車站因為在動畫中出現，也開始被動畫迷們視為「聖地」，而前往這些聖地觀光的活動則就被稱為「聖地巡禮」²⁴⁶。

二、京都動畫與 P.A.Works：與社區營造的結合

按筒井隆志的調查約略在 2008 年開始有關「聖地巡禮」的關鍵詞開始在國會圖書館的資料庫中大量出現²⁴⁷。回顧相關的學者研究，筆者認為這與在埼玉縣久喜市因電視動畫《幸運星》（らき☆すた）所引發的動畫聖地巡禮現象有關。最初為角川書店出版的月刊雜誌《Comptiq》（コンプティーク）上所連載的四格漫

²⁴³ 同註 2，頁 7-10。

²⁴⁴ 岡本亮輔，《聖地巡礼》，（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頁 6。

²⁴⁵ 大石玄，〈アニメ《舞台探訪》成立史-いわゆる《聖地巡礼》の起源について〉，《釧路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紀要》，第 45 號，2012 年，頁 43。

²⁴⁶ 由谷裕哉，佐藤喜久一郎，《サブカルチャー聖地巡礼—アニメ聖地と戦国史蹟—》，（東京：岩田書院，2014），頁 22。

²⁴⁷ 筒井隆志，〈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の新たな方向性～地域活性化の手法として～〉，《經濟のプリズム》，第 110 卷，2013 年 3 月，頁 11。

畫，故事內容主要描述以 4 位女高中生為核心，分別是喜好動畫、漫畫與遊戲的泉此方；做為友人的雙胞胎姊妹柊鏡與柊司；品學兼優但個性有些脫線的高良美幸等人與週遭朋友們互動的平淡日常生活。電視動畫版本由京都動畫公司製作，總共 24 話於 2007 年 4 月到 9 月在日本各地的電視台播放。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登場人物的柊家姊妹在故事中設定住在虛構的「鷹宮神社」之內，在新年等特別的節日時期會以巫女的身分幫忙。而在電視動畫版本的當中，鷹宮神社則是以埼玉縣久喜市的「鷺宮神社」為藍本描繪，此外在動畫的片頭中也精細的再現了久喜市和鷺宮神社週遭的景觀。

山村高淑的調查研究將《幸運星》所引發的動畫聖地巡禮按主導者的差異分為整備期、動畫迷主導、角川商店主導、商工會主導與地域主導等 5 個階段²⁴⁸。首先遠在動畫開始於電視上播放之前，鷺宮神社前原有百年歷史的古老民宅，因鷺宮神社雖然有許多的參拜旅客，可是當地缺乏能給予停留休息的場所，因此商工會以預算約六百萬日幣，於 2005 年將民宅改建為商工會直營的「大西茶屋」，往後這間茶屋成為商工會在推行相關政策和商品的重要據點。

隨著動畫播放之後，雖然片頭中有關鷺宮神社與久喜市的畫面僅僅出現了數秒鐘，但依然有許多熱情的動畫迷從中發現相關線索，並且推斷出確切位置，以此為契機前往鷺宮神社進行參拜與觀光。而在 2007 年 8 月角川書店出版的雜誌上介紹了做為《幸運星》描寫藍本的鷺宮神社，前往參拜的動畫迷更是快速的增加，並且在神社內供奉了許多畫有故事中 4 位主角塗鴉的繪馬，也會拍攝許多與動畫片頭相同取景角度的照片。這樣不同於傳統參拜旅客的行為模式，透過網路傳播引起了地方人士與商工會人員的注意，而商工會內 2 位年輕的經營指導員開始考慮在大西茶屋內販賣鷺宮神社相關的紀念產品，並進一步於網路的相關討論板上與動畫迷們進行交流討論，最終推出了印有「聖地巡禮」字樣的饅頭放在大西茶屋內販賣，1 週的銷量約略五十個²⁴⁹。

自行推出的土產品獲得初步成功後，商工會開始嘗試與擁有版權的角川書店合作，2007 年 12 月推出了邀請的漫畫作者與動畫配音員們前往大西茶屋舉辦與動畫迷共進早午餐並參拜鷺宮神社的企劃，這次活動吸引了多達 3500 人參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人數眾多，但當地民眾的投訴案件卻僅僅個位數，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地方居民對於來參加活動的動畫迷相較過去一般的參拜旅客更加遵守規範與富於禮貌感到驚訝²⁵⁰。

12 月的合作企劃取得高度成功，而且吸引了如 NHK 等大眾傳播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成功打開全國性的知名度，從這時候開始到隔年的 3 月，商工會與地方商店開始積極開發各類週邊商品，諸如畫有角色圖樣的繪馬商品、明信片和食品等等，皆推出後便銷售一空。但是商工會也意識到單靠商品販賣並不足以維持中

²⁴⁸ 山村高淑，〈アニメ聖地の成立とその展開に関する研究--アニメ作品「らき☆すた」による埼玉県鷺宮町の旅客誘致に関する一考察〉，《国際広報メディア・観光学ジャーナル》，第 7 卷，2008 年，頁 149。

²⁴⁹ 同註 8，頁 152。

²⁵⁰ 同註 8，頁 153。

長期的發展，如何將《幸運星》所帶來的觀光人潮與長久的社區營造相結合，成為商工會所考量的重要目標。往後工商會開始積極開拓各類以動畫迷為目標的活動與服務，諸如定期舉辦各種聚會並邀請動畫配音員前往當地，不僅僅是《幸運星》的觀眾，更擴大到所有的動畫迷們。此外地方商店街原有定期舉辦抬著神轎繞行神社週遭的「土師祭」活動，該祭典舉辦方也在 2008 年時積極的邀請這些動畫聖地巡禮的參訪者們，推出了畫有《幸運星》角色圖樣的「幸運星神轎」(らき☆すた神輿)，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動畫迷，往後也成為該地區的例年活動之一²⁵¹。

從數據上看，鷺宮神社的新年參拜人數從 2007 年的約十三萬人次，到了 2008 年長到約三十萬人次，2009 年達到約四十二萬人次，往後直到 2015 年的數據為止都呈現相當穩定的成長，而且即便不再舉行特殊的活動，參拜人數也沒有下滑。相較於過往的影視觀光，例如 NHK 大河劇為地方帶來的觀光效益來看，鷺宮神社因《幸運星》而帶來的觀光人潮，不僅不因為動畫的播放結束而消失，甚至還能持續帶來更多的動畫迷前往當地，成為人數雖然不多，但卻非常穩定的觀光效應²⁵²。

作為分水嶺，雖然在《幸運星》的成功之前，已經有許多聖地巡禮的案例發生，例如同樣是京都動畫製作的《涼宮春日的憂鬱》，在動畫內大量描繪了兵庫縣西宮市的景色，也吸引了許多動畫迷前往朝聖，有部分動畫迷甚至會穿著與動畫角色相同的服裝進行觀光，而其知名度之高，連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網站也設立專頁介紹。但是《涼宮春日的憂鬱》的案例並沒有如同《幸運星》一般，地方的商工會和居民能深入參與，進而影響了當地的例行活動乃至於自我認同。而從《幸運星》與鷺宮神社之間的合作開始，京都動畫開始更積極地與地方自治體合作。2009 年製作的電視動畫《K-ON！輕音部》，故事描寫 5 位女高中生組成校園樂團，作為背景藍本而被描繪的滋賀縣犬上郡豐鄉町，其町內原來處於廢棄的豐鄉町小學校舍，因此而獲得再次利用的機會。2012 年改編自米澤穗信原著小說的《冰菓》也重現了岐阜縣高山市水無神社的傳統祭典。2013 年的《玉子市場》則是以京都府京都市的出町商店街為重要故事舞台。

而位於日本富山縣的 P.A.Works 創立於 2000 年，於 2008 年推出首部電視動畫作品《真實之淚》(true tears)。該作品改編自同名電腦遊戲，其忠實重現了富山縣南礪市的街景與自然風光，也如同《幸運星》一般有動畫迷因此希望當地的觀光協會能放置巡禮筆記於 JR 城端車站，此外地方的商工也與 P.A.Works 合作開發了許多週邊商品。但是讓 P.A.Works 打開知名度的則是 2011 年所製作的電視動畫《花開物語》，故事講述女主角松前緒花前往外婆的溫泉旅館工作遭遇了許多邂逅與困難進而克服成長，該作品與石川縣金澤市的湯湧溫泉合作，不僅背景皆取材自實景樣貌，相關出場的角色姓氏也以石川縣內各區域命名。同時

²⁵¹ 岡本健，《マンガ・アニメで人気の「聖地」をめぐる一神社巡礼》，(東京：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2014)，頁 17。

²⁵² 同註 11，頁 15。

P.A.Works 也與能登鐵道合作，在西岸車站增設了動畫中虛構的「湯乃鷺」車站牌，也將部分班次的車內廣播聲音改由動畫的配音員錄製²⁵³。

《花開物語》最值得注意的是與湯湧溫泉觀光協會合作，將故事中虛構的雪洞祭（ぼんぼり祭り）搬上了現實世界中。2011 初次舉辦便有約 5 千人參加。從數據上來看，該年度即便發生了日本 311 大地震，整體的觀光人數依然達到 62261 人次，成長了 7.4%。而且不同於前述鷺宮神社的聖地巡禮屬於自然發生型，P.A.Works 在製作《花開物語》是便有強烈的社區營造意識。例如雪洞祭的舉行，為了避免淪為僅僅舉辦一次的短期活動，而是能夠由湯湧溫泉的地區居民自力舉辦的長期例行事務，在辦理的規模上便刻意的避免過度盛大，但即便如此也吸引了對當地而言相當龐大的觀光人潮。而且特別的是也不同于前述《幸運星》與土師祭的合作僅僅是地方商圈基於吸引外來觀光客的合作，雪洞祭不僅由當地的神職人員，參與的地方居民也表達了即使動畫迷們不再前來也要持續舉辦下去，讓它成為地方例行事務的想法，至 2015 年 9 月為止已經連續舉辦 4 屆。

隔年 2012 的電視動畫《Another》則是將南礪市的福野高中、巖淨閣和福野車站等地都作為背景而使用。2012 的《taritari》則是使用了江之島週遭的風景。2013 年的《有頂天家族》則是京都。

三、從案例來看聖地巡禮的結構特徵

（1）地理位置分布

按網站「聖地巡禮地圖」（聖地巡礼マップ）所提供的統計數據來看，動畫聖地巡禮的景點高度集中於東京都，大約占了全數的八成以上。但是回顧京都動畫與 P.A.Works 的作品來看，京都動畫於 2000 年後除了《幸運星》以埼玉縣為主之外，其餘皆和日本關西地區的地方自治體合作。而 P.A.Works 則是多以富山縣和石川縣為背景。不過再深入來看的話，位於東京都內的聖地巡禮景點，多半重複集中於車站和其週遭地區。

（2）動畫類型

不論京都動畫或是 P.A.Works 的作品而言，能夠引發聖地巡禮效應而受到媒體與學者關注者，其最大的共同特徵便是皆為電視動畫。也就是 1 週 1 回、1 話 30 分鐘的形式於日本各地方電視台乃至於全國性的電視頻道上播出。京都動畫的作品中，被認為有引起聖地巡禮效應而受到媒體或學者關注者，《涼宮春日的憂鬱》（2006）、《幸運星》（2007）、《冰菓》（2009）與《玉子市場》（2013）等 4 部動畫而言，雖然播放時間因各地區電視台而有所不同，但皆於深夜 24 時至隔日凌晨 3 點之間播放。P.A.Works 的 4 部動畫作品，分別是《真實之淚》（2008）、《花開物語》（2011）、《Another》（2012）與《有頂天家族》（2013）等，除了《花開物語》主要於晚間 10 點之外，其他也大致分布於深夜 24 時至隔日凌晨 3 時間之間播放，與京都動畫的作品相當。

（3）「巡禮者」的組成

²⁵³ 同註 2，頁 7-8。

岡本健曾針對鷲宮神社週邊地區與豐鄉町兩處的巡禮者進行調查。首先是性別以男性為多數，佔 90.6%。年齡層而言，20 至 30 歲的族群佔了 48.6%，而放大到 10 至 40 歲來看的話，則超過 9 成以上。有關情報來源方面，約略半數為透過網際網路，2 成為依靠他人的告知。

從行為模式來看，由谷指出巡禮者的最大特殊性是「大量反復地前往聖地」，從各個動畫聖地的筆記本的留言中可以發現，前往聖地超過 100 次以上的巡禮者大有人在²⁵⁴。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10 至 40 歲的男性為最主要組成份子，而且看似與日本的御宅族文化之間高度關連性，但從各地筆記本的紀錄來看，也不乏高年齡層的觀眾和低年齡層的幼兒進行巡禮活動，而性別上來說，雖然《花開物語》中以女性角色居多，看似以男性觀眾為主，但也是存在著年輕女性前往湯湧溫泉進行巡禮的案例²⁵⁵。

其觀光行為中較為特殊的兩點，第一是反復前往特定的聖地巡禮景點，例如《幸運星》在鷲宮神社留下的繪馬上都可以看到許多參訪超過一百次以上的巡禮者，而這點在《花開物語》和湯湧溫泉之間也能發現類似的參訪者。第二則是巡禮者慣於在當地的神社內留下許多畫有角色圖樣之繪馬，在動畫迷之間常戲稱為「痛繪馬」。而且從岡本健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許多巡禮者也樂於提供自身的想法來改變前往觀光的地區，比如說鷲宮町商工會所舉辦的各類活動，都有動畫迷提供了許多企畫支援，甚至做為義工參與活動的舉辦。而在《K-ON！輕音部》與豐鄉町，也有巡禮者因此影響了當地的交通標誌的案例²⁵⁶。

肆、日本動畫產業的結構特徵與數位化發展

一、戰後日本「電視動畫」的誕生

1945 年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指示下，以政岡憲三、山本早苗與村田安思等人為核心的近百人團隊於東京成立了「新日本動畫社」。之所以能在百廢待舉的戰後日本成立如此龐大的公司，實是因為美軍了解動畫所能帶來的政治宣傳效果，因此有意識地動員了散落於日本全國的動畫製作者。但是礙於原來本是各自為政的創作者們並不習慣集中管理，新日本動畫社在幾乎沒有任何成果的情況下於 1947 年解散，政岡憲三等人在同年另外創立了「日本漫画映画社」。但是該公司也因經營不善很快便破產，1948 年透過東寶的資金援助，政岡憲三與山本早苗在東京新宿區成立了「日本動畫」，日本動畫隨後在 1952 年吸收了東寶的相關企業並改名為「日動映画」，最終在 1956 年 7 月以東映的委託案件為契機被納入成為東映教育映画的子公司，更名為「東映動畫」。1958 年東映完成了

²⁵⁴ 同註 6，頁 28-31。

²⁵⁵ 同註 6，頁 34-38。

²⁵⁶ 岡本健，〈アニメ聖地巡礼と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遠藤英樹、寺岡伸悟、堀野正人，〈観光メディア論〉，（京都：ナカニシヤ，2014），頁 173。

第一部彩色長篇動畫電影《白蛇傳》，隔年推出第二部作品《少年猿飛佐助》，1960年以手塚治蟲的漫畫原作改編，推出第三部長篇動畫《西遊記》²⁵⁷。

以《西遊記》為契機，手塚治蟲在合作中學習動畫製作的相關技術，並於1961年在東京都練馬區成立「手塚動畫製作公司」，隔年更名為「蟲製作公司」。1963年蟲製作推出首部電視動畫《原子小金剛》，雖然當時已經有自外國引進的電視動畫，大致為每話5到10分鐘，並且每天放映1回；而《原子小金剛》卻嘗試了過往未有的「每週1回，1話30分鐘，連續放映」之播放型態。但是每週長達30分鐘的動畫長度，對於才剛創立的蟲製作而言在製作時間和成本上皆面臨了極大考驗，以當時迪士尼的製作標準而言，30分鐘的動畫長度大約要15000張左右的動畫張數。但是手塚治蟲同樣長度的動畫作品僅僅使用十分之一的數量，也就是1500張而已。這種「省力化」的策略，不同於迪士尼重視作畫品質，強調動畫的動感與豐富的視覺體驗，而在題材上以結構單純的音樂劇和童話故事為主；手塚為首的日本動畫家採取了在動態表現上省略，但是更加注重故事性與世界觀的製作方向²⁵⁸。

日本動畫史的研究者津監信之認為手塚治蟲的嘗試為日本動畫產業帶來了4項重要影響。首先是他所開設的蟲動畫製作，培養出了往後的日本動畫製作人才，如執導成為日本機器人動畫基盤的《機動戰士鋼彈》的富野由悠紀，《小拳王》的出崎統等人都曾經在蟲製作中工作；第二是確立了日本電視動畫「每週1回，1話30分鐘，連續放映」的播放模式，這樣的模式為往後的日本電視動畫所遵循。第三是為了維持每週緊迫的製作量，在質上面做出犧牲，採行大量削減製作張數的「省力化」策略，並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驗證了在日本動畫市場的可行性。最終則是跨媒體的製作模式，《原子小金剛》本來已是相當知名的漫畫作品，也因此動畫播映之前便能確保有相當數量的漫畫讀者做為潛在觀眾，降低了電視播映的風險。而往後手塚治蟲也持續的繪製了許多長篇漫畫，為蟲製作提供了穩定的改編材料，從《原子小金剛》開始，將「廣受歡迎的漫畫改編成電視動畫」之慣例依然為現今日本動畫產業所遵循。但是電視動畫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是其資金來源，不僅在動畫本身上必須採取徹底的省力手法，在動畫之外也不得不積極地開發動畫角色的商品價值以尋求贊助者，如《原子小金剛》便與明治製菓合作，因當時電視台僅提供每集55萬日幣的製作費，但是蟲製作方面卻推測每集的成本需要150萬日幣左右，單純依賴電視台的資金來源根本無法維持動畫公司的營運，從最初開始赤字壓力便是不得不面對的課題，因此除了透過電視台的資金來源之外，也必須積極開發週邊商品的合作以擴大收益來源。

從手塚治蟲的成功開始，日本電視台與其他動畫製作公司開始意識到電視動畫的潛在價值，即便是過往專門製作在電影院放映的長篇動畫的東映動畫都開始跨足電視領域，隨著各個電視台與動畫公司積極開發電視動畫市場，電視動畫逐

²⁵⁷ 山口康男編，《日本のアニメ全史：世界を制した日本アニメの奇跡》，（東京：テン・ブックス，2004），頁64-70。

²⁵⁸ 同註17，頁76。

漸成為日本動畫產業最主要的製作模式。以 AJA 的產業調報告來看，2002 年至 2014 年的日本動畫市場的收益大約是每年 1 兆 4 千億日圓左右；以 2005 年為例，市場總值約在 1 兆 3 千億日圓，電視動畫就佔了 5200 億日圓，而電影院放映的長篇動畫僅 178 億日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體動畫的相關權利商品收益高達 5000 億日圓，可以說電視動畫與其週邊商品的販賣構成了日本動畫產業最主要的收益來源。

二、日本動畫產業的聚集現象

隨著電視動畫成為日本動畫產業的主要製作對象後，每週 30 分鐘長度的製作壓力對動畫產業帶來外包分工的改變。半澤誠司在 2001 年所進行的研究調查指出，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成立的日本動畫製作公司在設立地點上高度集中於東京都內，約佔日本全國總數的百分之 80。為何如此？這與日本動畫製作的分工流程和電視動畫做為產業大宗這兩者有高度關連。日本的動畫製作從企畫階段到最後的成品出貨，甚少由單一公司來完成，而是慣於在不同階段外包給下游的動畫製作公司，形成了垂直的分工體系。這是因為電視動畫基本上仰賴電視台的資金和版權供給，使的每一年度的作品數量相當不穩定，而且主題上有各種各樣的變化，因此對於動畫製作公司而言，所需要的人力和技術在每一次的合作上都各有不同，如果全部都由單一公司內部製作的話，必需雇用大量的人力和購置相關器材，還必須面臨淡季時的閒置問題。相對而言將動畫各階段工作外包給專門的製作公司和契約制的自由工作者，則可以避免過度的投資造成營運成本過高的風險。例如即便是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東映動畫，在跨足電視動畫的初期也面臨了內製化的策略造成人力成本過高，最終也選擇了外包的分工體系，僅保留 2 成的工作在東映動畫內部完成。

此外雖然採取內製化的策略對於提高作畫品質上有所幫助，但是對於以承攬電視動畫案件為主的日本動畫產業而言，製作速度的提高遠比品質更重要，1 週 1 回的播放形式，對於製作方而言是極大的時間壓力，舉例而言，在 1963 年時 1 部在電影院播映的劇場版動畫所需要的原畫數大約是 75000 張，其製作時間為 18 個月左右，而電視動畫則是一週需要 3000 到 4000 張不等。也因此時間壓力成為動畫公司之間在分工合作上時，必須要考量彼此的物理距離，形成了動畫公司的開設地點在交通條件上都相當鄰近²⁵⁹。

最終則是日本的動畫製作上也相當重視業界人士之間的情報流通之故。這是因為動畫製作上關於導演、演出或是各領域的專業人才，其能力的差異對於一部動畫的製作成功與否有極大影響，比如其畫風和擅長的故事類型等，也促使著動畫製作產業的聚集現象。最後則是有關於電視台的影響，日本的電視台相對於中小企業為主的動畫公司掌握了作品的版權收入和製作費用的提供，對於動畫公司可以說是握有生殺大權，而日本的電視台除了一部分位於關西地區以外，其營運

²⁵⁹ 半澤誠司，〈東京におけるアニメーション産業集積の構造と変容〉，《經濟地理学年報》，第 47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 31 日，頁 64-65。

中心皆設立於東京都內，在數位化尚未普及的階段，特別是在企畫階段上往往需要與電視台方面進行密集聯繫與溝通，也促使了動畫產業必須集中在東京都內。這點即使是現今立足於東京都以外的動畫公司如京都動畫和 P.A.Works 等也必須在東京地區開設辦公室以便溝通。

三、1990 年代開始的數位化進程

但是本文所提及的案例，京都動畫與 P.A.Works 分別將製作部門設置於遠離東京都的京都府和富山縣；之所以能不受到因距離而產生的成本壓力影響，這與日本動畫產業在 1998 年以東映動畫為首的數位化發展有關。事實上早在 1970 年代初期，東映動畫便已經有發展數位化製作的意圖，但是當時整體的開發成本過高，數位化的進展並不順遂²⁶⁰。直到 1990 年代，電腦技術的普及才使得數位化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數位化製作的最大影響便是節省了龐大的實體成本。過去使用賽璐璐片製作動畫，每一集達數千張的畫片對於保存和運輸上來說都有相當的難度，而改採電腦製作數位版本的原畫後，不僅製作上的容錯率提高，在將相關半成品外包給下游公司時也省去了實體運輸的時間成本，僅需透過網路傳輸數位資料即可。此外數位化之前進入最後的攝影階段時還需送到專門的成像所，往往需要一天以上的時間才能確認最終成品，但是數位化後當天便可以檢查²⁶¹。製作成本和時間大幅度下降的結果，也讓動畫製作公司有餘力提高製作的品質，能更加精細的描繪背景乃至於在企劃構思階段更審慎地架構動畫的故事內容與世界觀。

數位化製作的發展讓動畫公司不再有非得將製作部門設立於東京都內的壓力，而且隨著日本動畫的觀眾年齡層提高，對於作品的表現品質也有更高的要求，這也讓原本以重視削減成本為最高考量的動畫製作公司，有了重新檢討內製化的誘因。以京都動畫為例，不仰賴外包分工而是將演出、作畫、美術、攝影和數位特效等等動畫製作的各個階段都由內部人員自行完成，在動畫的製作品質上得到極大的成長，每年所推出的電視動畫作品在市場上都獲得良好的評價，而 P.A.Works 近年來也積極的發展內製化，透過內製化提高整體的製作品質，從而強化作品在商業動畫市場上的競爭力。而且如增淵敏之所提及，數位化的發展讓動畫製作不再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如近年來倍受矚目的動畫導演新海誠，其作品儘管製作人數極少，甚至全由個人單獨製作，但依然能以極端細膩的背景描繪而聞名。也有許多原來在東京工作的動畫人才，回到自己的家鄉發，將動畫作品與地方特色相結合。如今的日本動畫產業從最初東京寡佔的狀態開始走向分散地方的發展，這都與數位化帶來的製作成本與門檻的降低有關。

伍、日本動畫產業對聖地巡禮的影響

綜合前兩章的討論，在此筆者將嘗試論述日本動畫產業的結構對於下列 3 項

²⁶⁰ 同註 17，頁 131-134。

²⁶¹ 同註 17，頁 134。

動畫聖地巡禮之特徵有何關連？又是如何影響？

- (1) 「聖地」的地理位置分布
- (2) 引發聖地巡禮的動畫類型
- (3) 巡禮者的組成

其中有關(1)和(2)兩者，筆者以為這其實有高度關連，在此將一併論述之。從第二章的介紹可以了解到，日本動畫產業的收益來源上，有極大比重來自於電視動畫的播放，而現今日本的主要電視放送組織，皆以東京都為主要立足點。而在動畫的製作改以數位化流程與網際網路普及的1990年代之前，任何動畫公司的開設都必須考量到實體運送的時間成本，以及與握有版權的電視台之間的協調方面來看，地理條件來說與電視台聯絡窗口越遠則成本越高，此外電視動畫製作具有高度的分工性，甚少有公司能夠從企劃到最終成品流程都能單獨製作，極便條件上允許，在降低製作成本和電視動畫的高時間壓力的考量下，專業分工的走向成為必然。而日本動畫產業不同於如美國通常採取明文契約形式，對於相關合作的公司，往往採取不成文的口頭協定與透過私人網路之間獲得幫助，而這樣重視人際關係網絡的分工模式，也強化了各個動畫公司高度集中於東京的取向。在此背景下，每週播放1回的電視動畫，對於製作上的時間壓力實則非常急迫，按岡本健針對相關產業人士的訪談，為了便於製作，比起憑空想像的背景，按照實物照片來描繪事實上更為容易，而多數的動畫公司都立足於東京都的背景下，也形成了動畫聖地巡禮的景點有大量來自於東京都地區。

而回顧京都動畫和P.A.Works兩家公司，可以發現其推出的動畫作品描繪的背景都與其製作部門所在的地區週邊有關，如京都府、滋賀縣與金澤縣等地。對於京都動畫而言，《幸運星》的成功顯然對於其往後的製作有高度影響，在此之前的《涼宮春日的憂鬱》雖然已經有些許成效，但僅止於動畫迷前往拍照觀光的程度，缺乏廣告和實質的經濟效益。而對面臨人口結構失衡問題的地方自治體而言，積極的與動畫公司合作不僅能帶來觀光收益，也透過地方動畫產業的發展帶來財政上的挹注。而且從另一點來看，這或許也與大眾傳媒對於題材選擇上的關注有關，從大河劇的資料來看，原來便是重要觀光景點的地區，所能提升的觀光效益便顯得有限。而對於媒體而言，要能吸引讀者的目光，比起報導原來就已經為人所熟知的都會地區，介紹一個原來沒沒無聞的地方突然出現大量的觀光人口更有新聞價值。這些因素綜合來看，京都動畫選擇了許多過去並非非常有名的地區作為描繪地點有其商業上的合理性。而P.A.Works在許多公開言論上則是從不掩蓋其對於與地方產業和社區進行合作的興趣，其創辦者本身就是富山縣出身，對於位家鄉盡一份心力的意識相當強烈，《幸運星》所展現的社區營造效應，在《花開物語》之中也能發現類似特徵。

而另外一點則是帶有高度日本特色的「御宅族」文化問題。巡禮者的組成上可以發現，以年輕男性居多的特色是相當顯注。而也非常容易讓人聯想到御宅族的關連性，但是如同由谷所言，中間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²⁶²。曾自稱為「御宅

²⁶² 同註6，頁4-5。

族之王」的岡田斗司夫曾以日本動畫作品的脈絡將日本的御宅族分為三個時期而廣為人知，此外著名的評論者東浩紀也曾提出有關御宅族與後現代的關連性，甚至野村研究所也針對御宅族的消費特性進行了相關討論。但綜合來看，都可以發現有關日本的「御宅族」到底為何這一個問題有許多曖昧模糊的部分，或是從消費習慣定義、或是從自我認同定義，但都無法完整的清楚含括整體，比如野村將漫畫、動畫和遊戲三者的御宅族分開論述之，但東浩紀和岡田斗司夫又顯然認為這三者的差異性相當微小，彼此之間的重疊性極高。不過本文對此曖昧性礙於篇幅則不多加論述。但是回顧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基本上動畫產業的發展與御宅族文化的發展有高度關連，或是更精確而言是電視動畫的發展。電視作為日本最廣泛的傳播媒體，被岡田斗司夫視為三個重要分水嶺的作品，皆是在電視上播映的動畫。電視作為有高度影響力的媒體，許多漫畫作品一但有相當的讀者數量後，為了更進一步擴展收益，皆會改編成電視動畫。而值得關注的是，動畫迷乃至於御宅族而言，二次創作的概念極為重要，從相關的案例中都可以發現，動畫迷對於參與當地的改造相當熱衷，許多聖地巡禮的發展最初皆是因為動畫迷在當地或是大量繪製有角色圖案的痛繪馬，或是在當地的可供觀光客留言的地區留下獨特的符號印記，進而讓這些景色成為另一種的觀光素材，按研究者岡本健所言，其將之稱為「n 次創作觀光」，原來作為消費者的觀光客同時也是創作觀光價值的提供者。

在此尚需提到日本動畫產業在題材來源上的跨媒體傳統，自手塚治蟲以來，從漫畫來提取靈感是日本電視動畫的悠久傳統；首先在企劃階段便能節省構思成本，而且漫畫原作多半已經有相當的讀者基礎，也能降低動畫製作的收益風險。而日本動漫畫產業正如陳仲偉所言，以美國漫畫做比較基準的話，更加強調與讀者日常生活的高度連結，舉凡青年漫畫的島耕作系列、或是武內直子的《美少女戰士》等等，都可以發現日常生活作品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這也構築了在 1990 年代日本動畫產業的製作技術逐漸成熟後，進而使用現實生活的風景的契機。

最終近年來聖地巡禮的發展中，數位化製作的因素舉足輕重。以本文的兩家動畫公司來說，京都動畫近年來積極的開發相關週邊權利商品，也嘗試推出自己的輕小說作品，這都是在試著擺脫受到電視台控制的嘗試。但整體來看還是必須仰賴位於東京的各大電視播放局的委託才能維持營運，而要能在東京以外的地區立足，實體成本的削減就成了必要關鍵，而在數位化的影響下，即便將動畫公司設立在富山縣，也不影響和東京地區的下游公司進行合作。而且在進行動畫背景的取材上，因為較容易進用地方出身的動畫製作人才，也相對有更高意願與地方產業和政府合作，對於地方自治體而言，位於自身轄區內的動畫公司能帶來稅收和工作機會，相對也更願意提供合作。

總結而論，日本動畫產業在戰後漫長的發展中對於聖地巡禮現象的影響依歷史脈絡來看，首先是戰後因手塚治蟲的成功，電視動畫成為日本動畫產業最主要的獲利來源，而電視動畫在製作上要求快速和降低成本，並且因為製作費用多半

來自電視台和漫畫的出版社，因此形成了複雜的外包分工制度，因應分工體系上的時間壓力，也讓動畫製作公司高度集中於東京都內。隨著日本的動畫與漫畫產業逐漸發展成長，出現許多更加複雜和貼近日常生活的作品題材，再因製作時間上的壓力，許多動畫公司開始以現實生活的風景為動畫背景的描繪依據。以此為背景，1990年代開始有初步的聖地巡禮，但是直到2000年代中期以京都動畫為核心，許多聖地巡禮受到日本動漫畫產業所培養出來的獨特迷文化，也就是「御宅族」們的影響，這些動畫迷所擁有的二次創作行為與日本社區營造相結合，形成了如驚宮神社與湯湧溫泉這般改變當地文化樣貌的特殊案例。可以說，近年來作為日本御宅族次文化重要文本的深夜動畫，相關的製作公司在成本考量下一方面大量的使用了東京的風景，但是以京都動畫的成功案例為藍本，許多動畫公司也更積極的與地方政府、工商會乃至於神社等組織合作，促成了聖地巡禮現象的特殊模式與蓬勃發展。

陸、結語

近年來有關動畫聖地巡禮的研究都相當重視透過動畫與社區營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應。首先是相對的低成本，不同於過往如電影或電視連續劇所帶來的影視觀光效應需要投資高額的成本來維護相關設備與規劃宣傳活動，從動畫聖地巡禮的成功案例來看都僅需相對低額的成本，甚至是利用現地已有的設備。更甚者，過去被視為毫無觀光價值的如廢棄校舍等，都能透過動畫作品的描寫產生過往未有的觀光價值。而且不如於電視連續劇帶來的觀光效應往往僅能在播放期間維持，驚宮神社和湯湧溫泉的案例都顯示了可能人數不如電視連續劇般的龐大，但是卻能在低成本的前提下維持數年之久，並且真正深入社區之中，進而改變地區的自我認同與文化塑造。

而能夠產生這樣特殊的社區營造效應，與日本動畫產業因數位化而帶來的向地區擴散有極大關連。從本文所論及的聖地巡禮分布地點即可發現，動畫的背景描繪與動畫公司的設置地點之間有相當大的關連，如今日本商業動畫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相對於設立在東京都地區的動畫公司，如本文案例的京都動畫和P.A.Works，對動畫公司而言最重要的製作人才其流動率較低，也能建立更穩定的企業內部教育體系。同時數位化的發展帶來的成本降低，也重新為動畫內製化帶來可能性，內製化強調組織內部綿密的溝通帶來製作品質的提升，也讓動畫作品的市場評價提高，進而影響其作品所能帶來的觀光效應。

聖地巡禮現象的發展對於動畫公司和地方自治體而言皆能得利，動畫公司首先能透過實景的描繪降低製作時的構思成本與時間壓力，而與過往不被視為有較高觀光價值的地區展開合作，也能吸引大眾媒體的關注，連帶的讓動畫作品的曝光度提高，形成綜效進一步提升動畫作品的週邊商品銷售。對地方自治體而言則是能透過動畫來創作過往所未有的觀光價值，而且這樣的觀光效應所需要的成本遠比吸引電視台在該地區拍攝較低，往往是利用現地已有的風景為基礎即可，而且成功的聖地巡禮能夠維持數年之久，較不需擔心投注了大量成本後，隔年卻陷

入不再有觀光客湧入的窘境之中。

總結而論可以說日本動畫產業在戰後的發展以來便強調成本上的削減與製作時的時間壓力，因而產生集中於東京的分工體制，但是這樣的分工系統在 2000 年代以來因為數位化製作的發展而產生變化，許多獨立於各大電視放送網的動畫製作公司開始在東京以外的地區立足，並且與企業所在的地方組織相連結，發展出與地區特色相結合的動畫聖地巡禮效應。

參考文獻

陳仲偉，2009。《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與迷的文化》，台北：唐山出版社。

岡本亮輔，2015。《聖地巡礼》，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遠藤英樹、寺岡伸悟、掘野正人等編，2014。《観光メディア論》，京都：株式会社ナカニシヤ出版。

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学会，2014。《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入門》，東京：古今書院。

岡本健，2014。《n 次創作観光》，北海道：NPO 法人北海道冒險藝術出版。

岡本健，2014。《マンガ・アニメで人気の「聖地」をめぐる一神社巡礼》，東京：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

由谷裕哉、佐藤喜久一郎，2014。《サブカルチャー聖地巡礼ーアニメ聖地と戦国史蹟ー》，東京：岩田書院。

山口康男，2004。《日本のアニメ全史：世界を制した日本アニメの奇跡》，東京：テン・ブックス。

津堅信之，2014。《日本のアニメは何がすごいのか》，東京：祥傳社。

山村高淑，2008。〈アニメ聖地の成立とその展開に関する研究--アニメ作品「らき☆すた」による埼玉県鷲宮町の旅客誘致に関する一考察〉，《国際広報メディア・観光学ジャーナル》，第 7 卷，頁 145-164。

山村高淑，2009。〈観光革命と 21 世紀：アニメ聖地巡礼型まちづくりに見るツーリズムの現代的意義と可能性〉，《CATS 叢書：観光学高等研究センター叢書 = CATS Library》，第 1 卷，頁 3-28。

半澤誠司，2001。〈東京におけるアニメーション産業集積の構造と変容〉，《経済地理学年報》，第 47 卷，第 4 期，頁 56-70。

筒井隆志，2013。〈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の新たな方向性～地域活性化の手法として～〉，《経済のプリズム》，第 110 卷，頁 10-24。

2014/9/10。〈～都道府県別～ アニメ聖地数ランキング〉，《聖地巡礼マップ》，〈<https://seichimap.jp/contents/2014/07/spot-ranking.html>〉。

全球氣候變遷的農業課題與日本環境保護之 國際參與實況研究

李曉佩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鄭淳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在全球化與政治議題多元發展下，氣候變遷和地球暖化對國際社會帶來各種層面的影響逐漸被廣泛討論，此類新興議題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中也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本文探討身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面臨環境保護的迫切性和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性，兩者衡量間如何取捨？以及日本在國際環保公約及碳排放減量實踐時，對中國和美國的規避態度表達不滿立場，此現象可從日本參與京都議定書的態度轉變中觀察得知。

關鍵字：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共同減量機制(JCM)、京都議定書

壹、前言

目前全球生態環境受到不同來源的威脅，又加上全球化的效應，為國際社會的議題帶來多元性，因此國際社會的成員對維護自然環境與永續發展具有共同責任，理應分攤維護公共財的成本。環境保護涉及複雜的技術、科學與道德問題，²⁶³然而要兼顧國內經濟與工業發展的同時，必然會產生國家發展與環境保護孰重孰輕的討論。從 1970 年代開始，關於臭氧層結構破壞帶來不利影響的討論出現，國際間也開始一連串相關的討論，如 1985 年 3 月 22 日，設置以保護臭氧層為宗旨的國際合作基本框架「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簡稱維也納公約)；1987 年 9 月 16 日，在維也納公約的框架下，對於可能破壞臭氧層的特定物質，透過生產、消費及貿易限制，在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中嚴格管制規定，以保護人民健康和環境。²⁶⁴身為八大

²⁶³ Joshua S. Goldstein &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earson, 2012, 10th ed.) p.378.

²⁶⁴ 外務省，〈オゾン層保護（ウィーン条約／モントリオール議定書）〉，2013 年 2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jyoyaku/ozone.html>>。

工業國成員的日本在 1988 年 9 月 30 日也簽署加入維也納公約和蒙特婁議定書，從此成為全球環保的先驅之一。

在此之前，承如前述，身為工業化大國的日本在兼顧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時也必然要做出取捨。日本歷經二次大戰和戰後復甦期後，在 1952 年~1968 年間的經濟發展進入「猛迅發展時期」，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有「黃金六十年代」之稱的盛況，²⁶⁵並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段時間，日本雖然達到戰後以來經濟成長的顛峰，卻也遭受工業污染指控的打擊。日本媒體揭露，許多工業污染和疾病的徵兆早在 1955 年時就曾發現，但是政府始終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改善。²⁶⁶直到 1967 年，日本國會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針對七大汙染項目設定標準，並在通產省的建議下，國會修改原厚生省提出的草案第一條，追加說明—反公害措施必須「與經濟的健全發展不互相牴觸」。²⁶⁷這個時期的日本對國際事務參與缺乏積極度，但這個情況從 1974 年開始有了轉變。

1974 年，國際間爆發石油危機，油價上漲，導致許多日本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紛紛轉向海外投資設廠，因此國際環境變化對日本的影響性逐漸提高。Thomas U. Berger、Mike M. Mochizuki，及 Jitsuo Tsuchiyama 在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 一書中，依據日本的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將日本的外交政策分成三個時期，其中，從 1974 年~1990 年的第二期，為日本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時期，²⁶⁸恰是國際間對環保問題的研究興趣迅速增加的時候，也使日本成為環境議題和國際合作機制的積極參與者。除了國內、外經濟情勢的變化造成日本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外，內政也是使日本對國際事務參與態度轉變的因素之一。從 1982 年 11 月到 1987 年 11 月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期間，將日本從戰後實施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消極、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吉田主義轉變為邁向政治大國的大戰略，並在全球戰略事務上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改變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以符合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²⁶⁹

故本文的研究範圍從 1970 年代至今，觀察日本參與國際事務態度變化，身為工業大國的日本面對全球暖化帶來的種種不利影響，日本政府如何在國家經濟產業發展和各項環境保護公約間抉擇，探討日本對環境保護政策的態度，又如何反應在國內政策上。研究顯示，全球暖化除了導致海氣候異常、極地融冰加速、海平面上升...等外，也會對農業發展造成衝擊，甚至消耗農地的價值。

²⁶⁵ Chalmers Johnson 著，姜雪影、李定健合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臺北市：經濟與生活出版：黎光總經銷，1985)，頁 248。

²⁶⁶ Chalmers Johnson 著，姜雪影、李定健合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頁 344。

²⁶⁷ Chalmers Johnson 著，姜雪影、李定健合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頁 345。

²⁶⁸ Thomas U. Berger, Mike M. Mochizuki, Jitsuo Tsuchiyama,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2007) pp.115-132.

²⁶⁹ 金榮勇，〈日本「橋本主義」下的東亞情勢與互動〉，《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9 期，1997 年 9 月，頁 4。

²⁷⁰而日本的農業發展已臻成熟，技術先進，向來是日本經濟產業發展的重點，但近年除了全球暖化影響農作生產量，也因為 TPP 的關稅制度設計，可能對日本農業造成極大威脅，²⁷¹引發農業發展問題的討論。因此，在這個日本農業發展條件艱鉅的時期，日本政府究竟會選擇符合國際期待的環保政策，或是照顧國內民生經濟的發展政策，以何種態度面對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機制，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貳、氣候變遷

一、氣候變化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 年的統計數據，在 1906 至 2005 年間，全球平均接近地面的大氣層溫度上升攝氏 0.74 度；²⁷²而 2014 年的統計數據全球綜合陸地和海洋的平均溫度在 1880 年至 2012 年之間升高攝氏 0.85 度。²⁷³北極的溫度在過去一百年以相較於世界平均兩倍快的速度增高，1978 年以來衛星數據顯示北極海冰的面積平均每年縮減 2.7%。²⁷⁴1901 年至 2010 年海平面平均上升的速率是 1.7 毫米，此期間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 0.19 米。科學家估計，三分之一的海平面上升是因為溫室效應，另外有三分之一是因為冰川融化而導致。²⁷⁵

圖一：全球平均地表溫度變化圖

²⁷⁰ Robert Mendelsohn, William D. Nordhaus, Daigee Shaw,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agriculture: a Ricardian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Sep., 1994, p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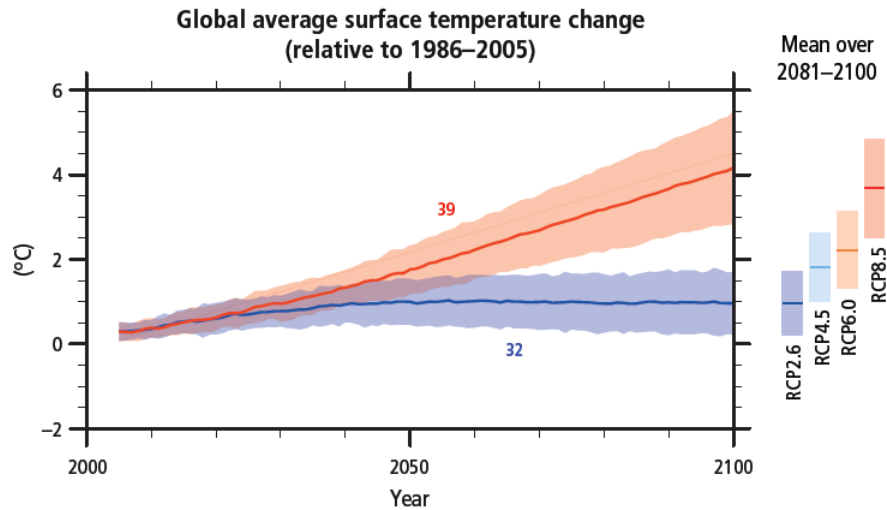
²⁷¹ 根據農林水產的評估，加入 TPP 將使日本農業淨生產值減少 4.1 兆日圓。(李秉璋，〈國益？國損？TPP 引爆日本農業存亡爭議〉，《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4 卷第 3 期，100 年 3 月，頁 97。)

²⁷² 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07, pp.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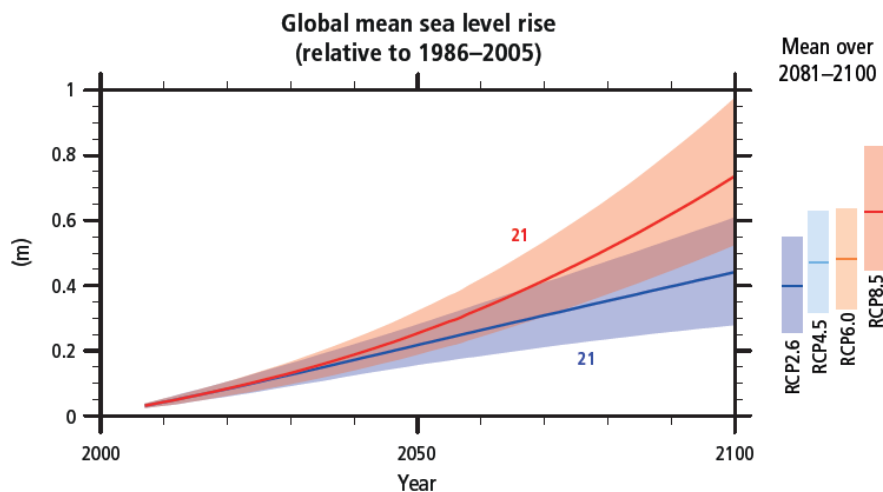
²⁷³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14, pp.2.

²⁷⁴ 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07, pp.7.

²⁷⁵ "NASA: Rising Sea Levels More Dangerous Than Thought," *Jewish Business News*, August 27, 2015, <<http://jewishbusinessnews.com/2015/08/27/nasa-rising-sea-levels-more-dangerous-than-thought/>>



圖二：全球海平面上升圖



資料來源：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14.

這些氣候和溫度的轉變直接影響到農作物的生長和農業的發展。持續的高溫對於小麥、水稻和玉米等在熱帶和溫帶的農作物將有無法適應氣溫而減少產量的狀況產生。再加上全球糧食需求的增加，可再生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的減少，大幅增加飢荒等糧食危機發生的機率。²⁷⁶

二、全球受影響的狀況

全球暖化帶來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因為風速增強和雨量增多，導致颶風形成的機率增加 2-11%，雨量也增加 3-31%；²⁷⁷熱浪也在今年(2015)兩週內奪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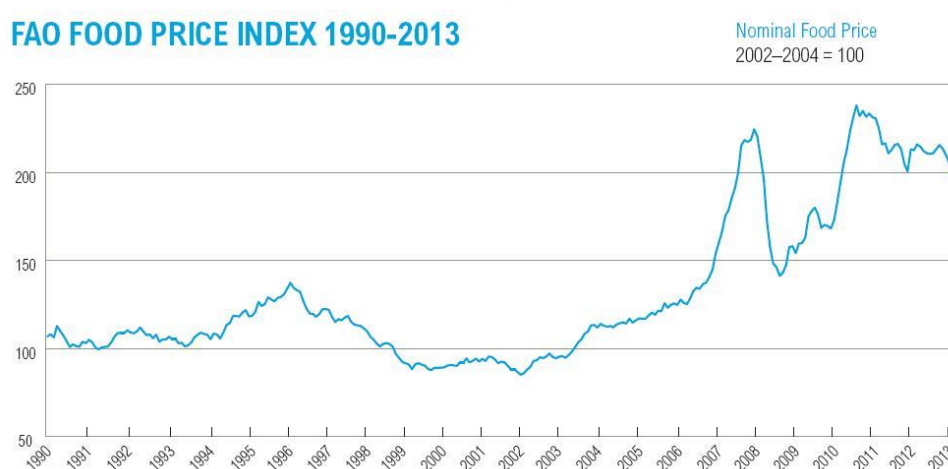
²⁷⁶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14, pp.13.

²⁷⁷ Amanda Staudt, *Global Warming and Hurricanes*,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https://www.nwf.org/Wildlife/Threats-to-Wildlife/Global-Warming/Global-Warming-is-Causing->

1250 條人命；²⁷⁸而 1982—1983 年聖嬰(El Niño)現象帶來的災害，讓全球至少損失 80 多億美元，並造成 2 千多人喪生。²⁷⁹1997-1998 年聖嬰現象則讓印尼出現霾害、亞馬遜熱帶雨林出現大火²⁸⁰，而今年七月初，研究人員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提出警告，認為聖嬰現象再次發生的機率為 85%，呼籲各國政府不要忽視其帶來的災害和潛在的經濟影響。²⁸¹

以糧食作物來說，自 2006 年開始，全球大米的平均價格已經上漲了 217%，小麥 136%，玉米 125%和大豆了 107%。糧食價格的漲幅太大，使得部分海地的人民必須啃泥餅努力避免飢餓。糧食價格的提高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暖化帶來的乾旱使得農作物生長不易，各國糧食庫存減少的緣故。²⁸²

圖三、聯合國糧農組織食物價格指數 1993-2013



資料來源：Climate Change News

圖四、1960-2000 年主要穀物成長率

Extreme-Weather/Hurricanes.aspx>.

²⁷⁸ Adam Withnall, *Pakistan heatwave death toll rises to 1250 as public urged to abstain from Ramadan fast*, The Independent, July 2, 2015, <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uk-heatwave-pakistan-death-toll-rises-as-clerics-urge-followers-to-abstain-from-ramadan-fasting-1036032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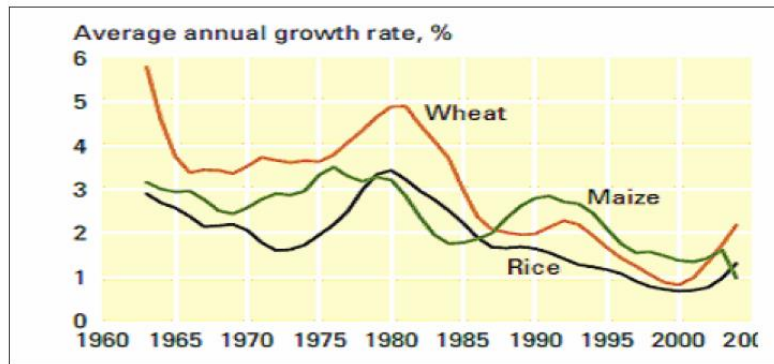
²⁷⁹ STORMFAX, *El Niño and La Niña*, < <http://www.el-nino.com/>>.

²⁸⁰ Global Change, Agriculture, < <http://nca2014.globalchange.gov/highlights/report-findings/agriculture#intro-section>>.

²⁸¹ Nithin Coca, *El Niño and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July 16, 2015, < <http://thediplomat.com/2015/07/el-nino-and-southeast-asia/>>.

²⁸² “Climate Change & Food Security,” Climate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2008), pp. 1.

Growth rates of yields for major cereals, 1960 - 2000



Source: World Bank (2008)

三、日本農業現況

日本可耕地面積只占全國土地面積的 12%，²⁸³這 12%的可耕地分散在日本各地，和其他農業國家相比更顯零散，因此日本的農業經營模式採精緻農業，其單位土地的生產量是世界第一。日本糧食自給率在 1960 年時曾高達 79%，²⁸⁴但是隨著氣候變化、經濟型態改變，糧食自給率已不如以往。日本農林水產省 8 月 7 日發佈數據稱，日本 2014 年度糧食自給率（按熱量計算）已連續 5 年維持在 39%。日本這個以米飯為主食的國家，糧食自給率卻如屢創新低，若按產值計算，2014 年度比 2013 年度下降 1 個百分點，降至 64%，是日本有史以來最低。²⁸⁵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今年的統計數據指出，日本在 2011 年的小麥、麵粉及其製品的交易量為 6354 噸，但到今年 8 月逐漸降至 5800 噸。²⁸⁶據農林水產省「生產農業所得統計」的數據來看，從 1980 年至 2010 年日本的國內農業總產出值已減少了 3 兆日圓。²⁸⁷

圖五、日本糧食自給率變化圖

²⁸³ CIA, The World Factbook,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ja.html> >.

²⁸⁴ 賴宗裕，〈淺談日本維護糧食安全之農地新政〉，《地政學訊》，第 48 期，104 年 1 月，頁 6-7。

²⁸⁵ 〈日本糧食自給率連續 5 年維持在 39%低水平〉，《日經中文網》，2015 年 8 月 7 日，<<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5612-20150807.html>>。

²⁸⁶ USDA, “World Wheat, Flour, and Products Trade,” September 11, 2015, <<http://apps.fas.usda.gov/psdonline/psdReport.aspx?hidReportRetrievalName=World+Wheat%2c+Flour%2c+and+Products+Trade&hidReportRetrievalID=386&hidReportRetrievalTemplateID=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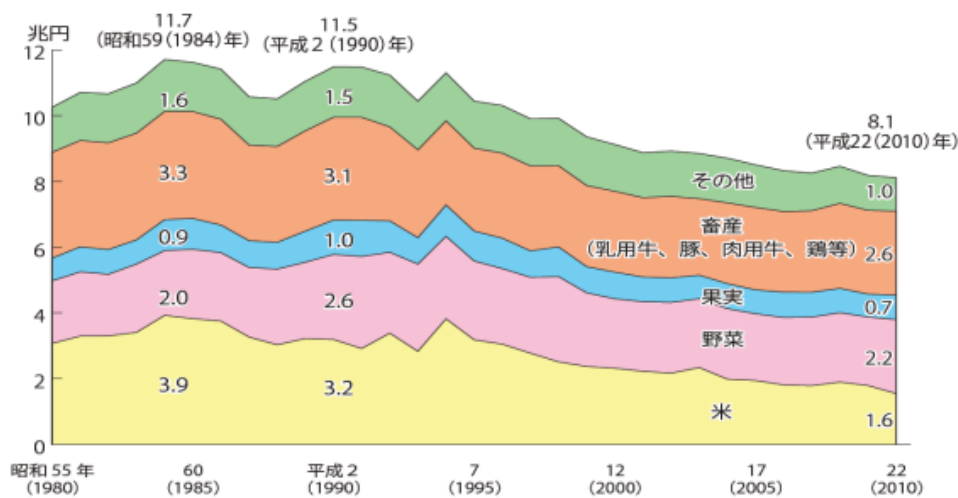
²⁸⁷ 張國益，〈安倍政權下的農業政策：日本農業今後的展望〉，2014，<<http://www.rest.org.tw/upload/2014090310332088.pdf>>。

日本歷年糧食自給率變化

年	1960	1965	1975	1985	1999	2000
自給率	79%	73%	54%	53%	40%	40%
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自給率	40%	40%	40%	40%	40%	39%
年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自給率	40%	41%	40%	39%	39%	39%

資料來源：賴宗裕，〈淺談日本維護糧食安全之農地新政〉，104 年 1 月。

圖六、1980-2010 日本生產農業所得統計圖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生產農業所得統計」

注：其他為麥類、穀類、豆類、薯類、花卉、工藝作物、其他作物、加工農產品之合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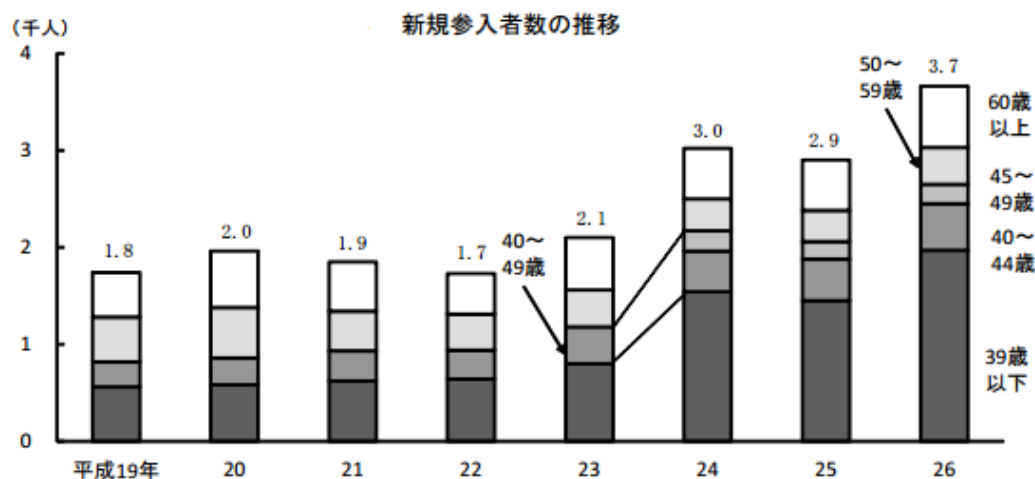
不過，縱使有諸多的數據顯示日本農業產量和產值下降，但本研究卻沒有發現足夠的證據去證明和氣候變遷有絕對的關係。反而，因日本人口高齡化、勞動力不足等原因放棄可耕作農地的相關性較高。²⁸⁸統計至 2010 年，日本棄耕的農地竟已達到 39 萬公頃，為東京都面積的兩倍。²⁸⁹不過，日本的農業發展並沒有因此停滯，雖然 65 歲以上的農業從業者有半數以上年逾 75 歲，但是受僱於個人農場和農業法人的員工逐年遞增，並有年輕化的趨勢。²⁹⁰

圖七、平成 26 年新規就農者調查

²⁸⁸ 賴宗裕，〈淺談日本維護糧食安全之農地新政〉，《地政學訊》，第 48 期，104 年 1 月，頁 6。

²⁸⁹ 道本裕，〈從國際競爭力角度探索日本農業的再生〉，《nippon.com 日本網》，2012 年 10 月 22 日，〈<http://www.nippon.com/hk/in-depth/a00902/>>。

²⁹⁰ 農林水產省，〈平成 26 年新規就農者調查〉，2015 年 9 月 4 日，〈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sinki/pdf/sinki_syunou_14.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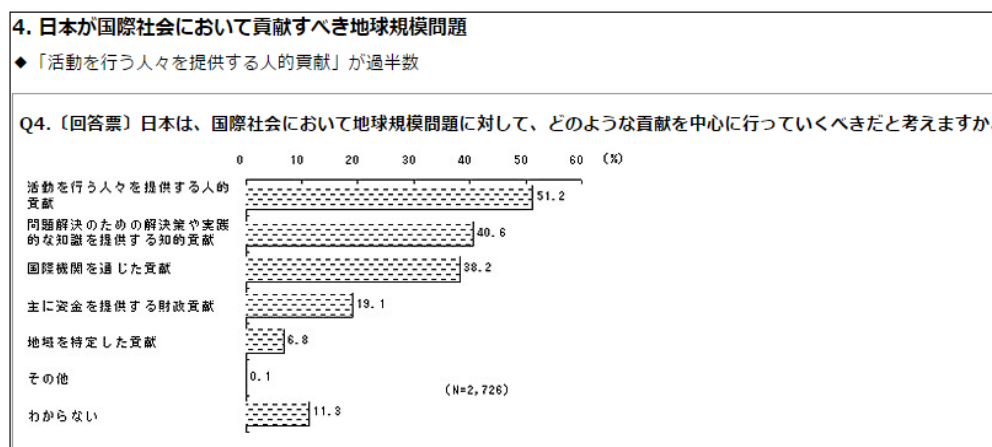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平成 26 年新規就農者調査〉，2015 年 9 月。

參、日本的國際環境保護事務參與情況

一、日本官方機構有關全球暖化與環境保護議題的民意調查

2005 年 2 月，外務省調查國內民眾對國際議題的認知度調查，作為日後施政之參考。其中，對參與全球議題的方式，日本可以何種方法做出貢獻的回答，51.2%受訪者認為日本可以透過提供實際參與活動的人力資源，40.6%的受訪者認為可以對國際議題提供相關專業知識，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圖八)。

圖八、日本對國際社會的全球問題應做的貢獻



資料來源：外務省，2005 年 2 月。〈地球規模問題に関する意識調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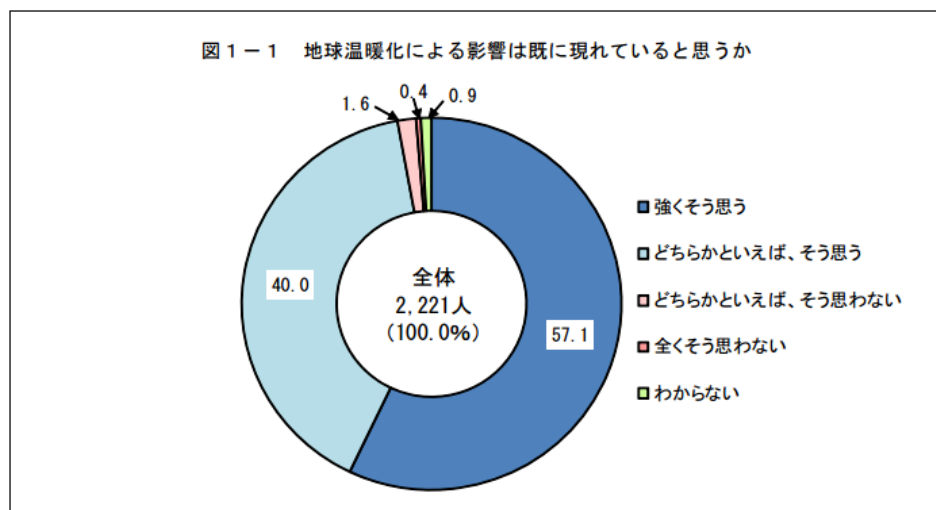
<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i_chosa.html >。

在促進國內環境保護方面，農林水産省自 1992 年宣布「新食品、農業和農村政策方向」，並在 1994 年建立環境保護型農業振興司，推廣環境保護型農

業，少用化學肥料、農藥栽培作物，以減少環境負荷的環保型農業，²⁹¹並推廣各種相關的環境保護政策。

今年二月，農林水產省針對農業、林業和漁業從業者做了一項民意調查，欲了解農、林、漁業者對於有關全球暖化的對策了解程度和認知。調查中，多數認為全球暖化的影響已經出現(圖九)。另一個民調問題結果顯示，52.2%的調查民眾認為，應持續重視減全球暖化問題或溫室氣體減量的對策(圖十)。此二民調問題顯示，全球暖化議題在日本農林漁業從事者間，對氣候變遷問題帶來的影響已經具有一定認知，並且瞭解採取因應措施的需求性。

圖九、全球氣候暖化影響是否已顯著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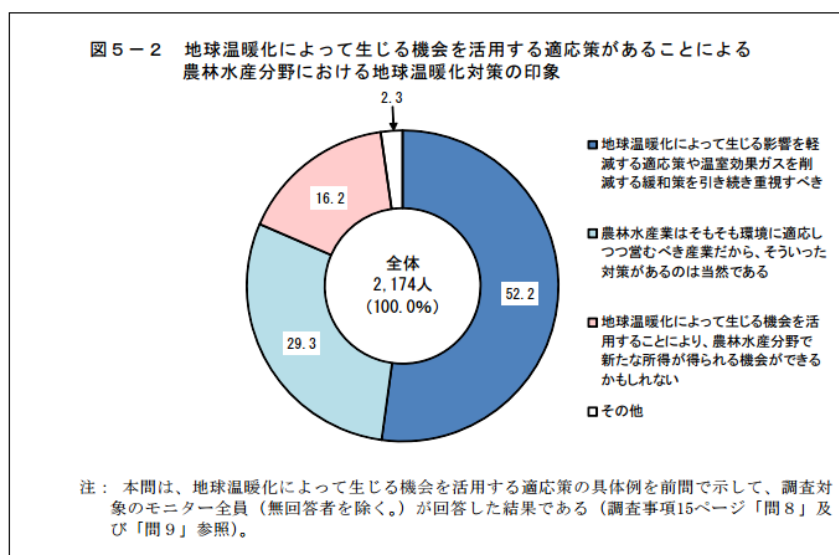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大臣官房統計部，2015 年 2 月 6 日。〈地球温暖化の農林水産分野への影響及び地球温暖化適応策に関する意識・意向調査〉，《農林水産統計》，頁 1。

圖十、農林漁業部門對因運全球暖化產生的運用對策印象調查

²⁹¹農林水產省，〈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農家の経営分析調査の概要〉，

<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kankyo_hozen/gaiyou/index.html#1>。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大臣官房統計部，2015年2月6日。〈地球温暖化の農林水産分野への影響及び地球温暖化適応策に関する意識・意向調査〉，《農林水産統計》，頁5。

綜合上述各項調查結果判斷，日本國內不反對參與國際環保議題或在合理能力範圍內提供協助，日本國內對全球暖化議題有一定認知，並具備一定環保觀念，所以推測普遍來說，日本人並不排斥遵守國際公約、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等與環保議題、地球永續發展有關之事務。

二、日本環境保護政策與實踐

(一)國內環保政策推動

目前日本在農業方面推廣的環境保護執行包括：推廣環境保護型農業、開發適應氣候變遷的水稻科作物品種、開發適應氣候變遷的蔬果品種、開發農業領域的暖化緩和技術...等等，日本的農業領域暖化緩和技術目前有構築農地(水田、旱地、果樹園、茶園)、草地、家畜排泄物處理設施的溫室氣體精密測定與農地與草地的炭、氮合併循環模式。此外分析全國規模的農地土壤及草地土壤的溫室氣體排出量，提升吸收氣機能技術、處理家畜排泄物的溫室氣體排出量減少技術、家畜飼養管理的排出量減少技術、自然能源利用技術。²⁹²

在產業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的推行上，日本政府努力推動國內排放權交易制度，規劃國內的「自願性排放交易計畫」(Japan's Voluntary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VETS)。此計畫目的在於提供日本國內企業累積排放交易經驗，並增進企業了解排放流程、試驗在日本建立跨部門排放交易體系的可行性，並用以建構國內排放權交易的基礎設施。²⁹³另外還提倡自願減量、課徵碳稅、鼓勵參與清潔發展機制...等對策。

²⁹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日本研發趨勢-農業環境與防災〉，《農業科技決策支援資訊平台》，2015年1月6日，頁3，〈<http://agritech-foresight.atri.org.tw/archive/file/2015-09-.pdf>〉。

²⁹³洪嘉莘，〈日本自願性碳排放交易的做法〉，《碳經濟月刊》，2006年，第2期，頁34。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 1990 年制定的「地球暖化防止行動計畫」，由於缺乏規則，導致責任規範不明，並且沒有在群眾間達到真正落實，故檢討計畫缺失後，由環境廳(現為環境省)擬定「地球暖化對策推進法」，並於 1998 年 10 月 9 日正式生效，法案規範內容包含最佳模式運轉計畫、能源使用合理化法、改善基礎建設、改進交通調空與發展新節能科技，以達到減量目標。而此法也是全球第一個以專法對應溫室氣體減量行動的國家立法。²⁹⁴

日本在每年 9 月會推行「臭氧層保護措施推廣月」。此期間環境省會密集舉行保護臭氧層推廣活動和媒體宣傳，在氟氯碳化物排放防止法的基礎上，鼓勵落實家電和車輛回收等收集、處置各類會產生氟氯碳化物的廢棄產品。²⁹⁵

(二)對國際環境保護的執行與貢獻

1987 年建立蒙特婁議定書後，1990 年 6 月，各締約國於倫敦舉辦第二回締約國會議，為了實現議定書中訂定的監管措施和協助開發中國家達成目標，成立「落實蒙特婁議定書多邊基金」(又稱臭氧層保護基金)，並於 1991 年開始實施。此基金繳納方式以三年為一期，第一期日本的貢獻金額約 3300 萬美元，最近一期(2012 年~2014 年)，日本的基金貢獻提高至 6394 萬美元左右。臭氧層保護基金成立十多年來，日本投入基金在 2003 年~2005 年間高達 1 億 400 萬美元，為日本歷來提供金額最高的一次，歷年累計則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捐贈國。²⁹⁶

在執行方面，日本積極推動「多途徑減量架構」(Framework for Various Approach, FVA)與「共同減量機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JCM 計畫是日本政府為了促進其領先低碳技術普及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在發展中國家執行，而實施的 JCM 融資計畫，²⁹⁷提供日本的先進技術、產品、服務系統和基礎設施，實現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最終目標。JCM 計畫型態相當多元，包括節能計畫、碳匯及低碳城市等計畫。目前日本已與 15 個國家簽署 JCM 協議，並有約 19 項執行計畫，成為全球推動新市場機制(New Market Mechanism, NMM)成效最佳的國家。²⁹⁸

²⁹⁴陳佩祺，《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法制化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68。

²⁹⁵ 環境省，〈[地球環境・国際環境協力-オゾン層の状況や取組の概要](http://www.env.go.jp/earth/ozone/month/index.html)〉，
<<http://www.env.go.jp/earth/ozone/month/index.html>>。

²⁹⁶外務省，〈オゾン層保護（ウィーン条約／モントリオール議定書）〉，2013 年 2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jyoyaku/ozone.html>>。

²⁹⁷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Japan, “JCM Financing Programs”, *New Mechanisms Information Platform*, <<http://www.mmechanisms.org/e/support/programme.html>>.

²⁹⁸經濟部能源局，2015 年 3 月。〈聯合國 2014 祕魯利馬氣候大會(COP20)觀察〉，《能源報導》，頁 41。

(三)京都議定書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設立後，也代表著國際社會全體成員對地球暖化問題須採取行動已達成共識。在此框架下，從 1995 年開始，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COP)開始舉行，在 1997 年於京都舉行的第三回的締約國會議(COP3)時，日本及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約定 2008 年~2012 年的五年間，分別要減少 1990 年碳排放量的 6%、7%和 8%，並將此一系列相關規則訂為「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計畫的一大進步。²⁹⁹

日本的溫室效應氣體減量作法以自願性減量方式為主，不作強硬性的規定，鼓勵產業界、政府各部會以及人民共同推進節能措施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對於產業界節能對策採取兩種手段：一是要求排放者自我約束與調整，為自願性減排對策；二是提供誘因鼓勵產業界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及開發節能新技術，各種作法包括以補助、租稅減免、融資或公部門帶頭示範等。依據日本環境省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 年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基準年(1990 年)碳排放量減少 4.1%、相較 2008 年碳排放量減少了 5.6%，未達到京都議定書規定減少 6%之目標。³⁰⁰但日本承諾會努力在 2012 年的期限內達成目標。

然而，日本並未簽訂 2012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COP18)所決議的「第二期減排承諾」。2010 年，日本於聯合國氣候高峰會—坎昆會議中宣布不再續簽《京都議定書》的減排承諾，隨即受到國際社會的輿論批評。因為這可能意味國際唯一對減排具約束力的氣候條約即將走向消亡的困境。³⁰¹日本則表示，應該重新建立一個具國際法約束力、且包括美國和中國等經濟大國的框架，現行的京都議定書既不公平、也不有效，日本不能做這樣無法解決嚴重問題的短期交易，這也無助於提升日本的國家利益或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³⁰²

肆、結論

觀察日本近年來國際環境保護事務參與情況發現，若以國際會議參與狀況

²⁹⁹環境省，〈氣候變動枠組条約・京都議定書〉，

<<http://www.env.go.jp/earth/ondanka/cop.html>>。

³⁰⁰環境省，〈2009 年度（平成 21 年度）の温室効果ガス排出量（確定値）について（お知らせ）〉，2011 年 4 月 26 日，<<http://www.env.go.jp/press/13722.html>>。

³⁰¹Andrew Light, "Has Japan Killed the Kyoto Protocol-Even If It Has There's Still Hope for a Climate Agreement", *Center of American Progress*, December 8, 2010,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green/news/2010/12/08/8733/has-japan-killed-the-kyoto-protocol/>>.

³⁰²外務省，〈Japan's position regarding the Kyoto Protocol〉，2010 年 9 月，<http://www.mofa.go.jp/policy/environment/warm/cop/kp_pos_1012.html>。

和公約簽署做為判斷標準，日本近期的態度變化可從不續簽《京都議定書》之第二期減排計畫的決策中觀察。日本立場從推動國際環境保護的創始締約國變成實質上已退出的非締約國。日本不續簽《京都議定書》的決定雖然受到國際輿論批評，但日本外務省提出的聲明立場，實際上卻使長久以來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間的矛盾問題浮上檯面。美國作為《京都議定書》的參與國之一，曾經簽署此條約，但因為沒有獲得美國國會批准而無效，歐巴馬總統上任初期，國際間對美國簽定議定書寄予厚望，但直至目前美國仍未加入《京都議定書》。而中國雖然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議定書中的減排目標卻以開發中國家的標準為規範。佔全球碳排放量 40% 覆蓋率的中國和美國卻不在《京都議定書》中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使日本對此國際條約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提出合理懷疑。

日本在拒絕參與延長議定書的效期後，開始以其他方式如 JCM 計劃進行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持續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締約國會議...等進行日本的環境保護實踐。目前，日本的目標是找到更有效緩和全球暖化效應的方法，和建立一個包含美國、中國、印度等主要經濟國家的新框架，³⁰³實現技術、人才活用和各先進國家皆納入的機制。

因此本文認為，雖然日本在京都議定書的締約狀況發生改變，又 2009 年的碳排放量目標並未如期達成，但就目前蒐集到的文獻資料和研究發現，在國家經濟產業發展和國際環保公約間的抉擇，目前僅能推測日本的選擇方向出現轉折，但尚且無法斷定環境保護政策不如以往受日本政府重視，更不可推斷日本是因為選擇國家經濟產業發展的原故，所以拒絕京都議定書的續約討論的簽署。另外，自 311 日本關東大地震後關閉核電廠後，今年 8 月決定於九州鹿兒島再度重啟核電，以彌補核電廠關閉以來的國內能源缺口，結束長達兩年的零核電時期。本文的目前研究結果還無法提出直接證據，證明這是否表示日本在國內產業經濟和環境保護選擇上，決定傾向有利經濟發展的方向，但可能可以作為判斷的標準之一。

伍、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專書譯著

Chalmers Johnson 著，姜雪影、李定健合譯，1985。《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臺北市：經濟與生活出版：黎光總經銷。

(二)期刊論文

³⁰³環境省，〈氣候變動枠組条約・京都議定書〉，<<http://www.env.go.jp/earth/ondanka/cop.html>>。

李秉璋，100 年 3 月。〈國益？國損？TPP 引爆日本農業存亡爭議〉，《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4 卷第 3 期，頁 95-102。

金榮勇，1997 年 9 月。〈日本「橋本主義」下的東亞情勢與互動〉，《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9 期，頁 1-11。

洪嘉莘，2006 年。〈日本自願性碳排放交易的做法〉，《碳經濟月刊》，第 2 期，頁 33-37。

賴宗裕，104 年 1 月。〈淺談日本維護糧食安全之農地新政〉，《地政學訊》，第 48 期，頁 1-20。

(三)學位論文

陳佩祺，1999 年。《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法制化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網際網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5 年 1 月 6 日。〈日本研發趨勢-農業環境與防災〉，台北：行政院。《農業科技決策支援資訊平台》，
<<http://agritech-foresight.atrri.org.tw/archive/file/2015-09-.pdf>>。

道本裕，2012 年 10 月 22 日。〈從國際競爭力角度探索日本農業的再生〉，《nippon.com 日本網》，<<http://www.nippon.com/hk/in-depth/a00902/>>。

張國益，2014 年 8 月，〈安倍政權下的農業政策：日本農業今後的展望〉，台北：行政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rest.org.tw/upload/2014090310332088.pdf>>。

經濟部能源局，2015 年 3 月。〈聯合國 2014 秘魯利馬氣候大會(COP20)觀察〉，《能源報導-專家評析》，台北：經濟部，
<<http://energymonthly.tier.org.tw/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201503&Page=41>>。

2015 年 8 月 7 日，〈日本糧食自給率連續 5 年維持在 39%低水平〉，《日經中文網》，<<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5612-20150807.html>>。

二、英文資料

(一)專書

Joshua S. Goldstein & Jon C. Pevehouse, 201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earson.

Thomas U. Berger, Mike M. Mochizuki, Jitsuo Tsuchiyama, 2007.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二)期刊論文

Robert Mendelsohn, William D. Nordhaus, Daigee Shaw, 1994/9.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agriculture: a Ricardian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pp763.

(三)官方文件

CIA, *The World Factbook*.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14.

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07.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Japan, JCM Financing Programs*.

(四)網際網路

Adam Withnall, 2015/7/2. "Pakistan heatwave death toll rises to 1250 as public urged to abstain from Ramadan fast," *The Independen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uk-heatwave-pakistan-death-toll-rises-as-clerics-urge-followers-to-abstain-from-ramadan-fasting-10360322.html>>.

Andrew Light, 2010/12/8. "Has Japan Killed the Kyoto Protocol-Even If It Has There's Still Hope for a Climate Agreement", *Center of American Progress*,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green/news/2010/12/08/8733/has-japan-killed-the-kyoto-protocol/>>.

Amanda Staudt, "Global Warming and Hurricanes,"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https://www.nwf.org/Wildlife/Threats-to-Wildlife/Global-Warming/Global-Warming-is-Causing-Extreme-Weather/Hurricanes.aspx>>.

GlobalChange.gov, "Climate Change & Food Security," *Climate Institute*,
<<http://nca2014.globalchange.gov/highlights/report-findings/agriculture#intro-section>>

"NASA: Rising Sea Levels More Dangerous Than Thought," *Jewish Business News*, 2015/8/27, <<http://jewishbusinessnews.com/2015/08/27/nasa-rising-sea-levels-more-dangerous-than-thought/>>

Nithin Coca, 2015/7/16. "El Niño and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7/el-nino-and-southeast-asia/>>.

STORMFAX, *El Niño and La Niña*, <<http://www.el-nino.com/>>.

USDA, 2015/09/11. “World Wheat, Flour, and Products Trade,”
<<http://apps.fas.usda.gov/psdonline/psdReport.aspx?hidReportRetrievalName=World+Wheat%2c+Flour%2c+and+Products+Trade&hidReportRetrievalID=386&hidReportRetrievalTemplateID=7>>.

三、日文資料

(一)官方文件

農林水産省大臣官房統計部，2007 年 11 月 2 日。〈有機農業をはじめとする環境保全型農業に関する意識・意向調査結果〉，《農林水産統計》，頁 1-38。

農林水産省大臣官房統計部，2015 年 2 月 6 日。〈地球温暖化の農林水産分野への影響及び地球温暖化適応策に関する意識・意向調査〉，《農林水産統計》，頁 1-20。

(二)網際網路

外務省，2005 年 2 月。〈地球規模問題に関する意識調査〉，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i_chosa.html>。

外務省，2010 年 9 月。〈Japan's position regarding the Kyoto Protocol〉，
<http://www.mofa.go.jp/policy/environment/warm/cop/kp_pos_1012.html>。

外務省，2013 年 2 月。〈オゾン層保護（ウィーン条約／モントリオール議定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jyoyaku/ozone.html>>。

農林水産省，〈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農家の経営分析調査の概要〉，
<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kankyo_hozen/gaiyou/index.html#1>。

農林水産省，2015 年 9 月 4 日。〈平成 26 年新規就農者調査〉，
<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sinki/pdf/sinki_syunou_14.pdf>。

環境省，〈地球環境・国際環境協力- オゾン層の状況や取組の概要〉，
<<http://www.env.go.jp/earth/ozone/month/index.html>>。

環境省，〈気候変動枠組条約・京都議定書〉，
<<http://www.env.go.jp/earth/ondanka/cop.html>>。

環境省，2011 年 4 月 26 日。〈2009 年度（平成 21 年度）の温室効果ガス排

出量（確定値）について（お知らせ）>，
<<http://www.env.go.jp/press/13722.html>>。

論促進社會參與之日本社會福祉法制—以「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為例

A Study on Japanese Social Welfare System Promo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 Project for Self-reliance in Daily Life as an Example

撰稿人：王鼎棧

摘要

隨著台灣步入高齡社會，家庭與社會照顧老人之負擔漸重，不免產生虐待或遺棄等情事，除「老人保護」外，如何促其進行「社會參與」，即愈發重要。而回顧我國相關文獻，在此狀況下，多係著重如何進行虐待防治、安置，而安置後如何令其再度安心回歸自立生活，相對較少討論，遑論法制應然面之建構。如是，本文將以「人口狀態、文化及法制構造」與我國相近之日本，為比較對象，希冀透過相關文獻整理及歷史觀察，對該國全體社會福祉法制及個別領域進行檢視與整理，供我國類似狀況於制度建立上之參照。申言之，將以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下稱自立事業）為例說明；其係指為協助行為能力不足之失智老人、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能於自身所地域中，充分自立生活，而由「都道府縣」之社會福祉協議會等，提供相關服務之事業總稱。綜上，為充分瞭解自立事業之法制定位及發展脈絡，本文將先於「貳」部分鳥瞰日本社會福祉制度之概念、理念發展、提供模型、規範體系等事項。承前，本文將續於「參」部分介紹自立事業之具體運作，如實施主體、利用人、服務內容、契約方式、利用費、申訴機制、實施現況及未來展望等，並輔以探討該制度於實務上所面臨之各式難題；藉此，闡明老人並非「單純受保護」之行為客體，而係能夠「自我決定」之法律主體，是自立事業之運作，自不得將老人置於被養之境地，而應積極從旁協助本人意思於社會中開展。最後，在「肆」部分統整前開論述，嘗試於我國國情之上，借鏡前述日本經驗，簡要提出反思，期許為臺灣長者參與社會之需求盡份棉薄之力。

關鍵字：社會參與、社會福祉、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

Keywords: social participation, social welfare, basic structural reform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social welfare, project for self-reliance in daily life

壹、前言

按所謂高齡化社會之判斷，係依 65 歲以上人口數相對總人口數之比例計算。簡言之，若 65 歲以上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百分之 7 以上而未滿百分之 14 時，即屬高齡化社會；且若 65 歲以上人口數比例超過百分之 14，而未至百分之 21，則稱之「高齡社會」；甚者，若比例超過百分之 21 以上，即為「超高齡社會」³⁰⁴。觀諸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統計³⁰⁵，我國於 1993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即超過百分之 7，成為高齡化社會；推計將於 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並於 2025 年超過百分之 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

隨著台灣步入高齡社會，家庭與社會照顧老人之負擔漸重，不免產生虐待或遺棄等情事；近期數據以觀，自 2006 年至 2008 年，老人虐待之個案數成長率甚達 44%，個案實有逐年增加之趨勢³⁰⁶。是除「老人保護」外，如何促其進行「社會參與」，即愈發重要。查學界就³⁰⁷老人虐待之定義如下：一、身體虐待：包括各種身體攻擊或造成身體疼痛、受傷之行為，導致身體功能損傷或失能。二、心理虐待：係指故意透過口頭攻擊、威脅、恐嚇、侮辱及孤立等行動。三、經濟虐待：指剝奪老人處理財物之權利，或對老人財產作成不適當處置。四、疏忽：故意不滿足生活所需。相對學界，立法者就「老人虐待」之劃定，較為狹隘；觀諸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老人因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虐待、遺棄等情事，致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危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老人的申請或職權予以適當短期保護及安置。」其對老人虐待之觀察僅含身體、心理虐待及疏忽，而忽略對經濟虐待之保護安置。而此經濟虐待問題亦由來已久，由 1999 年內政部「老人虐待指標之研究」即可觀之，當時各縣市老人面臨經濟虐待比例雖僅佔老人保護個案 2.05%，然受傳統「家醜不可外揚」之觀念影響，可推測尚有許多受經濟虐待之老人並未列入統計，且老

³⁰⁴ 岩村正彥編，《高齡化社会と法》，（東京：有斐閣，2008 年），頁 1。

³⁰⁵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報告》，（臺北：2012 年），頁 13，《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ezcatfiles/b001/img/img/28/108563462.pdf>〉。

³⁰⁶ 吳玉琴，《台灣老人保護工作的挑戰與契機》，（臺北：2009 年），《老人保護資訊平台》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15814.pdf>〉。

³⁰⁷ 孫靜芸、林怡秀、黃小萍、徐旭香、葉淑惠，〈老人虐待之概念分析〉，《高雄護理雜誌》，第 29 卷第 3 期，2012 年 12 月，頁 75。

人經濟虐待缺乏實定法上一致標準，致各縣市在分類統計時各行其事³⁰⁸。是當代如何建構相關支持體系，令其擺脫經濟壓迫，以維老人生活健康與心靈安頓，為極重要之課題。次按社會參與，既包含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休閒娛樂的、慈善的等不同層面，且透過社會參與可降低老人的寂寞感，建立自我認同，減少社會隔離與增加生活充實感，使老人生活保持活躍，有助於晚年生活品質之提升³⁰⁹。惟回顧我國相關文獻，係多著重如何進行虐待防治、安置，而安置後如何令其再度安心回歸自立生活，相對較少討論，遑論法制應然面之建構。如是，本文將以「人口狀態、文化及法制構造」與我國相近之日本，為觀察對象，特別以該國之「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下稱自立事業）」為關注中心；申言之，該概念係指為協助行為能力不足之失智老人、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能於自身所在地域中，充分自立生活，而由「都道府縣」之社會福祉協議會等，提供相關服務之事業總稱。透過自立事業職員之定期參訪，除得給案主事務上之援助外，更得掌握其生活狀況，即時防範虐待事件之續行（生理、心理外，更含經濟虐待）；申言之，透過自立事業與本人及家族之互動，得隨時臨機應變，與相關單位進行聯繫而給予援助，並促其終局自立³¹⁰。

綜上，為充分瞭解自立事業之法制定位及發展脈絡，本文將先於「貳」部分鳥瞰日本社會福祉制度之概念、理念發展、提供模型、規範體系等事項。承前，本文將續於「參」部分介紹自立事業之具體運作，如實施主體、利用人、服務內容、契約方式、利用費、申訴機制、實施現況及未來展望等，並輔以探討該制度於實務上所面臨之各式難題；藉此，闡明老人並非「單純受保護」之行為客體，而係能夠「自我決定」之法律主體，是自立事業之運作，自不得將老人置於被養之境地，而應積極從旁協助本人意思於社會中開展。最後，在「肆」部分統整前開論述，嘗試於我國國情之上，借鏡前述日本經驗，簡要提出反思，期許為臺灣長者參與社會之需求盡份棉薄之力。

³⁰⁸ 洪國程，《高齡者經濟安全保障—嬰兒潮世代對財產信託態度實證研究》，（臺北：2009年），《老人保護資訊平台》，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20044.pdf>〉。

³⁰⁹ 謝茉莉、方文輝、吳柄緯，〈老人人際親密、社會參與及心理健康狀況之相關研究〉，《台灣老人保健學刊》，第9卷第2期，2013年12月，頁111。

³¹⁰ 阿部和光，〈社会福祉における権利擁護の課題〉，《社会保障法》，第15期，2000年，頁192。

貳、日本社會福祉制度之鳥瞰

一、總說

(一) 意義

談論後續課題前，須先對社會福祉係何概念，進行說明。亦即，此係指針對身心障礙、老年、母子單親家庭等具有社會或身體上障礙之族群，給予給付，使其除去或緩和**生活不便之制度總稱**；如是，即得協助當事人克服生活障礙，進行社會參與，發展自我能力，而享有富有人性之生活³¹¹。體系上，有專法處理相關組織及財政運作，而實體給付內容，大致則依照顧對象分以專法規定，

(二) 歷史發展

1、戰後草創期（戰後～1960 年代）

由於戰敗，日本境內出現許多歸國者、傷病軍人、戰爭孤兒、失業者，另加上糧食問題及通貨膨脹，該等人士缺乏照料，生活面臨困頓；而前述混亂適逢佔領日本之 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採取「**去軍事化，往民主化**」的政策，更如火中添薪，促長民間各方抗爭運動（著名口號如：米よこせ、職よこせ）興起，一時之間騷然不止，對執政當局產生統治危機，如何解決即成急需處理之燙手山芋³¹²。然而，正因 GHQ 嚴禁戰前法西斯再起之態度，迫使日本政府放棄強力鎮壓之手段，改以經濟措施之改善，促進社會統合³¹³。1945 年 12 月 8 日，GHQ 對日本政府發出「救濟及福祉計畫文件（救済並びに福祉計画の件）」，要求其於同月 31 日前，針對前述困境提出詳細對應計畫及法令，是後者即趕於該月 31 日，日本政府對 GHQ 提交「救濟福祉文件（救済福祉に関する件）」，經過審核後，GHQ 回覆備忘錄（覚書）而要點有三：1、國家責任原則。2、無差別平等原則。3、最低生活保障原則；循此，日本政府依序制定生活保護法（1946 年）、兒童福祉法（1947 年）及身障者福祉法（1949 年），前開三者併稱「福祉三法」；綜上可知，**本階段關心重點在於救濟「生活貧困者」**³¹⁴。

³¹¹ 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東京：有斐閣，2007 年），頁 443-444；井上英夫、高野範成編，《実務社会保障法講義》，（東京，民事法研究会，2007 年），頁 137。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東京：光生館，2007 年），頁 25-26。

³¹²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東京：有斐閣，2014 年），頁 393；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東京：有斐閣，2012 年），頁 120。

³¹³ 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26

³¹⁴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3；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6。

而在國家責任之大旗下，政府初期即嚴格執行前述憲法第 89 條有關「公的責任³¹⁵」之意旨，由國家單方作成行政處分，主導社會福祉之給付，稱為「措置制度」，並拒絕對民間社會事業提供任何財政援助，導致後者營運狀況開始惡化，惟因前開社會事業戰前即於社會福祉方面，補充國家許多施政不足之處，扮演相當吃重之角色，故漸有從寬解釋前開規定之聲音；亦即，雖仍由政府主導社會事業，卻允許前者基於對等契約，出以必要經費，向民間業者購買服務；如是，則認不該當「公的責任轉移」，並稱為「措置委託」³¹⁶。同時，為順利制度化前開統合公私部門力量之論述，即於 1951 年制定社會福祉事業法，作為執行全部社會福祉事業之共通準則，並創立「社會福祉法人」之法概念—相較民法公益法人給予更嚴格之國家監督，藉此證成國家具有「支配性」地位，賦予對民間經費補助之正當性基礎³¹⁷。

2、發展飛躍期（1960 年代～1990 年代中）

時至本階段，日本開始引進美式化學重工業，帶動經濟蒸蒸日上，又亟需勞動力之故，亦牽動薪資上漲，如此繁榮則使該國福祉建制走向分殊化；換言之，伴隨法人及個人所得上昇，該等稅收令國庫充實，而有能力開始關注該時期所生之種種社會問題—如因核心家庭化及婦女就業，令過往家庭對於內部成員之扶養能力弱化，而有針對過往依生活保護法受領給付之高齡者及智能障礙者，另行制定老人福祉法（1963 年）、精神薄弱者福祉法（1960 年；後改³¹⁸稱智能障礙者福祉法）予以安置之必要，而若算入同時期之母子福祉法（1964 年），則前開法令得併稱「福祉六法」³¹⁹。由前可知，受分殊化擴大之影響，社會福祉於前時期所具「低收入戶對策」之色彩轉弱，漸漸具備不計算收入多寡，並針對利用人障礙加以照護之性格。

³¹⁵ 該條規定意旨略以：不得對非屬政府支配之慈善、教育或博愛事業，提供金錢等援助。

³¹⁶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3；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6。

³¹⁷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3-394；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6；橋本宏子主筆部分，〈福祉をめぐる状況と展望〉，日本社会保障法学会編，《社会保障法講座第 3 卷社会福祉サービス法》，（京都：法律文化社，2001 年），頁 5。

³¹⁸ 此番改正係為因應國際潮流—聯合國 1971 年大會決議通過之智能障礙者權權利宣言，所使用之名稱使然，並避免精神薄弱一詞所帶來助長負面歧視之效應。前述參見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 121。

³¹⁹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5；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43、51-52、60。

惟時序進入 70 年代後，面臨第一次石油危機等事件衝擊，日本經濟高度成長之時期頓時宣告終結，嚴重影響政府稅收，造成相當赤字，外加國際間「新自由主義」之治理思潮抬頭，推動社會福祉背後之財政重整問題，即慢慢浮上檯面，逐漸成為選舉議題或國政焦點³²⁰。其中，於 1979 年由內閣針對日本型福祉社會所作成之改革決議，甚具里程碑意義，其謂：「為與歐美諸國齊頭並進，我國將來努力之方向...將以個人自助努力、家庭鄰近地域社會之連帶為基礎，以效率更佳之政府，重點性地保障合適之公共福祉，令執此精神之自由經濟社會所帶來之創造活力，作為原動力，創造我國獨有之道。」學者指出，從強調個人責任及由家族、地域等相互扶持等語可知，當時政府欲有效率地進行財政控管，往「小而美政府」邁進³²¹。具體而言，首重補助比例調整，諸如過往老人醫療保險費由國家負擔之政策，即於修正老人保健法，導入費用分擔後，加以終結。其次，因應進入 1980 年代後，國家財政赤字已進入非由地方自治團體協力分擔不可之境界，是推動「地方分權化」，透過事務及財政二方面逐漸加重地方自治團體之任務。

3、發展轉型期（1990 年代中～迄今）

隨著社會種種現象轉變，為確保服務質量之穩定，法制即有對應調整之必要。詳言之，有三大現象³²²：（1）就業結構之轉變：受到經濟大環境之影響—諸如長期不景氣之裁員壓力；製造業技術升級及代工體制之確立；餐飲業及服務業營業時間之擴張—使得該國企業開始打破終身雇用之固有制度，大量晉用「非正規雇用者」，像是派遣社員、簽約社員、工讀生等職位；傳統勞動人力被迫轉換跑道之餘，仍有搶食其他新興職位之壓力。據 1997 年之統計，非正規雇用者總數當時已達 1260 萬人之譜；由於人數眾多，該等族群即被命名為「飛特族（和制英語：Freeter、フリーター）」。而因職位競爭轉為激烈，令飛特族縱突破重圍，有工作傍身，亦僅得維持生活最低水準，形成「工作貧窮（ワーキング・プア）」（2）家庭結構之轉變：除受前述工作貧窮所生「將來無望」之影響，當代男女亦不願續受傳統價值觀—男主外、女主內—之束縛，故整體人口之不婚比率逐漸

³²⁰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5；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7；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89、176-177。

³²¹ 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91。

³²² 整理自品田充儀，〈社会福祉法制の構造と変容〉，日本社会保障法学会編，《新講座社会保障法第 2 卷—地域生活を支える社会福祉》，（京都：法律文化社，2012 年），頁 35-42。

上升，國民生活型態可謂走向「個人化」。又隨個人化現象之開展，個人與「親族及地區」間之互動，亦呈「稀薄化」。針對「個人與社區親近度」之高低，1997年調查指出，在大都會地區尚有3成，鄉下地區則達6成；可進入2002年之後，大都會地區即掉至1成，鄉下地區亦僅勉力維持3成。近年來，相對「個人化」之整體生活趨勢，由於工作難尋、維生不易，年輕世代畢業後，多不得已選擇續與父母親同住，接受父母撫養；此等族群，即被稱作「尼特族（ニード）」³²³。而在就業及家庭結構轉變之雙重夾擊下，日本高齡或障礙者則陷入照護難尋之局面，照顧人力不足、拒絕照顧甚或虐待等事，即層出不窮。

惟回顧法制，面對前述困難，尚有心有餘力不足之處，諸如³²³：(1) **社會福祉之提供方式**：如前述，長久以來皆行「措置制度」；其特色在於行政機關擁有裁量判斷權，得以行政處分單方決定，是否提供服務甚或服務內容之多寡，不免令利用者有無法參與決定，且受行政監護之憾。(2) **社會福祉各領域與其他社會保障法制之連結**：當時社會福祉各領域（如針對障礙者、兒童、老人、母子所為者），僅分別縱向發展，缺乏橫向連結，遑論其他社會保障法制之交流聯繫（如針對心智障礙者之醫療、保健、福祉等給付）；此一現象，更衍生僅著重個別細節，缺乏整體衡平與因地制宜之批評。而正因法制與社會發展間之落差愈發巨大，愈令日本政府認識有加以改變之必要，即欲發動所謂「**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說明如後。

厚生省（厚生勞動省之前身）自平成9年8月起，即設置「社會福祉事業等進行方式檢討會」，於同年11月針對「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加以討論；又以上述討論為基礎，續在同月之「中央社會福祉審議會之社會福祉構造改革分科會」，深入就「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之理念與內容」進行檢討，並於隔年10月再以「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為題，發表中間結論；而此結論背後之理念，則對後續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之制定，發揮莫大影響力³²⁴。申言之，厚生省係循此結論，制定「社會福祉事業法一部修定要綱」，且回頭向中央社會福祉審議會等處諮詢併為答辯；平成12年3月，終由政府向國會提出法律案，再於同年6月經參議院通過，對外公布之（不同章節，分別有不同生效日期；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部分則係於公布時生效）³²⁵。

³²³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397。

³²⁴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判例タイムズ》，第1030期，2000年7月，頁162。

³²⁵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163。

值得注意者，前開中間結論認為：社會福祉之目的在於，維持個人尊嚴，並出於「社會連帶」之考量，在家庭與地域間，不分障礙之有無及年齡限制，致力使其享有人應有之自立生活，給予支援。基此，衍生出下列七點關懷：

(1) 服務利用者與提供者間應具對等關係。(2) 綜合性支援地域間之個人多樣需求。(3) 促進各種需求之不同主體參與。(4) 促進服務品質信賴可靠，使其服務品質及效率向上。(5) 透過資訊公開，確保事業營運之透明性。(6) 公平並公正地分擔成長費用。(7) 透過住民之積極參與，型塑福祉文化。

透過前開討論，相關立法亦隨之修正³²⁶，諸如兒童福祉法開始針對保育所入所方式加以修定（1997年）。同年，介護保險法亦併同制定（2000年開始施行），將過往由機關「單方措置」所提供之給付，像是介護保險之介護服務、障礙者之自立支援給付或保育服務等，多改成需用者與提供者間，以契約訂定之運作型態；申言之，得作為消費者檢視契約內容，再行決定是否購買，循著前開緩和管制之腳步，並增加民間業者參與服務提供之機會，希冀透過業界知彼此競爭，提升服務品質。此外，社會福祉事業法也修訂為社會福祉法（2000年），將對利用者之資訊提供、福祉服務之利用援助、爭議申訴等保護機制予以明文，並設計由社會福祉事業經營者、地方自治團體及國家，提供內外部評價與相關資訊之制度，確保社會福祉事業能彼此適切營運及競爭。而為推進地域福祉之發展，亦將市町村地域福祉計畫及都道府縣地域福祉支援計畫同為法定化。

二、當代特色（一）自立理念化

所謂自立，係指「個人依其人格，自律地存在，並以主體性之地位追求生存之道³²⁷」。其並非指涉一種特定狀態，而係一種思維向度—隨個人意思及環境條件而有異，若考量社會法係為擔保人們生活當中所遭遇到之各式風險，而可從人們對「精神、身體及經濟」三面向綜合觀察；申言之，人類自嬰孩時期起成長，雖可逐漸脫去對身體照顧的依存，而邁向精神獨立，並開始進入社會，取得工作資格，嘗試在經濟面上站穩腳步，惟年齡增長、疾病或失業等風險仍可能隨時無情

³²⁶ 整理自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397-399；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450；品田充儀，〈社会福祉法制の構造と変容〉，頁43-45。

³²⁷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人間像〉，《法律時報》，第80卷第11期，2008年1月，頁71。

地往人們侵襲，造成自立狀態之改變³²⁸。

承上，當人們自立狀態有所改變，即有自主依循他人支援，重新回歸其主體性地位之必要；換言之，社會福利法制之擬定應以此等「有自主意識之個人(亦即，非被保護之客體)」為預設對象，為欠缺此等能力之人，提供向將來開展人格之支援而加以整備，不宜過度介入，且非由提供相關保護之一方，藉由恣意之標準及強制力，強迫賦予受給付之人相關內容³²⁹。為實踐如上要求，可自下列角度確保。**第一、受給付主體性之確保：**社會福利既係滿足個人生活需求，是若不能依個人之選擇完成，則無法令其滿足；基此，應尊重當事人對受給付內容之選擇權³³⁰。**第二、協助認識自我：**若問本人是否已順利自立，可取決於「主觀基準」及「客觀基準」，二標準之差別一如精神疾病患者，雖自我認定已能獨立處理事務，惟自專家學者眼裡卻呈相反狀態。是在本人難以完整觀察自身狀態之前提下，如何從旁引導其認識自我，進而順利達成自立，即屬必要³³¹。**第三、促其持續挑戰自立：**面對年齡增長、疾病或失業等風險所帶來之影響，若要想重返自立，則需時時刻刻保持努力，長久以往不免容易懈怠，在社會福利制度設計上則須意識此點為宜³³²。

又為何日本法在此強調自立之重要性？法律學者即謂與該國**憲法第 13 條「追求幸福權」**規定之實踐有關³³³，可從二方面進行說明。**第一、作為個人價值之自立：**回顧當代憲法之沿革，從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之發展以觀，係強調自「傳統封建身分關係」種種人格拘束解放，並因生產方式之改變，而主張透過勞雇雙方自由契約簽訂，來交換勞動力與價金，是每一位「個人」皆開始背負應「積極進取」之責任，以求其生存³³⁴，是率以「精神、身體及經濟」各面向皆為健全之人作為預設規範對象，如何協助自我決定能力不充分之人亦能同創人生，即屬重

³²⁸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菊池馨実編，《自立支援と社会保障—主体性を尊重する、福祉、医療、所得保障を求めて》，（東京：日本加除，2008 年），頁 32-33。

³²⁹ 西原博史，〈生存權論の理論的課題--自己決定・社会的包摂・潜在能力〉，《法律時報》，第 80 卷第 12 期，2008 年 11 月，頁 84；笹沼弘志，〈社会権保障における自立と保護〉，《法律時報》，第 75 卷第 8 期，2003 年 7 月，頁 59。

³³⁰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39-40。

³³¹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40。

³³²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41。

³³³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の法理念》，（東京：有斐閣，2004 年），頁 140。

³³⁴ 工藤恒夫，《資本制社会保障の一般理論》，（東京：新日本，2009 年），頁 23-24。

要³³⁵。是若長久依存他人，難免損及自尊心，導致精神無法安定；反之，自我決斷即代表「自我選擇」之擴大，而隨著選擇權同時在「精神、身體及經濟」各面向之擴大，人們更得透過成長而擁有成就感，並感到深層的喜悅，也一併拾起追求生存之意欲³³⁶。**第二、基於社會價值之自立：**若人們對其所屬共同體社會過度依存，則建立於其上之社會福利制度恐怕將難健全存續；申言之，社會福利制度本係為處理個人之力所無法對應之危險而存在，是其手段之界限即以個人能處理之責任範圍為準，而透過社會團體之共同連帶支持，今若發生有限資源濫用之情形，則會導致福利價值之下降，並提高他人之未來負擔，將加速共同體對制度存續之信心崩解³³⁷。前述狀況若對照日本社會福利改革之脈絡，亦若合符節，蓋伴隨著少子高齡化，所需資源如年金及醫療等持續看漲，經濟成長卻難以攀升，政府負擔實日趨惡化，而有調整社會福利內容之必要³³⁸。衡諸前述「自立」二概念，此實得作為填充前開「追求幸福權」之基礎。

三、當代特色（二）地方分權化

除了迫切之財政因素外，為給予住民貼近、適切且快速對應之福祉服務，即如前述，逐漸推動「地方分權」。詳言之，中央集權下，福祉設施及服務內容全國均一，固得確保公平而屬優點，惟考量地理環境、人口規模、年齡組成、產業結構、所得水準等因素，均一標準不見得能合乎地方實情³³⁹。回顧立法歷程³⁴⁰，1986年，該國制定機關委任事務整理合理化法，將兒童福祉法、老人福祉法、母子保健法、身障者福祉法及精神薄弱者福祉法中有關「機關委任」之事務，改為「團體委任」（所謂機關委任，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非以住民代表之身分，而以國家機關地位，受中央監督，執行委任事務之態樣；相對地，團體委任之事務執行，則須經地方議會審議，等同自治事項³⁴¹）。行至1990年，隨老人福祉法等八法修改，重新檢視市町村之樞紐地位，將老人及身障者福祉之機構照護措置事宜，交由後者辦理。1997年，另依兒童福祉法之修正，將兒童保育所入所與否之事宜，改為團體委任事務，地方自治團體並得考量地方實情，另以條例定之。

³³⁵ 竹中勳，〈高齢者と人権保障・憲法学〉，《法律時報》，第77卷第5期，2005年5月，頁22。

³³⁶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37-38。

³³⁷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36-37、40。

³³⁸ 中村直樹，〈自立支援と社会福祉：社会福祉の政策と援助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こと〉，《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第64卷第2期，2014年2月，頁47-48。

³³⁹ 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148。

³⁴⁰ 以下時序發展，未另註記者，整理自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447-448。

³⁴¹ 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148。

1998 年，則因地方分權統整（一括）法之制定，廢止機關委任，對應事務性質，改設立「自治事務」及「地方受託事務」。綜上，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間互動，可謂是自「上下、主從關係」走向「對等、協力關係」³⁴²。

四、當代特色（三）單方措置到契約合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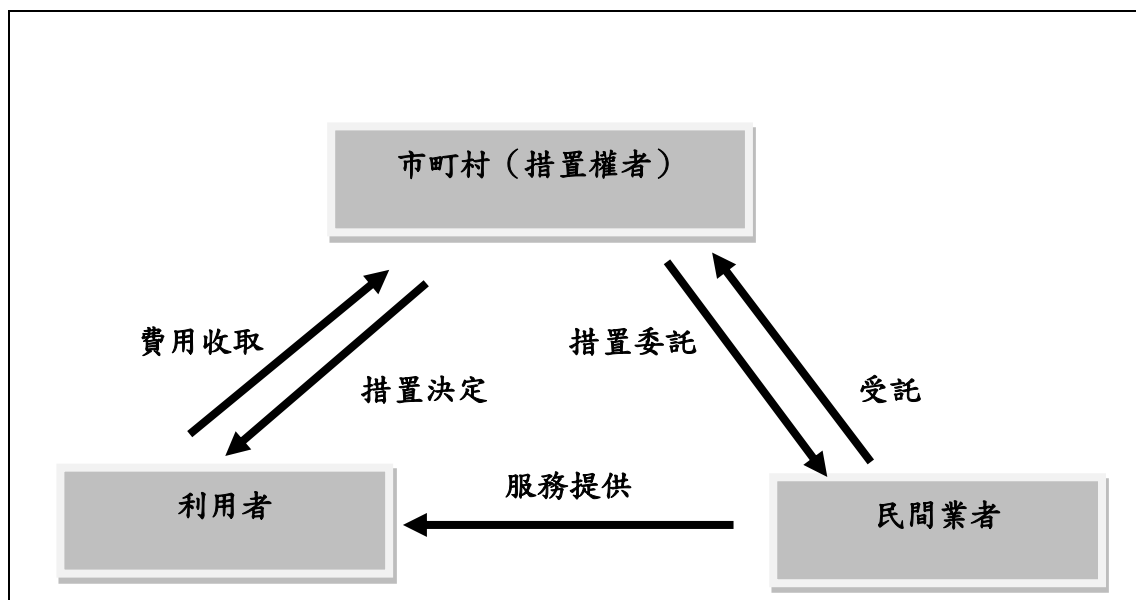


圖 1：措置制度運作模式

由前圖³⁴³可知，措置制度具單方性，給付內容係依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定之，惟受財政預算制約，供給量尚屬有限，利用者對其將來享有之服務，除無置喙餘地，更被實務認定無相對應之請求權，僅係依法行政下之「反射利益」；至受政府委託提供服務之民間業者，因給付內容劃一旦無市場競爭壓力，則難期待照護品質有所提升³⁴⁴。基此，前述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即引入契約模式，令當事人得依契約合意，設定服務內容。如此模式轉變，即以「措置到契約（措置から契約へ）」為口號號召。以下即以「障礙者自立支援」實施為例，圖示³⁴⁵如後。

³⁴² 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 150。

³⁴³ 參考自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400。

³⁴⁴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400；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 153；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7-448。

³⁴⁵ 參考自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2014 年，頁 400；矢嶋里絵主筆部分，〈福祉サービスの紛争解決〉，日本社會保障法学会編，《社会保障法講座第 3 卷社会福祉サービス法》，（京都：法律文化社，2001 年），頁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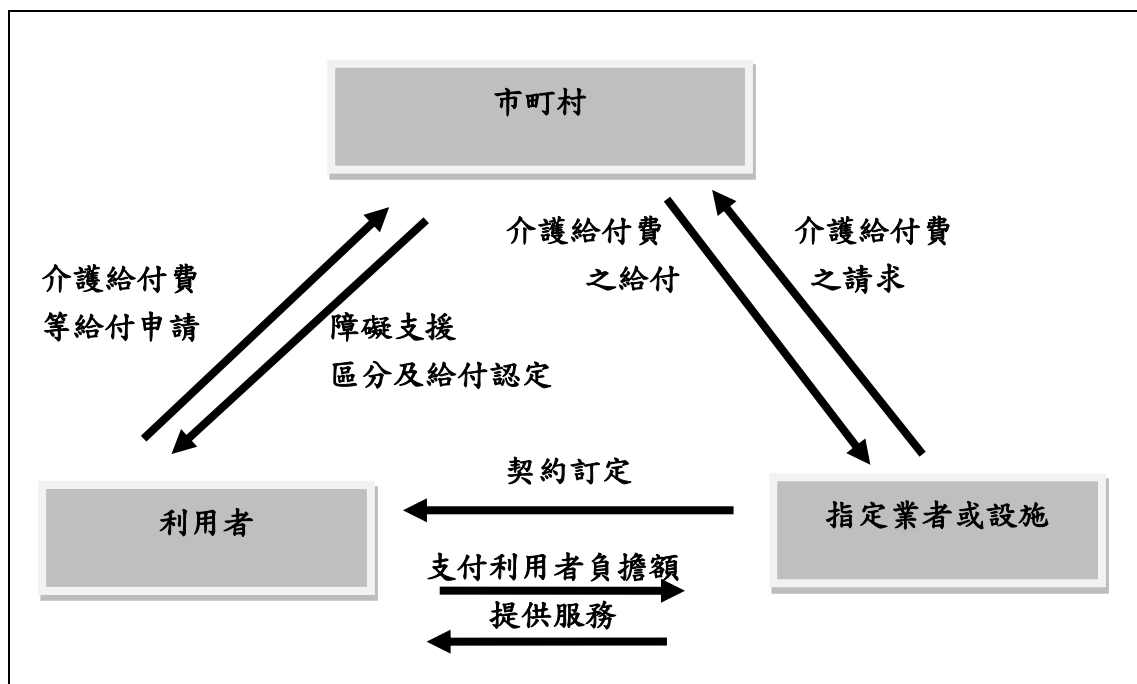


圖 2：「障礙者自立支援」之運作模式

詳言之，隨著 2005 年障礙者自立支援法之實施，並整併類似法制後，利用者得依法向市町村申請，經考量障礙程度、介護者狀況及將來障礙福祉服務之利用狀態等情事，即行作成給付決定；再經與業者或設施締結服務契約，並由市町村支付介護服務費；當事人原則尚須負擔一成負擔費，乃向業者給付³⁴⁶。

雖說日本近年社會福祉改革，放手讓受給付者得以自我意志選擇服務，基於自己責任制履行契約，抑或依照所選服務之質量繳納費用；如此，看似充分尊重個人主體性，給予選擇之自我空間，惟卻忽略受領相關給付之高領者或障礙者，無法進行合理選擇者，係不在少數。此外，相關給付之設定，若交由家族代決，考量前述當今「個人化」之生活型態，恐難完全信任其將尊重當事人之選擇意志³⁴⁷。回顧所謂自立，乃異於醫療及保健領域，不應僅考量身心機能之回復，尚應注意給付受領意味著社會參與，當事人得以藉此感受自身存在。是當事人之自主意思即應屬法律制度之核心構造，故於社會福祉之提供過程中，應導入扮演第三者而能傳遞當事人真意且中立之專業人士，避免當事人之真意受到遮掩，而任由這波市場化之浪潮無情撥弄³⁴⁸，而有下列日常生活自立支援

³⁴⁶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2014 年，頁 402。

³⁴⁷ 品田充儀，〈社会福祉法制的構造と変容〉，頁 46。

³⁴⁸ 品田充儀，〈社会福祉法制的構造と変容〉，頁 47。

事業之興起。

參、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之具體運作

一、概說

若謂「自立」指「依其主體性之地位追求生存之道」而言，則「自立支援」係從旁支援無法表達自由意志之人，為其引導想法之謂；而「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平成 19 年前稱之「地域福祉權利擁護事業」³⁴⁹）」正是為完成如此任務而生之制度—轉換老人置於被養之境地，並積極從旁協助本人意思於社會中開展；換言之，自立事業係為協助行為能力不足之失智老人、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能於自身所處地域中自立生活，而由「都道府縣」之社會福祉協議會（下稱社協，並依行文，在用語前標明所在地區）等，提供相關支援服務之事業總稱³⁵⁰。說明有二：其一，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於法律體系下之定位，依社會福祉法³⁵¹第 2 條第 3 項第 12 款，係「福祉服務利用援助事業」³⁵³；而前開法律，更特別於第 8 章第 2 節「福祉服務之利用援助」，設有具體運作規範。其二，前開社協究係何指？申言之，其係依社會福祉法（依地區規模，依據分別為該法第 109 條到第 111 條）所設立，為地區社會福祉之推進，針對地區住民、社會福祉關係人提供支援，作為非營利性質之民間組織；此一

³⁴⁹ 改名係因舊有名稱過於寬泛，難讓利用人望文生義。參見厚生勞動省社會・援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http://www.mhlw.go.jp/shingi/2007/11/dl/s1119-7e.pdf>〉。

³⁵⁰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菊池馨実編，《自立支援と社会保障—主體性を尊重する福祉、医療、所得保障を求めて》，（東京：日本加除，2008 年），頁 327、335。

³⁵¹ 「社會福祉」制度之緣起，係因二次戰後，日本當局考量貧困、身心障礙、戰爭孤兒等族群急速增加之困境，並考量重建下之資源不足，為能緊急保護及救濟，由行政機關主導，將相關民間資源予以制度化，按照「社會福祉事業法」，代替國家從事社會福祉（由國家提供補助）；如此以往，則無意間強化福利提供者之優越感，忽略利用人之自我意識。前述參見青木重仁，〈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權利擁護事業〉，頁 162；古都賢一，〈福祉サービスと苦情解決〉，《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2000 年 7 月，頁 169-170。

³⁵² 社會福祉法原名為「社會福祉事業法」。從過往名稱可知，昔多自業者角度出發，較未注意利用人之需求，故後有意識地改為現行名稱。

³⁵³ 就概念定義，該款規定指出：此係針對因精神方面於日常生活經營上具障礙者，提供免費或需定額費用之福祉服務利用會談及建議，且為其能享有福祉服務，給予必要手續費或服務提供費之折扣等多方有助福祉服務適切利用之援助事業。

組織，依治理範圍，在全國有一所、各都道府縣及各市町村各設一所³⁵⁴。

二、發展背景

（一）微觀—財產安全之維護

依日本學者³⁵⁵所述，於九零年代，有關高齡者財產安全常見事例如下。事例一，79歲之獨居老翁，於住院時，不時向醫護人員詢問家中是否遭竊，其印鑑及存摺是否安好，常令醫院社工不知如何是好。事例二，某長者為求謹慎，將其存摺、印章皆置於兒子所在；不料，其子為償還公司借款，即私底下將其存款請領一空。兒子逢親戚便表示：「母親是個癡呆」。對此，令福祉事務所職員煩惱是否要將其存摺、印鑑交由值得信賴之第三人保管。前述事例，無非皆指向財產安全之維護。申言之，財產正是維繫日常生活之基礎；透過良善之財產管理，方得安心經營生活，而與他人盡情互動。是財產不僅具經濟意義，更係生活方式與水平之基礎，與個人自主決定權及人格發展具有密切關聯。

惟面對前述困境，早期係由民生委員或家庭協助員，善意協助為其繳納費用或存款等金錢管理；然因事前多無具體白紙黑字之授權，面臨援助不當之爭議時，多有金錢糾紛³⁵⁶，是漸有引進自立事業之考量。

（二）巨觀—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理念使然

針對前述改革理念之關懷，學者指出：較諸過去，此次改革毋寧更著重由「利用者」角度，仔細構築社會福祉制度—於利用人與服務提供者間，係屬對等關係，並藉此選擇所需服務；而為徹底實踐此目標，即有創設保護利用人制度之必要，如福祉服務利用支援及相關申訴機制³⁵⁷。按福祉服務利用契約具有「資訊非對稱性」，亦即，此類契約之給付內容多涉專業判斷，消費者方實難輕鬆掌握，且此類消費者多屬「判斷能力不足」，有透過支援從旁強化消費者主體性之必要；基此，為緩和弱肉強食之市場競爭，滿足消費者能夠自主決定之理念，國家即有整

³⁵⁴ 山下興一郎，〈社會福祉協議会の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福祉サービス利用者本人の意思決定と生活を支える制度〉，《判例タイムズ》，第1030期，2000年7月，頁203。

³⁵⁵ 大曾根寛，《成年後見と社會福祉法制—高齡者・障害者の権利擁護と社会的後見》，（京都，法律文化社，2003年），頁10-11、21。

³⁵⁶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335。

³⁵⁷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163。

備契約締結環境之責任³⁵⁸，而對自立事業漸生興趣。

三、實施主體

依社會福祉法第 81 條之意旨，係由都道府縣社及指定都市社協辦理；然而，前開社協得將事業內容之一部，委託³⁵⁹由市町村或地區社協辦理。而為辦理此項事務，都道府縣社協則設有「事業負責人」、「負責事業相關企劃及營運之職員」、「專門員」及「生活支援員」，又因後兩者與個案息息相關，故以之為論述重心；申言之，專門員係為確認利用申請人之契約締結能力，而出訪現場，並協助締結「利用援助契約」之人，至生活支援員則係按前開締結之契約內容，給予案主具體援助之人³⁶⁰。

四、利用人

詳言之，係指任何從事福利服務利用、或相關費用繳納等日常生活經營時，有作成適切判斷困難之人；惟其仍須具備締結「福利服務利用援助契約」之「意思能力」，是無行為能力人即不得利用此一援助³⁶¹。

五、實施流程³⁶²

首先，社協專門員會多方進行訪談—除本人外，亦會向其家族、轄區內民生委員、保健人員、行政機關為之，以充分掌握利用人之生活狀況，並依「契約締結判定準則（契約締結判定ガイドライン）」確認其契約締結能力，調查其生活狀態或經濟狀況；細部言之，前開判定流程如下：（一）專門員將先進行自

³⁵⁸ 菊池馨実，〈介護保険制度と利用者の権利擁護〉，《季刊社会保障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2000 年 9 月，頁 235-236；平田厚，〈「知的障害の子をもつ親」制度の利用〉，《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2000 年 7 月，頁 183；阿部和光，〈社会福祉における権利擁護の課題〉，《社会保障法》，第 15 期，2000 年，頁 187。

³⁵⁹ 因地利之便，實務上，都道府縣社協多會將業務委託於市町村社協，由前者監督後者從事第一線工作，略含：面談、受理申請與否之判斷、支援計畫之擬定、福祉服務利用援助契約之締結等。前述參見阿部和光，〈社会福祉における権利擁護の課題〉，頁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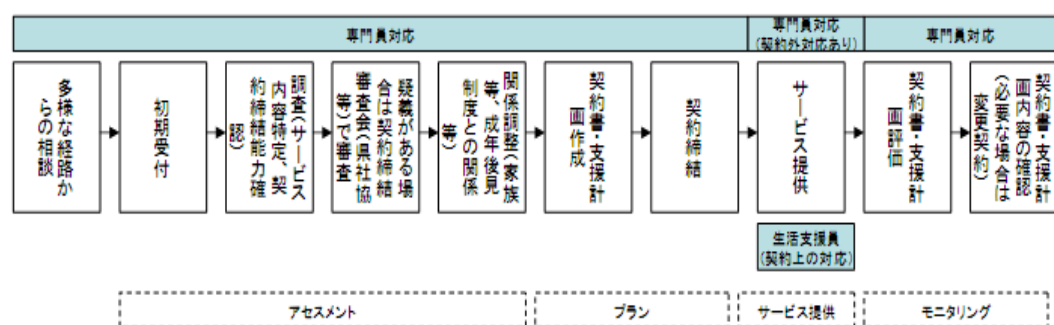
³⁶⁰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6。

³⁶¹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6。

³⁶² 此部分綜合整理自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7；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6；山下興一郎，〈社會福祉協議会の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福祉サービス利用者本人の意思決定と生活を支える制度〉，頁 206。

我介紹，表達社協之立場及任務，並確認利用申請人之溝通能力。(二) 透過簡明手冊之方式，介紹服務內容。(三) 聽取預先設定之調查事項，含意思表示能力、理解能力，契約要約確認、契約意思確認、利用人基本資訊、生活概況、將來生活計畫、援助之必要性等項目(四) 專門員談話尚須謹慎小心，不得催促或打斷利用人回答，接話或等待過程亦須留意。過程中，若對本人有無契約締結能力一事有所爭議，得在取得本人了解後，向都道府縣社協所設之「契約締結審查會」進行諮詢。而本人締約能力若已確認，且其意向亦經充分表達後，專門員可與其一同作成具體載明「何者、何時、如何為援助」之支援計畫。完成後，專門員將再次向本人針對前開計畫進行說明，以締結契約；另待契約締結後之隔周，專門員尚會再度拜訪申請人，二度確認其具備欲締約之意思。此時，方交棒於生活支援員，由其開始對利用人提供相關福利援助服務。

援助のプロセス



* 介護保険法、障害者自立支援法のケアマネジメントと同様のプロセス

(P13参照)

圖 3：實施流程示意

圖片參見厚生労働省社会・援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

六、服務內容

如前述，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既欲從尊重個人自主決定之觀點出發，打造令其得充分自我選擇之福祉服務利用制度，是可分下列四點說明³⁶³：(一) 關於福利服務之資訊提供及建議、(二)關於福利服務紛爭申訴機制之利用援助、(三) 住宅改造、居家房屋租借、日常生活消費契約及住民票等申請行政程序之援助，或其他福利服務適切利用之必要援助、(四) 為利用人日常生活所進行之存款處理、解約等程序：申言之，得為日常生活費設立特別帳戶(最高存入金額為 50 萬

³⁶³ 此部分綜合整理自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7；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7。

日圓)，生活支援員得在一定限度內為案主取用；若另有領款需求，則無庸屢次事先填寫委任狀，得改由社協向金融機關申請「代理人狀（代理人届）」，將本人欲設定「社協」為代理人之意旨，向金融機關登記，是生活支援員嗣後僅需提示請款書，即可請款，無疑相當便利迅速。

總的來說，援助內容若涉契約締結等「法律行為」之作成，而有事先授予代理權之必要時，則須對本人充分說明代理意旨，使其完全了解後，方得於契約書中載明代理權之授與及範圍。又為確認各式援助之具體內容及實施頻率，社協尚須於契約外，與利用人另簽訂前述所謂「支援計畫」。

七、利用費用

大體上，係採「**利用者負擔**」原則；各地區社協所收費用，則因地制宜³⁶⁴。雖政府對自立事業之進行有提供相當補助，而得降低業者所開出之服務價格，惟結果仍可能令低所得者感到負擔沉重；如何對資力不足之族群積極提供價格減免，係未來重要課題³⁶⁵。其次，由於生活支援員之薪資係從前開利用費收入所供給，亦造成該等支援員僱用之不安定，致僅得從民生委員或福利相關部門退休人員中尋找志工，使生活支援員之專業性大打折扣³⁶⁶。

八、申訴機制—「苦情解決」

此係依社會福祉法第 82 條所設，讓福利服務利用人及其家族或代理人等進行申訴，並提供意見，以改善服務為目的之機制。按利用人與業者間若對服務提供有所爭執，並循法律途徑，往往耗費許多金錢與時間，易使本居弱勢之利用人提早放棄；是本制度即為此所生³⁶⁷。

而依社會福祉法第 83 條規定，都道府縣之社協即負設立「**營運適正化委員會**」之義務，以為利用人之申訴機關；其委員選任尚應注重「人格高潔，對於社會福祉有其見地，且對社會福利、法律或醫療有學識經驗者」。又為確實達成前述選任目標，依社會福祉法施行令及同法施行規則，社協應另設立「選考委

³⁶⁴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9。

³⁶⁵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9。

³⁶⁶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0。另依厚生勞動省 2007 年之資料顯示，申請人平均一個月會利用兩次，每次費用平均為 1200 日圓，參見厚生勞動省社会・援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

³⁶⁷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1。

員會（依社會福祉法施行令第6條第4項規定，係由代表「利用人、經營方及公益」者所組成），負責處理相關事務。至其業務，依社會福祉法第85條規定，係因應聲請人之會面談話，進行相關調查，並給予適當建議；若委員會認申訴人及對造間適於調解時，則可告知其得進行相關程序—此際，該等委員將同時轉為「調解委員」³⁶⁸。又申訴過程中，選考委員會若於受理申訴並進行調查後，就「對利用人所為建議、業者之申請必要或內容」，發現有不當處遇之情形時，依社會福祉法第86條，即負立即通知都道府縣知事之義務。前述處理情形，含處理件數、內容及結果，將在考量隱私權之前提下，一年至少一次，由營運適正化委員會予以公佈³⁶⁹。

實踐上，因申訴人易歸於消極不安，而有「委員是否能充分了解我？」、「表達內容是否會被認定有異？」等感受，申訴機關須立於「充權」觀點給予充分支援。具體來說，應讓利用人完整了解並信賴，其將得以自在表達自身感受；而對表達困難者或具表達障礙者，更應提供足夠技術，使其能暢所欲言；甚者，進行申訴之當事人皆希冀能發現真實，如何以誠心誠意之姿態，妥善說明，圓滿解決，即屬重要³⁷⁰。另因社協同時作為服務提供者及申訴機關，如何確保「營運適正化委員會」之公平及中立性，難免有所疑問；且該等委員非屬常設性質，是不得不由事務局事先處理大部分之申訴業務，而多少減損特別設置此等委員會之初衷³⁷¹。

³⁶⁸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權利擁護〉頁342-343。

³⁶⁹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權利擁護〉頁343。

³⁷⁰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權利擁護〉頁347。

³⁷¹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權利擁護〉頁346。

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の流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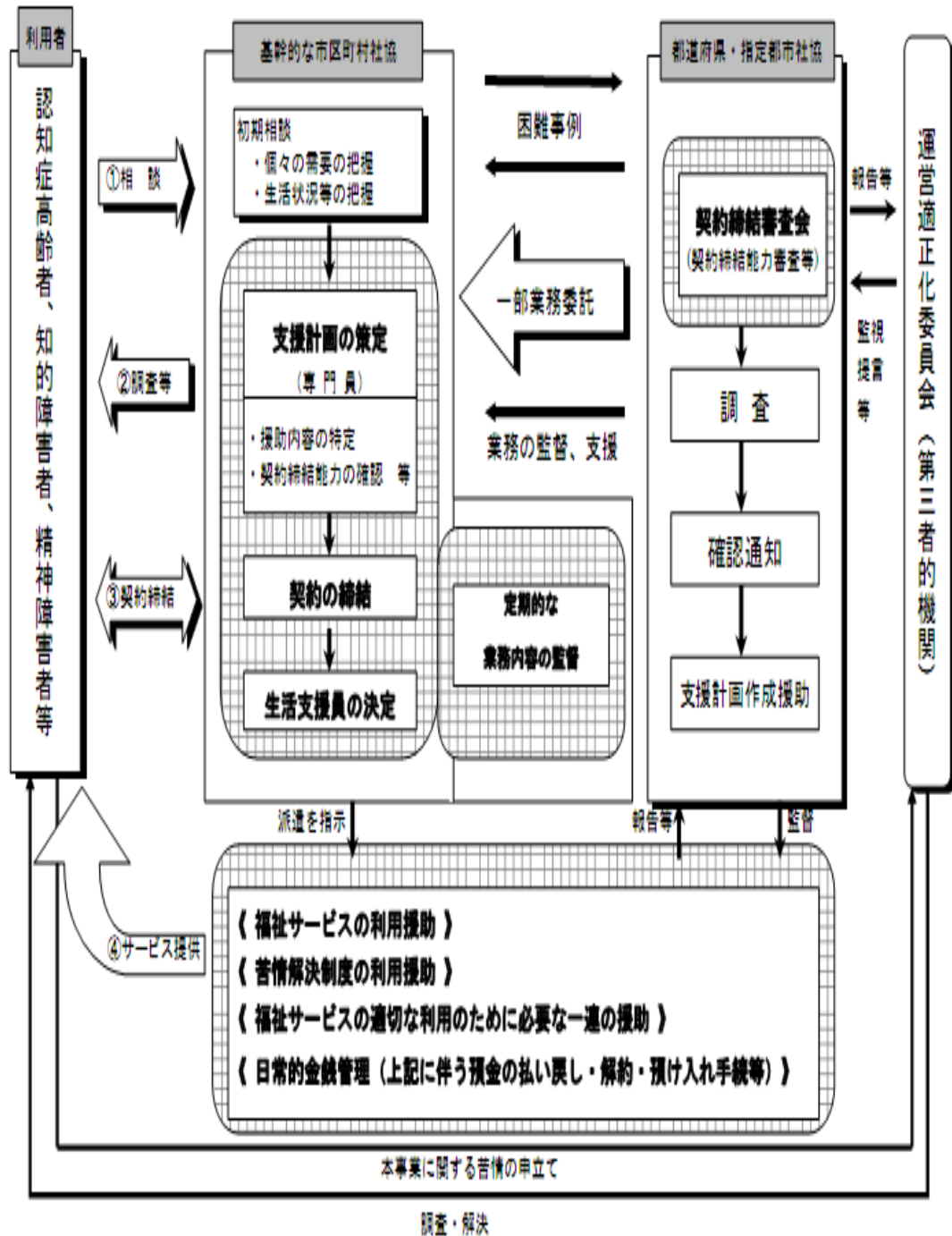


図 4：自立事業運作總示意图

圖片截自厚生労働省社会・援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

肆、代結論—日本經驗之簡要反思

綜上所述，自立事業係立基財產安全維護之需求及社會福祉基礎之改革浪潮，對於失智老人、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經社協專門員會多方訪談，方給予福利服務之資訊提供、援助及利用人日常生活所需進行之存款處理、解約，並提供申訴機制；如此，難謂未建構一定支持體系，使其得擺脫經濟虐待之壓迫，為智能障礙者與精神障礙者之高齡者生活自立，提供相當充分幫助，開拓老人保護之可能性。申言之，此制度進入案主之社會系統，如家庭、同儕團體、組織與社區，關心個人與社會環境之聯結或互動結果，以探求其真實需求，而令其「解放」—亦即人們雖曾因年齡、族群、階級、身心障礙、文化差異、性別與性取向等不同，受有歧視與壓迫，卻能相關團體之支援下，在動態之生命週期中，逐漸「充權」³⁷²。尤其學者³⁷³研究指出，老人於使用社會服務之協助時，常會擔心自己被標籤為「依賴者」；按臺灣老人福利向來多以孤苦無依之老人為對象，使接受政府福利服務之人，易將給付聯想為一種恥辱，並形成自我烙印之效果，令人裹足不前，無法勇敢申請或使用服務。基此，若要改變人民對於社會服務之態度，除須加強宣導「社會福利作為人民權利」之觀念外，服務提供者更應尊重老人之自我決定權，營造一個能讓老人感受成就之環境，讓使用者卸下作為「依賴者」之心防³⁷⁴。自立事業之設計，即係因此而生。

然而，如同日本學者³⁷⁵所指出，自立事業之服務提供乃至整體制度修正，係以「福利多元主義」為基底，孕育相關規範；若將自立事業移植至我國，回顧臺灣社經環境是否妥適，此即本部分首欲關心之處。細部言之，福利多元主義認為社會服務之提供，政府部門非唯一媒介，尚可由志願部門、商業部門及非正式部門為之；蓋福利國家資源過度集中，運作組織過度科層且權威，無法及時反應人民之需求，是嘗試導入競爭因子，令服務方案能更貼進使用者之心意³⁷⁶。實施過程中，應健全市場結構，令消費者具備足夠資訊，且服務提供者

³⁷² 黃松林，〈反壓迫實務與老人照顧〉，《社區發展季刊》，第 106 期，2004 年 6 月，頁 123、126。

³⁷³ 呂寶靜，〈老人使用日間照護服務的決定過程：誰的需求？誰的決定？〉，《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1 期，1999 年 5 月，頁 222。

³⁷⁴ 黃松林〈反壓迫實務與老人照顧〉，頁 123。

³⁷⁵ 本多滝夫，〈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社会福祉行政組織の変容〉，《社会保障法》，第 15 期，2000 年，頁 56。

³⁷⁶ 黃源協，〈臺灣社區照顧的實施與衝擊—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5

有動機進行普遍服務；政府若是如此將任務移轉至私人部門，始得認僅為減輕負擔，改變物質或服務之傳遞方式，尚非迴避責任³⁷⁷。

正面來看，透過相關立法引進民間力量，設計如自立事業之福利服務支援系統，除可望得節省政府有關組織人力之支出外，更得將非營利組織與人民間之互動，予以制度化，令雙方一舉一動皆須在國家所圈選之遊戲規則下為之，使專業社工人員得以提供效率且多元之服務，保障人民能享有公平合理之照顧³⁷⁸。且老人福利法第 8 條，針對「引進民間力量，以服務或照顧老人」一事，實早有明文如後：「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各本其職掌，對老人提供服務及照顧（第 1 項）...前項對老人提供之服務及照顧，得結合民間資源，以補助、委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補助、委託對象、項目、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 3 項）。」故若欲仿效前述日本制度，在組織合法性上並無問題。

相對前述，不外乎「效率、競爭、願景、普遍、財政」等考量，反之取其要者³⁷⁹，其一，大多數文獻在探討民營化功能時，多認定民營化可³⁸⁰減少政府人力配置，由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社會福利則可提供成本較低之方案及較高效率之服務；然而，實作之際，是否確實存有「自由競爭市場」？即屬有疑，按臺灣之現實問題係：部分縣市非營利團體少而弱，在合格供應者有限之前提下，若強行推動民營化，即助成「高度資源集中化」而享有獨占性，並形成「勉力拜託進場」之尷尬局面。此外，所謂的效率和效能仍無客觀且具體之衡量指標，如何能進一步落

期，2001 年 5 月，頁 58-61；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7 卷第 2 期，1995 年 9 月，頁 152-153；河村倫哉，〈福祉多元主義の意義と問題〉，《大阪外国語大学論集》，第 24 期，2001 年 3 月，頁 74。

³⁷⁷ 姚蘊慧，〈社會福利民營化的省思〉，《通議研究集刊》，第 5 期，2004 年 6 月，頁 42。

³⁷⁸ 江亮演、應福國，〈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 108 期，2005 年 1 月，頁 58-59。

³⁷⁹ 綜合整理自：江亮演、應福國，〈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頁 60；姚蘊慧，〈社會福利民營化的省思〉，頁 48-49；劉淑瓊，〈社會服務「民營化」再探：迷思與現實〉，《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5 卷第 2 期，2001 年 12 月，頁 17-19、24；黃源協，〈臺灣社區照顧的實施與衝擊—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頁 58-61、92-95；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頁 159-160；西村健一郎、岩村正彥、菊池馨実編，《社会保障法 Case and Materials》，（東京：有斐閣，2009 年），頁 362。

³⁸⁰ 至對於任務如何移轉至私部門（如法令規範、財源、生產、配置等要素），詳細描述可參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頁 154-157。

實成本效益分析？縱得計算，難保不會因成本降低導致服務品質下降。且私立社會福利與醫療機構亦有可能未因競爭而降價，委託服務反使行政工作複雜化，政府需花費更多時間與人力，從事監督與評鑑工作。**其二**，隨著民營化之發展，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仰賴政府補助或購買服務契約之經費比例愈來愈高，有的占機構總預算一半，有的甚達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之譜；然而，政府經費具有不確定性與低額度性，前述深度之財務依賴狀況將會造成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之未來不可預測性和營運風險。民間單位為獲取經費來源，必須配合政府之方案要求，使組織犧牲傳統之自主色彩。除非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能積極採取「廣闢各種財務管道」、「責信的建立」、「與政府建立夥伴關係」、「與其他機構合作或策略聯盟」、「人力精簡措施」、「尋求組織管理之道」，並透過「政治辯護」來提高政府補助金額，否則財務依賴將不利組織生存與發展。**其三**，民間團體與學者經常批評的是，政府於移轉照顧責任時，往往將「何者得以何種方式享受服務」之決定標準，併同交予非營利組織，是有需要之人能否得到資源、資訊接近性低之人可否得到服務、機構是否會選擇案主？易生爭議。**其四**，福利多元主義無非希望透過民間力量，降低政府施政成本，惟隨著民營化項目、範圍之蔓延，相關委託或補助總費用不免水漲船高，對於財政持續困難之中央及地方政府而言，如何編列足夠預算因應，將會是一巨大考驗。

然而，儘管社會福利民營化有以上的限制，惟民營化仍係社會福利服務輸送之未來選項，按政府無法獨占福利市場，亦無法滿足每位福利消費者之個別需求，私部門之營利部門亦難期待在無利可圖下，填補政府空缺，非營利部門同因資源問題亦難為之，尚須**各方發揮相互特色，共同協力補充彼此不足**。申言之，政府之目標在於贏取多數選民之支持，爭取執政，內部則以「權威層級式」為凝聚；企業所追求者，則在於利潤及市占率之極大化，以「競爭」作為前進之動力；而非營利組織³⁸¹則在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公共利益，以「信任」為合作基礎³⁸²。前述如是，則應於充分針對福利服務及公私部門之特色進行比對考量後，方透過民間力量（尤其係非營利組織），提倡大眾參與，發揮政府財

³⁸¹ 針對非營利組織中有關志願服務及就業情況之深入描述，請參呂朝賢、鄭清霞主筆部分，〈非營利組織與志願服務〉，官有垣、鄭清霞主筆部分，〈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就業〉，均於蕭新煌、官有垣、陸宛蘋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臺北：巨流 2009 年），頁 151-175、197-221。

³⁸² 孫煒、蕭全政，〈全球化潮流下台灣公私部門組合型態的制度性安排〉，《政治科學論叢》，第 58 期，2013 年 12 月，頁 111-112。

力、物力資源，結合民間有能力、有意願之團體，運用專業人員提昇服務品質，並代替弱勢向政治團體倡議，方可圓滿案主之迫切需要³⁸³。

行政的弱點	NPO 的強項
偏好中間思想，無法對應特殊需求	得以對應少數需求。
較無彈性	迅速、彈性

圖 5：從需求滿足觀察「福利行政獨佔」之可行

本圖參照廣川嘉裕，〈行政と NPO の協働に関する理論〉，頁 89。

不過，因歸納我國憲法體系可知，相關社會福利之維護本屬政府義務，司法院釋字第 485 號亦揭其旨：「憲法係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本原則，此觀憲法前言、第一條、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自明。本此原則國家應提供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是國家角色縱自往昔「給付國家」轉為「保障國家」，對人民生存照顧所負之責任亦從給付責任成為保障責任，國家仍應透過引導、管制及監督等各式措施，確保人民生存所需之相關物質與服務，得以如同國家自身所提供一般，由私人為「普及與無差別」待遇³⁸⁴。具體來說，保障責任有如下述³⁸⁵：（一）給付不中斷之擔保義務。（二）維持與促進競爭之擔保義務，（三）合理價格與服務品質之擔保義務（含人員資格認定、評價及進修制度）。（四）既有員工安置之擔保義務。（五）人權保障及國家賠償責任之承擔。

簡言之，監督標準與管制是否確能落實，進而維繫照顧品質，將是福利多元主義及自立事業能否充分引進之關鍵，亦將嚴重關係至服務利用人之選擇及充權；否則終將成為學者口中「政府推推卸照顧責任之糖衣」³⁸⁶。

³⁸³ 江亮演、應福國，〈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頁 61；劉華美，〈論老人服務民營化—公私協力之行政〉，《社區發展季刊》，第 108 期，2005 年 1 月，頁 87；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頁 157-158；廣川嘉裕，〈行政と NPO の協働に関する理論〉，《ノモス》，第 19 期，2006 年 12 月，頁 92；河村倫哉，〈福祉多元主義の意義と問題〉，頁 78。

³⁸⁴ 詹鎮榮，〈生存照顧〉，《民營化法與管制革新》，（臺北：元照，2005 年），頁 279。

³⁸⁵ 詳情請見許宗力，論行政任務的民營化，法與國家權力（二），（臺北：元照，2007 年），頁 454-458。

³⁸⁶ 黃源協，〈臺灣社區照顧的實施與衝擊—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頁 94-95。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專書

蕭新煌、官有垣、陸宛蘋編，2009 年。《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臺北：巨流。

(二) 專書論文

江亮演、應福國，2005/1。〈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 108 期，頁 54-71。

許宗力，論行政任務的民營化，法與國家權力（二），（臺北：元照，2007 年），頁 425-459。

詹鎮榮，2005 年。〈生存照顧〉，《民營化法與管制革新》。臺北：元照，頁 275-280。

(三) 期刊論文

呂寶靜，1999/5。〈老人使用日間照護服務的決定過程：誰的需求？誰的決定？〉，《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1 期，頁 181-229。

黃松林，2004/6。〈反壓迫實務與老人照顧〉，《社區發展季刊》，第 106 期，頁 123-131。

黃源協，2001/5。〈臺灣社區照顧的實施與衝擊—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5 期，頁 55-101

孫煒、蕭全政，2013/12。〈全球化潮流下台灣公私部門組合型態的制度性安排〉，《政治科學論叢》，第 58 期，頁 109-138。

孫靜芸、林怡秀、黃小萍、徐旭香、葉淑惠，2012/12。〈老人虐待之概念分析〉，《高雄護理雜誌》，第 29 卷第 3 期，頁 73-80。

姚蘊慧，2004/6。〈社會福利民營化的省思〉，《通識研究集刊》，第 5 期，頁 39-52。

謝茉莉、方文輝、吳柄緯，2013/12。〈老人人際親密、社會參與及心理健康狀

況之相關研究》，《台灣老人保健學刊》，第 9 卷第 2 期，頁 109-125。

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1995/9。〈「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7 卷第 2 期，頁 147-174。

劉淑瓊，2001/12。〈社會服務「民營化」再探：迷思與現實〉，《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5 卷第 2 期，頁 7-56

劉華美，2005/1。〈論老人服務民營化—公私協力之行政〉，《社區發展季刊》，第 108 期，頁 82-89

（四）網際網路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報告》，頁 13。《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ezcatfiles/b001/img/img/28/108563462.pdf>>。

吳玉琴，2009 年。《台灣老人保護工作的挑戰與契機》，《老人保護資訊平台》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15814.pdf>>。

洪國程，2009 年。《高齡者經濟安全保障—嬰兒潮世代對財產信託態度實證研究》，《老人保護資訊平台》，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20044.pdf>>。

二、日文部分

（一）專書

大曾根寬，2003 年。《成年後見と社會福祉法制—高齢者・障害者の権利擁護と社会的後見》。京都，法律文化社。

工藤恒夫，2009 年。《資本制社会保障の一般理論》。東京：新日本。

井上英夫、高野範成編，2007 年。《實務社会保障法講義》。東京，民事法研究会。

田多英範，2007 年。《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東京：光生館。

西村健一郎，2007 年。《社会保障法》。東京：有斐閣。

西村健一郎、岩村正彦、菊池馨実編，2009 年《社会保障法 Case and

Materials》。東京：有斐閣。

岩村正彦編，2008 年。《高齢化社会と法》。東京：有斐閣。

坂田周一，2012 年。《社会福祉政策》。東京：有斐閣。

菊池馨実，2014 年。《社会保障法》。東京：有斐閣。

（二）專書論文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2008 年。〈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菊池馨実編，《自立支援と社会保障—主体性を尊重する福祉、医療、所得保障を求めて》。東京：日本加除，2008 年）。

山下興一郎，2000/7。〈社会福祉協議会の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福祉サービス利用者本人の意思決定と生活を支える制度〉，《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頁 203-212。

矢嶋里絵主筆部分，2001 年。〈福祉サービスの紛争解決〉，日本社会福祉法学会編，《社会保障法講座第 3 卷社会福祉サービス法》。京都：法律文化社。

（三）期刊論文

中村直樹，2014/2。〈自立支援と社会福祉：社会福祉の政策と援助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こと〉，《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第 64 巻第 2 期，頁 43-52。

古都賢一，2000/7。〈福祉サービスと苦情解決〉，《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頁 169-177。

本多滝夫，2001 〈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社会福祉行政組織の変容〉，《社会保障法》，第 16 期，2000 年，頁 55-70。

阿部和光，，2000。〈社会福祉における権利擁護の課題〉，《社会保障法》，第 15 期，頁 185-196。

西原博史，2008/11。〈生存権論の理論的課題--自己決定・社会的包摂・潜在能力〉，《法律時報》，第 80 巻第 12 期，頁 81-85。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2012 年。〈社会福祉法制の構造と変容〉，日本社会福祉法学会編，《新講座社会保障法第 2 巻—地域生活を支える社会福祉》。京都：法律文化社，2012 年）

竹中勳 2005/5。〈高齢者と人権保障・憲法学〉，《法律時報》，第 77 卷第 5 期，2005 年 5 月，頁 21-25。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2008 年。〈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菊池馨実編，《自立支援と社会保障—主体性を尊重する、福祉、医療、所得保障を求めて》。東京：日本加除。

河村倫哉，2001/3。〈福祉多元主義の意義と問題〉，《大阪外国語大学論集》，第 24 期，頁 71-84。

青木重仁，，2000/7。〈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頁 162-168。

笹沼弘志，2003/7。〈社会権保障における自立と保護〉，《法律時報》，第 75 卷第 8 期，頁 57-61。

菊池馨実，2008。〈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人間像〉，《法律時報》，第 80 卷第 11 期，頁 69-74。

菊池馨実，2000/9。〈介護保険制度と利用者の権利擁護〉，《季刊社会保障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頁 235-245。

平田厚，2000/7。〈「知的障害の子をもつ親」制度の利用〉，《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頁 183-187。

橋本宏子主筆部分，2001 年。〈福祉をめぐる状況と展望〉，日本社会保障法学会編，《社会保障法講座第 3 卷社会福祉サービス法》。京都：法律文化社。

廣川嘉裕，2006/12。〈行政と NPO の協働に関する理論〉，《ノモス》，第 19 期，頁 87-98。

（四）網際網路

厚生労働省社会・援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http://www.mhlw.go.jp/shingi/2007/11/dl/s1119-7e.pdf>〉。

場次四：

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

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

—日本國防外交突破與未來可能發展

魏丞宣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隨著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安倍政府除了透過地球儀外交，積極輸出日本影響力，武器外交更是有深度化影響力，在一系列的新安保法案中，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是安倍政府邁向「正常化國家」的第一階段。本文從武器出口解禁前後，探討日本在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目前的作為，分析軍事外交與轉變，並提出此原則下產生的優勢與隱憂，最後盤點日本應有所為，輔以報導文獻回顧。另一方面，武器出口傳帶諸多條件，日本能否順利輸出，政府的態度與作為將是關鍵。

關鍵詞：防衛裝備、武器出口、軍工業、安倍首相、軍事

壹、前言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方法除了提高國家軍力，³⁸⁷經濟實力的提升，也可以採取外交手段，積極向外爭取軍事合作，結盟他國或是弱化他國的聯盟。身處地緣政治因素複雜的日本，外交長期陷入與他國領土之糾紛，與南韓之獨島之爭；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之爭；與中國大陸、台灣釣魚島之爭；北韓發展核武和無預警試射飛彈，甚至飛越日本領土，尤其中國大陸方面軍事提升的壓力，加深日本強化軍事國力的決心。

二戰結束後，美國佔領日本，美國為首盟軍制定日本憲法，美日安保條約³⁸⁸就順勢產生，使日本接受美國的保護之下，美國也藉由佔領日本確保周邊區域穩定，戰後美日安保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軸，直到近幾年，日本政府在國防改革上，漸漸脫離美日安保下「專守防衛」³⁸⁹政策，化被動為主動，修改一系列

³⁸⁷ 較非量化因素除軍備包含、軍隊士氣、後備軍人、更重要的是國民的支持。

³⁸⁸ 1951年9月8日簽訂。

³⁸⁹ 日本遭受攻擊時才能行使個別自衛權。

的安保法案，母法是「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³⁹⁰、「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前者是一系列國家安全法案，後者是自衛隊派遣海外支援他國的特別法案，2012年底安倍晉三重返執政，2013年12月1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新的《防衛計畫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三項攸關外交、安保政策之文件。³⁹¹這是涵蓋防衛與安全領域綱要性政策。

2014年4月1日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實現安倍首相的第一階段，日本社會上會對武器出口解禁有疑慮以及反對的聲音，認為違背和平憲法，但是隨著日本國內經濟低迷與國際大環境結構影響，加上自民黨為主的「國防族」³⁹²不斷施加壓力，安倍、自民黨與公民黨利用國會優勢通過。本文探討日本從武器出口三原則到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檢視日本的軍售變化，在國際上作為的改變，評估武器出口解禁未來軍售可能帶來的影響，最後結論並提出筆者一些看法。

貳、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前後

2014年4月1日，日本安倍內閣會議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1967年制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則」，³⁹³新三原則為有條件鬆綁禁止原則，其一、不出口武器給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之紛爭國家；其二、有助於國際合作與和平原則及有助於日本國家安全，並嚴格審查；其三、將防衛裝備用於目的之外及移轉第三國時，需事先經過日本同意並妥善保管。³⁹⁴防衛移轉三原則為日本武器出口多了法制化的窗口，仍有諸多附加前提，並且需經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³⁹⁵層層審查，以及定期報告與資訊公開等義務，比起歐美或其他國家武器出口，限制仍是較多。³⁹⁶

早在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在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明確表示將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鑒於武器一詞太過於敏感，安倍政府以防衛裝備來代替，減少日本民眾對此敏感性。內閣新聞稿聲稱，隨著安全環境的變化，有必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防衛裝備向海外的妥善轉讓，將有助於積極推進國際和平與維持穩定，以及日本防衛生產技術基礎的維持和強化。促成這次修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日兩國共同研發海基式飛彈防禦系統的計畫，許多重要零組件都在日本製造，如果要供應給美軍使用，武器輸出原則勢必要做修

³⁹⁰ 包含武力攻擊暨存立危機事態法、重要影響事態法案、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等10項法案。

³⁹¹ 〈日美與美國競合互動最新情勢〉，《中央日報》，2014年3月18日。

³⁹²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2680572&page=1>。

³⁹³ 指一群長期關注日本國防議題的政治人物、議員、與國防企業關係緊密政府代理人等…。

³⁹⁴ 禁止武器輸出至共產主義國家、聯合國決議武器禁運國家、國際衝突爭議國家

³⁹⁵ 防衛省・自衛隊，〈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の内容〉，《平成27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2242000.html>>。

³⁹⁶ 根據《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由首相、官房長官、防衛相、外相組成會議。

³⁹⁷ 易子聖，〈日本海外「作戰行動」時機近了嗎~探討「軍備輸出和集體自衛權」未來〉，《亞太防務》，第84期，2015年4月，頁35。

正。³⁹⁷但日本內閣新聞稿聲稱：「透過妥善管理與轉移，積極推動國際和平與維持穩定，日本將繼續堅持和平國家的基本理念。」³⁹⁸但是，問題也產生。

歷史道歉問題、慰安婦議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始終圍繞著日本政府糾纏，不管是國內國外，爭議一直存在，但在武器出口解禁似乎沒有受到太大阻力，安倍政府也一直強調武器出口前都需要經過嚴格審查程序，尤其是中國大陸以「疑慮」的態度並提醒日本政府審慎評估武器出口對區域安全的影響。根據BBC報導，無論是自民黨政權還是民主黨政權都發表過官房長官談話，推進放寬出口武器原則，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如不加入國際合作開發武器和生產的形勢，日本將在軍工領域落伍。³⁹⁹美國在背後支持是主要推力之一，況且日本軍工業極需資金的投入，因為日本軍購內需市場不大，成本考量，跟美國採購比例較高，長期國防預算低落。自安倍政府上台，國防改革中將增加預算，畢竟，資金是維持技術研發的關鍵。當初在嚴苛的環境⁴⁰⁰下生存日本的傳統軍工企業，現在出現新的發展契機。

1967 年	佐藤榮作	對武器出口三原則作出解釋「共產國家、聯合國武器禁運、對可能捲入或已經捲入國際紛爭或衝突國家，三條件之一都禁止出口武器。」
1976 年	三木武夫	擴大原則「慎重向三原則以外條件國家出口武器，並列武器有關設備為準武器。」
1983 年	中曾根康弘	基於美日安保條約，允許提供美國武器技術。
2005 年	小泉純一郎	把與美國合作開發案、彈道飛彈武器系統列為例外。
2011 年	野田佳彥	允許輸出武器和技術與日本安保關係的國家，並須向和平貢獻並遵守國際武器出口規定的國家，不得向第三國轉移情況下出口。
2014 年	安倍晉三	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

作者自行整理：防衛移轉三原則相關進程

參、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下軍事外交與轉變

雖然日本已解禁武器輸出三原則，根據國家安全保障局次長高見澤指出日

³⁹⁷ 徐家仁，〈日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 中韓有疑慮〉，《公視新聞網》，2014 年 4 月 2 日
<<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65816>>.

³⁹⁸ 外務省，〈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報道発表》，2014 年 4 月 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0805.html>.

³⁹⁹ 童倩，〈安倍政權顯出解禁武器出框架〉，《BBC 中文網》，2014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2/140224_japan_cabinet_weapon>

⁴⁰⁰ 日本軍備無法輸出，國防預算低落時期。

本未來將出口救難、運輸、監視、掃雷等技術與設備，暫不考慮出口坦克及戰機，在新三原則規範下，日本決定出口救難機到印度，出口地雷探測機到開發中國家，出口反海盜巡邏艦到印尼、菲律賓及其他東南亞國家。⁴⁰¹

日本以政府開發援助為主，武器輸出為輔，搭配安倍的地球儀外交，積極向外拓展實力，日本贈送菲律賓多艘有武裝的巡邏艇；日本還將出售海上自衛隊所使用的 US-2 型水上飛機給印度，執行救難任務。日本與法國在 2+2 會議⁴⁰²上，簽署《共同開發防衛裝備協定》，將共同研發水下無人機、用於處理輻射污染作業與爆裂物處置的機器人，還共同鄭重聲明打擊恐怖主義，拒絕對恐怖分子金援、交易武器行為，並加強雙邊關係⁴⁰³這是繼美國、英國、澳洲第四個國家與日本所簽訂的防衛裝備協議。

日本軍工業配合政府政策，與美、英、法等國共同研發武器，孕育出研發及生產力良好的民營軍工業⁴⁰⁴，在防衛白皮書指出：⁴⁰⁵

（一）深化與歐美國家防備裝備與技術合作，

愛國者二型海外技術轉移、F-35 共同研發、建立共同平台使陸上自衛隊引進魚鷹機。

（二）與太平洋友好國家技術合作，

澳大利亞潛艇技術聯合開發與技術轉移、印度 US-2 技術轉讓。

（三）應用於民間產業

授權部分國防技術給民間產業使用，例如：C-2 飛機技術資料。

（四）技術管理

促進嚴格審查，強化技術管理，保護日本技術。

綜觀武器外交，日本更與菲律賓舉行首次雙方軍事演習，普遍認為這是對中國在南海作為上的抗議，美國與日例行兩年一次規模更大的「利劍」演習，訓練項目因情勢不同而有所變化，像是當釣魚台主權紛爭時，奪島訓練項目就被列為是重點。聯合軍事演習代表著三種訊息：參與演習國家之間的作戰協調性、保持軍隊高昂的鬥志，展現自衛隊的雄心、震懾他國。

日本向澳洲輸出蒼龍級潛艦技術，強化美、日、澳軍事同盟，日本自我武裝的加強符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利益，美日安保的轉型，美國需要日本承擔更多亞洲和平與安全責任，更樂見武器適當解禁出口。

張景全教授認為：「短期而言，武器出口禁令放寬會增加日美雙方整體實力

⁴⁰¹ 〈日本放寬武器出口 針對中國布局〉，《泰國世界日報》，2014 年 4 月 7 日。

<http://www.udnbnk.com/article/2014/0407/article_116111.html>

⁴⁰² 由兩國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出席的會議，探討日法國家安全、外交相關議題。

⁴⁰³ Masaaki Kameda, “Japan, France ink defense gear transfer pact at-plus-two meeting” *The Japan Times NEWS*, May 13, 2015.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3/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france-ink-defense-gear-transfer-pact-at-two-plus-two-meeting/#.VgNhVPmSz4y>>.

⁴⁰⁴ 包含三菱重工、豐田、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

⁴⁰⁵ 〈防衛裝備・技術協力〉，《平成 27 年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3241000.html>>

和戰略動機，從而暫時增強美日同盟的威攝力。然而，長期看來，武器出口放框以及隨後解禁集體自衛權正催生出一個具有強大防衛產業、廣泛防衛合作對象和更大防衛空間的日本，維持美日同盟穩定的傳統結構與觀念將悉數瓦解。」⁴⁰⁶ 筆者認為美日同盟將有更全面化的變質，長期而言不至於瓦解，而是會因國際情勢，日本未來遭遇的任何困境在面對抉擇時足以動搖美日同盟，但那也說明美日同盟又到另一個轉型階段。2015 年 4 月，美國國防部長卡特 (Ashton Carter) 訪日，會後卡特表示，即將完成的美日共同防衛指針會改變美日雙邊同盟的形態，並有助於應對來自亞太和全球的挑戰，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原則表示，這是更加牢固美日同盟的措舉。⁴⁰⁷ 在 2+2 美日安全磋商會議後，美日軍事交流也更為頻繁，一個名為日本觀察員交流計畫(JOEP)⁴⁰⁸，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藉由交流計畫，進行交流訓練，並與日本陸上自衛隊員分享兩棲作戰經驗，美軍指揮官說：「與盟友一起訓練是很重要，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這地區未來無論是救災或偶發事故的挑戰。」⁴⁰⁹ 在面對日本周邊區域衝突可能性提高，甚至影響到日本海上航行安全，周邊航空交通，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或許有特別例外的產生，日本國會在 911 事件後，緊急通過的《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即為一例，為提供美軍船隻補給開出特例。

2014 年 7 月歐洲國際防衛展在巴黎舉行，在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下，這次日本首次有防衛裝備在外國展出，儘管這次「日本館」展出的多半是民用產品，但隨著日本長期奉行「武器出口三原則」今年 4 月鬆綁，安倍晉三政府積極鼓勵日本輸出武器裝備，此次參展堪稱賣出一大步。⁴¹⁰ 要輸出軍品到國際市場，除了邀請客戶來國內探訪，藉由會展的展售，加上外國客戶現場體驗產品的可用性，增加客戶興趣。2015 年 5 月 13 至 15 日，日本港都橫濱地區舉辦「海洋系統與科技展」，日本國內外共 125 家廠商參展，展出海軍最新裝備與技術，日本兩大國防工業廠商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也都參展，這是日本國內頭一次舉辦以海洋安全為主題的防衛裝備展。⁴¹¹ 這是自武器出口解禁後，日本自己主辦的防衛裝備展，顯示日本軍工企業已躍躍欲試，向國際市場試水溫，技術面問題將是考驗。

⁴⁰⁶ 張景全，〈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禁令及其對日美同盟的影響〉，《日本學刊》，第 6 期，2014 年 11 月 14 日。

<http://qk.cass.cn/rbxk/zdtj/201411/t20141114_50804.htm>

⁴⁰⁷ 趙國材，〈中、美、日在亞太較勁〉，《觀察》，第 21 期，2015 年 5 月，頁 40。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687>>.

⁴⁰⁸ Japanese Observer Exchange Program. 日本陸上自衛隊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交流計畫。

⁴⁰⁹ Ryan, "JGSDF COMES TOGETHER WITH U.S. MARINES," MARINES, MAY 7, 2015, <<http://www.marines.mil/News/NewsDisplay/tabid/3258/Article/587911/jgsdf-comes-together-with-us-marines.aspx>>.

⁴¹⁰ 編譯中心，〈日鬆綁售武，首參加巴黎武器展〉，《世界新聞網》，2014 年 6 月 18 日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1396/article-%E6%97%A5%E9%AC%86%E7%B6%81%E5%94%AE%E6%AD%A6-%E9%A6%96%E5%8F%83%E5%8A%A0%E5%B7%B4%E9%BB%8E%E6%AD%A6%E5%99%A8%E5%B1%95/>>.

⁴¹¹ 黃菁菁，〈日內閣通過集體自衛權法案〉，《中時電子報》，2015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5000505-260108>>.

路透社報導，日本拓殖大學教授佐藤丙作表示：「武器出口解禁有助於日本國防企業參加武器研發與製造，進而取得尖端技術。一個像日本這樣的封閉市場，你能清楚地體會技術發展的落後。」⁴¹²但是，日本軍工企業對於武器出口初期還是相當謹慎，配合政府政策，會先出口部分非爭議的防衛裝備。日本防衛相關企業多數都不是專門的防衛專業製造商，而是在力圖妥善調節民用產業與經營資源的同時維持發展防衛產業。⁴¹³相較於尖端武器技術，日本部分技術像是圖像感測器技術、碳纖維航空零組件技術可授權民間運用，因為這些無法製成一個產品，小規模生產昂貴，又屬於非敏感性技術，日本政府可授權於民間企業使用。⁴¹⁴安倍內閣對於武器出口仍有日本企業觀望態度、美國國防工業合作障礙、政治決定與內鬥。⁴¹⁵所以日本內部整合

肆、日本優勢與隱憂

一、優勢

（一）軍工企業再進化

武器出口的解禁對於日本軍工產業意義重大，透過不斷研發與投資，並且掌握關鍵技術，在軍備技術面的交流上掌握軍事發展話語權，讓軍工企業保有競爭力，相對地，日本對如戰機引擎、雷達系統等關鍵技術的缺乏...，仍須向外國軍事工業引進關鍵技術，借重國際技術交流與分享，便於參與國際間合作開發及生產國防裝備。

（二）出售武器

日本經濟不振，長期而言，逐步的放寬武器出口限制，適時提振日本出口，帶動整個相關生產鏈；日本也積極推動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出售武器給部分無爭議的非洲國家，除了可以增加聯合國的票源，中國本身更是非洲最大援助暨貿易國，更可以削弱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幫助亞洲不管是美日盟友或是日本欲牽制中國的盟友發展自衛力量，達到遏止中國戰略目的。

（三）軍事交流擴大

⁴¹² Kiyoshi Takenakak and Nobuhibo kubo, "Japan relaxes arms export regime to fortify defense," *REUTERS*, April 1,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1/us-japan-defence-idUSBREA2U1VF20140401>>.

⁴¹³ 白石隆，〈為參加 TPP 談判與維持完善防衛能力，制定中長期戰略〉，《nippon.com》，2012 年 7 月 30 日。

<<http://www.nippon.com/hk/editor/f00009/>>.

⁴¹⁴ Jonathan Soble, "With Ban on Exports, Japan Arm Makers Cautiously Market Wars Abroad,"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7/13/business/international/with-ban-on-exports-lifted-japan-arms-makers-cautiously-market-wares-abroad.html>>.

⁴¹⁵ 郭育仁，〈日本新武器出口政策淺析〉，《台北論壇》，2014 年 4 月 24 日。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136.pdf>.

隨著集體自衛權解禁，加上新的美日共同防衛指針修訂後，日本自衛隊能更有效與美軍聯合軍事行動，並提高兩軍默契，強化作戰能力。今年「護身軍刀」演習（Talisman Sabre）⁴¹⁶31名陸上自衛隊登上美國海軍兩棲運輸船綠灣號，前往澳洲參加日澳演習⁴¹⁷，報導稱，此次演習將能讓日本自衛隊了解美澳海陸部隊如何處理國際的危機，並觀摩美澳部隊在後勤、通訊、兩棲作戰上的作為。⁴¹⁸美日等7國也在2015年9月持續進行「黎明閃電」（Dawn Blitz）聯合軍事演習⁴¹⁹，從2010年開始，日本在2013年首次參加，奪島演練為此演習的主要項目，透過美日聯合軍演，建立有效溝通軍事管道、協調美軍與自衛隊作戰能力，以應付任何危機發生的情況。經過聯合軍事演習更是強化美日與參與國家的軍事關係，也可展示武器技術最新發展情形，視同實戰測試，對於武器輸出也是相當重要的推銷場合。

（四）邁向正常化國家的一大步

偏向右翼的安倍首相秉持著祖父岸信介的精神，積極擺脫和平憲法，武器出口解禁後，加上擁有集體自衛權，甚至不惜替換內閣法制局長，⁴²⁰解釋憲法，顯示讓日本再次崛起的政治意圖。

（五）日本地位的提升

在邁向正常化國家後，軍事實力一直是衡量國家間重要的國力指標，筆者相信日本雖不至於主動發生戰爭，但日本漸漸有投射遠洋的作戰能力，此軍事戰力的需求，可應付未來的動盪並對日本構成安全威脅的有效戰略嚇阻，例如：新成軍的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以及剛下水的加賀號；藉由軍事裝備輸出與出擴大售國的軍事交流，增加實質影響力。

二、隱憂

（一）未來出兵海外的可能：

雖然安倍政府不斷強調「積極的和平主義」，隨著武器出口三原則更動，集體自衛權逐漸的解禁，美日共同防衛指針的最新修正，日本一改美日安保的專守防衛政策，但日本人民對於未來日本參與戰爭可能性仍有很大的疑慮。日本

⁴¹⁶ 每兩年舉行一次，旨在加強雙邊聯合作戰、自然災害、人道救援合作能力強化。

⁴¹⁷ 〈史無前例 日本自衛隊登陸澳洲參加演習〉，《大紀元電子報》，2015年6月23日。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31233/%E5%8F%B2%E7%84%A1%E5%89%8D%E4%BE%8B-%E6%97%A5%E6%9C%AC%E8%87%AA%E8%A1%9B%E9%9A%8A%E7%99%BB%E9%99%B8%E6%BE%B3%E6%B4%B2%E5%8F%83%E5%8A%A0%E6%BC%94%E7%BF%92-.html>>.

⁴¹⁸ Derek Harkins, “Images: Talisman Sabre 2015” DVIDS, July 11, 2015,
<https://www.dvidshub.net/image/2060815/talisman-sabre-2015#.Vf5Z5_mSz4w>.

⁴¹⁹ Gretel C. Kovach, “international force storms beach at Pendleton : Dawn Blitz amphibious military exercise expands with U.S-Japan alliance,”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Sept 4, 2015.
<<http://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news/2015/sep/04/dawn-blitz-2015-pendleton/>>.

⁴²⁰ 〈安倍將更換法制局長官 或為憲法討論鋪路〉，《日經中文網》，2013年8月2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6178-20130802.html>>.

民眾擔心未來日本將有出兵海外作戰的可能，現在的政府造成自己的孩子要出兵作戰，根據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The WIN/Gallup International）以 Willing to fight for your country? 為命題，針對 64 國比較中，在回答「會」的答題選項，日本以 11% 排名第 63 名，在不知道或拒絕回答的選項日本以 46.6% 排名第一，⁴²¹換句話說，安倍政府在修改美日安保條約時，需要顧及到日本民眾對於保家衛國的意識，這調查也說明日本國民對戰爭的厭倦。

（二）對於日本軍事科技的信賴度

雖然美日有共同研發軍事武器與裝備的基礎，相較於美國以戰養戰的方式，藉由實際戰爭行為除了讓武器不斷使用並改造不良之處，更是推銷本身軍事裝備的好手法，也提升武器研發的經驗。日本自二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就沒有出兵過，也少了武器使用的經驗，這些經驗也是出售武器的障礙。

（三）中日關係的變化：

儘管日本對外聲稱，這次鬆綁不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但在軍備競賽上，亞洲除了俄羅斯外，就屬中國軍力逐漸威脅日本，在加上東海釣魚台隨時發生的摩擦、日本積極出售防衛裝備給南海沿海國家，任何的軍事行為很難不讓人聯想是在與中國大陸抗衡。加上美國也需要日本牽制中國。

伍、結論

每年的國防市場都被幾個主要國家占有，要突破重圍，技術的掌握是關鍵，其實日本軍事蘊底自二戰後已有良好基礎，只是苦無和平憲法等一系列限制法案，隨著一系列美日安保相關法案通過，加上安倍採用兩面手法，一方面，今年 8 月安倍對戰後 70 年發表《安倍談話》，承認侵略和殖民統治，表示反省和道歉的基本立場獲得大部分傳媒和輿論支持，⁴²²；一方面，透過安倍地球儀外交，拓展日本影響力，實現安倍首相日本再次崛起的願望。

以下歸納可能作為：

一、安倍政府或許可以透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集體自衛權解禁、新安保法的外交政策盤點，轉移日本國民對經濟不振的焦點。

二、建立如北約組織的東亞或亞太軍事聯盟組織，聯合與中國有南海領土

⁴²¹ “Japan is less optimistic, than last year, on the economic outlooks for 2015,” 「エンド・オブ・イヤーサーベイ2014-65カ国グローバル調査」 January 13, 2015.

<<http://www.wingia.com/web/files/news/231/file/231.pdf>>.

⁴²² 童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動當選連任總裁〉，《BBC 中文網》，2015 年 9 月 8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8_japan_shinzo_abe>.

主權糾紛的國家或美國盟友，如：南韓、新加坡、菲律賓、越南等...。宗旨宜為維護東亞區域安全，營造永久和平環境，處理亞洲有關安全事務甚至可以與東協共同打擊恐怖攻擊。

三、對於新安保法的解釋，面對自衛隊出兵海外作戰，除了增加實戰經驗，更是讓日本軍事科技在國際市場上能見度曝光更多；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下，藉著安倍俯瞰地球儀外交，推銷防衛裝備到有興趣的國家，有意與日本簽訂防衛裝備產品協定，再進一步擴大交流。

四、美日安保的強化有利於日本軍事工業的發展，合作代替競爭，倚重美國軍火公司的能力當墊腳石，拓展日本軍事影響力，

五、日本政府已有防衛大綱計畫，並設定整體核心國防目標，建立與維持國防架構的環境，與他國戰略對話深層化、落實化、面對突發狀況時的應變能力訓練，提升緊急反應能力。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文章與報導

郭育仁，2014/4/24。〈日本新武器出口政策淺析〉，《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136.pdf>.

張景全，2014/11/14。〈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禁令及其對美日同盟的影響〉，《日本學刊》，第6期。

<http://qk.cass.cn/rbxk/zdtj/201411/t20141114_50804.htm>

趙國材，2015/5，〈中、美、日在亞太較勁〉，《觀察》，第21期，頁40。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687>>.

2014/3/18，〈日美與美國競合互動最新情勢〉，《中央日報》。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2680572&page=1>

徐家仁，2014/4/2。〈日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 中韓有疑慮〉，《公視新聞網》。
 <<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65816>>.

張佑生，2014/4/2。〈和平憲法更遠了 日武器出口解禁〉，《聯合電子報》，第3148期。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6/255958/web/#top>>.

童倩，2014/2/24。〈安倍政權顯出解禁武器出框架〉，《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2/140224_japan_cabinet_weapon>

2014/4/7。〈日本放寬武器出口 針對中國布局〉，《泰國世界日報》。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14/0407/article_116111.html>

編譯中心，2014/6/18。〈日鬆綁售武，首參加巴黎武器展〉，《世界新聞網》。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1396/article-%E6%97%A5%E9%AC%86%E7%B6%81%E5%94%AE%E6%AD%A6-%E9%A6%96%E5%8F%83%E5%8A%A0%E5%B7%B4%E9%BB%8E%E6%AD%A6%E5%99%A8%E5%B1%95/>>.

黃菁菁，2015/5/15。〈日內閣通過集體自衛權法案〉，《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5000505-260108>>.

白石隆，2012/7/30。〈為參加 TPP 談判與維持完善防衛能力，制定中長期戰略〉，《nippon.com》。
 <<http://www.nippon.com/hk/editor/f00009/>>

2015/6/23。〈史無前例 日本自衛隊登陸澳洲參加演習〉，《大紀元電子報》。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31233/%E5%8F%B2%E7%84%A1%E5%89%8D%E4%BE%8B-%E6%97%A5%E6%9C%AC%E8%87%AA%E8%A1%9B%E9%9A%8A%E7%99%BB%E9%99%B8%E6%BE%B3%E6%B4%B2%E5%8F%83%E5%8A%A0%E6%BC%94%E7%BF%92-.html>>.

童倩，2015/9/8。〈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動當選連任總裁〉，《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8_japan_shinzo_abe>

外文部分

政府資料

防衛省・自衛隊，〈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の内容〉，《平成 27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2242000.html>>

〈防衛裝備・技術協力〉，《平成 27 年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3241000.html>>

外務省，〈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報道発表》，2014 年 4 月 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0805.html>.

調查報告

2015/1/13. “Japan is less optimistic, than last year, on the economic outlooks for 2015,”
 「エンド・オブ・イヤーサーベイ 2014-65 ヵ国グローバル調査」.

<<http://www.wingia.com/web/files/news/231/file/231.pdf>>.

文章與報導

Masaaki Kameda, “Japan, France ink defense gear transfer pact at-plus-two meeting ”
The Japan Times NEWS, May 13, 2015.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3/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france-ink-defense-gear-transfer-pact-at-two-plus-two-meeting/#.VgNhVPmSz4y>>.

Ryan, “JGSDF COMES TOGETHER WITH U.S. MARINES,”*MARINES*, MAY 7, 2015,

<<http://www.marines.mil/News/NewsDisplay/tabid/3258/Article/587911/jgsdf-comes-together-with-us-marines.aspx>>.

Kiyoshi Takenakak and Nobuhibo kubo, 2014/4/1. “Japan relaxes arms export regime to fortify defense,”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1/us-japan-defence-idUSBREA2U1VF20140401>>.

Jonathan Soble, “With Ban on Exports, Japan Arm Makers Cautiously Market Wars Abroad,”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7/13/business/international/with-ban-on-exports-lifted-japan-arms-makers-cautiously-market-wares-abroad.html>>.

Derek Harkins, 2015/7/11, “Images: Talisman Sabre 2015” *DVIDS*,

<https://www.dvidshub.net/image/2060815/talisman-sabre-2015#.Vf5Z5_mSz4w>.

Gretel C. Kovach, 2015/9/4. “international force storms beach at Pendlton:Dawn Blitz amphibious military exercise expands with U.S-Japan alliance,”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http://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news/2015/sep/04/dawn-blitz-2015-pendleton/>>.

日本與南韓在加入美國彈道飛彈防禦體系 決策上差異之比較：以威脅可信度視角分析

徐圓媛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文探討身為美國在東亞區域重要盟友的日本與南韓，在 1990 年代面對美國要求加入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時造成日本、南韓決策差異之因素。面對北韓威脅，美國在 1990 年代開始根據全球性的防衛系統構想飛彈防禦體系，對此美國在東亞區域最重要的兩個盟友日本和南韓對於美國所領導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採取了不同的政策選項：日本同意並開始加入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計畫且與美國共同研發技術；南韓則是持續地拒絕美國所提議的計畫，且自主發展南韓彈道飛彈防禦體系。美日、美韓此兩案例有極其類似之處，日、韓兩國同樣面臨北韓飛彈的外在威脅，且與美國皆為同盟關係且在軍事合作上關係密切、互動頻繁；兩國國內也都存在可能對政策造成影響的反美主義，此兩案例在相同的自變項基礎上，但面對安全環境變化，卻出現了日本、南韓分別採取不同政策的依變項。又，日本、南韓國內即使皆經歷保守、進步派政黨輪替，也未改變原有的政策方向。是以，本文提出「威脅可信度」來解釋造成兩案例差異的關鍵因素。

關鍵字：美日同盟、美韓同盟、彈道飛彈防禦體系

壹、前言

1990 年美蘇僵持對立的冷戰結束後，過去被美國及其盟友視為是最大安全威脅的蘇聯瓦解，改變了原先兩極對立、意識形態對抗的國際體系，但國際安全環境並沒有因此有所改善。北韓在 1990 年代初期不顧周邊國家和聯合國抗議頻繁試射飛彈，擁有可以以美國為攻擊目標的洲際彈道飛彈能力(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安全威脅也從過去在冷戰時期美蘇核子戰爭的恐怖平衡威脅轉變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彈道飛彈。

然而面對北韓威脅，美國在 1990 年代開始根據全球性的防衛系統構想飛彈防禦體系，對此美國在東亞區域最重要的兩個盟友日本和南韓對於美國所領導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Missile Defense, MD)採取了不同的政策選項：日本同意並開始加入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計畫且與美國共同研發技術；南韓則是持續地拒絕美國所提議的計畫，且自主發展南韓彈道飛彈防禦體系(Korean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KAMD)。美日、美韓此兩案例有極其類似之處，日、韓兩國同樣面臨北韓飛彈的外在威脅，且與美國皆為同盟關係且在軍事合作上關係密切、互動頻繁；兩國國內也都存在可能對政策造成影響的反美主義，此兩案例在相同的自變項基礎上，但面對安全環境變化，卻出現了日本、南韓分別採取不同政策的依變項。又，日、韓兩國國內即使經歷保守、進步派政黨輪替，皆未改變原有的政策方向。是以，本文目的為討論日本、南韓在面對參與美國彈道飛彈防禦體系的決策上，造成差異的關鍵因素為何。探究日本、南韓兩國對於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及威脅認知為何、國內菁英如何分析外部威脅且會採取何種政策來因應威脅。

既有國際關係理論中，系統層次分析顯示出日本和南韓不同的威脅認知造成了分歧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政策選擇：對南韓來說，北韓的傳統武力是主要的威脅；對日本來說，除了北韓之外，1995、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讓日本質疑也擔憂中國的飛彈威脅，但卻沒有解釋日本、南韓兩國為何對外在環境存在解釋上的差異。再者，新現實主義認為外交政策是由政策領袖所決定而非抽象的國家，政策菁英、軍事領袖、政治家基於自身對外在環境的認知及國家相對權力的分析進行決策。因此新現實主義關注決策者如何同意或不同意某種特定對外在威脅認知的解釋，且認為政治領導的認知決定了國家外交政策。當外在威脅出現時，經濟、政治和法律限制都會成為阻礙國內動員的重要因素。而若日本、南韓所採取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政策反映了國內政治的變化而非外在環境威脅認知，則為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一開始會成為排除其他安全策略的選項？為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成為重要議題？本文研究問題本質為日本和南韓決定加入美國所領導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與否，而非解釋兩國自己決定是否發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亦非各自分別對中國、北韓的態度，而是日本、南韓身為美國

的盟友，在美國都希望日韓兩盟友加入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各自採取何種選項，在此同時也要考慮美國對北韓和中國的態度及立場。

又，關於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議題以美日、美韓兩案例進行類比討論的既有文獻較少。既有的討論多是在，第一，分別討論日本和南韓兩國決策的歷史過程及彈道飛彈防禦體系分別對兩國造成的影響進行論述；⁴²³第二，日本和南韓各自所面臨國內限制和障礙與彈道飛彈防禦體系發展上的成本和效益。這樣的討論難以解釋政策結果的差異，亦缺乏自變項和依變項間的因果關係連結。

綜上所述，本文發現從相關國際關係理論對日本、南韓在面對參與美國彈道飛彈防禦體系的決策上的論述，和日本、南韓的政策選擇相關文獻或將兩者進行類比研究皆無法確切回答日本和南韓兩國國內面臨政權交替，這段期間內影響兩國各自採取不同政策選項的因素為何。本文研究目的為提出具有解釋力的「威脅可信度」邏輯，且從案例比較中回答造成兩案例差異的關鍵因素。

貳、以威脅可信度來解釋日本與南韓參與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政策差異之解釋

一、威脅可信度相關理論

一國是否具有意圖、威脅可信度該如何衡量，可以從國際衝突研究中討論的核心「國際危機衝突中，國家政治領袖要如何發出訊號以避免戰爭爆發」來觀察，考量到爆發戰爭是必須付出成本的，因此衝突雙方會傾向妥協而非爆發戰爭。在握有完整資訊的情況下，要靠協商解決衝突並不困難。但是國家往往無法確知他國決心、意圖或是軍事能力，因此難以仰賴協商解決問題。國家可能會為了在談判協商過程中獲得較多的議價籌碼或是力量，而誇大自己「真實的決心」(true resolve)或是軍事能力。由於扭曲的資訊可以獲得議價力量，因此缺乏成本的訊號通常被認為無法有效地、具可信地傳達自身的決心。

許多文獻針對「在國際衝突中，國家可以有多大的可信度來傳達其決心的訊號，以求達成妥協、協商，進而避免耗費成本的戰爭爆發」進行研究。「可信度的信號機制」(credible signaling mechanism)可以透過「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軍事動員」(military mobilization)、「反對黨同意政府的行為」(opposition party endorsement of government's threat)來檢驗。

在國際危機中，主要是處理兩個國際政治上的困境：國家領袖握有國家有多大意願動用武力而非妥協來解決衝突的資訊；其有誘因去扭曲此資訊，以取得較大議價力量。因此沈默的外交交換可能不足以讓國家知道敵國會做出多大的讓步，

⁴²³ Weitz, Richard. 2013A. "US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and Its Asian Implication". ISSUE BERIF, 75, 1-10.

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國家會讓事件「公眾化」(going public)，像是透過採取軍隊動員活動、公開的威脅，「國家領袖將衝突升高或是正面衝突的行為，再選擇退讓」會比「不升高緊張衝突」遭受更嚴厲的國內聽眾批評或是懲罰。⁴²⁴「國內聽眾成本」主要是在國際衝突中，政治領袖所面臨的國內效果，及他國對該國領袖意圖的認知。國家政治領袖會運用具有成本的信號，以此具有可信度地傳達其外交政策上的利益。透過採取需要耗費金錢的軍隊動員，動員的同時產生了沈澱成本，以沈澱成本來顯示出國家的決心，⁴²⁵國家政治領袖也會運用適當的軍事力量或是進行武力展示來證明自己對於解決衝突、維護國家利益的決心。在國際衝突中，國內政治也會對升高國際衝突產生影響，國內反對黨可以透過創造第二個資訊來有效地確認政府的決心，進而提升政府能夠做出可信威脅的能力；同時，反對黨也可以透過公開反對來削弱政府的威脅可信度。一旦此策略威脅敵國做出更多的抵抗，國家就被迫做出選擇性的威脅；若是政府面臨國內競爭者擁有誘因去揭露其較不期待戰爭爆發，則政府就擁有較少空間進行策略性的扭曲。

又，從何憶南(2007)以日中關係為例，日中兩國對於戰爭記憶的衝突顯示出菁英可透過操作歷史議題讓過去敵對的兩國再度陷入這樣的問題中，歷史議題與菁英造神和大眾反應會讓國際衝突變得政治化。菁英可以操弄、運用國家歷史和濫用國際歷史衝突，此外即使菁英發現持續推動「歷史議題」不再有符合成本效益時，但大眾情緒一旦被喚醒了，也不太可能視而不見此因素，儘管日本和中國經濟貿易等「物質」上互賴程度高，卻也因此改變日中互動關係，證明理念認同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而這樣的理念、物質因素的作用也體現在日本、南韓加入 MD 與否的決策案例上，由此本文將影響「意圖」的因素細分為「理念」和「物質」兩個層面，來分析討論「意圖」此變項分別如何造成日本和南韓決策上關鍵差異。

⁴²⁴ Fearon, James D.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03), pp.586.

⁴²⁵ Fearon, James D. 1997.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1), pp.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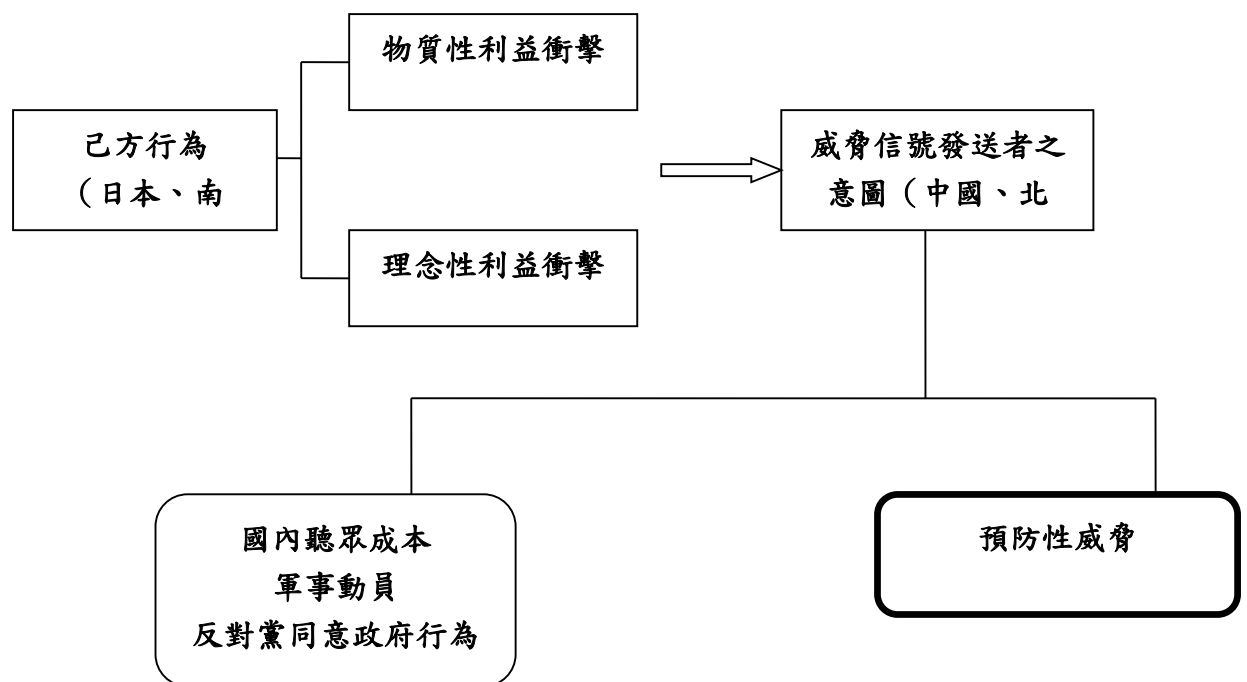


圖 1：衡量威脅可信度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大量現有文獻多是從「國內聽眾成本」、「反對黨同意政府行為」來衡量威脅可信度（見圖 1），而本文所討論的發出威脅信號國家為北韓和中國非民主國家，因此難以適用上述指標來衡量評估其所發出的威脅。由此，本文對於威脅可信度的判斷提出「預防性威脅」(preventive threat)概念做為指標來衡量，內涵是源自「預防性威脅」(preventive threat strike)。概念上「先制性攻擊」(preemptive strike)與「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的區別，主要在於是否確知敵方正準備採取攻擊行動，「預防性攻擊」所應對的不是立即、明確的威脅，而是敵方長期可能發生的進攻威脅，有可能在數個月後或是數年後發生的進攻威脅，因無法確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而率先採取的軍事行動。「預防性攻擊」之所以會爆發是設想到將來可能發生的威脅，長期可能成為軍事攻擊的目標，但在此威脅尚未明確形成時，提前開戰清除威脅，率先採取攻擊行動，因此預防性的攻擊是起因於對長期可能遭受攻擊的擔憂，當一國認知到未來越有可能爆發戰爭，則越可能採取預防性的行動。⁴²⁶

由此「預防性威脅」的概念是擔心未來可能發生的攻擊，為攻擊者帶有防禦

⁴²⁶ Reiter, Dan. 1995. "Exploding the powder keg myth: Preemptive wars almost never Happ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 pp.6; Levy, Jack S. 1987.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01), pp. 91.

性質的應對行動。要判斷此威脅可信度與否是一策略互動的概念（見圖 2），以下說明以甲方代稱可能被威脅的國家，即為本文中的日本和南韓，以乙方代稱施加威脅的國家，即為本文中的北韓與中國，當乙方發出施加威脅攻擊的信號時，要判斷乙方實現威脅的動機意圖可能性，是甲方以自身行為來判斷乙方的意圖，甲方審視自身行為是否侵害乙方國家安全利益，而造成重大潛在威脅或是危機，是甲方被威脅者從客觀行為去觀察、判斷乙方的威脅是否真的可能實踐。若是甲方認為自身行為讓乙方發動預防性攻擊實現的動機、可能性上升，則威脅的可信度上升；反之，若是甲方判斷自身行為並沒有讓乙方發動預防性攻擊實現的動機、可能性上升，則即便乙方表示要對甲方施加威脅，這樣的威脅也不具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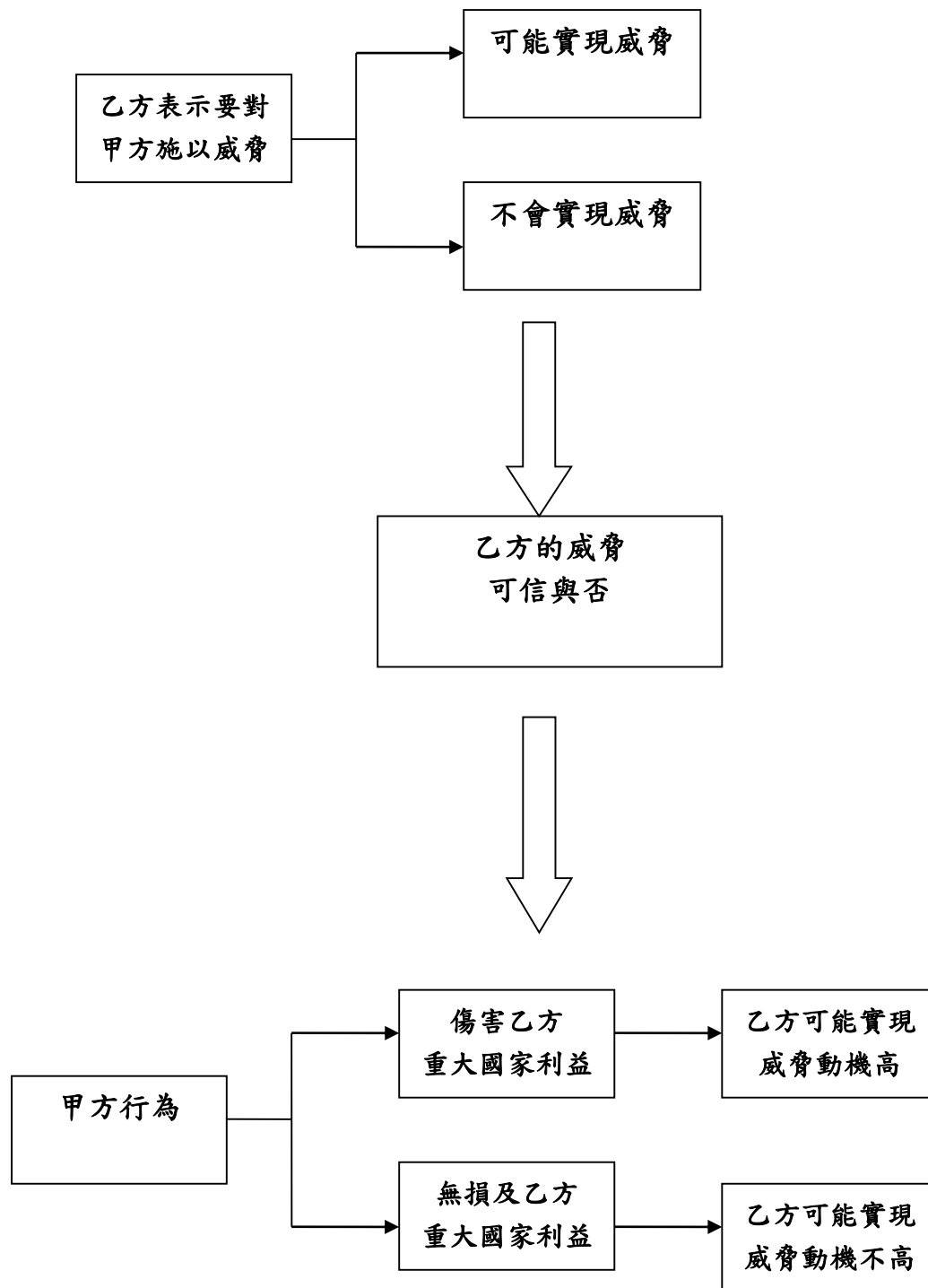


圖 2：衡量預防性威脅可信度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日本國家正常化對日中關係與日朝關係的影響

(一) 日中關係

1. 釣魚島主權爭議

中日雙方對於釣魚島所有權歸屬說法分歧：⁴²⁷日本主張，「明治 18 年(1885)後，日本透過沖繩縣當局等途徑多次前往釣魚島進行實地考察，確認這些島嶼不僅是無人島，且沒有受到清政府或是其他國家統治過的跡象，因此日本將其編入沖繩縣」，這是根據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正當取得所有權；中國則是主張，中國最早發現了釣魚島，並將其編入中國版圖中，從 16 世紀起，中國歷史文獻就有關於釣魚島的記載。如果基於「發現」可以成為獲得領土的依據，那麼釣魚島在 16 世紀即為中國的領土。1895 年後，中日雙方對於釣魚島編入問題也存有不同的看法，日本認為釣魚島並不在 1895 年 5 月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湖列嶼內，日本早 1895 年 1 月在就將釣魚島正式編入日本沖繩縣領土；而中國主張釣魚島是台灣的一部份，在馬關條約時被迫割讓給日本，而二戰結束後，日本必須將釣魚島和台灣、澎湖列嶼一同歸還改中國。⁴²⁸

而在 1972 年中日外交關係正常化時，雙方就已經注意到釣魚島的問題，當時中日為了促進中日邦交正常化，雙方領導人同意暫時擱置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在 1990 年代中日雙方多次地確認擱置的原則。但是 1992 年 2 月 25 日，中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4 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其中明文規定釣魚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進一步表達釣魚台屬於中國固有領土的立場。⁴²⁹

雖然中日在 2010 年中日船隻撞船事件前沒有發生大規模衝突，但是在此之前中國不斷以登島行為、入侵日本領海。2004 年中國保釣人士不法登上釣魚島；2004 年中國原子能潛艦進入日本領海航行；2005 年派遣軍艦航行東海春曉油氣田周邊海域；在 2006 年時派遣潛艦接近沖繩海域附近的美國航母小鷹號的事件；2008 年 12 月 8 日中國官方的海洋監調查船，進入 12 海浬以內的日本領海，且無視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要求其離開，持續航行 9 個半小時；2009 年派遣 5 艘驅逐艦通過沖繩本島和宮古島間航行前往沖之鳥島北方海域；2010 年 3 月再度派遣 6 艘驅逐艦通過沖繩本島和宮古島間航行前往太平洋海域，諸如此類事件不斷發生，使得中日雙方對於釣魚島爭議未曾停歇。此外，從 2002 年起中國施行《新軍事訓練大綱》透過軍事演習給予釣魚島周邊海域壓力。⁴³⁰

⁴²⁷ 日本稱尖閣諸島，本文中若非直接引述，則一律以釣魚島稱之。

⁴²⁸ 孫崎享，2011，《日本の国境問題：尖閣・竹島・北方領土》，東京都：筑摩書房，頁 67。

⁴²⁹ 孫崎享，2011，《日本の国境問題：尖閣・竹島・北方領土》，東京都：筑摩書房，頁 84；保阪正

康，東郷和彦著，2012，《日本の領土問題：北方四島・竹島・尖閣諸島》，東京都：角川書店，

頁 134。

⁴³⁰ 浦野起央，2005，《尖閣諸島・琉球・中国：日中国際關係史：分析・資料・文献》，東京：

2010年9月日本逮捕和兩艘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隻相撞的中國漁船船長，地點就是在日本所控制的釣魚島附近的東海海域。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刻道歉和賠償，也同時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限制出口日本的稀土資源（rare-earth elements）。最後日本將中國漁船船長釋放，日本國內民意對於中國強硬的態度和菅直人政府明顯屈服的行為感到不滿。2010年中日釣魚台事件發生後，日本雖然沒有動員區域國家批評中國的作為，但是日本強化了島嶼周邊的海軍巡邏。為了貢獻海上安全，日本已經開始推動「海上保安外交」（coast guard diplomacy），已經有超過4000名的東亞區域和印度的海上保安人員是來自廣島海上保安大學（Japanese Coast Guard Academy）的訓練。日本也考慮派遣自衛隊作為和平監督，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這是日本朝向承擔和平和安全責任的正常國家之重要階段。而到了2010年日本海上保安廳與中國漁船衝突事件後，中日關係急速惡化，中國對此採取一連串措施，包含中國停止中日天然氣田談判、終止內閣官員級交流、禁止對日出口稀土。面對中國強硬的回應，日本也對此採取一連串的行動，2012年9月野田政府宣布國有化釣魚島，中國也以將釣魚島做為領海基點劃定領海基線，也派遣海洋監視船表明監視活動常態化的立場。⁴³¹2011年後中國的海洋活動不斷擴大，中國海軍艦艇部隊進出太平洋逐漸常態化。2011年6月是史上最大規模，派遣11艘艦艇部隊通過沖繩本島和宮古島間前往太平洋；2011年8月派遣「漁政201」、「漁政31001」入侵釣魚島附近日本領海；在日本決定收購釣魚島後，中國在2012年3月派出「海監50」、「海監66」艦艇前往釣魚島附近海域。⁴³²2012年7月26日，首相野田佳彥在眾議院會議上表示「尖閣諸島附屬島嶼和領海上，若有周邊鄰國不法行為發生，有必要派遣自衛隊回應」。2012年9月24日，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和前政調會會長在TBS節目中表示，為了防衛所屬沖繩縣的釣魚島和離島，自衛隊應該要海軍一樣擁有緊急回應能力的新部隊。民主黨和自民黨雙方黨魁都提及活用自衛隊以積極回應。⁴³³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11日決定購入釣魚島後，中國海洋監視船進入領海的次數持續增加，到2013年2月初共計25次（東鄉和彥，2013：26）。2012年12月13日中國國家海洋局所屬的飛機也侵入釣魚島領空，於是日本派出海上自衛隊所屬自衛艦，激化雙方緊張衝突。⁴³⁴

三和書籍，頁164。

⁴³¹東鄉和彥，2013，《歷史認識を問い直す：靖国、慰安婦、領土問題》，東京都：角川書店，頁26；久保孝雄，2013，《変わる世界 変われるか日本：対米自立と日中共生へ》，東京都：

東洋書店，頁213；春名幹男，2013，《米中冷戦と日本：激化す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戦争の内幕》，東京：PHP研究所，頁26。

⁴³²孫崎享、木村郎，2013，《終わらない〈占領〉：対米自立と日米安保見直しを提言する!》，京

都市：法律文化社，頁199；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24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

2012年。

⁴³³孫崎享，2012，《検証尖閣問題》，東京：岩波書店，頁42。

⁴³⁴東鄉和彥，2013，《歷史認識を問い直す：靖国、慰安婦、領土問題》，東京都：角川書店，

2. 歷史問題與靖國神社參拜

日本強硬的外交政策伴隨著日本國內政治保守主義的崛起，特別是在教育領域方面。首相小泉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促進了一般民眾參拜靖國人神社的次數，尤其是年輕一輩。2001 年小泉訪問中國，前往中日戰爭爆發地點盧溝橋，並向戰爭犧牲者表示哀悼之意。在非公開的領袖高峰會上，國家主席江澤民表示首相小泉參訪戰爭紀念館內含重要意義，且表示靖國神社是祭拜日本軍國主義戰犯的地點，日本領導人如果前往參拜的話會有爭議存在。但是首相小泉仍在 2002 年 4 月 21 日、2003 年 1 月 14 日連續三年參拜靖國神社。在小泉第二次參拜靖國神社時，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與公明黨代表神崎武法的會談上表示，絕對不容許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小泉持續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也使得日中關係持續惡化。⁴³⁵中國也多次在公開場合上批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例如 2004 年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高峰會和東協加三(ASEAN+3)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公開批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認為現在日中政治關係的最大困難即為靖國神社參拜問題。⁴³⁶

雖然安倍在上任前期表示出在歷史問題上的愛國意識、鷹派的態度，安倍政府上任後，深刻瞭解到小泉政府在內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弱點：靖國神社參拜、遭受在野民主黨和政黨盟友公明黨(New Komeito)的批評，以及商界人士對於中日關係惡化的影響感到不滿，因此安倍上任後於 2006 年 10 月 8、9 日出訪中國與南韓，展現出合作的意願，希望可以改善因為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惡化的關係。而後中國國家主席溫家寶也在 2007 年 4 月訪問日本，重啟與環境、能源合作、食品安全相關會談時，中日關係顯現出改善的趨勢。雖然安倍理解到修補、改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但是安倍的歷史觀點是修正主義的態度。安倍對「日本放送協會」(NHK)施壓，在歷史相關節目上刪除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軍隊強迫中、韓婦女為慰安婦的部分，又公開表示目前並無直接證據可證明日軍於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甚至強調即使美國國會通過要求日本對慰安婦問題正式道歉的決議案，日方也不會對此再度道歉，這樣的觀點意味著安倍會跟隨小泉的步伐，不會擔心在歷史議題上激怒中國，惡化日中政治關

頁 28；中内康夫，2010，〈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日までの経緯〉，《立

法と調査》(311), pp.69；藤井嚴喜，2013，《米中新冷戦、どうする日本》，東京都：PHP 研究所，頁 266。

⁴³⁵家近亮子、段瑞聰、松田康博，2007，《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

東京都：晃洋書房，頁 50。

⁴³⁶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2012，《日中関係史 1972-2012》，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430；

坂元一哉，2006，〈靖国問題について〉，《東亜》，No. 468，頁 2。

3. 中國軍事現代化

長期來看，中國的軍事發展對日本造成很大的威脅。從 1990 年代初期，日本就擔心中國的傳統武器和核武軍事現代化、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能力，包含新的潛艦可以發射 2000 公里射程的巡弋飛彈，且具備像美國戰斧巡弋飛彈 (Tomahawks) 相似的能力、透過佈署 Su-27 和 Su-30MK 攻擊戰機 (strike aircraft) 來提升整體的空中防衛和攻擊能力、發展本土 J-10 和 FB-7A 戰鬥機、新的 J-X 隱形戰鬥機 (stealth fighter)、空中早期預警系統 (AWACS)。特別是中國在防衛支出缺乏透明性。日本也擔心 2007 年中國的反衛星系統，可能會讓美國衛星能力、日本的軍事衛星計畫受到影響破壞。

日本將中國引進 Type 052C Luyang II DDG 驅逐艦、Type 052C 旅洋驅逐艦、Type 054A 江凱驅逐艦的行為視為是要回應美日 MD，且中國秘密進行科技研究、也逐漸增加對航空母艦科技的興趣，主要是 2012 年中國重新翻修在大連的烏克蘭的瓦良格 (Varyag) 航空母艦，且推測中國要從俄羅斯購買 12 架 Su-33 戰鬥機，並加以修改以便航空母艦使用。日本也逐漸注意到中國船隻入侵日本領海，在 2004 年 11 月 10 日偵測到中國核能潛艦進入日本領海，不過隨即得到中國誤闖日本領海的道歉，2008 年 9 月又有潛艦誤闖日本領海。但 2008 年 12 月中國決定派遣兩艘驅逐艦前往索馬利亞外海亞丁灣執行反海盜任務，做為中國海軍力量投射的信號。所有的跡象都顯示中國的行為不只是現代化軍事能力，而是在領土外投射中國力量有助自身國家利益因此可能會威脅到日本在釣魚島上的利益、打斷日本重要的海上溝通 (SLOC)，甚至可能在台灣海峽緊急態勢發生時，攻擊美國在沖繩的基地。⁴³⁸ 日本《防衛白書》每年度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情勢」章節中，皆有對於中國的專門介紹，而可以從討論的主題和方向看出日本對中國擔憂日益增加。

在《防衛白書》中，除了日本持續對於中國國防支出項目不透明和連年增加支出 (圖 5.3) 表示關注外，到了 2007 年防衛白書在對中國國防政策的討論中，從 1998 年「概述」、「國防政策」、「軍事態勢」、「軍事能力」、「台灣的軍事能力」等五的子項目討論，變成「概述」、「軍事相關透明性」、「國防支出」、「軍事態勢」、「教育、訓練現況」、「國防產業部門現況」、「海洋活動現況」等七個項目；到了 2010 年又將原本的「海洋活動現況」拆成「我國近海鄰近活動」、「中國軍隊的國際活動」，從討論方向的變化可以看出日中在釣魚島上的爭議日漸成為日本防衛安全關注的焦點。⁴³⁹

⁴³⁷ Hughes, Christopher W. and Ellis. S. Krauss. 2007. "U.S.-Japan Alliance Futures: Koizumi's Legacy Abe's Security Policies U.S. Challenge" *Survival: The IISS Quarterly*, 49 (2), pp160.

⁴³⁸ Hughes, Christopher W. 2009B. Japan's Military Modernisation: a Quiet Japan-China Arms Race and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Asia Pacific Review*, 16(1), pp.87.

⁴³⁹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19 年版），東京：株式會社ぎょうせい，2007 年；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2 年版），東京：株式會社ぎょうせい，2010 年。

日本也密切關注中國在國防科技發展上的動向，特別是中國有東風 31 型長程洲際彈道飛彈，射程含括日本在內的全亞洲範圍。還有東風 21 型中程彈道飛彈(IRBM/MRBM: 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Medium Range Ballistic Missile)；短程導彈(SRB: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則是東風 11、15 型飛彈，射程可達臺灣，對於亞洲區域安全造成極大的影響。2007 年 1 月 11 日中國發射導彈射擊距離地球 800 公里太空中的老舊氣象衛星、到了 2010 年，中國更發展出「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可以成功摧毀大氣層外導彈，成為世界第三個擁有陸基中程反彈道飛彈技術國家。再從海軍建設來看，中國也有長足的進展。從 2005 年起中國將原蘇聯所有的瓦良格號改造為新型航空母艦⁴⁴⁰，並於 2011 年 8 月下水試航，象徵中國即將具備遠洋作戰能力。2013 年 11 月，此作戰能力被進一步的充實，中國自行研發的 J15 艦載機正式搭載於遼寧號上，並前往南海海域航行。中國這一連串的發展，都讓日本擔憂中國威脅可能實現的能力和可信度提升，此外日本也認為中國國防工業發展不夠透明。⁴⁴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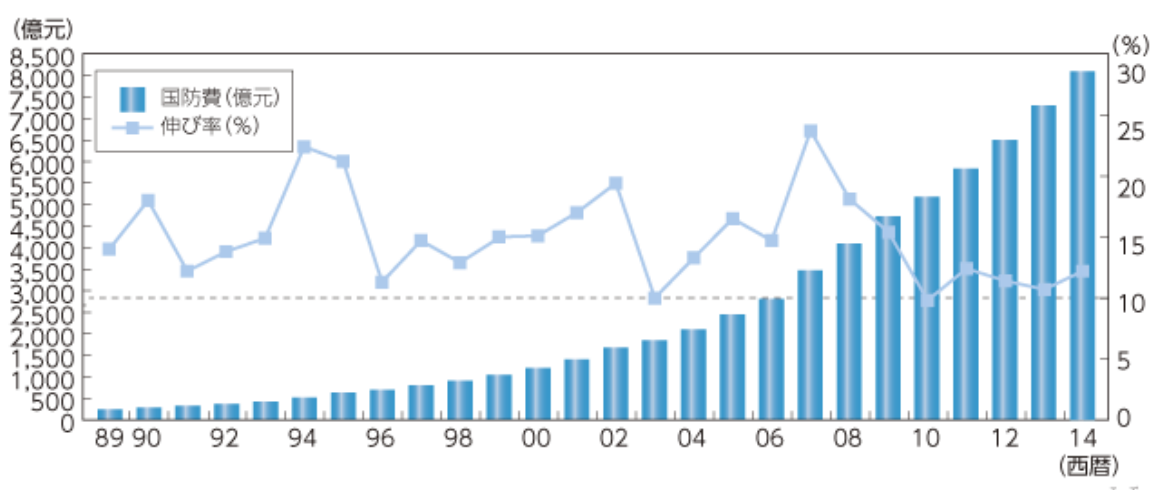


圖 5.3：中國國防軍事費用支出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白書，2014)

(二) 日朝關係

1. 1998 年北韓發射大浦洞飛彈試射

1998 年北韓發射大浦洞一號後改變了日本對 MD 謹慎小心的態度，因為日本無法再像 1990 年代一樣持觀望的態度。和 1993 年北韓發射飛越本州掉入日本海的蘆洞飛彈相比，1998 年大浦洞飛彈危機劇烈地改變了日本民眾對北韓的

⁴⁴⁰ 2012 年正式命名為「遼寧號」。

⁴⁴¹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5 年版），東京：株式會社ぎょうせい，2013 年。

威脅認知，主要是因為飛越日本本土。在 1998 年 8 月 31 日後，過去對 MD 態度冷淡或是謹慎的政治人物表示日本沒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來抵禦北韓飛彈，且和保守派政治人物一起公開表示支持允許日本政府加入 TMD 的共同研究。日本和北韓關係日漸惡化，特別是在 2002 年平壤宣言(Pyongyang Declaration)後更加鞏固對 BMD 的支持。北韓和日本都認為在 2002 年高峰會後可以推動雙方外交關係正常化，不過北韓政府官方承認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北韓的情報單位綁架日本人質加速了日本民眾對北韓的仇恨情緒。⁴⁴²隨著北韓持續拒絕 IAEA 國際檢查被懷疑藏有核武的金倉里地下設施，又在 1998 年 8 月 31 日北韓發射直接飛越日本上空的彈道飛彈，北韓此舉引起日本官員憤怒，決定暫停原訂對北韓建設輕水核反應爐 10 億美元的支援、拒絕北韓糧食支援的要求且中止雙邊關係正常化會談。接下來幾週證明了原先北韓發射大浦洞飛彈是為了將非軍事用衛星放上軌道，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收回原先的回應。1998 年 10 月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同意恢復對北韓輕水反應爐的援助。⁴⁴³在面臨北韓直接飛彈威脅後，立刻引起日本對於自身飛彈偵測、反飛彈安全能力的質疑。促使首相小淵惠三要求其政府在 9 月 1 日重新檢視對北政策，日本決定暫緩簽署共同分擔輕水反應爐的計畫，日本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抗議北韓的行為，且同意和美國共同研究 TMD 計畫，日本空中自衛隊也決定引進空中加油機(airborn refueling)計畫，透過擴大 F-2 和 F-16 戰機、空中加油機(the refueling tanker)計畫，可以提供日本直接攻擊北韓基地的能力。日本政府強烈的反應提供政府未來朝向戰爭準備和防衛支出的潛在動力，而南韓一開始也對北韓行為感到憤怒，但不安感很快地穩定下來，主要是南韓不希望此次事件使得金大中推動的陽光政策受到影響。⁴⁴⁴

1999 年日本主要的外交政策議題即為解決北韓威脅問題，隨著一連串北韓的挑釁行為，也讓日本重新思考其對北韓的態度及防衛政策。1998 年 8 月北韓因為大浦洞飛彈試射深遠地影響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於是同年 11 月日本第一次決定要取得偵察衛星(spy satellites)的技術。1999 年 3 月日本防衛廳長官野呂田芳成向國會防衛小組(defense panel)表示日本面臨立即的飛彈攻擊威脅時，有進行先制軍事攻擊的權利。雖然日本當時尚未有能力以此方式這樣回應威脅，但此發言很明顯地是向北韓提出警告。1999 年 3 月當北韓再次因為兩艘間諜船隻偽裝為漁船進入日本海域引起日本不滿，首相小淵惠三授權日本上海自衛隊對闖入者進行攔截和發射警告砲。同年在 8 月情報指出北韓正在準備長程飛彈大浦洞 2 號的試射，射程距離可以遠達阿拉斯加。北韓的行為也推動了一連串日

⁴⁴² Urayama, Kaori. 2008. *Missile Defense, US-Japan Alliance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83-2007*. ProQuest, pp.147.

⁴⁴³ Uriu, Robert. 1999. "Japan in 1998: Nowhere to Go but Up?". *Asian Survey*, 39(1), pp.123; 倉田秀也, 1999, 〈北朝鮮の弾道ミサイル脅威と日米韓関係--新たな地域安保の文脈 (焦点 国際情勢と日本・1998)〉, 《国際問題》, 頁 63。

⁴⁴⁴ Kim, Tae-woo. 1999. "South Korea's Missile Dilemmas". *Asian Survey*, 39(3), pp.488; Fouse, David. 2004. "Japan's Post-Cold War North Korea Policy: Hedging toward Autonom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pp.110.

本政府正在考慮的措施。在北韓飛彈試射後，日本政府也強調對和美國共同發展 TMD 的意願，這是美國推動許久的政策。1999 年 8 月美日簽署 MOU 表明共同發展的科技包含 MD 的特定零件，且會由日本負責主導。日本也同意在接下來五到六年提供 1.74 到 2.6 億美元作為共同研究使用，日本官員也強調此協定並不表示日本承諾購買或是部署 MD 系統，日本政府也決定改善其獨立的情報蒐集能力，在北韓飛彈試射後，日本宣布發展考慮許久的本土偵察衛星。日本變化的安全環境也提供了日本思考擺脫憲法限制的動力，在 1999 年 7 月國會在參眾兩院建立特殊小組，重新檢視憲法第九條關於日本宣布戰爭和使用武力的規範，憲法研究會議也會在 2000 年初期舉行公眾討論，顯示出修改憲法已經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⁴⁴⁵

雖然北韓在 1994 年「架構協議」(Agreed Framework)、1999 年「柏林協定」(Berlin Agreement)下，已經凍結飛彈和核武計畫，但北韓還是持續給日本帶來極大的威脅。北韓被懷疑擁有 1 到 2 枚可運載(deliverable)核武且保有大量的生化武器，也佈署了約 100 多個射程可達日本人口最密集地方的蘆洞一號飛彈(1300km)。1999 年 12 月前首相村山被派往平壤和北韓重啟日朝關係正常化會談，雙方所面臨的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北韓得到美國、南韓的支持，也得到中國領導江澤民對其外交政策的祝福；相反地，日本民眾對北韓發射飛彈的憤怒深化、日本出現積極軍國主義活動者。1999 年 8 月 10 日當北韓政府提到日朝關係時，也表示擔憂日本這一連串行為，之前北韓對日政策主要集中在要求日本提供金融補償，而新的政策則是強調「維持對金正日政權的保障」、「緩和來自日本的軍事威脅」。除了民眾逐漸對北韓綁架人質問題提升關注外，北韓持續發展可飛越日本本土的飛彈和核武能力，讓移除北韓直接的軍事威脅成為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Fouse, 2004:112)。北韓一連串違反國際協定、約束的行為，使日本更追求更強硬的安全政策，更加朝向正常化國家發展。

2. 日朝關係正常化談判與 2002 年核武危機

小泉和金正日在 2002 年 9 月簽訂《平壤宣言》(Pyongyang Declaration)，雙方為過去的行為道歉，且表示未來要進行合作，但樂觀的展望很快被核武危機所掩蓋。而後隨即爆發第二次核武危機，⁴⁴⁶又加深了日本的反北韓情緒。自民黨年輕的政治份子決定要讓日本有能力對抗北韓威脅，因此支持日本採取強硬的手段，包括採取經濟制裁、發展 MD 也是其中一個有效的方式。北韓綁架日本人質事件被證實後，北韓威脅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因此對許多人來說 MD 是一個有效回

⁴⁴⁵ Uriu, Robert. 2000. "Japan in 1999: Ending the Century on an Uncertain Note". Asian Survey, 40(1), pp.147; Fouse, David. 2004. "Japan's Post-Cold War North Korea Policy: Hedging toward Autonom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pp.111.

⁴⁴⁶ 2002 年 10 月，美國透過偵察機構掌握了北韓仍在秘密研製核武器的證據，從而對北韓核項目再次提出異議。北韓當局當即承認了美國的指控，北韓坦承在巴基斯坦協助下秘密發展核武。

應北韓的方法。⁴⁴⁷

日本在2005年凍結對北韓的食物援助後，日本對北韓外交政策逐漸轉為專注人質議題，此議題重要性變得和核武議題一樣重要。北韓表示重啟六方會談不只要看美國的立場，還要看日本對人質議題的態度。小泉因此在關係正常化的議題上急踩剎車，表示除非北韓遵守平壤宣言，否則日本不會和北韓的關係正常化，也不會對恢復外交關係設定底線。隨著解決北韓問題的壓力逐漸地增加，日本在2005年3月1日透過實施與油汙損害民事責任(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相關的修改法，限制外國船艦在缺乏適當的保障下不得接近日本港口，採取朝向制裁的第一步。在2005年中期以前，日本曾經考慮過要正常化及改善與北韓的關係，但是三年內對北韓轉為採取強硬的手段。當日本專注於人質事件時，區域國家對於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沒有顯著的進展，在2003年8月到2005年7月間重啟六方會談失敗了四次。六方會談參與國之間政策協調基於兩項因素而難以進行：一是國家對於朝鮮半島及如何解決北韓問題有不同的偏好；二是國家可行的政策選項因為北韓的嚇阻能力受到限制。⁴⁴⁸

日本政府在2002年10月第一周得知北韓鈾濃縮計畫，不到一個月後，防衛廳長官石破茂要求將BMD從目前的合作狀態推進到發展階段。2002年12月12日北韓表示要重啟所有核設施，聲明發表5天後，石破茂向美國官員表示日本會研究MD的發展和佈署階段。2003年1月北韓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下一個月日本政府要求美國所設計的MD系統詳盡資訊。2003年2月和3月北韓重啟延邊反應爐且開始提煉燃料棒(fuel rod)，在2003年4月，新聞開始報導日本政府已經著手研究採購MD系統。2003年7月北韓表示已經提煉8000燃料棒，且可以製造出六枚核武，同年8月防衛廳向國會提出2004年度投資12億美元購買MD系統。2003年10月北韓威脅要進行核試驗，兩個月內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引進BMD，很明顯地，北韓逐漸提升的核武能力加速了日本政府購買MD系統。⁴⁴⁹

3. 2006年飛彈危機與核武危機

2006年7月5日北韓進行飛彈演習，從軍事觀點來看，北韓連續發射7發朝向日本海的飛彈是用以誇示其突破防衛網的能力。現在美日正在進行MD的發展和配備，武器系統能否有效發揮效用還存在許多疑點。在美日配置MD系統後，北韓朝向具備多種類飛彈攻擊能力的實戰配備發展，為了誇示對美國戰略戰力的軍事平衡，才進行多種類飛彈連續試射。⁴⁵⁰日本意外地決定是為了實

⁴⁴⁷ Ishikawa, Taku. 2005. "Japan: Harmony by Accident?"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6(3), 639-662.

⁴⁴⁸ 坂元一哉，2006，〈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と日本外交〉，《東亜》，No. 471，頁2-3。

⁴⁴⁹ Kliman, Daniel M. 2006.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 World: 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pp.98.

⁴⁵⁰ 矢野義昭，2008，《日本はすでに北朝鮮核ミサイル200基の射程下にある：金正日の核とミ

サイル問題の深層》，東京都：光人社，頁139；能勢伸之，2013，《弾道ミサイルが日本を

質的 MD 佈署做準備，看起來是受到北韓行為的影響，尤其是 2006 年 7 月北韓飛彈試射、10 月核武試驗都加速了日本 MD 發展。⁴⁵¹

4. 民主黨時期

民主黨政府上台後，比起自民黨展現出較願意和北韓改善關係的意志，2009 年首相鳩山由紀夫上台後，以解決人質、核武、飛彈問題為條件，根據「平壤宣言」雙方推動日本和北韓的關係正常化，民主黨的對北政策沒有出現顯著的變化，首相野田佳彥上任後，也展現出解決人質問題、核武和飛彈問題的決心，為了解決問題也有訪問北韓的計畫。且如果日朝關係正常化，日本會對北韓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和數十億貸款提供，於是 2012 年日朝重啟雙邊對話，但此時北韓又宣布發射飛彈，使得雙邊對話被迫延期。⁴⁵²

5. 北韓官方批評日本軍國主義

北韓勞動黨黨報〈勞動新聞〉多次對於日本加入 MD 展開批判，認為日本藉此落實其軍國主義的野心。

飛彈防禦體系是冷戰後日本著重提升軍事能力的其中一環。2004 年 12 月日本在新的《防衛計畫大綱》上表示要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適用，以利和美國進行共同研究和生產 MD，此作法是犯罪的行為。這意味著日本要放棄專守防衛，朝向武裝攻擊的體制...MD 並不是符合專守防衛的行為，是為了具備先制攻擊的武器系統，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確保飛彈防禦體系的同時也讓周邊亞洲國家可能面臨被攻擊的不利益。⁴⁵³

北韓對於日本正常化國家的行為，包含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擴大自衛隊活動和修改憲法，透過官方媒體批評日本的作為：

日本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加入攻擊作戰會讓提升正規武力，這是日本增強軍國化的實例之一。⁴⁵⁴

襲

う：北朝鮮の核弾頭、中国の脅威にどう立ち向かうか》，東京都：幻冬舎ルネッサンス，頁 64。

⁴⁵¹ Toki, Masako. 2009. "Missile defense in Japan." in <http://thebulletin.org/missile-defense-japan>. Latest update 16 January.

⁴⁵² 미찌시타 나루시게(道下徳成). 2012. "북한의 핵 미사일 위협에 대한 일본의 군사 외교적 대응" 신아시아, 재 19 권 4 호, pp.23.

⁴⁵³

〈선제공격을 노린 무모한 미사일 방위 체계 수립 책동〉，2007 年 12 月 10 日，勞動新聞，<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07/12/12-10/2007-1210-004.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30 日）

⁴⁵⁴ 〈로동신문 일본반동들이 떠드는 《평화》의 본질 폭로〉，2012 年 5 月 29 日，勞動新聞，<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12/05/05-29/2012-0529->

北韓除了持續批評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外，也明確表示飛彈攻擊的目標為「首爾、華盛頓、東京」⁴⁵⁵。此外，北韓也批評針對日本過去的殖民歷史，認為身為罪犯日本並沒有為此行為道歉，且在獨島主權爭議上，北韓也主張獨島是屬於北韓的固有領土。北韓除了實際行動外，多次公開表示將威脅日本安全，也加深日本對北韓威脅的擔憂。

在日本正常化國家過程中，進行修改憲法議題討論、擴大安全角色、提升防衛軍事能力，一連串的行動對於日中關係與日朝關係的影響（圖3）。日本和中國原先即存在釣魚島主權爭議，從1990年代起也屢次發生中國入侵日本領海或是登島事件，到了2010年更發生撞船事件使得雙方關係緊張愈加升高。此外，日中兩國還存有歷史問題，小泉首相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也引發中國抗議。隨著中國軍事能力現代化，日本持續關注中國的軍事能力發展，也感受到中國軍事發展對其造成的威脅，而中國對於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也公開表示抗議。在日朝關係方面，從1998年大浦洞飛彈危機以來，北韓不斷以飛彈試射和核武試驗讓周邊國家感到不安。除了軍事上的威脅外，北韓綁架日本人質事件也讓日本人民對於北韓更加恐慌。雖然日本嘗試和北韓進行關係正常化，但是雙方接觸、談判後，北韓還是持續進行軍事挑釁行為，如此更強化了日本對北韓的不信任與日本正常化國家的進程。北韓也公開批判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認為是過去軍國主義再起的徵兆，使得雙方關係愈加惡化。

[010.html](#)，（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⁴⁵⁵

〈北"타격목표는서울,워싱턴,도쿄"〉，2003年7月13日，獨立新聞，<http://www.independent.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5>，（檢索日期：2015年5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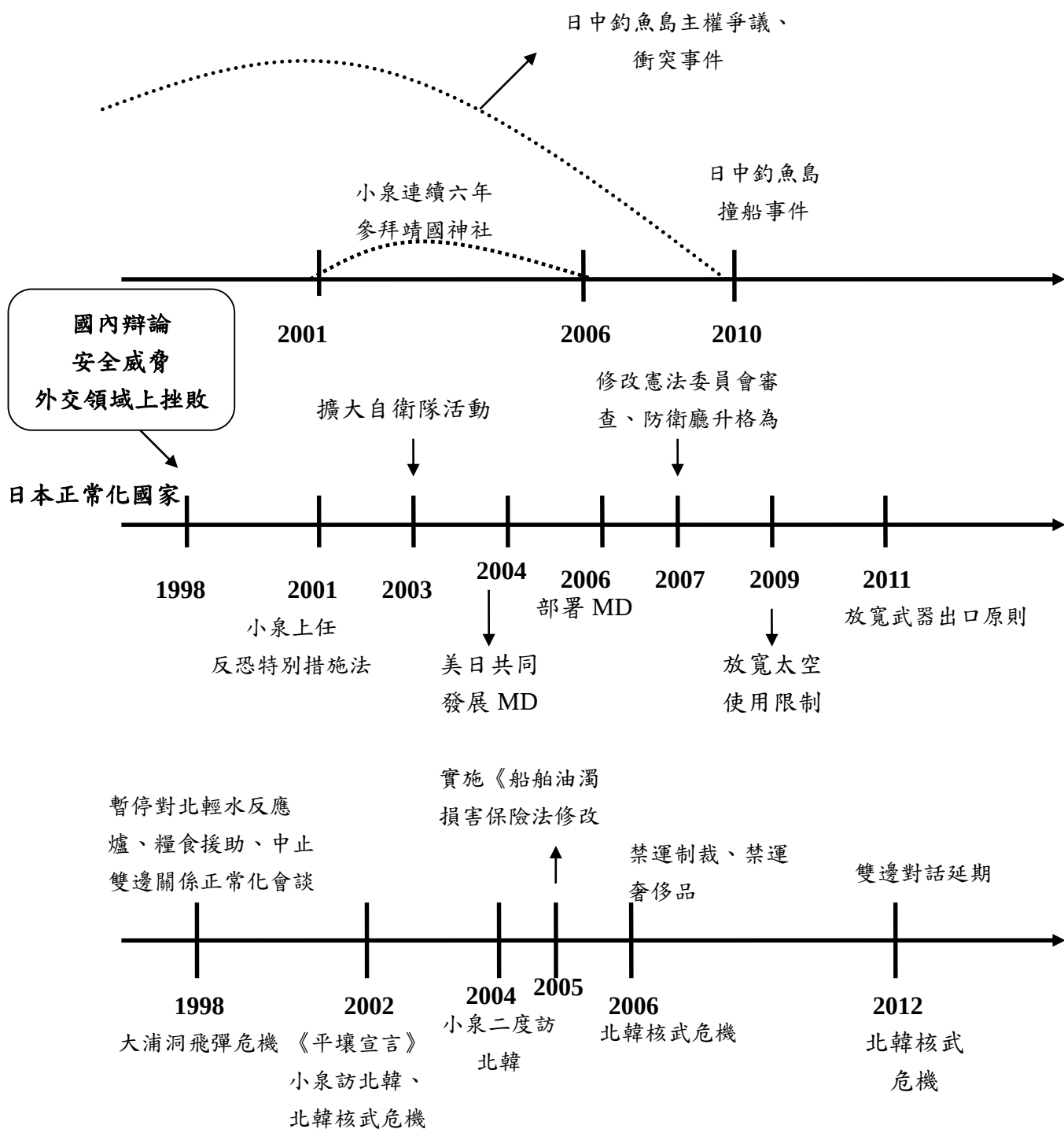


圖 3 日本正常化國家與日中、日朝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朝鮮半島統一意識與南北韓關係發展

南韓在金大中政府上台後，持續推動參與北韓的「陽光政策」，到了盧武鉉時期也承接金大中政策，提出「和平繁榮」政策，希望改善與北韓的關係。南韓不僅在統一部所發行的官方文書中提及未來和平統一的政策，南北韓在實質經貿、人員間的交流活動也持續發展，雖然過程中北韓仍然持續發動海戰，北韓常態性進行飛彈試射和核武試驗等軍事行動，但雙方交流活動也未因此中斷，南韓希望持續推動參與北韓政策，因此對於北韓軍事挑釁行為也未直接採取制裁行動。到了李明博政府時期，也是持續主張朝鮮半島要和平統一，只是李明博政府認為必須先解決北韓非核化問題，才能達成統一目標。對此，北韓認為南韓是干涉內政行為，「解決核武問題與發展南北韓關係並行」的想法是和過去金大中、盧武鉉時期政策最大的差異。在回應北韓軍事挑釁行為上，李明博政府態度也較強硬，雙方的交流活動也從 2008 年金剛山觀光客遭槍擊事件開始停擺，使得雙方關係愈加惡化（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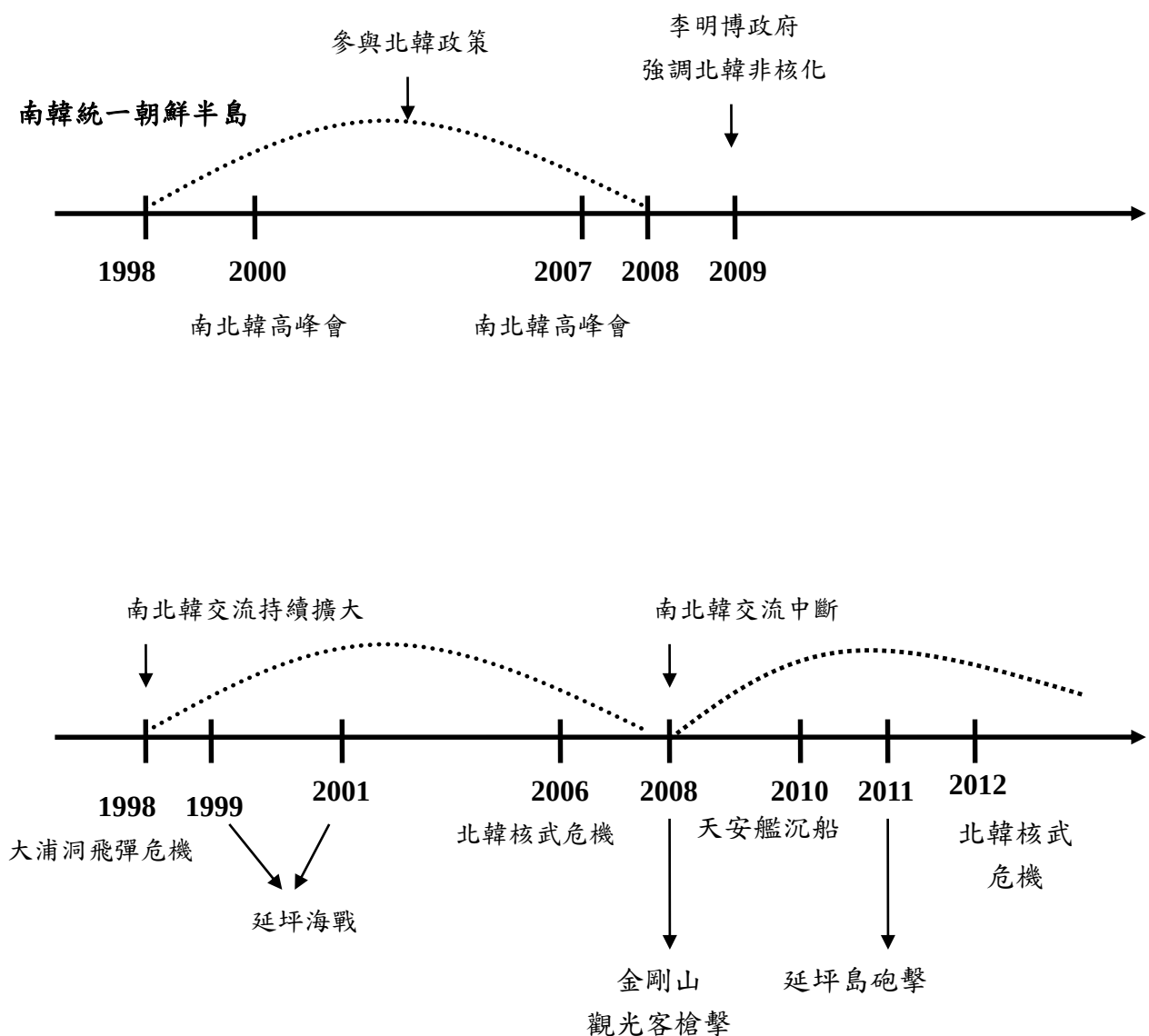


圖 4 南北韓軍事衝突事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四、威脅可信度分析

「預防性威脅」的概念是擔心未來可能發生的不確定攻擊，影響威脅可信度的因素可以分為物質和理念上兩個層面進行討論。從日本首相小泉開始系統性地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正常化過程中不僅擴大全球安全角色，也增強防衛軍事能力，預期此舉會損及他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進而和他國關係惡化，因此推論敵方實

現威脅的可能性增加，威脅可信度也就隨之增加。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見圖5），中日兩國存在島嶼主權爭議，在軍事準備上，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成長，中國國防費用逐年上升，且軍事武器發展能力不斷突破，因此顯示出中國有意圖對日本施加威脅，但是南韓與中國並不存在島嶼領土爭議，而日本即使由一直在野的民主黨上任後，還是持續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這也給了其他國家「日本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明確信號，日本從自己行為也可以預期和他國關係會因此惡化；又從理念層面來看，中日存有歷史問題和教科書等爭議，而在理念層面來看，中國和南韓也不存在這樣爭議。而對日本來說，從物質上來看（見圖6），北韓不僅多次威脅以飛彈和核武攻擊日本，且不顧國際社會反對，持續進行飛彈、核武開發計畫，也公開批評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意味著軍國主義再起和也有獨島主權爭議；從理念上來看，日朝間有二戰以來的殖民歷史、慰安婦問題，由此，在日本正常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與中國和北韓的衝突，不論從物質和理念層面來看中國和北韓的威脅都具有可信度，所以日本透過認真地加入飛彈防禦體系，就是讓可能用飛彈攻擊的威脅、有可信度的威脅不至於產生，一旦加入MD，他國的反應就會更加強化本國必須要朝向此路徑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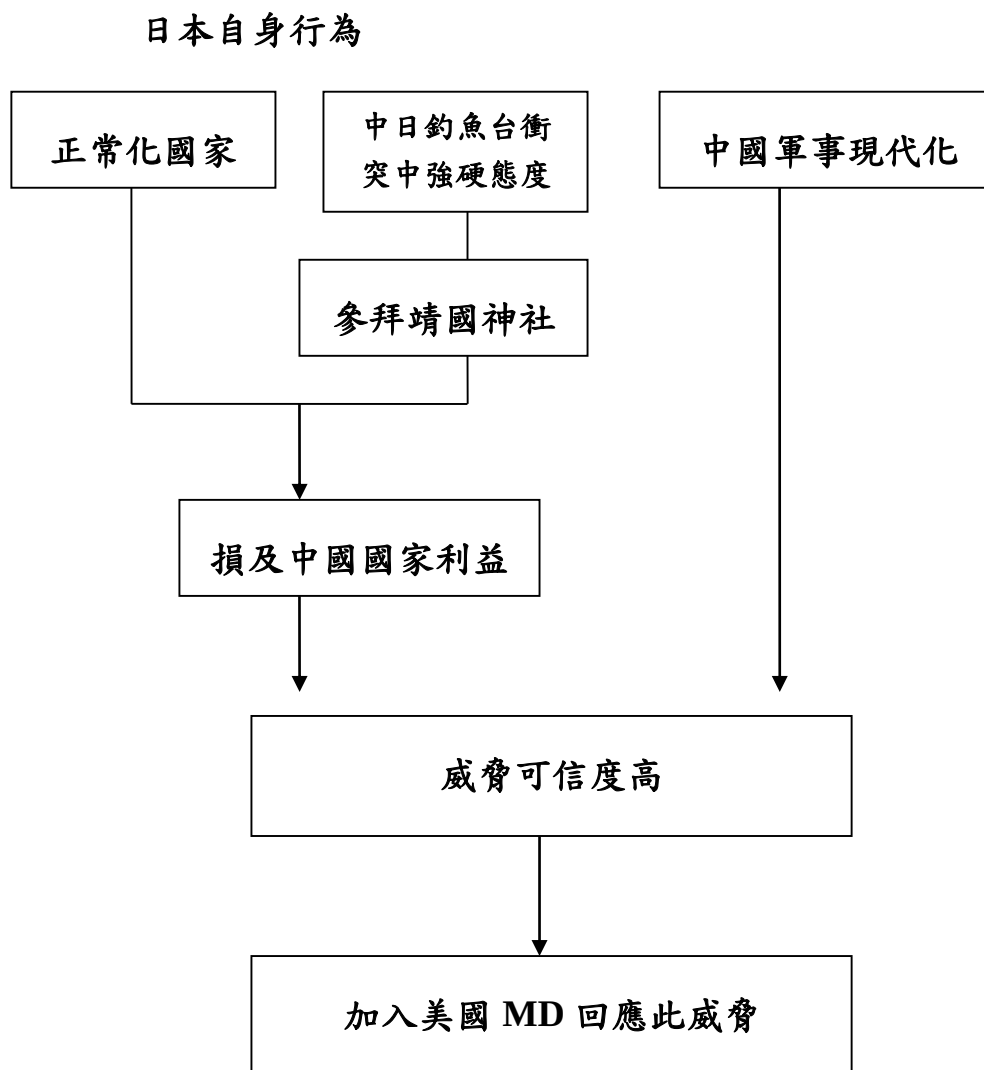


圖5：中國對日本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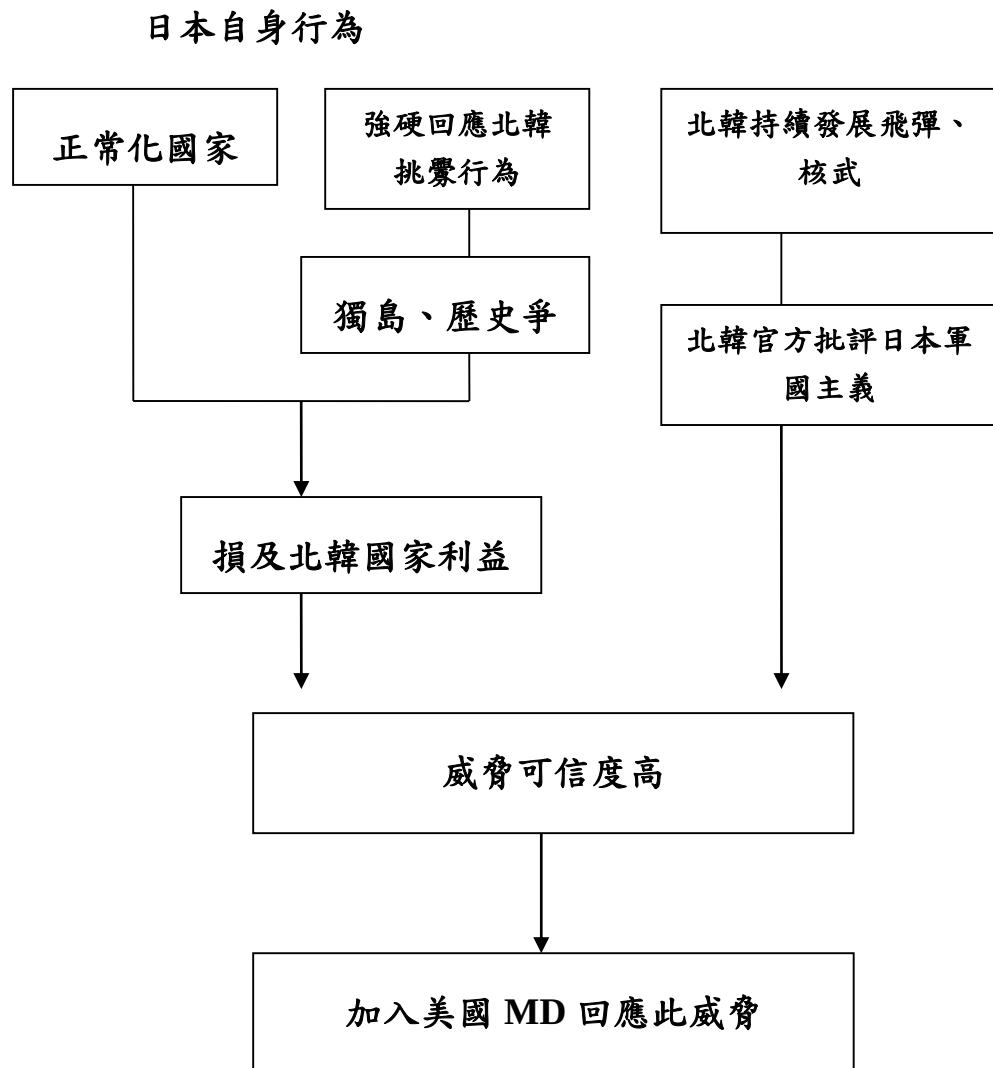


圖6：北韓對日本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理念層面來看影響威脅可信度的因素，南韓國內無論是進步派或是保守派政治領導都強調南北韓統一，儘管因為軍事衝突或是雙邊交流使得南北韓關係起伏，但和共同血統的民族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是南韓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基礎，所以南韓不會去質疑南北韓統一上民族的問題，南韓非常渴望能和北韓統一，南韓人民認為現狀只是暫時的，雖然南北韓對於統一的形式和策略的想法不同，但是雙方都認為朝鮮半島應該基於統一民族性統一，統一對南韓來說是必須實行的終極目標。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在金大中、盧武鉉進步派政府時期（見圖

7)，雖然南北韓間爆發衝突但是並沒有因此影響或是中斷雙方的交流活動，到了李明博保守派政府上台後（見圖 8），仍然和北韓持續進行交流。但是在面對南北韓衝突時，李明博展現出較強硬的態度，金剛山觀光事業、南北韓間鐵路運行中斷，縮小開城工業區，對開城工業區陸路運輸管制強化，一連串的行為危害了北韓的國家利益，從物質上來看，李明博政府時期的北韓威脅是較進步派政府具有可信度。由此，南韓因為不需要透過加入 MD 的作為去抵銷此有可信度的威脅帶來的結果，持續拒絕加入 MD，但是到了李明博時期參與雖然在理念上仍然是維持統一想法讓北韓實現威脅仍然較不具可信度，但從物質層面上來看雙方交流中斷，使得北韓實現威脅的意圖增加時，便開始放鬆政府的態度，雖然仍然持續拒絕加入美國發展的 MD，但表現出合作的可能性，這是理念和物質層面對威脅可信度造成影響的結果。

從「威脅可信度」來看，日本長期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可以解釋在發展 MD 的過程中日本預期己方行為會傷害中、朝國家重要利益，因此當中、朝兩國對日本造成威脅的動機上升，威脅可信度提高，因此需要透過加入 MD 來應對可信的威脅。南韓則是不論進步派或是保守派政府皆懷抱「統一朝鮮半島」的終極目標，而這也是北韓所認同的，雙方交流活動也持續進行，且南韓持續推動的參與北韓政策也是符合北韓國家利益，因此即使北韓仍有軍事挑釁行為，但南韓瞭解此為北韓為了鞏固其政權的路徑依賴作為，北韓實現威脅的意圖、動機並不會上升，並非具有可信度的威脅，因此南韓不需要加入 MD 來應對威脅。但是到了李明博時期，雖然「統一朝鮮半島」的長期目標不變，但是李明博政府改變實現統一的方法，強調「北韓非核化」必須優先處理，也因為北韓軍事挑釁行為而中斷雙邊交流活動，此舉傷害了北韓的重要國家利益，由此李明博政府預期北韓實現威脅意圖的可能性上升，威脅的可信度也隨之上升，因此為了回應可信的威脅，李明博政府開始討論加入美國 MD 的可能性，同時在統一的意識的影響下而讓南韓維持原先既有拒絕加入美國 MD 的路徑卻展現合作可能性的態度。

南韓自身行為（金大中、盧武鉉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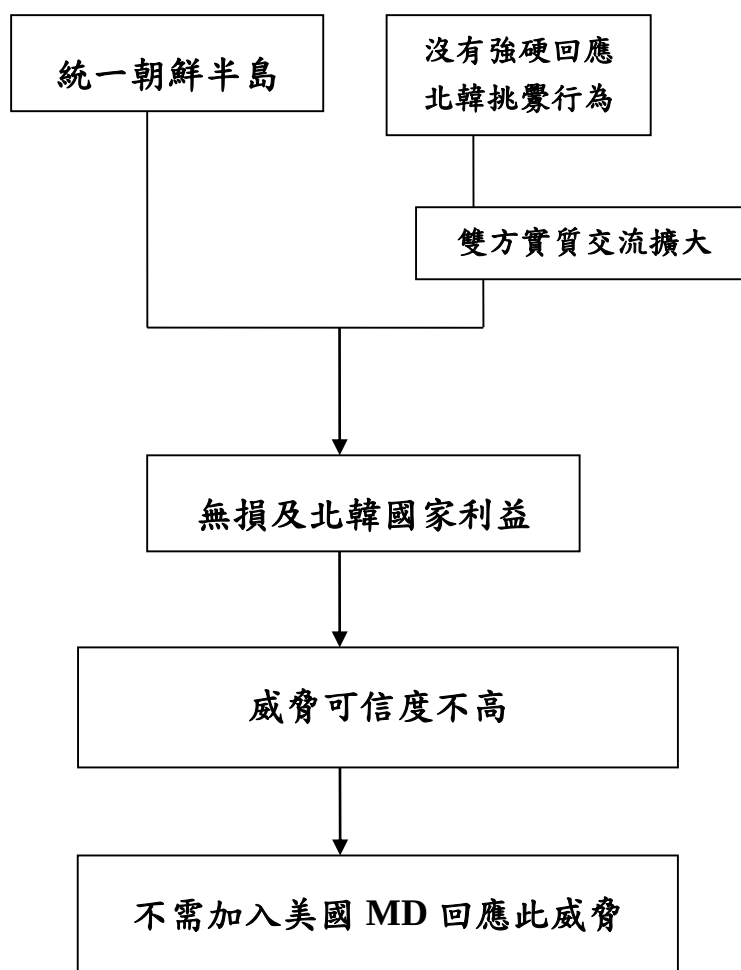


圖7：進步對派政府時期北韓對南韓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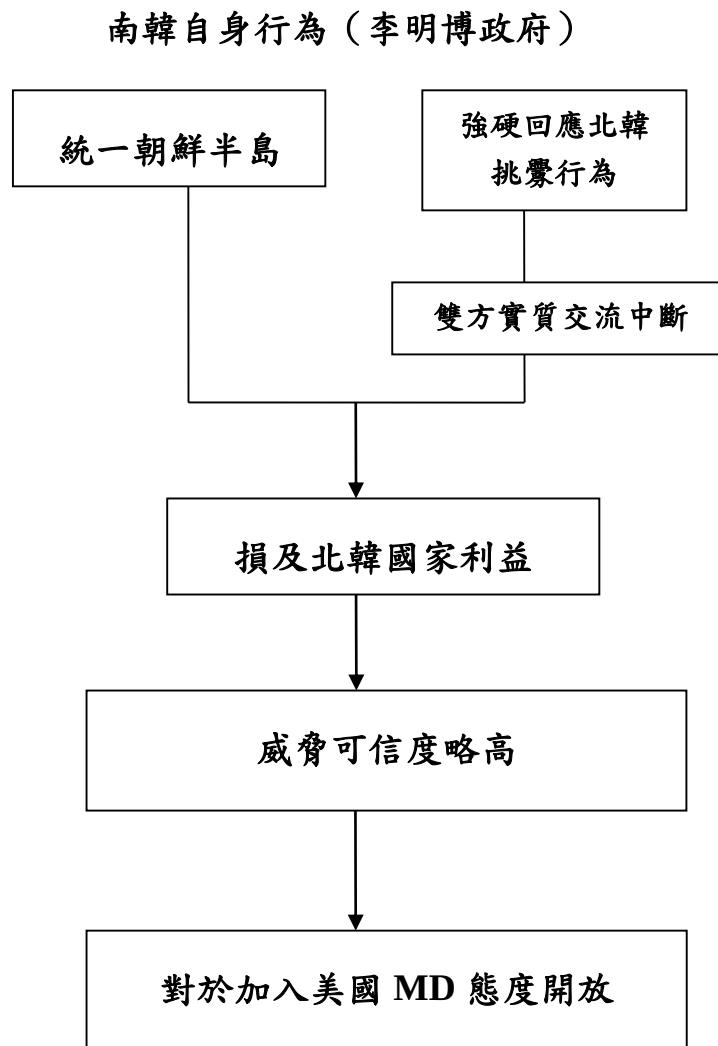


圖8：保守派政府時期北韓對南韓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參、 結論

對「威脅可信度」的影響可以分為物質和理念上兩個層面進行討論。從首相小泉開始正常化國家行為，正常化過程中預期會威脅他國重要國家安全利益，進而導致和他國關係惡化，因此知道對方實現威脅的意圖可能性增加，威脅可信度

也就隨之增加。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中日兩國存在島嶼主權爭議，在軍事準備上，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成長，中國國防費用逐年上升，且軍事武器發展能力不斷突破，因此顯示出中國有意圖對日本施加威脅，但是南韓與中國並不存在島嶼領土爭議，而日本即使由一直在野的民主黨上任後，還是持續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這也給了其他國家「日本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明確信號，日本從自己行為也可以預期和他國關係會因此惡化；又從理念層面來看，中日存有歷史問題和教科書等爭議，而在理念層面來看，中國和南韓也不存在這樣爭議。而對日本來說，從物質上來看，北韓不僅多次威脅以飛彈和核武攻擊日本，且不顧國際社會反對，持續進行飛彈、核武開發計畫，也公開批評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意味著軍國主義再起，和日本也存在獨島主權爭議；從理念上來看，日朝間有二戰以來的殖民歷史、慰安婦問題，由此，在日本正常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與中國和北韓的衝突，不論從物質和理念層面來看中國和北韓的威脅都具有可信度，所以日本透過認真地加入飛彈防禦體系，不至於面臨飛彈攻擊等具有可信度的威脅發生時無法回應。

MD系統的發展和部署會挑戰許多日本反軍國主義規範，其中包括武器出口限制、和平使用太空、集體防衛活動限制，隨著日本要求美國在出售任何共同研發技術前要取得日本的同意，未來出口共同研發技術至第三國已經出現歧異。雖然日本官方為了雙邊研發計畫已經提供了日本禁止武器出口的例外，出口武器至第三國會需要面臨一連串取得日本內閣准許的過程。雖然可能不會惡化未來的共同研發計畫，此象徵了日本會如何限制雙邊合作的限制程度和讓美國防衛計畫單位感到失望，即使在技術層面上成功。許多法律上的因素限制日本和美國更進一步穩固地合作，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為日本憲法第九條限制戰爭作為日本的集體自衛權，且禁止日本的戰爭權。其中規定了陸、海和空軍以及其他戰爭傾向的意志都不能維持。然而日本將此法條解釋為日本可以維持自衛目的的武力，在日本正常化國家的過程中，MD可視為改變日本防衛政策和與美國同盟關係安排的動力，和美國共同聯合製造MD系統挑戰了日本安全和認同和長期以來的制度限制（武器出口限制），在2004年12月10日宣布放寬武器出口限制，但是日本在發展MD的過程中，持續對於法律上的限制進行檢討，故日本加入MD不僅是實現其國家正常化的一環，他國的反應也讓日本選擇繼續強化MD能力以回應區域威脅。

對南韓來說統一一直是朝鮮半島的終程目標，儘管進步派和保守派政治菁英間存在對北韓認識的差異或是對統一方式的認知差異，但是統一朝鮮半島是不論政治傾向為何皆共享的。從理念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南韓國內無論是進步派或是保守派政治領導都強調南北韓統一，儘管因為軍事衝突或是雙邊交流使得南北韓關係起伏，和共同血統的民族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是南韓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基礎，即為南韓不會去質疑南北韓統一上民族的問題，南韓非常渴望能和北韓統一，南韓人民認為現狀只是暫時的，雖然南北韓對於統一的形式和策略的想法不同，但是雙方都認為朝鮮半島應該基於統一民族性統一，統一對南韓來說是必須實行的終極目標。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在金大中、盧武鉉進步派政府時期，

雖然南北韓間爆發衝突但是並沒有因此影響或是中斷雙方的交流活動，到了李明博保守派政府上台後，初期仍然和北韓持續進行交流，但是在面對北韓發動軍事挑釁行動時，展現出較強硬的態度，金剛山觀光事業、南北韓間鐵路運行中斷，縮小開城工業區，對開城工業區陸路運輸管制強化，從物質上來看，李明博政府時期的北韓實現威脅動機是較進步派政府高。但是到了李明博時期雖然在理念上仍然是維持統一朝鮮半島想法讓北韓實現威脅動機不那麼高，但從物質層面上來看威脅開始具有可信度時，便開始放鬆政府的態度，由此可見南北韓理念因素和物質因素雙重性的影響下，雖然仍然南韓仍持續拒絕加入美國發展的 MD，但表現出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英文參考文獻

- Ahn, Yinhay. 2003. "North Korea in 2002: A Survival Game". *Asian Survey*, 43(1), 49-63.
- Anthony, Ian. 2000. *SIPRI Yearbook 2000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gnalistgatan: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 Arase, David. 2009. "Japan in 2008: a Prelude to Change?". *Asian Survey*, 49(1), 107-119.
- Arase, David. 2010. "Japan in 2009: a Historic Election Year". *Asian Survey*, 50(1), 40-55.
- Calder, Kent E. 2009. *Pacific Alliance: Reviving U.S.-Japan Relations*.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rpenter, Ted Galen. and Bandow Doug. 2004. *The Korean Conundrum: America's Troubled Relations with North and South Korea*. Palgrave Macmillan.
- Chae, Haesook. and Steven Kim. 2008. "Conservatives and Progressives in South Korea". *Washington Quarterly*, 31(4), 77-95.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49-80.
- Chris, Jones. 2009. "Managing the Goldilocks Dilemma: Missile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The 2009 Collection of Papers from the PONI Conference Series.
- Cho, Ilsoo David. and Meredith Jung-En Woo. 2007. "North Korea in 2006: 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Asian Survey*, 47 (1), 68-73.
- Choo, Jaewoo. 2008. "Mirroring North Korea's Growing Economic Dependence on

- China: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Asian Survey*, 48(2), 343-372.
- Chung, Chien-Peng. 2011. “Japan's Involvement in Asia-Centered Regional Forums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Survey*, 51(3), 407-427.
- Cronin, Richard. P. 2002. “Japan-U.S. Cooperation on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ssues and Prospect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 Dittmer, Lowell. 2008. “Asia in 2007”. *Asian Survey*, 48(1), 1-4.
- Emma Chanlett-Avery. 2011. “The U.S.-Japan Allian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18, 1-28.
- Fearon, James D.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03), 577-592.
- Fearon, James D. 1997.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1), 68-90.
- Fouse, David. 2004. “Japan's Post-Cold War North Korea Policy: Hedging toward Autonom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102-120.
- Finnegan, Michael. 2011.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7(1), 91-116.
- Finnegan, Michael. 2009. “Managing Unmet Expectation-in the U.S.-Japan Alliance ”. *NBR Special Report*, 17, 63-64.
- Fry, Graham. 2010. “Japan's New Government: What Has Changed?”. *Asian Affairs*, 41(2), 178-187.
- Green, Michael J. and Nicholas Szechenyi. 2010. “Green Shoots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 *CSIS JAPAN CHAIR PLATFORM*, November 9, 1-3.
- Godement, François. 2011.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10”. *Asian Survey*, 50(1), 8-24.
- Govella, Kristi. and Steven Vogel. 2008. “Japan in 2007: a Divided Government”.

- Asian Survey*, 48(1), 97-106.
- Hughes, Christopher W. 2006."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nd US-Japan and US-UK Alliance Compared,"GARNET Working Paper, December 6, 1-41.
- Hughes, Christopher W. and Ellis. S. Krauss. 2007. "U.S.-Japan Alliance Futures: Koizumi's Legacy Abe's Security Policies U.S. Challenge" *Survival: The IISS Quarterly*, 49 (2), 157-76.
- Hughes, Christopher W. 2009A. " Super-Sizing" the DPRK Threat: Japan's Evolving Military Posture and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49 (2) , 291-311.
- Hughes, Christopher W. 2009B. Japan's Military Modernisation: a Quiet Japan–China Arms Race and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Asia Pacific Review*, 16(1), 84-99.
- Hughes, Christopher W. 2013". Japan , Ballistic Missile Defence and Remilitarization" *Space Policy* (2013), 1-7.
- Haggard, Stephan. and Marcus Noland. 2009. "North Korea in 2008: Twilight of the God?". *Asian Survey*, 49(1), 98-106.
- Hakjoon, Kim. 2010. "A Brief History of the US-ROK Alliance and Anti-Americanism in South Korea". *Shorenstein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31 (1), 1-47.
- Ha, Yong-Chool. 2001. "SOUTH KOREA IN 2000 A Summit and the Search for New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sian Survey*, 41(1), 30-39.
- Ha, Yong-Chool. 2001. "SOUTH KOREA IN 2000 A Summit and the Search for New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sian Survey*, 41(1), 30-39.
- He ,Yinan. 2007.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War: Elite Mythmaking, Mass Reac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50–2006". *History & Memory*, 19(2), 43-74.
- Ishikawa, Taku. 2005." Japan: Harmony by Accident?"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6(3), 639-662 .

- Jimbo, Ken. 2002. "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ssile Defense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Non Proliferation Review*, 9(2), 56-62.
- Jimbo, Ken. 2005."Japan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NDPG) and Prospects for Korean Peninsular Security" *전략연구*, 통권 제34호, 39-73.
- Kang, David C. 2009.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1), 1-28.
- Kang, David C. and Ji-Young Lee. 2010. "Japan-Korea Relations: Same Dance, Different Floor".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1(1), 115-122.
- Kang, David C. 2010.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tz, Katrin. and Victor Cha. 2012. "South Korea in 2011: Holding Ground as the Region's Linchpin". *Asian Survey*, 52(1), 52-64.
- Kim, Andrew Eungi. and Lie, John. 2007. "South Korea in 2006: Nuclear Standoff, Trade Talks, and Population Trends". *Asian Survey*, 47(1), 52-57.
- Kim, Samuel S. 2006. *The Two Koreas and the Great Pow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m, Seung-Hwan. 2002. "Anti-Americanism in Korea". *Washington Quarterly*, 26(1), 109-122.
- Kim, Tae-woo. 1999. "South Korea's Missile Dilemmas". *Asian Survey*, 39(3), 486-503.
- Kim, Tae-woo. 2008." ROK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ROK-US Security and Maritime Cooperation: MD, PSI and Dokdo Is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2(1), 43-60.
- Kim, Hyun-Wook. 2009. "Domestic Events, Ideological Changes and the Post-Cold War US–South Korea Al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3(4), 482-504.

- Kliman, Daniel M. 2006.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 World: 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Kim, Tae-hyung. 2009. "South Korea's Missile Defense Policy: Dilemma and Opportunity for a Medium Stat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1(3), 371–389.
- Klingner, Bruce. 2011. "The Case for Comprehensive Missile Defense in Asia." *Backgrounder*, January 7, 1-12.
- Klingner, Bruce. 2008. "Evolving Military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U.S.-ROK Alli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2(1), 25-42.
- Lee, Sook-Jong. 2005. "Ally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 South Korean Attitud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17(1), 81-104.
- Lieberthal, Kenneth. 2002.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01: Changing Agendas". *Asian Survey*, 42(1), 1-13.
- Levy, Jack S. 1987.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01), 82-107.
- Lincoln, Edward J. 2002. "Japan in 2001: A Depressing Year". *Asian Survey*, 42(1), 67-80.
- Lee, Nae-young. and Han-wool Jeong. 2003.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ROK-U.S. Alliance". *East Asian Review*, 15(4), 23-46.
- Michael D. Swaine, Rachel M. Swanger, Takashi Kawakami. 2001. *Japan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anta Monica, CA: RAND.
- Mearsheimer, John J. 2005. "Anarchy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Edited by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ervis. Beijing, The People of Republic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50-60.
- Midford, Paul. 2011. *Rethinking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and Security: from Pacifism to Re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Gordon R. 2001. Japan-US Missile Defense Collaboration: Rhetorically Delicious, Deceptively Dangerous.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25, 85-108.
- Nakanishi, Hiroshi "The Japan-US Alliance and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Sources of Chang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Armacost, M. H., & Okimoto, D. I. (Eds.). 2004. *The future of America's alliance in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 Nam, Chang-hee. 2006. "Relocating the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Strained Alliance, Emerging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Defense Posture". *Asian Survey*, 46(4), 615-631.
- Oros, Andrew L. 2008. *Normalizing Japan: Politics,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 NUS Press.
- Paal, Douglas H. 2000.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in 1999: Ending the 20th Century". *Asian Survey*, 40(1), 1-15.
- Park, Tong Whan. 1999. "South Korea in 1998: Swallowing the Bitter Pills of Restructuring". *Asian Survey*, 39(1), 133-139.
- Park, Gene. and Steven Vogel. 2007. "Japan in 2006: a Political Transition". *Asian Survey*, 47(1), 22-31.
- Pempel, T. John. and Chung-min Lee. (Eds.). 2012.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rchitecture and Beyond*. Routledge.
- Przystup, James. 2009.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U.S.-ROK Alliance".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19, 45-46.
- Pyle, Kenneth B. 2010. "A New Stage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 *Asia Policy*, 10, 1-41.
- Ralph. Cossa A"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Can Japan Become the Great Britain of Asia? Should it?" Armacost, M. H., & Okimoto, D. I. (Eds.). 2004.

- The future of America's alliance in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 Reiter, Dan. 1995. "Exploding the powder keg myth: Preemptive wars almost never Happ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 5-34.
- Rosenbluth, Frances McCall. 2010. "Japan in 2010". *Asian Survey*, 51(1), 41-53.
- Scalapino, Robert A. 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1998: Summitry amid Crisis". *Asian Survey*, 39(1), 1-11.
- Schoff, James L. 2009.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Future of Extended Deterrence".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1(4), 417-433.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2.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44(02), 235-269.
- Shinoda, Tomohito. 2007. *Koizumi diplomacy: Japan's kantei Approach to Foreign and Defense Affai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habalín, Maxim N. 2011. *The Logic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ce Procurement in Japan (1994-2007): from Hedging through Self-Imposed Restraints toward Hedging from the Position of Military Strength*. University of Oxford.
- Sheen, Seong-ho. 2009. *Out of America, into the Dragon's Arms-South Korea, a Northeast Asian balancer?*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 Sneider, Daniel. 2011. "The new Asianism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Asia Policy*, 12(1), 99-129
- Sonya Finley" Democratic America in Northeast Asia: US Strategy,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nd Allied Relations." Cho, L. J., Ahn, C. S., & Kim, C. N. 2004. *Changing Korea in Regional and Global Context*. Honolulu, HI : East-West Center ; Seoul :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Janice Gross. 2013.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thcoming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2nd ed. Edited by Leonie

-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5.
- Sunohara, Tsuyoshi. 2010. "The Anatomy of Japan's Shifting Security Orient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3(4), 39-57
- Tarar, Ahmer. and Leventoglu, Bahar. 2008. Bargaining and Signal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Unpublished paper.
- Toki, Masako. 2009. "Missile defense in Japan." in <http://thebulletin.org/missile-defense-japan>. Latest update 16 January.
- Urayama, Kaori. 2008. *Missile Defense, US-Japan Alliance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83-2007*. ProQuest.
- Uriu, Robert. 1999. "Japan in 1998: Nowhere to Go but Up?". *Asian Survey*, 39(1), 114-124.
- Uriu, Robert. 2000. "Japan in 1999: Ending the Century on an Uncertain Note". *Asian Survey*, 40(1), 140-150.
- Uriu, Robert. 2003. "Japan in 2002: An Up-and-Down Year, but Mostly Down". *Asian Survey*, 43(1), 78-90.
- Tetsuya, Umemoto.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Ikenberry, G. J. and T. Inoguchi 2003.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ha, Victor D. and Katrin Katz. 2010. "South Korea in 2010". *Asian Survey*, 51(1), 41-53.
- Cha, Victor D. 1999. "The Rationale for "Enhanced" Engagement of North Korea: After the Perry Policy Review". *Asian Survey*, 39(6), 845-866.
- Cha, Victor D. 1999. "The Rationale for "Enhanced" Engagement of North Korea: After the Perry Policy". *Asian Survey*, 39(6), 845-866.
- Walt, Stephen M.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zer, Michael. 2006.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Weitz, Richard. 2013A. "US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and Its Asian Implication". *ISSUE BRIEF*, 75, 1-10.
- Weitz, Richard. 2013B. "An Enduring Partnership: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5(3), 301-315.
- Youngshik, Bong. and T. John. Pempel. 2013. *Japan in Crisis: What Will it Take for Japan to Rise Again?*. Palgrave Macmillan.
- Youngshik, Bong. 2004. "Yongmi: Pragmatic Anti-Americanism in South Korea".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0(2), 153-165.
- Yasuaki, Chijiwa. 2010. "Japan's Security Outlook: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fense Policy". *NIDS Joint Research Series*, 5, 161-174.
- Yoo, Hyon Joo. 2012A. "The Korea-US Alliance as a Source of Creeping Tension: A Korean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36, 331-352.
- Yoo, Hyon Joo. 2012B. "Domestic Hurdles for System-Driven Behavio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Missile Defense Polici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2(2), 317-348.

韓文參考文獻

- 김병국(金邊國) 등, 2006, 《시민사회의 정치과정: 한국과 일본의 비교》, 서울 : 아연.
- 남창희(南昌熙). 2006. "일본의 미사일 방어체계" *군사논단*, 제 45 호, 56-75.
- 남창희(南昌熙). 2009. "한미동맹과 미일동맹의 동조화와 한일안보협력" *한일군사문화*, 제 8 집, 65-99.

- 남창희(南昌熙),이종성(李宗城). 2010.”북한의 핵과 미사일 위협에 대한 일본의 대응”. *국가전략*, 제 6 권 2 호, 63-94.
- 엄상윤(嚴尙允). 2014.”한.미.일 MD 협력의 양상과 전망”*국가전략*,제 20 권 2 호.
- 조한승. 2007.”북한의 벼랑 끝 전술과 미국의 미사일방어체제의 상호관계:전쟁억지와 군사개입을 중심으로” *평화연구*,제 15 권 1 호, 167-193.
- 진창수(鎭昌秀). 2011.” 일본의 동아시아 공동체구상 전개 쟁점 그리고 한국의 대응” *세종정책연구*,제 15 권,1-39
- 정경영(鄭慶英). 2013. 학술논문: 전작권 전환 정상추진과 한미동맹의 비전. *군사논단*, 74(단일호), 147-174.
- 정철호(鄭哲浩). 2013.”미국의 동북아 MD 정책과 한국의 KAMD 전략 발전방향” *세종정책연구*,2013-6, 20-53.
- 정한울(鄭韓律). 2003. “한국사회 반미의식 다원한 현상 분석: 새로운 경험분석 모델의 모색” *동아시아연구* 제 7 호, 101-124.
- 정한울(鄭韓律). 2007.”미국 소프트 파워의 위기?” *EAI 여론브리핑*, 2007 년 1 월 23 일, 1-3.
- 정한울(鄭韓律). 2013.” 안보불감증인가? 안보의식의 변화인가?” *EAI 여론브리핑*, 2013 년 4 월 23 일, 1-7.
- 정한울(鄭韓律). 2015.”KOREAN VIEWS 2014:달라진 한국의 위상과 대외인식의 딜레마” *EAI OPINION Review*, No. 2015-01, 1-14.
- 정옥식(鄭玉錫). 2011.”한미 미사일방어체제(MD) 협력: 분석, 문제점, 정책대안”*새세상연구소*,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c8MWqgY4gOsJ:knsi.org/knsi/admin/work/works/nci_110725.hwp+&cd=4&hl=zh-TW&ct=clnk

- 정하울(鄭韓律). 2013.” 안보불감증인가? 안보의식의 변화인가? 핵 보유국
북한시대의 안보인식 지형과 신안보전략 논의 시급성” *EAI OPINION
Review Series*, 2013-2 호
- 김성조(金成曹). 2002. 장군의 시각: 서해교전은 끝나지 않았다. *한국논단*,
155(단일호), 39-46.
- 김성철(金成哲). 2010.” 일본 민주당 정부의 외교안보정책 세종정책연구-
원칙과 과제” *세종정책연구*, 제 6 권 제 1 호, 360-412.
- 김민곤(金敏坤). 2014.” 전시작전권 전환과 주한미군의 변화
고찰” *사회과학연구*, 제 38 집 2 호, 1-39.
- 김성걸(金成吉). 2014. 일본의 최근 미사일, 미사일 방어 정책 방향.
한일군사문화연구, 17(단일호), 3-32.
- 강원택(康元澤). 2010.”천안함 사건은 지방선거의 변수였나?” *EAI OPINION
Review*, No. 201006-01, 1-7.
- 강최, 김기범(康崔、金起範). 2014.”미사일방어에 대한 전략적 모호성의
장벽을 넘어서” *issue BRIEF*, 2014-23.
- 김일영(金日英). 2004.”주한미군 재편:배경, 경과, 그리고 전망”
한국정치외교사논총, 제 25 집 1 호, 231-263.
- 김학성(金學成). 2007.”남북관계와 한미관계에 대한 한국인의 의식변화와
국민적 공감대 형성 문제” *한국과 국제정치*, 제 23 권 2 호 통권 57 호,
1-29.
- 김성만(金成滿). 2012. 제 2 연평해전 10 년, 남겨진 과제. *한국논단*,
273(단일호), 52-57.
- 엄태암(嚴泰岩). 2009. “21 세기 한·미 전략동맹 구현의 과제 - 한미 FTA 와
아프간 지방재건팀(PRT) 파견을 중심으로”. *국제문제연구*, 9 (4), 1-33.
- 이상현(李尚炫). 2007.” 한·미관계의 회고와 전망”. *국제문제연구*, 7(4), 1-14.
- 이상현(李尚炫). 2009.”한미전략동맹과 미사일방어(MD) 및

확산방지구상(PSI): 한국의 정책방향 및 과제,”

[http://www.jpi.or.kr/board/run/download.php?board_id=ROA&page=1&row_per_page=15&page_per_block=10&pds_uid=365,](http://www.jpi.or.kr/board/run/download.php?board_id=ROA&page=1&row_per_page=15&page_per_block=10&pds_uid=365)

이내영, & 정한울(李來榮、鄭韓律). 2003. 반미여론과 한미동맹: 2002 년 12 월과 2003 년 6 월의 여론조사 자료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 *국가전략* 2003 년 제 9 권 3 호, 57-82.

이상원(李相元). 2005. “반미연론의 등장과 한국인의 대중국 인식: 2004 년 7 월 여론조사를 중심으로” *동아시아연구*, 제 11 호, 27-89.

이내영, 정한울, & 정원칠(李來榮、鄭韓律、鄭元漆). 2005. “전환기의 한미동맹과 국민여론”. *EAI 오피니언 리뷰*, 1-77.

이희옥, 차재복(李熙玉、車載福). 2012. 《1992-2012 한중 관계 어디 까지 왔나 : 성과와 전망》, 서울시 : 동북아 역사 재단.

이창헌(李昌憲). 2013. 이명박 정부시대의 남북관계: 분석과 평가. *정치정보연구*, 16(2), 225-266.

유호열(劉浩烈). 2006. 제 2 의 햇볕정책과 북한의 전략적 선택. *통일한국*, 24(6), 15-18.

유호열(劉浩烈). 2008. 비핵화 정책과제와 추진방향-남북관계의 시각 버리고 비핵화 위한 국제공조에 나설 때다. *통일한국*, 26(1), 17-20.

유호열(劉浩烈). 2008. 이명박 정부의 대북정책과 남북관계. *한국국제정치학회소식*, 제 127 호, 1-2.

유호열(劉浩烈). 2011. 한국, 안보 우선 기조 남북 대화 재개 타진?. *통일한국*, 22-23.

신옥희(申玉熙). 2001. “북미관계와 한반도 평화체제: 역사적 고찰” *한국정치외교사논총*, 제 33 집 2 호, 35-61.

송대성(宋大成). 2009. “북한의 위협과 한미동맹” *북한학보*, 제 34 집 1 호.

문정인, 이춘복(文正仁、李春福). 2009. “이명박 정부의 대북정책-평가와

- 전망” 통일연구, 제 3 권 제 2 호, 5-33.
- 미찌시타 나루시게(道下德成). 2012.”북한의 핵 미사일 위협에 대한 일본의 군사 외교적 대응” 신아시아, 제 19 권 4 호, 15-25.
- 문정인,이춘복(文正仁、李春福). 2009.”이명박 정부의 대북정책-평가와 전망” 통일연구, 제 3 권 제 2 호, 5-33.
- 박건영(朴建英) & 정옥식(鄭玉錫). 2009. “김대중-부시 정부 시기 한미관계” 역사비평, 통권 86 호, 140-168.
- 박광기(朴光基). 2002.” 동북아 안보질서와 TMD” 통일전략, 제 2 권 제 2 호, 245-268.
- 박휘락(朴輝洛). 2009.”한국의 미사일 적극방어체제 구축 방향” 신아시아, 16 권 3 호, 63-94.
- 박휘락(朴輝洛). 2010.”탄도미사일방어체제 동아시아 뜨거운감자” 통일한국, 통권 제 315, 20-21.
- 박휘락(朴輝洛).2013A.”북한의 비대칭의협에 대한 한국의 군사적 대응전략” 전략연구,통권 제 57 호, KRIS 창설 25 주년 기념논문, 273-307.
- 박휘락(朴輝洛).2013B.”북한 핵미사일 공격 위협 시 한국의 대안과 대비방향” 국방연구,제 56 권 제 1 호, 29-52.
- 박휘락(朴輝洛).2013C.”일본의 탄도미사일 방어체제 추진사례 분석과 한국에 대한 교훈”. 국가전략, 제19권 제4호, 86-87.
- 박휘락(朴輝洛).2013D.“북한’핵미사일’ 위협에 대한 장기적/안정적 대비방향:미사일 방어망 구축”.군사논단, 제 73 호, 35-52.
- 고봉준(高奉準).2008.” 한일 국방태세 비교연구 북한의 탄도미사일 개발에 대한 대응을 중심으로”. 2008
- 일본학국제비교학술대회(제주평화연구원), 213-225.

현대경제연구원(現代經濟研究所).2012.”포스트 김정일 체제하의 남북관계와
통일의식-2012 년 남북 관계 대구민 여론조사-” *현안과 과제*,12-06.

황성옥(黃成玉). 2008. 한미 방위비 분담 & 전작권 전환 & 미사일방어.

통일한국, 제 26 권 제 5 호, 14-16.

황일도(黃日道).2008.”이명박 정부 MD(미사일방어체제)참여 구상

정밀분석”*신동아*,2008 년 2 월호, 1-5.

http://shindonga.donga.com/docs/magazine/shin/2008/02/12/200802120500007/200802120500007_1.html

최종철(崔中哲)” 미국 미사일방어(MD)체계가 한국 안보에 미치는

영향”*국방연구*,제 47 권 제 2 호, 29-64.

도재숙(都在淑). 2002. 6.29 서해교전 이후 김정일의 대남정책 변화전망.

국방연구, 제 45 권 제 2 호, 49-77.

「PAC-2 요격률 40% 이하...北공격 막기 어려워」, 중앙일보,

2012 年 10 月 29 日, http://article.joins.com/news/article/article.asp?total_id=9722777&cloc=olink|article|default

「북 스커드 요격할 ‘한국형 MD’ 착수」, 중앙일보, 2011 年 04 月 16 日,

http://article.joins.com/news/article/article.asp?total_id=5356303&ctg=

「“북 미사일 잡기 ... 한•미 MD 협력 강화”」, 중앙일보,

2010 年 10 月 25 日,

http://article.joins.com/news/article/article.asp?total_id=4565246&ctg=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1998(統一白書 1998), 서울: 통일부, 1998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1999(統一白書 1999), 서울: 통일부, 1999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0(統一白書 2000), 서울: 통일부, 2000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1(統一白書 2001), 서울: 통일부, 2001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2(統一白書 2002), 서울: 통일부, 2002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3(統一白書 2003), 서울: 통일부, 2003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4(統一白書 2004), 서울: 통일부, 2004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5(統一白書 2005), 서울: 통일부, 2005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6(統一白書 2006), 서울: 통일부, 2006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7(統一白書 2007), 서울: 통일부, 2007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8(統一白書 2008), 서울: 통일부, 2008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09(統一白書 2009), 서울: 통일부, 2009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10(統一白書 2010), 서울: 통일부, 2010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11(統一白書 2011), 서울: 통일부, 2011 年。
통일부(統一部), 통일백서 2012(統一白書 2012), 서울: 통일부, 2012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1998(國防白書 1998), 서울: 국방부, 1998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1999(國防白書 1999), 서울: 국방부, 1999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0(國防白書 2000), 서울: 국방부, 2000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1 (國防白書 2001), 서울: 국방부, 2001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2 (國防白書 2002), 서울: 국방부, 2002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3 (國防白書 2003), 서울: 국방부, 2003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4 (國防白書 2004), 서울: 국방부, 2004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5 (國防白書 2005), 서울: 국방부, 2005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6 (國防白書 2006), 서울: 국방부, 2006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7(國防白書 2007), 서울: 국방부, 2007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8(國防白書 2008), 서울: 국방부, 2008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09(國防白書 2009), 서울: 국방부, 2009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10(國防白書 2010), 서울: 국방부, 2010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11(國防白書 2011), 서울: 국방부, 2011 年。
국방부(國防部), 국방백서 2012 (國防白書 2012), 서울: 국방부, 2012 年。

日文参考文献

小此木政夫、文正仁、西野純也，2012，《轉換期の東アジアと北朝鮮問題》，
東

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小針 進，2011，〈「韓国人の対北朝鮮意識と『四十七日間の原則』」〉，《東亜》，
No.523，頁 4-5。

川島真，2014，〈歴史的視座から見る日中関係〉，《東亜》，No. 559，頁 20-
28。

久間章生，2012，《安保戦略改造論 -在日米軍の存在は沖縄のため》，東京
都：

創英社/三省堂書店。

久保孝雄，2013，《変わる世界 変われるか日本：対米自立と日中共生へ》，
東京都：東洋書店。

日高義樹，2014，《アメリカの大変化を知らない日本人：日米関係は新しい
時

代に入る》，東京都：PHP 研究所。

中内康夫，2010，〈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日までの経
緯〉，《立法と調査》(311), 21-30.

矢野義昭，2008，《日本はすでに北朝鮮核ミサイル 200 基の射程下にある：
金

正日の核とミサイル問題の深層》，東京都：光人社。

広瀬善男，2001，《21 世紀日本の安全保障 新たな日米同盟とアジア》，東京
都：

明石書店。

石川卓，2005，〈国際安全保障環境と日米防衛協力（焦点/日本の新しい安全

保障政策)》、《国際問題》、No.543、頁 49-62。

石破茂、加藤朗、2005、〈インタビュー 日本の防衛政策の全般的な課題--石

破茂 前防衛庁長官 (焦点/日本の新しい安全保障政策)》、《国際問題》、

No.543、頁 2-20。

朴 一、2005、《朝鮮半島を見る眼—「親日と反日」「親米と反米」の構図》、

東

京都：藤原書店。

田中良和、2006、《朝鮮半島」危機の構図：半島統一と日本の役割》、京都

市：

ミネルヴァ書房。

平岩俊司、2006、〈KEDO がめざしたもの〉、《東亜》、No. 463、頁 8-9。

坂元一哉、2006、〈靖国問題について〉、《東亜》、No. 468、頁 2-3。

坂元一哉、2006、〈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と日本外交〉、《東亜》、No. 471、頁

2-3。

岡留康文、金子七絵、2010、〈鳩山内閣の防衛政策--防衛政策の継承と転換を

めぐる論議(特集 第 174 回国会の論議の焦点 (2))〉、《立法と調査》

15-22.

笹本浩、今井和昌、2011、〈菅内閣の防衛政策--新防衛大綱・東日本大震災・日

米同盟をめぐる論議 (特集 第 177 回国会の論議の焦点 (2))〉、《立法と

調査》。

東郷和彦、2013、《歴史認識を問い直す：靖国、慰安婦、領土問題》、

東京都：角川書店。

保阪正康、東郷和彦著、2012、《日本の領土問題：北方四島、竹島、尖閣諸

島》、

東京都：角川書店。

谷内正太郎、2014、〈安倍政権の対アジア・米国外交〉、《東亜》、No. 559、頁

10-19。

村田晃嗣，2000，〈米国の対北朝鮮政策とペリー報告--「対話」と「抑止」の狭間で〉，《国際問題》，No.479，頁 30-43。

伊豆見元，2005，〈北朝鮮の「核兵器開発継続宣言」〉，《東亜》，No.453，頁 56-63。

伊豆見元，2011，〈「挑発」から「対話」へ -- 舵を切った北朝鮮〉，《東亜》，No.525，頁 12-16。

孫崎享，2011，《日本の国境問題：尖閣.竹島.北方領土》，
東京都：筑摩書房。

孫崎享，2012，《検証尖閣問題》，東京：岩波書店。

孫崎享、木村郎，2013，《終わらない〈占領〉：対米自立と日米安保見直しを提

言する!》，京都市：法律文化社。

春名幹男，2013，《米中冷戦と日本：激化す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戦争の内幕》，

東京：PHP 研究所。

浦野起央，2005，《尖閣諸島・琉球・中国：日中国際関係史：分析・資料・文献》，東京：三和書籍。

御巫智洋，2006，〈ミサイル防衛と自衛権（自衛権の新展開）〉，《国際問題》，No.556，頁 15-24。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2012，《日中関係史 1972-2012》，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

高木誠一郎，1999，〈冷戦後の日米同盟と北東アジア--安全保障ジレンマ論の視点から（焦点 北東アジアの安全保障）〉，《国際問題》，No. 474，頁 2-15。

高木誠一郎，2008，〈日中「戦略的互惠関係」：進展と課題（岐路に立つ日

- 本外交)》、《国際問題》、No.569、頁 1-10。
- 能勢伸之、2013、《弾道ミサイルが日本を襲う：北朝鮮の核弾頭、中国の脅威に どう立ち向かうか》、東京都：幻冬舎ルネッサンス。
- 斎藤元秀、2000、〈プーチン政権のアジア太平洋政策（焦点/プーチン政権下のロシア）〉、《国際問題》、頁 30-47。
- 武貞秀士、2003、〈韓国の脅威認識の變化と軍近代化の方向〉、《防衛研究所紀要》、第6巻第1号、2003年9月、頁 37-54。
- 李鍾元、2007、〈盧武鉉政権の対外政策（盧武鉉政権の韓国）〉、《国際問題》、No.561、頁 4-16。
- 松村昌廣、1999、《日米同盟と軍事技術》、東京都：勁草書房。
- 金田秀昭、2003、《弾道ミサイル防衛入門：新たな核抑止戦略とわが国のBMD》、東京都：かや書房。
- 阿部純一、2006、〈中国から見た日米同盟と日中関係〉、《東亜》、No. 471、頁 36-45。
- 神保謙、2002、〈ミサイル防衛(BMD)と日米同盟 ―日米共同研究の政策過程と同盟の『戦略調整』〉、《国際安全保障》、第29巻4号 2002年3月。
- 家近亮子、段瑞聡、松田康博、2007、《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東京都：晃洋書房。
- 植村秀樹、2013、《「戦後」と安保の六十年》、東京都：日本経済評論社。
- 道下徳成、2011、〈北方限界線（NLL）をめぐる南北攻防の歴史と今後の展望〉、《東亜》、No.529、頁 94-106。
- 青山瑠妙、2014、〈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の戦略的展開と日中関係〉、《東亜》、No. 568、頁 32-41。
- 森本 敏、2002、《ミサイル防衛―新しい国際安全保障の構図》、東京都：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 森本 敏，2006，《米軍再編と在日米軍》，東京都：文藝春秋。
- 森本 敏，2007，《国民として知っておきたい日本の安全保障問題—湾岸戦争から防衛省昇格までの国会論議要覧》，東京：海竜社。
- 飯田将史，2013〈日中関係と今後の中国外交:「韜光養晦」の終焉?(習近平政権の安定性)〉，《国際問題》，No.620，頁 44-55。
- 飯村友紀，2008，〈「先軍政治」下の北朝鮮経済と韓国新政権〉，《東亜》，490，頁 99-100。
- 渡邊武，2010，〈二極化に伴う非対称同盟の機能更新:大国政治における米韓同盟の役割〉，《法學研究》，83 卷 12 号，頁 529-558。
- 渡邊武，2011，〈「中朝提携が朝鮮半島の政治にもたらす影響」〉，《東亜》，No.530，頁 100-110。
- 渡邊武，2010，〈米韓のミサイル防衛協力が持ちうる地域安全保障への影響—米韓同盟の役割拡大—〉，《防衛研究所ニュース》2010年1月号,1-39。
- 塚本壮一，2011，〈南北『砲撃』の緊張終息と日朝の対話模索〉，《東亜》，no.524，頁 68。
- 塚本壮一，2006，〈ブッシュ二期目を注視する北朝鮮〉，《東亜》，No. 452，頁 64-74。
- 鴨下ひろみ，2009，〈秘密接触と銃撃戦・・・硬軟両用の南北関係〉，《東亜》，No.511，頁 64-71。
- 鴨下ひろみ，2011，〈南北砲撃戦の衝撃と緊迫の朝鮮半島〔朝鮮半島の動向〕〉，《東亜》，No.523，頁。
- 魏志江、崔學松，2010，〈朝鮮半島の地政学的戦略構図における哨戒艦事件の影響〉，《東亜》，No.519，頁。
- 藤井嚴喜，2013，《米中新冷戦、どうする日本》，東京都：PHP 研究所。

増田雅之，2005，〈二つのシナリオが交錯する日中関係〉，《東亜》，No. 453，
頁 31-39。

倉田秀也，1999，〈北朝鮮の弾道ミサイル脅威と日米韓関係--新たな地域安保
の文脈（焦点 国際情勢と日本・1998）〉，《国際問題》，頁 52-67。

倉田秀也，2003，〈北朝鮮の「核問題」と盧武鉉政権--先制行動論・体制保
障・多国間協議（焦点 朝鮮半島問題の解析）〉，《国際問題》，頁 14-
31。

倉田秀也，2009，〈オバマ政権の対北朝鮮政策？「大国間の協調」と米朝関係
の相剋〉，《東亜》，No.509，頁 28-37。

倉田秀也，2013，〈「地域」を模索する米韓同盟 -- 同盟変革と「リバラン
ス」（冷戦の起源引きずる朝鮮半島）〉，《東亜》，No. 555，頁 20-29。

防衛庁，防衛白書（平成 18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06 年。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19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07 年。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0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08 年。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1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09 年。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2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10 年。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3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11 年。

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4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12 年。

霞山会，2008，《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 1972 年-2008 年》，東京都：霞山会。

從多元啟發理論分析日本在 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

李明勳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二)

摘要

2015 年 1 月 20 日，伊斯蘭國（ISIS）在網路上公布一段影片顯示兩名日本人質落入其手，要求在 72 小時內支付兩億美元贖金，否則將殺害兩名人質。自此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全面爆發。該兩億美元贖金明顯是針對 17 日安倍晉三於開羅的演說中承諾「將提供兩億美元的援助給相關受伊斯蘭國影響的國家。」此舉無疑激化 ISIS 的敵意，成為此次危機的導火線。隨著一名人質被撕票後，ISIS 轉而要求「換俘」，但在一番折衝樽俎後，最終所有人質仍以撕票告終。該危機看似以悲劇落幕，但真的是如此嗎？

本文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Poliheuristic Theory）來重新詮釋日本在此次危機中的外交決策之始末及其影響。日本政府如何在「不與恐怖組織談判之原則」和「人質安全」之間做平衡？「國內政治」面向在此次人質危機中扮演什麼作用？以及它「為何」及「如何」影響到最終的決策結果？最終結局是否意味著日本外交上的挫敗？

筆者認為日本政府最終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選項其實是四種「國內政治」面向之因素相互連動的結果，即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民眾對和憲法的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透過這些因素的相互影響，不僅能理解為什麼該危機之後安倍支持率反而上升之難題，也能揭露「國內政治」面向對於外交決策的影響，以彌補既有外交決策理論時常忽視國內政治面向的不足。

關鍵字：元啟發理論、伊斯蘭國、人質危機、和平憲法、自我責任論

壹、前言

2015 年新春，剛眾院大選完並在國會獲得壓倒性優勢的安倍晉出訪中東，試圖告訴國際社會日本有其能力在國際政治上扮演更負責任的角色。但事與願違，正當安倍訪問途中，伊斯蘭國（ISIS）於網路上釋放出一段影片，顯示日本有兩名人質落入 ISIS 手中，並要求以兩億美元的贖金作為釋放條件，於是乎 ISIS—日本人質危機全面爆發。被和平憲法限制的日本不能在海外行使武力，如此日本該如何化解此次危機呢？隨著時間推移，兩名人質最終仍以雙雙遇害而告終。第一名人質湯川遙菜確認遇害後，ISIS 變更釋放條件為以約旦釋放死

囚里沙維為代價，來交換日本第二位人質後藤健二。該條件讓原本作壁上觀的約旦被迫捲入其中，日本該如何與約旦斡旋，達到雙贏的局面呢？然而，事實證明，無論是 ISIS、日本還是約旦，其人質依序遇害，仍以悲劇告終。

貳、問題意識

在此次人質危機中，表面上，日本看似輸家，因為它沒有在不與恐怖份子妥協的前提下，成功營救人質，但筆者試圖反駁這種論點，倘若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此次人質危機的經緯，會發現其實安倍會有如此決策，並不令人奇怪。因此，本文試圖證明，安倍在兩次人質危機中最終都選擇以「維持現狀」來應對，其實只是反映日本「國內政治」的概況。

然而，既有的外交決策理論往往疏忽對於「國內政治」的關切，而更多地關注在決策者、決策團體、官僚議價或組織結構的本身，我們有必要提升「國內政治」在外交決策的重要性來重新理解此次人質危機的始末，是故筆者使用「多元啟發理論」(Poliheuristic Theory)來幫助我們理解外交決策並非總是依賴國際層次的策略互動，而是同時要考慮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主流的理性選擇途徑的假設過於完美，而容易失真，尤其是危機決策，因為此時資訊不可能充足，也因為壓力不可能完全理性；相對的，多元啟發理論往往能在危機決策中有其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因而更能夠看出決策者如何在情況未明、資訊有限的緊急事態中試圖簡化決策的複雜性，以做出可能的決策。

因此，本文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來重新詮釋日本在 2015 年初的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之始末及其影響。日本政府如何在其中排序可能的政策選項？以及如何在「不與恐怖組織談判之原則」和「人質安全」之間做平衡？「國內政治」面向在此次人質危機中扮演什麼作用？以及它「為何」及「如何」影響到最終的決策結果？最後，兩名日本人質最終以悲劇收場，這是否意味著日本的外交挫敗？

以下，筆者將大致回顧日本的外交決策模式之歷史變遷，並大致簡介本文所要運用的理論觀點—**多元啟發理論**。這些理論觀點將有助於筆者對於此次外交決策過程中國內政治面向的理解，是故透過實際操作多元啟發理論於此次 ISIS—日本人質危機，來論證日本在此次危機中的外交決策過程。最後，筆者試圖整合是國內政治面向的那些因素在影響最終的決策結果。

參、文獻回顧

關於日本的外交決策模式，楊鈞池（2012）認為有以下三種特徵：第一，日本官僚體制幾乎是決策重心，相較於英國「西敏寺」(Westminster)議會內閣制以議會與內閣做為決策核心，日本經驗則是相當特殊的現象⁴⁵⁶。第二，日

⁴⁵⁶ 楊鈞池（2012）認為這是日本官僚制特有的「稟議制」，也就是政策決定是從官僚基層的起

本決策體制常常出現「本位主義」。第三，「政官關係」不斷出現各種緊張關係（2012：45-47）。須注意的是，由於日本的外交決策模式受美國因素影響，外務省保持相對的獨立性，首相官邸則因人員編制和派閥牽制而功能有限。2001年，橋本行政改革使官邸主導外交成為可能，但體制的運用與首相本身在黨內的權力基礎、國內民意支持度、政治家與官僚如何相互協調有很大的關連（沈家銘，2014：273-274）。

一般而言，日本外交決策在「日常時期」時，由外務省扮演決定性角色。但隨著外交決策的複雜化、擴散化、政治化和受矚目程度提升，外務省的影響力逐漸下降（松村岐夫等，2005：91）。相對的，在「非常時期」的特徵是，決策過程中的參與者相當少，首相扮演核心角色，擔任建言者的是少數政治家，或少數高級官僚。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簽訂、安全保障條約的改訂、日蘇國交恢復、琉球施政權的歸還、日中（共）國交正常化等都是此模型的例子（松村岐夫等，2005：91-92；福井，1974）。

日本「時事通信社」著名的政治觀察家田崎史郎在其新著《安倍官邸的真面目》（講談社，2014）中指出，安倍晉三的團隊核心實際上是「正副官房長官會議」，總共6人，包括首相安倍晉三、內閣官房長菅義偉、副內閣官房長加藤忠信、首相首席祕書官今井尚哉、世耕弘成、杉田和博。會議成員每週都會在首相官邸五樓的首相辦公室集合，就重大問題相互討論。日本目前所有的重大決策，幾乎都是通過這一團隊完成，非安倍一人獨斷獨行。在外交安保方面，日本版的國家安全會議（NSC）模仿美國體制，只有4人控制，即首相、官房長官、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權力高度集中⁴⁵⁷，為典型的「小團體」外交決策。

綜上所述，日本的外交決策核心逐漸由「外務省」向「首相官邸」前進，雖然常務性外交事務仍由外務省所掌控，但發生危機時，往往是「官邸決策」發揮主導作用。本研究中的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亦不例外。

至於該如何應對人質危機呢？針對「以綁架人質作為要脅」的恐怖主義行為，一般是採取「不與恐怖份子談判（交易）」作為基本原則，例如2004年的伊拉克—日本人質事件⁴⁵⁸。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過往經驗並非完全遵循此基本原則⁴⁵⁹。若關注人質安全，則常常危及反恐戰略；但若堅持反恐戰略，則也會被批評不重視人命；兩者常常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關係。因此，如何在「人

草人逐漸向上呈報、審議、蓋章用印後，又逐漸向下回覆的制度。然而，這種重視科層秩序的決策體系也很容易形成「最終的」政治制定者與「實質的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分離（2012：46）。

⁴⁵⁷ 明報，2015.2.23，《張望：人質危機下的安倍官邸決策》，

<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379110/73/sc>

⁴⁵⁸ 2004年，一位25歲青年香田証生在伊拉克被聖戰組織擄走，組織要求當時在伊拉克南部從事人道主義援助的日本自衛隊撤出，但當時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決拒絕。最後，人質香田証生被處決。蓋達組織之後指責日本以自衛隊侵略伊斯蘭世界，並以「十字軍」來形容日本。

⁴⁵⁹ 1977年日本航空472號曾遭恐怖份子劫持，當時首相福田赳夫最後交付600萬美元的贖金後，人質始獲釋，但也因為向恐怖份子妥協而飽受國際輿論譴責。2012年，安倍晉三在《走向新國家》中評論此事件，寫道「如果我是首相，對劫持人質事件，可能會採取不同的做法。」

質安全」與「反恐戰略」之間達成平衡是決策者必須細心揣摩的課題。

人質危機自二戰以來已發生多起，翟唯佳（2004）則對世界上幾個重大人質危機事件提出五點教訓：（1）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決策指揮機構、（2）建立處置與化解人質危機的正確指導方針、（3）準確掌握人質行動所需要的各項情報、（4）正確而巧妙的運用談判手段、（5）靈活機動的營救戰術。

肆、理論觀點—多元啟發理論

爬梳外交決策理論的歷史可知，二戰後至 1979 年代大致是理性選擇途徑為主流，1970 年代以後，認知心理學途徑逐漸顯見影響力，兩者開始爭論不休。因此，多元啟發理論（Poliheuristic Theory，簡稱 PH 理論）試圖在兩個途徑間架起理論之橋，以兼顧兩者的優點和不足。以下將簡單回顧兩個途徑的內容。

理性選擇途徑（rational choice theory），認為決策者會依照理性原則，根據所獲得的資訊，自覺的在決策過程中將利益或價值極大化。然而，有鑑於「理性」的界定不易，Simon 於 1957 年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試圖改良理性選擇模式的分析效力（Allison, 1991；黃奎博，2009）。

認知心理學途徑（cognitive psychology）注重微觀層面，透過決策者的觀感或印象，來研究決策者本身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⁴⁶⁰。此途徑假設決策者在事件發生前的信念與期望是影響認知的主要因素，是故決策過程常常不是理性選擇途徑所認為的那麼完美。然而，該途徑由於不存在一致的研究方式，使其內部邏輯可能不一致，且預測能力降低（Danilovic, 2002；黃奎博，2009）。

整體而言，兩種途徑的主要差異如表 2 所示：

表 2 理性選擇途徑與認知心理學途徑的差異

理性選擇途徑	認知心理學途徑
專注在結果	專注在過程
預測性	描述性
較能處理相對結構化的情境	較能處理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資料來源：參考 Mintz（2002）和筆者整理

綜合上述兩種途徑，多元啟發理論試圖在其中搭起理論之橋，以整合決策的結果和過程，並透過「**決策兩階段論**」，將決策過程分為兩階段，如下所述：

第一階段—認知心理學途徑：運用非補償性原則和面向導向，以最為關鍵的面向（dimension）作為篩選標準，一旦某個選項無法到達該標準，會馬上被剔除。換言之，一個政策選項若在關鍵面向（通常是政治面向）上造成重大負面影響，即使他在其他面向有極大利益，也不會被採納。此外，它具有非窮盡

⁴⁶⁰ 認知地圖又稱心理圖（mental map），意味著一個人心中對於特定事物，諸如圖像般且交錯影響的印象或觀感。認知地圖往往是主觀且經過個人偏好與觀感所篩選過的（黃奎博，2009）。

性 (non-exhaustive)，即它不試圖窮盡所有選項和可能的情況，而是只要篩選出「可接受的」(acceptable)、「滿意的」(satisfying) 選項即可。

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決策者傾向運用補償性原則和選項導向來對第一階段篩選後的剩餘選項作通盤性考量，透過評估各個選項的成本效益、最高成功率、可行性等，以達到「最佳的」(the best)、「效益最大化」的結果。

由此可知，決策兩階段論的優點在於，它兼採理性選擇途徑與認知心理學途徑的優點，並互相彌補彼此的不足。將認知的角色納入資訊蒐集、選項評估的過程中，不僅能兼顧經驗正確性和簡約性，也能做出堅實和可否證的預測。

大體上，Mintz 認為多元啟發理論有以下五點特色 (1997：84-87)：

- 第一，**非整體性 (non-holistic)**：即非窮盡性 (non-exhaustive)，在過濾可行選項時，決策者傾向以極少數的標準來判定，而非通盤性的考量，但相對也使得可行的選項被限縮在有限的範圍內。
- 第二，**面向導向 (dimension-based)**：以特定面向為篩選標準，不符合特定面向的選項會直接被剔除。至於何種面向會被納入考量，視決策者面臨的事件和情境而定。對政治人物而言，國內政治面向是最重要的面向，不論是何種政體類型。
- 第三，**非補償性原則 (non-compensatory)**⁴⁶¹：某個選項如果在重要面向上的分數上無法達到門檻，縱使在其他面向上的得分很高，也無法彌補它在該重要面向上的失分，此時該選項就會被剔除。因此，它強調「可接受」的選項，而非「效益最大化」的選項；是在單一面向內做選擇，而非橫跨不同面向的選項裡做選擇。總之，非補償性原則能迅速刪除不必要的選項，以利簡化資訊搜尋和評估的決策過程。
- 第四，**滿意性原則 (satisfying)**：在篩選過程中，並不是利用效益極大化的方式來選出最佳選項，決策者只能找出「令人滿意的」選項。只透過少數非補償性的面相快速採用或刪去選項，簡化資訊審查和評估的決策過程。
- 第五，**排序敏感性 (order-sensitive)**：選項和面向被納入考慮的順序，會影響決策結果。因此，決策結果常常是因為面向的考量順序而決定

因此，筆者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來重新詮釋 2015 年初的伊斯蘭國—日本質危機。多元啟發理論試圖簡化外交決策的複雜性，認為決策者通常是在有限的資訊和簡單的認知下做決策，且通常以「國內政治」面向為主要判准。在本研究案例中尤其如此，因為日本被視為是成熟的民主國家，政府施政須對人民負責，否則會在下次選舉中被選民制裁。此外，ISIS 並非傳統定義的國家，而是跨國界的恐怖組織，這樣的現實讓各國很難正確取得 ISIS 的資訊，從

⁴⁶¹ 與非補償性原則相對的是「補償性原則」，意即他會清楚檢視每個選項在每個面向上的分數，且各面向上的分數可互相補償，即選項在某個面向上的失分會在另外一個面向上得到補償。而將所有面向的得分加總後，總得分最高者即為最佳選項。

而符合多元啟發理論所強調的決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或資訊充足，而往往是在有限的情況下，就必須做出決策。

伍、研究發現

人質危機為典型的危機決策，本文運用多元啟發理論重新詮釋 2015 年初的 ISIS—日本人質危機的始末及影響。本研究分析起訖時間為 1 月 20 日至 2 月 3 日。由於兩名人質先後遇害，且兩次人質事件面臨的 ISIS 要求、相關行為者均不同，是故以兩名人質先後遇害的時間分成兩回合：第一輪為「湯川回合」（1 月 20 日至 1 月 24 日）；第二輪為「後藤回合」（1 月 24 日至 2 月 3 日）。

一、第一輪：「湯川回合」—交付贖金（1 月 20 日至 1 月 24 日）

（一）事件背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加強與中東國家間的關係，預計於 1 月 16 日至 1 月 21 日走訪中東四國（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⁴⁶²。17 日安倍於開羅的演說中承諾「將提供兩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給相關國家」，此舉激化 ISIS 對日本的敵意，成為 ISIS—日本人質危機的導火線。

20 日，ISIS 在網站上發布視頻，稱自己掌握了兩名日本人質—湯川遙菜（Yukawa Haruna）和後藤健二（Goto Kenji），倘若日本不能在 72 小時內（即 1 月 23 日前）支付兩億美元贖金，將殺死這兩名人質。該兩億美元贖金明顯針對 17 日安倍晉三於開羅的演說中承諾將提供「兩億美元」援助給相關國家，以「對抗伊斯蘭國」。自此人質危機正式爆發。最後，24 日，ISIS 再度發布的視頻中，後藤健二手拿照片用英語說「湯川已經死亡」，因為日本沒有如期支付贖金。第一輪「湯川回合」正式結束。

（二）PH 理論分析

一般在人質危機中，有幾種可能的政策選項：答應嫌犯要求、外交壓力、經濟制裁、談判、尋求第三國協助、轟炸、圍堵（封鎖）和不作為。而在此次人質危機中，由於「和平憲法」和自衛隊行使權的限制，使日本無法派遣部隊去營救海外僑民或人質，遑論是轟炸和圍堵，是故這些選項均不是日本政府考慮的選項。此外，由於 ISIS 資金的主要來源來自於其掌控區域內的油田，還包括捐款、徵稅和勒索和綁架⁴⁶³。但 ISIS 與日本在石油貿易上並無實質經濟關

⁴⁶² 安倍晉三於 2015 年第一次出訪即選擇中東，也是日本首相自小泉純一郎 2006 年訪問以來相隔 9 年的第一次。本次出訪是期望掌握中東穩定鑰匙的埃及建構新的關係，並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擔任和平遊說者。而約旦正遭受因伊斯蘭國而來的難民問題而面臨不穩定的情勢，安倍政府藉此訪問來對約旦政府表示願意支援流入約旦的伊斯蘭難民的經濟援助方案。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2015.1.13，〈安倍將訪中東 4 國發表中東政策〉，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13003417-260408>

⁴⁶³ ISIS 與其他恐怖組織不同，它的資金大多倚賴自籌而非富有資助者。ISIS 接受捐款，但捐款並非資金的主要來源；反之，它大部分的資金來自其掌控區域內的油田。美國官員預估，在

係，使經濟制裁也無法成為可運用的選項。因此，剔除以上三個完全不可能的選項後，其餘可行選項之分析如下。

1. 可行的政策選項（alternatives）

（1）答應嫌犯要求—交付贖金

在第一輪「湯川回合」的嫌犯要求為「交付贖金」，此選項意味著受害者在人質賽局中採取合作策略。一般而言，答應嫌犯的要求並交付贖金不被視為是好的解決方式，因為它違反了「不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讓嫌犯以為只要綁架人質就能達成他們的目標，則後續綁架人質事件將會層出不窮。

（2）外交壓力

此處的外交壓力特指日本尋求第三國（非武力）支援，尤其是關鍵性大國和與 ISIS 毗鄰的中東國家，以製造大量的國際反恐輿論，來樹立自己的道德正當性，期盼 ISIS 能迫於這種外交壓力而逐漸改變其態度，最終釋放人質。

（3）談判

此處的談判是指除了（1）交付贖金以外的談判、妥協與讓步。雖然大多數國家奉行著「原則上絕不向恐怖份子妥協」的政策，但透過談判仍可爭取在一定範圍內做有限妥協的前提下，和平解決人質危機。即使不能達成妥協，談判也能夠為當局拖延一些時間，便於政府以其他形式來解決人質危機。

（4）尋求第三國武力協助

由於和平憲法和自衛隊行使職權的限制，使日本無法派遣部隊去營救海外僑民或人質，是故日本政府只能請求第三國（盟國或相關國家）的武力協助，來達成營救海外僑民或人質的目的。這些第三國的武力協助包括轟炸、圍堵和派遣地面部隊等。

（5）維持現狀

除了上述積極的作為之外，還有一種選項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本文所指的是消極的不作為。政府可能認為即便付諸積極行動也無法改變結果，或政府刻意形塑某種被動的態勢來達到一些政治目的。此外，也可能是表面上維持現狀，但實際上仍暗地裡進行救援行動。

空襲行動之前，ISIS 每日的石油收入達 200 萬美元（當地人認為更多）；但一名官員於 2014 年 12 月表示，空襲行動（部分行動的目標即為敘利亞的石油設施）已讓該組織的收入「大幅」減少。掌有如此大片區域，也讓 ISIS 得以靠勒索和徵稅賺取收入。此外，ISIS 和其他恐怖組織一樣，靠綁架賺取收入；ISIS 去年獲得的人質贖金至少達 2000 萬美元。聯合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 2014 年 11 月發佈的報告顯示，ISIS 在過去一年裡，透過挾持人質獲得的贖金達到 3500 萬至 4500 萬美元，美國雜誌《新聞週刊》認為贖金帶來的收入，佔整體預算的 20%。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全球最會賺錢的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資金從哪來？〉，《天下雜誌》，<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3584#sthash.xD4OsVsu.dpuf>

2. 可能的考慮面向 (dimensions)

Brule (2005) 運用 PH 理論來分析伊朗人質危機時，採用三個可能面向：國內政治、軍事和全球戰略面向；然而，由於日本對於武力使用的限制，使得軍事面向在本案中並非可能的面向，是故筆者試圖採用另兩個面向來分析之。

(1) 國內政治面向

對政治人物而言，國內政治面向常常是最重要的面向，政治人物往往優先考慮國內政黨政治和政黨內部的競爭對手、政治聯盟的結構、政治生命的存續等 (Mintz, 2002)。因此，民意調查與輿論走向常常是判斷國內民眾對於某事件的態度傾向之測量工具，從而決定政治人物對某事件所可能採取的選項為何，尤其是民主國家，政策制定必須徵得多數人民的同意，否則若強行推動某些民眾不欲推動的法案，往往會在下次選舉得到選民的懲罰，而失去連任機會。

(2) 全球戰略面向

全球戰略面向意指政治領袖對於國家在國際政治和社會上具有某種特定地位的想像、信念與價值。例如冷戰期間為美蘇冷戰，所以美國的全球戰略即是在自由民主陣營的代表，防止代表共產主義陣營的蘇聯的稱霸。

3. 決策矩陣

綜合上述決策選項和面向，則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決策矩陣如下表 4 所示 (1 為最低分，5 為最高分)。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由於大部分日本民眾對於是否營救湯川遙菜抱持著否定態度 (後續詳述)，是故相關營救人質和與嫌犯談判妥協的選項均不被選民所喜。因此，對決策者而言，最差選項為「交付贖金」，再來是「談判」。相對的，最佳選項則是「維持現狀」，因為如此既符合國內民眾的消極態度，也符合「不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次佳選項則是透過形塑「外交壓力」，來迫使 ISIS 知難而退。至於「第三國武力協助」，則因為「和平國家」的想像仍是多數日本民眾的期待，因而凡是與武力相關的選項皆很難受到民眾的青睞，安倍雖然急欲將日本改造成「正常國家」，但在危機決策上仍須先以國內民意為依歸，是故使該選項的得分介於中間。

至於全球戰略面向，則是維持與七國集團訂立的「不與恐怖份子談判」和「打擊恐怖主義」基本原則，否則會有負面的示範效應 (signaling)，讓該國民眾在海外成為恐怖份子的錨定對象。此外，日本政府負擔不起比贖金更沉重的代價，因為該兩億美元贖金明顯有其針對性，如果支付贖金，等於宣布日本政府沒有在中東地區發揮其所宣稱要發揮的影響力，以至於不得不向 ISIS 低頭。因此，最佳選項無非是能夠實質打擊 ISIS 的「第三國武力協助」；相對的，最差選項則是「交付贖金」，因為此等於是向 ISIS 投降，還不一定會釋放人質；

再來則是「談判」和「外交壓力」。至於「維持現狀」，由於消極的不作為不代表向 ISIS 投降或妥協，但也沒有積極打擊 ISIS，因此是次佳選項。

表 4 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決策矩陣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交付贖金	1	1	2
外交壓力	4	3	7
談判	2	2	4
第三國武力協助	3	5	8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4. 兩階段決策

(1) 第一階段：認知心理學途徑

PH 理論第一階段運用非補償性原則和面向導向，以最為關鍵的面向作為篩選標準，一旦某個選項無法到達該標準，會馬上被剔除。換言之，某個選項若在關鍵面向上造成重大失分，即使它在其他面向有重大得分，也不會被採納。

本次人質危機中，對安倍晉三而言，最重要的面向是「國內政治」面向。連任後的安倍內閣於今年最重要的議程設定無非是「安保法制化」，是故他必須留意國內民意與輿論走向，形塑修憲的有利條件；相對的，全球戰略面向則不一定需要由國內選民來檢驗，它反映的只是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地位。

由於各國國內政治所反映的現象不盡相同，是故我們必需先考察日本國內政治的特殊脈絡。首先，對安倍晉三而言，最在意的無非是政治生命的存續。2014 年 12 月 14 日第 47 屆日本眾議員大選中，執政聯盟（自民黨和公明黨）在總席次 475 席中獲得 320 席，掌控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安倍的 political life 因而得以存續。雖然此次大選可能只是選民冷漠信任的結果，但不可諱言的，執政黨的壓倒性優勢使他能大膽推動一些重大且爭議的法案，此即為「**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honeymoon effect)。換言之，這種政治蜜月期等於讓安倍獲得一張免死金牌，使其即便推動一些選民不樂見的法案，也不至於遭受太大的批評。

此外，大多數日本人仍堅守「憲法第九條」(和平憲法)所揭櫫的和平主義精神，從 NHK 於「平和観についての世論調査 2014」⁴⁶⁴的民調結果顯示，當問到「安倍內閣決定變更『憲法上不允許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並放寬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時，贊同者有 37.6%，而不贊同者則高達 54%。當問到「所謂憲法第九條，即是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你認為憲法第九條自從戰後所扮演的角色之評價為何？」時，給予高評價者高達 76.5%。當問到「為了守護日本的和平，你認為最應該重視的是什麼？」時，認為是「不仰賴武力的外交」

⁴⁶⁴ NHK 社会や政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15.5.8，〈平和観についての世論調査 2014〉，<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901.pdf>

者高達 53.4%，「以武力為基礎的外交」者只有 9.4%。由此可知，日本民眾「對和平憲法的堅守」是多數民意，從而解釋了為什麼安倍推動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時，常常遭受強大的民意反彈。

再者，人質的「個人背景」也會影響民意和輿論走向。日本國內民眾對於湯川遙菜和後藤健二的態度並不相同，導致兩次人質危機對於政府的壓力也有其差異。大體上，日本民眾較同情後藤健二；相對的，湯川遙菜一直是爭議性人物，他與極右派交往甚密⁴⁶⁵，讓大部分日本民眾認為湯川遙菜前往敘利亞的動機並不單純，再加上日本文化蘊涵著根深蒂固的「自我責任論」，使得民眾認為國家沒有營救他的必要，他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民意與輿論走向影響了政府思考第一輪人質危機時的政策選項。

綜合上述日本「國內政治」面向的特殊脈絡可知，只有「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這兩個較為「滿意」的選項進入第二階段。由於第一階段運用非補償性原則和面向導向，所以即便「第三國武力」在「全球戰略」面向上得到 5 分，也無法補償它在「國內政治」面向上的失分。更因為它在「國內政治」這個關鍵面向未達標準，所以在第一階段即被剔除，不予考慮。

（2）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

第二階段是決策者運用補償性原則和選項導向來對第一階段篩選後的剩餘選項作通盤性考量，以達到「最佳的」、「效益最大化」的結果。目前，第一階段篩選後的選項只剩「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為了達到效益最大化的結果，須依補償性原則來分析這兩個選項在各個面向的得分，如表 5 所示。

表 5 「湯川回合」：剩餘選項在各面向的積分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外交壓力	4	3	7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由於日本國內政治（選後政治蜜月期、和平主義）和湯川遙菜的個人背景（動機不純、自我責任論），讓民意與輿論走向傾向認為「政府不必去營救人質（湯川）」，「維持現狀」因而在國內政治面向上得到最高分；而「外交壓力」則是透過形塑國際反恐輿論，讓 ISIS 知難而退，期盼 ISIS 能夠基於「國際顏面」而釋放人質；但也因為仍利基於 ISIS 的善意，意味著 ISIS 不一定會釋放人質。若能在不交付贖金的前提下，透過外交壓力而使之釋放，當然很好，但如此可能與國內民意與輿論走向相悖離；相對的，若 ISIS 仍不釋放，也不會在國內遭致太大反彈，因為國內政治並未對政府造成「非救

⁴⁶⁵ 根據其臉書和部落格，他從 2013 年底開始與日本極右派來往，是東京某間民間軍事公司的負責人；網站指出，他在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和非洲均有事務所，服務內容為「海外護衛」。

不可」的壓力。因此，「外交壓力」成為僅次於「維持現狀」的選項。

從「全球戰略」面向來看，「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都秉持著「不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但前者仍比後者高分，因為前者展現一種態度，即「以人質作為要脅」對我沒有用，我被動的什麼都不做，讓你認知到「從我這兒獲得好處是無利可圖的」；後者則展現另一種態度，即我主動向各國討救兵，企圖證明大家都是站在我這一邊，但這種主動行為背後隱含一種心理，即「該危機讓我緊張、害怕，從而正中嫌犯下懷」，雖然嫌犯的表面要求無法被滿足，但至少能「讓你知道我的可怕」。由此可見，即便兩者都符合反恐戰略，但仍有其微妙差別，「維持現狀」仍略勝一籌。

綜合評比可知，「維持現狀」在兩個面向上都比「外交壓力」來的高分，使其總積分也最高，讓「維持現狀」成為第一輪人質危機的「最佳」選項，符合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的「利益最大化」原則。以下以經驗證據來佐證之。

5. 經驗分析

ISIS－日本人質危機第一輪「湯川回合」爆發後，如同翟唯佳（2004）所述，日本立刻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決策指揮機構和處理人質危機的正確指導方針；此外，日本還多方面的請求各國協助。此時（1月20日），安倍仍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進行訪問⁴⁶⁶，是故他即刻在當地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

「以人質作為要脅是難以容許的恐怖主義行為，對此我感到非常憤慨，強烈要求不得傷害並立即釋放他們。外務省副大臣中山泰秀緊急派遣至約旦，與約旦政府聯手蒐集相關情報。...現在由松富大使負責來自以色列政府的情報收集工作。我本人則會馬上與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進行對話。這些都通過電話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做了指示。...日本會盡最大可能向伊拉克、敘利亞難民等提供非軍事領域援助。先前宣佈的我國將提供的2億美元援助將用於救助這一地區失去家園的難民，為他們提供糧食和醫療服務的人道主義援助。」⁴⁶⁷

同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於東京召開記者會，表明：「我國立場就是投入打擊恐怖主義、不投降。⁴⁶⁸」而安倍在與巴勒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會晤後，再次表示：「援助是用來安置難民和其他人道主義目的，與穆斯林群體和極端組織無關。」21日，菅義偉表示：「日本正努力透

⁴⁶⁶ 有一種說法是，當安倍晉三訪問以色列時，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共同會見記者時，由於媒體拍攝角度的問題，使安倍在電視畫面上似乎站在以色列國旗前方，從而能讓阿拉伯國家產生日本偏袒以色列的聯想，並進一步激怒伊斯蘭國。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15.3.3，〈人質危機將成為日本社會的分水嶺〉，
<http://news.inewsweek.cn/detail-1446.html>

⁴⁶⁷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2.1.20，〈安倍内閣总理大臣记者招待会〉，
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501/0120naigai.html

⁴⁶⁸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2.1.20，〈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0_p.html

過第三國、宗教團體等管道來傳達這項訊息給 ISIS。⁴⁶⁹」22 日，菅義偉再次表示：「日本的支援中東政策是為了**支援難民、疏散民眾**，完全不是 ISIS 所說的那樣是要殺傷伊斯蘭社會的人們。」另外，安倍所屬的自民黨本身也發表聲明。21 日上午，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於自民黨總部召開記者會，認為「**日本不會支付贖金**...日本對人道援助一貫的主張不是只針對 ISIS，而是向中東和全世界各地宣傳。⁴⁷⁰」

以上聲明反映幾個重點。首先，確立以首相安倍晉三為中心、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為輔的「官邸決策」模式，反映在危機發生之初，安倍晉三與菅義偉在官方聲明上的連成一氣。此外，也立即確立指導方針，即「堅決不向恐怖主義屈服（反恐決心）」。⁴⁷⁰值得一提的是，安倍試圖澄清該兩億元是為了「（經濟）援助難民」，一改之前「對抗伊斯蘭國」之立場，期望化解 ISIS 對日本的敵意與錯誤認知（misperception）。但對 ISIS 而言，經濟援助仍舊是間接資助其它國家來對付穆斯林，因而使得澄清的成效有限。

除了高度集中的決策指揮機構和處理人質危機的指導方針之外，日本還多方面的請求各國的協助，如下表 6 所列。

表 6 日本致電各國請求協助之一覽表

時間	請求協助者	被請求者
1 月 20 日	首相 安倍晉三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 Mahmoud Abbas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 Abdullah II 土耳其總統 Erdoğan 埃及總統 Abdel Fattah Al Sisi
	外務大臣 岸田文雄	美國國務卿 John Forbes Kerry 法國外交部長 Laurent Fabius 德國外交部長 Frank-Walter Steinmeier
	防衛大臣 中谷元	英國國防部長 Michael Fallon
1 月 21 日	外務大臣 岸田文雄	義大利外交部長 Paolo Gentiloni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布魯塞爾）
1 月 22 日	首相 安倍晉三	澳洲首相 Tony Abbott 英國首相 David Cameron
	防衛大臣 中谷元	美國國防部長 Chuck Hagel
1 月 23 日	防衛大臣 中谷元	美國駐日大使 Caroline Kennedy（會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安倍內閣的決策團體起初就不斷強調「反恐決心」，而自民黨本

⁴⁶⁹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5.1.21，〈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1_a.html

⁴⁷⁰ 資料來源：產經新聞，2015.1.21，〈「身代金は払えない」自民・高村副総裁〉，<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121/plt1501210014-n1.html>

身的立場更進一步強調「不會交付贖金」。由於國內政治面向是最重要的面向，若安倍不能肯認所屬的自民黨本身對此事件的底線，可能會招致黨內競爭者的挑戰，是故「交付贖金」這個選項幾乎完全不在安倍的考慮之列。此外，雖然日本在危機初期，不斷多方面的請求各國協助（如表 6 所示），看似積極地形塑國際反恐輿論，試圖讓 ISIS 知難而退，但對 ISIS 而言，可能成效有限。其原因在於，這種形塑策略的前提是，ISIS 必須存在一個自身所認同或歸屬的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透過這種社群內部的同儕壓力，來迫使 ISIS 的行為產生改變。然而，ISIS 不僅公開地站在西方國家的對立面，甚至是連周圍的伊斯蘭教國家也不認同 ISIS 的理念，因為對這些周遭國家而言，ISIS 是個想要侵占他們領土的團體。由此可知，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周遭的伊斯蘭國家，均非 ISIS 所認同的參考團體。「外交壓力」將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不被安倍青睞。

因此，目前問題是，安倍從「外交壓力」轉向「維持現狀」的關鍵為何？而這也是本研究所欲闡述的重點。筆者認為「國內政治面向」的考慮是安倍態度轉變的關鍵，即選後政治蜜月期、對和平憲法的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這四個因素相互參雜，讓「維持現狀」這個選項浮上檯面。

由於湯川遙菜極右派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前往敘利亞的動機不純，使國內民意和輿論走向對於「是否營救湯川遙菜」抱持著否定的態度。日本國內的新聞媒體無論是偏左派的《朝日新聞》、中間偏右的《讀賣新聞》到偏右派的《產經新聞》，無不鼓吹「自我責任論」，認為這些人質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政府沒有營救的義務。剛大選完的安倍適時捕捉到民眾這樣的心理，再加上憑藉著「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和「和平憲法」對於日本武力行使的限制，讓安倍即便選擇不去營救、談判與交付贖金，也不至於遭致國內太大的反彈。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第一輪「湯川回合」後期除了持續形塑外交壓力之外，並沒有其他積極作為，在各種國內政治面向的考量下，「維持現狀」成為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最佳選項。

最後，1 月 23 日，ISIS 提出的 72 小時的期限已過，日本政府並未透露是否已交付贖金。24 日，後藤健二的妻子收到 ISIS 的郵件，並通知日本政府；同時，安倍仍與約旦政府通話，持續討論如何解決人質危機。此時，網路上出現一段新的視頻，其中播放一張照片，顯示後藤健二手舉一張據信是湯川遙菜被斬首後的屍體照片。25 日，安倍表示這段視頻的展示有極高的可能就是湯川遙菜的屍體，自此第一輪「湯川回合」以人質湯川遙菜遇害而正式告終。

二、第二輪：「後藤回合」—囚犯換俘（1 月 24 日至 2 月 3 日）

（一）事件背景

第一輪「湯川回合」在湯川遙菜被撕票後，隨即進入第二輪「後藤回合」。當 24 日，ISIS 發布視頻表示「湯川已經死亡」的同時，ISIS 更改要求，希望以後藤健二交換作為約旦死囚的伊拉克婦女薩吉達·里沙維（Sajida al-Rishawi），27 日，ISIS 訂出「自即日起 24 小時」的限期，此後又延長至 29 日的日落時。

日本因而與約旦密切協商，但約旦認為釋放死刑犯的換俘方式不應該開先例或正常化，加上如此將失去營救約旦皇家飛行員米那·卡薩斯貝中尉（Muath al-Kasasbeh）的機會，而躊躇不前。

31 日，素與 ISIS 關係密切的 Al-Fulqan 網站突然發布視頻，宣布「後藤健二業已遇害」。自此美國、歐盟等開始強烈譴責 ISIS 的劣行。2 月 3 日，ISIS 又公佈了活活燒死卡薩斯貝的視頻，約旦隨即以處死里沙維作為報復，並密集轟炸 ISIS，震驚世界的 ISIS—日本人質危機最終以悲劇落幕。

（二）PH 理論分析

1. 可行的政策選項（alternatives）

（1）答應嫌犯要求—囚犯換俘

第二輪「湯川回合」的嫌犯要求為「囚犯換俘」，即以作為約旦死囚的伊拉克婦女里沙維來交換日本人質後藤健二。這種囚犯換俘的方式目前在國際上並沒有先例，因而讓該回合充滿變數。原本一直是旁觀者的約旦突然被迫躍升成主要的談判行為者；但也因為行為者的增加，在三方各懷鬼胎下，可能更難形成共識。ISIS 此舉被外界視為是試圖動搖以美國為首的反 ISIS 聯盟，使其不攻自破。

（2）外交壓力

（3）談判

（4）第三國武力協助

（5）維持現狀

至於選項（2）至（5）的內容與第一輪「湯川回合」大致相同，惟須注意的是，選項（4）的第三國在此回合中特別意指「約旦」，由於日本武力行使的限制，使其若要成功打擊 ISIS，勢必要拉攏此危機的利益相關人—約旦，使其成為與日本命運掛勾在一起的命運共同體，從而借約旦的武力攻擊（轟炸、派遣地面部隊營救等）來打擊 ISIS，使 ISIS 知難而退。

2. 可能的考慮面向（同第一輪「湯川回合」，在此不再贅述）

（1）國內政治面向

（2）全球戰略面向

3. 決策矩陣

綜合上述決策選項和面向，第二輪「後藤回合」的決策矩陣如下表 7 所示（1 為最低分，5 為最高分）。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雖然後藤健二的「個人背景」使其被描述成富有人道精神的自由記者，但國內民意和輿論走向仍以「自

我責任論」為主流（後續詳述），只是強度不似第一輪「湯川回合」那般一面倒的否定。因此，最佳選項與第一輪相同為「維持現狀」。惟一不同的是，後藤健二較為正面的「個人背景」因素使「自我責任論」的影響力大打折扣，讓「囚犯換俘」的得分超越「談判」，因為民眾施壓政府營救後藤健二的強度變大。

至於全球戰略面向，與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排序大致相同，雖然 ISIS 的要求從「交付贖金」轉變成「囚犯換俘」，但並未改變全球戰略的基本思考方式，即是「不與恐怖份子談判（交易）」和「打擊恐怖主義（反恐）」的基本原則。因此，其得分排序的論證，在此不再贅述。

表 7 第二輪「後藤回合」的決策矩陣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囚犯換俘	2	1	3
外交壓力	4	3	7
談判	1	2	3
第三國武力協助	3	5	8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4. 兩階段決策

（1）第一階段：認知心理學途徑

如同第一輪所述，本此人質危機中，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而言，最重要的面向仍是「國內政治面向」，勝過不太需要由國內選民來檢驗的全球戰略面向。而國內政治面向之內容與第一輪大致相同，惟一不同的是，後藤健二的「個人背景」因素與湯川遙菜顯然不同。後藤健二是一名自由記者，1966 年創設影像通訊公司，提供中東和其他紛爭地區的紀錄片或撰寫相關書籍，因而成為包括日本放送協會（NHK）等新聞媒體在內的重要訊息提供管道。此外，據信後藤健二前往敘利亞有可能是為了營救被 ISIS 擄走的湯川遙菜，因為湯川遙菜曾經是後藤健二在中東地區採訪時的副手。上述這些因素無不緩解「自我責任論」的強度，一些民眾甚至在 Facebook 上成立「我是健二」（IAM KENJI）的粉絲專業來聲援他，呼籲日本政府要有相應的營救之作為⁴⁷¹。

⁴⁷¹ 「我是健二」（IAM KENJI）的 Facebook 專業要求人們上傳附上「我是健二」

（#IAmKenji）標語的自拍照或其他照片，該網頁迄今為止已獲得 5 萬多人「按讚」。此次人質危機爆發之後，10 天內，標註「#我不是安倍」（#IAmNotAbe）標籤的文章，暴增到將近 50 萬則。日本民眾甚至手拿「我是健二」、「我不是安倍」等標語前往首相官邸前靜坐，呼籲日本政府拿出作為拯救人質。「我是健二」的 Facebook 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IAmKenjiGoto/likes>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2015.1.27，〈盼人質平安歸來 我是健二傳臉書〉，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501270375-1.aspx>

天下雜誌，2015.2.2，〈死了一個日本記者之後，伊斯蘭國挑戰全球外交神經〉，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4275#>

綜合上述日本「國內政治」面向的特殊脈絡可知，只有「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這兩個較為「滿意」的選項進入第二階段，即便「第三國武力協助」在「全球戰略」面向上得到5分，但也無法補償它在「國內政治」面向上的失分，因而在第一階段即被剔除，不予考慮。

(2) 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

第一階段篩選後的選項只剩「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為了達到效益最大化的結果，須依補償性原則來分析這兩個選項在各面向的得分，如表8所示

表8 「後藤回合」：剩餘選項在各面向的積分表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外交壓力	4	3	7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延續第一輪「湯川回合」的「維持現狀」為主要的「滿意」選項。換言之，第一輪與第二輪人質危機並非兩個完全相互獨立的事件，第一輪的決定會連帶影響第二輪。大體上，自我責任論仍是第二輪的主流論述，使「維持現狀」仍是第二輪的「最佳」選項，而支撐該選項的國內政治背景為選後政治蜜月期和平憲法。另外，第二輪中 ISIS 的要求從「交付贖金」轉變成「囚犯換俘」，但因為「囚犯換俘」在第一階段最重要的「國內政治面向」未達標準而被剔除，是故也不會成為第二階段的考慮選項。

從「全球戰略」面向來看，即便人質的「個人背景」因素使施加在政府的壓力不盡相同，但仍難以動搖政府在全球戰略上的決策。基本上，「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都秉持「不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但前者略勝後者。

綜合評比可知，「維持現狀」在兩個面向上都比「外交壓力」來的高分，使其總積分也最高，讓「維持現狀」成為第一輪人質危機的「最佳」選項，符合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的「利益最大化」原則。以下以經驗證據來佐證之。

5. 經驗分析

第一輪「湯川回合」的結束即代表著第二輪「後藤回合」的開始，兩者具有連動關係。1月24日晚上11點，一段視頻公布在網路上，其中後藤拿著一名人質湯川被殺害的照片，並以英語責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湯川就是你殺的。」他指控：「你沒有認真地回應我們領袖的要求，沒有在72小時（即1月23日以前）內有所行動。」並表示：「要救我的命很簡單，只要釋放被囚禁在約旦的里沙維，我就可以獲得自由。」

25日，湯川遙菜確定被殺後（美國政府認為該影片的可信度極高），安倍

隨即發表三點聲明⁴⁷²：

- 第一， 日本政府本著**確保人質生命安全為首的原則**，...這種恐怖行徑是令人髮指、不可饒恕的暴行，我感到極其憤慨。
- 第二， 我再次強烈要求不得傷害並立即釋放另一名人質後藤健二。日本政府正傾盡全力營救後藤。
- 第三， 日本政府**絕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並將一如既往地與國際社會攜手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此回合仍延續「官邸決策」模式。25 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同樣召開記者會表示：「這是難以容許的暴行，我們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釋放最後一名日本人質。我們將立即和內閣危機管理監、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和相關省廳合作蒐集情報，並立即舉辦相關部長級會議。」⁴⁷³

此外，針對 ISIS 殺害人質的恐怖主義行為，國際社會也紛紛予以強烈譴責⁴⁷⁴，如下表 9 所示：

表 9 國際社會紛紛譴責暴行

時間	聲援國	內容
1 月 25 日	英國首相卡麥隆	我極度譴責後藤健二似乎遭到謀殺這種可惡與卑劣的行為。這更提醒了我們，伊斯蘭國是邪惡的化身。
	美國總統歐巴馬	恐怖組織殺害日本記者後藤健二令人髮指，美國予以譴責。
	美國國防部長 Chuck Hagel	日本最近幾個月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人道主義援助，顯示了日本的寬大，完全對照於伊斯蘭國的殘酷。
	法國總統歐蘭德	我毫不遲疑地，譴責日本公民後藤健二遭殘忍殺害一事。
	德國總理梅克爾	我感到非常震驚，我們將與日本攜手並進，持續進行反恐戰爭。
	澳洲首相 Tony Abbott	沒有什麼比根除對死亡的崇拜來的更重要。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無端被捲入 ISIS—日本人質危機的約旦於 26 日發表聲明，約旦國王阿卜杜

⁴⁷² 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1.25，〈內閣總理大臣聲明〉，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se/20150125seimei.html

⁴⁷³ 資料來源：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1.25 午前，〈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5_a.html

⁴⁷⁴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2015.1.26，〈米欧「イスラム国」を強く非難 独首相「ともに戦う」〉，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GM25H0S_V20C15A1FF8000/

拉二世表示將竭盡全力營救 ISIS 手中的約旦皇家飛行員卡薩斯貝中尉，但卻未回應記者關於日本人質的提問⁴⁷⁵。27 日，ISIS 公布影片，警告約旦當局必須在「自即日起 24 小時內（即 1 月 28 日以前）」釋放里沙維，否則將殺害卡薩斯貝和後藤健二。此外，ISIS 也要求約旦政府必須同意後藤健二和里沙維的「一對一交換」，否則卡薩斯貝會比後藤健二先被殺害。

日本和約旦隨即展開秘密談判，並表示不排除考慮「囚犯換俘」；對此，美國表示強烈反對⁴⁷⁶。28 日，約旦政府表示願意談判而釋放死囚里沙維，但條件是 ISIS 必須同時釋放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即便約旦政府已釋出善意，但 ISIS 卻未對此提出回應。29 日，後藤健二用錄音檔來替 ISIS 傳話，警告約旦政府若不在 29 日日落以前釋放里沙維，就會處決卡薩斯貝。但日落後並無後續消息。

最後，31 日，又有一段影片公布在網路上，影片顯示已被砍頭的後藤跪在地上，一名黑衣男子站在旁邊，並說：「由於你魯莽決定參與一場贏不了的戰爭，這把刀子不僅要殺害後藤健二，且會繼續殺害不論在哪裡被逮到的日本國民。因此，日本的惡夢才剛開始。」但未提及卡薩斯貝的命運。2 月 1 日，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表示，影帶「高度可信」。安倍晉三隨即發表聲明提到：

「這是極其殘暴、卑劣至極的恐怖主義行徑。絕對不能饒恕恐怖主義者的暴行。日本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往後會更加擴大對中東地區的食糧和醫療等人道主義援助。與國際社會一同反恐，是日本責無旁貸的責任」⁴⁷⁷

同時，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強調：「不能寬恕慘無人道、卑劣的恐怖主義暴行，堅決予以譴責。為了讓（恐怖分子）付出代價，將繼續與國際社會繼續合作追究到底。」⁴⁷⁸此外，英國首相卡麥隆、美國總統歐巴馬、法國總統歐蘭德等世界領袖也同聲譴責。

除了後藤健二之外，此回合的另一位囚犯相關人—卡薩斯貝也於 2 月 3 日遇害，他被大火熊熊燒死的影片被公布在網路上，引起國際輿論的撻伐。既然卡薩斯貝已遇害，約旦政府也不甘示弱，隨即於 2 月 4 日處死里沙維，以報復

⁴⁷⁵ 對約旦政府而言，此次人質危機是個莫名的燙手山芋，因為約旦國內同情 ISIS 的勢力不小，許多約旦人覺得「反 ISIS 和約旦不相干」，質疑政府讓「自己人」為不相干的事務冒險。然而，卡薩斯貝對約旦政府而言有其重要性，不全力營救將會引發許多政治後果。因此，約旦一方面表示「願意與 ISIS 談判」，另一方面卻只談卡薩斯貝，而不談後藤健二。
資料來源：南華早報，2015.2.26，〈ISIS：誰是最後的人質？〉，
<http://www.nanzao.com/tc/international/14c317169955979/isis-shui-shi-zui-hou-di-ren-zhi->

⁴⁷⁶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Jen Psaki 表示，美國一貫立場是絕不向恐怖份子讓步，也反對盟友向恐怖份子屈服。因此，美國明確表示反對日本和約旦以尋求換俘的方式來解決人質危機。但此舉被質疑「雙重標準」，因為美國陸軍中士 Bowe Bergdahl 是美國用五名關達摩囚犯向塔利班交換而來的。為什麼美國可以換俘，而日本和約旦不行？
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2015.1.30，〈人質危機 凸顯日本外交失衡〉
<http://news.rti.org.tw/news/newsSubject?recordId=636>

⁴⁷⁷ 資料來源：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2.1，〈內閣總理大臣聲明〉，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201seimei.html

⁴⁷⁸ 資料來源：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2.1.午前，〈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殺害予告事案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2/1_a.html

ISIS。最終，第二輪「後藤回合」以三方人質依序遇害而悲劇性的告終。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在第二輪「後藤回合」幾乎沒有什麼實質作為，符合此回合 PH 理論的預測結果—「維持現狀」。延續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政策選項，此無疑與日本國內政治面向緊密相關，即**選後政治蜜月期、對和平憲法的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相互牽動後的產物。至於「外交壓力」早在第一輪就已用盡，如今也只是黔驢技窮。此外，第一輪湯川遙菜遇害後，國際社會紛紛對此提出譴責（如表 9 所示），但這些言論如今看來，cheap talk 的成分居多，可能沒有實際的嚇阻效用。

深究之，會發現本回合的主動權並不在日本，而是約旦和 ISIS，因為釋放後藤健二的前提是，約旦政府必須先釋放里沙維。於是乎整個人質談判的難題移轉至約旦，對安倍而言，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倘若約旦政府願意釋放里沙維，則後藤健二有很高的機率會被釋放。然而，倘若約旦政府不願意釋放里沙維，後藤健二也可能因此而遇害，則日本政府也能說「是約旦政府不願意釋放里沙維，而非我沒有努力！」使責任不至於全部歸諸在自己身上。

原本 28 日，約旦政府表示願意談判而釋放里沙維，如果 ISIS 當時願意與約旦妥協，則或許可以獲致雙贏或三贏的結局，但為何最終仍是以後藤健二、卡薩斯貝和里沙維紛紛遇害而告終呢？對此，大致有三種說法：第一，ISIS 內部的派系內鬨和權力鬥爭使交易流產⁴⁷⁹。第二，ISIS 根本沒準備要談判，以至於他們對於應該拿什麼來換什麼舉棋不定。第三，ISIS 其實自始沒有要談判，其目的只是要分化美國、約旦、日本等反 ISIS 聯盟之間的關係⁴⁸⁰。

無論原因為何，ISIS 的脫序出牌讓各方如釋重負；相對的，ISIS 則成為眾矢之的⁴⁸¹。日本政府自人質危機以來便一直處在兩難困局，一方面安倍不希望此事動搖「安保法制化」進程，否則會產生「日本政府無法保護海外利益卻又

⁴⁷⁹ 黎巴嫩《中東日報》就有文章援引消息人士指稱 ISIS 本來就是「萬國聯軍」，骨幹來自五湖四海，內部派系林立，大體可分為「伊拉克派」、「敘利亞派」和「國際派」三大派，此次人質事件中，最初掌握人質命運的是「伊拉克派」，想完成交易的也是他們，但「敘利亞派」卻設法奪取了人質控制權並最終讓交易流產。至於後者何以要這樣做，是單純出於政治、宗教考量，還是「只要對手想完成的我一定搗亂」情結作祟，就不得而知了。

資料來源：同註 20。

⁴⁸⁰ 約旦是美國盟邦，因而參與美國轟炸 ISIS 的軍事行動。對 ISIS 來說，他們正想往約旦擴張，如果這樣能夠造成美國與約旦間的摩擦，甚至約旦百姓跟政府間的摩擦，將有助於 ISIS 的勢力擴張。但後來發現分化策略並未奏效，所以 ISIS 決定不玩了，而把後藤健二斬首。

資料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5.2.4，〈日本人質遭殺害 集體安全解禁成議題〉，

<http://bit.ly/1LrqSBo>

⁴⁸¹ 約旦飛行員被殘忍燒死，緩解約旦王室和政府的壓力，因為如今他們可理直氣壯地指出，不是約旦不和 ISIS 談，而是對方不可理喻。事發後 24 小時內，約旦就處死里沙維，從網絡和輿情來看，民意已發生逆轉，原本主張妥協的約旦人，如今卻明確支持政府第一時間處死里沙維的行為。國王更親自指揮對 ISIS 目標的報復性轟炸，同樣得到舉國響應。此外，一直沉默的美國頁也鬆一口氣：既不用因堅持「不談判不妥協」而背負「罔顧人質安全」的惡名，也不用擔心反恐聯盟因對是否和 ISIS 做交易的分歧而產生致命的裂痕，相反，不僅中東，全球幾乎所有國家都明確表示「ISIS 是人類公敵」，安理會隨後針對 ISIS 的製裁決議獲得一致通過，奧巴馬更趁勢在國會提交「授權動議」—這些在人質事件發酵前，都是難以想像、至少很不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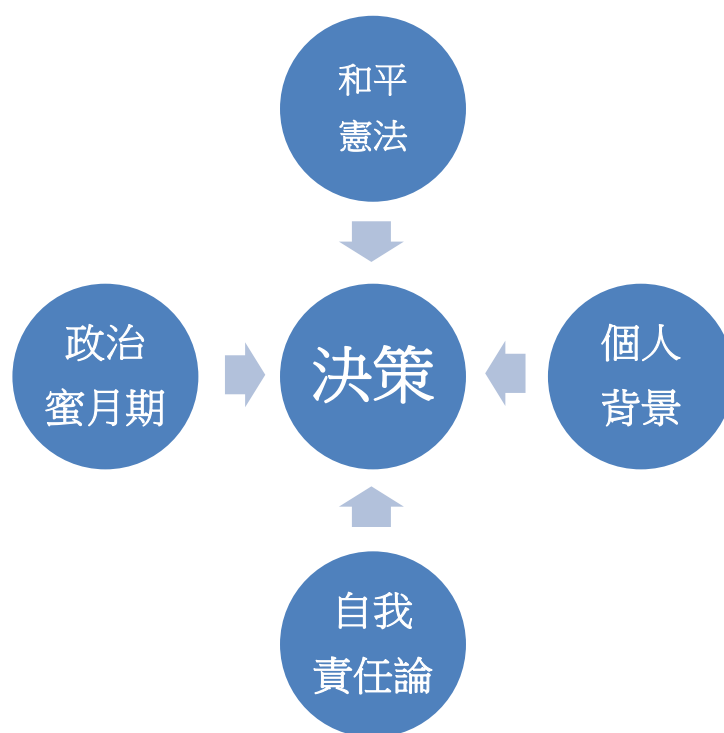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同註 20。

一味加強海外存在」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釋放「日本政府會和恐怖份子討價還價」的印象，否則會讓更多恐怖組織得寸進尺。如今兩名人質先後遇害，雖然令其政治聲譽受到一定損害，但卻不會因此背上「和恐怖分子妥協」的黑鍋。此外，人質事件彰顯「正常國家化」的風險，但也能反向解釋成「日本須加強海外軍事存在，否則就無法保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之依據。後藤死訊傳出後，國際社會紛紛予以譴責，這顯然是安倍此時最想聽到的聲音。

三、綜合比較與分析

綜合上述兩回合可知，國內政治面向對於外交決策的重要性。從本案中，相關國內政治面向之因素為「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對和平憲法的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這四種因素的相互牽動，形成最終決策。據此，筆者將此以結構圖來表示，如下圖 2 所示。

圖 2 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國內政治面向與外交決策關係之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交叉分析「湯川回合」和「後藤回合」會發現，其關鍵變項是「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雖然自我責任論大致是日本根深蒂固的文化，是既定的背景脈絡，但不意味著它是全然不變的常數，其強度會隨著個人背景因素的差異而變動。而這也是本研究試圖闡述的部分，即何謂「自我責任論？」。由於筆者在上述文中不斷提到民意、輿論、信念等詞語，為了更嚴謹的看待這些論述，以下將以實際的量化資料來與以佐證「為什麼安倍在此次人質危機決策上得到『自我責任論』的背書」。

（一）自我責任論 VS. 首相責任論

首先，何謂「自我責任論」（或稱「自己責任論」）呢？一般而言，與自我責任論相對的概念是「首相責任論」（或稱「政府責任論」）。前者認為是當事人自己不顧危險前往危險地區，其所招惹的事情國家沒有義務協助，屬於自作自受；後者則認為首相也就是國家政府，有義務幫助這些深陷恐怖事件的國民。

日本自 2004 年伊拉克—日本人質事件⁴⁸²後，面對這類危機時，「自我責任論」一直是主流民意。冀浩然（2015）認為「自我責任論」背後所反映的是一種日本人的特殊性格，大部份日本人至今依然認為「給他人、社會帶來麻煩」是一種恥辱，再加上日本人傳統的「集體主義」氛圍影響，很容易就會產生這種論調⁴⁸³。這類思維反映在 ISIS—日本人質危機上，即是「自己明明知道有危險，還要去這種地方（ISIS 控制地區），結果被恐怖份子綁架，這完全是自作自受。政府為了這種人改變安全政策、交付贖金實在是太沒有意義了」。

再者，這種自我責任論者也認為「『道歉認錯』比什麼都來的更重要」，是故 2004 年伊拉克—日本人質危機的人質回國後，以低姿態召開記者會，為自己「輕率魯莽不計代價」的行為向社會大眾「謝罪認錯」⁴⁸⁴。在此次 ISIS—日本人質危機亦如是。危機爆發之初，後藤健二的母親石堂順子於 22 日向全日本國民道歉，對自己的兒子被抓給政府帶來麻煩、驚動其他日本民眾，她覺得非常抱歉。甚至湯川遇害後，她是道完歉才說：「拜託日本政府救救健二。」

相對的，「首相責任論」則強調是安倍在埃及發表「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威脅」、「應對 ISIS」等言論招惹了 ISIS，才導致人質危機，是故政府應為自己的「過激」言論負責。然而，首相責任論把責任歸結到國家的外交行為，和自我責任論般都忽視「恐怖份子才是恐怖主義事件的第一責任人」這個基本觀點。

然而，誠如先前所述，即便它是基本背景，也不代表是固定不變的常數，依照不同的「個人背景」，會連帶的影響自我責任論的強度。亞洲研究的金斯頓（Kingston）教授表示：「大眾對後藤還有湯川的態度是有區別的。因為後藤的經驗還有他曾做過的事，使大眾對記者是相當尊敬的；湯川則被認為是一個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天真冒險者，所以很多人都在問為什麼政府和納稅人要對他負起責任。」因此，日本人為後藤健二設立 Facebook 專頁來聲援他，甚至有約

⁴⁸² 自己責任論的近期例子，是 2004 年時的伊拉克日本人質事件。在政府反覆斡旋之後，三名被綁架的日本人郡山總一郎、今井紀明、高遠菜穗子終獲釋放，但回國後似乎才是惡夢的開始。即使郡山是自由攝影師、今井紀明當時只是 18 歲的少年，高遠致力於義工活動，但任何「人道」光芒並未阻絕掉日本的輿論撻伐，媒體稱呼三人是「傲慢的累贅」、質疑「沒有正式地向政府道謝也太奇怪了」、要求「機票費應該要本人支付」。

資料來源：陳怡秀，2015.1.31，〈IS 人質事件：瞥見日本冷漠的「自己責任論」〉，《日本思想》，<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76>

⁴⁸³ 冀浩然，2015.1.30，〈人質事件下日本社會“自我責任論”〉，《中國評論》，<http://hkmag.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35&docid=103595316&page=4>

⁴⁸⁴ 金斯頓表示，在日本的社會背景下，石堂順子的道歉是可以理解的。金斯頓說：「在日本，如果你造成別人的不便，向他們道歉並請求原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資料來源：地球編輯團隊，2015.1.26，〈從伊斯蘭國綁架事件看日本道歉文化〉，<http://world.yam.com/post.php?id=3259>

200 位民眾於首相官邸前靜坐，呼籲日本政府營救後藤健二⁴⁸⁵。但卻不見相同作為來聲援湯川遙菜，由此可見，日本民眾對於兩位人質的差異態度削弱「後藤回合」的自我責任論之強度。但即便如此，「自我責任論」仍是日本社會的主流民意，以下將以民意調查的資料來佐證。

（二）自我責任論的經驗證據

日本國內民眾對於「自我責任論」的肯認，以及自我責任論對於安倍的決策之影響，可以從一些民調的數據上顯現。以下將以相關民意調查來佐證之。從「時事通信社」於 2015 年 3 月的「時事世論調查」⁴⁸⁶可知，當問到「派遣自衛隊去救援海外僑民或人質」時，贊成者約 34.6%，而反對者則高達 51.1%，可見超過半數的日本民眾認為政府沒有義務去營救僑民或人質。另外，若從「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來看，ISIS—日本人質危機爆發時的 1 月和爆發後的 2 月⁴⁸⁷和 3⁴⁸⁸月「時事世論調查」（如圖 3 所示）可知，其支持率分別是 47.2%、47.4%和 47.7%，呈現逐漸上揚的趨勢。若從「各政黨支持率」⁴⁸⁹（如圖 10 所示）來看，自民黨於 2015 年 1 月、2 月和 3 月的支持率分別是 26.2%、26.5%和 27%，也呈現逐漸上揚的趨勢。由此可見，安倍內閣和執政的自民黨並未因此次人質危機而重挫政府的聲譽，反而還逆勢成長。正因為有自我責任論作為安倍內閣的後盾，使其即便採取「維持現狀」，也不至於遭致太大的苛責，因為國內多數民眾可能也不認為有營救人質的必要。

圖 3 安倍內閣和各個政黨的支持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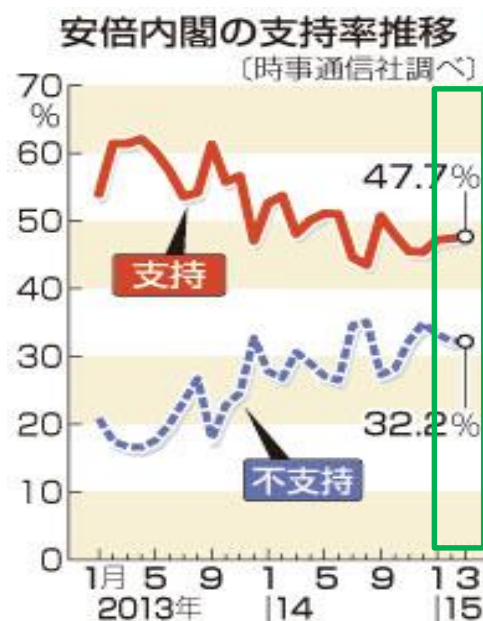
⁴⁸⁵ 朝日新聞，2015.1.25，〈「後藤さんの命を救え」 官邸前で 200 人がアピール〉，<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1T5SYFH1TUTIL01Z.html>

⁴⁸⁶ 時事通信社，2015.3，〈邦人救出に自衛隊「反対」51%＝内閣支持、横ばい47%—時事世論調査〉，<http://www.jiji.com/jc/zc?k=201503/2015031300612&g=pol>

⁴⁸⁷ 時事通信社，2015.2，〈内閣支持、横ばい47%＝6割が「格差拡大」—時事世論調査〉，<http://www.jiji.com/jc/zc?k=201502/2015021300560&g=pol>

⁴⁸⁸ 時事通信社，2015.2，〈内閣支持、47%に持ち直し＝景気回復「実感せず」が85%—時事世論調査〉，<http://www.jiji.com/jc/zc?k=201501/2015011600614&g=pol>

⁴⁸⁹ 同註 32。



政党支持率の推移

	2015年 3月	2月	1月
自 民	27.0	26.5	26.2%
民 主	4.6	6.6	6.1
公 明	4.1	3.0	3.7
維新の党	1.5	2.5	1.8
共 産	2.1	2.4	2.9
次世代の党	0.2	0.0	0.2
社 民	1.2	0.6	0.7
生活の党	0.1	0.0	0.3
元気にする会	0.0	0.0	—
新党改革	0.1	0.0	0.0
支持なし	57.8	57.2	56.5

註：左圖上の綠色框框即是此次人質危機爆發及其後續影響的時期

資料來源：時事通信社

此外，從「共同通信社」於1月25日實施全國的緊急性電話民意調查⁴⁹⁰中可知，針對安倍內閣此次人質事件的處理方式，60.6%的民眾給予「較高的評價」，31.2%的民眾則給予「較差的評價」。至於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則是52.8%，不支持率則是31.9%。上述數據顯示，由於1月25日大致是第一輪「湯川回合」結束，而「後藤回合」正開始之際，因此大致可以檢測民眾對於安倍在第一輪的表現，結果發現有六成的民眾給予肯定。必須注意的是，第一輪是以湯川遙菜遇害而告終，即便人質遇害，仍有六成的民眾予以肯定，可見自我責任論在其中發揮作用。誠如先前所述，由於比起後藤健二，湯川遙菜被視為極右派分子，且前往敘利亞的動機不純，從而讓多數民眾對湯川並無好感，會有這樣的結果，或許並不為過。

再者，根據「產經新聞」和「富士新聞」於1月24至25日聯合執行的民意調查⁴⁹¹中可知，針對安倍內閣此次人質事件的處置方式，原本站在安倍對立面的民主黨也給予不錯評價。有52.7%的民主黨支持者認為政府的處置「非常妥當」，31.3%的人認為「非常不妥當」。從執政黨來看，回答「非常妥當」者，自民黨有66.5%、公明黨有56.8%。從在野黨來看，除了民主黨之外，其餘維新黨、共產黨、次世代黨和新黨改革四黨的支持者也多數給予「較高的評價」。尤其是維新黨更是有72.4%認為安倍的處置方式非常妥當，比自民黨還要高。

⁴⁹⁰ 內閣支持率為52.8%，比去年12月的調查減少0.7%，不支持率則是減少3.0%至31.9%。
資料來源：產經新聞，2015.1.25，〈安倍政権の対応「評価」6割 共同通信世論調査、支持率は横ばい〉，<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125/plt1501250038-n1.html>

⁴⁹¹ 產經新聞，2015.1.26，〈政府イスラム対応、政権に否定的な野党支持層も評価 民主党支持層の52% 維新は72%〉，<http://www.sankei.com/affairs/news/150126/afr1501260046-n1.html>

而無黨派也有 52.4% 回答「非常妥當」。相對的，給予較多負面評價的政黨只有社民黨和生活黨，這些即使不是安倍內閣支持層也有 49.1% 認為「非常妥當」。

上述數據顯示，各政黨大致都有五成至六成的民意支持安倍內閣的處置方式，維新黨甚至有七成民意支持。此外，即便對安倍給予較多負面評價的社民黨也有近五成的民意支持。由此可見，安倍內閣在此次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幾乎獲得各個政黨的共鳴與一致支持，反映了「自我責任論」的根深蒂固，讓平日相互算計的政黨能在此議題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

陸、結論

本文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來重新詮釋日本在 2015 年初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過程及其影響。由於既有外交決策理論忽視國內政治對外交決策的影響，而多元啟發理論恰巧彌補這些不足，它強調許多時候決策者常常考慮「國內政治」面向來做決策，而非國際層次的策略互動或遵循國家利益。筆者認為多元啟發理論尤其適用於本次人質危機，不僅解釋決策者時常在理性和資訊有限的情勢下做決策，更能理解一些外界無法解釋的難題。

在本次人質危機中，由於和平憲法對於日本行使武力的限制，使得日本並沒有太多籌碼可以與 ISIS 抗衡，但這不意味著日本注定成為此次人質危機的輸家；相對的，如果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就會發現安倍晉三最終選擇「維持現狀」是有其道理可循。因此，如果沒有適時揭露「國內政治」面向對外交決策的影響，很容易就會有偏誤的結論。

藉由將 PH 理論實際操作於此次人質危機中，筆者認為「維持現狀」選項的脫穎而出其實是四種日本國內政治面向之因素相互連動的結果，即**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對於和憲法的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首先，多數日本民眾高度肯認「和平憲法」所揭示的和平主義精神，使無論是強硬（第三國武力協助）還是軟弱（答應 ISIS 要求、談判）的行動，都不被安倍所考慮。雖然他最終期望能將日本改造成「正常國家」，但由於危機決策的緊迫性，使他仍必須先以國內民意與輿論走向為主軸，否則失了此局，也將危及他「安保法制化」的盤算。此外，剛大選完的安倍有其選後政治蜜月期這張金牌，再加上「自我責任論」的發酵使安倍適時捕捉到民眾這樣的心理，使之即便不積極營救人質，也不會遭致國內太大的反彈。惟須注意的是，人質的「個人背景」也會影響自我責任論的強度。大體上，日本民眾比較同情後藤健二，甚過於湯川遙菜，從而使施加在政府的壓力也不盡相同。但即便如此，「自我責任論」仍是主流多數，反映在各種民調與人質危機後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反而上升。如果是既有外交決策理論則很難完全解釋這種「看似的」反常現象。

柒、資料來源

一、專書

- 沈家銘，2014，《21 世紀日本對中外交決策模式研究—以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為例》，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
- 松村岐夫、伊藤光利、辻中豐著，吳明上譯，2001，《日本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出版社。
- 黃奎博，2009，〈外交與決策分析〉，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169-192。
- 楊鈞池，2012，《從「和平國家」邁向「正常國家」：日本政治轉型之研究》，台北：翰蘆出版社。
- 翟唯佳，2004，《人質危機與解救》，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Allison, Graham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Danilovic, Vesna. 2002. "The Rational-Cognitive Debate and Poliheuristic Theory." in *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ed. Mintz, Alex.
- Karl De Rouen, Jr. 2002. "The Decision Not to Use Force at Dien Bien Phu: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In *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ed. Mintz, Alex.
- Mintz, Alex and Nehemia Geva. 1997.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Decisionmaking on War and Peace*, ed. Mintz, Alex and Nehemia Geva.
- Mintz, Alex. 2002. "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in *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ed. Mintz, Alex.
- Xinsheng Liu. 2002.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Decision and 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in *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ed. Mintz, Alex.

二、期刊論文

- Brule, David J. 2005. "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16(1): 99-113.
- Kinne, Brandon J. 2005. "Decision Mak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16(1): 114-128.
- Redd, Steven B. 2005. "The Influence of Advisors and Decision Strategies on Foreign Policy Choices: President Clinton's Decision to Use Force in Kosovo."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6(1): 129-150.

James, Patrick and Enyu Zhang. 2005. "Chinese Choices: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1950-1996."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1(1): 31-54.

Mintz, Alex. 1993. "The Decision to Attack Iraq: A Noncompensatory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7(4): 595-618.

三、新聞媒體

BBC 中文網，2014.12.15，〈分析：安倍晉三政權延續 中日關係成焦點〉，
<http://bbc.in/1dkhr91>

天下雜誌，2015.2.2，〈死了一個日本記者之後，伊斯蘭國挑戰全球外交神經〉，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4275#>

日本經濟新聞，2015.1.26，〈米欧「イスラム国」を強く非難 独首相「ともに戦う」〉，<http://is.gd/5f1Bff>

中央通訊社，2015.1.26，〈伊斯蘭國殺日本人質 事件始末快速了解〉，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1265002-1.aspx>

中央通訊社，2015.1.27，〈盼人質平安歸來 我是健二傳臉書〉，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501270375-1.aspx>

中央廣播電台，2015.1.30，〈人質危機 凸顯日本外交失衡〉
<http://news.rti.org.tw/news/newsSubject/?recordId=636>

中時電子報，2015.1.13，〈安倍將訪中東 4 國發表中東政策〉，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13003417-260408>

中國新聞周刊，2015.3.3，〈人質危機將成為日本社會的分水嶺〉，
<http://news.inewsweek.cn/detail-1446.html>

地球編輯團隊，2015.1.26，〈從伊斯蘭國綁架事件看日本道歉文化〉，
<http://world.yam.com/post.php?id=3259>

明報，2015.2.23，〈張望：人質危機下的安倍官邸決策〉，
<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379110/73/sc>

南華早報，2015.2.26，〈ISIS：誰是最後的人質？〉，
<http://bit.ly/1e7zcsE>

產經新聞，2015.1.21，〈「身代金は払えない」自民・高村副総裁〉，
<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121/plt1501210014-n1.html>

朝日新聞，2015.1.25，〈「後藤さんの命を救え」 官邸前で200人がアピール〉，
<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1T5SYFH1TUTIL01Z.html>

經濟學人，〈全球最會賺錢的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資金從哪來？〉，《天下雜誌》，
<http://bit.ly/1GMZKJR>

四、民調資料

NHK 社会や政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15.5.8，〈平和観についての世論調査 2014〉，
<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901.pdf>

時事通信社，2015.3，〈邦人救出に自衛隊「反対」51％＝内閣支持、横ばい47％－時事世論調査〉，<http://bit.ly/1TR2Lj0>

時事通信社，2015.2，〈内閣支持、横ばい47％＝6割が「格差拡大」－時事世論調査〉，<http://www.jiji.com/jc/zc?k=201502/2015021300560&g=pol>

時事通信社，2015.2，〈内閣支持、47％に持ち直し＝景気回復「実感せず」が85％－時事世論調査〉，<http://bit.ly/1dkjsBO>

産経新聞，2015.1.25，〈安倍政権の対応「評価」6割 共同通信世論調査、支持率は横ばい〉，<http://bit.ly/1TR2uwA>

産経新聞，2015.1.26，〈政府イスラム対応、政権に否定的な野党支持層も評価 民主党支持層の52％ 維新は72％〉，<http://bit.ly/1TR2ywg>

五、官方文件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2.1.20，〈安倍内閣总理大臣记者招待会〉，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501/0120naigai.html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2.1.20，〈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0_p.html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5.1.21，〈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1_a.html

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1.25，〈内閣総理大臣声明〉，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125seimei.html

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1.25 午前，〈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5_a.html

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2.1，〈内閣総理大臣声明〉，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201seimei.html

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2.1.午前，〈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殺害予告事案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2/1_a.html

六、時事評論

陳怡秀，2015.1.31，〈IS 人質事件：瞥見日本冷漠的「自己責任論」〉，《日本思想》，<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76>

劉必榮，2015.2.4，〈日本人質遭殺害 集體安全解禁成議題〉，《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bit.ly/1LrqSBo>

冀浩然，2015.1.30，〈人質事件下日本社會“自我責任論”〉，《中國評論》，<http://bit.ly/1TR2nB3>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與日本之間即不再有武裝衝突，但兩國之間仍因若干議題，而處於緊張的狀態。首先，中日兩國對釣魚台列嶼存有領土紛爭。釣魚台列嶼由釣魚台島、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沖北岩、沖南岩與飛瀨島八小島組成，總面積約 6.5 平方公里，最大島亦稱釣魚台島，面積約 4.5 平方公里。二次大戰後，琉球與釣魚台列嶼交由美國託管。爭議的起源始於 1968 年的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UNESCAP）預測釣魚臺列嶼附近東海的大陸礁層，可能蘊藏大量石油，自此台灣與中國開始主張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權利。1972 年美國歸還沖繩，並將琉球歸還日本的同時一併將釣魚臺之行政權轉送給日本。⁴⁹² 自行政權轉讓之後，日本聲稱擁有釣魚臺列嶼的行政權、航道權，開始驅離台灣、中國漁業至今。2012 年日本將釣魚臺列嶼「國有化」後，中國大陸 20 個城市發生激烈反日抗爭，中國大陸海警船開始並持續駛入釣魚臺海域。⁴⁹³

其次，釣魚台牽動的不只是中國與日本的主權主張，也涉及區域內的大國關係。2014 年 5 月 20-26 日，中國及俄羅斯在釣魚臺列嶼西北海域舉行「海上聯合—2014」軍事演習，雙方參演部隊組成混合編隊，演練聯合護航、聯合解救被劫持船舶、聯合查證識別、聯合防空和聯合對海突擊等多個項目。此一事件被部分觀察家用以證明兩國軍事關係的密切，⁴⁹⁴ 甚至有軍事聯盟的可能。⁴⁹⁵

⁴⁹²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等編，楊紫函等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⁴⁹³ “*Dangerous Waters Why China's dispute with Japan is more dangerous than you think*” <http://foreignpolicy.com/2012/09/17/dangerous-waters/>, Foreign Policy, 2012/9/17, 檢閱日期：2015/5/29

⁴⁹⁴ 黃鏡豪，「共軍與國際夥伴交流」，收錄於甘浩森（Roy Kamphausen）、雷霆（David Lai）、譚俊輝（Travis Tanner）等編，黃文啟譯，*從實踐中學習：共軍的境內外訓練*（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3 年），頁 203-217。

⁴⁹⁵ 林經緯，「邁向軍事聯盟？探索中俄軍事合作的虛實」，*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123-146。

對中俄軍演，美國與日本也於 2014 年 11 月以軍事演習做為回應。⁴⁹⁶ 美國空軍派出 F-22 和 F-35 隱形戰機進行空戰訓練，這兩種戰機針對中蘇的蘇-30 戰鬥機，並進行了模擬兩軍交火的空中交互進攻、空中對戰防禦以及空中遮掩斷路的戰略演習。在戰區指定空域內產生準確打擊能力，對近距離展開空中支援。此次演習包括美國海軍的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和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伊勢號直升機航空母艦向中國與俄羅斯展現武力。一共有包括三萬名日本自衛隊員、三十艘船艦、兩百六十架戰機及一萬名美軍士兵參加演習。

第三，在主權與軍事的因素之外，歷史問題也是中日之間緊張關係的來源，展現在慰安婦與靖國神社等爭議上。以慰安婦而言，慰安婦制度是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期間對亞洲國家所建立的大規模的性奴隸體系，在中國估計有兩百萬人是被強迫為性奴隸與集體強姦，1993 年的河野洋平就慰安婦問題發表講話，承認日軍在朝鮮半島和中國等地強徵當地婦女充當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婦，並就此表示道歉及反省。「河野談話」被此後的歷屆日本政府所接受，是日本政府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正式立場。⁴⁹⁷ 然而，慰安婦的爭議並未就此平息。關於慰安婦的事件，在 2013 年時橋下徹的發言，日本慰安婦必要論⁴⁹⁸和 2014 年時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國會參議院發言，針對前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 1993 年對慰安婦問題的發言說：「在沒有資料顯示強徵慰安婦時，承認是重大問題」。⁴⁹⁹

中國國務院說了非常重的話：「我們對日方有關言論表示嚴重關切。強徵“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對亞洲等受害國人民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鐵證如山，不容否認。任何企圖否認這一歷史罪行和事實的做法只能適得其反，使人們對日方企圖為歷史翻案的動向更加警惕。我們嚴肅敦促日方不折不扣地

⁴⁹⁶ 虞群、成漢平，「中國週邊：軍演逐鹿場」，世界知識，第 7 期（2013 年 8 月），頁 14-22。

⁴⁹⁷ 大師堂經慰，慰安婦強制連行はなかった：河野談話の放置は許されない（東京都：展転社，1999 年）。

⁴⁹⁸ 「橋下徹拒絕收回慰安婦必要論」，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5/130527_hashimoto_comfort_women, bbc, 2013/05/27, 檢閱日期：2015/5/29

⁴⁹⁹ 「日本官員欲否認強徵慰安婦獲日媒支持」，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22_japan_comfort-women_history, bbc, 檢閱日期：2015/5/29

信守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的有關表態和承諾。」⁵⁰⁰這兩件爭議事件說明引發中國外交部的抗議，把慰安婦和日本軍國主義相連結。凸顯中日之間為此而有緊張，顯示出兩者的衝突。

韓國外長趙太庸（Cho Tae-yong）在 2014 年 1 月聲明：慰安婦爭議對日本而言，破壞越多河野談話，日本的國際信譽越會受影響⁵⁰¹。

中國亦譴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導致日本與其近鄰韓國與中國因為領土爭議已經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⁵⁰²靖國神社的參拜行為代表了民族象徵意義，英烈在死後進入神社，與活著的日本人，共同構成民族國家的主體，參拜十四名二戰時的侵略者，對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而言，是不可原諒的。⁵⁰³

以上事例顯示，中國與日本之間因為種種主權、安全、與歷史因素，而不時在外交上有緊張態勢。對這些事件的評論，往往著重在個別政府或領導人的因素，本文則嘗試從國際關係的理論切入，提供一個簡潔的架構，解釋這些個別事件為何不斷出現。換句話說，主權爭議固然需要國際法或國際協商解決，但並不是所有的主權爭議都一定會帶來國家間的衝突；中國與周邊許多國家都有領土糾紛，但不是每一個主權爭端都帶來中國與鄰國的衝突。同樣的，慰安婦與靖國神社往往隨著個別行為者的言論和行為而造成中日與中韓之間的緊張，但這些事件常和日本的軍國主義聯結，顯示出它們不只是單純的歷史問題，也和當前的東亞軍事與安全局勢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有助於我們理解驅動這些事件的基本因素。

⁵⁰⁰ 「外交部發言人：日本軍國主義強徵“慰安婦”的嚴重反人道罪行不容否認」，
<http://edinburgh.china-consulate.org/chn/wjbfyrth/t1202974.htm>, 2014/10/22，檢閱日期：2015/5/29

⁵⁰¹ “South Korea, China protest Japan's 'comfort women apology review'”, Reuters, 2014/06/2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6/23/us-southkorea-japan-idUSKBN0EY0PR20140623>，檢閱日期：2015/5/29

⁵⁰² 「中國譴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2/131226_china_japan_yasukuni, bbc, 2013/12/26，檢閱日期：2015/5/29

⁵⁰³ 「日本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 中韓譴責美失望」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japan-war-shrine20131226/1817880.html>, voa, 2013/12/26, 檢閱日期：2015/5/29

二、研究目的

本文嘗試就中日緊張關係提出較根本的解釋，而地理環境可說是影響區域衝突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國來說，除了中國管轄或聲稱擁有的領土——台灣、西藏、東海（如釣魚台）、以及南海——之外，它周邊與 20 個國家接壤，如東面的日本、南面的越南、西南面的印度、到北面的俄國等。在這些鄰國之中，包含了世界上 15 個最大國家中的 7 個（印度、巴基斯坦、俄國、日本、菲律賓、印尼和越南）；中國並曾與 5 國（俄國、南韓、日本、越南和印度）打過戰爭；也有 9 國的政權是不穩定的（北韓、菲律賓、緬甸、不丹、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和吉爾吉斯）；中國並與這些國家有過或仍有邊界的爭端。台灣雖不被中國視為一個國家，但作為一個試圖擺脫中國控制的政治實體，它構成中國外交的一大難題。⁵⁰⁴

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一個最大的安全挑戰——美國。美國在距中國僅 2000 英里的關島上有軍事基地；在東海與南中國海有中國無可匹敵的海軍勢力；它和中國周邊的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吉爾吉斯有各式防衛關係；其政經影響力遍及亞洲。因此如果說美國因為和中國距離遙遠，可以防止後者對它直接造成軍事壓力，但美國卻可透過和亞洲國家的安全關係威脅到中國。就此而言，中國可說處於世上最富挑戰性的地緣政治環境。⁵⁰⁵

中日之間、或更廣大的東亞安全局勢，因此可說是陸權與海權的爭奪。中國想突破第一島鏈，便會產生中日區域衝突，影響美日安保條約下固有的秩序。中國始終堅持擁有台灣、釣魚台、南海主權，不容許日本釣魚台國有化的政策等舉

⁵⁰⁴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新北市：左岸文化，2013 年），頁 40-42。

⁵⁰⁵ 黎安友、施道安，**尋求安全感的中國**，頁 42。

動，不只是主權的爭議，也涉及諸如天然資源的爭奪、經濟資源、航道安全等戰略考量。

此一基本局勢隨著中國經貿的發展以及「中國崛起」的呼聲，而加深了中國與日本（及美國）的對立。日本 2014 年第四季 GDP 年增僅 0.7%，遠低於中國的 7.7%。儘管中國的 GDP 成長速度近年來已從逾 10%放緩，但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預估⁵⁰⁶，最快在 2019 年，中國就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它對區域主義也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例如 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⁵⁰⁷以及亞投行⁵⁰⁸的構想。

處於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國對於其國力的發展一向強調和平與不爭霸的立場。舉例而言，2004 年 3 月 14 日，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重申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並有如下特點：第一，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崛起應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雄厚的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的機制創新。第三，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第五，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⁵⁰⁹

儘管如此，美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事實，仍持高度警戒的態度。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即被普遍認知為針對中國而來。⁵¹⁰歐巴馬政府上任後，

⁵⁰⁶ “China Hand: Private financing makes headway”, Economist Intelligence, 2014/4/29, 檢閱日期：2015/5/29

⁵⁰⁷ “One Belt and One Road”, <http://www.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one-belt-and-one-road-far-reaching-initiative/>, china us focus, 2015/3/26, 檢閱日期：2015/5/29

⁵⁰⁸ “Fifty Countries Sign the Articles of Agreement for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ank, http://www.aiibank.org/html/2015/NEWS_0629/11.html, 2015/6/29, 檢閱日期：2015/8/2

⁵⁰⁹ 「中國和平崛起論的由來」,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MATERIAL/540646.htm>, china.com.cn, 2004/4/7, 檢閱日期：2015/5/29；溫家寶，「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8213/8309/28296/2456452.html>, people.com.cn 2004/4/19, 檢閱日期：2015/5/29

⁵¹⁰ “We’re back America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st,

多次宣示「重返亞洲」企圖，繼而啟動多項亞太政策，並著墨於區域多邊途徑，近兩年來所推動政策逐步落實，美國對亞太區域主義發展之影響。歐巴馬政府所闡釋的「重返亞洲」具體政策內涵，對區域多邊途徑多所著墨：在經濟議題上，企圖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合作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之談判，當中國崛起時，面對美國巧實力的外交政策，將會影響東亞區域原有勢力版塊及秩序，而美國盡力維持原有勢力版塊以確保原有在東亞地緣之霸權，中國在東海以釣魚台主權爭端尋求切入點，日本爭取美國的美日同盟，以美國的亞洲在平衡來制衡中國的崛起。由於美國一向借助日本支撐其在東亞的霸權，美國重返東亞的政策，也伴隨著美日關係而強化。日本自二戰戰敗後，被定位為「和平國家」，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必須「專守防衛」，永久放棄以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這就是日本的部隊，只能叫自衛隊，而不能稱為軍隊的原因。和平憲法中，雖保留了日本的「集體自衛權」，不過在憲法第9條中規定，日本只能行使「個別自衛權」，而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⁵¹¹換言之，在原先的憲法解釋下，只要日本本土未遭受攻擊，不管其他國家打成怎麼樣，日本只能旁觀，不能出兵。但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復甦，美國逐步要求日本在其自身與國際安全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美日安全關係的變遷，可從雙方於1951年簽署之安保條約的重大修正觀察。舉例來說，1992年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KO)海外派兵法案，為日本自衛隊之海外行動提供法律基礎；1996年4月美國柯林頓總統與日本橋本龍太郎首相共同簽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其中要點之一是「確定對於日本本身的防衛應是日本自衛隊與美日安保體系的相加而達成、肯定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是維繫與穩定區域安全的關鍵因素」；⁵¹² 1997年底修訂的「美日安保防衛新指南」，則就美日「平常時候」的合作（normal circumstances）、日本遭受軍事攻擊而「有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8803>, 2011/11/9 檢閱日期：2015/5/29

⁵¹¹ 久田榮正，「憲法九條 歷史的意義」，法律時報 5 月臨時增刊－憲法九條課題，1979/5/1，pp1-12

⁵¹²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9期（1998年6月），頁281。

事」時的合作(an armed attack against Japan)以及「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三個面向提出規定與做法。儘管日本自衛隊仍然僅可對於日本領域的軍事攻擊進行武力自衛行動，新指南卻確認了美國軍事持續存在日本與亞太地區。⁵¹³ 日本在2007年1月9日修憲，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的發展，雖是藉反恐之勢，但也藉此突破和平憲法以分擔美國的責任。2014年7月1日，日本政府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以「修改憲法解釋」之方式以解禁集體自衛權。⁵¹⁴這些也都是美日關係下，日本逐步扮演更積極的安全角色之例證。

日本安全角色的變遷雖然不完全以中國為對象，但中國無疑是日本與美國的東亞安全政策中的主要考量。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因此可說是以陸權為主的中國，和以海權為主的日本與美國，兩者相競爭或抗衡的態勢。在此基礎上，本文欲進一步探討地緣政治的概念與理論發展，以及其對中國與日本的軍事與經濟戰略的影響。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 一、地緣政治如何影響中國與日本的戰略？
- 二、從地緣政治的邏輯，探討中國與日本在近年來的軍事安全關係之發展。
- 三、從地緣政治的邏輯，探討中國與日本在近年來的經濟戰略之走向。

第 三 節 文獻回顧

對於中日關係的衝突與競爭，有許多不同的途徑解釋，先扼要簡述過去相關文獻如何闡述中日關係的衝突，並提出具體分類，作為文獻檢閱的架構。且說明每種類別或研究途徑之優缺點來探討中日關係文獻的選擇。本文回顧三種，第一種是法律相關的文獻、第二種是民族主義相關文獻、第三種是地緣政治與攻勢現實主義，也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國際關係理論。先扼要簡述根據文獻檢閱結果，以及想用來解決所提出之研究問題的分析觀點、架構或理論。攻勢現實

⁵¹³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頁282-283。

⁵¹⁴ 「日本決定以憲法新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7/140701_japan_collective_self-defense，2014年7月1日，檢閱日期：2015/5/29

主義以權力性人物為主，以約翰·米爾斯海默為代表，並以兩個不同領域的學者補充他的觀點，以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和法律的學者對其觀點作為補足。

（壹）與法律研究相關文獻

自從 1969 年艾默利報告(K. O. Emery Report) 發現釣魚臺列嶼附近可能是世界藏油氣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中日間圍繞該島嶼爭議，主權爭議成為東亞地區衝突的引爆點。法律上爭端國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都宣稱擁有釣魚臺列嶼主權。2012 年 9 月 11 日，日本把釣魚臺列嶼「國有化」後，將長期實質控管該島嶼之行政權做本質上的改變，引起爭端國的抗議與轉變。尤其是中國大陸立場的轉變，從以往韜光養晦轉向為和平崛起，積極爭取主權與海權，甚至表示為捍衛主權，2014 年和俄國的聯合軍事演習，引起美國與周邊國家高度關注，也造成中日雙方發生軍機的對峙情勢，使得國際衝突危機逐漸升溫，大陸學者鄭海麟的從歷史與國際法看釣魚台問題⁵¹⁵，熊玠的釣魚台問題由法律研究途徑切入⁵¹⁶，這些主張都認為釣魚台是中國固有領土。

台灣法律的學者丘宏達教授所著的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論集⁵¹⁷、俞寬賜所著的南海諸島領土爭端之經緯與法理⁵¹⁸、張啟雄的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日本領有主張的國際法論證⁵¹⁹等等論述日本根據國際法領土取得理論，日本主張釣魚台為無主地，日本為持續使用支配，自 1970 年代至今實質控制使用該區域應取得釣魚台所有權，直到近日釣魚台國有化政策、修憲主張引起中國的重視。本途徑僅限於單一議題，有國際法糾紛時可以討論，國家戰略不在討論範圍。

⁵¹⁵鄭海麟，「從歷史與國際法看釣魚台問題」，**海峽評論**，第 143 期（2002 年），頁 26-27。

⁵¹⁶熊玠，「由國際法看釣魚台的主權與保釣運動功能」，**海峽評論**，第 143 期（2002 年），頁 17-19。

⁵¹⁷丘宏達，「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 肆-釣魚臺問題研究」，**台灣商務印書**，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初版，頁 69-71；丘宏達，「現代國際法」，**三民書局**，八十四年十一月，頁 524。

⁵¹⁸俞寬賜，「南海諸島領土爭端之經緯與法理-兼論東海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台北國立編譯館**，2000 年

⁵¹⁹張啟雄，「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日本領有主張的國際法驗證」，**近代史研究集刊**，頁 109-135。

（貳）與民族主義相關文獻

民族主義如果是衝突的引爆點，對於國家間的和解並不可能。「情感結構」的概念主要來自英國左派學者雷蒙·威廉斯。他對情感結構的界定是「一種溶解的社會經驗，與其他已經沉澱且更為顯明的社會意義形構有別」。試著融入情感來凝聚共識，情感已經沒有框架來駕馭，試著為團結找一種共同對外的氛圍，當前社會科學在講民族主義時，已沒有人贊同原生論，民族主義研究者 He Yanan 的文章 *Ripe for Cooperation or Rivalry? Commerce, Realpolitik, and War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⁵²⁰ 中提及戰爭的集體記憶是造成中日衝突的因素，自安倍政權上台後重新重視美日安保條約，重視美日雙邊關係，中日間不止存在戰略競爭，他們互相威脅，並視對方為對手，這種長期的危險過度關係和敵意，頻繁動火的歷史、雙邊爭議加劇、彼此相互威脅。

與 Christopher Hughes 的文章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⁵²¹ 強調民族主義的全球化，並從歷史來說明中國民族主義從毛澤東時代到現代，研究民族主義學者如中國的群眾(憤青)與日本的右派，相信民族是原生的，情感結構這個詞凸顯了「衝動、抑制與調性的特有成分，尤其是意識與關係中的情感成分」；它所強調的不是「與思考對立的情感」，而是「被感受的思考與被思考的感受」。這些情感成分被稱為「結構」，因為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連鎖互動與張力。克拉克、霍格特與湯普森認為情感結構包括「持久的感情組態，這種感情組態表現了一個年代和時代，超越了特定政權、國族或階級的偶成性，但仍可從政權、國族與階級中找到範例」。可以解釋為中國是根深柢固、為日本是有威脅，不管是哪一任日本政府，都不能改變中日情感上的認同。

民族主義的途徑有助於理解一國對外政策受到的國內政治的推力或限制，但它不能完全解釋政策的做成與否。具體來說，就中日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則

⁵²⁰Yinan He, "Ripe for Cooperation or Rivalry? Commerce, Realpolitik, and War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4, No. 2 (2008), pp. 162-97.

⁵²¹Christopher R. Hughes,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No. 71 (September 2011), pp. 601-620.

中日之間的衝突勢不可免。但迄今為止，兩國在釣魚台乃至其他議題的爭議如慰安婦、南京大屠殺、歷史教科書與靖國神社等，並未導致武裝衝突的出現，可見國家政府相對於國內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仍有其自主性與控制力。本文因此將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國與日本對釣魚台的政策，以及背後的戰略觀，僅在必要時，才援引民族主義與其他國內政治的因素做為補充。

（參）地緣政治、攻勢主義相關的文獻

地緣政治為研究理論基礎，使用他來修飾攻勢現實主義，依據 Robert Ross 所著的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透過地理來解釋區域衝突⁵²²，透過地理來解釋權力平衡，從區域秩序暗示美國影響力的式微。從現實主義來看，中國權力影響力透過擴展經貿關係而提升，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對手，挑戰美國在國際體系霸主地位。

東亞地緣政治影響之解釋來分析釣魚台問題。在東亞地緣政治限制下，日本認為中國崛起在軍事上對其造成威脅，拉攏美國的勢力作為抗衡。釣魚台主權爭議和中國崛起、日本釣魚台國有化、美國重返亞太佈局是對東亞地緣政治產生不穩定的因素。John Mearsheimer 以兩專書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闡述他的攻勢現實主義觀點，依據攻勢現實主義，約翰認為權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由於陸權和海權存在權力結構的問題，陸權會不斷擴張和侵略，成為區域霸權，而海權做為離岸平衡手，制止陸權成為霸權，當一個國家成為區域霸權他會持續維持現狀，並阻止其他區域內霸權的出現，因為國家彼此間相互猜疑，從中國和日本彼此追求權力，潛在的權力（經濟）和軍事活動、軍力部屬、強硬的談判立場。中日間，國際結構為唯一影響要素⁵²³，體制合作的可能性很小，競爭是常態。大國政治的悲劇講的是國家間不變的衝突和侵略⁵²⁴，並從中解釋，中共運

⁵²² Ross, Robert,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81-118.

⁵²³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⁵²⁴ John Mearsheimer,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用攻勢現實主義作為理論依據，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雖然作為國際間的主要行為者，卻必須接受國際政治上各國權力分配形成的結構所制約當然會成為修正主義者。

第 四 節 研究理論

本文理論有兩種：第一種是地緣政治、第二種是結構現實主義，本文的立場是使用地緣政治修正結構現實主義，在假設國家彼此間是互相猜疑，彼此有可能遭受對方的攻擊，現實主義互不信任的因素是地緣政治造成的必然結果。在冷戰時，在討論極的變化，從中美的二極體中，具體呈現出地緣政治的戰略。在冷戰時期，會將焦點放在區域性的地緣政治來討論強權的衝突。美國的四大戰略中：均勢戰略、霸權戰略、圍堵戰略、孤立戰略，就國家安全對其戰略、國防、軍事安全來討論圍堵蘇聯。而中日間延續抗衡和競爭態勢，本文從理論分析、文獻檢閱來分析中日軍事、外交、經濟影響力，透過現實主義、地緣政治來分析現實主義中兩國對彼此安全的建構，討論權力平衡中透過競爭來發展自己的競爭力，中國想改變現狀、日本想維持現狀。

東北亞是世界上兩大權，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所在地。地緣政治是強權角逐之地。區域性危機造成的競爭問題，中國想突破第一島鏈，而地緣政治中中國崛起，造成霸權轉移，產生區域衝突，影響固有的秩序。從地緣政治中，因中國崛起後，日本權力的遞增造成權力轉移理論。地理是影響區域衝突的重要因素。日本的防衛白皮書近年連續強調中國大國崛起，明言大陸不斷擴大海洋支配力，海軍艦艇常態性進入東海、南海，成為日本航空自衛隊主要緊急升空驅離的對象，敵國化態勢明顯，且日本和中國在軍備上支出持續增加，東北亞成為海權、空權的爭奪場，雙極體系的穩定，因為區域次霸權，日本缺乏地理上的條件來發展霸權，與追求大國利益的中國崛起相互矛盾，中日關係造成安全困境。

中國崛起容易產生不穩定的因素，破壞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美國重返亞太佈局是對東亞地緣政治產生不穩定的因素。

從中日關係互動中找出負面影響，依據現實主義講求國家安全和霸權的展現，透過軍備競賽建構其國家安全。日本維持東亞地域區域權力平衡的角色，日本成為首要遏制中國崛起的因素。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前因是中國追求霸權、經濟軍事力量的展現。後果是強調富國強兵的狀況下，中國和日本開始互拉盟友，分別訂下了海上絲路的中國夢和修憲路線的日本夢，日本在安倍經濟學下為其地緣政治下的戰略、國防、軍事安全提出財政上的支持。地緣政治下安全：戰略、國防、軍事安全由季辛吉的現實主義，保障安全現狀的地緣政治轉變為歐巴馬的亞洲再平衡，當美國改變了其外交和政治決策，中國亦修正自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大戰略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一代一路，發展雙邊主義來鞏固其戰略地位；日本在國有化釣魚台、在修改憲法第九條、自衛隊改成國防軍、安倍經濟學多重戰略建築下，基於理性原則，透過制度解決現實主義中無政府的問題，認為東亞是無政府狀態，可以透過合作、透過公約的談判的多邊建制、經濟懲罰來處罰違法的國家。日本與中國透過外交手段表達政治意圖、溝通訊息，都希望減少區域內的行為體欺騙、搭便車的依賴產生。國家和其他行為者若能相信所有國家均遵守規範、合作，為了絕對利益，中國與日本互相提供利益、承諾和戰略同盟發展長期穩定互動關係。中日這兩個強權國家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尋找特定國際政治行為者，追求地緣政治下的國家：東協、台灣、印度、中亞之盟友，各自彙集而成的一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範、決策程序，產生區域內盟友間合作互惠互賴，創立一套制度。透過創立制度，基於攻勢現實主義，理性假設國家來追求國家利益保障自己安全，拉攏集體安全的東協軍事體成員，日本和中國均注重權力利益和延續兩極體系的對抗性，日本國防軍和中國海上絲路的競合下，中國的大戰略，在地緣政治下的發展現實主義抗衡日本的戰略，是開發南海海底的石油、漁業資源，不接受日本在二戰侵略國的道歉、認為日本向中國道歉不具誠意。

廣義來說，大部分檢驗日本與中國所改變權力結構的論據是，美國重返亞洲。中日關係衝突的引爆點是因釣魚台國有化爭議，中國崛起後對於日本外交政策如釣魚台國有化作出了強硬表態。但日本不會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其國有化政策。在美國重返亞太後，日本增強了美日安保條約，中國從釣魚台國有化後發展中日關係是越來越強硬，兩者的競爭態勢已白熱化。

第 五 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理論作為研究方法，從國家間規範內容評估當前困境，從意涵、發展、協定解釋發展狀況，加深戰略佈局中討論歷史背景和蒐集相關文獻。中國崛起的是必然因素，但對於日本和美國，實力不同會造成對中國崛起的因應能力不同，。以 2010 年後 5 年文獻來解釋日本在地緣政治下預測其採取因應之道。確認日本的戰略佈局和中國崛起的戰略互動關係，選擇採取歷史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兩種研究方法，與既有文獻之關係：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是為了因應中國崛起的破壞東亞地緣格局的效應，2010 年後 5 年，以習近平—安倍時期的外交政策為主。一代一路、亞投行是中國的戰略，安倍的圍堵，結合菲律賓、印度的圍堵戰略，日本將自衛隊改成國防軍的因果關係，結合非傳統議題和傳統議題的綜合安全來探討：中國崛起效應對東亞區域安全打破極的均衡，地緣政治及美國重返亞太對中日關係產生的影響。

（一）文獻分析法

運用相關的文獻，界定日本和中國的戰略對東亞地緣政治的影響，

蒐集的文獻加以參考系統客觀地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未來，以國內外學者學術著作、專書，有公信力的新聞媒體，深入了解分析日本和中國的重要議題，

作為研究基礎。使用社會科學收集相關文獻的方法⁵²⁵，發現現實主義中，認為安全的考量會重於經濟，地緣政治中對於領土說法、地理空間的區別有海權和陸權之分。蒐集與閱讀相關學者的文獻，將其應用在本議題上，戰略的發展導致中日關係的轉變，使用地緣政治的視角，是因為中日這兩個國家都有特定的國家戰略。

中國是傳統的大陸國家，陸軍象徵大陸的國力，陸權的角度分析大陸的國家戰略，陸軍現代化到填海造陸，對釣魚台的強硬立場，一代一路的國家戰略佈署，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描述中國崛起後東亞局勢的改變。

日本的外交政策從釣魚台國有化、美國的干涉，改變地緣政治格局，進入了政治、經濟、軍事、科技關係的階段，地緣政治從馬漢海權論認為以海上立國的國家，必須控制海洋，國家強盛和繁榮主要因素，集中、中央位置、交通線是海軍作戰原則。針對東亞地緣政治影響之解釋，來分析中日兩國戰略問題。以東亞地緣政治看中日戰略，來說日本對中共戰略考量？

從軍事、經濟來討論中日關係戰略佈局，為何會做出該項限制？是因為現實主義只討論軍事、經濟傳統安全，而地緣政治的地理假設修正了現實主義的範圍，結合非傳統議題和傳統議題的綜合安全來探討，從軍事衝突爆發、釣魚台爭議，到一代一路和修改憲法，該事實來解釋中國崛起後對於中國、日本外交政策的改變。日本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其國家戰略政策？抑或立場更加堅定？「中國崛起」對東亞地緣政治影響之研究：以中日戰略為探討，中日是否維持一貫的外交政策，進一步閱讀文獻，並從國家戰略的觀點梳理出回顧和可能的發展。

（二）歷史分析法

從歷史分析來評估當前安全困境，從戰略意涵、戰略發展、戰略發展狀況，如何加深戰略佈局。對於中國和日本，增加國家實力由於戰略的訂制不同造成，

⁵²⁵ W. Lawrence Neuman 著，郭思餘譯，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方法之應用（台北：雙葉，2012年）。

本研究採取時間序列研究。以 2010 年後 5 年文獻來解釋不同國家在地緣政治⁵²⁶下預測其採取因應之道。日本戰略佈局和中國崛起的戰略比較，該路徑解釋中國崛起，兩國產生的互動。與之關係：假定日本的地球儀圍堵戰略是為了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呼應，以習近平—安倍時期的外交政策為主。美國重返亞太對日本國有化的因果關係，中國崛起負面效應，東亞區域安全，地緣政治受美國重返亞太的影響，

第六節 研究限制

廣義來說，大部分檢驗日本與中國所改變權力結構的論據是，美國重返亞洲。中日關係衝突的引爆點是因釣魚台國有化爭議，解釋中國崛起前後對於日本外交政策國有化的改變。日本不會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其國有化政策。在美國重返亞太後，中國從日本釣魚台國有化後應穩健發展中日關係。

（一）以中國崛起後⁵²⁷的時間軸為主

Francis Fukuyama⁵²⁸在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提到偶然性的歷史原因出現，科學方法一旦創立，就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時間軸的設定為改變了東亞的緣政治的現狀作為論文的時間點界定。九零年代蘇聯解體後，作者認為已不會爆發戰爭，而冷戰後的中國在 2003 年以前都不曾明確提及中國崛起來改變東亞現狀的官方文件或公開聲明，中國崛起具體的戰略，日本安倍政權具體作為在近五年有顯著的改變，一帶一路⁵²⁹（英文：One Belt And One Road，

⁵²⁶ Ross, Robert,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81-118.

⁵²⁷ 鄭必堅, 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 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 2003/12/2, 檢閱日期：2015/5/29

鄭必堅, 「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 中國互聯網 2003 年 11 月 24 日, 參見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

⁵²⁸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International Interest, 1989

⁵²⁹ "China's Road Rule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5-04-19/chinas-road-rules>, 2015/04/19, 檢閱日期：2015/5/29

縮寫：OBAOR；或稱 One Belt One Road⁵³⁰，縮寫：OBOR；或稱 Belt And Road，縮寫：BA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的簡稱，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別提出的經濟合作概念，屬於跨國經濟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⁵³¹在亞洲和歐洲訪問時進一步推廣，並寫進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成為中國對外的主要經濟戰略。一帶一路一度被稱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安倍的修改憲法是 2014 年，因為日本憲法的爭議將限制同盟的合作效果。日本應可在特定情況下，進行海外軍事部署。在日本持續成長的區域和全球責任，增加防衛省與自衛隊所需資源有其必要性。日本軍事科技：心神戰機⁵³²、出雲號、伊勢號直升機航空母艦，中國軍事科技：遼寧號、殲 11 戰鬥機、蘇 27 戰鬥機、蘇 30 戰鬥機，中國軍方的鷹派強硬的聲明、戰略這些皆是 2010 以後陸續出台，在此之前中國因為韜光養晦的限制，並沒有公布其戰略資訊，「一帶一路」建設習近平的外交重點拓及中亞、西亞及南亞，透過各項區域會議，行銷「亞洲新安全觀」與簡稱「一帶一路」的經濟整合倡議。這兩大對外政策，一個以中國大陸國界以東的美國為對象，另一個則以國界以西的中亞、西亞及南亞為目標。「一東一西」的對外政策，顯示習近平的對外關係版圖呈現兼顧東向與西望的布局。「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已經制訂；「亞投行」籌建邁出實質性步伐；「絲路基金」已順利啟動；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已在推進。

⁵³⁰ “One Belt and One Road”, Far-reaching Initiative, <http://www.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one-belt-and-one-road-far-reaching-initiative/>, china us focus, 2015/3/26, 檢閱日期：2015/5/29

⁵³¹ “Messages from the NPC on China’s Diplomacy in 2015”,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messages-from-the-npc-on-chinas-diplomacy-in-2015/>, china us focus, 2015/3/23, 檢閱日期：2015/5/29

⁵³² “Japan's ATD-X first flight delayed by software glitch” <http://www.janes.com/article/47768/japan-s-atd-x-first-flight-delayed-by-software-glitch> china us focus, IHS Jane's 360, 2015/1/8, 檢閱日期：2015/5/29

（二）根據地緣政治，中日間競爭面向為討論重點，忽略合作面向

中日競爭已趨近白熱化，中日間緊張的關係並尋求解釋，溫家寶說的中國和平崛起前，在 2005 年中國崛起的說法出來後，定位日本東北亞戰略意義，因是地緣政治，果是外交上的競爭，佐證日美安保條約的強化，和平憲法的修正，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思想是「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這樣看似大國可以和平共存的思維背後，隱含的意義是一方面中國大陸對自己國力崛資深具信心，認為美陸地位平等；另一方面亦認知美國實力仍強，且美國及其盟邦長期經營並主導亞太地區秩序與事務，加上近年中共與東亞國家的海上領域主權爭議方興未艾，使得日本與中國大陸維持經濟上合作、安全上競爭的競合關係。

（三）日本在二戰後採吉田茂主義，美國因素重要，因此美國的戰略和日本戰略是有一體性

日本戰略地位，地緣政治下日本海島的表現重要性，美國公認為區域第一大國，大國能得到最好的結果是成為區域霸主，日本是「離岸平衡」中的「離岸」，美國會將其主要軍力移離地區的中心地帶，但這並不代表美國會撤離該地區，只是不會貿然發動戰爭及派駐部隊到當地。「平衡」，顧名思義就指美國會盡量靠地區勢力之間的權力平衡，以維持地區的秩序與穩定，同時美國會保持其外交的主動性，必要時更會支援地區衝突中較弱的一方。但離岸平衡手理想局面成為區域霸主，維持現狀國家，潛在霸主試圖阻止其他大國複製霸權，繼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日本已成為美國重新在全球實行「離岸平衡」大戰略的第一個試點，最主要原因固然是應付中國崛起。地緣政治強調控制某些貿易通道，是國家為了達到國家安全而發展的戰略目標，藉由軍事、經濟力量控制戰略交通線要地為主，力量要投射於何處、使用何種力量，中國大陸的學者也經常使用「地緣戰略」：中國的戰略指的就是軍事戰略，戰略管理與規劃必須

以一定地緣政治理論為指導⁵³³，具體的陸權作為，在中國的崛起後是一代一路、上海合作組織、在南海填海造陸。中國尋找在美日安保條約圍堵下，牽制以美國、日本、菲律賓的海上圍堵。

有不同學者著墨地緣政治，Cohen 認為是對地理環境與政治過程互動關係的研究。中日間的關係可由政治互動觀察；Jakub J Grygiel 認為地緣政治不是固定不變，而是經濟與資源路線分布。中國的地緣戰略，國際鐵公路、中南半島的次區域經濟整合、西部大開發整合新陸上交通網，可由一代一路的與經濟合作做觀察。Robert E Harkavy 戰略地理是國家安全經濟繁榮的控制與介入。1990 年代 Hans J Morgenthau 在 *Politics among nation* ⁵³⁴提到的地理是一國力量所依賴最穩定因素，美國學者布里辛斯基在 1997 年出版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 一書，使用 **geostrategic** 一詞，後冷戰時期的武裝衝突多是國家內部，然而東北亞地區尚未有國家間或國內武裝衝突的事件。

「中國崛起」是個修正主義者，試圖改變現狀；達成西部大開發後和興建亞洲大陸的路上交通網，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集團牽制以美國、日本為中心的海洋集團，地緣政治主要涉及依據從馬漢、麥欽德以至史派克曼以來的地理與國際政治運作相關的論述，以大國相對位置的影響下所做的研究，並以攻勢現實主義闡述其概念。季辛吉認為地緣政治就是權力政治，地理的變數認為地理對於陸權向海權提出挑戰，陸權的戰略擴張與海權的海洋戰略的發展，John 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海洋能有效阻止國家向外投射能力，國際體系出現對抗海權是國際權力分配重要因素。由於從東亞地緣格局看來，日本提供了美國重要的戰略地位，中國因迅速發展與位居歐亞大陸和中南半島之間中間位子，逐漸成為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建設中心。

⁵³³ 蒲寧，*地緣戰略與中國安全環境的塑造*（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頁 6-7。

⁵³⁴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peace*, 5th ed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p164-166

因為國家資源有限，所以必須集中投射軍事力量和指導外交活動。這也是所有討論戰略有關論述的基本假定。大國基於權力、利益或安全的理由，在資源有限並預防戰爭的情況下，必須集中投射軍事力量和指導外交活動在特定的地區之中。這成為一種結構性因素而影響大國行為，不涉及動機、意識型態或決策過程。因此，關鍵在軍事力量投射的限制因素考慮下如何解讀地圖。中國大陸立場的轉變，從以往韜光養晦轉向為爭取主權與海權，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以及一連串軍事演習，引起美國與日本高度關注，也造成中日雙方發生軍機的對峙情勢，使得國際衝突危機逐漸升溫。近年來，中國機艦在周邊海域的活動紀錄已有明顯增加，有敵國化的趨勢，中國和日本衝突加劇，中國積極擴展海軍的打擊與投射能力，引發美、日等傳統海洋國家的關注。根據美國國防部的分析，中國海軍正積極展現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並爭取在台灣及中國周邊水域建立某種程度的「海洋控制」(sea control)。日本也高度重視中國海軍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擔心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會對日本的海上供給線造成威脅。日本是通過海洋尋求權力，中國是通過陸路進行擴張，哪一個會勝出呢？

馬漢認為透過海洋尋求權力較通過陸路更為明智的理由是經濟，而關鍵則是運輸，因為陸權所依靠的陸上運輸體系，無論從商業或戰略的觀點都不足以與海上運動相競爭，他在論述構成海權的第一個因素：「地理位置」時，特別強調海洋運輸的優勢，這也是馬漢的海權論最重要的推論依據。麥欽德注意到當時工業與鐵路的發展，鐵路同樣能提供大量運輸的能量；工業化及鐵路網的發展，將可迂迴海權，而對海權提出挑戰。1904年他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寫道：「不要到這世紀終了，整個亞洲就都會遍佈鐵路網，在俄羅斯帝國與蒙古之內的空間是如此巨大，其在人口、小麥、棉花、燃料、及金屬方面所具有的潛力，都是大到無法計算的程度。這必然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經濟世界，而是海洋商業所不能達到的」。中國重視鐵路網的發展、高鐵建設的輸出，被視為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原因。

日本的資源透過美國的海空能力即可獲得保障，其他海島國家的安全問題也無須透過和日本的合作。美國一開始不認為與蘇聯及中國接壤的陸地國家是可防守的，它因此偏好和離岸的海島國家合作。而戰後的日本則大致僅關注和美國的關係。

繼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亞洲已成為美國重新在全球實行「離岸平衡」大戰略的核心區域，應付中國崛起。不過，亞洲地區具備不少有利因素，有助美國實行該戰略。其一就是中國的軍力擴張，亞洲各國借助美國在平衡戰略保護自己國家利益。對美國而言重新建立一個有效的同盟體系、重整地區安全架構的多邊建制架構，是霸主應負的責任。亞洲的地緣環境，南海，美國運用其絕對的海上優勢——面對着美國海軍，中國海軍是無法抗衡的。假如美國能夠扶植越南、菲律賓這些較弱的國家成功抗衡中國，背後的象徵意義暗示中國無法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美國主持下的地區秩序還是不可能被挑戰的，美國在亞太實行「離岸平衡」戰略，加強美日聯盟，延續其全球霸權，日本是美國在亞洲實行「離岸平衡」戰略最忠堅的盟友。

日本和中國的競爭，戰略如何受美國的影響，轉往東南亞，中國一代一路的簡介及內容，是否因應地理鄰近性而使周邊國家強化集體安全措施？

鄧小平大戰略的目的使戰鬥行為減少到最低程度，避免正面衝突的作戰方式。積極的尋找資源，四大要點：避免衝突、建設綜合國力、逐步推進、維護穩定。武力攻打台灣需要時間建構綜合國力，中國崛起對於世界秩序的助益，提供不安穩、不平衡中提供改革的可能性，如果中國選擇武力，在傳統安全上著墨大於非傳統安全，挑戰以美國為霸主的舊有的秩序，必須達到和平崛起的條件否則無法和美國在綜合實力抗衡。國家外交的權衡取捨安全和權力。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會因中國崛起而改變。中國有中、長程目標，使用手段達成目標，集合軍事、經濟、外交手段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強權。中國的大戰略，保障其資源安全，才能贏得戰爭，塑造隨後的和平。

日澳戰略夥伴關係下的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

陳鼎尹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Abstract

日本與澳洲於 2007 年發佈〈安保聯合宣言〉後，陸續建立了外長與防長的部長級會議(two-plus-two)、簽署〈日澳情報協定〉(ISA)與〈日澳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在近十年所累積的信任與交往基礎上，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洲時，日澳簽署了〈日澳經濟合作協定〉(EPA)與〈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定〉，啟動了在政治與技術上具高度敏感性的蒼龍級潛艦(Soryu Class Submarine)合作計畫。日澳能發展成為當前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不僅是各自利益考量與背景的相似性，美國更扮演關鍵的角色。近二十年，基於亞太地區快速變遷的戰略環境，美國也調整了在東亞的安全架構，並以再平衡政策為軸心。除了調整既有的同盟架構，也透過三邊關係的發展因應潛在的事態，並透過同盟國間的橫向連結，使其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同樣作為美國盟友的日本與澳洲，一方面與美國簽訂新的安全條約，一方面也在美國的推動下形成美日澳三邊安全合作框架。因此，本文擬以美國再平衡政策下的日澳戰略夥伴關係，探討日澳蒼龍級潛艦合作的發展與意義。

關鍵字：美國再平衡政策、日澳戰略夥伴關係、蒼龍級潛艦

壹、前言

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洲，與澳洲總理艾伯特(Anthony John Abbott)簽署了〈日澳經濟合作協定〉(Japan-Australi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與〈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定〉(Transfer of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⁵³⁵在澳洲國會的演說中，安倍晉三強調兩國以建立特殊關係為目標，合作的領域則涵蓋了安全、軍事戰略與經濟。⁵³⁶而日澳元首高峰會後發佈的〈面向 21 世紀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中，澳洲明確表示支持和歡迎日本最近在安全政策的努力，支持日本提出的基於國際合作的積極和平主義，以及按照聯合國憲章相關原則行使集體自衛權。⁵³⁷其中的〈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定〉，不僅標示著雙方十年以來的安全與軍事合作的深化，主要的目的在於啟動日本與澳洲之間的蒼龍級潛艦(Soryu Class Submarine)輸出與合作計劃。

日本與澳洲於 2007 年發表〈安保聯合宣言〉後，陸續建立了外長與防長的部長級會議(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簽署〈日澳情報協定〉(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 ISA)與〈日澳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 ACSA)。⁵³⁸也是在近十年所累積的信任與交往基礎上，雙方也才得以啟動在政治與技術上具高度敏感性的蒼龍級潛艦合作計劃。然而，日澳之所以能發展成為當前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不僅是各自利益考量與背景的相似性，美國更扮演關鍵的角色。近二十年，基於亞太地區快速變遷的戰略環境，美國也調整了在東亞的安全架構，除了既有同盟架構的調整，也透過三邊關係的發展因應潛在的事態。同樣作為美國盟友的日本與澳洲，一方面與美國簽訂新的安全條約，一方面也在美國的推動下形成美日澳三邊安全合作框架。因此，本文擬以美日澳框架下的日澳戰略夥伴關係，探討日澳潛艦合作的發展與意義。

貳、背景—日本新外交策略與美國再平衡政策

從 1992 年日本首次海外派兵並與澳洲國防軍合作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日澳雙方已發展成為亞太地區繼美日之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潛艦合作既是雙方安全關係的里程碑，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架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澳戰略夥伴關係與潛艦合作能夠實現的，有兩個背景：後冷戰日本國家安全改革

⁵³⁵ 外務省，〈オーストラリア連邦アーカイブ〉，〈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bn_topic.html〉。

⁵³⁶ Cabine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Abe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July 8, 2014, 〈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407/0708article1.html〉。

⁵³⁷ MOFA, “Joint Statement with Prime Minister Abe-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8, 2014, 〈<http://www.mofa.go.jp/files/000044640.pdf>〉。

⁵³⁸ 外務省，〈オーストラリア連邦アーカイブ〉，〈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bn_topic.html〉。

下新外交路線，以及以因應中國為主的美國再平衡政策。

一、日本新外交策略

在和平憲法、二戰戰敗、民主化以及美日同盟等因素下，戰後日本外交政策有幾個的特點：強調經濟的手段與面向，並將安全的目的以經濟手段包裝。安全議題上高度依賴美國，不主張意見、不出風頭的低姿態等。⁵³⁹派爾(Kenneth B. Pyle)認為作為戰後外交主軸的吉田主義儘管強調和平，仍然是在操縱現實主義，惟依賴的工具由軍事轉換成產業、技術、跨國企業，目標是透過取得在不同層次、不同國家的市場的比較利益獲得國際權力。⁵⁴⁰伯格(Thomas Berger)指出大平正芳修正了吉田主義並提出廣博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概念，亦即透過各種攸關國家安全的非軍事政策來達到目標，包括物資儲備、推動成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以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促進經濟發展。⁵⁴¹然而，隨著日本國家安全改革的推進，將軍售作為外交策略的一部分，得以實現並逐漸嶄露頭角。從政治的角度，軍售將可以因應美日同盟架構的擴大，提升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上的主動性、與配合美日同盟轉型後的新分工。武器出口的解禁，對於原本就是具武器製造能力的日本，可以得到新的商業機會。休斯(Christopher W. Hughes)認為在國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國防工業往國際合作、出口、太空領域方向轉型的同時，日本也逐漸產生一個涵蓋官僚、軍方、產業的軍工複合體，⁵⁴²這會是日本推動軍售外交的國內因素。薩繆爾則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吉田主義務實派和反戰和平主義被邊緣化，使得日本在修正主義者的帶領下逐漸形成一個涵蓋安全、經濟與外交的新大戰略。⁵⁴³對這些修正主義而言，無論是基於產業技術發展、商業利益或自主生產而獲得安全，國防工業都是討論的焦點。⁵⁴⁴

日本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武器出口的接受者，美國也藉著涵蓋軍事基地使用權、武器維修與製造、產業科技等內容的武器外交途徑，維繫美日同盟對於日本的權力。⁵⁴⁵格林(Michael J. Green)與陳渥斯(Michael Chinworth)都認為，在美日同盟的

⁵³⁹ 豬口孝著，賴郁君譯，《經濟大國政治運作》(台北：月旦出版社)，頁 168。

⁵⁴⁰ 派爾稱之為經濟現實主義(Economic Realism)，他認為亦是吉田信條的展現。Kenneth B. Pyle,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U.S.: Perseus Books Group, 2007), pp. 256-262.

⁵⁴¹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275-281.

⁵⁴²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militarisation* (Routledge, 2009), pp. 14-19.

⁵⁴³ 薩繆爾定義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介於新軍事主義者(Neo-militarists)與重商現實主義(Mercantile Realists)之間，並在後冷戰時期逐漸以正常國家(Normal Nation)為訴求，追求在外交、軍事與安全保障等面向的政策與體制改革。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2007), pp. 13-37, 63-108.

⁵⁴⁴ 例如重新檢討武器裝備國產化政策、推動國際合作、武器出口甚至打破國內賣家獨佔的外包等議題。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8-184.

⁵⁴⁵ 美日同盟對於戰後日本的武器製造發展有兩個影響：日本國防工業的製造能量與技術的主要來源；在美日同盟的戰略分工下，日本的武器需求。美日雙方於 1954 年簽署了〈共同防衛軍援協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 MDAA)。透過共同防禦與軍援，美國因此得以協助日本

框架下，日本武器生產與美日產業科技相對實力、美日關係是完全脫離不了關係。⁵⁴⁶格林認為，由於美國是日本戰後武器製造與技術的單一來源，因此日本戰後國防工業的發展，是一個在美日同盟政治架構下追求自主性的冗長過程。⁵⁴⁷陳渥斯指出，日本過去透過美日安全關係獲得許多經濟與科技上的好處，但隨著相對產業能力的改變，美國在 80 年代之後越來越強調相對應的經濟與科技利益。在新的環境下找到新的武器合作模式，並確保雙方能因為安保條約彼此的獲利可以符合兩國利益成為主要的重點。⁵⁴⁸無論是科技換科技或者共同研發，每一個武器合作方案都需要仔細檢視對美日同盟關係的可能影響。⁵⁴⁹因此，武器外交可能背離過去吉田原則下的和平主義外交路線——在修正主義者的帶領下，日本「和平主義外衣」已經被漸進戰術(Salami tactics)所攻破，在國際安全與軍事上的主動性也越來越大。⁵⁵⁰隨著安全改革而得以實現的武器外交，使得日本能夠推動積極和平主義與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但同時也將擴大日本之於東亞區域的戰略意義、並成為影響變動中區域權力平衡的自變數。

二、美國再平衡政策

第二個背景，是美國以因應中國軍力崛起為主要目標的再平衡政策。中國海空軍實力與規模快速成長的趨勢，⁵⁵¹逐漸改變亞太地區的戰略環境，並挑戰美國西太平洋海權。因此歐巴馬政府就任後，陸續提出相關的亞洲政策。2009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在記者會上宣布「美國重返亞洲」⁵⁵²；2010 年 10 月，希拉蕊又宣布將美國對亞洲的外交定位為「外交前進部署」(forward-deployed

發展國防裝備的生產計畫，方式則有授權製造、軍售、科技移轉等。到了 1980 年代，實際上日本已是所有美國盟友中透過授權製造獲利最大的國家。授權製造在 1980 年代末期達到高峰，當時最大的項目是包含所有軟硬體授權與移轉的愛國者地對空飛彈生產計畫。然而，美日武器合作同時牽涉到防衛與經濟兩個政策領域，並延伸至科技與貿易因素。隨著日本經濟的在 1960 年後之後的快速成長，武器合作的敏感性與重要性也越來越高。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388-393.

⁵⁴⁶ Michael J. Green. *Arming Japan: Defense Production,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Search for Aut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7-259.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387-407.

⁵⁴⁷ Michael J. Green. *Arming Japan: Defense Production,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Search for Aut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7-259.

⁵⁴⁸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406-407.

⁵⁴⁹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406-407.

⁵⁵⁰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2007), pp. 86-94.

⁵⁵¹ 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在 2070 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國防支出自然也將相應增長。二十年後，中、美、日三國國防經費的估計值分別為 1.06 兆、0.85 兆與 0.08 兆美元。The Tokyo Foundation,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 China: Integration, Balancing, and Deterrence in the Era of Power Shift", The Tokyo Foundation, Oct.2011.

⁵⁵² "U.S. 'is back' is Asia,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Daily News, July 21, 2009,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world/u-s-back-asia-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declares-article-1.429381> >

diplomacy) — 「把全方位的外交資源 — 包括我們最高級別官員、發展專家處理各種緊迫問題的團隊 — 都派遣至亞太區域每個角落和首都。⁵⁵³2011 年 11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夏威夷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亞太的重要性，國務卿希拉蕊則在會前會提出「亞洲軸心」(pivot to Asia)的概念⁵⁵⁴。此外，儘管關注的程度與面向不一，但中國已成為美日澳三國戰略與國防政策的重心之一。美國方面，2010 年 2 月公布的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中指出，雖然美國樂於見到中國崛起的正面影響，但由於軍費與決策過程的不透明，卻也使得中國在亞洲及全球的行為與動向有著合法性的問題。⁵⁵⁵2012 年 6 月 3 日閉幕的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會(The Shangri-La Dialogue)上，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Panetta)提出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US Rebalance to Asia)，指出美國將在 2020 年前向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戰艦，屆時將 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⁵⁵⁶2014 年 QDR 亦提出，中國除了持續利用反介入與區域阻隔 (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A2/AD) 的方式刺探美國的實力，也使用新的網路戰與網路控制科技。⁵⁵⁷美國的盟友日本與澳洲，對於至中國的崛起與威脅也都反映在各自的官方文件中。

日本在 2010 年 12 月公佈的〈防衛計畫大綱〉中指出 2004 年以來中國就是日本周邊安全環境的最大潛在威脅，理由是軍費快速成長、頻繁的海洋活動以及遠海作戰能力的提升。2013 年版的〈防衛計畫大綱〉首先就指出中國大幅增加的國防經費以及快速成長的軍事實力，加上在東海、南海持續以軍事活動試圖改變現狀，並入侵日本領海與領空，是日本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強烈隱憂。⁵⁵⁸2009 年澳洲國防部公佈的國防白皮書亦指出中國過去十年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崛起以及軍事現代化，將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造成顯著的影響。⁵⁵⁹美國的再平衡等亞洲政策除了是因應中國的崛起、快速變動的亞太安全環境，另一因素則是國防預算的縮減。由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架構主要透過軍事合作、兵力部署來維繫，若要在兵力調整乃至縮減的情況下維持既有的嚇阻效果，就需要盟國承擔更積極的角色，這就是美國近年致力於推動以多邊關係補足雙邊關係、鼓勵三邊關係下

⁵⁵³ “Hillary Clinton on U.S. in Asia: 'Forward-Deployed'”, WBUR, October 29, 2010, <<http://onpoint.wbur.org/2010/10/29/clinton-asia-diplomacy>>

⁵⁵⁴ Wu Jiao, “‘Pivot to Asia’ sidelined by US domestic woes”, China Daily, October 7, 2013,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10/07/content_17012099.htm>.

⁵⁵⁵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p. 1-105.

⁵⁵⁶ “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Leon Panetta”,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12,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ld12-43d9/first-plenary-session-2749/leon-panetta-d67b>>.

⁵⁵⁷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rch 7, 2014, pp.4-41,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⁵⁵⁸ 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防衛省，《平成 26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⁵⁵⁹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CDG/Document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盟國橫向聯繫與軍事合作的主因。⁵⁶⁰

參、日澳戰略夥伴關係

日本與澳洲都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重要的戰略夥伴，各自也面對中國崛起為主的安全環境變遷，因此無論是從美國或者日澳兩國本身的立場，美日澳與日澳關係都有強化的理由，而前者（美日澳）又是後者（日澳）的前提條件。美國與澳洲的同盟關係（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NZUS），以及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皆始於 1951 年。在冷戰時期，日澳兩國皆是美國單邊主義輪軸式(hub and spokes)系統安全架構的成員，惟彼此沒有橫向連結。但是後冷戰時期安全環境的改變，美國對同盟關係架構的調整以及日本本身的改革，使得極富戰略意義的日澳潛艦合作有實現的條件。以下以美日澳三邊安全框架為先，繼而討論日澳戰略夥伴關係。

一、美國為首的三邊安全框架

美日關係是美國在東亞推動多邊安全關係的基礎與前提，例如 Mataka Kamiya 認為東京與華盛頓都不斷在摸索如何使同盟的功能可以更符合東亞安全環境的新需求與挑戰。⁵⁶¹第一是美日必須在多邊與雙邊下重新定義關係，以因應快速發展的區域安全合作；第二，需要重新協商各自的負擔與分工。⁵⁶²薩繆爾認為，美國在 2001 年 11 月宣布軍力轉型(force transformation)計畫後，表示美國將採取更靈活的全球姿態，而原來的正式盟友框架會被更多的、非正式的自願聯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所補充，就像伊拉克戰爭表現的那樣。美國正使用市場化(marketizing)的方式對待自己的盟友，亦即盟國可以通過共同安全做出貢獻來換取應有的地位。⁵⁶³克利史汀森(Christensen)則認為而美國及美日聯盟扮演了穩定閥的角色，可以避免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風險下東亞國際情勢的緊張與升高。⁵⁶⁴然而這個「裁決者（機制）」(arbiter)是有矛盾的，華盛頓一方面希望日本能承擔更多責任，但又希望在日本的美軍是確保(reassurance)該區局勢的主要力量。⁵⁶⁵在這兩個矛盾的目標之下，美國鼓勵日本發展或扮演一個非攻擊性的角色(non-offensive roles)，以備能在發揮安全上的作用時不至於對鄰國產生威脅性，

⁵⁶⁰ 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⁵⁶¹ G. John Ikenberry &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 - 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91

⁵⁶² G. John Ikenberry &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 - 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91

⁵⁶³ 經過同盟漂流期的互相摸索，雙方在 1996 年 4 月達成共識，即加強同盟關係讓盟友感到安心。但這些互動在 911 後產生變化。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2007), p. 82

⁵⁶⁴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26.

⁵⁶⁵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26.

避免升高安全困境的情勢。⁵⁶⁶Yuki Tatsumi 認為，面對亞太地區的新威脅、挑戰，美國調整冷戰時期的單邊安全關係，通過三個或四個參與國形成少邊(minilaterals)戰略合作框架，補充與擴大既有作的雙邊聯盟。⁵⁶⁷例如為因應朝鮮問題，美國所推動美日韓情報合作，三國已於 2014 年達成情報分享協議的共識。⁵⁶⁸然而由於日韓之間存在著歷史與領土問題，美日韓三邊安全關係的發展與制度化過程遠不及美日澳與日澳三國來得完整與迅速⁵⁶⁹。

Yuki Tatsumi 並指出，從 2006 年建立三邊安全對話(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TSD)以來，美日澳已經發展成為華府在亞太地區最具廣泛性與穩定性的合作關係，遠勝於該區域任何其他三邊關係。早在 2002 年時，美日澳三國就舉行過外交次長級戰略對話，⁵⁷⁰當時主要的時空背景 911 後的全球反恐戰爭。2006 年，美國國務卿賴斯、澳洲外商事務部長約翰唐納與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於澳洲雪梨舉行了首屆部長級三邊安全對話，是三邊安全關係真正制度化的開端。⁵⁷¹2007 年是日澳關係同盟化的起點，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與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簽署了〈日澳安保聯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JADSC)，並建立了日澳 2+2 機制。⁵⁷²日澳之間安全關係的推進不能僅從雙邊的角度來看，而是使得美日、美澳兩組同盟關係的缺口—日澳安全關係可以補起來，形成完整美日澳三邊安全關係。從美國的角度，其主導下橫向連結可以發揮更多元、廣泛的安全功能，從日本的角度，則是發展成以美日同盟為首、多邊多層安全框架(Strategic domain-oriented multilateral and -layer)的起始點。⁵⁷³2007 年，美日澳三國亦開始進行軍事聯合訓練與演習（2012 年起稱為 Pacific Bond），演訓科目有反潛、防水面、戰術與通訊。⁵⁷⁴2011 年，美日澳設立了年度的安全與防衛合作論壇(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Forum, SDCF)，內容有人道援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救災(disaster relief)、維和行動

⁵⁶⁶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26.

⁵⁶⁷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15-20.

⁵⁶⁸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15-20.

⁵⁶⁹ Yusuke Ishihara, "Japan-Australia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U-NIDS Joint Research: Beyond Hub and Spokes*, Tokyo: NIDS, No.32, March 2014, pp. 93-122.

⁵⁷⁰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15-20.

⁵⁷¹ 外務省，〈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を実施するための行動計画の主要な要素（仮訳）〉，〈外務省〉，2007 年 9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0709_kk.html>。

⁵⁷² 外務省，〈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を実施するための行動計画の主要な要素（仮訳）〉，〈外務省〉，2007 年 9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0709_kk.html>。

⁵⁷³ 美日同盟的多邊多層的概念由郭育仁教授所提出。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⁵⁷⁴ Maritime Staff Office, "Participation in Japan-US-Australia Joint Exercise" Notice, June, 2013 <<http://www.mod.go.jp/msdf/formal/info/news/201306/062001.pdf>>。

支援(peacekeeping support)與建立海上能力(and maritime capacity building)⁵⁷⁵。此外，美日澳三國也利用國際會議時舉行小型對話(Side-talk)，例如香格里拉會議、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二、日澳安全關係的制度化

2012 年安倍晉三執政前

日澳兩國的安全合作是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透過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框架來進行。1992 年 6 月，日本通過了《國際和平合作法》(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Law, IPCL，通稱聯合國維和行動法)，旋即於該年 10 月派遣自衛隊赴海外參與非戰鬥維和行動，⁵⁷⁶此為日澳間第一次軍事合作。⁵⁷⁷之後兩國皆有參與的維和行動有 2000 年的東帝汶維和行動，2004 年 12 月印度洋大海嘯後的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援(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2005 至 2006 年在伊拉克的重建工作的合作。⁵⁷⁸2011 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後，澳洲派遣了三架 C-17 運輸機到日本，協助運送搜救隊、援助物資、遠端控制水泵以及陸上自衛隊第十五旅團人員(JGSDF 15th Brigade)。⁵⁷⁹澳洲投入救災的部隊規模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⁵⁸⁰這些實際合作促進了兩國安全合作的關係，也為正式的雙邊協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礎。2003 年，日澳簽署〈日澳在國際反恐鬥爭中合作的聯合聲明〉(Australia-Japan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to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⁵⁸¹是兩國安全合作制度化的第一步。2006 年美日澳部長級安全對話之後，日澳於 2007 年 3 月簽訂了 JADSC，是雙方同盟化的起點。JADSC 提出的合作領域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WMD proliferation)、國際維和、防衛交流、搜救與和參與〈防擴散安全倡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PSI)，是軍事合作的深化。⁵⁸²同年 6 月，日本和澳洲仿效日美的 SCC 建立了外長與防長會議，並簽訂〈綜合性戰略，安全性和經濟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此外，日本與澳洲已有在印度洋與南海情報分享、PSI 以及預防海盜等活動的合作共識。日本和澳洲將整合進美國戰略導彈防禦的全球和區域戰略，澳洲並透過北領地的地面站將偵測到的飛彈發射資訊（原始數據由

⁵⁷⁵ U.S.-Australia-Japan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Forum,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U.S.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22, 201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10/233252.htm>>.

⁵⁷⁶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 196

⁵⁷⁷ Yusuke Ishihara, "Japan-Australia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U-NIDS Joint Research: Beyond Hub and Spokes*, Tokyo: NIDS, No.32, March 2014, pp. 93-122.

⁵⁷⁸ Yusuke Ishihara, "Japan-Australia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U-NIDS Joint Research: Beyond Hub and Spokes*, Tokyo: NIDS, No.32, March 2014, pp. 93-122.

⁵⁷⁹ Yusuke Ishihara, "Japan-Australia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U-NIDS Joint Research: Beyond Hub and Spokes*, Tokyo: NIDS, No.32, March 2014, pp. 93-122.

⁵⁸⁰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NID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2* (Prime Station, 2013), pp. 92-93.

⁵⁸¹ MOFA, "Australia-Japan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to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July 6, 2003,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pmv0307/terrorism.html>>.

⁵⁸² MOFA,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March 13,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3.html>>.

美國衛星所提供)給日本。⁵⁸³2010年,日本和澳洲簽訂〈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議〉,以擴大兩國的安保合作關係。⁵⁸⁴澳大利亞是繼美國之後,與日本簽訂這項合作協議的第二個國家。2012年,日本與澳洲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⁵⁸⁵2012年的2+2會議概要指出,由於日本已於2011年放寬了防衛裝備品海外轉移的相關規定,⁵⁸⁶將有助於日澳兩國在國防工業與科技方面的合作,同時也確立了防衛省技術研究本部(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TRDI)與澳洲防衛科學技術組織(The 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DSTO)關係的深化。⁵⁸⁷在2012年安倍執政前,日本與澳洲已經以JADSC為基礎,建立了2+2對話機制、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議與情報分享,並透過政府的機構開啟在國防工業的交流與合作。

2012年安倍晉三執政後

安倍晉三於2012年12月就任首相後,在外交與安全兩方面都有積極的行動,而這兩個領域的政策使日本與澳洲之間更大範圍的安全合作成為可能。在外交方面,安倍政府以「地球儀外交」與重新強調美日關係作為主軸。⁵⁸⁸前者是積極出訪各國並依據不同的戰略目標建立明確的合作領域,例如日俄之間的領土、能源、戰略,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戰略與經濟,與歐盟之間的預防外交,與印度的戰略、經濟,與中東的能源等等。⁵⁸⁹外交的第二項,是重新強調美日同盟關係的重要性。安倍就任後的第二個出訪地即是美國,並獻上美國期待的大禮—日本即將加入TPP談判。⁵⁹⁰2013年10月3日,美日在東京召開2+2會議,討論於2014年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事宜。⁵⁹¹在拓展地球儀外交的同時,安倍也推動了一系列國家安全相關的政策。2013年11月27日,日本通過設立「國家

⁵⁸³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militarisation* (Routledge, 2009), pp. 89-92.

⁵⁸⁴ MOFA, "The Signing of the Japan-Australia 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ACSA)", May 19, 2010, <http://www.mofa.go.jp/announce/announce/2010/5/0519_02.html>.

⁵⁸⁵ MOFA, "Signing of the Japan-Australia 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 (ISA)", May 17, 2012, <http://www.mofa.go.jp/announce/announce/2012/5/0517_01.html>.

⁵⁸⁶ Cabine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Statement by th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On Guidelines for Overseas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etc.", December 27, 2011, <http://japan.kantei.go.jp/noda/topics/201112/20111227DANWA_e.pdf>.

⁵⁸⁷ MOFA, "4th Australia-Japan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tralia and Japan – Cooperating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Common Vision and Objectives", September 14, 2012,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pdfs/2plus2_1209.pdf>.

⁵⁸⁸ 郭育仁,〈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策略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46期,2014年4月,頁43-64。

⁵⁸⁹ 為重建民主黨時期留下的外交殘局,安倍甫就任即積極出訪,從2013年1月16日出訪越南、泰國、印尼,到11月17日出訪寮國,一年內就訪問了25個國家與迎接8個國家的赴日訪問。郭育仁,〈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策略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46期,2014年4月,頁43-64。

⁵⁹⁰ 郭育仁,〈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策略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46期,2014年4月,頁43-64。

⁵⁹¹ 外務省,〈より力強い同盟とより大きな責任の共有に向けて(仮訳)〉,《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閣僚会合)等の開催》,2013年10月3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6027.pdf>>。

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的相關法案，⁵⁹²接著在 12 月制定了《特定秘密保護法》、⁵⁹³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⁵⁹⁴和〈防衛計劃大綱〉。⁵⁹⁵其他完成有〈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2014 年 4 月)、行使集體自衛權(2014 年 7 月)，持續推動中的有增設安保大臣、將現有武器開發單位整合的防衛裝備廳以及修改自衛隊法。外交上的積極作為與國家安全改革，將賦予日本政府在外交、安全與軍事事務上有更大的空間與更多的政策手段，成為美日澳三邊與雙邊⁵⁹⁶安全關係的推進的基礎。

2013 年 10 月，美日澳藉由 APEC 高峰會的機會進行第五次三邊戰略對話部長級會議，安倍晉三執政後日澳元首初次會面。10 月 4 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美國國務卿凱瑞(Kerry)和澳洲外長畢曉普(Julie Bishop)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反對任何有可能改變東海現狀的強制性、單方面的行動，同時要求中國與東協部分成員國儘管在南海有主權之爭，仍必須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與相關的國際法。⁵⁹⁷2014 年 4 月，澳洲總理艾伯特訪問日本。雙方在高峰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兩國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下，享有維護共同價值觀⁵⁹⁸的利益，並尋求在維護地區和國際社會和平穩定與繁榮的目標，維護貿易自由和海上、空中航線暢通無阻。⁵⁹⁹2014 年 6 月，由日澳雙方外長與防長參加的日澳第五次 2+2 會議就雙方在防衛裝備和技術領域的合作達成實質性共識。為因應將來的潛艦合作，兩國將啟動在船舶流體力學(marine hydrodynamics)方面共同研究，並將此作為日澳防衛裝備聯合開發的初始領域(initial are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⁶⁰⁰2014 年 7 月，安倍訪問澳洲，並成為二戰後第一個在澳國會發表演講的日本

⁵⁹²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隨即於同年 12 月 4 日成立。內閣官房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準備室，〈「國家安全保障會議」について（説明資料）〉，《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kaigi/konkyo.html>>。

⁵⁹³ 內閣官房特定秘密保護法施行準備室，〈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説明資料〉，《首相官邸》，2013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kantei.go.jp/jp/pages/tokuteihimitu.html>>。

⁵⁹⁴ 內閣官房，〈國家安全保障戰略について〉，《內閣官房》，2013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⁵⁹⁵ 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提出了一個基本理念—從過去一貫的消極和平主義(Passive Peace)向以國際協調主義為基礎之積極和平主義的轉型。內閣官房，〈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概要）〉，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⁵⁹⁶ 美日關係、日澳關係。

⁵⁹⁷ 外務省，〈第 5 回 日米豪閣僚級戰略對話(TSD)概要〉，《會談・訪問》，2013 年 10 月 4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462.html。〈共同ステートメント(英文)〉，《第 5 回 日米豪閣僚級戰略對話(TSD)概要》，2013 年 10 月 4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6195.pdf>>。郭育仁，〈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策略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 4 月，頁 43-64。

⁵⁹⁸ 共同價值觀指的是民主、人權、法律規則、開放的市場和自由貿易秩序。外務省，〈日豪首腦會談に関する共同プレス発表〉，《外務省》，2014 年 4 月 7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802.pdf>>。

⁵⁹⁹ 外務省，〈日豪首腦會談に関する共同プレス発表〉，《外務省》，2014 年 4 月 7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802.pdf>>。

⁶⁰⁰ 外務省，〈第 5 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共同プレス発表（仮訳）〉，《外務省》，2014 年 6 月 11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1605.pdf>>。

領導人。兩國簽署的日澳〈面向 21 世紀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明確表示要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新型特殊戰略夥伴關係」。澳洲在聲明中表示支持和歡迎日本最近在安全政策和法律解釋方面作出的努力，支援日本提出的基於國際合作的積極和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及按照聯合國憲章相關原則行使集體自衛權。⁶⁰¹聲明中也提到日澳兩國在兩用科技方面的合作，第一是太空領域與資通訊技術(ICT)的合作，並建立 ICT 事務的政策對話，第二是透過準天頂衛星系統(Quasi-Zenith Satellite System, QZSS)推動空間資訊計畫(Geospatial Information Project)。隨後，日澳簽署了〈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定〉(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進一步明確雙方軍事合作關係的具體事項。協議規定：一方沒有獲得另一方的事先同意，不得將兩國間聯合研究、開發和生產的軍事裝備和技術向任何協力廠商再次轉移；成立日澳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負責商討決定屬於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的相關項目。⁶⁰²該協議確立了日澳兩國今後進一步擴大、深化聯合研究、開發和生產軍事裝備和技術的法律框架和依據，安倍稱此防衛裝備協定為日澳「邁出載入我們兩國史冊之特殊關係的第一步」(That will make the first cut engrav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our future history)。⁶⁰³

肆、日澳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

在以上美日澳三邊安全合作框架、日澳戰略夥伴關係與日本外交新策略的背景之下，澳洲購買日本蒼龍級潛艦的交易成為可能，其意義也超過澳洲基於個別自衛權的戰略考量，而擴及美日為中心的區域安全架構、針對中國的避險策略、日本武器出口、日本與澳洲的國防工業、潛艦技術、地緣政治等面向。換言之，日澳的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牽涉面向是綜合性的，以美國的安全框架為上層結構，將南海、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權與美國、日本、澳洲、中國的區域權力競逐聯繫在一起。以下分從澳洲的戰略考量、美日為中心區域安全合作的強化、日本外交新策略、日澳國防工業合作基礎與分歧四點說明之：

一、因應現勢的澳洲戰略考量

澳洲皇家海軍(Royal Australian Navy)現役為六艘柯林斯級(Collins class)柴電潛艦，惟基於以下理由，於 2007 年開始推動研擬新一代柴電潛艦的計畫。柯林斯級為主要技術來自瑞典、澳洲國產自製的柴電潛艦，自 1990 以來建造了六艘，但問題層出不窮：從建造過程、應用、引擎、燃料、戰鬥系統到船體設計，以及

⁶⁰¹ 外務省，〈安倍總理とアボット首相共同声明“21 世紀のための特別な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2014 年 7 月 8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1605.pdf>〉。

⁶⁰² 外務省，〈防衛裝備品及び技術の移転に関する日本国政府とオーストラリア政府との間の協定〉，《外務省》，2014 年 7 月 8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4421.pdf>〉。

⁶⁰³ 安倍晋三，〈豪州国会両院総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演説〉，《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0708australia_enzetsu.html〉。

良率低、噪音大的致命缺點。因此新計畫中希望建造新的潛艦來取而代之。⁶⁰⁴第二，中國急速擴張的海空能力已對澳洲形成威脅，根據澳洲潛艦中心(Submarine Institute of Australia)的報告，印度、中國與印尼都在擴張潛艇艦隊的規模，到了2025年亞太地區將會部署超過130艘現代潛艦(美國與澳洲的潛艦未計算在內)，⁶⁰⁵因此澳洲也需要因應此形勢提高潛艦規模與反潛能力。第三，澳洲海岸線很長，並需要進行西太平洋長期監視行動的任務，前述的趨勢使得澳洲需要更大噸位、續航力更遠的潛艦。⁶⁰⁶2009年澳洲國防部公佈國防白皮書—〈武力2030：在亞洲太平洋防衛澳洲〉(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中指出，現有六艘潛艇的規模將增加到十二艘，並從2025年起陸續替換掉現役的柯林斯級潛艦。白皮書確定了澳大利亞的戰略利益為：(1)澳大利亞的防禦，(2)周邊國家的穩定，(3)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4)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澳洲國防軍(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DF)必須透過海權來維持四個主要的戰略利益，而潛艇則是維持海權的關鍵。⁶⁰⁷

飯田將史表示，從海權的角度，日澳潛艦合作、澳洲擴大與提升潛艦能力，是澳洲反制中國在其周圍海域從事軍事活動最好的措施，依序是南海、印度洋與南太平洋國家。這是澳洲需要增加海空能力構築的主因，特別是潛艇能力。⁶⁰⁸香田洋二(前海上自衛隊司令官)表示，為了構築足夠的海空能力，澳洲新型潛艦需要能配合F/A-18E/F戰機(將來則是F-35)，以實現反潛戰、布雷艇、對地攻擊、戰略監視偵察、特殊作戰支援等目標。因此，香田洋二認為澳洲新潛艦需要的規格有：4000噸排水量、美國的戰鬥指揮系統、魚雷、巡弋飛彈、航行距離一萬兩千公海里，而滿足這個嚴格要求的潛艦只有日本的蒼龍級。⁶⁰⁹目前除了日本之外，德國與法國亦表示興趣並提出造艦計畫，但德國、法國雖具有建造能力，但由於兩國的戰略目標以沿海防禦為主，因此未建造過這樣噸位的柴電潛艦，目前只有設計圖和構想。⁶¹⁰此外，蒼龍級潛艦在戰場管理與武器系統方面的技術源

⁶⁰⁴ 蒼龍和澳洲柯林斯級對比，日本的比較好。柯林斯有很多問題，有時候他們會希望中止建造。山崎元泰，〈「そうりゅう」型潜水艦の輸出実現に向けて：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は新たな時代へ〉，《改革者》，56(1)，2015年1月，頁42-45。

⁶⁰⁵ Submarine Institute of Australia, "Maximising Strategic Options in Constrained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The Future Underwater Warfare Capability- Australia's Strategic Sting", December 30, 2007, <http://www.submarineinstitute.com/userfiles/File/RAN_Seapower_Conference_2008_-_SIA_Paper_Final.pdf>.

⁶⁰⁶ 山崎元泰，〈「そうりゅう」型潜水艦の輸出実現に向けて：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は新たな時代へ〉，《改革者》，56(1)，2015年1月，頁42-45。

⁶⁰⁷ Australia DOD,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CDG/Document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⁶⁰⁸ 陳鼎尹，當面訪談，飯田將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京)，2015年7月17日。

⁶⁰⁹ 這樣潛艦的推進方法，為了延長航行距離，需要AIP系統或梨電池。香田洋二，〈策定から1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年4月，頁10-13。

⁶¹⁰ 山崎元泰，〈「そうりゅう」型潜水艦の輸出実現に向けて：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は新たな時代へ〉，《改革者》，56(1)，2015年1月，頁42-45。

是美國，但這樣的規格與裝備通常是裝設在更大的潛艦上。⁶¹¹換言之，為了實現澳洲新潛艦在噸位與武器方面的需求，製造商、製造過程必須與美國海軍、美國軍工業緊密的合作。加上前面所回顧的日美澳三邊安全框架、日澳戰略夥伴關係，使得日本蒼龍級潛艦無論基於自身國與同盟戰略需求、技術合作的政治前提與三國外交關係，是惟一符合全部條件的。⁶¹²

二、美日為中心區域安全合作的強化

除了前述澳洲本身基於個別自衛權的戰略考量，澳洲購買蒼龍級旗艦的計畫亦與與美國、日本安全關係擴大相輔相成，得以強化以美日為中心之區域安全合作，涵蓋了美國再平衡政策、美日同盟轉型與針對中國避險策略等面向。美國的再平衡政策，軍事面美軍為：存在、介入、戰略推進。美國一方面保持之於中國在軍事面的優越性，一方面強化同盟的合作—調整與盟國的雙邊安全關係，並積極推動同盟國之間的橫向連結。⁶¹³近年快速發展的日澳關係，以及日澳各自與美國半世紀以來的同盟關係，就成為同盟國橫向連結最主要對象。第二，日澳的戰略夥伴關係的推進與美日同盟朝向多邊的擴大、轉型，是相輔相成的，在日本2013年〈防衛計畫大綱〉與2015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都可以看到這個政策趨向。日本2013年〈防衛計畫大綱〉中提到，「美日同盟公共財」因為當前國際環境的改變，開始調整其安全合作模式，從過去的雙邊擴及多邊，並以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為主。⁶¹⁴而從日澳關係的演進可以清楚得知，其所強調的海上能力、情報、太空與網路等領域，也都是近年日澳安全合作的重點。2015年4月公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提出了雙邊合作無縫(seamless)、健全(robust)、彈性(flexible)與有效雙邊回應(effective bilateral responses)等關鍵詞，這些構成美日因應中國乃至全球的安全事件的基礎，且即使無害於日本安全，美日同盟都可以發揮影響力。⁶¹⁵

準此，日美澳、日美的安全合作框架，賦予了日澳潛艦計畫更廣泛的意義與

⁶¹¹ 艦装（ぎそう）。香田洋二，〈策定から1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年4月，頁10-13。

⁶¹² 香田洋二，〈策定から1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年4月，頁10-13。

⁶¹³ 香田洋二，〈策定から1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年4月，頁10-13；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年11月5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⁶¹⁴ 在2010的《防衛計畫大綱》中，指出美日防衛合作的框架從過去的雙邊擴及多邊（國），例如美日韓、美日澳。到了2013《防衛計畫大綱》，又加入了美日印。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年11月5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⁶¹⁵ 主要目標包含了灰色地帶(Gray-Zone Coercion)、安全承諾與衝突管理、集體自衛權與全球合作等等。此外，新指針也取消了派遣自衛隊的地域限制，一旦第三國攻擊，日本自衛隊可以在全球範圍與美軍合作。外務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外務省》，2015年4月27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7.pdf>。

戰略意涵。若日澳兩國都使用蒼龍級潛艦，則意味著海上自衛隊跟澳洲海軍擁有統一的平台，提升相互運用性，對美國來說可以更好發揮三國的海上協同作戰，以助美國海軍部隊並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而這也是為何日澳合作可以強化以美國為中心之區域安全體制的理由。⁶¹⁶山崎元泰則指出，基於財政原因，美國將會減少潛艦數量，若日澳使用同型潛艦，將可以更好地配合美國核潛艦推動牽制中國的策略。飯田將史指出，雖然解放軍海軍在快速擴張規模，但是反潛能力仍落後美日，因此美日澳安全框架之下的蒼龍潛艦計畫，不僅是反制中國海軍反潛戰的最好的手段，更能提高日澳戰略合作和強化區域美日澳三邊聯盟，將有助於南海和東亞的穩定。⁶¹⁷渡部恒雄則認為日本推動的包含潛艇在內的雙邊與多邊安全合作（美國、澳洲、印度），是一種避險與交往並行的中國策略，不是圍堵也沒有因為軍事戰略上的對峙放棄經濟利益（交往），而是要傳遞中國這個訊息一片面透過武力改變現狀的成本會愈來愈大，並避免與中國的安全困境。⁶¹⁸準此，在日澳安全關係的深化以及日本武器出口政策改革後可能實現的日澳潛艦合作，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可視為配合美日同盟走向多邊多層、實現與各國不同目的與內涵的新安全合作⁶¹⁹的重要手段。第二，日澳潛艦合作連結了美日安保條約與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使兩者可以在美國的領導下發展成更廣泛與綜合性的安全架構。

三、日本新外交策略

日本過去在武器出口禁令的限制下，美國幾乎是唯一的武器貿易國，日本也無法透過軍事合作或武器輸出來強化雙邊關係。⁶²⁰換言之，和平憲法與美日同盟形成的框架雖然給戰後的日本帶來了相對自外於國際政治上的獨立性與安全，但也使得日本國際地位與外交政策受到限制，軍事與外交上的自主性更一直是日本被貼上非正常國家(The abnormal state)標籤的主要因素。但是日本政治在修正主義路線的調整之下，放寬武器出口政策(2011年)、制定通則性武器轉移規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2014年)與允許非軍事領域援助的ODA大綱調整(2015年)逐步實現，使得日本外交政策操作越來越靈活與擴大範疇。除了與澳洲的蒼龍級潛艦絕氣動力裝置(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 AIP)的技術移轉、共同研究，⁶²¹

⁶¹⁶ 與德法合作的話，那時候對美國最大同盟夥伴的日本，沒有 framing（之外），可以因為日豪合作而強化。香田洋二，〈策定から1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年4月，頁10-13。

⁶¹⁷ 當然解放軍在努力提高反潛能力，但需要成本和時間，缺少經驗並需要相關的合作。因此這是美日澳發展潛艇來制約中國海軍的動力。因此美國需要維持足夠的潛艇來反制中國海軍成長的影響。陳鼎尹，當面訪談，飯田將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京），2015年7月17日。

⁶¹⁸ 陳鼎尹，當面訪談，渡部恒雄，東京財團（東京），2015年7月21日。

⁶¹⁹ 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年11月5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⁶²⁰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4卷第3期，2013年7月，頁1-54。

⁶²¹ 外務省，〈オーストラリアン紙（豪州） 安倍総理大臣書面インタビュー〉，《外務省》，2014年7月8日，<<http://news.nna.jp/free/news/20130312aud002A.html>>。

向印度出售 US-2 運輸機、⁶²²透過對外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向菲律賓提供海上保安廳的二手巡邏艦並協助構築情報通訊系統、⁶²³與英國的導彈技術共同研發、與法國的水下無人機(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UUV)合作計畫都在進行中。因此，開放武器出口後日本得以實現的軍售，將可以提升日本與盟國、友好國家間的關係與影響力，並擴及到更大的軍事戰略的意義。武器所導致的國際政治效果可能擴及到更大的政治與經濟層面，亦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⁶²⁴

在這些日本與各國的國防工業與科技的跨國合作案例中，無論是從規模、金額、牽涉之科技與政治敏感性，高達一百億美金的日澳潛艦合作案無疑是最受矚目的。⁶²⁵除了澳洲之外，同樣著眼於因應中國海軍擴張趨勢的馬來西亞、印度、印尼等國家，也開始通過管道秘密和日本開始接觸，探詢購買潛艦或取得相關技術的可能。⁶²⁶神保謙認為雖然日本的軍售外交尚在萌芽階段，但是在未來會是一個很強大的手段，而與澳洲、印度和菲律賓的軍售將有助於日本掌握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海上航線的情報與相關參數，是日本提升海權的大戰略。⁶²⁷他並進一步指出，日澳安全合作未來會因為潛艦計畫逐步實現水下合作(underwater cooperation)、聯合情報監視偵察(Joint ISR)與反潛作戰(ASW)。⁶²⁸這些也都已經在前述日澳安全合作的議程之中。日本透過與菲律賓、越南的能力建構計畫預防中國主導區域權力平衡，實際上，澳洲因為輸入蒼龍級潛艦而提升的水下與反潛能力、強化與日本的海上合作，也是類似的概念。然而，雖然武器出口擴大了日本外交的範疇，提高其在國際政治、安全政策、地緣戰略與產業經濟等面向的影響力，卻也同時增加了日本外交操作的複雜性，可能加深了鄰國對日本的疑慮、複雜化東亞區域權力鬥爭安全困境，日本國內社會的反戰意識形態也是變數之一。

629

⁶²² 外務省，〈マンモハン・シン・インド首相の訪日（概要と評価）〉《外務省》，2013 年 5 月 30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

⁶²³ 外務省，〈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概要）〉，《外務省》，2013 年 12 月 13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22_000792.html〉。

⁶²⁴ Barry Buzan & Eric Herring, *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 1998), pp. 83-100.

⁶²⁵ 以蒼龍級潛艦單艘造價 5~6 億美金計算，12 艘潛艦更換計畫加上包裹服務，總金額可能近百億美金。澳洲潛艦更換計畫 Sea 1000 的總預算則預估為 200 到 400 億美金。Collins Class Submarine Replacement | SEA 1000 Program, *Defence Portal*, Feb 18, 2015, 〈<http://defenceportal.com.au/collins-class-submarine-replacement-sea-1000-program/australian-defence-force-acquisition-programs/collins-class-submarine-replacement-sea-1000-program>〉。

⁶²⁶ 〈豪州・インド・ベトナムへ積極輸出 安倍首相-「(秘)潜水艦」で中国封じ込めへ：一発で空母を沈める魚雷を含め世界最高水準の技術をアジア諸国が渴望する〉，《Themis》，23(11)，2014 年 11 月，頁 30-31。

⁶²⁷ 陳鼎尹，個人面訪，神保謙，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高雄），2015 年 5 月 2 日。

⁶²⁸ 陳鼎尹，當面訪談，神保謙，Canon 戰略研究所（東京），2015 年 8 月 3 日。

⁶²⁹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年 7 月，頁 1-54。

四、日澳國防工業合作基礎與分歧

相較於前述在因應中國崛起、擴大美日澳/美日安全合作、東亞與南太平洋地區戰略佈局等軍事與政治上的一致性，日澳潛艦合作在國防工業與潛艦製造上反而可能會有較大的分歧，需要更多的協商與時間來找到符合彼此考量的合作方式。從積極面來看，日澳潛艦合作在經濟產業面的利基有兩點：當前全球國防工業國際合作的市場趨勢、皆有長期與美國國防工業合作的基礎。當前的全球國防工業(趨勢)有市場快速成長、海外訂單角色日趨重要、武器生產的全球化、國防預算縮減、提高的研發成本等趨勢，使得武器系統研發的國際合作越來越重要。⁶³⁰各國都想透過國際合作分擔研發軍事科技的風險與擴大海外市場，日本與澳洲也各自有對於自身造艦(船)業的盤算：日本希望透過戰後首次大規模武器出口的個案，推動武器外交並著眼於在未來搶食柴電潛艦市場的大餅，而澳洲希望恢復自身的造船業、也盼望相關技術有移轉到第三國的可能。其次，由於日、澳都是美國同盟國，過去已有美日共同防禦援助協議(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 MDAA)與美澳防務貿易合作條約(Defense Trade and Cooperation Treaty, DTCT)維持兩組雙邊安全關係下的防衛裝備合作，除了日本自衛隊(SDF)和澳洲國防軍都有大批的美國武器，日澳、日美澳之間的武器裝備保持高水平的相互操作性(high level of interoperability)。⁶³¹因此，2014年簽訂的日澳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議，不僅是日澳兩國，更是美日澳三國防衛裝備合作的基礎，美國也可能加入該製造計畫。

然而，國防工業的國際合作並不容易，其牽涉到合作國在全球防衛市場的位置、技術稟賦、外交政策、戰略考量、國際政治結構與地緣關係等方方面面。日本在武器出口解禁後，希望透過建立國際夥伴關係來推動共同研發與製造，推動國防工業進入國際市場。⁶³²澳洲由國防工業公司(Australia Defence Industries, ADI)與特尼克斯防務(Tenix Defence)兩家製造商執牛耳，主要股權卻大部分掌握在歐洲公司手裡。⁶³³從產業結構的角度，日澳潛艦合作是有互補性，例如日本可以試驗武器出口、甚至在國外完成的挑戰，澳洲則力圖透過技術轉移、建設十二艘潛艦的規模發展本土造艦能力與復興南澳的造船業。然而實際上卻會有很多問題。渡部恒雄認為，相對於共同的安全利益，蒼龍潛艦合作案最大的歧見是在技術面—日本並不希望因為與澳洲的潛艦軍售，使得蒼龍級潛艦的技術移轉至第三國。⁶³⁴而澳洲更有興趣的是技術、但日本傾向於「整艦輸出」，雙方尚未有共識。⁶³⁵

⁶³⁰ Richard A. Bitzinger, *The Modern Defense Indust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Praeger Publishers, 2009), pp. 1-12.

⁶³¹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77-79.

⁶³²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4卷第3期，2013年7月，頁1-54。

⁶³³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79-81.

⁶³⁴ 陳鼎尹，當面訪談，渡部恒雄，東京財團(東京)，2015年7月21日。

⁶³⁵ 陳鼎尹，當面訪談，渡部恒雄，東京財團(東京)，2015年7月21日。

澳洲提升建造潛艦的能力與技術將有益於區域安全，但日本產業界並不歡迎這樣的事情發生。此外，澳洲期望造艦計畫可以創造國內就業機會與帶動產業發展，要求一定的比例造艦必須在南澳阿得雷德(Adelaide)的造船廠完成將會是合同的一部分。⁶³⁶針對此點，神保謙認為，雖然無論從安全關係與國防工業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個案，但因為涉及戰後日本敏感軍事科技/零件的首次出口，究竟在生產過程的那一部分要在澳洲進行？那些技術可以移轉給澳洲？美國將如何參與？都是循而未解、依賴兩國協商的問題。⁶³⁷未來工學研究所一位匿名研究顧問則指出，未來會是美日澳三邊共同合作，或者透過美澳、日澳兩個雙邊合作推動共同研發，則要視澳洲政府的決定。⁶³⁸

伍、代結論—日澳同盟？

面對改變中的亞太戰略環境，美國近年推動的再平衡政策加速了同盟關係與與多邊安全關係的調整，形成了更廣泛與深化的美日、美日澳安全合作。⁶³⁹在這個背景下，自後冷戰逐步發展起來的日澳安全關係逐漸形成涵蓋經濟與軍事的戰略夥伴，兩國在民主、人權、開放的市場與自由貿易秩序等共同價值也進一步強化兩國的連結。處於初期階段的潛艦合作是雙方關係的里程碑，也同時是檢視未來安全關係發展與戰略、經濟意義的個案。

日本與澳洲的管轄海域（領海加上經濟海域）排名都在世界前六大，⁶⁴⁰都面對中國快速擴張的海空軍力，有維護西太平洋海上航線安全與區域穩定共同利益。這些因素加上兩者的地緣位置，具有在海上能力、情報、太空與網路的合作誘因，而潛艦作為海權實力的關鍵要素，更高度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然而，對於與日本同盟化的趨向，澳洲並非沒有疑慮。作為中國主要的貿易進口國之一，他們不僅擔心購買日本潛艦會導致中澳關係的倒退並影響到雙邊經濟關係，也相信日澳緊密的安全合作會在中日發生衝突時（例如釣魚台）被捲入。由於日澳關係已經從個人走向制度化，在越來越穩固並擴大的合作框架下，究竟和日本同盟化的關係要走到什麼地步、涉入東北亞要到什麼程度，是當前澳洲學界爭辯的焦點。⁶⁴¹

⁶³⁶ 日本和印度的 US-2 飛行艇計畫亦然，印度要求 30%飛機製造過程必須在印度國內進行。陳鼎尹，個人面訪，日本防衛研究中心匿名研究員，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高雄），2015 年 5 月 13 日。

⁶³⁷ 陳鼎尹，當面訪談，神保謙，Canon 戰略研究所（東京），2015 年 8 月 3 日。

⁶³⁸ 陳鼎尹，當面訪談，未來工學研究所匿名研究顧問，未來工學研究所（東京），2015 年 7 月 29 日。

⁶³⁹ 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⁶⁴⁰ 日本領海面積（包括內水約 43 萬平方公里）加上專屬經濟區面積（約 405 萬平方公里）為 447 萬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六位，澳洲則是排名第二（701 萬平方公里）。宋燕輝，《日本海洋政策發展與對策政策建議書（計畫編號：RDEC-PLN-101-003）》（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7 年）。

⁶⁴¹ Stephan Frühling, James Goldrick and Rory Medcalf, “Preserving the knowledge edge Surveillance cooperation and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in Asia”, ASPI, December 2014,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preserving-the-knowledge-edge-surveillance-cooperation-and-the-usaustralia-alliance-in-asia/SI80_C4ISR.pdf>, Nick Bisley & Brendan Taylor, CONFLICT IN THE

相對於澳洲的疑慮，日本戰略與安全事務自戰後就以美國馬首是瞻，日澳關係的發展雖然還是在美國的同盟架構之下，卻可以提高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性，同時是推動新外交策略的個案，同時具有象徵與實質的意義。

美國再平衡策略的框架之下，日本與澳洲都是美國調整戰略佈局樞紐(Pivot)，因此美澳、美日安全關係在近年都面臨合作領域、法規、行為準則等各方面的調整，然而本文相信美日是美國在東亞的最重要的盟友，所以強調美日同盟的轉型甚於美澳。換言之，儘管日澳關係深化乃至潛艦合作擴大了日本在外交與軍事合作的範疇，日本仍然必須計算美國的考量與利益，因此正如本文中提到的，美國在探詢加入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的可能。因此，日澳潛艦乃至日本外交的軍售策略可以走多遠，各個階段中美國的利益與想法是無法忽略的。最後，基於全球國防工業的大趨勢，各國除了積極尋找海外合作機會、透過合作作伴分擔技術開發的龐大成本，也都寄望帶動產業與創造工作機會，這樣的考量顯然不僅是經濟社會面向，更有國內政治與選舉的考量。日澳都希望共同的潛艦計畫可以為本國帶來商業機會以獲取國內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這裡就會遇到一個難題—整體造艦計畫究竟要有多少比例是在澳洲完成？那一些部分？技術移轉與共同開發的智產權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將是日澳之蒼龍級潛艦共同研究開始後，下一階段要面臨的最大問題。潛艦合作究竟會如何影響日澳安全關係，使得彼此同盟的進程前進或暫緩，以及美國的角色，將值得持續關注。

EAST CHINA SEA: WOULD ANZUS APPLY?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ACRI), 2014), <<http://www.uts.edu.au/sites/default/files/18924-acri-anzus-booklet-web.pdf>>. Robert Ayson & Desmond Ball, Escal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Australia (Strategic &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4)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宋燕輝，2007 年。《日本海洋政策發展與對策政策建議書（計畫編號：RDEC-PLN-101-003）》。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豬口孝著，賴郁君譯，1994 年。《經濟大國政治運作》。台北：月旦出版社。

期刊論文

郭育仁，2014/4。〈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策略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頁 43-64。

郭育仁，2013/7。〈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頁 1-54。

網際網路

郭育仁，2014/11/5。〈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訪談資料

陳鼎尹，當面訪談，神保謙，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高雄），2015 年 5 月 2 日。

陳鼎尹，當面訪談，日本防衛研究中心匿名研究員，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高雄），2015 年 5 月 13 日。

陳鼎尹，當面訪談，飯田將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京），2015 年 7 月 17 日。

陳鼎尹，當面訪談，渡部恒雄，東京財團（東京），2015 年 7 月 21 日。

陳鼎尹，當面訪談，未來工學研究所匿名研究顧問，未來工學研究所（東京），2015 年 7 月 29 日。

陳鼎尹，當面訪談，神保謙，Canon 戰略研究所（東京），2015 年 8 月 3 日。

英文部分

專書

Barry Buzan & Eric Herring, 1998. *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

Christopher W. Hughes. 2009. *Japan's Remilitarisation*. Routledge.

Christopher W. Hughes, 2004.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U.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G. John Ikenberry & Takashi Inoguchi, 2003.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 - 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200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U.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nneth B. Pyle, 2007.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U.S.: Perseus Books Group.
-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1999.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Michael J. Green, 1995. *Arming Japan: Defense Production,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Search for Autonomy*. U.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 J. Samuels, 2007.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U.S.: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 Richard A. Bitzinger, 2009. *The Modern Defense Indust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C.A.: Praeger Publishers.
- Robert Ayson & Desmond Ball, 2014. *Escal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Australia*. A.U.: Strategic & Defence Studies Centre.
-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NIDS), 2013.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2*. Tokyo: The Japan Times.
- The Tokyo Foundation, 2011/10.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 China: Integration, Balancing, and Deterrence in the Era of Power Shift*. Tokyo: The Tokyo Foundation.
- Yuki Tatsumi eds. 2015.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D.C.: Stimson Center.

期刊論文

- Yusuke Ishihara, 2014/03. "Japan-Australia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U-NIDS Joint Research: Beyond Hub and Spokes*, No.32, pp. 93-122.

網際網路

- Cabine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2014/7/8. "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Abe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Cabine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407/0708article1.html>.
- Cabine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2011/12/27. "Statement by th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on Guidelines for Overseas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etc.", *Cabine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http://japan.kantei.go.jp/noda/topics/201112/20111227DANWA_e.pdf>.
- Collins Class Submarine Replacement | SEA 1000 Program, Defence Portal, 2015/2/18, <<http://defenceportal.com.au/collins-class-submarine-replacement->

sea-1000-program/australian-defence-force-acquisition-programs/collins-class-submarine-replacement-sea-1000-program>.

Daily News, 2009/7/21. “U.S. 'is back' in Asia,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Daily New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world/u-s-back-asia-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declares-article-1.429381>>.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9.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Australian DOD*, <http://www.defence.gov.au/CDG/Document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2014/3/7. “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USDOD*,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2010/2.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USDOD*, <http://archive.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4/0314_sdr/qdr.aspx>.

Maritime Staff Office, 2013/06. “Participation in Japan-US-Australia Joint Exercise” *Notice*, <<http://www.mod.go.jp/msdf/formal/info/news/201306/062001.pdf>>.

MOFA, 2003/7/6. “Australia-Japan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to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MOFA*,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pmv0307/terrorism.html>>.

MOFA, 2007/3/13. “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MOFA*,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3.html>>.

MOFA, 2010/5/19. “The Signing of the Japan-Australia 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ACSA)”, *MOFA*, <http://www.mofa.go.jp/announce/announce/2010/5/0519_02.html>.

MOFA, 2012/5/17. “Signing of the Japan-Australia 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 (ISA)”, *MOFA*, <http://www.mofa.go.jp/announce/announce/2012/5/0517_01.html>.

MOFA, 2012/9/14. “4th Australia-Japan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tralia and Japan – Cooperating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Common Vision and Objectives”, *MOFA*,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pdfs/2plus2_1209.pdf>.

MOFA, 2014/7/8. “Joint Statement with Prime Minister Abe-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MOFA*, <<http://www.mofa.go.jp/files/000044640.pdf>>.

Nick Bisley & Brendan Taylor, 2014. “Conflict in the East China Sea: Would ANZUS Apply?”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ACRI), <<http://www.uts.edu.au/sites/default/files/18924-acri-anzus-booklet-web.pdf>>.

Stephan Frühling, James Goldrick and Rory Medcalf, 2014/12. “Preserving the

knowledge edge Surveillance cooperation and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in Asia”, *ASPI*,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preserving-the-knowledge-edge-surveillance-cooperation-and-the-usaustralia-alliance-in-asia/SI80_C4ISR.pdf>.

Submarine Institute of Australia, 2007/12/30. “Maximising Strategic Options in Constrained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The Future Underwater Warfare Capability- Australia’s Strategic Sting”, *SIA*, <http://www.submarineinstitute.com/userfiles/File/RAN_Seapower_Conference_2008_-_SIA_Paper_Final.pdf>.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2012/6/2, “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Leon Panetta”,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ld12-43d9/first-plenary-session-2749/leon-panetta-d67b>>.

U.S.-Australia-Japan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Forum, 2014/10/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U.S. State Department),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10/233252.htm>>.

WBUR, 2010/10/29. “Hillary Clinton on U.S. in Asia: 'Forward-Deployed'”, *WBUR*, October 29, 2010, <<http://onpoint.wbur.org/2010/10/29/clinton-asia-diplomacy>>.

Wu Jiao, 2012/10/7. “'Pivot to Asia' sidelined by US domestic woes”, *China Daily*,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10/07/content_17012099.htm>.

日文部分

期刊

Themis，2014/11。〈豪州・インド・ベトナムへ積極輸出 安倍首相-「(秘)潜水艦」で中国封じ込めへ：一発で空母を沈める魚雷を含め世界最高水準の技術をアジア諸国が渴望する〉，《Themis》，第23号，頁30-31。

山崎元泰，2015/1。〈「そうりゅう」型潜水艦の輸出実現に向けて：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は新たな時代へ〉，《改革者》，第56号，頁42-45。

香田洋二，2015/4。〈策定から1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第27号，頁10-13。

網際網路

内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会議設置準備室。〈「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について（説明資料）〉，《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kaigi/konkyo.html>>。

内閣官房特定秘密保護法施行準備室，2013/12/10。〈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説明資料〉，《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pages/tokuteihimitu.html>>。

内閣官房，2013/12/17。〈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内閣官房》，
<http://www.cas.go.jp/jp/siryu/131217anzenhoshou.html>。

外務省，〈オーストラリア連邦アーカイブ〉，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bn_topic.html。

外務省，2007/9。〈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を実施するための行動
 計画の主要な要素（仮訳）〉，《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0709_kk.html。

外務省，2013/10/3。〈より力強い同盟とより大きな責任の共有に向けて（仮
 訳）〉，《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閣僚会合）等の開催》，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6027.pdf>。

外務省，2014/4/7。〈日豪首脳会談に関する共同プレス発表〉，《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802.pdf>。

外務省，2014/6/11。〈第5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共同プレス発表（仮
 訳）〉，《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1605.pdf>。

外務省，2014/7/8。〈安倍総理とアボット首相共同声明“21世紀のための特別
 な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1605.pdf>。

外務省，2014/7/8。〈防衛装備品及び技術の移転に関する日本国政府とオース
 トラリア政府との間の協定〉，《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4421.pdf>。

外務省，2013/10/4。〈第5回日米豪閣僚級戦略対話(TSD)概要〉，《会談・訪
 問》，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462.html。

外務省，2015/4/27。〈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7.pdf>。

外務省，2014/7/8。〈オーストラリアン紙（豪州） 安倍総理大臣書面インタ
 ビュー〉，《外務省》，
<http://news.nna.jp/free/news/20130312aud002A.html>。

外務省，2013/5/30。〈マンモハン・シン・インド首相の訪日（概要と評価）〉
 《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

外務省，2013/12/13。〈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概要）〉，《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22_000792.html。

安倍晋三，〈豪州国会両院総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演説〉，《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0708australia_enzetsu.html。

防衛省，2013/12/17。《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The U.S. Factor of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in the Postwar Era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戰後北方四島爭端中的美國因素

日俄關係歷史分析

作者：楊中天

〈職稱：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碩士班〉

摘要

戰後日俄關係受制於北方四島爭議、冷戰結構以及雙邊關係處置不當導致迄今尚未簽屬和平條約，其中美國因素是日俄僵局的主要原因。自 1951 年美國決定以舊金山和約取代雅爾達協議作為安排戰後國際局勢的依據後，北方四島爭議就此成為日蘇關係發展的阻礙。透過製造國際法的模糊空間，藉由駐日美軍威嚇蘇聯並利用日本希望盡早結束盟軍佔領的心態美國在戰後初期成功阻止了日蘇國交正常化。1960 年安保條約的簽署進一步強化了北方四島的戰略價值，導致日蘇關係改善更形困難。冷戰期間縱有「政經分離」、「二島先行歸還」等構想，卻都無法帶來本質上的改善。時至終戰 70 周年的今日，北方四島爭議依舊懸而未決，日俄和平條約簽署之日更是遙遙無期。美國做為日俄關係中的自變數於製造、維持、複雜化北方四島爭議握有主動權，因此本文透過回顧日蘇/日俄關係發展的重要節點分析美國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如何維持對日蘇/日俄關係發展的主導地位。

關鍵字：日俄關係、北方領土、舊金山和約、美國霸權、美日同盟。

Abstract

The postwar Russo-Japanese relation was restrained by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Cold War structure and the mismanage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mong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key factor of a stalemated Russo-Japanese relation. Since 1951 when the U.S. replaced the Yalta agreement with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s the final arrangement of the postwar structure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has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 By creating ambig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s, deterring USSR with U.S. forces in Japan and utilizing Japan's wish for an early-end U.S. occupation Washington successfully obstructed the normalization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 The 1960 Mutual Security Treaty further promote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and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 more difficult. Despite the proposals of "Seikei Bunri" and "Two-Islands Firs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is still inaccessible. Until today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2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remains and the peace treaty is still in a distant future. Being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 the U.S. holds the initiative in creating, maintaining and complicating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way the U.S. upholds the initia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 throughout different decisive historical junctures.

Keywords: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U.S. Hegemony, U.S.-Japan Alliance

Introduction

The Russia/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period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the Cold War sentiment, and the mismanage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y both sides.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dominant position in arranging the regional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has been the single factor that hid behind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aspects that determined the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evise the postwar arrangement settled by the Yalta Agreement by recogniz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s the ultimately legitimate docu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as the essential cause for the unresolved territorial issue and the absence of a peace treaty between Soviet Union/Russia and Japan.⁶⁴²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the U.S. in Northeast Asia had a dominant influence on the attempt of both the Soviets and the Japanese in arranging their reconciliation. Finally, the U.S.' presence behind Japan's diplomacy and Soviet's strategic calcul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for both Moscow and Tokyo to conduct a fully independent bilateral foreign policy.⁶⁴³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key factors behind the vulnerable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creating, maintaining and complicating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and the prevention of a full Soviet/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The dispute over the Kurile Islands first appeared whe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ecided to amend its position in the Yalta Agreement, which granted the Soviet Union the entire Kurile Islands from Kamchatka to Hokkaido.⁶⁴⁴ In March 1947, whe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roposed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was finish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a debate over the "punitive peace" and the "benevolent peace" was set up.⁶⁴⁵

People who supported the "punitive peace" tended to honor the Yalta Agreement

⁶⁴² James E. Goodby, Vladimir I. 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p. 12.

⁶⁴³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 32.

⁶⁴⁴ "The Leaders of the three Great Powers-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have agreed that...the Soviet Union shall enter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 on the side of the Allies on condition that:...2. The former rights of Russia violated by the treacherous attack of Japan in 1904 shall be restored...3. The Kurile islands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Soviet Union...The Heads of the three Great Powers have agreed that these claims of the Soviet Union shall be unquestionably fulfilled after Japan has been defeated...,"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Crimea(Yalta) Conference, 1945: Entry of Soviet Union into War Against Japan* (Crimea, Yalta, February, 1945), <<http://www.loc.gov/la/w/help/us-treaties/bevans/m-ust000003-1022.pdf>>.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 18.

⁶⁴⁵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Berkeley: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p. 83.

and were aware of Soviet's military response to the overturn of the Yalta Agreement.⁶⁴⁶ They recognize the Soviet's sovereignty over the entire Kurile Islands including Etorofu, Kunashiri, Shikotan and Habomai as Japan's renouncement.⁶⁴⁷

The 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Charles Bohlen was one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punitive peace" who saw the recognition of Soviet's position is essential not merely for the peace settlement but for U.S.'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⁶⁴⁸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granting the four islands to the Soviets in the name of "punitive peace" to legitimize U.S.'s control over Okinawa.⁶⁴⁹ His argument was challenged by Hugh Borton, a Japan expert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who embraced the "benevolent peace".⁶⁵⁰ The motivation for Hugh Borton's "benevolent peace" was just like the one of Bohlen to maintain U.S. presence in Okinawa, but through an opposite approach. Borton proposed that the U.S. should recognize Japan's historical claim over the four southernmost islands in order to set up an anti-Soviet sentiment among Japanese that would in turn view the U.S. presence on Okinawa as protection for Japan against Soviet incursion.⁶⁵¹

Borton's idea was backed by the advisor to the Far Eastern Division, Conrad E. Snow who propos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four islands.⁶⁵² He recognized the smaller two islands - Shikotan and Habomai -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Kurile Islands and 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returned to Japan as he agreed to that Etorofu and Kunashir are part of the Kurils which should be yielded to Soviet Union according to the Yalta Agreement.⁶⁵³ Based on Snow's proposal, a new peace treaty draft was accept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29 December 1949 which compromised between "punitive peace" and the "benevolent peace".⁶⁵⁴

Since John Foster Dulles came in as a special advisor of the peace treaty in May 1950, the focus of the U.S. shifted from the internal debate over the two peace approaches to the absorption of Japan into U.S.'s anti-communism camp.⁶⁵⁵ The

⁶⁴⁶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19.

⁶⁴⁷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84.

⁶⁴⁸ James E. Goodby, Vladimir I. 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p. 15.

⁶⁴⁹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85.

⁶⁵⁰ *Ibid.*, p. 86.

⁶⁵¹ James E. Goodby, Vladimir I. 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p. 17.

⁶⁵² *Ibid.*, p. 18.

⁶⁵³ Bruce A. Elleman, Michael R. Nichols and Mathew J. Oimet,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Pacific Affairs*, Vol. 71, No. 4, Winter 1998/1999, p.495.

⁶⁵⁴ Richard deVillafranca, "Japan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Past, Present, Future," *Asian Survey*, Vol. 33, No. 6, 1993, p. 609.

⁶⁵⁵ Bruce A. Elleman, Michael R. Nichols and Mathew J. Oimet,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America's

Chinese Communist's victory in 1949 and the outbreak of Korean War in June 1950 marked the watershed that reversed U.S.'s policy for Japan from reform to rehabilitation.⁶⁵⁶ The reverse course also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S.'s position on the Kurile Islands issue.⁶⁵⁷

In order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keeping the Kurile dispute unresolved, Dulles adopted a two-hand strategy. During his negotiations with Japan's Prime Minister Yoshida Shigeru, Dulles promised that by accepting his peace treaty draft the Kurile Islands issue would only be settled once there is a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geographic boundary of the Kurile Islands.⁶⁵⁸ As for the Soviets, Dulles told Yakov Malik, Soviet'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legitimize their ownership of the Kurile Islands if they would sign the peace treaty.⁶⁵⁹ After gaining the trust from his Japanese and Soviet counterparts Dulles began finishing his draft of Peace Treaty.

On 23 March 1951 Dulles announced the draft of the peace treaty which contained clauses that shocked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Soviets.⁶⁶⁰ Article 5 stated that Japan should return south Sakhalin and the Kuriles to the USSR; however Article 9 prescribed that the treaty should not confer any rights, title or benefits to any non-signatory nations.⁶⁶¹ In addition, Article 20 prohibited Japan from granting to any state greater advantages than contemplated by the treaty. The Articles seem to express more sympathy on Soviet's side and the intention to honor the Yalta Treaty; however as Dulles announced this draft in a press conference he added orally that the Kuriles granted to Soviet Union in Article 5 does not include Habomai which belongs to Hokkaido, not the Kuriles. Later, Dulles stressed that Article 5 would not become effective unless the Soviets signed the peace treaty. Dulles' intention was clear that unless the Soviets were willing to give up Habomai no territory would be transferred from Japan to the Soviet Union legally.⁶⁶²

On 14 June 1951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nnounced their joint-amended version of the draft of peace treaty that turned out to be the basis of the San

Role in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p. 496.

⁶⁵⁶ Tsuyoshi Hasegawa,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45-1991*,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1), p. 138.

⁶⁵⁷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97.

⁶⁵⁸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92.

⁶⁵⁹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93.

⁶⁶⁰ Marc Gallicchio, "The Kuriles Controversy: U.S. Diplomacy in the Soviet-Japan Border Dispute, 1941-1956,"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1, February 1991, p. 97.

⁶⁶¹ *Ibid.*, p. 98.

⁶⁶² *Ibid.*, p. 99.

Francisco Peace Treaty.⁶⁶³ With British opposition to the separation of Habomai from the Kurils this draft slightly deviated from Dulles' version.⁶⁶⁴ Article 2 stated: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Kurile Islands, and to that portion of Sakhalin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to it over which Japan acquired sovereignt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of 5 Sept. 1905.*⁶⁶⁵

This Article 2 which is a revision to Article 5 of Dulles' initial draft included Habomai into the Kurils, but did not mention to whom Japan would renounce them to.

During the peace conference from the 4th through the 8th of September 1951 in San Francisco, the Soviet representative, Andrei Gromyko, who was th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objected to the U.S.-drafted peace treaty and proposed Soviet amendment.⁶⁶⁶ Gromyko urged the total respect to the Yalta Agreement, the indivisibility of the Kuril Islands and the withdrawal of foreign forces from Japan.⁶⁶⁷ Having failed to gain support from other participants Gromyko could not achieve any of his goals.⁶⁶⁸ On 8 September 1951 the peace treaty was signed by 49 countries, without the Soviet Union.⁶⁶⁹ Without Gromyko's signature Soviet and Japan remained in status of war till 1956.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as a huge vi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t assured United States' legitimacy in keeping military bases in Okinawa, softened Japanese nationalist's anti-America sentiment, prevented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the Kuril dispute and made Japan totally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engaging the Soviet Union. Japan howev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leverage in bargaining the content of the Peace Treaty. By making compromises on the ambiguous clauses in the Peace Treaty, Japan regained its independence. As for the Soviet Union, the miserable conclusion in San Francisco represented a missing piece of her Cold War diplomacy - an independent Japan polic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As to the Kurile Islands,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s a basis for a series of unsettlements. It left an undefined boundary of the Kuriles, secured the

⁶⁶³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37.

⁶⁶⁴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92.

⁶⁶⁵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s,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1951*,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6/volume-136-I-1832-English.pdf>>.

⁶⁶⁶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37.

⁶⁶⁷ *Ibid.*, p. 39.

⁶⁶⁸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97.

⁶⁶⁹ William Nester, "Japan, Russia,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Continuities, Changes, Obstacles, Opportunit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4, No. 4, November 1993, p. 722.

absence of a peace treaty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it removed the Yalta Agreement - the sole legitimate document of Soviet's occupation of the Kuri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kept Soviet Union unrelated to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December 1954, soon after Hatoyama Ichiro succeeded Yoshida Shigeru as Japan's Prime Minister he initiated a diplomatic agenda that deviated from his predecessor. Unlike Yoshida who disregarded the Japane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viet Union, Hatoyama Ichiro viewed the normalization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as the top priority of his administration.⁶⁷⁰ Thus, Hatoyama sought a mor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which does not proceed fu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⁶⁷¹

Since January 1955 the two sides launched the first round of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 in London.⁶⁷² Before sending his chief negotiator, Matsumoto Shunichi, to London, Hatoyama made clear to him that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is a must; the sovereignty issue over South Sakhalin and the entire Kurile Islands could be used as a bargaining chip.⁶⁷³ In August, two sides finally came to an agreement that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and Japan's view that the security trea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targeting the Soviet Union could be the preconditions for a peace treaty.⁶⁷⁴ At that very moment of reaching a full settlement on all disputes, Japan changed its course due to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 among right wings - Hatoyama's Democratic Party and Yoshida's Liberal Party which feared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would upset the United States.⁶⁷⁵ When Matsumoto hande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a new proposal, in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 included the Kunashiri and Etoropu with Habomai and Shikotan as Japan's minimal demand with an attempt to exclude these four islands from the Kurile Islands, and demande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discuss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Sakhalin and Kurile Islands.⁶⁷⁶ This reverse of course shocked the Khrushchev administration and was interpreted by the Russians as Japan's unwillingness to draw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Soviet Union.⁶⁷⁷ In retaliation to Japan's abrupt change of course Moscow imposed

⁶⁷⁰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07.

⁶⁷¹ *Ibid.*

⁶⁷² Richard deVillafranca, "Japan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Past, Present, Future," *Asian Survey*, Vol. 33, No. 6, 1993, p. 611.

⁶⁷³ *Ibid.*, p. 612.

⁶⁷⁴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38.

⁶⁷⁵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11.

⁶⁷⁶ Marc Gallicchio, "The Kuriles Controversy: U.S. Diplomacy in the Soviet-Japan Border Dispute, 1941-1956,"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1, February 1991, p. 96.

⁶⁷⁷ Semyon Verbitsky, *Misperceptions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00), p. 8.

strict restrictions on Japanese salmon fishing.⁶⁷⁸ Under the pressure on the fishing industry, Japan called for fishing negotiations in Moscow separated from the normalization talks.⁶⁷⁹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Japan adopted the *seikei bunri* (separation of politics from economy) strategy in Kuriles negotiations.⁶⁸⁰ The first round of London negotiations was the most favorable moment in postwar history for the two sides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On the surface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round was caused by Japan's unilateral decision. The fear of losing America's support was the key reason for Japan's harsher attitude at the end of the negotiations.

The domestic obstacle was soon removed as on 27 February 1955 Hatoyama's Japan Democratic Party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in the Diet and led to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Liberal Party in the same year.⁶⁸¹ Hatoyama's victory has made the U.S. wary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concluding a peace treaty which would undermine America's strategical deployment against the communism.⁶⁸² The resolution of the Soviet-Japan islands dispute might become an excuse for Japanese left-wingers to demand the withdrawal of American bases in Japan. In additio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Japan might open a door for a warmer PRC-Japanese relationship.⁶⁸³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expressed its strong support for Japan's original claim to all four islands.⁶⁸⁴ In light of the danger of America's legitimate occup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the U.S. adapt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o undermine Soviet's claims and reduce the possibility for Tokyo to make a concession and urged Japan to stand firm on the claim of four islands rather than two in order to assure Soviet rejection of the treaty.⁶⁸⁵

On 26 July 1956, a new round of normalization talks in Moscow began. After a series of bargaining, the Japanese chief negotiator, Foreign Minister Shigemitsu, backed down from his original position and tended to accept Moscow's terms that the Soviets would return only the two smaller islands and Japan would give up on pursuing sovereignty over South Sakhalin and the Kurile Islands, which in Japanese acknowledgement does not include Etorufu and Kunashiri. Shigemitsu's concession was opposed by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as well as Dulles which forced the Hatoyama

⁶⁷⁸ Bruce A. Elleman, Michael R. Nichols and Mathew J. Oimet,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p. 497.

⁶⁷⁹ *Ibid.*

⁶⁸⁰ Lonny E. Carlile,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Rus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eikei fukabun," *Pacific Affairs*, Vol. 67, No. 3, p. 402.

⁶⁸¹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16.

⁶⁸² *Ibid.*

⁶⁸³ *Ibid.*, pp. 114-115.

⁶⁸⁴ Richard deVillafranca, "Japan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Past, Present, Future," p. 614.

⁶⁸⁵ Marc Gallicchio, "The Kuriles Controversy: U.S. Diplomacy in the Soviet-Japan Border Dispute, 1941-1956," p. 91.

administration to give up this position.⁶⁸⁶

On 19 August Shigemitsu explained Japan's difficulties in the normalization talks with the Soviet Union to Dulles; what he gained from his American counterpart was a humiliation.⁶⁸⁷ Dulles accused Japan for exceeding its role on dissolving territorial issues and warned Japan that were Japan to make concessions on Etorofu and Kunashiri,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nnex Okinawa permanently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26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⁶⁸⁸

In an effort to remedy Dulles' tough rhetoric and assure the normalization talk will proceed in accordance to American interests, the State Department sent a memorandum to Japanese government addressing that (1) the Yalta Agreement was just a statement of Allied Powers' consensus and it does not present the final decision of post-war order; (2)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of the territories Japan renounced; (3) therefore Japan has no right to determine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renounced territories; (4)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Etorofu, Kunashiri, along with Habomai and Shikotan as Japan's inherent territory.⁶⁸⁹ The memorandum further prevented any compromises by identifying Etorofu and Kunashiri as terra nullius that has originally been Japan's territory.

The inconsistency of Japan's position has made the USSR suspicious of Japan's true intentions. In response to Japan's latest proposal restrained by domestic opposition

⁶⁸⁶ Richard deVillafranca, "Japan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Past, Present, Future," p. 614.

⁶⁸⁷ *Ibid.*, p. 615.

⁶⁸⁸ "...Should Japan make a peace settlement or war claims settlement with any State granting that State greater advantages than those provided by the present Treaty, those same advantages shall be extended to the parties to the present Treaty."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s,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1951*,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6/volume-136-I-1832-English.pdf>>.

⁶⁸⁹ The memorandum addressed: "...With respect to the territorial question, a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previously informed,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the so-called Yalta agreement as simp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s by the then heads of the participating powers, and not as a final determination by those powers or of any legal effect in transferring territories.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hich conferred no rights upon the Soviet Union because it refused to sign) did not determin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territories renounced by Japan, leaving that question, as was stated by the Deleg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San Francisco, to "international solvents other than this treaty". It is the considered opi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by virtue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Japan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territories renounced by it therein, and that this is not a matter to be resolved by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any single Allied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be bound to accept any action of this character and would have to reserve all its righ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ched the conclusion after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the islands of Etorofu and Kunashiri (along with the Habomai Islands and Shikotan which are a part of Hokkaido) have always been part of Japan proper and should in justice be acknowledged as under Japanese sovereignty.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gard Soviet agreement to this effect as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reduction of tension in the Far East, and speaking for itself would be inclined in that event to review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remainder of the Soviet claim,"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ume 23, part 1, Japan, document 97*,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5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3p1/d97>>.

and American pressure, Khrushchev made his stance clear that the peace treaty should be concluded before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and the two islands would be returned only if all Japanese territories controlled by the U.S., mainly referred to Okinawa, have been returned to Japan.⁶⁹⁰ This proposal is driven by both 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prestige.⁶⁹¹ The Soviets saw the U.S. presence in Japan as the major threat to its Far East interests, therefore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okyo and Washington would ease the pressure from the east.⁶⁹² By attaching Okinawa to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the Soviet Union attempted to highlight America's unwillingness to return Okinawa and stir up anti-America sentiment among Japanese nationalists.⁶⁹³ Beyond the strategic calculation there was a psychological reason for Khrushchev's insistence in binding Okinawa with Habomai and Shikotan: his pursuit of Soviet prestige. In his point of view, the Soviets as a victor of WW2 should enjoy prestige equal to the United States.⁶⁹⁴ Therefore there is no way that the Soviet Union can give up the two islands while the U.S. troops are still stationed in Okinawa.

The failure in the Moscow negotiations was a huge drawback on the popularity of Hatoyama administration, thus Hatoyama proposed that the normalization could be achieved prior to the resolution of territorial question.⁶⁹⁵ In the final stage of negotiations, concessions were made by both sides. Khrushchev withdrew the clause regarding Okinawa and Japan agreed to the settlement that the normalization will come prior to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⁶⁹⁶ On October 19, 1956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signed.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normalized and the state of war between them ended, even though a peace treaty remained absent.⁶⁹⁷ The normalization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was a compromise from the Soviet Unio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Khrushchev, Soviet's policy toward Japan was never independent.⁶⁹⁸ It has been the countermeas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ce in Japan. Therefore he was willing to exchange the two smaller islands for Japan's anti-America sentiment. Japan's position on the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

⁶⁹⁰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51.

⁶⁹¹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31.

⁶⁹²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53.

⁶⁹³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32.

⁶⁹⁴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54.

⁶⁹⁵ *Ibid.*, p. 55.

⁶⁹⁶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33.

⁶⁹⁷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aragraph 9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Japan and the USSR (1956)," *Joint Compendium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erritorial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http://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territory/edition92/period5.html>>.

⁶⁹⁸ James E. Goodby, Vladimir I. 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p. 18.

showed that Japan's Soviet policy was restra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A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oviet-Japanese rapprochement should never undermine America's hegemonic posi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refore the normalization that does not lead to total resolution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was acceptable.

The U.S.-Japan Mutual Security Treaty and the Stagnation in Cold War

The attempt to move on to peace treaty negotiations failed as the US-Japan Mutual Security Treaty was signed in 1960. This revision of the 1951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further assured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of the U.S. over the Soviet Union in Northeast Asia.⁶⁹⁹ Moscow responded to the enhanced alliance by withdrawing its commitment of returning Habomai and Shikotan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⁷⁰⁰ Japan, in response, affirmed the right on settling its own security arrangement and furthermore, extended its sovereignty claim beyond Habomai and Shikotan once again.⁷⁰¹ Despite the stalemate in the peace treaty negotiations,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ollowing the normaliz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and economic ties have both reached historical highs.⁷⁰² In 1966 a commercial flight route was opened between Moscow and Tokyo, and Japan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fly over Siberia.⁷⁰³ In 1967 Japan became USSR's largest trade partner among the capitalist states.⁷⁰⁴ Despite the economic breakthrough, the territorial issue has no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1960's.

In the early 1970's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saw a glimmer of hope for resolving the disputed islands following the settlement of Okinawa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y never reached any consensus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déten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⁷⁰⁵ In 1973 Japan's Prime Minister Tanaka and Soviet's leader Brezhnev both saw the necessity of bilateral talk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⁷⁰⁶ Caught unaware by the "Nixon Shock", Japan set off for a more independent foreign

⁶⁹⁹ Kazuhiko Togo,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five lost windows of opportunity," *Japan Forum*, Vol. 23, 2011, p. 125.

⁷⁰⁰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66.

⁷⁰¹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37.

⁷⁰²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45.

⁷⁰³ *Ibid.*

⁷⁰⁴ *Ibid.*

⁷⁰⁵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77.

⁷⁰⁶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47.

policy by initiating its own version of rapprochement with the PRC which was viewed by the Soviet Union as a big threat.⁷⁰⁷ In order to prevent a security agreement being made between Japan and PRC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Soviet's collective security agenda against PRC, Brezhnev saw the necessity of a summit with Japan.⁷⁰⁸ At the time Japan was heavily impacted by both the Sino-American détente and the "Oil Shock" in 1973. Tanaka perceived an opportunity to open up Japan's involvement in investing in the Soviet's Far East and Siberia in order to diversify its energy sources.⁷⁰⁹ After the Tanaka-Brezhnev Summit in 1973 neither Japan nor the USSR achieved their ultimate goal.⁷¹⁰ For Japan no progress was made in resolv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stead, it was used as a trump card by the Soviets to counter the Japan-PRC détente.⁷¹¹ Although the summit did not achieve any concrete agreement it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vulnerability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Right before the summit took place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ts position on rejecting Japan's pursuit of independent diplomacy clearly.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mposed a food embargo on Japan and criticized Japan for being a "free rider" on the U.S. security umbrella.⁷¹² Under American pressure Tanaka was not able to realize rapprochement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seemed to be even harder to resolve in the 1970s due to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On 9 September 1976 a Soviet pilot called Belenko landed his MiG 25 in Hakodate to ask for political asylum. This was the well-known Belenko incident. However, what frustrated the Soviet-Japan relations was not the revolting pilot but the mishandlings of Tokyo and Moscow. Instead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Soviets, Japan handed in the aircraf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intelligence purposes and Belenko was given asylum in United States.⁷¹³ In response to Japan's unilateral action the Soviet announced a 200 nautical mile maritime territory from the Kurile Islands that covered Hokkaido.⁷¹⁴ This made the territorial talk impossible to progress.

Failing to dissolve the PRC-Japan-America détente, the Soviets launched a military buildup in Asia-Pacific. Since 1978 the Soviet Union expanded its deploy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ich led to a more cautious Japan and the next round of

⁷⁰⁷ Tsuyoshi Hasegawa,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45-1991*, p. 197.

⁷⁰⁸ *Ibid.*, p. 198.

⁷⁰⁹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52.

⁷¹⁰ Tsuyoshi Hasegawa,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45-1991*, p. 200.

⁷¹¹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55.

⁷¹² Tsuyoshi Hasegawa,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45-1991*, p. 201.

⁷¹³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87.

⁷¹⁴ *Ibid.*

stalemates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⁷¹⁵ In light of Soviet military buildup on the four disputed islands along with Vietnam and areas around Sea of Okhotsk there was a strong remilitarization sentiment among the Japan Defense Agency, however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ended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bilateral relations in general.⁷¹⁶ Not until the United States made clear their response to Soviet's Asian expansion did Japan began to adopt a unified posi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September 1979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expressed its full support for Japan's position on the islands issue and announced its naval activities sphere would extend into the Sea of Okhotsk.⁷¹⁷ After this statement Japan sid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gnized the Soviet military buildup as a real threat to Japan.⁷¹⁸

In the next decade Japan's sup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n opposing Soviet military buildup and its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was comprehensive and immediate. In 1979 Japan join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later boycotted the Summer Olympics in Moscow in 1980.⁷¹⁹ In 1981 Japan initiated another round of sanction in response to Soviet's intervention in the crisis in Poland.⁷²⁰ In 1980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joined RIMPAC for the first time and soon after that a joint operational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⁷²¹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Japan's Prime Minister Suzuki Zenko announced that Japan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ense of sea lanes 1000 nautical miles stretched from Japan.⁷²² The situation became even worse as the KAL Incident took place. On September 1 1983 Soviet pilots downed a Korean Airline passenger plane near Sakhalin, leaving 269 people dead including 28 Japanese.⁷²³ This stirred up strong anti-Soviet sentiment in Japan and damag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⁷²⁴ Japan has given up its *seikei bunri* approach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78 and instead adopted the *seikei fukabun* (the inseparability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pproach.⁷²⁵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have

⁷¹⁵ James E. Goodby, Vladimir I. 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p. 80.

⁷¹⁶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61.

⁷¹⁷ *Ibid.*, p. 165.

⁷¹⁸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100.

⁷¹⁹ *Ibid.*, p. 88.

⁷²⁰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67.

⁷²¹ *Ibid.*

⁷²²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89.

⁷²³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p. 170.

⁷²⁴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101.

⁷²⁵ Lonny E. Carlile,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Rus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eikei fukabun," p. 413.

failed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throughout the Cold War. The reasons are varied; however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decisive force that drove Moscow and Tokyo away from each other.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imed at keeping Japan within its security orbital has made the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totally dependent on the wil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any attempt to reconcile must not exceed the tolerance of Washington. Japan could not form an independent Soviet policy due to its asymmetric position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which exists to counterbalance communist expansion in East Asia. The Soviets did not establish independent Japan policies since they perceived that Japan could not act by its own will. Despite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Cold War nature was correct the failure to reach out to each other independently was still a huge loss for these two economically complementary countries. Entering the 1990's the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s continued to be fraught with old problems and as well as new challenges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the Lost Decade

In the dawn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America's obstructive role in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gradually faded away as a result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ussian leadership and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⁷²⁶ Seizing the momentum of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power Bill Clinton began to take actions to achieve three strategic goals aiming to manage the possible results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first goal is to demolish the remaining Soviet influence within the Iron Curtain, second, neutralizing the Soviet threat to Northeast Asia and third,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the world economy.⁷²⁷ In order to realize Washington's strategic planning Japan was positioned once again in an important junc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only this time it is not for containment, it is for the sake of deepening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⁷²⁸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Washington was aware of the possible impact from the unwatched Russo-Japanese reconciliation.⁷²⁹ To the Americans a controlled rapprochement could instead bring strategic benefits to Washington.⁷³⁰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would only bring benefits to America

⁷²⁶ Tsuyoshi Hasegawa, "Why Did Russia and Japan Failed to Achieve Rapprochement in 1991-1996?" in Gilbert Rozman ed.,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p. 171.

⁷²⁷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Jersey: Princeton press, 2014), pp. 17-19.

⁷²⁸ Akitoshi Miyashita, *Limits to Power: Asymmetric Dependence and Japanese Foreign Aid Policy*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3), p. 105.

⁷²⁹ *Ibid.*, p. 107.

⁷³⁰ Brad William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15.

Washington adopted two approaches; one is to acquire first-h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rogress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their Japanese ally the other is to occupy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rapprochement.⁷³¹ George H.W. Bush and Bill Clinton urged Japan to initiate political contact with Moscow in exchange for Russia's higher tolerance to NATO expansion. Washington also encouraged Tokyo to offe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id to Russia's Far Eas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ase Moscow's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grated Russia into world economic system.⁷³² To their Russian counterparts both U.S. leaders encouraged Moscow to reach out for Tokyo in exchange for Russia's new position in the America-led world order.⁷³³

To the Russians Washington's proposal seems to be attractive. Within Moscow there was a new evaluation over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a debate over the prospect of establishing a new power structure in Northeast Asia with Russia playing a more active role.⁷³⁴ As the first Russian leader to visit Tokyo Gorbachev had the attempt of reconciliation in his mind as he shook hands with Foreign Minister Taro Nakayama in April 16, 1991.⁷³⁵ During his visit to Japan Gorbachev proposed a concept of a new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 with Moscow joining Tokyo and Washington forming a trilateral structure for Northeast Asia.⁷³⁶ Another intention is to infuse Japanese capital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into Russia's Far East to save Russian economy and develop the natural-resources-rich Far East.⁷³⁷ As for the Japanese side, Prime Minister Toshiki Kaifu saw Gorbachev's economic demand as a leverage to make the Russians yielded in the long-stagnant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⁷³⁸ With both eyeing on different agendas Gorbachev and Kaifu failed to tak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o another level.⁷³⁹ Despite the failure to make consensus on the dispute Gorbachev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oshiki Kaifu still signed 14 agreements regarding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trade exhibition and consolation to the long-deceased war dead in

⁷³¹ *Ibid.*, pp. 16-17.

⁷³² Joseph Ferguson,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ussia,"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11), p. 197.

⁷³³ *Ibid.*, p. 198.

⁷³⁴ David Arase and Tsuneo Akaha, *The US-Japan Alliance: Balancing Soft and Hard Power in East Asia* (Oxon: Routledge, 2010), p. 132.

⁷³⁵ John Woodruff, "Gorbachev tries to mend relations in Japan visit," *The Baltimore Sun*, April 16, 1991, <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1-04-16/news/1991106084_1_gorbachev-soviet-far-east-tokyo>.

⁷³⁶ 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pp. 209-210.

⁷³⁷ Joseph Ferguson,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ussia,"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pp. 204-205.

⁷³⁸ John-Thor Dahlburg, "Kaifu Urges Gorbachev to Concede Japan's Sovereignty Over 4 Islands : Summit: The Soviet leader, in turn, calls for an end to the 'Cold War' in Tokyo-Moscow relation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7, 1991, <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1-04-17/news/mn-95_1_soviet-union>.

⁷³⁹ Akitoshi Miyashita, *Limits to Power: Asymmetric Dependence and Japanese Foreign Aid Policy*, p. 106.

each country in the light of this historical moment.⁷⁴⁰ Nonetheless due to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the outcome of the first Soviet-Japanese head-of-state meeting was limited.

Washington's evaluation for the Gorbachev-Kaifu meeting is mainly positive because the U.S. remains the center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late 1980's there was a debate over Soviet'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es resulted from Gorbachev's *perestroika*.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 order to smoothly carry out *perestroika* Gorbachev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Washington in terms of securing USSR's prestige as a great power and to ease the internal objection.⁷⁴¹ The difficulties in reducing military expenses, converging partially military sector with civilian sector and the negotiations of arms reduction pushed Gorbachev to seek primarily Washington's good will in cooperation and that made the U.S. rest assured to see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Despite the milder global atmosphere and American blessings to the *perestroika* Gorbachev failed to survive the Shock Therapy and his Union of the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went down with him. His successor,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newly independent Russian Federation-Boris Yeltsin made compromises to Gorbachev's fundamental ideas in handling the great chang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⁷⁴² Economically Yeltsin accepted the IMF's proposal in conducting the Shock Therapy to decentralize and privatize former Soviet industrial bases, politically he agreed to democratize Russia and diplomatically he promised to lead Russia into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western-led world economy.⁷⁴³ Nevertheless the Shock Therapy became the source of Yeltsin's apprehension over Russia'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at made all the reconciliation attempts possible including the one with Japan.⁷⁴⁴

In October 12, 1993 Yeltsin made his first trip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okyo with his eyes on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benefits Japan could offer to rescue Russia's great power status from the sequela of the Shock Therapy.⁷⁴⁵ The trip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one year ago however,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⁷⁴⁰ John Woodruff, "Gorbachev visit to Japan may be short on substance," *The Baltimore Sun*, April 14, 1991, <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1-04-14/news/1991104077_1_gorbachev-peace-treaty-soviet-union>.

⁷⁴¹ Hiroshi Kimura,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and Yeltsin*, (New York: M.E. Sharpe Inc., 2000), pp. 15-16.

⁷⁴² Nikolas K. Gvosdev and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ectors, and Sectors* (Thousand Oaks: CQ Press, 2014), pp. 79-80.

⁷⁴³ 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pp. 14-18.

⁷⁴⁴ Kathy Wolfe, "Boris Yeltsin's visit to Japan can't mask Moscow coup,"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Volume 20, Number 42, October 29, 1993, pp. 53-54.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1993/eirv20n42-19931029/eirv20n42-19931029_053-boris_yeltsins_visit_to_japan_ca.pdf>.

⁷⁴⁵ Laura King, "Yeltsin hails improved ties Japan visit ends with promise on Kurile islands," *The Free Lance-Star*, October 13, 1993,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1298&dat=19931013&id=IuYyAAAAIABJ&sjid=lQcGAAAAIABJ&pg=6927,2527950&hl=zh-TW>>.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ability of his power that Yeltsin could not afford being inferi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visit was postponed to October 1993.⁷⁴⁶ Despite the delay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visit from both sides remained the same. For the Russians, enlarging Japanese aid was the top priority; as for the Japanese, making Yeltsin compromise o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s the sole purpose of this meeting.⁷⁴⁷ Viewing Russia as an underdog Japan intended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Russi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aknesses by making concrete scenarios for the return of the total four islands while Russia has made its largest concession ever by recognizing the dispute and being willing to transfer parts of the islands to Japan.⁷⁴⁸ In the joint conference at midnight October 13, 1993 the two leaders signed the 1993 Tokyo Declaration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reconfirm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1956 Soviet-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USSR and reassured the willingness of both sides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and to re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on the basis of law and justice.⁷⁴⁹ Nevertheless with the gap of different expectations un-narrowed the Yeltsin-Hosokawa meeting fail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erritorial deadlock even though this time they received blessings from Washington.⁷⁵⁰

Having Russia's integration into the America-led world order as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Russo-American relations Washington for the first time pushed Japan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Russia's concession.⁷⁵¹ However this time it was not the U.S. intervention but the two leaders' misperceptions should be blamed for the failure of the Yeltsin-Hosokawa meeting.

In 1994 and 1995 after the Yeltsin-Hosokawa mee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ent into stagnation due to respective domestic politics.⁷⁵² Yeltsin's power struggle has preserved him from reaching out to Japan.⁷⁵³ At the time Japan was undergoing regime changes which led to an absence of its Russian policy.⁷⁵⁴ But the ice began to melt whe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s started to change.

⁷⁴⁶ Hiroshi Kimura,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and Yeltsin*, pp. 144-145.

⁷⁴⁷ Thomas Easton, "Yeltsin, in visit to Tokyo, to discuss return of 4 Japanese islands seized in 1945," *The Baltimore Sun*, October 08, 1993, <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3-10-08/news/1993281033_1_president-yeltsin-visit-to-tokyo-russian-president-boris>.

⁷⁴⁸ Alexander Bukh,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ussia as Japan's 'oth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06.

⁷⁴⁹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okyo Declaration on Japan-Russia Relations*, October 13, 1993. <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declaration.html>>

⁷⁵⁰ Alexander Bukh,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ussia as Japan's 'other'*, p. 107.

⁷⁵¹ *Ibid.*, pp.106-107.

⁷⁵² Kimie Hara and Geoffrey Jukes, *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Aland Experience: Untying the Kurillian Knot* (Oxon: Routledge, 2009), p. 52.

⁷⁵³ 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Leiden: Brill, 2010), p.251.

⁷⁵⁴ *Ibid.*, p. 252.

Since January 1996 Ryutaro Hashimoto becam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Moscow and Tokyo began to be shortened.⁷⁵⁵ In his term as former Minister of MITI Hashimoto advocated expanding Japanese investment in Russian Far East. After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Hashimoto undertook a series of warm gestures toward Russia.⁷⁵⁶ The talks between Foreign Ministers of both sides began to touch upon various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terms of military hostility reduction and plans for expanding Russia's access to Japanese aids.⁷⁵⁷ Hashimoto administration's good faith was not only appreciated by the investment-hungry Russia but also echoed by the U.S.⁷⁵⁸

In 1997 at Denver G7 summit Bill Clinton urged Japan to assist Russia's economy in exchange for Russia's concession to NATO enlargement.⁷⁵⁹ Furthermore since mid-1990's a "track two" annual trilateral forum was held in Moscow, Tokyo and Washington each year consisted of mid-ranking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bureaucrats from these three countries discussing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⁷⁶⁰ A quasi-shock to Tokyo was America's unexpected enthusiasm in warming up with Russia in the 1990's that encouraged Japanese policy makers to follow suit.⁷⁶¹

In July 1997 a month after the G7 Summit following Yeltsin's good will and Clinton's pledge Hashimoto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softened Japanese attitude 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by announcing three principles: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and a long-term vision in regard to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⁷⁶² Based on the confidence-building process the two leaders decided to meet in an informal arrangement.⁷⁶³

In November 1997 at Krasnoyarsk in west Siberia Yeltsin and Hashimoto set up their first "no necktie" meeting. The result was less concrete as it was expected but a positive mood was shared by both sides. They agreed upon supporting each othe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cluding Japan's support to Russia in its APEC membership acquisition and Russia's support for Japan's permanent membership in UN Security Council.⁷⁶⁴ As for the territorial issue the "Yeltsin-Hashimoto Plan" expressed the

⁷⁵⁵ Brad William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p. 34.

⁷⁵⁶ *Ibid.*, pp. 35-36.

⁷⁵⁷ Alexander Bukh,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ussia as Japan's 'other'*, p. 108.

⁷⁵⁸ *Ibid.*, p. 109.

⁷⁵⁹ Michael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Press, 2001), p. 146.

⁷⁶⁰ Joseph Ferguson,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ussia," p. 198.

⁷⁶¹ *Ibid.*

⁷⁶² Haruhiro Fukui and Shigeko N. Fukai, "Japan in 1997: More Uncertain, Less Hopeful," *Asian Survey*, January, 1998, p. 33.

⁷⁶³ *Ibid.*

⁷⁶⁴ Mitsuko Nashima, "Hashimoto-Yeltsin plan stimulates bilateral economic ties," *The Japan Times*, APR 15, 1998, <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1998/04/15/national/hashimoto-yeltsin-plan-stimul>

wiliness to sign a peace treaty in year 2000 and sought a co-administration resolution to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was announced.⁷⁶⁵ In April 1998 the second “no necktie” meeting was held in Japan’s Kawa where the achievements were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eir previous meeting in Siberia and this outcome led to another drawback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⁷⁶⁶

The good will shared by Hashimoto and Yeltsin was the source for the rapprochement but it was also the cause for the following stagnation. The “Yeltsin-Hashimoto Plan” failed to initiate the both-satisfied settlement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and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due to the limited foundation for mutual trust which was mainly focused on economic ties a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eaders.⁷⁶⁷ Despite the warm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progress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Yeltsin and Hashimoto could not make any compromise 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due to respective domestic politics.⁷⁶⁸

Overall, in the 1990’s there were two major events that represent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the bilateral ties. First, in 1993 during the Yeltsin-Hosokawa meeting the Tokyo Declaration was signed to reiterate the 1956 Joint Declaration.⁷⁶⁹ Second, in 1998 there were a series of “Yeltsin-Hashimoto Tieless Summits” in which the “Yeltsin-Hashimoto Plan” was made to honor the preceding declaration and enhance further bilateral economic ties.⁷⁷⁰ Nevertheless neither a concrete resolution for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nor a solid diplomatic tie was made in this period of time due to respective uncertainties of both regimes and more importantly Japan’s misinterpretation of Russia’s weakness.⁷⁷¹ In the 1990’s U.S. and Japan’s priorities for a weak Russia diverged from U.S.’s attempt to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the new world order to Japan’s desire to making Russia give way to the four-island-returning initiative in the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⁷⁷² The abrupt change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was the major cause of this divergence.⁷⁷³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Russian threat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gone through a period of

ates-bilateral-economic-ties/#.Vdc9lPmqkko>.

⁷⁶⁵ Kazuhiko Tōgō,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p.254.

⁷⁶⁶ *Ibid.*, p. 255.

⁷⁶⁷ Alexei V. Zagorsky, “Three Years on a Path to Nowhere: The Hashimoto Initiative in Russian-Japanese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74, No. 1 Spring 2001, pp. 75-93.

⁷⁶⁸ Sonni Efron and Carol J. Williams, “Tieless Yeltsin, Hashimoto Talk Tie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9, 1998, <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8/apr/19/news/mn-40968>>.

⁷⁶⁹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okyo Declaration on Japan-Russia Relations*, October 13, 1993. <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declaration.html>.>

⁷⁷⁰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rogr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shimoto-Yeltsin Plan*, August, 1999. < <http://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assistance/hashimoto.html> .>

⁷⁷¹ Kazuhiko Tōgō,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p.257.

⁷⁷² Kimie Hara and Geoffrey Jukes, *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Aland Experience: Untying the Kurillian Knot*, pp. 37-38.

⁷⁷³ Robyn Lim, *The Geopolitics of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46.

“alliance drifting” which made Japan reevaluate the necessity of binding its foreign policy with Washington’s global strategy and led to the hesitation of providing economic assistance to Russia without getting significant territorial concession from Russia in return.⁷⁷⁴ As Russian nationalism rising Yeltsin became less able to make way for neither U.S. nor Japan’s strategic planning for Russia therefore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 went through a lost decade filled with both positive imagination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⁷⁷⁵

The Resurgence of Russia and a Realistic Approach

Entering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nessed the resurgence of a proactive Russia under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former KGB officer Vladimir Putin who was viewed by Washington and Tokyo as a strong man capable of handling the respective bilateral ties.⁷⁷⁶ Since Putin’s first visit to Tokyo in September 2000 Russia and Japan started another round of engagement with Russia-friendly fraction within LDP paving the way for the first reconciliation in the opening of the Millennium.⁷⁷⁷ The U.S.-Russian relation was sublimated into quasi-alliance thanks to their cooperation in Bush’s Global War on Terror.⁷⁷⁸ In the dawn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Russia began to regain its lost ground of global and regional influence as Putin enjoying much stronger support from its domestic fellows.⁷⁷⁹

Since 2000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Vladimir Putin has been in charged in the bilateral issues with his Japanese counterpart. Four months after hi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Putin made his first visit to Tokyo in September 2000 where he honored the 1956 Joint Statement which indicated that Russia will return the two smaller islands to Japan once the peace treaty is signed.⁷⁸⁰ Mori Administration was excited about this achievement for Putin had the public foundation to fully decide the territorial arrangement unlike Yeltsin.⁷⁸¹ From 2000 to 2001, Putin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Yoshiro Mori who was the leader of Russia-friendly fraction within LDP have met five times in both countries and made a joint statement in Irkutsk Communique in March

⁷⁷⁴ Tatsuo Akaneya, *The Japanese-US Alliance: A New Definition*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 p. 40.

⁷⁷⁵ Sonni Efron and Carol J. Williams, “Tieless Yeltsin, Hashimoto Talk Ties,”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8/apr/19/news/mn-40968>>

⁷⁷⁶ Alexander Bukh,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ussia as Japan’s ‘other’*, p. 138.

⁷⁷⁷ Brad William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p. 39.

⁷⁷⁸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95-96.

⁷⁷⁹ Nikolas K. Gvosdev and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ectors, and Sectors*, pp. 84-86.

⁷⁸⁰ 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p.220.

⁷⁸¹ *Ibid.*

2001.⁷⁸² In the Irkutsk Statement Mori made a bold move in dealing with Russia over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Mori announced the “two-track” settlement that accepted the returning of the Shikotan and Habomai as the first stage of settlement and leave the two larger islands Kunashiri and Etorupu to the second stage.⁷⁸³ This “two-track” settlement was a huge concession made by Japanese side and a political gamble of Mori in securing his political lifetime.⁷⁸⁴ Despite the warm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and the tight personal ties with Putin Mori’s proposal was rejected by the Russian President and opposed by LDP members which led to Mori’s resign one month after the Irkutsk Summit.⁷⁸⁵ The failure of Mori Administration did not stop right there, in the end of 2001 Mori’s trusted aide Muneo Suzuki who was a Diet member from Hokkaido in charging of the “two-track” approach was arrested for corruption and was outcast from Russia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group in the next administration.⁷⁸⁶ The meteoric “two-track” settlement was buried together with the short-lived Mori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is century.⁷⁸⁷

Despite the disappointed result of Putin-Mori rapprochement the Moscow-Washington relations have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Unlike their predecessors-Clinton and Yeltsin who built bilateral ties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 Bush and Putin tended to settle a consistent national relation that can last longer than their presidency.⁷⁸⁸ Despite the downgrade of U.S.-Russian relations by Bush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his first presidency this two gentlemen at their first joint conference expressed admiration for each other and showed enthusiastic in expand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⁷⁸⁹ The 9/11 attack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a short but significant U.S.-Russia alliance that ultimately chang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for decades to come.⁷⁹⁰

On September 9 2001, two days before the suicide plane attacks Putin warned Bush the possibility of Islamic extremists attack on United States based on Russian intelligence in Afghanistan.⁷⁹¹ After the attack Putin expressed his compassion at once

⁷⁸²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Irkutsk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Continuation of Future Negotiations on the Issue of a Peace Treaty*, March 25, 2001. < <http://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pmv0103/state.html>.>

⁷⁸³ Brad William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p. 175.

⁷⁸⁴ Joseph P.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Oxon: Routledge, 2008), pp. 104-105.

⁷⁸⁵ 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p.409.

⁷⁸⁶ “Suzuki faces arrest over lumber bribe,” *Japan Times*, June 15, 2002, <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news/2002/06/15/news/suzuki-faces-arrest-over-lumber-bribe/#.VfeUKBGqqkp>>.

⁷⁸⁷ Joseph P.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Oxon: Routledge, 2008), p. 109.

⁷⁸⁸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49.

⁷⁸⁹ *Ibid.*, p. 50.

⁷⁹⁰ *Ibid.*, p. 51.

⁷⁹¹ Joseph Ferguson,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ussia,”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and showed the willingness to assist the U.S. with the war on terror.⁷⁹² The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in Afghanistan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both sides to build up mutual trust based on their own strategic needs. For Putin the incentive to come to America's need was to restore Russia's great power status.⁷⁹³ By allowing the U.S. troops to set up bases in Central Asia and providing intelligence regarding Al Qaeda's locations Russia could gain the trust of the U.S., the access to western invest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justify its' own activity in Chechnya.⁷⁹⁴ Putin eyes the longer term strategic influence through the aid on the War on Terror which demonstrated America's need for Russian intelligence, Russia's permission to use military bases in its backyard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priority of consulting the Russians.⁷⁹⁵ For Bush, th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was more issue-oriented and lack of strategic dimension.⁷⁹⁶ However they both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fruit of the first U.S.-Russia alliance ever since the war on German Nazis.

The huge success of Russo-U.S. cooperation in the war on terror has raised Japan's wariness of being left behind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by the rapid reconciliation of Russia and the U.S.⁷⁹⁷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chiro Koizumi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for both Russia and the U.S.⁷⁹⁸ With the vivid memory of being humiliat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Koizumi promised to join U.S.-led war on terror at once and Japanese Diet passed the Anti-Terrorism Law in just six weeks after the 9/11 to show their solid support to their senior ally.⁷⁹⁹ The law authorized Japan's Self Defense Force (JSDF) to provide logistic support to U.S.-led military operation in Afghanistan.⁸⁰⁰ As the war expanded to overthrowing Saddam Hussain from Iraq Koizumi stepped up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cho the request of his ally by passing the Special Measures Law on Humanitarian and Reconstruction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p. 200.

⁷⁹²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5.

⁷⁹³ Nikolas K. Gvosdev and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ectors, and Sectors*, p. 87.

⁷⁹⁴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66-67.

⁷⁹⁵ *Ibid.*

⁷⁹⁶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94-95.

⁷⁹⁷ Joseph Ferguson,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ussia,"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p. 201.

⁷⁹⁸ Daniel Koizhi Hagashima Jr. *Waves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Constrained Bilateralism and Political Multilateralism to Reinforced Bilater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n Arbor: ProQuest, 2007), p. 45.

⁷⁹⁹ Paul Midford, *Rethinking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and Security: From Pacifism to Reali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7.

⁸⁰⁰ Daniel Koizhi Hagashima Jr. *Waves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Constrained Bilateralism and Political Multilateralism to Reinforced Bilater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 47.

Assistance in July 2003.⁸⁰¹ This law represents a breakthrough in post-war Japanese defense legislation by removing the precondition of UN-led PKO and expanded the scope and legitimacy of JSDF global dispatch.⁸⁰² To make Japan more adaptive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oizumi did not stop at pleasing the U.S. instead he took it one step further to reach out to Russia with eyes on balancing the Russo-U.S. rapprochement and seeking new possibilit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⁸⁰³

In early 2003 Koizumi met Putin in Moscow and Khabarovsk respectively and signed the “Action Plan” with Putin presenting greater interest of both sides in enhancing economic ties and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world economic syste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affirmed the determination to implement all the existent consensus based on 1956 Joint Declaration, 1993 Tokyo Declaration and the 2001 Irkutsk Statement.⁸⁰⁴ In addition Koizumi offered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aid in dissolving 40 decommissioned Soviet nuclear submarines in Russian Far East.⁸⁰⁵ Despite all the efforts both sides had no strong incentives to resolve the territorial issue in this juncture. Putin tended to talk less about the return of any island while Koizumi stood firm on the four-islands returning policy.⁸⁰⁶ Therefore no progress was made regarding the territorial issue in the give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honeymoon for Bush and Putin did not last long. In 2003 on the edge of Iraq War these two gentlemen came to many disagreements.⁸⁰⁷ Bush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convince the world that Sad am Hussain regime is highly related to Al Qaeda and need to be overrun.⁸⁰⁸ While Bush was trying to convince its traditional allies to

⁸⁰¹ Yutaka Kawashima,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3), p. 41.

⁸⁰² *Ibid.*

⁸⁰³ *Ibid.*, p. 42.

⁸⁰⁴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Junichiro Koizumi and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Concerning the Adoption of a Japan-Russia Action Plan*, January 10, 2003. <<http://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pmv0301/joint.html>>

⁸⁰⁵ Akio Kawato, “How Russia Matters in Japan-U.S. Alliance,”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p. 186.

⁸⁰⁶ Kimie Hara and Geoffrey Jukes, *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Aland Experience: Untying the Kurillian Knot*, p. 42.

⁸⁰⁷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96.

⁸⁰⁸ “...Iraq continues to flaunt its hostility toward America and to support terror. The Iraqi regime has plotted to develop anthrax, and nerve gas, and nuclear weapons for over a decade. This is a regime that has already used poison gas to murder thousands of its own citizens -- leaving the bodies of mothers huddled over their dead children. This is a regime that agreed to international inspections -- then kicked out the inspectors. This is a regime that has something to hide from the civilized world.

States like these, and their terrorist allies, constitute an axis of evil, arming to threaten the peace of the world. By seek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se regimes pose a grave and growing danger. They could provide these arms to terrorists, giving them the means to match their hatred. They could attack our allies or attempt to blackmail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of these cases, the price of

support him on the war, Putin wa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way his American counterparts treat Russia.⁸⁰⁹ Putin was look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 Russia being raised by the Americans on the war in Iraq, however this time he was disappointed.⁸¹⁰ Unlike the war in Afghanistan Bush administration adopted unilateralism on the war in Iraq which Russia viewed as a huge ignorance of Russia's interests in Iraq and a betrayed of the consensus made during the war in Afghanistan.⁸¹¹

In addition to the Iraq War, Russia and America confronted each other on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settlement of security and regional order in Europe.⁸¹² Through America's withdraw from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Treaty), the settlement of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to the NATO expansion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rew deeper.⁸¹³

In comparison to the honey moon between Bush and Putin during the War on Terror, the approaches Bush administration adopted toward Russia on the issue of Iraq and the security issues in Europe were not only unilateralism but provocative.⁸¹⁴ This is much to do with the result of constant debates 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 of bureaucrats within Washington.⁸¹⁵ One of them saw the weakness of Russia and its strategic need for United States as an opportunity to further weaken its influence by enlarging NATO, deploying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Europe and downgraded the ABM Treaty others viewed a weak Russia as a potential partner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U.S. should secure a rapprochement toward Russia the rest eyed at Russia's po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 record and proposed a more passive attitude to a warmer bilateral relations.⁸¹⁶ Due to the internal wrestling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ussian policy in this period was fragmented and lack of inconsistency

indifference would be catastrophic.

We will work closely with our coalition to deny terrorists and their state sponsors the materials, technology, and expertise to make and delive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e will develop and deploy effective missile defenses to protect America and our allies from sudden attack. And all nations should know: America will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our nation's security...,"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9, 2002, <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⁸⁰⁹ Nikolas K. Gvosdev and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ectors, and Sectors*, pp. 86-87.

⁸¹⁰ *Ibid.*, p. 87.

⁸¹¹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93.

⁸¹² Ainius Lasas,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Expans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0), pp. 99-101.

⁸¹³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72-75.

⁸¹⁴ Nikolas K. Gvosdev and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ectors, and Sectors*, p. 85.

⁸¹⁵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118.

⁸¹⁶ *Ibid.*, pp. 119-121.

however the Bush-Putin era did provide a window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to sustain a relativel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powers in comparison to the storm that is about to come at the border of post-Soviet states.⁸¹⁷

The color revolutions spreading along the border of Russia and former Soviet states further soured the Russo-U.S. relations.⁸¹⁸ The Rose Revolution happened in Tbilisi, Georgia in November 2003 as a result of the questionable impartiality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led to victory of the reformists.⁸¹⁹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o-western reformists this movement became the source of conten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From Washington's perspective Georgia's value in providing military base for the War on Terror, building a strategic-important Caspian oil pipeline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makes it worthy of supporting the newly elected regime even though it means challenge to the interests of Moscow which sees Georgia as its backyard and access to Middle East and Caspian region.⁸²⁰ The Orange Revolution took place in Kiev in November 2004 stirred up the fi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over the influence over Ukraine.⁸²¹

Despite the sour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scow and Washington the tie between Tokyo and Moscow was not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U.S. factor thanks to Tokyo's realistic approach toward Moscow. In the ligh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attempt to fill the vacuum of power in East Asia due to U.S.'s strategic transfer to Middle East and Russia's peripheral regions Japan moved on to honor the "Action Plan" which represents the revival of the *seikei bunri* approach abandoned in the 1980's.⁸²² Since 2003 Japan has been contesting with China over the route of the East Siberia-Pacific Ocean oil pipeline that was saw as a solution to Japan's overreliance on Persian Gulf for energy supply and as a counterbalance to a closer ti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⁸²³ As a result the Japan-backed Pacific Route was chosen as the ultimate scheme in the end of 2004.⁸²⁴ The constant lobbying for Russian officials and oil giants accompanying the stalemate of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 spoke of the shift of rationale for

⁸¹⁷ Ainius Lasas,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Expans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 65.

⁸¹⁸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97-98.

⁸¹⁹ "How the Rose revolution happened," *BBC News*, May 10, 2005, < <http://news.bbc.co.uk/2/hi/4532539.stm>>.

⁸²⁰ Nikolas K. Gvosdev and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ectors, and Sectors*, p. 177.

⁸²¹ Rajen Menon and Eugene Rumer,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Unwinding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5), pp. 34-35.

⁸²² Natasha Kuhrt, *Russi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Japan: The 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Oxon: Routledge, 2007), p. 147.

⁸²³ Thane Gustafson, *Wheel of Fortune: The Battle for Oil and Power in Russi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2012), p. 173.

⁸²⁴ *Ibid.*, p. 174.

managing the bilateral ties.⁸²⁵

The shift from territorial dispute-centered mentality to the economy-focused approach was related to the revival of Russian economy and the resurgence of Russ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⁸²⁶ The rise of oil price since 2000 has empowered Putin's priority in bringing Russia back to the arena of East Asian power politics and that made the resolution of territorial dispute less attractive to Putin.⁸²⁷ Realizing any concession from their Russian counterpart is unrealistic Japan turned their eyes to the mutual beneficial energy projects in Russian Far East as well as East Siberia seeking a new model of managing bilateral tie.⁸²⁸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Japan and Russia were back to the *seikei bunri* mechanism with bilateral economic tie soaring while the territorial negotiation continued to be in stagnation.⁸²⁹ However this twenty first-century *seikei bunri* leaves Japan higher autonomy than the one they enjoyed before 1980's due to the weakened U.S. factor in restraining Tokyo's approaching to Moscow. Entering into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th Russia and Japan a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arismatic national figures.⁸³⁰ The wa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engage each other and the way they deal with the declining but still eminent U.S. hegemony will have a deeper impact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Shinzo Abe came back to power in late 2012 as Japan's Prime Minister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has been achieved i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In April 13 2013 Abe made his first visit to Moscow which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a decade co-hosting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utin pledged to improv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in every possible way including the territorial issue.⁸³¹ Abe's visit is both histor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It is the first leadership summit since the catastrophe involving one Japanese fisherman shot dead by Russian coast guards in the waters of the dispute islands in 2006 symbolizing the repair of the bilateral ties.⁸³² It also opened up a window for Japanese strategic calculation to including Russia as a positive factor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decade.⁸³³ In November 2, 2013 the first two-plus-

⁸²⁵ Natasha Kuhrt, *Russi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Japan: The 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p. 148.

⁸²⁶ Akio Kawato, "How Russia Matters in Japan-U.S. Alliance,"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p. 187.

⁸²⁷ Natasha Kuhrt, *Russi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Japan: The 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pp. 150-151.

⁸²⁸ Natasha Kuhrt, *Russi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Japan: The 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p. 149.

⁸²⁹ Alexander Bukh,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ussia as Japan's 'other'*, p. 113.

⁸³⁰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284.

⁸³¹ Kirill, Kudryavtsev, "Japan PM, Putin seek progress on islands dispute," *ABC NEWS*, April 29, 2013, <<http://www.abc.net.au/news/2013-04-29/an-japan2c-russia-discuss-islands-dispute/4658814>>

⁸³² Justin McCurry, "Japanese fisherman killed in Kuril dispute," *The Guardian*, August 16, 2006,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aug/16/japan.russia>>.

⁸³³ "Abe looks to Moscow after regional spats," *The Japan Times*, May 1, 2013, <<http://www.japantim>

two meeting between Russian and Japan was held in Moscow making Russia the third country to hold a two-plus-two meeting with Japan besides the U.S. and France.⁸³⁴ This movement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of Russia's strategic value in Japan's security policy thanks to the rise of China.⁸³⁵

The reevaluation of either country'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by both sides took place in 2013 when an observed increasing Chinese naval activities in the Okhotsk Sea. In July 14, 2013, right after the Sino-Russian joint exercise in Vladivostok five Chinese vessels passing the Tsuruga Straits entered Okhotsk Sea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⁸³⁶ On the same day Putin ordered a largest military exercise in Russia's Far East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⁸³⁷ The motivation of Putin's order remains in doubt but his wiliness in not to avoiding the Sino-suspicion interpretation is for sure.⁸³⁸ In addition, since 2012 the numbers of China's intrusion into Japan's air domain surpassed Russia as number on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ontinued to be on the top for the coming years due to the escalation of Senkaku/Diaoyu dispute which led to the shift of Japan's defense focus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facing China.⁸³⁹ Undoubtedly, China has given Russia and Japan a persuasive excuse to seek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hich has been in a long vacuum due to the absence of a common threat between these two Northeast Asian rivals.

The repositioning of Russia in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received a green light from Washington in the beginning of Abe-Putin rapprochement.⁸⁴⁰ From 2013 through 2014 Abe and Putin has met seven times despite the Ukraine crisis happened in February 2014.⁸⁴¹ Followed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U.S. started to forge its

es.co.jp/news/2013/05/01/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looks-to-moscow-after-regional-spats/#.VfgmexGqqko >.

⁸³⁴ The National Strategic Review,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4 (Tokyo: The Japan Times, Ltd, 2014), pp. 211-212.

⁸³⁵ Polina Chernitsa, "Russia, Japan two-plus-two talks: Goodwill format," *Sputnik News*, November 2, 2013, < http://sputniknews.com/voiceofrussia/2013_11_02/Russia-Japan-two-plus-two-talks-Goodwill-format-0060/>.

⁸³⁶ Zachary Keck, "Russia Holds Massive Military Drill Aimed at China, Japan," *The Diplomat*, July 17, 2013, < <http://thediplomat.com/2013/07/russia-holds-massive-military-drill-aimed-at-china-japan/>>.

⁸³⁷ "Putin attends largest military exercises in Russia's Far East since Soviet-era," *The Voice of Russia*, July 16, 2013, <http://sputniknews.com/voiceofrussia/news/2013_07_16/Putin-attends-massive-military-exercises-in-Russias-Far-East-since-Soviet-era-1855/>.

⁸³⁸ Hyodo Shinji, "Japan-Russia Relations in Triangular Context with China," *The ASAN Forum*, November 22, 2013,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russia-relations-in-triangular-context-with-china/>>.

⁸³⁹ "China's activities surrounding Japan's airspace,"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 http://www.mod.go.jp/e/d_act/ryouku/>.

⁸⁴⁰ Clint Richards, "A Putin-Abe Summit Doesn't Threaten the US," *The Diplomat*, August 27, 2014, < <http://thediplomat.com/2014/08/a-putin-abe-summit-doesnt-threaten-the-us/>>.

⁸⁴¹ Isabel Reynolds, "Abe Keeps Putin Flame Alive in Balancing Act on Ukraine Visit," *Bloomberg*, June 5, 2015, <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6-04/abe-keeps-putin-flame-alive-in-balancing-act-on-ukraine-visit> >.

allies into an anti-Russia campaign with economic sanctions and diplomatic boycott as measures against Russia's intrusion in Ukraine.⁸⁴² Abe was caught embarrassed as his Russian policy gradually to make ways for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for territorial talks and his attempt to neutralize Russia in Japan's security environment began to receive outcomes.⁸⁴³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the Washington Abe reluctantly complied with the anti-Russian policy of his senior ally and adopted the lightest sanctions among the G7.⁸⁴⁴ As the situation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 continued to rise Putin's visit to Tokyo has been postponed and the atmosphere for territorial talks worsened.⁸⁴⁵ Given the clash of core interests of Moscow and Washington the 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was once again interrupted by U.S.'s Russian policy in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Facing a resurgent Russia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Putin Japanese leadership gradually formed a realistic approach toward Moscow. The *seikei bunri* approach consisting of shelving the dispute and enlarging common interests has brought the bilateral tie a new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to the first *seikei bunri* in the 1970's which narrowed in scope and depth to the raw materials trade this time the concern over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power structure is gradually turning *seikei bunri* into a comprehensive Russian policy of Japan that has been abs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ost war period. For Japan a comprehensive Russia policy requires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for both sides and more importantly a friendly U.S.-Russian relation.⁸⁴⁶ These two elements have to coexist in order to form a comprehensively independent Russia Policy of Japan unfortunately this happened only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the honeymoon between Abe and Putin from 2013 to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in March 2014.⁸⁴⁷ Before then there has been several times when the U.S.-Russian relation enjoyed a friendly atmosphere but there was no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for Japan and Russia. As the two sides began to recognize China's assertiveness and its

⁸⁴² United States, *Executive Order -- Blocking Property of Certain Persons Contribu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March 06, 2014, <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3/06/executive-order-blocking-property-certain-persons-contributing-situation> >.

⁸⁴³ "Obama asked Abe to deal with Russia cautiously," *The Japan Times*, May 16, 2015, <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5/16/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obama-asked-abe-to-deal-with-russia-cautiously/#.VferCxGqqko> >.

⁸⁴⁴ "Japan imposes additional sanctions on Russia over Ukraine," *The Japan Times*, August 5, 2014, <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8/05/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imposes-additional-sanctions-on-russia-over-ukraine/#.VfesXxGqqko> >.

⁸⁴⁵ "Abe drops plan for Japan visit by Putin, eyes summit during APEC meet," *The Japan Times*, September 23, 2014, <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9/23/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drops-plan-for-japan-visit-by-putin-eyes-summit-during-apec-meet/#.VfetCxGqqko> >.

⁸⁴⁶ Yuka Hayashi, "Abe, Putin Agree to Improve Ties Despite Sanc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9, 2014, < <http://www.wsj.com/articles/abe-putin-meet-ahead-of-apec-summit-1415560145> >.

⁸⁴⁷ Hiroki Sugita, "Abe's diplomacy with Putin," *The Japan Times*, September 1, 2015, <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9/01/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s-diplomacy-putin/#.VfewchGqqko> >.

uncertainties as a common threat the U.S.-Russian relation deteriorated once again. Given the concern over the rise of China is not going to be excluded anytime soon whether a comprehensive Russia policy can be formed in the Abe-Putin era depends on U.S. perception of the disengage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 from the U.S.-Russian relation.

Conclusion

Throughout the postwar history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are said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bilateral misperceptions however the U.S. factor is a singl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in e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juncture. From the first attempt to reach consensus on the two-islands settlement in the Hatoyama-Khrushchev meetings, the friendship of convenience between Tanaka and Brezhnev,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Hashimoto-Yeltsin tieless summits, the Action Plan with *seikei bunri* characteristics made by the Koizumi-Putin rapprochement to the China-driven Abe-Putin cooperation the U.S. policy shifts have always been the source of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every juncture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and find ways for a durabl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U.S. factor should be singled out as the primal element for analysis.

As Hatoyama and Khrushchev tried to fill the gap of the bilateral tie caused b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the U.S. stepped in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of their contact.⁸⁴⁸ The U.S. used the San Francisco treaty to block the Soviets from getting full access to arrange the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structure and leveraged Japan with their desire of getting rid of the U.S. occupa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⁸⁴⁹ The Dulles intervention was merely a catalyst of the failure of concluding a peace treaty. It was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the U.S. occupation of Japan that functioned as a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accommodation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Moscow and Tokyo attempted to explore more opportun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Nixon Shock. Tanaka and Brezhnev seized the window of U.S. détente to bypass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and promote the bilateral economic tie. However the attempt to form a bilateral relation deviated from the U.S. influence came to a halt because of the revival of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⁸⁵⁰ The glimpse of

⁸⁴⁸ Joseph P.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p. 35.

⁸⁴⁹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p. 18.

⁸⁵⁰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 254.

independent bilateral policies appeared in the Tanaka-Brezhnev summit was actually a false impression of Tokyo and Moscow being autonomous in launching the reconciliation. In fact they never escaped from Washington's management of Northeast Asia's power structure and have always been contained by the U.S.'s pace of Cold War détente.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s threat to East Asia have brought a new opportunity for rearranging the Moscow-Tokyo-Washington relations. Throughout the 1990's the experiment of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world economy and reevaluating Russian Far East in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structure have never ceased.⁸⁵¹ The Hashimoto-Yeltsin tieless summits were a mechanism used by both sides to leverage each other 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with the economic interests in developing Russian Far East.⁸⁵² However it was the mistrust caused by the long-lasting suspicion in the Cold War prevented Yeltsin and Hashimoto from reaching out to a formal settlement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⁸⁵³ In the end of 1990's the fri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began to grow as Russia opposing NATO expansion and supporting PRC's position in Taiwan crisis.⁸⁵⁴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 was once again restrained in the aftermath of Cold War and challenged by new contingencies in the new era.

Hope rises as Putin came to office being seen by many optimists as an opportunity for renegotiating the territorial issue.⁸⁵⁵ However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 did not go as smooth as expected due to political turmoil in Japan and the reoriented of the U.S.-Japan alliance.⁸⁵⁶ The demise of pro-Russia politicians within LDP has hinde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Moscow and Tokyo.⁸⁵⁷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global scope of operation of U.S.-Japan Alliance and a more-than-ever proactive Japan under Koizumi's legislation breakthrough have limite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to the economic warm-political cold second *seikei bunri* period.

Entering the year 2012 new opportunities emerged as Russia, Japan, China and

⁸⁵¹ Brad William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p. 91.

⁸⁵² Joseph P.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p. 88.

⁸⁵³ 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p.254.

⁸⁵⁴ Ainius Lasas,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Expans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101-102.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85-186.

⁸⁵⁵ Joseph P.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p. 98.

⁸⁵⁶ David Arase and Tsuneo Akaha, *The US-Japan Alliance: Balancing Soft and Hard Power in East Asia*, pp. 143-145.

⁸⁵⁷ Brad William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p. 26.

the U.S. welcomed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ir governments. Russia, after a four-year leadership of Medvedev with Putin sitting behind the chair regained its assertiveness in global affairs as Putin reelected as President.⁸⁵⁸ China's new leader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with the call of China Dream aiming at economic reform and military buildup.⁸⁵⁹ Shinzo Abe's victory in Japan symbolized the abandonment of postwar mentality i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enhancement of military projection capability. With eyes on bringing Japan back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Abe applied the bird's eye view of global affairs and promoting Japan's contribution to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order to turn Japan into a normal state with full military projection capability and a more symmetric partnership with the U.S.⁸⁶⁰ With China's growing provocation in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urbulence in Middle East the second Obama administration welcomed Shinzo Abe's proactive pacifism for Japan and accelerated TPP negotiation for solidifying U.S. presence in Asia-Pacific and for the first time promoting the spoke to spoke connection to enhance the America-led hub-spoke system.⁸⁶¹ However Abe's effort to neutralizing Russia was not appreciated by Obama administration.⁸⁶²

Since 2012 Abe and Putin set up a new model of communication with territorial dispute being set aside, economic cooperation running the show and strategic dialogue emerging as a new channel for the first time Washington has been left behind to the unexpected Abe-Putin model.⁸⁶³ Their attempt to maintain this new model continued even in the overture of Russia's intrusion in Crimea.⁸⁶⁴ Following suit the U.S. pressure in sanctioning Russia Abe reluctantly withdrew from the new model with Russia.⁸⁶⁵ So as Putin reluctantly and reactively responded to Abe's new position with more than once emphasizing that the door is opened for future dialogue with Japan.⁸⁶⁶ The U.S.

⁸⁵⁸ "Putin declared president-elect," *Russia Today*, March 5, 2012, < <http://www.rt.com/news/putin-wi-n-presidential-election-813/>>.

⁸⁵⁹ "Xi Jinping and the Chinese dream," *The Economist*, May 4, 2013, <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77070-vision-chinas-new-president-should-serve-his-people-not-nationalist-state-xi-jinping>>.

⁸⁶⁰ Yujen Kuo,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 46, 2014, pp. 43-64.

⁸⁶¹ The United State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Unlocking Opportunity for Americans through trade with the Asia Pacific*,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 <https://ustr.gov/tpp/>>.

⁸⁶² "Japan pursues top-level talks with Russia despite U.S. concern," *The Asahi Shimbun*, May 23, 2015, <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505230035>.

⁸⁶³ Yuya Shino, "Japan's Abe seeks talks with Russia's Putin; No TPP proposals with Obama," *Reuters*, October 15, 2014, <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0/15/us-japan-abe-idUSKCN0I40AR20141015>>.

⁸⁶⁴ Bakhtiar Usmonov, "Russia and Japan in the Face of Sanctions," *New Eastern Outlook*, April 25, 2015, < <http://journal-neo.org/2015/04/25/rus-rossiya-i-yaponiya-na-fone-sanktsij/>>.

⁸⁶⁵ "Japan admits US pressure behind anti-Russian sanctions – Duma speaker," *Russia Today*, May 22, 2015, < <http://www.rt.com/politics/261113-naryshkin-japan-us-pressure/>>.

⁸⁶⁶ "Putin ready to discuss isle row but hits Japan's sanctions over Ukraine," *The Japan Times*, April 17, 2015, <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4/17/national/putin-says-hes-ready-discuss-isle-row-hits-japans-sanctions-ukraine/#.VffIGxGqkqo>>.

factor once again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hip. However was this time Washington's block originated from a strategic concern of a closer Russo-Japanese tie? Or is it merely a case-oriented intervention to decelerate 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turbulence in Eastern Europe?

Given Abe administration's U.S.-Japan alliance-centered defense reform, growing uncertainties in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s blue naval buildup Washington have reasons to rest assured that their junior ally will stand firmly with U.S.'s arrangement for Northeast Asia.⁸⁶⁷ Nevertheless as Washington continuing to consider Russia the major threat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y further attempt to reach out to Moscow from Tokyo will be watched closely and intervened periodically by their elder brother.⁸⁶⁸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Syria were just catalysts for U.S.'s intervention in establishing a new model of Russo-Japanese communication. It is the potential penetration to U.S.'s hegemonic position in Northeast Asia caused by an uncontrollable closer tie between its major threat and its major ally that makes Washington keep its eyes on Abe-Putin rapprochement vigilantly. The sanction against Crimean annexation is just a measure to regain the initiative in 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which Washington has lost since 2012.

⁸⁶⁷ Thomas Gibbons-Neff, "China appears to be building another airstr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5,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5/09/15/china-appears-to-be-building-another-airstrip-in-the-south-china-sea/>>.

Emma Chanlett-Avery and Ian E. Rinehart, *The U.S.-Japan Alliance*, (Washington DC, US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pp. 6-9.

⁸⁶⁸ "Russia and China pose largest security threats, says US military report," *The Guardian*, July 1, 2015, <<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jul/01/russia-china-us-military-national-security>>.

Bibliography

Books

Akaneya, Tatsuo, 1998. *The Japanese-US Alliance: A New Definition*.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rase, David and Akaha, Tsuneo, 2010. *The US-Japan Alliance: Balancing Soft and Hard Power in East Asia*. Oxon: Routledge.

Bukh, Alexander, 2010.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ussia as Japan's 'other'*. New York: Routledge.

Chanlett-Avery, Emma and Rinehart, Ian E., 2013. *The U.S.-Japan Alliance*. Washington DC, US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rguson, Joseph, 2008.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Oxon: Routledge.

Goodby, James E., Ivanov, Vladimir I., Shimotamai, Nobuo, 1995.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Green, Michael, 2001.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Press.

Gustafson, Thane, 2012. *Wheel of Fortune: The Battle for Oil and Power in Russi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Gvosdev, Nikolas K., and Marsh, Christopher, 2014.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ectors, and Sectors*. Thousand Oaks: CQ Press.

Hagashima, Daniel Koizhi Jr., 2007. *Waves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Constrained Bilateralism and Political Multilateralism to Reinforced Bilater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n Arbor: ProQuest, 2007.

Hara, Kimie and Jukes, Geoffrey, 2009. *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Aland Experience: Untying the Kurillian Knot*. Oxon: Routledge.

Hasegawa, Tsuyoshi, 2011.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45-1991*.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Hasegawa, Tsuyoshi, 1998.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Berkley: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Kawashima, Yutaka, 2003.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Kimura, Hiroshi, 2000.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and Yeltsin*. New York: M.E. Sharpe Inc.

Kuhr, Natasha, 2007. *Russi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Japan: The 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Oxon: Routledge.

Lasas, Ainius, 2010.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Expans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im, Robyn, 2003. *The Geopolitics of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Menon, Rajen and Rumer, Eugene, 2015.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Unwinding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Midford, Paul, 2011. *Rethinking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and Security: From Pacifism to Reali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iyashita, Akitoshi, 2003. *Limits to Power: Asymmetric Dependence and Japanese Foreign Aid Policy*.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Plokhyy, Serhii, 2014.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Pyle, Kenneth B., 2007.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Rozman, Gilbert, 2000.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tent, Angela E., 2014.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Jersey: Princeton pres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2014.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Tokyo: The Japan Times, Ltd.

Togo, Kazuhiko, 2010.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Leiden: Brill.

Tucker, Nancy Bernkopf, 2009.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erbitsky, Semyon, 2000. *Misperceptions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Williams, Brad, 2007.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Zubok, Vladislav M., 2007. *A Failed Empir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ook Chapters

Ferguson, Joseph, 2011.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ussia,"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Palgrave. pp. 195-216.

Hasegawa, Tsuyoshi, 1999. "Why Did Russia and Japan Failed to Achieve Rapprochement in 1991-1996?" in Gilbert Rozman ed.,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New York: St. Martin's. pp. 158-198.

Kawato, Akio, 2011. "How Russia Matters in Japan-U.S. Alliance?,"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Palgrave. pp. 177-193.

Journal Articles

Carlile, Lonny E.,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Rus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eikei fukabun," *Pacific Affairs*, Vol. 67, No. 3, pp. 411-432.

Elleman, Bruce A., Nichols, Michael R., and Oimet, Mathew J., Winter 1998/1999.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Pacific Affairs*, Vol. 71, No. 4, pp. 489-504.

Fukui, Haruhiro and Fukai, Shigeko N., January, 1998. "Japan in 1997: More Uncertain, Less Hopeful," *Asian Survey*, pp. 24- 33.

Gallicchio, Marc, February, 1991. "The Kuriles Controversy: U.S. Diplomacy in the Soviet-Japan Border Dispute, 1941-1956,"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1, pp. 69-101.

Kuo, Yujen, 2014.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 46, pp. 43-64.

Nester, William, November, 1993. "Japan, Russia,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Continuities, Changes, Obstacles, Opportunit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4, No. 4, pp. 717-734.

Togo, Kazuhiko, 2011.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five lost windows of opportunity," *Japan Forum*, Vol. 23, pp. 123-145.

Villafranca, Richard de, 1993. "Japan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Past, Present, Future," *Asian Survey*, Vol. 33, No. 6, pp. 610-624.

Zagorsky, Alexei V., Spring 2001. "Three Years on a Path to Nowhere: The Hashimoto Initiative in Russian-Japanese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74, No. 1, pp. 75-93.

Web Sources

Chernitsa, Polina, 2013/11/02. "Russia, Japan two-plus-two talks: Goodwill format," *Sputnik News*, <http://sputniknews.com/voiceofrussia/2013_11_02/Russia-Japan-two-plus-two-talks-Goodwill-format-0060/>.

"China's activities surrounding Japan's airspace,"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http://www.mod.go.jp/e/d_act/ryouku/>.

Dahlburg, John-Thor, 1991/04/17. "Kaifu Urges Gorbachev to Concede Japan's Sovereignty Over 4 Islands : Summit: The Soviet leader, in turn, calls for an end to the 'Cold War' in Tokyo-Moscow relations,"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1-04-17/news/mn-95_1_soviet-union.>

Easton, Thomas, 1993/10/08. "Yeltsin, in visit to Tokyo, to discuss return of 4 Japanese islands seized in 1945," *The Baltimore Sun*,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3-10-08/news/1993281033_1_president-yeltsin-visit-to-tokyo-russian-president-boris>.

Efron, Sonni and Williams, Carol J., 1998/04/19. "Tieless Yeltsin, Hashimoto Talk Ties,"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8/apr/19/news/mn-40968>>.

Hayashi, Yuka, 2014/11/09. "Abe, Putin Agree to Improve Ties Despite Sanc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wsj.com/articles/abe-putin-meet-ahead-of-apec-summit-1415560145>>.

Keck, Zachary, 2013/07/17. "Russia Holds Massive Military Drill Aimed at China, Japan,"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7/russia-holds-massive-military-drill-aimed-at-china-japan/>>.

Kirill, Kudryavtsev, 2013/04/29. "Japan PM, Putin seek progress on islands dispute,"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3-04-29/an-japan2c-russia-discuss-islands-dispute/4658814>>.

Laura King, 1993/10/13. "Yeltsin hails improved ties Japan visit ends with promise on Kurile islands," *The Free Lance-Star*,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1298&dat=19931013&id=IuYyAAAAIBAJ&sjid=lQcGAAAAIBAJ&pg=6927,2527950&hl=zh-TW>>.

McCurry, Justin, 2006/08/16. "Japanese fisherman killed in Kuril dispute," *The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aug/16/japan.russ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aragraph 9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Japan

and the USSR (1956),” *Joint Compendium of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erritorial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http://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territory/edition92/period5.html>>.

Nashima, Mitsuko, 1998/04/15. “Hashimoto-Yeltsin plan stimulates bilateral economic ties,”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1998/04/15/national/hashimoto-yeltsin-plan-stimulates-bilateral-economic-ties/#.Vdc9lPmqkko>>.

Reynolds, Isabel, 2015/06/05. “Abe Keeps Putin Flame Alive in Balancing Act on Ukraine Visit,” *Bloomberg*,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6-04/abe-keeps-putin-flame-alive-in-balancing-act-on-ukraine-visit>>.

Richards, Clint, 2014/08/27. “A Putin-Abe Summit Doesn’t Threaten the US,”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8/a-putin-abe-summit-doesnt-threaten-the-us/>>.

Shinji, Hyodo, 2013/11/22. “Japan-Russia Relations in Triangular Context with China,” *The ASAN Forum*,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russia-relations-in-triangular-context-with-china/>>.

Shino, Yuya, 2014/10/15. “Japan's Abe seeks talks with Russia's Putin; No TPP proposals with Obama,”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0/15/us-japan-abe-idUSKCN0I40AR20141015>>.

Sugita, Hiroki, 2015/09/01. “Abe’s diplomacy with Putin,”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9/01/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s-diplomacy-putin/#.VfewchGqqko>>.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1945/02/11. *Crimea(Yalta) Conference, 1945: Entry of Soviet Union into War Against Japan*, <<http://www.loc.gov/law/help/us-treaties/bevans/m-ust000003-1022.pdf>>.

The United States, 2014/03/06. *Executive Order -- Blocking Property of Certain Persons Contribu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3/06/executive-order-blocking-property-certain-persons-contributing-situatio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1956/0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ume 23, part 1, Japan, document 9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3p1/d97>>.

The United State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Unlocking Opportunity for Americans through trade with the Asia Pacific*,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 <https://ustr.gov/tpp/>>.

Thomas Gibbons-Neff, 2015/09/15. "China appears to be building another airstr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5/09/15/china-appears-to-be-building-another-airstrip-in-the-south-china-sea/>>.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s,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1951*,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6/volume-136-I-1832-English.pdf>>.

Usmonov, Bakhtiar, 2015/04/25. "Russia and Japan in the Face of Sanctions," *New Eastern Outlook*, <<http://journal-neo.org/2015/04/25/rus-rossiya-i-yaponiya-na-fone-sanktsij/>>.

Wolfe, Kathy, 1993/10/29. "Boris Yeltsin's visit to Japan can't mask Moscow coup,"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Volume 20, Number 42, pp. 53-54.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1993/eirv20n42-19931029/eirv20n42-19931029_053-boris_yeltsins_visit_to_japan_ca.pdf>.

Woodruff, John, 1991/04/16. "Gorbachev tries to mend relations in Japan visit," *The Baltimore Sun*,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1-04-16/news/1991106084_1_gorbachev-soviet-far-east-tokyo>.

2002/06/15. "Suzuki faces arrest over lumber bribe," *Japan Times*,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news/2002/06/15/news/suzuki-faces-arrest-over-lumber-bribe/#.VfeUKBGqqkp>>.

2005/05/10. "How the Rose revolution happened,"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4532539.stm>>.

2012/05/05. "Putin declared president-elect," *Russia Today*, <<http://www.rt.com/news/putin-win-presidential-election-813/>>.

2013/05/01. "Abe looks to Moscow after regional spats,"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3/05/01/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looks-to-moscow-after-regional-spats/#.VfgmexGqqko>>.

2013/05/04. "Xi Jinping and the Chinese dream,"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77070-vision-chinas-new-president-should-serve-his-people-not-nationalist-state-xi-jinping>>.

2013/07/16. "Putin attends largest military exercises in Russia's Far East since Soviet-era," *The Voice of Russia*, <http://sputniknews.com/voiceofrussia/news/2013_07_16/Putin-attends-massive-military-exercises-in-Russias-Far-East-since-Soviet-era-1855/>.

2014/08/05. "Japan imposes additional sanctions on Russia over Ukraine,"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8/05/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imposes-additional-sanctions-on-russia-over-ukraine/#.VfesXxGqqko>>.

2014/09/23. "Abe drops plan for Japan visit by Putin, eyes summit during APEC meet,"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9/23/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drops-plan-for-japan-visit-by-putin-eyes-summit-during-apec-meet/#.VfetCxGqqko>>.

2015/04/17. "Putin ready to discuss isle row but hits Japan's sanctions over Ukraine,"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4/17/national/putin-says-hes-ready-discuss-isle-row-hits-japans-sanctions-ukraine/#.VffIGxGqqko>>.

2015/05/16. "Obama asked Abe to deal with Russia cautiously,"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5/16/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obama-asked-abe-to-deal-with-russia-cautiously/#.VferCxGqqko>>.

2015/05/22. "Japan admits US pressure behind anti-Russian sanctions – Duma speaker," *Russia Today*, <<http://www.rt.com/politics/261113-naryshkin-japan-us-pressure/>>.

2015/05/23. "Japan pursues top-level talks with Russia despite U.S. concern," *The Asahi Shimbun*,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505230035>.

2015/07/01. "Russia and China pose largest security threats, says US military report," *The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jul/01/russia-china-us-military-national-security>>.